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
海军兴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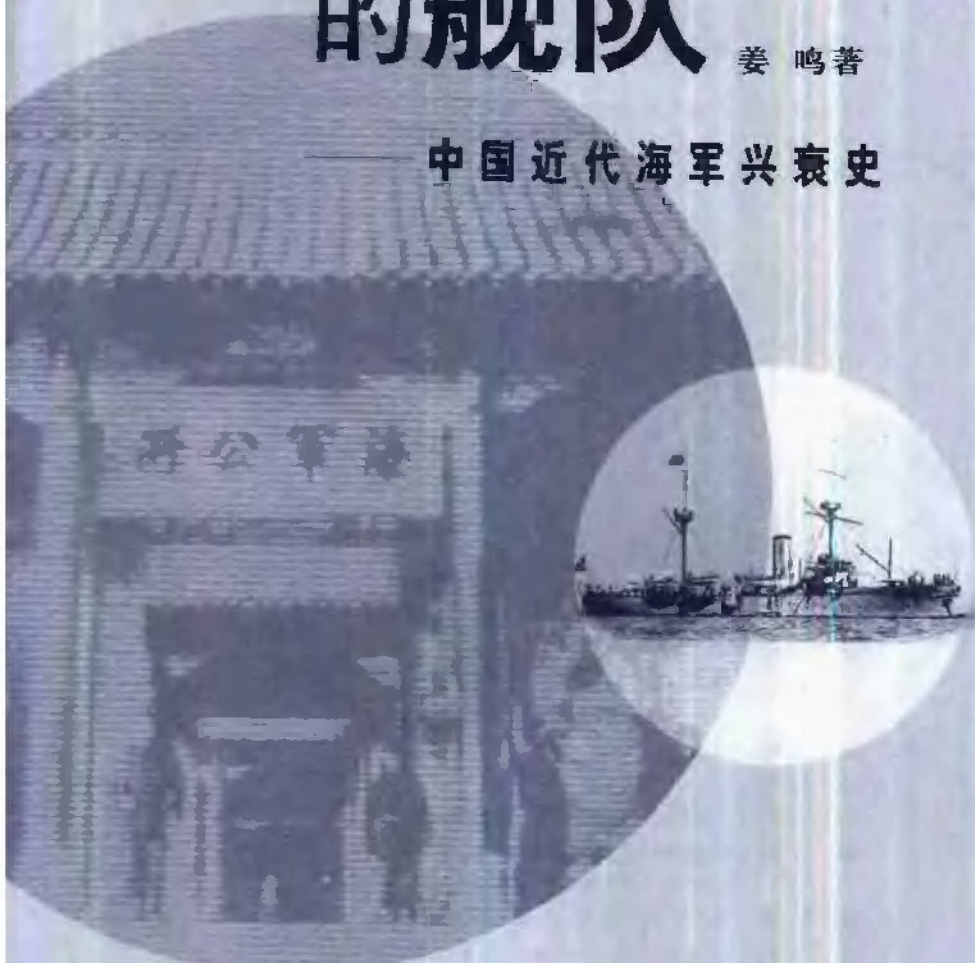


【增订本】

龙旗飘扬 的舰队

姜 鸣 著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 —增订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2
ISBN 7-108-01748-2

I. 龙… II. 姜… III. 海军—军事史—研究
—中国—清后期 IV. F1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4827 号

责任编辑 潘振平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36
字 数 48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姜鸣

1957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副总经理。出版有《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被调整的目光》等。

责任编辑:潘振平
封面设计:罗洪

序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令人瞩目的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孜孜求索,以年轻人特有的朝气,给学界带来了蓬勃生机。姜鸣同志是其中之一。

他从1981年起,在我指导下专攻中国近代海军史。十年耕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军事史和船史研究界同仁的注意。本书是他关于海军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原拟作为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丛书》的一种,后来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只好先单独出书了。

从一开始起,我们就议定了海军史研究的几项原则:既要着重考察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又要认真研究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关键性细节,避免使近代海军史写成不相接续的事件堆积;既要对近代海军的发展过程作动态研究,又需对有关海军建设的各项制度、舰性能、军舰炮械、教育训练等做充分的静态研究,避免把近代海军史写成海战史;既要深入研究北洋海军,又应对南洋、福建、广东地区的海军发展状况进行勾稽考索,避免把近代海军史写成北洋舰队史;既要充分注意海军的军事使命,又要注意海军的政治使命与晚清政情的关系,把近代海军的发生发展放在清王朝国家战略的广阔背景中考察;既要纵向论述中国海军的兴衰,又要对中外海军尤其是日本海军作横向比较研究,以确定中国海军的发展水平、特点和历史教训。我们认为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翔实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海军史。

我高兴地看到姜鸣同志在本书中很好地实现了自己原定的目

标。他对若干重大事件如马江之战、黄海之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又对某些细节如黄海海战中的接敌队形、中俄密约与维特回忆、颐和园经费等做了详细考证;对某些鲜为人知的问题如甲午战争期间的军舰贸易、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的内幕等,也根据中外史料进行了论述。在充分注意动态研究的同时,对诸如船舰性能、海军章程与训练、海军教育制度等不少静态专题作了叙述与分析。他使用了清廷档案和奏稿,对南洋、福建、广东地区的海军做了迄今为止最翔实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存在三洋海军的见解。尽管这是一家之言,容可讨论,但他根据史料立说的态度是认真的。

作者的视野也较宽阔。在本书中,他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于中外海军的比较研究,从而对海防与塞防的大讨论、海军发展战略、晚清和清流政治等问题,都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观察与分析。虽然,分析中有时会夹杂一些太现代化的辞句而显得不够缜密,但年轻人在对历史进行反思时所特有的敏感,又常常使人嗟叹不已。

本书不仅以开阔的思路给人启迪,且因扎实的史料显示了作者的功力。为了写书,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奔波于各个图书馆,辛勤搜集中外海军史料;做了数十万字的海军史大事记,每条记事都出自原始资料;解析海军史的重要问题,先做专题研究;钻研前辈和时贤的著作,咀嚼他们的写作技巧和文采,这几多辛劳的凝聚,才使本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深入浅出,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这本书的文字也很潇洒,文如其人,他自己确也是个颇为潇洒的人。既做党务方面的工作,又搞历史研究,还经常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京华揽胜的历史散文,说古抚今,致使许多人以为他是一个熟知北京掌故、好发思古幽情的老夫子,其实,他至今只有三十挂四。以三十出头的青年人而能有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欣慰。

我决非因为是他的老师而尽说些好话,只是在目前知识贬值的非正常情况下,出于对像他那样一类青年学者有志于学术研究的感动,写些他的勤奋与立志,可以举一反三,看到其他已有成绩或正在努力的青年同志的辛劳。有这样一代青年,我们的学术界

是大有希望的。他们当然还不很成熟,这部著作中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我不是在评书。我所想到的是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应该给他们以更多的指导、关心和支持。一棵好苗,只有在肥沃的土壤里,在充足的阳光、水分下,才能茁壮成长。木多成林,学术才能繁荣昌盛。当然,像姜鸣这类青年学者,也要更加自爱自重,才能在学界和社会的扶植下不断奋进,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作为老师,对之有厚望焉。是为序。

沈渭滨

1991年4月于复旦大学

序 二

世纪之末,在中央电视台拍摄讲述中国海军百年变迁的专题片《世纪海》时,我认识了姜鸣。

尚未谋面之前,军事部海军记者站站长刘树人先向我推荐了姜鸣和他所写的历史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我曾想像,他一定是个饱经世事,满腹经纶的文人,见面后才知道大错特错了。

他竟然是个证券营业部的老总,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下海”的商人。我和商界人士接触不多,在证券界更无熟人,但当我们在一起聊起中国海军的发展,我深深地被姜鸣忧国忧民、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强盛之路的赤诚之心所深深感动。作为一个军人,我觉得,我们在许多想法上竟是那样相通。

2000年12月30日下午,《世纪海》在中央一台播出,我们在舟山的军舰上一同收看。姜鸣告诉我,他将修订《龙旗飘扬的舰队》。

《龙旗飘扬的舰队》是姜鸣在十年前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详细记录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的曲折历史,总结了清末海军近代化失败的历史教训。为了修订本书,姜鸣在业余时间倾注了无数的精力。晚间,我时常接到他的电话,讨论中法战争时期浙江海面某日的航海晨光,甲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爆破弹和穿甲弹的战斗性能这样一些专业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对这段历史投诸了很大的关注。

我尤为关注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大一次失败。提起这场战争,中国人无不悲愤和叹息。尤其海军军人,更

是感到莫大的耻辱。虽然这页惨痛的历史早已翻了过去,中国人再也不是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然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面前要走的路还很长。总结甲午战争,不让历史重演,对于学术界和海军界来说,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利的原因,以前的专家学者已经做了多方面的总结。除了大家常说的封建政治层面的腐败之外,从军队建设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才培养上只注重技术技能灌输,忽视了品德节操的养成。人的综合素质是多方面组成的,素质的各方面关系如同木桶效应,其中某项素质的严重缺乏将导致其综合素质的低下。北洋海军骨干军官基本上经过国内外海军院校培养深造,不可谓知识不丰富,视野不开阔;回国操舰,训练多年,不可谓缺乏实践经验。为何甲午一战,全军覆没而未能歼敌一艘?究其原因,还是缺乏全民族团结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素质。诚然,北洋海军官兵中,不乏为寻找强国之路而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不乏面对危险为国慷慨赴死者,但战争中也明显暴露出严重的问题:不敢出战者有之,临阵脱逃者有之,力主投降者有之;在军人节操、军人道德上存在严重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综合素质,最终导致刘公岛的投降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我们推而广之地观察,在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史上,除了少数战役之外,中国军队几乎从未取得过全局性的胜利,反而常常出现“兵败如山倒”这样的记录。这里,仅仅把失败解释为武器装备落后显然是不够的,而是同当时军队没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人品德节操的养成有很大关系,是军队建设中的一大教训。

部队管理松懈,形同一盘散沙 有个比喻,武器装备和高技能的人才是战车的两个轮子,而部队管理是连接轮子的车轴。军队没有正规严格的管理,战车就不能前进。中国古代军事家认为,军队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居住时严守规章制度,行动时十分威严,进击时锐不可当,退却时不可追赶,进退有节制,左右调动听指挥。对照以上目标,北洋海军的部队管理差距很大。首先是军队

的主要管理者自己的表率作用极差。当时海军军官有着比陆军军官更为丰厚的报酬,但高级军官却带头违反纪律,建公馆,养小妾,夜不归宿。上行下效,下级官兵也军纪涣散,甚至在出访日本时竟在炮管上晾晒衣服。“长崎事件”固然是日本人对敌敌视造成的,但也暴露了北洋海军管理上的问题,以致日本海军一眼认定北洋海军是可以欺辱的目标。管理的松弛同时也是腐败的温床,纪律和训练懈怠了,军官就会把精力放到谋私利上去,结果销蚀的必然是部队的战斗力。

引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没有形成系统配套的保障体制。热兵器时代武器装备不同于古代的大刀长矛,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装备管理办法和维修保障体系,使其始终处于良好能战状态,这样才能发挥出装备应有的效能。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的舰艇、火炮,均属世界先进水平。问题在于,北洋海军引进了先进的装备,却没有搞好装备管理。舰艇水密装置损坏不及时修复,造成军舰进水后迅速沉没;黄海海战中军舰弹药供应不足,战后调查却发现实际上存有所需的弹药,均暴露出装备管理和维护水平的低劣。北洋海军追求进口西式装备,模仿西式操典和西式战术,却没有真正学到先进的保障管理体制。

训练缺乏针对性,满足于演式和摆练,造成实战中的失利。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分析周边形势,设置假想敌,分析敌我优长与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然而北洋海军的训练显然不从实战出发,仅是为了满足上级视察;编队训练预定阵形,射击训练预定距离,缺乏实战的针对性。平时看起来耀武扬威,一到作战,便马上暴露问题。甚至在黄海海战中连接敌的第一个编队变阵都没能走好,鱼雷艇对商船改制的代用军舰几次抵近发射均不能命中目标。这样的舰队,岂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我读过《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初版,也在第一时间里读到了修订文稿。我注意到,姜鸣在修订本里,着力对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做了新的和更为深刻的发掘。有位军人曾说:“如同美国人反复

研究越战一样,我们也应该反复研究北洋海军史。”尽管今天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温故知新,在我们进行现代化军队建设的时候,仍然可以从清政府创建海军的历史中不断地汲取教训。我愿意军队和地方的朋友们都能认真地一阅本书。

最后我还想说,姜鸣是个勤奋的人,他的勤奋,不仅表现在业余时间专研海军史,更反映在他对自己本职工作的热爱和投入,他获得了2001年全国金融系统五一劳动奖章。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喜欢这样的双重角色,并且在两方面均取得了成绩。我想,能够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常常交流思想,成为挚友。我祝愿姜鸣在业务上和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柏耀平 海军上校

2001年9月

目 录

序一	沈清溪	1
序二	柏耀平	4
初版前言		1
增订本前言		8
第一章 海军事业的先声(1861 ~ 1874)		13
一、船坚炮利的时代		13
二、初创的江南制造局		28
三、福州船政局的诞生		37
四、天津、广州的造船事业		49
五、海军人才的摇篮		56
第二章 南北并举(1875 ~ 1884)		71
一、日本侵台与海防筹议		71
二、方兴未艾的近代海军		87
三、官场内斗与琉球、朝鲜的外争		103
四、炮艇、巡洋舰和铁甲船		117
五、海防经费的收支		130
六、继续发展的海军教育		138
第三章 马江之战前后(1884 ~ 1885)		163
一、战前风波		163

二、马江之战	174
三、东南战局与议和	188
四、海防建设的再次讨论	201
第四章 海军衙门的设立(1885~1894)	214
一、史所未有的新机构	214
二、西苑、颐和园与海军费	225
三、海军教育的全盛时期	235
四、由盛转衰的福州船政局	243
第五章 北洋海军成军(1885~1894)	262
一、购舰活动的继续	262
二、《北洋海军章程》和北洋海军成军	268
三、两大海军基地	279
四、北洋海军的训练	290
五、北洋海军中的外籍雇员	297
六、跛足而行	306
第六章 甲午海战及北洋海军的覆灭	
(1894~1895)	327
一、寂静战场的较量	327
二、丰岛海战	342
三、黄海大海战	356
四、亡羊未能补牢	380
五、威海卫保卫战	394
六、龙旗飘零	413
第七章 海军发展的第二个浪峰(1895~1911)	449
一、瓜分军港的狂潮	449
二、再造海军的初步措施	463
三、三个事件	475

四、海军复兴	486
五、辛亥革命海军易帜	495
主要参考书目	512
人名索引	525
舰船索引	552

初版前言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濒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有长达一万八千余公里的海岸线。

早在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在沿海地区生活了。为了同江河湖海搏斗,他们发明了舟楫。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水上作战的部队“舟师”。公元前485年,吴国和齐国在黄海进行了最早的海战。

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活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高峰。从1405年至1433年,宝船队远航三十余国,航迹到达印度洋和大西洋。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返航,要比哥伦布抵达美洲早六十年。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但中国本土位于温带至暖温带地区,绵亘于北方的戈壁荒漠和西伯利亚森林草原,逶迤西陲的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截断东西的澜沧江、怒江和横断山脉,使得华夏文明相对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区域。从大海到帕米尔高原,有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舞台可供先民们驰骋,足以抵消人口繁衍和外族入侵带来的种种压力。黄河、长江滋润着中下游平原,哺育出极为发达的农业文明。西太平洋成为天然屏障,既保护中国东部沿海不受外来民族的侵略,也阻碍了我们的祖先向东开拓的步伐。

孔子有一次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不过是偶尔发出的喟叹。在传统世界观中,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心。宋代有位士大夫说过:“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

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原王朝和四海邻国的关系就是如此。中原王朝对四海邻国实行王道教化,追求的理想是四野宾服、万方来朝。杜甫曾在诗中吟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表达的正是既要抵御外来侵略,又不要无止境地开疆拓土的有限战略目标。总体说来,这种温顺平和的战略思想,反映了儒学的中庸特征。

海军的发展,是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相联系的。16世纪的英国探险家罗利说过:“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控制世界贸易,而能控制世界贸易的人,便可控制陆地资源和陆地本身。”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更直言不讳地说:“炮舰是最好的大使。军舰最能显示一国的军力及对利益的关切。军舰可以采取主动或有利的行动……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提供这种机动和弹性。”这就把西方国家发展海军的政治、经济目的都说得十分明白。19世纪更是海洋的时代,尽管当时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尚未达到相当的程度,但通过海洋控制贸易、交通、战略要隘和陆地资源却显得十分重要。然而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国策的清政府几乎没有这种观念。我们重温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可以看到明成祖和明宣宗的指导思想,首先是树立大明帝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威信,宣敷教化于海外,以造成远邦重译而来、宾服中国的盛世景象;其次是察访明惠帝流亡海外的问题;第三才是进行朝贡贸易,为皇室和参加航海的官员获取经济利益。根据这些目标,中国海上力量前所未有地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度和凝聚力。可是,郑和下西洋毕竟只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行动,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投入和产出也应是不成比例的。一旦皇帝决定取消这一行动,整个航海事业便像昙花一现般很快萎谢。这同西方航海事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势力东来而欣欣向荣、久盛不衰的景象,恰成对照。

总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濒海的大陆民族,在它历史上有过一些航海的壮举,在航海器的研究上,也达到过相当水平。但从整个

认识系统看,它对海洋的认识是保守的和有限的。广袤的生存空间,使它不必像岛国民族那样拼命去拓殖海外领土;丰饶的物产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它无多大顾忌,除了奢侈品和香料外,几乎可以不依赖海外贸易;繁多的国内事务,更使它无暇顾及海外;而浩淼的大海,犹如天然鸿沟,有效地阻挡住外族入侵的可能性。由于中华帝国巨大的空间存在和华夏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在大多数年代里,海外邻国表示臣服和向化。于是皇帝和臣子们便沾沾自喜、高枕无忧了,他们何必再要去探险海外呢?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长期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奔驰的铁骑。直到明朝,海防才成为国家对外防御的重点。明朝从山东北部辽东都司(今辽东半岛)至广东南部的海南岛,设立了五十四个卫,一百二十七千户所,并在各险要之处筑城戍守。每千户所有十艘战船,每卫有五十艘战船,以期水陆配合,协同作战。明朝的海上之敌,主要是倭寇,后来还有荷兰殖民者。

清袭明制,继续设置水师。但在闭关政策指导下,水师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9世纪,便完全过时了。而西方的海军却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纵横三大洋,把一个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也用轰鸣的舰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无论从侵略还是从反侵略的角度看,从来没有一个世纪,海军的作用显得如此突出。

近代中国的屈辱从海防的崩溃开始。为修补和缝缀破碎了的防线,便有了创办近代海军的历史活动。所谓近代海军,是指以蒸汽动力舰艇为主体,采用西式训练和作战方法,军官多经国内外海军院校培训,有完善后勤支援系统的新式海上武装力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近代海军的缔造者们——奕訢、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顺应历史的发展,继承“师夷长技”的主张,从1861年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把海军建设成整个清朝武装力量中初步完成向近代化转变的新军种,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研究者把1895年

开始的“小站练兵”看做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滥觞,其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只是把军队近代化的重点从海军转移到陆军而已。袁世凯在“新建陆军”中追求的西式编队、西式装备、西式操典、西式教育、西式选拔征募制度和西式战术,海军在更早的时候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由于海军装备和军港基地的特殊性,因而使得近代化的规模显得更为宏大。

本书所述的近代海军是指清朝海军。它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61~1874年的初创阶段,1875~1884年的“南北洋并举”阶段,1885~1894年的“北洋独进”阶段和1895~1911年的重建阶段。选择1861年作为海军史的开端,是以“李—阿舰队事件”为标志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企图从国外购买军舰组建新式舰队,结果却被李泰国、阿思本等帝国主义分子搅得一塌糊涂,说明中国近代海军在发轫之初便历尽艰难。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清政府先后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显示近代海军同大工业密不可分。恰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在考察近代海军的发展过程中,笔者始终把近代造船工业的发育作为同时关注的线索,这也正是近代海军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1867年,担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三洋水师”的方案。1870年,在自制舰船的基础上,福建设立“轮船统领”。从此,按区域组建舰队以完成海军近代化的构想一直成为19世纪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主线。只是在如何发展区域海军的认识上,出现了许多激烈的争辩。经过1874年的海防大筹议,确立了南北洋同步发展的战略,构成海军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法战争后,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领导全国的海防建设,并确立先练北洋海军的战略,构成近代海军发展最为辉煌的阶段。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海军衙门被裁撤。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20世纪初,海军开始了缓慢的复兴,直至辛亥革命易帜。

四个阶段的交接点,是三场对外民族战争,即1874年抵御日

本侵略台湾的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投入了相当的海军力量。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都有大规模的海战。尤其在中日战争中,出现了迄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蒸汽军舰主力决战和要塞防御战,从而使中国近代军事史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前两场战争刺激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第三场战争却毁灭了海军菁华。总结这些战争,对于海军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

早在1874年,郭嵩焘便提出了他的疑惑:“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海外之覬觐,亦何惮而不为之?而……果足恃否,此所不敢知也!”他尖锐地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二十年。其他洋务思想家和官员,一下子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实践,也开始考虑海防同国家战略的关系,提出把海防力量的振兴同航海、对外贸易、侨民管理事业结合起来,要从国家战略的宏观高度上来讨论海防。可是,这只是闪烁的流火,瞬即消逝在茫茫的夜空。无论是对于发展国家的海上综合力量,还是加强同侨民的联系以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清政府都没有认真考虑,始终把海军建设仅仅看成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港口要塞的辅助力量。没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论,没有深入思考过海军的使命。直至清朝覆灭为止,中国舰队总体上是一支“绿水”舰队。可以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需要强大的海军,不需要拥有将利用海洋

和保卫国家利益综合于一体的海上力量。因此,发展海军事业必然缺乏内在动力。虽然在一个时期内,鼓吹海防的言论可以遍及朝野,海军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清政府绝不会像德国、日本、美国那样,倾国力去建设海军,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为海军强国。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保卫海防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

四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近代海军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三个专题内,没有形成海军史自身的研究体系。主要围绕着清政府创办海军的社会背景和目的、北洋海军的评价、海军失败与洋务运动的性质、福州船政局、江南机器制造局、中法马尾海战、镇海保卫战、中日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保卫战、丁汝昌、刘步蟾、方伯谦的评价以及若干史料的价值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近年来,对海军史的研究还从海战史及人物评价进一步深入到海防思想,海军发展战略,海军衙门,海军的教育、训练、经费、基地,军舰性能,海军战术,北洋地区以外区域的海军,辛亥革命中的海军等方面,从而使得海军史的轮廓日益明显,海军史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的细节更为清晰和丰富。此外,各种新史料的公布,台湾和海外史学界研究成果的传入,对我们认识海军史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海军史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史学界、军事科研机构及院校和造船界三个方面。史学界偏重历史过程,军界偏重战役和战术细节,造船界偏重于舰艇发展。从三个侧面出发,大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年来,三方面的研究者呈现出相互合作、协同配合、共同探索的新气象。这对于扩大海军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成果,本书都注意予以吸收。

海军史研究的积极意义,不仅表现为对历史碎片的修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记取历史经验教训,建设现代化国防也有深刻的启迪作用。与一百年前相比,我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和国防

力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从一个封闭的体系走向世界。人们开始认识到,海洋的特性决定了地理海疆和战略海疆的不一致性。热爱和平的、战略上处于防御态势的国家,它的海军并非只能是近海型的。拘泥于近海防御,等待敌国海军逼近领海,就是放弃制海权,就会在战争中陷于被动。为了保卫包括南沙、中沙、西沙群岛在内的广阔的领海和管辖海域,为了保卫我国日益壮大的远洋船队的水上交通线,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那么,了解一下前辈们是如何梦寐以求建立一支强大的钢铁舰队,了解一下这支在上个世纪“对外开放”中建立起来的舰队所取得的光荣,以及后来如何走向覆灭,就显得尤为重要。

九年前,我在沈渭滨先生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近代军事史研究,并从1987年1月,开始撰写本书,至1988年10月完成初稿。对于一个完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创作的人来说,我经历了种种曲折。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才能体察。借此机会,谨向在本书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我支持、鼓励和提供无私帮助的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本书是难以问世的。

作 者

1990年6月

增订本前言

我一直钦佩理想的守望者。我知道,一个人要坚守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对我来说,能把自己喜爱的历史学专业当成一个没有功利目标的兴趣,来执着地守望着,就是一个理想。20年前,当我刚刚踏上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阶梯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课题竟会如此长久地伴随我,同我一起走过五分之一世纪的风风雨雨。而到了今天,我想说,我终于做到了自己当年走进大学时立下的心愿:不管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专业。

去年4月12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我写的纪念一位当代中国海军军人的文章《13亿人呼唤着一个名字》时,加了一段作者介绍:“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者兼证券从业人员,他是在我国军机被撞事件发生后,最早见到王伟朋友的人之一”,这个“兼”字引起了同事们的议论。自然,我也觉得“兼”字用得不妥,因为证券工作毕竟是我从事了9年的职业而不是兼职,应当把“兼”字改成一个逗号。但我又想,这种写法也许反映出一部分朋友对我的看法,他们从本质上认为我是一个史学研究者,别的事儿,只是我在某个时期里从事的具体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我对于自己在每个时间段里从事的每项具体工作都是极为投入的,但我始终保持了对于历史学术的那份忠诚不渝的挚爱。

本书初稿完稿于1990年底。我开始写作时,国内尚无这一题材的专著,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还分散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专题领域。初稿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

评。而在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个课题的研究,无论在史料开掘,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促使我下决心拨出时间来修订本书。

史学研究的基本要点,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找到历史大门背后隐藏着的钥匙眼,而不是仅凭一鳞半爪,就望文生意,擅下评论。这些年来,我接触到的新史料,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以上均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沈葆楨的《沈文肃公牍》(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谢忠岳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中公布的《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陈贞寿公布的《益堂(方伯谦)年谱》,苏小东公布的《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王记华公布的《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甲午遗书》,日本中塚明提供的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秘本),台湾王家俭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中国近代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台湾国立编译馆出版)中提供的材料,黄振南在《中法战争诸役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提供的材料,孔祥吉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提供的材料,以及袁保龄的《阁学公集》等等。这里应当特别提到,我有幸读到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在整理的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有关内容。这些史料,对于我拓宽视野,加深对近代海军发展历史的研究,弄清许多历史细节,无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收集史料、修订和考证的过程中,甚至在辨读一封字迹模糊的旧信札时,都能使我感受到历史研究的迷人魅力。

虽说我们常常感叹新史料的发掘极为困难,用新史料重新修订传统定论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毕竟有许多旧结论是可以重新讨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本

书修订本在研究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与海防建设的关系,李鸿章同清流(张佩纶、李鸿藻)的关系,李鸿章与淮系将领(张树生、张华奎父子,吴长庆等)的关系,袁保龄对海军建设的贡献,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内部状况,李鸿章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对日秘密外交活动,丁汝昌的历史评价,方伯谦之死是否是冤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考订,并拓宽了对海军史相关人物与事件研究的视野,从而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脉络,海军发展同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北洋海军建设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新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对历史人物评价要客观谨慎,尽量少夹杂“好人”、“坏人”,“爱国”、“卖国”等简单的道德评判。我曾说过我不敢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会虚构。所谓虚构,其实是以作者的水平去揣想前人的智慧谋略和行事处世。既然我所研究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在时代的佼佼者 and 弄潮儿,我怎么可以依自己的一孔之见去妄想去编派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呢?我的任务只是努力地深刻地发掘并再现他们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修订本中,对重要历史人物,更多地采用了描述的方式,力求准确真实地再现他们本来的生动复杂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优点和弱点,他们的成就和无奈。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作中把握得是否妥当,但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的用心。

在本书的初稿中,我力图打破原来海军史研究仅涉及中法、中日海战和洋务运动中兴办造船企业及军事院校等几个方面的限制,把研究深入到海军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海军战略等领域,以使得书稿更具有军事史的完整性和专业性。而在修订本中,虽然未对全书做体例上的调整,但融入了我多年来的许多专题研究成果,增加了大量的细节,使得全书显得更为丰满,近代海军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就显得更加清晰。

本书修订时,也曾想能以更大的篇幅,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化失败的经验教训,然而真到动笔之时,又不得不感叹时间不够,材料不够,识见功力不够,所以最后的修订稿,还是不够惬意,有着意犹未尽的遗憾。

在修订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关注着我国的国防战略、海权理论研究和海军建设。2001年元旦的第一缕阳光,我是在131驱逐舰上,同“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获得者,著名的飞行员舰长柏耀平上校一起迎来的。4月1日晚间,我得悉南海撞机事件中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失踪的消息时,正在修改本书刘公岛保卫战的最后几段文字。我为撞机事件震惊,也被那些失败和投降的情节愤懑着压抑着,总觉得要透出一口气来,于是我加写了杨用霖自杀的一段文字。同时,我连夜在我主管的“中国银河证券网”上,转贴了《发生在中国海上空巡航的故事》(该文发表于第4期《舰船知识》,文章中提到王伟和战友多次监视并赶走美军侦察机),以表达我对这位年轻飞行员的纪念。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从历史看未来,我在新一代中国海军军人身上寄托着希望。我在同柏耀平,在同王伟的战友们的交往中,感受到他们质朴纯洁的心灵,他们是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的守望者。所以我说:在这个灯红酒绿五彩绚迷的世界,当我们享受着阳光春风,在恋爱在旅游在努力挣钱在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默默奉献着青春并随时准备奉献出生命却不为人知道姓名的军人,那些质朴平凡的好兄弟。中国国防现代化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总结昨天的历史正是为了明天的崛起。有位书评作者曾说《龙旗飘扬的舰队》“起码应该列为中国海军排以上军官的必读书”,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愿他们从上一个时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失败中总结和吸取教训,为我们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征途中,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本书修订过程中,始终得到沈渭滨老师的关心和指导,皮明勇、刘申宁、翁飞、苏小东、戚俊杰、后志刚、宋晓军、许华、刘庆、马忠文、姚晓亭、李光宇等先生,以及日本的中塚明教授为我提供史料,与我切磋观点,给我很多帮助;台湾学者王家俭教授的新作《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给我不少新的启发;吴侃炯、刘丽琼为我翻译和打印资料,在此我向它们表示感谢。

柏耀平上校在百忙中欣然为本书修订本作序,使这本平民史学研究者撰写的海军史著作,有了真正一线海军军人的评介,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还应当提到,十多年前,为了帮助本书的初版顺利付梓,黄跃金、王仲伟、李智平、李安瑜等同志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出版之后,赵启正部长亲自撰写书评予以推荐。对于这些曾经给我帮助和鼓励的领导和朋友,我也在此向他们致谢。

本书初版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责任编辑潘振平先生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我向他,并向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女士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李家玻,没有他们的倾力支持,我不可能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中,依然保持住自己在学术领域的探索。

姜 鸣

2001年9月于上海望亭室

第一章 海军事业的先声

(1861 ~ 1874)

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

李鸿章

一、船坚炮利的时代

公元1793年,时为大清朝乾隆五十八年。这年秋天,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来中国谈判两国贸易的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圆明园向中国皇帝弘历送交了一批礼物。其中引起皇帝兴趣的,是一艘载有110门火炮的“君主”号军舰模型。“君主”号是当时英国最大的战列舰,舰上的各种细微部分在模型中表现无遗。皇帝兴致勃勃地向使团人员询问了军舰上的许多细节,以及英国造船事业方面的问题。他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些礼品:地球仪、天体仪、铜炮、榴弹炮、枪支和英国式马车。

马戛尔尼使团不久失败而归。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须与外夷贸易以通有无,英国则是个相距遥远无关紧要的岛国。这批象征“坚船利炮”的礼物渐渐被人淡忘,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后,被英国人重新找到。

在乾隆皇帝亲眼见到“君主”号模型后的12年,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击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从而

最终确立了英国长达百余年的海上霸权。此时,英国海军主力,正是类似“君主”号的三层甲板大型帆船。

又过了29年。1834年9月30日,乾隆帝的孙子道光帝旻宁在圆明园披阅奏章时,从两广总督卢坤的折子中得悉,原先执有对华贸易垄断权和管理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解散。英国新派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乘坐兵船于7月25日来到广州商馆,次日遣人向总督递送了一封要求通商的信函。按照数百年来传统做法,外国人的要求和意见,一律采用“禀帖”形式,由行商代转,而不能采取平行公文,因为此节关系天朝体制的尊严。总督通过商人向其晓谕,希望初入中华的“化外愚蠢”能悔悟恭顺。谁知律劳卑置之不理,又调来一艘军舰,一起泊在虎门口外的九洲沙沥洋面。广州的当权者——总督、将军、粤海关监督和都统紧张起来了,决定封舱,停止中英贸易,既作惩罚,也促其改变态度。卢坤向皇帝报告说:该夷人所恃者,惟有船坚炮利。内洋水浅,礁石林立,夷人施放炮火,亦不能得力。我方只要调兵遣将,水陆分投布置,夷人便会折服。道光帝对于遥远的南方所发生的事件并未特别注意,他用硃笔批了八个字:“所办尚妥,所见亦是。”^[1]

谁知未过几天又接急报,英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灭古”号在律劳卑的命令下强行驶入虎门,直逼黄埔,轰击炮台,而清朝水师竟不能阻挡。虽然后来采用木排封锁航道以使律劳卑退回澳门,但广东水师的腐败无能却暴露无遗。消息传来,朝廷震怒,将疏于职守的广东水师中军参将高宜勇革职,押在海口,枷号一月,以示惩戒。^[2]

其实败象早已显露。两年前,东印度公司为了突破清政府仅限广州一地通商的规定,派遣林赛和郭士立乘坐“罗尔·阿美士德”号帆船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直至朝鲜、琉球,进行侦察和测量航道时,就发现中国水师不堪一击。他们观察到广东海防重镇南澳的78艘类似福建商船的战船,要比广州的战船差得多;而在南澳镇总兵指挥下的5000余人军队,似乎只存在于花名册里。他们认为,“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

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3]1835年,他们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表示,侵略中国只要1艘主力舰、2艘大巡洋舰、6艘三等军舰、34艘武装轮船,加上600人的舰载陆上部队就足够了。这支舰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4]

林赛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清朝水师的腐败落后却是毋庸置疑的。从成立时起,清朝水师就是一支编制无统一规定,也无全国统一指挥机构,分别隶属于各地区将军、总督、巡抚指挥的辅助兵种,职责是防守海口、缉私捕盗。装备是旧式木帆船和旧式火炮。最大的战船全长30余米,载炮30门;小的长度不足20米,载炮不足4门。在海外水师中,广东水师舰只最多,实力最强。福建、浙江次之,越往北力量越弱。^[5]由于200年没有遇到海上入侵,坐享太平盛世,额定战船,视为无用,风吹日炙,敝坏居多。或舵折桅倾,或蓬烂缆断,即使修理,不过涂饰颜色,以彩画为工,内中早已损坏,难供驾驶。推其原因,首先应当归于清朝的海禁政策。康熙帝为了切断沿海人民对郑成功抗清势力的支持,于1685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以上违反制式船只者,无论官兵民人,俱发边治罪。以后,在1760年至1835年间,清廷先后颁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防范夷人规程》,限制与外商交往,严重阻碍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又于1797年明谕各地,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仿民船改小。这种出于对内统治需要的防范措施,使得旧式战船的发展被完全窒息了。

其次,是由于战船归文官修理,竣工接收时,武弁索取陋规,有增无减。所领修船之费,不足供其所索,修理战船就不得不草率从事。此外,修船力量不足,难以适应水师定期维修保养的要求,甚至有的军官离任数年,战船仍未修竣,建造新型战船就更没人过问了。

水师官兵的素质更成问题。水师本有查禁鸦片走私之责,可是据当时人披露,广东水师总兵奕振彪本人便有20年吸毒史。家

丁员弁，相率效尤，官署中大小人等，无不吸毒。副将韩肇庆，专以护鸦片渔利。^[6]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视察部队时发现弓箭手、鸟枪手在射击时一枪不中、五箭全空或仅中一鹄的，竟占大多数。这样的军队怎能作战呢？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虽力行整饬，加意战备，但由于同英国海军实力相差悬殊，双方没有进行主力决战。除了穿鼻洋海战出动了10余艘师船外，其余多是海岸炮台的防御战斗。英国远征军以40余艘舰船（其中一半是运输船）两次北犯，从广州到渤海湾横行无阻。尤其在林则徐受到贬斥和打击后，清朝水师海上防御的弱点更是一览无遗了。英军攻打香港、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宝山、上海、镇江，直逼江宁（今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

林则徐在广州时，已经意识到水师装备的落后，一方面，他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剑桥”（又译“甘米力治”）号战舰，并仿造西洋式样，建造了一批火炮；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7]把制胜的希望寄托在陆战上。这种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以致有人建议改水师为陆师，专防陆地。

林则徐对海军的认识不久便有变化。当他被贬离开广州前，提出了“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8]的主张。在流戍西北途中，他更明确提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之所能往者，我亦能往”的设想，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9]到了《南京条约》签订前夕，连道光帝也认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水师巨舰与英军接战，造成“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的被动局面。他命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如果赶造不及，可先行设法购买，并奖励捐资建造者。战争结束后，湖南邵阳人魏源出版了他受林则徐委托编写的

《海国图志》，第一次明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

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新式的坚船利炮和残暴的毒品贸易向古老的中国进行冲击，以图叩开紧闭的大门，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但在当时，连最先进的中国人也只认为是数万万里之外的蛮夷小国，凭借着奇巧利器，以图挟制天朝大国，因此必须学其长技，以利器制夷。而在更多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处置不当引起的偶然事件。所以当海上威胁暂时消除后，人们又沉湎昏睡，水师的整顿和装备更新也随之停止了。

1853年2月，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武汉后，挟数十万众，万余艘船，以雷霆万钧的气势，顺江而下，定鼎天京（今南京）。清军水师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曾国藩为了夺回长江江面的控制权，创建湘军水师。这支水师很出了些骁悍的战将，打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仗，但只是内战内行。其装备和作战方式，仍是旧式水师的翻版。从1855年曾国藩亲撰的《水师得胜歌》中，对这支部队的情况便可略知端倪了。曾国藩写道：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齐整，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桨柱，打湿水絮封药箱……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若是好汉打得进，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第八水师莫上岸，止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10]

太平军水营力量一度十分壮大，但没有认真编练，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水营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结果为湘军水师击败。他们之间的战斗，可以说是中国旧式水师之间的最后决战。1865年，曾国藩奏准将湘军水师改为经制长江水师，设提督管辖。又规定沿江五省督抚可以节制调遣。此后，长江水师也走入旧式八旗绿营水师的末路。

在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水师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抵御英法联军入侵的作用。对于旧式水师的改革，迫在眉睫了。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1861年，湘军统帅胡林翼率军合围安庆后，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得意地说：“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然而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于是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他与幕僚阎敬铭谈及洋务时，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说：“此非吾辈所知也。”不数月，薨于军中。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对于西方轮船出现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浪潮的焦虑心情。^[11]

19世纪50~60年代，是世界海军从木质帆船向钢质蒸汽舰转变的历史时期，主宰海洋数千年的古典风帆将要告退。卢坤、林则徐所称的船坚炮利，其实还只是制造精良的旧式帆船和前膛炮，待到装有可旋转炮塔的大口径后膛炮的铁甲舰驶入大海，海战便真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最早的蒸汽轮船，是英国工程师赛明顿1802年研制的“夏洛特·邓达斯”号。五年后，美国人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城”号投入了纽约至奥尔巴尼间的航线。1820年，第一艘铁壳蒸汽船“阿荣·曼比”号也问世了。这时的蒸汽船都是船体两侧的大型蹼轮驱动，蹼轮不仅挤占了约三分之一的安装火炮的位置，而且在战斗中极易遭到敌人炮火的损坏。1829年奥地利人莱赛尔发明了船

船螺旋桨。后来工程师埃里克森又对这一设计进行了改进。他与美国海军上尉斯托克顿一起设计了第一艘螺旋桨战船“普林斯顿”号。技术的急速发展,使得海军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在军舰向蒸汽动力演进的同时,火炮的研制也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世界上最早的火炮是中国人发明的。13世纪初期至中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军西征,把火药和火器带到阿拉伯和欧洲,但欧洲人未能掌握火药制造和使用的技术。14世纪前期,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火药和火器,并使它的制造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17世纪,慕尼黑有一种口径2英寸,带八根膛线的线膛炮。18世纪,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来复线能够提高射精度,并使炮弹从球型实心弹发展为细长型空心弹丸。1821年,法国人帕克斯发明了爆破弹。1829年,法国军官蒂埃里用铁箍套铸铁炮管,发明了套筒炮,解决了后装线膛炮容易炸膛的技术问题。接着,英国的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和惠斯沃思又分别造出了质量很高的后装线膛火炮。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铁甲舰才是对付爆破弹的较好方式;但又相信,强大的后装线膛炮,能够击沉铁甲舰。

19世纪中叶的三次著名海战,奠定了近代海军的发展方向。1853年,俄国为征服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而向近东和巴尔干扩张,同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是锡诺普海战。俄国黑海舰队司令纳希莫夫海军中将率领一支分舰队,袭击了停泊在锡诺普湾的土耳其分舰队。在俄国舰队所拥有的720门火炮中,有76门是发射爆破弹的轰击炮,而总数拥有510门火炮的土耳其舰队,仅有2门能发射爆破弹,在两个多小时的海战中,除了一艘汽船逃走之外,整个土耳其分舰队被消灭了。锡诺普海战是欧洲帆船舰队最后一次大规模交战,同时也是首次使用汽船和爆破弹的一次大海战,标志着现代海战的开始。

一年后,英法联合舰队驶入黑海。法国旗舰“拿破仑”号最为引人注目。它是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蒸汽-风帆战列舰,有500

四马力,顶着强风时航速可达11节,平时可达14节。同盟军400艘战列舰和运输舰组成的编队,将一支62000人的部队送到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以南约30英里的耶夫帕托利亚登陆。蒸汽船充分显示出它的作用。战争表明,木壳军舰的船舷经不起新式炮弹的袭击,由此也促进了铁甲舰的问世。在战争中,俄国人还首次使用了水雷。

1855年10月17日,塞瓦斯托波尔陷于同盟军之手后不久,联合舰队攻击了控制尼古拉耶夫港人口处的金伯要塞。行动中,法国人使用了排水量1400吨的浮动装甲炮台“雷鸣”号、“熔岩”号和“扫荡”号。“熔岩”号中弹64发,“雷鸣”号中弹70发,却没有造成重大损失,金伯炮台则被夷为平地。这种浮动炮台是现代炮舰的雏形。

接着,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1862年3月9日,首次铁甲舰之间的海战开始了。南军出动了“弗吉尼亚”号,这艘军舰的前身,是南军一年前占领诺福克军港时俘获的蒸汽动力护卫舰“麦里马克”号,南军把它改装成铁甲舰。北军注意到这一情况,制成了“莫尼特”号新型铁甲舰,它比“弗吉尼亚”号略小,但旋转炮台上装有2门11英寸口径滑膛炮,火力大大超过了对方的3门9英寸口径炮。它们在切萨皮克湾的汉普顿锚地展开了激烈的对射。双方相距仅三十几米,炮火对彼此的铁甲似乎都不起作用。这次海战使那些反对用钢铁建造军舰的人被说服了。以后,旋转炮塔也被推广,以取代传统的侧舷炮。

又过了4年,意大利与奥地利间爆发了奥意战争。1866年7月20日,双方海军在利萨岛展开会战。数百年来,西方海军战术一直遵循纵队原则,交战双方的舰队航向互相平行,舷侧对舷侧地展开炮火射击,直到击败对方为止。19世纪初,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海军上将开始探索新的海战战术。他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用两个纵队横向拦截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以机动分割打破了单纵队线式战术的教条,创造了著名的海战战例,但是各国海军仍把单纵队看作最正常、最规范的战术队形。利萨海战中,

奥地利海军上将特拉特霍夫再次打破单纵队常规,以三列楔形队型扑向意大利的单纵队,他的旗舰勇敢地撞沉了意大利旗舰。经过激战,奥地利大获全胜。利萨海战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奥意战争中奥地利败北的局势,但它是铁甲舰队之间第一次大规模交战,作战编队成了各国海军将领热衷研究的课题。单纵队虽然仍不失为一种经典严密的海战队形,但大胆偏离条令;也能使战斗出奇制胜。此外,冲撞战术在铁甲舰上被证明继续有效,于是铁甲舰和巡洋舰的艏部都装上了坚固的冲角。不过这仅仅是古老战术的回光返照,海战正日益摆脱近距离的格杀,在很多情况下,孤注一掷的冲撞是十分危险的举动。

西方海军就是在这一系列海战的刺激下,急速地走向现代化。

早在1856年,当太平天国起义正如火如荼、势不可当地迅猛发展时,清政府已开始考虑购买外国轮船了。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建议清廷“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12]福建布政使曾望颜也主张雇火轮船以肃清江面。后来,咸丰帝奕訢同意筹商雇请火轮船入江助剿,命钦差大臣向荣等人办理。未料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爆发,此事便搁置下来了。

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俄、法先后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使得朝廷再一次酝酿购买外洋船炮。军机大臣文祥在奏折中援引上年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提出的要攻取苏、常、金陵,需有三支水师,现在设厂购料,不如购买轮船更为得利的話。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这年50岁,是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洋务活动家。此时刚被任命为中国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因在上海抵抗太平军进攻,受了重伤,回国休假,由26岁的北爱尔兰人赫德暂代职务。赫德具体建议,从海关关税中拨款,不过数十万两银子,便可购买外国舰船克复沿海失地。又说可以和步军夹击南京,“一日之内可保成功”。^[13]

7月7日,皇帝颁谕同意速购。对清廷来说,它已开始认识到旧式水师的落伍,无法对抗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购舰计划既是为

了镇压太平军,也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可谓一石二鸟。用曾国藩的话来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14]但此时购舰进行得十分缓慢。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皇子载淳继位。11月1日,24岁的慈安太后和26岁的慈禧太后从热河回到北京,次日与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免除肃顺等8人赞襄政务大臣职务,改年号为“同治”。

恭亲王奕訢是道光帝旻宁的第六个皇子,野史上说他“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同他的四哥咸丰皇帝奕訢,都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我曾将他和清朝从顺治到光绪九位皇帝的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驭力、应变力、私生活、机遇等方面进行过综合评分测试,结果在总名次中,他越过乾隆而与康熙并列第一。^[15]他精明强干,头脑开通,堪称皇族中的佼佼者。北京政变虽说只是皇室中的一场家务风波,其结果,却使得慈禧太后和小叔奕訢共同走到历史的前台,由此带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变化。

政坛的轩然大波搅得朝野心神不宁、极度紧张,而几乎在同时,太平军李秀成部迭克宁波、杭州,上海危如累卵。

朝廷有情报说,太平军攻击上海的目的之一,是借此向外国购置一批火炮船。这使以议政王名义主持军机处日常事务的恭亲王十分震惊。他于次年1月31日和2月1日,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分别致函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命令迅速筹款购舰,以资攻剿。2月27日,劳崇光在广州与赫德最后议定,由赫德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轮3艘,小号兵轮4艘。3月14日,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他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一支轮船舰队,遣派到中国来,“不能一日羈延”。

英国人鼓励清政府在英国买兵船组建舰队,是想趁机控制中国海军。李泰国接到赫德来信后,曾同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进行多次策划。6月16日,李向罗素递交呈文,请求批准他为清政府在

英国购买舰船和聘用官兵，“成立一支欧洲海军部队”，即“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他申明：“这支舰队不会在任何地方妨碍女王陛下政府，反而会使它在没有进行直接援助时那些烦恼的情况下，享有一切好处。”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同意这一计划。7月9日，海军部通知阿思本海军上校，让他指挥这支舰队。阿思本这年40岁，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驾驶“狂暴”号军舰，载着英国谈判代表额尔金沿长江上溯南京，同太平军发生过冲突，是第一个在长江上驾驶现代战舰的人。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熟悉。不久，舰船顺利购齐，共计6艘炮舰，由李泰国命名为“北京”号（670吨，150马力）、“中国”号（669吨，200马力）、“厦门”号（301吨，80马力）、“广东”号（550吨，150马力）、“天津”号（445吨，80马力）、“江苏”号（1269吨，300马力），一艘叫做“穆克德恩”号的供应船和一艘“遐荒”号快艇。

1863年1月16日，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十三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二）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三）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四）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使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16]

同时，李泰国、阿思本还参照英国海军章程，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程》，规定凡捕获船、货变价之银或原银，除以三分之一

归清廷外,其余完全由舰队人员分领。

这项合同,显然侵犯中国主权,是极其荒谬和非法的,也只有疯狂而强横的殖民主义者才想像得出来。根据合同规定,阿思本不仅是这支舰队的司令,而且还成了清政府的海军总司令,甚至有权不执行清政府的指令。阿思本在给罗素的信中承认,他们的合同“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而决定下来的行动计划,可以不致在今后迷失方向”。“在一切方面,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女王陛下以枢密院法令授予我们这样重大的权力及与之相适应的责任,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继任人或中国官员所滥用。”^[17]

在李泰国看来,中国已有一支由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再加上这支海军,今后都归总税务司指挥,就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国的政局,他说:“我对中国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我帮助你们征税,只要外国的质疑是对的,你们必须去做。如果你们不做的話,我就停止帮助你们。……我深信,在我的管理中,如果我不坚信某些原则,我就不能达到我所要的成功。我有雄心,要取得当中国人和外国间中介人的地位,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条在新的立足点解决同中国建立和平关系问题的路子。为了博得欧洲公使的支持,消除他们的嫉妒,我得证明我的影响纯粹是用来为欧洲各国的利益服务的。……中国政府太腐朽了,不能依靠。我正努力要建造的结构的基础,得人工来创造。我的地位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雇佣来替他们执行某些工作,而不是受他们的差遣。我根本不需要说,一个高贵的人受亚洲野蛮人差遣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不是中国官员,而是一个没有头衔但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国顾问。因为我受到信任,受到尊重。”^[18]

李泰国、阿思本间的协定,连赫德也未料到。因此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李泰国,指出这样的协议是不可容忍和有害的,但李泰国对此不予理会。

1862年10月17日,总理衙门奏准,以三角黄色龙旗为中国官船旗号。11月20日,恭亲王向朝廷奏呈赫德草拟的轮船应派官弁、兵丁、水手清单。根据这份清单,中国方面应派总兵官1员,

会同阿思本综理一切。另派武官7人,分管各船,督带兵勇。大轮船派炮手、水手各40名,水师兵30名;小轮船派炮手、水手、水师兵各10余名。炮手拟用湖南人,水手拟用山东人,水师兵拟用八旗人。同日奉上谕,命湖广总督官文、两江总督曾国藩相应机宜,悉心筹酌,所需官兵在船到之前一律配齐,船到即可上船练习。^[19]12月21日,总理衙门致函曾国藩,要他预筹节制、经费及进剿事宜,以防外人掣肘。曾国藩对这支舰队期待已久,他任命统带巡抚营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统辖轮船,盛永清、袁俊、欧阳芳、邓秀枝、周文祥、蔡国喜、郭得山各领一船。水手、炮手、兵丁由蔡国祥在所部弁勇中预先派定。^[20]

1863年4月4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宣布“北京”号、“厦门”号和“中国”号启航,并概述了这支舰队及舰队的宗旨。社论表示,这支中国英裔舰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帝国的权威——如果太平军有生命力,或有建设政权能力的话,南京也许就成为新帝国的首都。但是,十年的经验证明,太平军没有这种素质。南京并不是一个政府的首都,而是强盗的大本营。因此阿思本上校收复南京,对起义军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诚实的商人是很有利的。第二个任务,是勘探内河,重新打通大运河的航道,在主要通道上建立电报通讯,教中国人使用蒸汽和电的工作,以展示它的实用性。第三个目标,镇压流窜在通商口岸的强盗。^[21]同年12月12日,赫德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谈了他想依靠舰队达到的目的——为北京政府部署一支强大而机动的舰队,在最大范围内巩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消除中国沿海的海盗,给海上船只提供足够的保护,也使清政府有能力解除海上商船自备的重型武装;保证海上贸易额,减少走私行为;减少长江流域的犯罪;保护港口免受太平军的攻击,使太平军不能轻易横渡长江,并使清军便于攻打南京等等。^[22]

5月,李泰国从英国返回中国,6月1日,同赫德一起到达北京。在同总理衙门交涉过程中,他坚决要求清政府接受十三条合同。清廷本来希望英国帮助它购买船炮、聘请军官,组成舰队,而

事权则由自己主持。现在接到李-阿舰队合同,大吃一惊,认识到“其意意思藉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国外”,当然不肯全盘接受。但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仍打算让步。于是,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再三谈判,议定《轮船章程》五条。其要点是:中国所买兵船,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汉总统,延英人阿思本为帮同总统,以四年为期。兵船一切事宜,由两总统和衷商办。阿思本帮同中国管带师船,所在用兵地方,应听督抚节制。兵船系中国购买,应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实习,以期经历久远,不致日久荒废。^[23]

7月9日,总理衙门向各地通报《轮船章程》已获奏准。所购军舰,“北京”号改名“金台”号,“中国”号改名“一统”号,“厦门”号改名“广万”号,“穆克德恩”号改名“德胜”号,“广东”号改名“百粤”号,“天津”号改名“三卫”号,“江苏”号改名“镇吴”号。清廷与李泰国约定,如系同湘军共同攻克金陵,所得财物三分归朝廷充公,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员弁,三分半归中国官兵作赏。如系阿思本单独克服,则七分均归阿思本充饷。

此时,湘淮军首领对于不能指挥新购轮船,反而允许阿思本介入对南京的进攻并获取财物的规定也大感不满。曾国藩对总理衙门说:《轮船章程》奉行甚难,拟令蔡国祥仍住在旧式师船,不遽以汉总统自居,亦不停泊一处,且与阿思本交往察看,若不甚居骄,方可徐讲统辖之方。若意气凌厉,把轮船当作奇货,把汉总统看成堂下厮役、倚门贱客,则水陆将士必将视为大耻,不如早为之谋,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以折李泰国的骄气。^[24]他在给江苏巡抚李鸿章的信中说得更透彻:“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骐拇枝指,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25]李鸿章自然支持曾国藩。他表示“金陵已成合围之势,可毋庸外国兵船会剿”。同样的意见,还由在金陵指挥围城的曾国藩九弟、浙江巡抚曾国荃重复,这都使北京的统治者感到了分量。话又说回来,曾国藩是理学家,理学家讲究修身时的“内省”,然而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曾国藩却不知所措,只会愠气,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免费送掉,以为这

样就能折对手骄气,显然是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是国门初开时天朝大国的虚骄和对洋人无可奈何的心态在曾国藩身上的集中反映。

对李泰国来讲,他所谈论的舰队只听从中国皇帝的命令,本身包含有“要恢复和维持中国的和平,就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行动,指挥皇帝的军队,而不是省级地方军队”这样一种理念。他认为,如果中国要像西方那样强盛和进步的话,必须加强中央政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执行中央的意志。达到这个目的的惟一办法,就是建立和控制一支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他对李鸿章指挥着戈登的常胜军不以为然,甚至积极说服英国公使卜鲁斯,要把戈登直接置于清廷的控制之下。^[26]这种构想,在当时清廷中枢权力积弱,完全依靠地方汉族大员力挽狂澜的情况下,其实是根本做不到的。李泰国要求清廷撤消南北洋通商大臣这两个职位,由他本人直接控制海关岁人的使用权。他还要清廷为他提供一幢类似王府的官邸。他甚至要同总理衙门的大臣平起平坐,只对恭王负责。在北京的外交界,“他一直很傲慢”。赫德说,“他屡次到公使那里,多次烦扰他们,给他们带来不愉快。他告诉他们,他不信任他们,同时却要求他们信任他。”李泰国在北京成了人人讨厌的自大狂。赫德在日记中很有把握地写道:“李泰国不会成功。”^[27]

9月18日,阿思本率领舰队到达天津,旋进北京,同李泰国一起,要求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合同,表示除非按十三条合同办理外,拒绝从事任何活动,并宣布如果在48小时内收不到答复,就将舰队解散。总理衙门于10月13日口头通知李泰国,清政府不会批准他同阿思本签订的协议。

10月25日,总理衙门照会卜鲁斯,详述购舰事件始末,并指出“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这正是争论的症结所在,也是清朝统治者最为警惕的。接着,总理衙门又照会英国,宣布中国不能批准李-阿十三条合同的理由,请将轮船撤回变价出售,将船款交还中国,并免去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由赫德继任。15年后,赫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

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28]其实赫德是李-阿舰队事件的直接受益者,清政府不仅没有责备赫德,而且使他完全掌握了海关。

由于英国在此事件中企图单独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露馅,美国、法国等列强表示强烈的嫉妒和反对;在华的其他英国人也认为李泰国过于狂妄刚愎,所以英国最后同意撤退舰队。李-阿舰队的使命就此完结。12月12日,阿思本离开上海,次年1月10日,离开香港回英国。^[29]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新政府第一次对外采取强硬立场。洋务派刚刚起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装备的时候,就遇到了反对外国控制的严峻问题。通过这次交涉,也使他们今后同洋人打交道更加谨慎。

作为尾声,1865年8月28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阿思本带回轮船,英国政府估价为15.25万镑,合银46.75万两。此后售价若低于此数,由英国政府赔补。船上炮位军器火药不在此内,俟估明年再退还中国。^[30]不久,“广东”、“遐荒”被印度政府买去。“江苏”、“厦门”被日本萨摩藩买去,其中“江苏”改名“春日”,作为藩主的座船。1870年归入日本海军。“北京”、“中国”、“天津”卖给了埃及。清政府在这次组建舰队的活动中,先支付了173.2万两银子(包括外国官兵俸饷、路费等),以后收回106.8万两,白白耗费了67万两。^[31]由于英国冒险家的阴谋,清廷期望通过进口外国舰船,组建近代海军的第一个梦幻破灭了。

二、初创的江南制造局

1862年春天,正是太平军和清军在江浙一带激烈交战、争夺城池的时节。4月8日,39岁的道员李鸿章,率领着刚从家乡募来的七千淮勇,分乘八艘英国轮船,穿越太平军防线,从安庆抵达上海。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亲李文安,与曾国

藩、宝鋈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所以李鸿章 1844 年中举后,就以“年家子”身份,投入曾国藩门下,讲求义理之学。1847 年中进士,被认为是八股名家,落笔藻采纷披。同年中有许多人,包括张之万、沈桂芬、李宗羲、沈葆楨、何璟、郭嵩焘、马新贻,后来都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足迹。曾国藩认为此科进士中,有四人为伟器,可日为丁未四君子,李鸿章是其中之首。^[32]丁未科的主考官是潘世恩,其孙即潘祖荫,在同光年间官居尚书。李鸿章和沈葆楨的房师为孙锵鸣,孙乡试时出自翁心存门下,因而论起师门辈分,翁心存即为李鸿章的太老师,李鸿章则为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后来在给翁心存之子翁同书、翁同龢的书信中,都以“侄”、“世侄”自称。据说孙锵鸣当时以自己房中录取者甚少,很有些牢骚。某日带着门生拜见翁心存,翁心存懂点儿相术,看到李鸿章,就大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上”。看到沈葆楨,又说:“当为名臣。”翁心存对孙锵鸣说,“汝房中卷虽少,得此二人,复何憾?”这些复杂的师生同年人脉关系,对李鸿章后来登上政治舞台,周旋折冲于各派利益集团之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853 年,太平军占领武昌,李鸿章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后入曾国藩幕。这次正是根据曾国藩的命令,东驰上海,接着署理江苏巡抚,从而进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李鸿章踏上上海土地时,租界里已有英国人杜拉普经营的新船坞,莫海德经营的董家渡船坞,霍金斯开设的立祥安顺船厂,包义德开办的祥生船厂和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等几家修船企业。虽说这些船厂设备简陋,规模狭小,但黄浦江中停泊的外国轮船,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鸿章的长江之行,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他应邀参观了英法军舰后,感慨外国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决心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不过他尚无经验,对于学习西方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设想。在当时外国人眼中,淮军被看做“大裤子蛮兵”,李鸿章鼓励上兵说:“军贵能战,而不是看外表装饰。待我们上战场一试,再笑也不晚。”他给士兵装备西式枪炮,并采用西法进行训练,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

力。次年，他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事宜。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贡生出身，也是出自曾国藩幕府的洋务干才。此时，淮军正与太平军作战，所以由丁日昌在上海筹办洋炮局。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天京病逝，天京的陷落指日可待了。2日，总理衙门由恭亲王领衔，向皇帝提出一个奏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这个奏折在北京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奏折写道：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33]

这是经历了“李-阿舰队事件”之后，总理衙门再一次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奏折还附有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其中更有石破天惊之语，为当时士大夫不敢想、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34]

面对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有眼光的政治家都在认真思考。京师枢臣中的恭亲王、文祥，封疆大吏中的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时

代的先行者。他们认为,中国要避免落后、避免亡国灭种,只有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是大清王朝的忠实卫士,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造反,但在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他们审时度势,力排保守势力的非难。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出酝酿的这场学习西方运动,此时紧锣密鼓,开始上演第一幕。

黄鹄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鸟。史书上说:黄鹄一举,知山川之纾曲;再举,睹天地之方圆。它游于江海,淹于大沼,备其六翮,而凌清风。可见飞得极高,游得极远。1866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乘坐中国第一艘木质明轮蒸汽船“黄鹄”号北上省父,并亲书大楷,以金字雕镂于两舷明轮之厢,显示出时人对振兴中国造船工业所寄予的厚望。

最早开始研制轮船的人是徐寿和华蘅芳。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生于1818年。幼年姻帖括,习举业,应过童子试。后来深感举业不切实用,遂钻研格物之学。华蘅芳,字若汀,是徐寿的同乡,比徐寿小15岁,从小对数学极有兴趣,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典数学著作。1847年,他们两人相识,从此成为挚友。咸丰初年,他们跑到上海,向在墨海书馆工作的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求教,又广泛搜罗数学、律历、重学、化学、矿石、汽机、医学、光学、电学方面的书,潜心研索,并制设备一一予以验证。

1861年11月20日,政变上台才19天的两宫皇太后,为了笼络汉人,任命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曾国藩认为,中国“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35]不久,他在安庆建立内军械所,招致研究西学的专门人才。徐、华应募而去,开始了把科学实验同实际制造相结合的探索。

1862年4月,徐寿等奉命试造轮船,由于缺乏资料和加工设备,再加上毫无经验,因此困难重重。在此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刊载过火轮船介绍,郑复光撰写过《火轮船图说》,但与实际

造船和制作蒸汽机距离非常之大。徐寿、华蘅芳决定从试制蒸汽机模型着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诞生了。它的汽锅用锌类合金制造,汽缸直径1.7寸,引擎转速每分钟240转。7月30日,曾国藩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蒸汽机试车。

在此基础上,徐寿、华蘅芳开始试制一条小比例的“木质轮船”。船长3尺,暗轮。从长度分析,估计是条自航船模。其动力就是那台蒸汽机模型。然后他们着手制作真正的轮船。

造真船要比造模型困难得多。他们没有见过轮船动力设备的运转情况,就到长江边远远观察外国轮船的行驶;缺乏造船资料,就充分吸收我国传统造船的各种合理要素。1855年由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附有轮船略图,他们反复钻研、日夜凝思。华蘅芳主要负责设计和计算,制造轮船和蒸汽机则由徐寿主持。大约用了一年时间,于1863年11月,制成一艘暗轮蒸汽船。由于不知应设锅炉管,结果只行驶了一华里便停顿下来。徐寿毫不气馁,重新设计,并将暗轮改成明轮。两个月后,又一艘长约2丈8尺的小火轮制造成功了。轮船委员蔡国祥亲自驾驶,曾国藩上船察看,并指示将此船放大,投产制造。

湘军攻陷天京后,轮船的试制工作随内军械所迁往南京进行。1865年,第一艘有实用价值的蒸汽船建造成功。此船重25吨,长55尺,主机采用斜卧式双联双胀蒸汽机,单汽缸,回烟式烟管锅炉。推进器为设在两舷的腰明轮。船体布置为机舱在舫前,货舱在舫后,驾驶室在二层。时速22华里。^[36]造船材料,除主轴、锅炉和汽缸配件等铁料系进口外,其余皆为国产。而全部工具器材及设备配件,均系自行制造,总耗资约为纹银8000两。

1866年4月,“黄鹄”号在南京举行首航典礼。徐寿、华蘅芳在绝大多数士大夫们仍喋喋不休地唠叨着“用夏变夷”的时代,勇于探索西方工程技术,无愧是高高翱翔的“黄鹄”。

“黄鹄”号建成后,一度作为曾国藩的坐船。其儿子、夫人出行,都由“黄鹄”号拖带或护航。直到年底,才命徐寿将船驶往上海,交江南制造局管理。

1865年,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下了虹口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根据李鸿章的奏报,这家工厂是洋泾浜外国工厂中机器之最大者,能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由原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人集资4万两白银购下报效,以赎所犯罪愆。厂内各种钢铁木料,另值2万两白银,由丁日昌借款购买。关于旗记铁厂是不是“洋泾浜外国工厂中机器之最大者”,是可以存疑的。这年英商成立了耶松船厂,旗记铁厂估计是无意在日益增多的外商修船企业中继续竞争,所以愿意脱盘出售。李鸿章又把丁日昌和总兵韩殿甲先后所办的两个炮局以及容闳在美国购到的机器一并归入。李鸿章会同曾国藩,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初,似乎并不是为了造船。1863年底,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安庆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则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机器厂之基础也。”^[37]“制造机器之机器”的说法,对于刚刚接触外国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说来是十分新鲜的。所以李鸿章在报告购买旗记铁厂的奏折中说:“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但当时李鸿章并未将这批“制器之器”用于建设中国基础机械工业,而是根据前线需要,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至于造船,他说:“此事体大物博,毫厘千里,未易挈长较短。目前尚未轻议兴办。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之技艺。”^[38]

这年5月,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同捻军作战中被杀。朝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去剿捻,李鸿章署理江督。次年6月2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拟于福州海口建局造船。这对李鸿章显然是个刺激。7月19日,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去函,商筹沪厂制造小型轮船。这是江南制造局酝酿造船之始。年底,由于曾国藩剿捻无功,朝廷命其回任两江,调李鸿章署钦差大

臣,与捻军作战。此后,江南制造局便归曾国藩领导了。^[39]

江南制造局原址在虹口美租界,由于生产军火,受到外侨反对;而场地狭窄,也不利于工厂发展,于是便迁往上海县城南面的高昌庙。新址占地70余亩,动工于1866年夏,竣工于1867年冬。由孙玉堂、华蘅芳主持施工。不几年面积拓展到400亩。局门座北朝南而设,署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局名。东、西、北三面绕以高墙,正南面则用木头列成栅栏。进门后,中间设有公客厅,厅西迤北为公局,是官员议事的地方。公局东为文案房、画图房、总库房、东迤北为生铁厂、木工厂。正北为炮厂、大火器厂、汽锤厂、轮船汽机锅炉厂。公局西迤北为繙译房、广方言馆,又西北为熟铁厂,楼西为汽机厂。北面为卷枪厂。局门外至黄浦江边是一大片空地,有直道通往码头。直道东为泥船坞和造船厂,船坞长325英尺。坞西为木栈,又称西厂,为储积材料之所。^[40]时人作竹枝词吟道:“厂坞宏开备造船,马头筑就局门前。盖房分住华洋匠,监造工程派两员”。“机器锅炉厂各分,造船铁壳匠成群。楼登一座洋枪望,测量台高上矗云。”^[41]以后又增设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在龙华设立制造分局,内有火药厂和枪子厂;在陈家巷设立火箭分厂,两处分厂共占地267亩。还在松江城建立火药库。江南制造局成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它在开工生产军火后不久,又开始建造轮船,从而使得江南制造局的名字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867年5月16日,朝廷批准曾国藩的请求,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酌留二成,一成解济军饷,一成给制造局专供造船之用。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应宝时与会办冯焄光、沈保靖以及技术负责人徐寿、华蘅芳等,抓紧进行轮船的试制工作。1868年7月23日,江南制造局第一艘明轮蒸汽船下水,取名“恬吉”号,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的意思(后改名“惠吉”号)。从此,黄浦江开始迎接着一艘又一艘中国人制造的轮船。

“恬吉”号是木质船体,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顺流时速

60里,逆流时速35里。^[42]各项参数都大大超过了“黄鹄”号。在此之前,上海洋厂制造轮船,锅炉机器全从国外进口,只是配上自制的木船壳。江南制造局却自制船体和锅炉,另购旧蒸汽机整修后装船配套使用。轮船造价共耗工料银81397.3两。“恬吉”号先在吴淞口外试航,直抵舟山而返。9月28日上驶江宁,曾国藩亲自前去视察,并登舟驶至采石矶。

这件事从策划到施工,届时年余。曾国藩惟恐试验失败,未敢事先奏报。只是暗中催饬赶工。成功的捷报使得朝廷感到意外,也十分高兴。11月1日,军机大臣向有关人员颁布上谕指出:

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成造,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43]

曾国藩计划第一批建造4艘轮船。除第一艘是明轮外,其余皆改暗轮。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后,便抓紧第二艘船的施工。他奏请将江海关所留二成洋税全拨制造局,专造轮船。局里聘请三个外国技术人员领工,几百个中国工人边干边学。1869年5月,第二艘轮船“操江”号竣工。“操江”号排水量640吨,马力425匹,所有船体、轮机、锅炉皆为厂内自造。船成之后,照例出吴淞口试航,至舟山而返。旋驶江宁,供马新贻验试。马新贻向朝廷报告说,此船工料极为精坚,机器小而灵动,在长江行驶尤为相宜。^[44]10月5日,第三艘船“测海”号下水,次年10月,第四艘“威靖”号竣工。1872年5月,第五艘船“镇安”(后改名“海晏”)号下水。“镇安”排水量2800吨、马力1800匹,载炮20门,是当时国产木壳蒸汽船中最大的一艘。^[45]江南制造局的造船能力可见已很强大。

由于江南制造局是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兼带造船的兵工厂,在造船方面没有投入主要精力,故造船数量不如后起的福州船政局,大约保持在平均每年一艘的规模。1873年2月,“镇安”号的同型船“驭远”号下水后,延至1876年才又制成铁甲小轮船“金瓯”号。这是一艘带试验性的军舰,仅长105英尺,马力200匹。据说此船制成

后,发现不能出海,炮位布置也有问题。^[46]此后,造船业务便停顿下来了。

考察江南制造局停造轮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政府看到国产军舰型制不如外国。制造局所造6舰,除了“海晏”号、“驭远”号尚与国外同类军舰相似外,其余不过是炮艇的规模。造船所需原材料,皆需大宗进口。制造工作亦由洋匠主持。而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因此造船不如买船。^[47]在当时,这些情况显然是存在的。如前所述,19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海军的主战军舰已从木质舰改为钢质舰了,继续生产木壳军舰,本质上同继续生产旧式师船区别不大。而转产钢质舰,船厂设备需要大大更新。对清政府来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首要任务是加强海防、组建海军,集中起一批先进的军舰来。至于军舰是进口还是国产,只是问题的形式。两相权衡,清政府做出了依靠进口军舰组建海军的决定。近代军舰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涉及资金、技术、设备、工艺、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在没有强大稳固的重工业前提下,仅靠投资造船厂,要造出先进的舰只有很大困难。比诸外国,至少在1878年以前,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新型舰船的垄断权。因此,从获取近期效益的角度看,进口未必不是一种应急的方法。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大国,如要有效地保卫海疆,仅靠进口军舰而不建立本国先进的国防工业体系,显然也是不行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每当对外民族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的时候,中国海军就一筹莫展,无法及时补充军备。进口与自制,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自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历程,决策者总是备感棘手地面对着这种选择。

停造轮船的另一个原因,是江南制造局军火生产任务太重,又无款可拨,便将洋税之款拨留一成先行借拨,以济制造枪炮之急,导致了造船工业的偏废。当时李鸿章上奏,对制造局趋重生产枪炮、放松建造轮船表示过看法,指出欧洲列强正在推广海军,添造

轮船不遗余力,中国造船事业岂可创办未久遽生懈弛之心?无奈制造局注重枪炮弹药已成难返之势,马新贻所请酌留的二成洋税几无用于造船,故李鸿章有意维持造船也颇为困难。即便当过船政大臣的沈葆楨于1875~1879年驻节江宁五年,也没能使制造局的造船事业振兴起来。直到1884年左宗棠开府两江期间,才奏准建造了一艘“保民”号钢质军舰。以左宗棠之权位和对造船的兴趣,也无法使制造局军火、舰船两者生产并重。

1881年1月,李鸿章在讨论内阁学士梅启照整顿水师奏折时说:“从前闽沪轮船多系旧式,以之与西洋兵船角胜,尚难得力。闽厂后来所造‘扬武’、‘超武’两船,则渐渐合用矣。然欲仿造铁甲船,尚恐机器未全,工匠未备,不若西洋购材制料取携较便,厂肆既多,可以任意选择。惟是中国制造之法宜渐扩充,果使所造行驶之速,锋棱之利不逊于洋厂,虽需费稍多,亦可免洋人之居奇,开华匠之风气。拟请敕下船政大臣详查……如能合算,即以应购铁甲之费附入该厂,剋期造办。至沪局制造枪炮弹药各项工器太繁,经费支绌,已饬停造轮船……虽该局机器略备,而无精熟此道之员匠,于西洋新式隔阂尚多,似可缓议。”^[48]这番话,可以为以上两个原因做注脚。但在私下,李鸿章认定造船不如买船。

三、福州船政局的诞生

1866年6月25日,洋务派又一重要领袖,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任所向朝廷上了两道奏疏。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虽然只是举人出身,由于多年塾师、幕僚生涯的磨砺,使他下笔成书,文章灿烂可读。平日他悉心经世致用,注意研究外国事务,尤其重视研究国防,关心造船事业的发展。三年前,法国远东舰队司令琼·路易斯·耀来斯在宁波建造了一个小船厂,造了四艘小轮船。不久,法国人对直接在中国经营造船业失去信心,听说左宗棠有意建造轮船,便打算把船厂

盘给他,而在法国人需要时,又可加以利用。1864年7月,前“常捷军”帮统、法国人日意格向左宗棠提出了这个意向。由于“李-阿舰队事件”余波未息,宁波船厂规模又太小,只能建造船体,而螺旋桨、蒸汽机、火炮都要向法国购买,所以左宗棠立即予以回绝。这年10月,左宗棠在杭州西湖请日意格、德克碑观看中国人仿造的小轮船,^[49]并与他们论证了设立船厂的计划。可是当时正处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旅之中,治所未定,行程多变,这套计划只能置于篋中。太平天国失败后,左宗棠驻节福州,更决心建造轮船。1865年,赫德向总理衙门递呈《局外旁观论》,接着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提出《新议论略》,怂恿清政府实行“新政”。此时,左宗棠借清帝飭令他参与讨论之机,和盘端出了设局造船、御侮自强的主张。

在第一篇奏疏中,左宗棠剖析了鸦片战争后的沿海形势,指出江南大利,在水不在陆。自广东至盛京,大海环其三而。江河以外,万水朝宗。和平之日,漕运贸易,业民安众。战争之时,调兵转输,设防争道。况津沽为北京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舰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是以“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针对保守派的攻击非难,他以犀利的言辞回击说:

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50]

在第二篇奏疏中,左宗棠进一步申明: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奈之何”?“此微臣所为鳃鳃过计,拟习造船兼习驾驶。怀之三年,乃有此请。”^[51]

左宗棠分析了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轮船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的原因。针对船厂择地困难,他建议可在福州海口罗星塔一带建局;针对机器购觅之难,他认为可托洋人购觅;针对外国匠师要约之难,他主张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派人随同学习,靳

不传授者，罚扣薪水；针对筹款之难，他提出可划海关税收及厘税益之；针对船成之后无人驾驶，他提议雇请洋人担任教习；针对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赀，他以为可用轮船平日经商运漕，战时集中使用、分攻合剿的办法解决。最为困难的，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面对这些非难，他认为要看到世界大势，尤其是日本及俄罗斯、美利坚的奋起。他坚定地说：“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52]

鉴于“李-阿舰队事件”的教训，朝廷对于购买外洋船炮犹有并绳之虑。但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又使其坚信外国轮船必是攻守利器。处于这种矛盾境地中，看到左宗棠自告奋勇设局造船的主张，便立即予以批准了。

8月19日，刚担任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应左宗棠之邀，抵达福州。日意格原是法国军官，参加过克里米亚海战，1856年来华。在担任宁波税务司任中组织“常捷军”镇压太平军，从而结识左宗棠。这次他们同赴罗星塔，择定在马尾山下宽130丈、长110丈范围内开设船局。马尾山位于闽江之畔，闽江两大支流在此交汇。南支曰西峡江，又称乌龙江；北支叫东峡江，一曰马头江。因江中有石状如马头而得名，马尾的地名亦由此衍生。这里面临大江，群峰西矩，中间一片坦途。局址泊岸处，土实水清，深达12丈，为天然良港。在商定了办厂的详细合同后，根据左宗棠的要求，日意格前往上海，请法国领事白来尼签字作保。

10月5日，担任过“常捷军”统领的另一位法国军官德克碑亦应召赶到。左宗棠与他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办船厂的各项细节。10月14日，他们正在督署议事，忽然接到上谕。原来在十几天前，朝廷已决定调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前去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显然，船政局不可能随左西迁，左宗棠也不愿船政局流产。他推荐了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楨总理船政，要求准其专折奏事，以防牵

制。朝廷接受了这一提名。

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议定的清折要点是：（一）从船政局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内，日意格、德克碑负责募雇30名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中国工匠一切造船技术。（二）在此期间，购买外国船厂设备及轮船材料物件，以便制造能装1万石米、150匹马力的轮船11艘，80匹马力的轮船5艘。（三）进口二台150匹马力的蒸汽机，一台供初学仿造时参考，一台先行配装上船，以免船厂旷待。待铁厂自行生产出五六台轮机后，再将进口轮机装配上船。购买80匹马力的蒸汽机五台，交轮船厂抽空配造。（四）购买铁厂设备，以便制造轮机，并形成技术维修力量。铁厂设备，还可兼造枪炮。（五）开设学堂，教授中国工匠近海驾驶技术及英、法语。远洋航行非五年所能尽悉，将来或留外国人二三员再教习二三年。（六）日意格、德克碑回国雇募人员，采办设备原料。（七）日意格、德克碑月薪银1000两。五年内如能达到计划的各项要求，另外各嘉奖2.5万两，嘉奖外国工匠6万两。

左宗棠任命日意格、德克碑为船政局正副监督，又与他们订立合同规约，规定铁厂、轮船厂并学堂事务，由中国高级官员飭委洋监督负责，若有办理不妥，惟洋监督是问。所有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均系中国的雇员，须认真出力，除奉派差使外，不得私揽工作。局厂内一切公事与中国官长来往，俱由洋监督负责，其余外国雇员不得私自越疆干预。教习期内，如中国工匠已掌握技术，应由中国官员酌量裁减。外国雇员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或教习办事不力，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工匠，洋监督当随即令其回国。^[53]

从清折合同看，左宗棠十分注意“权操诸己”，以防“李-阿舰队事件”重演。朝廷对这些措施十分赞赏，称其“所见远大，理当如此”，并规定左宗棠西征期间仍当预闻船局一切事务。^[54]

船政局于1866年12月23日正式动工兴建，到1868年夏基本完工。计建衙、廨、厂、坞、洋房共八十余所。东北面是船政大臣衙门，前、后学堂，艺圃，东西考工所，洋监督住宅，外籍工人住宅，翻译、医生、洋教习住宅和中国工人、学生宿舍。住宅区用高墙分

隔,到了晚间就禁止通行。为了信仰的需要,特地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分造了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为中国人造了天后宫。西南面为厂区,包括船厂、合拢厂、截铁厂、打铁厂、铸铁厂、模厂、轮机厂、水缸厂、钟表厂、样板厂、帆缆厂、拉铁厂、锤铁厂、转锯厂、木料厂、炮厂、舢板厂。局内设置铁路。全局占地约 600 亩。其中船厂拥有四座船台,能够建造龙骨长 100 米,排水量 2500 吨的船舶。此外,还从法国订购轮机、铁板,制成长 30 丈、宽 15 丈的铁船槽(即浮船坞),专供修理轮船。^[55]

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楨于 1867 年 7 月 17 日释服,次日前往船政局工次,开始视事。

沈葆楨,字翰宇,号幼丹,福建侯官人。19 岁(1839 年)中举,娶舅父林则徐的二小姐林普晴为妻,27 岁中进士,排名二甲 39 名,后于 24 岁的安徽士子李鸿章三名。1856 年任江西九江知府,旋入曾国藩幕府,管理营务。1862 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抚赣期间,镇压太平军,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干王洪仁玕皆死在他手中。沈葆楨的特点是办事细密,作风严峻,擅兵法,长吏治。这些特点在他总理船政时都充分体现。按照清制,地方官不能在家乡任职。沈葆楨以本地绅士身份主持船政局,又获得专折奏事权和部颁关防,身份特殊,也可看出朝廷对他的宠信。他曾在船政大臣衙门作对联云:

以一簣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又联曰:

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此即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
何以能精益求精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扣心来

作为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葆楨为创建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封疆大吏中第一个真正进入近代化技术操作层面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人物。

1868 年 1 月 18 日,是福州船政局的盛大节日。第一号轮船

进行了隆重的安放龙骨典礼。沈葆楨亲率局中官绅并洋员祭告天后，与提调官周开锡、夏献纶及诸员匠共捧龙骨，安上船台。又到船厂，亲自拽绳下石，奠以牺醴。并与中外员匠敬宣皇上德意，勛以夙勉图功。闻者欢声雷动，手舞足蹈。然后举爵挈觞，劳之以酒而退。此后，他经常极为细致地关注着每一件新奇的西洋技巧，从蒸汽机到木材的弯曲工艺。他写给朝廷的报告，也常常包含着详尽的技术细节。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869年6月10日午间，第一号轮船顺利下水。这天沈葆楨率领员绅拜致天后、江神、土神、船神后，由日意格指挥工匠拔尽船底撑柱，锯断船头托钢，轮船便顺势滑向闽江。接着升桅杆、系帆缆、备床龔、添旗帜、制号衣、整炮械，以备出海试航。

船政局日后每制新船，均由船政大臣等共捧龙骨，安上船台。新船下水，祭祀天后及诸神，典礼如仪，成为定例。

第一号轮船被命名为“万年清”号，船长238营造尺，宽27.8尺，吃水14.5尺，排水量1370吨。货舱载货量350吨。装有立式150匹马力蒸汽机一台，平均时速40华里。^[56]9月25日，沈葆楨亲自登船出海试航。10月1日，由船政提调吴大廷督同管驾员锦泉展轮北上津门，听候勘验。11月5日至8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大沽验收合格。

12月6日，第二号“滙云”轮下水。1870年5月30日，第三号“福星”轮下水。两船动力均为80匹马力。至1871年底，船政局按预定计划共制轮船六艘。自制蒸汽机也顺利进行，第五号“安澜”轮（亦即第三艘150匹马力轮船）如期装上国产轮机、锅炉。出海试验表明，船极灵捷平稳，机器配搭亦均合宜，与购自外洋者无异。

80匹和150匹马力的动力，对于军舰来说，无疑太小了。船政局方面与日意格讨论，希望增拓马力。经过磋商，决定向国外订购一套250匹马力新式轮机，装到第七号“扬武”舰上去。“扬武”号是船政局前期制造的功率最大的军舰，排水量1560吨，时速12

节。布局全按国外军舰规制,不再兼设货舱。“扬武”舰于1871年7月12日装上龙骨,次年4月23日下水,船台周期9个月,较之第六号“镇海”轮的8个月周期、第五号“安澜”轮的7个月周期并不更长,但整个工作量却超出了一倍。^[57]

由于沈葆楨是封疆大吏出身,又经过战争的世面,所以在局里采用严刑峻法建立威信。时人笔记记载,有个工人偷了外国工匠的汗衫,他斥其“太不替中国人做脸”,喝令处斩。藩司因买铜不报,谓与税款有碍,用札驳诘,他立缚藩吏,以“阻挠国是,侮慢大臣”八字杀之。某次与幕僚作诗,中途退场一回,则又坐堂杀人。在他管理船政局期间,弊绝风清,外国专家也对他表示钦服。^[58]

除了严格的纪律管理,沈葆楨也给工人较高的报酬:无技术工人每天工作11小时,月薪银4.5到7两。同时期江南制造局的待遇是2.33两至4.7两,而上海工厂里的工人是4至5两。技术工人待遇更好,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冬季8.5小时,春秋9小时,夏季10小时,月薪7两至21两。江南制造局的技术工人工资为5.7至15两。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收入,并且都能按时领到,而劳动条件,较之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欧洲、日本以及后来的中国企业都要好得多。^[59]所以工人的表现也很出色,以较快的速度掌握了西方的工具和技能。

造船工业的兴建和发展一直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正统派士大夫坚持以孔孟之道作为立国的根本和评价事物的尺度。1867年春,正当船政局大兴土木进行基建的时候,京师里为设立同文馆爆发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大学士倭仁是保守派的挂帅人物。他在论战中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60]集中代表了保守派对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基本看法。在福州方面,新任闽浙总督吴棠也不以造船为然,处处务求反左宗棠其道而行之,使得船政局这株嫩苗面临夭折的危险,以致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亲自向朝廷请求,让沈葆楨一人专司船政。总理衙门也致函沈葆楨,要他以大局为重,勿以吴棠掣肘为意。

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上奏,认为船政经费已拨四五百万两,未免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用虚耗。请将沪闽两处造船暂行停止,额拨经费转解户部,已成之船租给殷商。福州将军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亦倾向停造。但又说如果停造,中国将赔偿法方70余万两白银,并认为将军舰租给商人太可惜,靠老式师船巡逻又不如轮船灵捷。曾国藩立即给总理衙门写信,指出当初造船,“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船械练兵演阵等处入手”。左宗棠也拍案而起,力驳非难,强调“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己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61]沈葆楨更用事实说明,从“万年清”到“伏波”、“安澜”,制造技术日益改进,航行效果越来越稳。他问:“譬诸读书,读至数年,谓弟子当胜于师者,妄也。谓弟子即不如师矣,莫若废书不读,不益妄乎?且各国轮船亦有利有不利,其创之也各有后先,其成之也互相师法,久于其道,熟能生巧者则利,卤莽从事,浅尝辄止者则不利……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岂但轮船一事然哉?”^[62]李鸿章也说:“士大学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大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63]在他们的坚持下,造船计划得以继续维持。不过在私下,李鸿章对船政局造船却不以为然,如同他对江南制造局造船的态度一样。他告诉王凯泰,他奏折中态度,只是对左宗棠、沈葆楨大声疾呼的回应,在当前的气氛下,鄙人又怎么可能去唱反调呢?^[64]

从1869年2月11日(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铁厂起造,到1874年2月16日(同治十二年底)适为五年,船政局共制成“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共15艘舰船。其中“扬武”轮工料繁巨,一船抵作二船。16艘舰船的建造计划算是完成了。朝廷赏给日意格一品衔和准穿黄马褂的荣耀,并与德克碑一体赏给一等宝星。所有在局出力洋员匠51人,

各得赏金。然后按照合同,将其遣散回国。

怎样评价船政局前期所造轮船,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当时,除了朝廷内部,报界也发表了意见。英文《北华捷报》认为清政府的钱用得很不得当,福州船厂不过是个大玩具,看看很漂亮,但完全无用。^[65]《申报》反驳说:中国仅以数百万两之费,六七年之时,习悉泰西百年之学,难道不是大利吗?怎能说是糜耗巨款呢?^[66]应当看到,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迈出的却是近代化的最初步伐,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变。同时也为进一步建造更好的舰船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些,应对船政局的造船实践予以高度评价。可是,在短短5年中,朝廷向船政局投入500万两白银,大大超出预定的300万两计划额度;所制军舰皆为木壳,功率较小,式样也不先进;每艘舰船的成本高于国外同类船50%至60%等问题也确实存在,^[67]说明船政局在引进外国技术时起点不高,内部经营管理也存在问题。加之国内本无制造业基础,使得船政局在许多方面依赖外国,造船成本难以降低。这些都是中国早期工业化探索中的宝贵教训。不过,仅凭这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船政局,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顺便指出,船政局与江南制造局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造船方针上出现的不同情况,只是洋务派内部在发展海防事业上做出的不同方案选择,而在引进西方技术加强国防建设的总体目标上并无质的区别。

15艘舰船完成后,喧闹了几年的船政局安静下来。车间里制成的两台蒸汽机尚未配用,船台上空空荡荡。下一步该怎么办?冬烘先生们主张就此收盘,洋务派还想继续干下去。这时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沈葆楨率“安澜”、“伏波”、“飞云”号军舰前往台湾交涉。接着,他向朝廷呼吁,请允许继续造船,加上朝中恭亲王奕訢的鼓动,这个要求被批准了。于是第十七号“元凯”轮(150匹马力)便顺利地被送上船台。同样的木壳轮船,后来还建造了两艘,即第十八号“登瀛洲”和第十九号“泰安”。

值得一提的是,1875年夏,第十七号150匹马力船制造在即。因用于船肋的暹罗弯木尚未到货,一时难以动手。船政学堂的学生拿出自己绘制的一艘50匹马力船设计图和轮机设计图,禀请试造。沈葆楨支持青年人的尝试,称之为“中华发轫之始”,并把它命名为“艺新”号。^[68]1876年6月10日,千总沈有恒和制造学生汪乔年、吴德章驾驶“艺新”轮进行首次试航。这是船政局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船舶。

1875年5月30日,朝廷调沈葆楨任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沈葆楨选择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接办船政,旋从李鸿章处得悉郭已被内定为第一任出使英国大臣,便改请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继任。11月9日,丁日昌到局视事。一个月后,福建巡抚王凯泰因病出缺,朝廷命丁日昌接任。丁日昌建议在顺天府尹吴赞诚和布政使衔津海关道黎兆棠两人中拣派一人接办船政。朝廷选择了吴赞诚。次年5月,吴赞诚到局就职。丁、吴配合默契,进一步发展船政局的事业。但这对密友的健康都不佳,1877年夏,丁日昌连续病假,挣扎了一年,终于因病免职,由吴赞诚署理巡抚。岁暮时节,吴赞诚由船政工次到省,前往拜访丁日昌,忽然病倒丁府,几经医治不见好转。朝廷便转调前直隶按察使黎兆棠继任。黎兆棠在船政大臣的职位上工作了四年,据说他官声不佳,最后被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参去职务,由张梦元接任,但这一时期船政局总的形势依然是蒸蒸日上。

吴赞诚任内的主要贡献,是将船政局从生产木质船转产铁肋木壳合构船。原先建造的19艘轮船,所需木肋皆从南洋进口。由于这种天然弯木来源日益困难,要长期稳定地建造轮船,必须以铁代木。此外,生产铁肋船,还能为进一步建造全铁壳船打下基础。船政局的生产设备,是按生产木质轮船配置的,法国人传授给中国人的,也是建造木质船的技术。转产铁肋船,原材料较原先易办,工作量则增加一倍,技术和工艺要求也更高。内行们还指出,为了提高船速,必须增大船用蒸汽机的功率。经与日意格商量,决定在法国先订全副铁肋,又在英国订制2台750匹马力复合式蒸汽机,

以作仿制依据,并于1875年底开始兴建铁肋厂。1877年5月,第一号铁肋兵船“威远”号下水,接着,同型船“超武”、“康济”、“澄庆”、“横海”号也先后下水。成批生产铁肋船和750匹蒸汽机,标志着船政局的造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黎兆棠任内,船政局开始生产铁木合构的巡洋舰,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巡海快船。这个计划酝酿已久,早在1876年秋,吴赞诚便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委托日意格在法国地中海船厂购买1000匹马力巡海快船图纸。经法国工程师核复,建议改为2400匹马力方可适用。旋用银3092两,在法国购得图纸,于1879年寄回国内。因船政局经费拮据,延至1881年11月开始施工,1883年1月下水,命名“开济”号。“开济”排水量2200吨,船体铁肋之外,另包木敷两层。船头水线下装设冲角。船上配炮10门,皆可旋转轰击,火力猛烈。黎兆棠兴高采烈地向朝廷报告说:“开济”舰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其大段款式,已与常式兵轮有异。制件之精良、算配之合法,皆由制造学生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按照国外最新技术建造的,尤为各船所不可及。^[69]当时北洋正从国外进口巡洋舰“超勇”、“扬威”号,南洋也随之引进“南琛”、“南瑞”号。李鸿章研究了“开济”图纸后,认为它“与购之外洋者相等,而与铁甲船相辅并行,为用甚大”。1883年9月和10月,新任船政大臣张梦元两次乘舰试航,也对它赞不绝口。沿海各省督抚纷纷表示出订购意向。

“开济”拨归南洋使用。1883年10月23日,何心川驾驶北上,忽遇飓风,致使舱中积水,轮机不能工作,何心川向上级报告说,船上抽水机不合用,顺便又指责造船未合工期、时速低于原设计、吃水又超过设计要求,还说造船经费超支。根据后来船政大臣何如璋的调查,故障责任主要归咎于何本人的驾驶技术和处理危急情况经验不足,以及船上水手对抽水机保养不善。^[70]因此,它的另外两艘姊妹舰“镜清”号和“寰泰”号得以继续建造。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在资金来源和产品分配上

都带有浓厚的封建官营手工业特征。经费来自财政拨款,产品由朝廷统一调拨,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等价交换原则。这种做法,虽能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保证企业的生产,但缺乏刺激企业生产和升级换代的活力。

船政局创办之初,左宗棠奏定从闽海关四成结款项下拨银40万两作开办费,每月从六成款项下拨5万两以供日常开支。“万年清”号下水后,沈葆楨上奏请拨厘局征收洋药票税款,作养成经费。1875年1月,又奏请自1874年5月31日起,将洋药票税并各船薪粮归入台防项下收支。因经费困难,船政局还于1873年从福建茶款项下每月拨银2万两,共24万两。1875年夏,沈葆楨以闽海关六成洋税下月解5万两不敷使用,奏请从四成项下余银40万两尽拨船政。嗣后又决定,从1876年起,船政经费六成月拨3万两,四成月拨2万两。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光绪十一年底(1866年12月23日~1886年2月3日)20年间,船政局共收各项经费银10 793 743两,总支出10 222 464两。^[71]其间共建造了27艘舰船,造船经费约用500万两,占总支出的50%。

最初,无论是总理衙门还是船政局,对于所制轮船的调拨使用均无周详考虑。迨至1871年底,已成五舰除一艘被浙江调去巡缉洋面外,其余四舰皆留在福建,洋药票税收入不敷养船之用。福州将军文煜向朝廷提出了这个问题。12月18日总理衙门议复说:

查闽省开厂制造轮船,原为备物制用,以期有备无患之意……沿海省份,如广东之香澳、山东之登州、奉省之牛庄、直隶之天津等处,均属海道可通。且各该省每有雇买外国火轮夹板等语,以资办公之时。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资,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雇买之费,兼可节闽省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于试演新船、撙节度支之道均有裨益。如蒙谕允,应俟命下之日,臣等行文南北洋通商大臣及沿海各督抚,体察各处情形,分别奏咨拨往应用。所需薪粮各费,准令由各该省洋药厘金项下就近动支。^[72]

当日奉旨允准。总理衙门即于翌日通知各地疆臣,嘱其奉旨

拨船应用。次年4月14日,又行文催促办理。从此形成各地向船政局调船的传统。由于船政局的资金来源于固定拨款,产品不计成本,因此这些舰船不作商品出售,各地完全是无偿而获。

各地对选船十分挑剔,尽量要好船。除了“安澜”、“大雅”两船1874年在台湾安平,旗后遭风浪沉没外,“登瀛洲”、“靖远”、“澄庆”、“开济”、“横海”、“镜清”调南洋,“伏波”、“元凯”、“超武”调浙江,“镇海”调天津,“湘云”调盛京牛庄,“泰安”调山东,“威远”调北洋,“康济”调招商局。留闽的尚有6艘军舰(“万年清”、“福星”、“扬武”、“振威”、“济安”、“艺新”)和3艘运船(“永保”、“海镜”、“琛航”),其中“扬武”舰吨位较大,用于船政学堂练习舰,其余都是过时的木壳舰船。第一艘下水的“万年清”号始终没有人要:“福星”曾经搁浅,船身龙骨均有受伤。而1877年以后下水的铁肋木壳舰却一艘也没留下。可见军舰的去留,取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需要,作为东南沿海前哨的福建,反倒得不到重视。只有分不出去的舰船,才挂在船政局名下,归闽浙总督和船政大臣调遣。

四、天津、广州的造船事业

天津是华北门户,京畿喉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它作为中外交涉的重要窗口,地位日益重要。先是设立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接着,直隶总督也从保定迁来,建立第二衙门,直隶总督往返于保定、天津二地办公。1870年起,每天早晨6时,它的上空便回旋起“嘟嘟——”的汽笛声,这是新设的机器局在催促工人上班。从曼彻斯特、埃森到匹兹堡,黎明的汽笛一直是工业的标志。此时,上海拉响了汽笛,马尾拉响了汽笛,天津也拉响了汽笛。

天津机器局是根据恭亲王的建议倡办的。1866年8月15日,总理衙门鉴于上海、福州、金陵等地相继兴办近代工业,而北方的捻军和西北的回民起义正风起云涌,特奏请在京师或天津设局

造机器。10月,又进一步提出办局设想。从表面看,这是为了使军火工业平衡布局,同时也开北方风气。在实质上,又是出于对南方军火工业发展导致地方实力增强、外重内轻局面发展的一种防范。恭亲王指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具体筹备,以津海关和东海关四成关税作为常经费。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贾家沽购买民地22顷30余亩,厘为局址。1867年5月开局,1868年春间收到在国外设计的局房图式,兴工建造,至1870年8月告成,局名“天津军火机器局”,主要设置机器厂、火药厂、铜帽厂。总计建造机器房42座,290余间,大烟筒10座,洋匠住房160余间。又在海光寺设立铸造局。为了便于区别,贾家沽局址称为东局,海光寺局址称为西局。崇厚聘请英国人密妥士为机器局洋总办。密妥士原是商人,此时正兼着荷兰、比利时、丹麦驻天津的领事,同时还是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居然能分出身来,为三口通商大臣办兵工厂。雇募的其他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于1868年春起陆续到工。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发生,直隶总督曾国藩办案,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死。29日,朝廷命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调湖广总督李鸿章任直隶总督。11月12日,朝廷准工部大臣毛昶熙请,裁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营,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从此,李鸿章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生涯。

李鸿章接任直督后,改“天津军火机器总局”为“天津机器局”。他视察了机器局后,建议进一步扩充,将江南制造局总办沈葆靖调任总理天津机器局事务。还从南方调来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撤换以前在局的旗人和北方人。又以密妥士对于机器未甚精核,将其撤换,从而使天津机器局控制权转到自己的手里,同时又添造了火药库、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津局宗旨,主要以制造弹药为主。以后又生产步枪,试制水雷。1887年还建成一座生产栗色火药的工厂,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之一。其产品专供海口炮台内新式后膛炮和北洋海军各军舰火炮使用。北洋

海军成军后,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天津机器局“专造北洋水陆各营枪炮、应用火药、子弹及水雷、铜帽、门火等件”。李鸿章本人也屡次强调“该局为海防水师取给之源”及“该局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73]

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任务是制造军火,但在兴办之初,便建起一座船坞。^[74]当时驻巡北洋的“镇海”、“操江”轮船,需煤需料,修船修器,皆由该局承办。运输直、晋赈粮的福建、江南轮船,运输江浙漕粮的招商局轮船,一有损坏,亦由该局拨工拨料,星夜修理。

天津机器局承制的舰船不多,但都以其特殊性引人注目。最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它在1880年试制的第一艘潜水艇。这年6月20日,上海教会报纸《益闻录》在“试造轮船”的标题下,刊登了一条消息:

析津来信云,客岁有某员稟请试造轮船,当经大僚据稟具奏,得旨着就厂局试办,其能否合用,仍俟察查复奏等因。刻闻津门陈观察绘图贴说,募工攒造,并经府道大员通牒大府,具保领款。并称如不适用,愿将开去款项,照数赔偿,具结申送。现于津厂后面,缭以周垣,开工试造。雇用工匠十余人,自备薪米油烛等费,并木料铁皮,分头采买,不动该厂公项。禁止外人窥探,即其余工师,均设严禁,不准窥视。闻夏秋之交,当可竣工。未知制就后能否绝妙一时,徒令通观厥成者,望眼欲穿也。^[75]

躲在围墙后面施工,无关人员不准窥视,这在其他船局制造轮船的过程中是没有的,因而更增添了神秘色彩,使那些惯于打听各种信息的报馆访员按捺不住,心痒难忍。三个月后,该报终于把谜底揭晓了:

津门机器局创造轮船,其情形已略前报,兹已造成,盖驶行水底机船也。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节下水试行,灵捷异常,颇为合用。因内河水甚深,水标仍浮出水面尺许。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而布雷

无不如意,洵摧敌之利器也。〔76〕

这条潜水艇的下落,后来不见记载,估计是失败了。从1880年9月18日(中秋节)的首次试航看,它尚未能全部沉入水下。

关于潜水艇的研制,有的学者一直追溯到2000年前,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曾坐一种玻璃容器下沉至海底并停留一些时候再浮上水面。但首先对潜水艇原理做科学说明的,是英国人威廉·伯恩在1578年出版的《发明》一书。40年后,侨居英国的荷兰物理学家德布雷按伯恩理论造了雏形潜艇。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布什内尔设计了一艘叫做“乌龟”的铜板壳体单座潜艇,并在艇上装置水雷,企图用它去攻击英国船。南北战争时,潜艇首次被运用于实践。1864年2月17日,南军的“H·L·亨利”号用撑杆水雷击沉了北军军舰“胡萨托尼克”号,但它自己也葬身海底。在那时,潜艇并不构成对水面舰艇的威胁,它对自己的乘员却更加危险。1879年英国牧师迦莱特制造了用蒸汽推进的“里苏甘”号潜艇。后来“里苏甘”号以损失3名乘员的悲剧结束了寿命,但迦莱特并不泄气。1882年,他又开始建造一艘长64英尺,宽9英尺,排水量60吨的“诺登费尔特-I号”潜艇。这艘潜艇首次装上自航式白头鱼雷。从这个时间表看,天津机器局所试制的潜水艇并不落后,它反映出中国近代科技人员密切关注着世界海军技术的发展。可惜这一试验后来中断了,后人甚至不清楚那位姓陈的设计者叫什么名字。

此外,天津机器局在光绪初年建成一艘挖泥船。史书记载:“其状如舟,大亦如之……以铁为之,底有机噐,上为机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载万斤,置之岸上,旋转最灵,较人工费省而工速。”船名叫做“直隶挖河船”。〔77〕1880年,建成一套舟桥,由130余只行军桥船组成,“百丈之河顷刻布成平地”。1881年,又建成130匹马力七丈螺桥船二只,专备海口布雷并作小战船用。〔78〕这年,李鸿章还建造了一艘小汽船,能载40~50人。《北华捷报》报道说:“全部机噐与装备都是在此地完成的。”〔79〕1887年,机器局总工程师司图诺根据李鸿章的指令,为慈禧太后建造了

钢质游艇“捧日”号。此船船舱宽敞，用硬木装潢，由一艘小汽船牵引着在颐和园昆明湖上行驶，以供太后饱览秀丽的湖光山色。

天津机器局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后便鞠为茂草，扫地无存了。

洋务企业不仅受到顽固派士大夫的攻讦，有时也受到洋务派官僚的戕贼。不同的政治派系，不同的利益集团，按照各自的政治目标行事，犹如无数交错的力量，构成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产生出推动历史前进的总的矢量。在洋务集团内部，这类大大小小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也是层出不穷的，这便是活生生的历史。

从广州机器局的发展及其主持人温子绍的经历中，能够清楚地体察到历史前进大潮流中的细小波澜。

温子绍是在籍绅士，广东顺德人，字颀园，靠捐资得花翎候补员外郎，加捐三品衔江苏试用道员的虚衔。他从小留意西学，对外国机器制造之事，悉心考究。到30岁时，因精于机器，善于发明，在社会上已很有名气了。1873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城内聚贤坊设立广州军装机器局。听说温子绍精通机械，便委派他为在局经理。机器局开办后，购置机床器具，试造枪炮弹药，并承担轮船的修葺业务。

1875年，机器局迁往城外增埗。次年，刘坤一开府两广，用8万银元购下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黄埔的各坞厂，^[80]使得广州机器局在船舶修造方面力量大增。刘坤一曾洋洋自得地说：“该澳工费颇巨，兹以贱值得之，将来如有扩充机器局务，自行制造大船大炮之时，此处便为得用。”又说这些船坞“于修理铁甲船甚为合用，似可于广东设立船政分局”。^[81]

由于广东方面造船经费拮据，又缺技术人员，在1879年前，由温子绍领导，曾建造了16艘内河小轮船，以供东、西、北三江分段巡缉，但船的性能较差。后来北洋方面购买的第一批蚊炮船行驶回国，李鸿章鼓动朝廷指令各地仿此购买，刘坤一便密嘱温子绍等携带工匠，考察北洋所购的蚊炮船。温子绍天资聪明，深谙西法，

认为广州有条件仿制木质船体的蚊炮船,并决定自己出资捐造。这条炮艇船身底板全用柚木,船身長 124 尺,200 匹馬力,除 18 吨后膛主炮系由库存拨给外,耗銀 39900 兩。炮艇于 1881 年夏竣工,被命名为“海東雄”号,并与刚从国外进口的鋼质炮艇“海鏡清”号进行了共同试航。兩广总督張樹声认为,“虽外洋所制机器較多,通体純鋼与木壳有异,而温子紹仿造之船,价值悬殊,规模形式駛行迟速亦能不甚相悬,洵足以資备御。”^[82]

温子紹家道并非巨富,因海防孔棘,不惜重資创此美举,刘坤一称赞他“揆诸古人毀家纾难之义,殊觉可风”。在办理机器局其他事务方面,所有制造枪炮、火箭、水雷,无不合用。仿制格林炮,灵巧不让外洋,面价格则減大半,使得广州机器局的产品声名鹊起,各省纷纷前来订购。广东財政拮据,他对局中經費与工料,无不力求节省。每遇放款不敷,便自行在外设法垫借接济,由此名闻遐迩,山东、江苏、云南、贵州乃至越南都竞相罗致。1880 年,吉林创办机器局,上諭指名要温子紹前去制造輪船,后因張樹声以蚊炮船尚未完工而拖延行期,他本人则以母亲年老生病,不能远离为由,才获准另觅他人前往。1881 年底,朝廷以其捐造炮船,賞从一品封典。

1884 年,張之洞由山西巡抚調任兩广总督。他与温子紹发生了矛盾,旋以“江苏候補道温子紹经营机器局多年,料价既多不实,工匠亦不足額”为由奏參,获旨将其革职,彻底查办,勒令賠繳。張之洞,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早年是清流健將,1880 年官居左庶子时,因庚辰午門案中,与右庶子陈宝琛分上二疏,轉圜西太后对阻止太监出官的午門值班官兵所施以的严峻处分,名滿天下。他的胆略和文字,为恭親王和翁同龢所叹服。然而在查办温子紹案情的奏疏里,却支支吾吾,羞羞掩掩,令人頗生疑团。他说温子紹主持广州机器局 12 年,动用白銀 59.4 万余兩,“經查明尚无侵吞浮冒情弊,惟支銷巨款,多历年所,因采办周折,算造未精,以致物料多所耗費,工匠手艺不尽精良”。又说該员“学艺本属疏淺,性情又复庸軟,不能糾核司事工役”。最后責令温子紹賠

罚白银5万余两,充作海防经费。事实上,张之洞并不打算解散机器局,还想借此干一番事业,所以他也不得不承认,“自设局创办以来,员弁工匠能者渐多,频年办理海防,添补军械、修船运炮等事,该局亦当能勉强支应,是则虽无大功,亦未必竟无微效。”^[83]他的目的,只不过是赶走温子绍,另行安排亲信办理局务而已。

温子绍的遭遇,引起广东官员的不平。广东海防善后局各司道呈请为他开复,指出机器局早期制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工业基础,没有熟练工人和工艺生疏造成的,而不能归结于温子绍中饱私囊。近年来广东工厂逐渐增多,追溯其源,实为温子绍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行前他也承认了上述理由,并建议开复温子绍的原官。接着,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出任粤督。他上奏提出,“粤中制购各国枪炮,其炮弹所存无几,若非善为仿造,设遇有警,有枪无弹,何以应敌?臣前派‘广甲’轮船赴北洋合操,闻有局制铜拉火未能合式,开炮即难灵便,可见一物未精,所关匪细,平时不讲,遇敌必挠。温子绍专精于是,为他员所不及。现值需人之际,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员赏还原品顶戴翎枝,留粤经办机器制造等事。”^[84]这篇奏折中,对张之洞是颇有微词的。李瀚章的请求被允准了,温子绍的冤屈至此方得平反。

张之洞是政治家,他在中国近代化事业中做出的贡献不容泯灭。温子绍是钻研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中级官员,在广州机器局的建设发展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在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属于一个营垒。然而他们也有利益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人们甚至搞不清起始原因和是非曲直了。但是,地位卑下的小人物,往往难以保护自己,这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历史需要政治家大刀阔斧地正面突击,也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辛勤钻研和埋头工作。可惜人们对于后者关注太少。温子绍的遭遇虽然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当年云集曾国藩幕府的徐寿、华蘅芳、王德均、赵元益,无不默默而终。李凤苞虽然官至出使大臣,但也被流失所中,这不

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在这一时期,广州机器局还仿照外洋式样,先后建设了“靖安”、“横海”、“扬武”、“翔云”、“肇安”、“南图”等小轮船,用于内河巡防捕盗。这些轮船的造价都未超过1万两白银。

五、海军人才的摇篮

流传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的最重要途径。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从国子监到县学,乃至民间的书院、私塾,都是以登科及第为办学目标。当明清科举考试的形式成为八股制艺后,青年士子的头脑就被彻底禁锢起来,任何生动活泼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术数,因而造成近几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萎缩。鸦片战争前,今文经学家们提倡经世致用。战后,林则徐、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洋务运动中,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开始受到重视,新式军事院校也应运而生。

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它的创办和船政局的建立几为同时,创始人也是左宗棠。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请求设局造船的那个著名奏折中指出:“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需雇倩洋人,则定义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制造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85]在左宗棠与日意格商定的创办船政局保约中,规定了创办学堂,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这一学堂,最初定名为“求是堂艺局”。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子弟。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吸引力不大,因此后来把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等作为保

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保证书。第一次招生考试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当时参加报考的,主要是家境贫寒之士。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获得考试第一名的福建侯官人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身世遭遇就很具有代表性。严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父祖两代皆为中医。他自己从小进私塾,再加上父亲的辅导,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不久,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家道急骤中落。听说船政学堂衣食住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的补贴,便决定前去报名。严宗光的叔叔严厚甫是个举人,母子俩请他作保,举人对此种新学堂绝无好感,当即回绝,后来只能瞒着他私自填写保结,还引来一场争吵。宗光和母亲只得痛哭跪求,才算了事。严宗光在考试时面对试题触景生情,文章自然写得情文并茂,大得沈葆楨的赞赏。

这次招生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约为12~15岁。另外从香港招来张成、吕翰、邓世昌、叶富、林国祥等,皆已学过英文,基础较好。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做教室。在暮鼓晨钟的古刹里,飘出了诵念A、B、C、D的朗朗书声,无可辩驳地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除了白塔寺外,学校还在仙塔街、亚伯尔顺洋房设置临时校舍。未几,船政局在马尾新盖的学堂落成,旋将三处学生一并迁入。^[86]学堂分作两部分,在外国人士的一些早期报告中,将其称作“法语学校”和“英语学校”。直到1873年底,沈葆楨在奏折中首次使用了“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87]这一名称才被中文资料所沿用。

前学堂以法语授课,包括制造专业和设计专业。制造专业是前学堂的主要专业,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船体和蒸汽机的设计制造人员。设计专业是日意格的说法,在中文文献中称作“绘事院”,目标是培养绘图员,同时还承担船政局全部图纸的绘制工

作,因此又是局属技术部门。后学堂以英语授课,包括驾驶专业和管轮(轮机)专业。它为后来的海军事业培养了大批军官。学堂还附设艺圃,日意格称作学徒班,主要是培养技术工人。

左宗棠离闽前,制定了《求是堂艺局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学堂的第一个章程,为后来船政学堂的学制、规程确定了基本内容。其要点为:

(一)学习期限为五年。入局时,取其父兄及本人甘结,不得改习别业。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天。过年时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不得请长假。

(二)饮食医药费,均由局中发给,此外每月给银四两赡养家庭。病重者准回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

(三)每三个月考试一次。考到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三次连考一等者另赏衣料。

(四)由船政大臣遴委明干绅士,常川驻局稽考师生勤惰。

(五)学成之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学成监工、船主者,即令作监工、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薪数发给。有文职、文生者入学,未便概保武职,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88]

从章程中可以看到,船政学堂虽是近代学校,仍留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同时也似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兵营。不久,英语教师嘉乐尔担任后学堂校长,他提出一套学校的规章制度,基本同《求是堂艺局章程》相同,但也有些欧美的新玩艺,如放暑假一个月等,但没有被中国方面采纳。

船政学堂在创办时期,师资主要聘用外籍人士,分为专职教师和兼职的船政局技术人员两类。前学堂由监督秘书博赖主持,另有教员迈达、录赛二人,其余则由工程师舒赛、总木匠师乐平、木工工头马益识、装配工头德素兼任。绘事院由设计科长卢维主持,锅炉制造工杰达翁协助。后学堂由曾在英国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

任过教的嘉乐尔主持,有教师仕记、德勒塞和航海长阿务德、水手长儒昂索在驾驶班执教,教师阿兰在轮机班执教。他们的聘期至1873年底结束。

为了解决学生与洋教习之间的语言隔阂,还在福建到处搜罗懂得外文的人才。先是聘到黄绍本、林宪曾二人为助教,讲授英文和数学,后来又在广东、新加坡觅得曾锦文、曾恒忠来校担任教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中国教员。学校开办几年后,便委派老班学生给新班学生帮教。

船政学堂正式办学后,面向全国招生,无论满汉民族皆可报考。但除了闽、粤两省外,仅有其他省籍学生一二人而已。广东及外省人,主要报名学习驾驶。学制造的,全是福建人。即使在驾驶班,福建人也占了多数。这自然是由于学堂设在福建,且福建又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到后来,福建人不仅遍布海军上下,其他海军学堂也由福建人或与船政局有关系的人主持。如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南京水师学堂总办沈瑜庆、蒋超英,广东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林贺峒、魏瀚等,在旧中国海军中,福建人独多。福建人互相推荐、援引,对于发展海军事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形成小圈子,排斥非闽系人士,就带有强烈的封建地域集团的色彩,以致被人称作“闽党”。

1874年秋,英国军舰“田凫”号访问了马尾。海军军官寿尔记载了当时他所看到的船政学堂的情景——虽然这是船政学堂重新聘请外国教员开展教学工作后的情景,但大致上能够反映早期船政学堂的状况:

我访问学校那天,学生大约五十人,第一班在作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训练出来的教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几何学。两班都用英语进行教学。命题是先写黑板上,然后连续指定学生去演算推证各阶段;例题的工作完成后,便抄在一本美好的本子上,以备将来参考。我查阅其中几本,它们的整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的口授的题目是用大写的。当我们想到用毛笔缮写的中国文字和用钢笔

横书的拼音语言间的区别时,便更知道这是一件非凡的事。学生每天上学六个小时,但课外许多作业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做的。星期六休假。学生们一部分来自广州和香港,一部分来自福州。这些从南方来的,常是最伶俐的青年,但是他们劳作上不利之处是不懂官话;不懂官话在政府工作便没有升迁的希望。因此他们每天花一些时间同一位合格的本地老师学官话……海军学校招收学生的方法是在福州城所有明显的地点遍贴告示。规定年龄为十六岁以下,但这项并未很严格执行,因为有一些由香港方面的广告招收而来的学生是在二十岁以上。报名学生,给以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直到最近,学校未曾录取过对自己国家的经典与文献没有相当知识的学生。……嘉乐尔先生的职务并不伸展到学生们的私人住宿区去,那是一位官吏管理的。广州和福州的学生分开住,用不同的厨师。嘉乐尔先生称赞这些学生,说他们勤勉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因为他们不管他在场不在场,都坚毅地工作,未曾给他麻烦。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中帼气。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龕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89]

西方人看东方,总有他们的癖好和偏见。同样,东方人要接受西方的教育方式,也需要相当长的适应时间。学生们无疑是聪明、勤奋、十分刻苦的。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他们还留有旧式士子的传统,不太习惯无拘无束地从事文体活动,但他们对祖国所抱有的责任心,却是不容怀疑的。

船政学堂的学生并非都是温顺的绵羊,他们有时也反抗。1872年,后学堂学生因洋教习逊顺非礼虐待,为之哄堂,提调夏献纶发脾气,罚刘步蟾、邱宝仁做小工,到船局挑土。同学们更加愤

怒,一直闹到丁忧在家的沈葆楨处,把逊顺撤换才算了事。据说沈葆楨当时打算撤去后学堂,把学生派往国外留学。经洋监督斯恭塞格引咎承担了责任,方使事件平缓下来。^[90]

学堂的课程十分广泛。制造专业的学生要掌握船舶和轮机的制造,必须学习法文、数学、物理和机械学,同时还进行船体制造和机械制造的实践教育,并到各工作部门实习,熟悉工作,并学会如何指挥工人,以保证成为一个合格的监工。设计专业学生的课程包括法文、数学,并着重讲授 150 匹马力蒸汽机。艺圃的课程也基本类似。驾驶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英语、数学外,还要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管轮专业的学生则要着重学习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以及各种仪表的用途、蒸汽机的安装。^[91]教材采用外文原版,在学校创办初期,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变更用书,因此没有固定的书目。

除了近代科学知识外,还要学习传统文化。沈葆楨谈到:

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 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92]

这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早期表述,也是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保守顽固派有着相通之处。在 19 世纪 70 年代前后,洋务派是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沈葆楨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看法不过如此,人们又怎能祈求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取得根本胜利呢?

课堂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还需经过练习舰的实习。如同沈葆楨所说:“出自学堂者,则未敢

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覩其胆智。否则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93]1868年,沈葆楨派员到香港、南洋一带购置夹板轮船,没有找到合适的。次年初夏,船政局所制第三号轮船“福星”轮下水,沈葆楨打算将其改成练习舰,可是“福星”轮太小,难以容纳多人。直到年底,才在福州购得德国三桅夹板船“马得罗”号,易名“建威”号,按照军舰式样改造。^[94]“建威”号排水量475吨,虽然已使用多年,但船的木料很好,做工也很讲究。二层舱内,能住百余人,于是以14 191元成交。这是船政学堂的第一艘练习舰。

1871年,船政后学堂的外籍教师嘉乐尔收到一封装饰精美的来信:

James Carroll 夫子教席:

惟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大人左奏请设船政局,以为强国之一法。皇上命令前江西巡抚沈在福州府的 Chung - Tzé 兴建所需的宿舍,派日意格先生等尽力协助此事业。

沈大人建立一所海军学堂,招收一批学生,聘请英国绅士 James Carroll 先生为教师,授航海原理,迄今五载。生等已修完了功课,即将航海,一试本领。为着这个航行,我们已做了广泛的准备。在离去之先,我们——你的忠实的学生——对于你的照顾及不倦的训诲,表示感激之忧……

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为,了解暴风的规律,勘察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

我们从老师所学习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你忠实的学生(二十三人签字)^[95]

不久,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

谦、林承漠、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溥泉、叶伯璠、黄建勋、许寿山、陈毓淞、柴卓群、陈锦荣等 18 人与前学堂的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由洋教习德勒塞负责，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扣除各码头停泊时间，实际在洋面 75 天。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沙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习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誊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

练习舰除了为后学堂学员提供实习机会外，还从香港招收学生直接进行培训。舰上的实习时间，至少约需二年。根据原定合同，驾驶专业学生要达到近海航行的培养目标，由于学生们勤奋好学，当他们毕业时，不少人已能胜任远洋航行。到 1873 年秋，已有 4 名学生成为合格的舰长和大副。另有 4 名正在巡航，返航时也能获得同样的职务。6 名学生需要实习至翌年春天。此外还有 12 名学生只完成了部分科目的训练。^[96]从现存的零星史料中，可以找到驾驶专业学生的一些情况。如 1874 年 3 月 23 日，沈葆楨奏请委派张成管驾“靖远”轮，叶富管驾“海东云”轮。旋调张成管驾“海东云”，吕翰管驾“长胜”轮船。同年，任命林国祥管驾“琛航”号，邓世昌担任大副。派林泰曾赴台湾后山测量海道，旋任“安澜”舰枪械教习，年底调充“建威”练习舰大副。派黄建勋任“扬武”舰正教习。^[97]

船政学堂培养的军官开始指挥军舰，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辟了院校教育的先河。虽然在最初，依然有不少行伍出身的舰长和学堂生相间杂，但最终都被学堂生所取代。这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船政学堂源源培养的青年军官，解决了中国军舰乏人指挥的严峻问题，为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注 释:

[1] “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唯嗜啤来粤不遵法度现予封舱示惩片”(道光十四年八月),《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146-149页。按: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3年是被取消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独占权,至1858年正式解散,卢坤在奏折中报告说“查得该公司已散”,并不准确。

[2] “两广总督卢坤奏为叩谢赏还兼衔花翎仍带革职留任之恩折”(道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164-165页。

[3]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110-111页,106-107页。

[4]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39-41页。

[5] 清朝水师,有外海、内河之分。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先后建立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外海水师及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南、浙江内河水师。根据乾隆年间统计,清初各地水师战船数目如下表(《清朝通典》,第2603页):

省 份	盛 京	直 隶	山 东	江 南	浙 江	福 建	广 东	江 西	湖 广
外海(只)	6	8	24	83	197	342	166		
内河(只)				250	221		392	46	127
总数(只)	6	8	24	333	418	342	558	46	127

[6] 黄爵滋:“申明员弁吸食鸦片分别定拟疏”(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六日),《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110页。史澄:《同治番禺县志》,载《鸦片战争》丛刊,第四册,第343页。

[7] 林则徐:“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林则徐集·奏疏》(中)第861页。

[8] 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道光二十年八月),《林则徐集·奏疏》(中),第885页。

[9] 林则徐:“致苏廷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致姚椿、王柏心”(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林则徐书简》,第191、197页。

[10] 曾国藩:“水师得胜歌”,《湘军记》,第352-353页。

[11]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16-17页。

[12] “怡良等奏英怂恿中国买其炮船并允助战已予批驳”(咸丰六年三月十九日),《筹办咸丰夷务》,第二册,第456页。

[13] “总署收署总税务司赫德禀附申呈及轮船枪炮价值等单”(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海防档》甲(一),第12页。

[14]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

[15] 参见姜鸣:《被调整的目光》,第21-23页。

[16]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Fitting Out, Dispatching to China, and Ultimate Withdrawal of the Anglo-Chinese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Sherard Osborn; and the Dismissal of Mr. Lay from the Chief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Inclosure 2 in No. 1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 27. pp. 235. 译文参见《清末海军史料》,第162-163页。

[17] Captain Osborn to Earl Russell, Inclosure 2 in No. 1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v. 27. pp. 235.

[18][21][26]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第324-325、319、326-330页。

[19]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海防档》甲(一),第117页。

[20] 曾国藩:“密陈购买外国船炮预筹管带员弁折”(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2925-2927页。

[22][27] 《赫德日记,1863-1866年》,第47-48页。

[23] “总署奏附议轮船章程”(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海防档》甲(一),第162-165页。

[24] “总署收两江总督曾国藩函”(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海防档》甲(一),第244-246页。

[25] 曾国藩:“复李鸿章”,《曾国藩全集·书信》(六),第3886-3887页。

[28] 赫德:“致金登干”(1879年12月21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276页。李泰国在1876年破产,“既无面包,又无朋友”,见“金致赫第94号”(1876年6月5日),《中国海关密档》,第八卷,第78页。赫德曾多次给予帮助。

[29] 阿思本回国后,于1864年受命指挥“皇家至尊”号军舰,接着到印度管理“大印半岛”铁路,后来作为董事管理电报建设与维修公司,从地中海和红海铺设海底电缆到印度和香港。1871年受命指挥“罕侃尔斯”铁甲舰。两年后晋升为海军少将。他于1875年5月8日死于中风,见金登干:“致赫德”(1875年5月14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一卷,第250页。5月10日《泰晤士报》上的讣告称其“具有最高的专业才能,以沉着冷静、敏捷机智而出名,富有海军大胆冒险的精神。他胆大心细,他军纪严明,是最孚众望的上校之一。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管理者”。见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第342页。

[30] “总署收英署使威妥玛照会附轮船总账”(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海防档》甲(一),第611页。

[31] 吴乾兑:“阿思本舰队与英国的侵华政策”,《历史教学》,1984年,第8期。

[32] 曾国藩:“与李瀚章”(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315页。

[33][34] “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筹办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一~十。

[35]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8页,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36] 李惠贤:“黄鹄号,中国自造第一艘轮船”,《船史研究》,第2期。

[37]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5页。

[38]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李集·奏稿》,卷九,页三十二。

[39] 据张伯初:“上海兵工厂之始末”云:“制造局创设之初,由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奏准办理。故以江督苏抚为督办长官。有时江督迁调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或湖广总督者,仍兼本局督办,有时非由江督迁调之直督亦遥兼本局督办。”见《人文月刊》,第5卷,第5期,1934年6月15日。这是指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等人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情况。

[40]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同治十年刊),卷二,页二十九。

[41] 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第68页。

[42] “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折”,《洋务运动》丛刊,第四册,第17页;池仲祐:《海军实纪·造舰篇》(上),《清末海军史料》,第175页。

[43] “同治七年九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丛刊,第四册,第19页。

[44] 马新贻:“续造第二号轮船工竣循案具报折”(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马端敏公奏议》,卷七,页五十五。

[45]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七日总理衙门收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羲文”,《海防档》(一),第137页。

[46]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沈葆楨奏”,《洋务运动》丛刊,第四册,第37~38页;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九,页三十一。

[47] “光绪元年十月十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丛刊,第四册,第34页;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十四,页十七。

[48]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九，页三十～三十一。

[49] 关于这艘小轮船，左宗棠记载说：“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初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匠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见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集·奏稿》，卷十八，页五～六。日意格记载说：左宗棠“给我看一艘中国人自己建造的蒸汽船。该船依照宁波船的样式。它可容两人，一人在前面，一人在后面。大体上，机器各部分齐全，它足够说明一条蒸汽船如何工作，但仅此而已。左宗棠要另日在西湖试验它。他给我看建造蒸汽船的两件工具。他告诉我，一个六十多岁的中国人用它建造轮船”。见 *Giquel Journal*, October 16, 1864. 转引自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第15页。又据陈其元记载：“……仿造小轮船二艘，试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费甚巨，无款可筹，且贼已将次剿灭，乃置之不讲。”见陈其元：《庸闲斋随笔》，卷十一，页二。

[50][52]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集·奏稿》，卷十八，页一～九。

[51] 左宗棠：“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集·奏稿》卷十八，页十二。

[53]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咨呈附清折”，《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4～46页。

[54]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字寄”，《左集·奏稿》，卷二十，页七十六。

[55] 参见黄维楨：“福州船政局厂告成记”，《福建马尾港图志》，第40～41页；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有关章节。

[56] 沈葆楨：“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折”（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三十五～三十六。

[57]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文煜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24～125页。

[58]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一，页十。

[59] 参见庞百麟：《沈葆楨评传》，第256页及第291页注[23]。

[60] “同治六年二月己亥大学士倭仁奏”，《筹办同治夷务》，卷四十七，页二十四。

[61]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理衙门收曾国藩函”，《海防档》乙（二），第326页；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左集·奏稿》，卷四十一，页三十四。

[62] “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楨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14页。

[63]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集·奏稿》，卷十九，页四十五。

[64] 1872年2月29日，李鸿章在给王凯泰的信中说：“雪帆阁部有停造轮船之奏，未知执事如何筹复？……闽轮创之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侮，徒增糜费。今已成事四与欲善其后，不亦难乎？”见“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李集·朋稿》，卷十二，页二。当他自己出奏支持继续造船之后，又这样向王凯泰解释：“轮船有不可中止之势，季（左宗棠）、丹（沈葆楨）两公大声疾呼，鄙人岂复能异议？”见“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一日），《李集·朋稿》，卷十二，页十六，表明他只是出于礼节，漫应左、沈而已。

[65] 《北华捷报》，1874年3月5日，载《孙辑》，第404页。

[66] 《申报》，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67] 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第116~117页。

[68] 沈葆楨：“第十七号艺新轮船下水片”（光绪二年四月初十日），《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三，页三十二。

[69] “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三日督办船政黎兆棠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260页。

[70] 左宗棠：“闽省船政局造船玩延饰请旨申饬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左集·奏稿》，卷六十一，页七十七；何如璋：“遵旨查明船政前此承造开济快船并无玩延饰请据实复陈折”（光绪十年五月二十四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二十五，页一~九。

[71] 参见船政大臣历年经费报销折，《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51~162、222~233、256~263、274~282、401~404页。

[72] “同治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总署奏”，《海防档》乙（一），第312页。

[73]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丛刊，第四册，第274、275页。

[74] 密妥士1867年4月18日致英同驻天津总领事摩尔根的备忘录中记载：“现在每天雇着1000至1200中国小工和泥瓦匠、木匠在赶建厂房。大半的小工正在垫高四尺的地基，上面拟铺设轨道。把厂地上的各个建筑和大门外的船坞联接起来，也有工人在挖大门上的船坞。”见“英国驻华各口岸领事商务报告”，《孙辑》，第349页。

[75][76] 《益闻录》，第五十四、七十三号，光绪六年五月十三日、九月二十七日。

[77] 张焘:《津门杂记》,第69页。

[78] 李鸿章:“机器局请奖折”(光绪七年八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四十二,页三。

[79] 《北华捷报》,1881年8月26日,《孙辑》,第359页。又,李鸿章曾说,光绪六七年间,机器局“又成‘仙航’小机船一号”。见“机器局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李集·奏稿》,卷四十六,页十六,估计即指此船。

[80] 《海关贸易关册》,1876年份,《孙辑》,第458页。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于1863年。这年它购得设在黄埔的“柯拜船坞”,1870年又吞并了另一家船厂“于仁船坞公司”。此外,它在香港还有多座船坞。张树声曾说:“所购西人船坞,环山带水,为省河中形胜之区。其于仁船澳局势堂皇,地尤旷阔。”见“筹议设立西学馆事宜折”(光绪六年),《张靖达公奏议》,卷五,页十二。说明原于仁船坞部分也一并为两广总督购得。在1867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黄埔拥有五座船坞,于仁船坞也有四座船坞。但刘坤一和他的后任似乎只修复了其中的二座,即长574英尺的大石坞和长383英尺的水雷坞。见《孙辑》,第5~6页、458页。

[81] 刘坤一:“复刘仲良”(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刘集》,第四册,第1811页。

[82] 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514~515页。

[83]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丛刊,第四册,第381~382页。

[84] 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七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奏,《洋务运动》丛刊,第四册,第389页。

[85]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集·奏稿》,卷十八,页一~九。

[86] 船政学堂何时迁入马尾,各种说法不一。闽浙总督吴棠同治六年奏:“臣吴棠先于五月初旬乘舟前往,周历勘视工程粗有端绪,查知学堂教习洋师均能认真讲授。”见《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52页。沈葆楨说:“六月十九日,就马尾甄别法艺童,随及英学艺童。”见“察看福州船坞大概情形折”(同治六年八月初六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说明在此以前,学堂已迁新址。但梁同悻编的《马尾海军学校稿》曰:“同治六年冬,马尾两学堂址落成后,遂将亚伯尔顺洋房艺童归于前学堂,……其设于白塔寺、仙塔街两处艺童并于后学堂。”转引自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688页,录之待考。

[87] 沈葆楨:“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十四。

[88] 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二，页九～十。

[89][95] 寿尔：“田冕号航行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385～388页。

[90] 黄维焯：“福州船政局厂告成记”，《福建马尾港图志》第43页。

[91][96] K.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译文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63～464、466页。

[92] 沈葆楨：“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折”（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七。

[93] 沈葆楨：“三号轮船下水并续造轮船情形折”（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四十六。

[94] “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煜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97页。文煜在奏折中说：“至学堂艺童练习驾驶，沈葆楨前因购致舢板船未得，议将第三号‘福星’作为练船。兹已购得日耳曼国舢板船一号，改名‘建威’，按照兵船之式，量为修改。一俟修竣，即可将英国学堂上等艺童概令上船练习。”由此可知，“建威”实为船政学堂第一艘练习舰。又，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217页称：“船政所具有的第一条练船是‘辰下第三号’，……该船是一条八十四马力的木质战船，改作练船后易名为‘福星’。”这一记叙有误。查沈葆楨“三号轮船下水并续造情形折”谓：“去岁派员到香港南洋各处购致舢板、轮船以资艺童练习，无如愿售者皆朽腐之余，不适于用。购旧修整，价又不贲，遂作罢议，而登舟练之事终不可以久延。辰下第三号八十四马力轮船告成，其式本属战舰，利于巡洋，拟以学堂上等艺童移处其中，饬洋员教其驾驶……第四号系一百五十四马力，龙骨业已安置，船肋斗合亦已过半……兹谨将三号拟名‘福星’、四号拟名‘伏波’，以资号召。”见《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七。“辰下第三号”应不是船名。“辰下”，当作“时下”、“目前”解，“第三号”则为船政自制轮船的排序。

[97] 《海防档》乙（二），第511～512页；《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十二；《申报》，同治十三年九月初十日；《清末海军史料》，第357、372页。

第二章 南北并举(1875 ~ 1884)

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官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水机为奇技淫巧,方且斋戒沐浴,盘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沃之。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终于火、人命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御今日之外侮,而仍欲以昔日之兵器者,何以类此!

丁日昌

一、日本侵台与海防筹议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4艘军舰,驶入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幕府派官阶相等的代表,接受美国总统的书信。幕府先要佩里把军舰开往长崎才开始谈判,后来又怕引起战争,才犹豫地收下了书信。佩里宣布,他明年将来听取回音。日本受到了西方世界要求它开放门户的挑战。

转眼半年过去,佩里海军准将果然又率军舰重返浦贺,深入神奈川河口停泊。幕府束手无策,在美国大炮的威慑下让步,签订《日美和好条约》,从此打破了日本延续二百多年的锁国状态。

1868年,明治天皇在倒幕派武士支持下,宣布王政复古,开始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明治维新”的运动,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

道路。

维新之初,新政府从幕府手中接收了一些军舰,各藩也陆续上缴军舰,其中以1869年从美国购入的铁甲舰“东”舰(排水量1358吨)、1870年熊本藩献纳的“龙骧”舰(2530吨)、佐贺藩上缴的“日进”舰(1468吨)、鹿儿岛藩上缴的“春日”舰(1269吨)规模较大。1869年7月,在东京筑地设立海军训练所,命各藩选派“海军志愿者”前来学习。次年聘请英国海军军官进行炮术训练。还扩建了从幕府手中接收的横须贺造船厂,附设技术学校,教授造船技术。日本海军开始起步。可以看出,这个时间表同中国海军的创建是十分接近的。

1870年,兵部大辅前原一诚提出了扩建强大海军的计划,建议用20年时间,建造200艘大小军舰,其中铁甲舰50艘,以7年为一期,共分三期实施。所需经费折合成米,平均每年150万石,相当全国岁入的八分之一。前原认为,这种经费比例较之英国以岁入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用于海军,并不更多。前原的动机,是建立在攘夷排外上的。当时明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陆军,控制各藩,进而撤消各藩,统一全国,因此大丞船越卫明确表示反对。经过多次讨论,前原计划被否决了。但同年又在兵部省设置了陆军司和海军司,为今后陆海军分别设部打下了基础。

明治政府一面谋求修改维新前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面又在积极准备对朝鲜和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征韩论”一时甚嚣尘上。1873年,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从欧洲考察回国,认为侵略朝鲜条件尚不成熟,主张“以治内为急务”。这样就与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发生激烈冲突。大久保、木户、西乡在当时被称为“维新三杰”,他们的冲突,导致征韩派退出政府,引起了政治危机。废藩置县政策实施后,也引起士族对政府的不满,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转移国内视线,明治政府决定利用琉球船民在台湾被杀害事件,发动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

琉球国位于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环节。琉球国从1372年(明洪武五年)起

向中国朝贡,五百余年中从未间断。1383年至1866年,有24个国王受中国皇帝册封。^[1]1609年日本萨摩藩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诸岛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南部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每年也向萨摩藩主纳贡。萨摩藩主企图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好处,允许琉球继续朝贡中国。在中国使者来琉球主持册封典礼的时候,日本人不许琉球显露出任何日本势力存在的迹象。因此,清政府始终把琉球看做自己的藩属,不清楚它的双重地位。1871年底,有两艘琉球贡船遇风飘至台湾,其中“八重山”号船获救,45名船员被地方当局和当地居民护送到台湾府城。另一艘“太平山”号船在台湾南部北瑶湾触礁沉没,3人淹死,66人凫水上岸,中有54人被土著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其余12人被营救至府城,与那里的“八重山”号船员一起,乘轮由福州转送回国。

1872年,日本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迫建立日、琉宗藩关系,为其吞并琉球做准备,也为侵略台湾寻找根据。1873年3月,日本备中州人佐藤利八等4人乘小船贩盐,遇风船沉,佐藤等凫水在台湾凤山后山上岸,被当地居民营救,并由地方官安排护送回国,当时即收到日本外交官的谢函。不料未久,日本人又指责佐藤等人在台湾遭劫。

同年6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换约和庆贺同治帝亲政为名,来到北京。21日,副岛派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探询清廷对台湾山胞戕害琉球船民的态度。总署大臣毛昶熙回答,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番,已设州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日本即抓住回答中的只言片语,作为侵台的借口。

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成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由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事务都督”,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准备出动军舰“日进”号、“孟长”号、“有功”号和运输船“三邦”号,兵力3600人。日本此举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和反对。在外国压力下,日本政府下令军舰延期出发,但西乡从道抗命,他和大隈重信连夜启航,假道厦门,于5月7

日在台湾南部琅琦登陆。当地民众对入侵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6月3日,日军攻占牡丹社,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准备长期占领。

清政府对日本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开始全无所知,直到5月14日,才任命沈葆楨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6月14日,沈葆楨同福建布政司潘霨、台湾道夏献纶、船政洋监督日意格、帮办斯恭塞格从马尾分乘“安澜”、“伏波”、“飞云”号军舰前往台湾,17日抵达安平。沈葆楨布置“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常驻澎湖,“福星”驻台北,“万年清”驻厦门,“济安”驻福州,“永保”、“琛航”、“大雅”3货船运送军队,装载军火,“测海”在闽沪间递送消息。^[2]李鸿章紧急调集驻扎徐州的淮军武毅铭字军唐定奎部13营6500人入台,运去洋炮20门,火药4万磅。中国自制军舰第一次在反侵略作战中发挥了作用。

6月19日,潘霨、夏献纶、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舰前往琅琦,与西乡从道交涉退兵。会谈三次,未得结果。沈葆楨提出迅速装备铁甲舰的构想。但在私下,他其实并非真的准备对日开战。在给前陕西布政使林寿图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认:“弟亦不甚欲战,所以必调洋枪队购铁甲船者,冀彼知难而退耳。然于弟则干系未免过重。何者?铁甲船在外国,非能目睹其优劣,万一购来,群以为劣;万一购定而抚局已成,群以此为浪费;万一购成仍无以胜敌;万一胜之于台,而他处被扰,援之无及,此皆弟万不能辞之,他人不能分谤也。”沈葆楨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也是林则徐的女婿,他不会忘记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所经受的曲折遭遇。这种细微的思绪,在官场中是能够被同僚所体会的。李鸿章则说得更明白:沈葆楨商调部队,原为设防备御,非必与之用武。他多次写信劝沈,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定奎,到台后“进队不可孟浪”。^[3]

在台湾面临日本侵略的当口,北京朝廷内部却掀起了另一场

波瀾。一年前,17岁的同治帝载淳亲政,垂帘12年的两宫太后撤帘归政。慈禧谋划修复圆明园作为自己的逸乐之所。1874年8月,皇帝发布上谕,宣布修园开工。由于当时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事平息未久,西北回民起义和新疆阿古柏叛乱尚未平复,日本在台湾又挑起事端,朝廷收入十分拮据而开销浩大,复修圆明园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遭到以恭亲王、醇亲王、醇亲王、御前大臣伯彦讷谟沽、恭亲王妹夫景寿、贝勒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重臣的联名反对。9月9日,刚愎的同治帝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旋因福建方面奏报台湾军务,乃复恭王军机大臣职务。10日,皇帝将给予恭王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但又欲以“朋比为奸,图谋不轨”的罪名革十重臣的职务,差点儿引发清代政坛前所未有的大风潮。同日,日本全权办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到京,与总理衙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11日,两宫太后出面,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已撤销”,赏还奕訢爵秩。在内部风潮平息之后,中日两国开始会谈。

中日双方在50天里会谈八次,辩论激烈。从实力对比来看,当时日本无论在军舰、兵力、后勤方面均不是中国的手,但在保卫台湾的军事调动中,也明显暴露了中国海防的薄弱环节,加之西北尚在阿古柏控制下,中法关系亦因越南问题而有紧张的趋势,经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清政府决定妥协。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专条中说,日本此次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此处所指之“民”,在日方,有含混所谓佐藤利八等人“被劫”和琉球船民被杀两个事件之意图;在中方,则从未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甚至在《专条》中只字未提“琉球”。在另订的《会议凭单》中,又规定“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给予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12月20日全行退出台湾后,其在台修路、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40万两。^[4]日本在这次侵台战争中,出动军舰5艘,运输船13艘,兵员3658人,其中死亡593人(内含战死12人,病亡581人),负伤17人。支出军费361.6万

元,另加船舶购买费共计 771 万元,中国付银 50 万两,合日币 78 万元,约占其支出的百分之十。李鸿章虽私下评论说:“甘允日本‘保民义举’,不指以为不是,犹要出五十万,犹以为了结便易,庸懦之甚,足见中国无人,能毋浩叹?”^[5]但在内心,他也不主张与日本开仗。日本出兵,理屈师老,中国却无与之决战的信心,确实令人扼腕。

1874 年台湾之役,对于中日双方海军发展都有深远影响。日本这次行动,带有强烈的军事冒险性,但从中试探得清政府颞预可欺,并看到建设海军的重要性,1875 年第三次提出海军扩张计划获得通过。根据这个计划,从英国进口了“扶桑”(水线带装甲舰,排水量 3777 吨)、“金刚”、“比睿”(铁骨木壳,排水量均为 2284 吨)3 艘军舰,又在横须贺船厂建造了木壳军舰“天城”号和“磐城”号(911 吨、650 吨)。^[6]3 艘进口军舰在性能上超过了中国已有的军舰。

台湾之役给中国朝野的震动更大,不少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日本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由此激发起重视海防、发展海军的热潮。以此为转折,清政府的注重点,也从建造轮船转移到海军建设上来。

《北京专条》签订后的第六天,恭亲王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了一份重要的奏疏,指出台湾事件明知日本理曲,苦于我之备虚。溯自庚申(1860 年)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未亟亟图振作,然而迄今并无自强之实。本衙门提出的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建议,有的被阻格,未能实行;有的实行了没法坚持。同心少,异议多,局中委屈,局外未能深知,以致敌情猝至,仓惶无备。现在日本寻衅,以一小国之不驯,防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观变而动,就更没法弭救了。^[7]

在这个奏折里,恭亲王等提出练兵、筒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要应办事宜,请求飭下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于一月内奏复,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

谋议。经皇帝批准,这个文件由军机大臣密寄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李宗羲、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楨、盛京将军都兴阿、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瀚章、两广总督英翰、暂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张兆栋、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江苏巡抚吴元炳、安徽巡抚裕祿、浙江巡抚杨昌濬、江西巡抚刘坤一、福建巡抚王凯泰、湖南巡抚王文韶,由此引发了晚清史上关于海防建设的著名大讨论。

当怀揣军机大臣字寄上谕的信使正在初冬的寒风中策马疾驰时,朝廷收到了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在籍守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早在1867年,丁日昌担任江苏布政使时,便考虑改革水师旧制。他分析说,鸦片战争证明中国水师不能御敌,沿海炮台也呆无所用。他建议制造中等炮艇30艘,分别由北洋提督、中洋提督、南洋提督统帅。北洋提督驻大沽,下属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中洋提督驻吴淞口,下属江苏、浙江各海口;南洋提督驻厦门,下属福建、广东各海口。无事出洋梭巡,习劳苦、娴港汊、捕海盗;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8]那是最早提出的三洋水师构想。这次丁日昌所建言的,是他1868年在江苏巡抚任上,因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如何创建江苏内外洋艇船部队出现意见分歧,而撰写的海军发展构想。其要点包括六条建议: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及招募驾驶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精择仁廉干练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其中关于三洋水师,改为北洋以山东益直隶建闽天津,东洋以浙江益江苏建闽吴淞,南洋以广东益福建建闽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6艘,炮艇10艘。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关于机器局,主张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分为三厂:一厂造轮船,一厂造枪炮火箭,一厂造耕织机器。关于专用大轮船,认为海上交锋,纵有百号艇船,不敌一号大兵轮船。沿海旧式艇船皆可废弃不用,以省经费供给新式军舰。^[9]丁日昌这些建议,对于未来海军的蓝图设想得十分具体。李鸿章回忆,当初曾国藩对用轮船完全替

代旧式艇船并不谓然,后来虽然后悔,但未及更改,无用的师船依然逐年生产,殊为可笑。他告诉总理衙门,丁的建议因是旧作,未提铁甲船水炮台,但以丁之究心洋务,不得诿为不知;而丁所提三洋水师建议,语多可采。^[10]

总理衙门提出,把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转交沿江沿海各大臣及在廷王大臣,一并归入海防建设讨论。到了12月6日,大学士文祥上奏,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海防的问题。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1845年取中进士,1859年入值军机处。从1862年起到1876年去世,他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排名第二,是恭亲王的密友,中央洋务集团的重要首脑。文祥提出:

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楨及沿海疆臣等金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敌。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11]

文祥透过日本侵台事件已经看到,日本将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这个论断是很有远见的。后来其他洋务政治家也相继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牖,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云:‘未雨绸缪’,何况既阴既雨乎?”“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2]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的战略使命和主要假设敌。但文祥对于明治维新的深远意义没有认识清楚,以为大失民心,将酿成事变。在这种历史转变关头,中国政

治家的错误判断,正是中日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文祥毕竟是同光年间中国最有远见的智者。1860年他随恭亲王与英法联军议和,亲身感受家国沦丧、火烧圆明园的切肤之痛,恐怕要超过看准洋枪洋炮厉害,索性借洋兵来打太平军的李鸿章。李鸿章在给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家信中袒露:“文相为倭事气愤不过,发此正论,但恐有唱无和,言易行难。……此间正拟构思,尚不知何处说起。尊处虽居上游,遇此大议论,不免随众涂抹。幕僚中有可商榷属稿者否?弟自凌筱南南旋后,洋务笺奏皆自起稿,苦涩殊甚。”^[13]信中所提到的凌筱南即凌焕,是李鸿章乡试同年,1862年即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曾称他久历艰险,赞画戎机,于筹议通商事务尤思精虑密,力持大体,“于洋务公牍实能曲折赴题”,^[14]但毕竟还是旧式文人,对于19世纪的世界变局缺乏真正的了解。李鸿章处尚且如此,其他督抚在讨论中就更难以置喙,反映出整个中国官场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转型初期,从观念到人才都缺乏准备。

李鸿章还告诉其兄:“海防自强复疏,文相又专函催嘱畅所欲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连日百忙中采择各营局洞悉军情洋法者议论,又历年来所阅历蕴蓄,逐条详答,推阐出许多新意,或日做一条,或数日一条,兹拟就六条草稿,尚须改定,先抄寄秘览。将来王大臣会议,即不能尽行,存吾此言,以俟后世。不一一做到,洋务断不能振作,自强断无实际也。兄未经办洋务,有许多话可说不到,复疏或不必要分条详对(于正折内条对似可藏拙),或分条撮要言之,幸勿过于雷同耳。”^[15]如此严肃的海防讨论背后,忽然读到李氏兄弟这番坦率体己的私房话,我们不难体会到,古往今来,庙堂上许多重大的历史决策,在幕后就是这样讨论的。

经过各自不同的准备,督抚们对于海防建设,开始发表意见了。李鸿章、文彬、杨昌濬、王凯泰、刘坤一、沈葆楨主张三洋水师之议,惟地域所分略有不同;^[16]李瀚章、李鹤年主张于南北洋分

设外海水师；^[17]王文韶称简任重臣督办海防，驻节天津，慎选熟悉海洋之提镇作分统，分布沿海；^[18]左宗棠则明确反对，认为海防一水可通，若划三洋，畛域攸分，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同，督抚亦成虚设。^[19]关于铁甲舰，除了丁宝楨明确宣布山东暂时不购，李宗羲表示要慎重，需酌定停泊处所，试验是否适用外，^[20]各地疆臣都支持购买。此外，对于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提出的其他问题，督抚们也各抒己见，虽互有出入，但至少在表面上大同小异，都表示出对洋务活动中各项求强事业的支持。

李鸿章是绝顶聪明的人物，他对海防大筹议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讨论初起时，他就透露出对时局的忧虑：“近日热闹，万寿排日筵宴，恬嬉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闻恭邸模棱缄默，畏祸实甚宝（璠）、沈（桂芬），自邸以下，更无建白。升除多出特简，如新补豫臬（河南按察使）兴奎，由宦者荐引；周寿昌名字吉祥，擢署户左（户部左侍郎）；张家骥值南斋，不知所由推之。西林（英翰）督粤、寿山（裕禄）抚皖，似皆意外。仲仙（吴棠，时任四川总督）退志已决，雨亭（李宗羲，时任两江总督）必不耐久，替人亦不知谁何？不得入则江海固不必防，防亦虚文，何用？”^[21]此处万寿，是指慈禧太后虚岁40的生日。恭邸模棱、缄默、畏祸，是指恭王在刚刚结束的关于是否重修圆明园的争议中，率全班军机抗旨，迫使同治帝收回成命之后，不欲在反击日本侵台事件上再持激烈态度，破坏普天同庆太后生日的热烈气氛。我们以往注意到恭亲王谏阻重修圆明园时的执着坚毅，却忽略了他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踌躇。李鸿章表面上也力主对日议和，私下则认为如此草草求和，是不知羞耻，并对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更展示了他对官场的透彻观察。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还说：“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亲近涕泣谏阻，皆不得允，国事可知！然外面撑持一日是一日，鸿章无可去可退之义，且思同志相助，或及吾身不至颠蹶耳。”^[22]这年他本人51岁。但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恰逢中法、中日两战，他也开始考虑战争与太后祝寿的关系，并力图以屈

辱求和的方式来回避战争。那时,他是更圆熟了,还是更胆小了呢?

然而李鸿章的奏折还是所有参与讨论的督抚中最有切实之言的。他强调“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他同意丁日昌提出的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艘,炮艇10艘,共计48艘的建议,更提出三洋各配置2艘铁甲舰,合计装备6艘铁甲舰的构想。在讨论到人才培养问题上,他指出传统的文武进身之途,考章句弓马,太蹈虚饰,不是培养人才之道,若不破此故习,天下危局,终不可支。建议“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23]

这年年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即1875年1月12日),20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懿旨立醇亲王之子载湫入继大统,年号“光绪”。此前三天,朝廷宣布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替10月17日去世的瑞麟,荣膺文华殿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文祥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宝鋆升授体仁阁大学士。清代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授大学士是极高的荣誉,习称“拜相”,又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据说是文祥自谓功业不如李鸿章而相让。^[24]李鸿章、文祥、宝鋆等人的这次职务安排在此非常时期匆匆做出,其中必有至深之意,涉及到同治去世之后最高政局的发展脉络,但对海防事业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15日,两宫皇太后再次宣布“垂帘听政”。同治皇帝在世的时候,对政事就不太留心。亲政两年余,大事仍由太后做主,日常朝政靠恭亲王和军机处处理,所以龙驭宾天后,各项政务仍然井井有条地执行着。太后垂帘后,即宣布停止园囿工程,褫革怙恩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和引导同治微服冶游的御史王庆祺,发遣遇事招摇、营私舞弊的7个太监,使得军机大臣大受鼓舞,李鸿章进京叩见大行皇帝梓官时发现,恭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奋兴之象,不似春间楚囚相对情景”。恭王还告诉李鸿章,海防讨论各折,数他和沈葆楨写得最好。2月22日明发上谕,将总理衙门筹办海防

事宜、丁日昌条陈、李鸿章、左宗棠及其他各大臣复奏中引申讨论各节，发给在京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月内复奏。

24日，李鸿章上“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他报告说，在上年的海防大筹议中，他想到丁日昌随办洋务多年，熟悉机宜，究心时事，曾密抄总理衙门原奏六条，嘱其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1月20日，丁日昌从广东揭阳老家写信，寄来了逐条议复的折稿，现在转呈朝廷。在这份约六千言的文件中，丁日昌进一步发挥其在《海洋水师章程》中阐述的思路。关于练兵，他认为中国四边，东北为最要，东南、西北为次要，西南又次之。当分别缓急，选练重兵，以息敌人覬覦之心。他强调沿海水师应当全洋统筹兼顾，化散为整，不可稍分畛域。他说：“今日驭远之法，内则力图整顿，不可徒托空言，外则虚与委蛇，不可稍涉虚骄”，力保目前和平环境，以待水陆各军练成。关于造船，他详细介绍各国铁甲舰的情况，认为中国洋面辽延袤阔，目前至少须有10艘铁甲舰，将来能够制造，至少须30艘，方敷防守海口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商人之用。目前各项船械，购买贱于自造，但如果不能制造，则“终受人把持，终无自强之日”。主张在购买的同时，派人到国外船厂，学习制造技术。关于筹饷，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为五大洲第一繁盛之区，提出建立纺织工业，开发矿产，开发台湾，设立银行，发展交通，设立电报，彻底禁烟。关于用人，他主张培养洋务通才，取消捐输鬻官；关于持久，他对比中西治学治事之差异，认为“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书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亦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力主打破保守者的阻挠，所谈思路，已从海防扩展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李鸿章称之“与拙作一鼻孔出气”。有的观点更是他“意中所欲言，

而未敢尽情吐露者”。^[25]

4月1日前后,在京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关于海防筹议的复奏拟就了,醇亲王奕譞单衔独上一奏,其余官员由礼亲王世铎领衔,上一合奏。这几天,相关官员络绎不绝地前往内阁奏事堂会看复奏稿。时任内阁学士的翁同龢记录说,昨天曾拟一稿,军机大臣李鸿藻认为不妥,又易新稿,其实仍是空言。他在讨论时说,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行,当时颇有附和者,醇亲王也以为然,就将借洋款归为“不可行”。其余内容皆不疼不痒,光说海防宜早布置,具体如何筹饷则毫无措置。他在奏稿上签名而出,心中以为“真是儿戏”。^[26]

3日,两份复奏递上。醇亲王此时正被儿子立为皇帝而诚惶诚恐,奏疏写得空泛而不着边际。如说购买铁甲舰,“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用词圆滑,看不出主见。礼亲王等人的复奏同意添设轮船,辅以陆兵,裁撤旧式木船以专养轮船,铁甲船应俟沈葆楨购到后观其实效,再行续买。筹饷项下,一如翁同龢所说,“增盐厘、借洋款、开矿厂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此议之不可行者”。^[27]

虽然京官们远没有像封疆大吏们那样认真地参与讨论,不以为然者多数也只是在自己的心里表示了不以为然,但有两位不太重要的京官——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分别上奏表示反对。

于凌辰攻击说:“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他认为李、丁讲求洋学是败坏风气。其推论是:制洋器、造洋船,就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就不能不以是否精通洋学作为人才的取用标准。但师事洋人,不是可耻吗?大家都学洋学,天下就会将礼义廉耻看作无用,那么谁来与国家共缓急呢?他的主张是:“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28]

王家璧则上一折五片，抨击丁日昌“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他的批评采用了更为细密的推理。如说裁艇船以养轮船、艇船五十，可以更番迭战，互相应援，即令一船有失，尚存四十九船，四十九船俱失，尤有一船尚存，若裁并为一大轮船，设遇有失，则一举而失五十艇船。又如派员出国定造军舰，假如贲巨款如徐福求仙一去不返怎么办？如果回国称船已造成，未能出口怎么办？即使治其欺罔之罪，不也貽笑洋人吗？他认为铁甲舰及其他各种军舰水雷，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制造，更不宜借洋款购办。“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舢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29]

恪守传统观念的士大夫，有时固执和迂阔得不能理喻。李鸿章怀疑于、王复奏，背后主谋附和者，不止二人，目的是阻止丁日昌出任两江总督。“书生无识，可为悲叹！”^[30]但枢廷各位大臣对于、王的批评并不以为然。就观点而论，于凌辰、王家璧的煌煌高论，只是道咸同光四朝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无数场辩论中颀顽庸迂一群的代表而已。早在1858年，马克思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曾指出：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31]

17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美国打完了南北战争，日本成立了明治政府，意大利完成了统一，法国在色当惨败于普鲁士之后，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而中国，虽然闭关自守的隔绝状态被打破，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一批具有洋务思想的政治家

正在努力寻找使国家强盛的新途径,但是正统派士大夫却毫无长进,儒家文化的固有观念和价值尺度,在他们心头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正统派士大夫蛮有把握地认为,只要正人心,重教化,就能够用夏变夷。即使是人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终还不是归顺了礼乐教化?他们见得多了。他们视洋务派为汉奸,高谈阔论,激扬文字,自以为在演出一场严肃的正剧,种种可笑可叹的言行,却犹如一场蹩脚的喜剧。而在具有超越狭隘民族主义世俗道德的哲人看来,这实在是出离奇的悲剧。

日本侵台事件不仅引起洋务派和正统派士大夫之间的争论,还引起洋务集体内部对于国防战略重点的争论,即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论”之争。

所谓“塞防”,是指中国西北边疆的防御。早在西汉,中国便对西域地区进行过有效的管辖。清康熙年间,朝廷勘定了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乾隆年间,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定边界秩序,又两次出兵,攻取伊犁,彻底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势力。1759年12月13日,清政府宣示中外,将西域改名为新疆,设立伊犁将军。由于新疆地处边陲,多民族杂处,所以内部存在着各种政治、民族和宗教势力集团。1864年,阿古柏利用当地人和汉人发生纠纷的机会,在乌鲁木齐起事,自号“清真王”。接着,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率军队入侵新疆,击败妥明及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控制了南疆,并向北疆扩充实力。号称“塔兰齐苏丹”的艾布艾拉,此时则控制北疆的伊犁地区。与此同时,沙俄也在中亚逐一吞并各个小汗国。1871年,俄国军队以“代管”为名,进占伊犁,消灭了艾布艾拉政权,同时拒绝署理伊犁将军兼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接收伊犁。在同荣全的谈判中提出了领土要求。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从而逼近克什米尔和印度,便给予阿古柏政权以外交承认。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哈里发也承认阿古柏,并向他提供武器和教官。新疆形势变得十分错综复杂。

朝廷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阿古柏政权,派左宗棠部队西出玉

门关。左宗棠1866年奉旨离开福州，出任陕甘总督后，用7年时间，平定了捻军起义和陕甘两省的回民起义。1873年，他的军队到达河西走廊。次年，部分军队由张曜率领，进驻新疆哈密地区。这时东南沿海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如何解决两面作战问题，成了朝廷内部争论的焦点。

李鸿章对进一步耗资巨万以支援西征的计划表示怀疑。在海防筹议讨论中，他提出，国防建设的重点，已从西北边塞转移到东南沿海。国家财力有限，无法既顾东南万里海疆，又顾西北万里饷运。新疆地区，“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痛，尤虑别生他变”。他的观点是“新疆不复，干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守，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诸部，准其自成部落，奉中国为正朔即可”。腾出款项，抵充海防经费，以保卫东南财奥之区。^[32]

1875年初，李鸿章借进京参加同治帝葬礼之机，三次陛见皇太后，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的建议。尤为重要的，是他当面向两宫皇太后阐述了停止西征，以西饷建设海军的理由。两宫不能确定，便交朝廷内外大臣研究。

左宗棠对李鸿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收复新疆是整个国防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百多年来无烽燧之警，不仅前代的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然后畿辅之地太平无事。重新疆者，为了保蒙古；保蒙古者，为了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才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他又说，就目前形势而论，西方列强断不至在沿海挑起战争，而关外贼氛极炽，收复新疆有燃眉之急。眼下俄国、英国尚不会介入中国平定叛乱之举，此时若弃置不问，则后患方长。再说海防本有经常之费，

所缺无多,塞防经费不足,官兵连年欠饷已达八百余万两。即使停兵撤饷,对海防的帮助也不会很大。^[33]

文祥支持左宗棠关于新疆—蒙古—京师战略关系的判断。湖南巡抚王文韶也支持“塞防”论,认为只要使俄国不能得逞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认为,日本进退疾徐视中俄关系疏密而定,应避免与俄国决裂而为日本所乘隙。醇亲王则认为李鸿章提出的暂罢西征是最上策。一时间争论十分热烈。“海防”和“塞防”之争是朝廷内部关于国防战略重点放在哪个方面的一场重要讨论,争论的双方,都是从如何拱卫大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出发设计的论证方案,同时又带有各自利益集团的色彩,本质上没有“爱国”与“卖国”之分,只有孰主孰从之别。朝廷刚刚在台湾结束了一场军事对峙,深知海防投资方兴未艾,而在新疆则需要继续面对战争,这是不容忽视的一对矛盾。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取了二者并举的方针。1875年5月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大约一个月后,又任命沈葆楨、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李鸿章攻击塞防的重要理由,是指责西征协饷犹如无底深壑。从1875年至1881年7年间,左宗棠在朝廷和全国各省的支持下,共获得5230万两白银的协饷,平均每年747万两。这场战争的价格确实昂贵,但它所取得的成果却远远超出了金钱的计量。西征不仅使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稳定了蒙古的局势,从而保证了北京的安全。这是朝廷支持西征的根本原因。而李鸿章强调海防的理由也受到了重视,推动了海防建设的发展。

二、方兴未艾的近代海军

1875年5月30日,恭亲王等上奏,对海防筹议进行总结并将

总理衙门原奏六条,参酌诸议,提出办理意见。关于练兵,由于限于财力,请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旧有舳板、红单等师船,倘实不堪用,即行裁撤。关于筒器、造船、新立外海水师应用枪炮、水炮台、水雷,应随宜购办。并派员赴各国学习制造诸艺。铁甲船拟先购一二只试用,果有实效,再行购买。恭亲王等还提出,对于凌辰、王家璧的各项批评,均应无庸置议。^[34]

同日又发布了上谕: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施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惟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曷可胜言。计惟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方。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拔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各该省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陆军须归并训练,方能得力……江防与海防表里,着彭玉麟、杨岳斌会同李成谋勤加操练,俟海防船炮购成,应择要添设兵轮船若干只……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着李鸿章、沈葆楨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拔应用,即着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35]

这道上谕,确定了此后十年海军发展的基本方针。耐人寻味的是,北洋并没有如同恭亲王所要求的,获得优先发展的特权,所谓“三洋海军”的设想,也未被采纳实行。而是采用了南北洋分洋、分任,齐头并进的格局。恭王兼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在

他主导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全国封疆大吏和在京王大臣中,进行了长达大半年的海防筹议,其最终确定的建军方针竟在一天里被轻轻地调换了。两宫太后通过上谕显示了自己的威严,后人则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最高决策层中的微妙关系。

李鸿章对于海防筹议的结果不甚满意。他表示他本人“甘为众矢之的,无所疑惧,即有于、王等十辈,亦不敢竟避其锋!惟此次总署为群议所持,复陈数条,大都模棱敷衍,而又必强我辈以万做不到万办不好之事,只有挺身而出,不欲强拉旁人”。^[36]上谕颁布后的第3天,他给丁日昌写信,说“海防一节,虽奉简派,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次则无人,又无激励之法。衰暮负此重寄,瞬见颠蹶,如何可支?”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资金、人才和激励机制问题。事实上,古往今来,要办成任何事业,所面对的,都是这三个条件。但同日他又向沈葆楨请教对总署原来所提北洋先创的“一军”,究竟应设兵轮若干只,何人堪为统领等问题的见解,说明他的态度还是积极的。沈葆楨回信说,他意中的“一军”,当有铁甲舰2艘,“扬武”级军舰6艘,“镇海”级军舰10艘。“扬武”等船,船政局能够制造,铁甲舰似宜从英、法各定制1艘。统领则必须由学堂出身。^[37]

李鸿章在办理海防时,与沈葆楨、丁日昌磋商最多。早在上年底,他与文祥议论海防人选时,就说“左相(左宗棠)坐镇西陲,似难兼营海,幼丹(沈葆楨)于船务颇知梗概而于不顺手之事肝气褊急,或有议其不能和衷者,究不失为光明俊伟之君子”。^[38]他的推荐,对于沈葆楨出任两江总督起了作用。

他同时也极力推荐丁日昌。这年春天,丁日昌在李鸿章的反复劝说下,带病北上,先是在天津督署住了十日,又去北京活动。丁日昌在京向文祥表示,愿助李鸿章,“明暗均帮”。6月10日,丁日昌奏旧病剧增,请假回籍调理,朝廷命他赴天津,帮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

6月24日,丁日昌入觐。他自记详细情况如下:

辰刻,传知在第三起引见。辰中刻,伯王带起上养心殿。

两宫皇太后在黄纱帘内东西坐，皇上坐正中。

皇太后谕：尔现在身子如何？调理稍愈否？

日昌奏：臣因天时干燥，服药不甚见效。

太后谕：尔此行到天津，与李鸿章办理北洋防务，务要和衷共济，不可各有意见。第一要讲求练兵。第二要讲求制器造船，其余筹饷、用人，亦要次第讲求。现在时势如此艰难，君臣总要卧薪尝胆，做一分事尽一份心。

日昌奏：天津海防，李鸿章于前数年业已悉心布置，井井有条，现在膺此重任，定能将全局统筹兼顾，皇太后可以不必耽心。但设防先要筹饷，今不怕无办防之人，只怕无办防之饷，此为可虑。

太后谕：现在饷事难办理，海防若要大举动，流弊实多，且今委员难以相信。尔告诉李鸿章，用人须要斟酌，捐输便宜官多，不好者亦要参。

日昌奏：臣即当传旨告诉李鸿章。但现在直隶官吏经李鸿章整顿之后，业已比前好得无数。所可叹者，各边省吏治，日坏一日，百姓苦情无由上达天听，将来民心一变，较之夷患尤为可虑！

太后谕：可不是！现在四川按粮津贴，每正款银一两，百姓要完至十数两，所以百姓更苦！

日昌奏：皇太后真真圣明！现在吏治之所以难整顿者，由于官多缺少。官所以多，由于捐输太滥。现在捐输局每年只收银二三十万两。外省捐输名为二三百两，折实不过数十万两。放出此等坏官，侵吞钱粮，贻害地方，国家每年何止吃数百万两之亏。务求皇太后毅然独断，停止实职捐输，不要与户部商议，方免阻挠。

太后谕：尔所言也有道理。

日昌奏：臣现在患病甚重，在外面不服水土，仰乞天恩准假回籍，调理一年半，再当出来报效。

太后谕：尔之病是为国家事急出来的，尔有此番忠心，善

萨亦当庇佑尔。尔在江苏做官，虽然官场书差不喜欢尔，然百姓至今思念尔，里面亦是知道的。虽有旁人闲话，不可因此灰心。尔是国家老臣，总当为国家办事才是。

日昌奏：皇太后不提出闲话一层，臣亦不敢剖白。臣自问与□□□无冤无仇，□□□竟敢公然造言诬蔑，形诸奏章，使臣何以为人！请求皇太后明鉴！

太后谕：不特□□□，尚有□□□，狠糟蹋尔与李鸿章二人。此等人能说空话不能办事，到了有事时不知逃往何处！即如天津之事，□□□被人一骂，便尔装病。亏得你认真查办，省得里面耽多少心。尔今虽然为此事受了人家闲话，然当时实亏得尔！……

太后又谕及洋务与天津事云：李鸿章连年在天津布置一切，里面亦深谅其为难。李鸿章一时不在天津，便一时不放心。他是有大功于国的人，尔告诉他，不可因人闲话便灰心！

日昌奏：李鸿章忠心如铁石，不惟自己身家性命不紧要，即千秋亦看做不紧要（稍停一晌，复奏）。李鸿章将自己声名亦看做不紧要，只要求于国家有济。臣此次来时，因病住在李鸿章署，谈及去年十二月来京，见皇太后又辛苦又悲哀，万分不得已为此垂帘之举。嘱臣见皇太后，劝不要过劳，不要过哀，保养玉体，以慰天下苍生之望。李鸿章一面谈，一面哭！（太后听至此，料拭泪不止。良久，随谕。）

太后谕：尔到天津，好好将病医好。

遂跪辞。奈跪至四刻之久，一时挣扎不起来，太后命伯王扶掖始起。出官门时已巳正矣。^[39]

觐见和奏对是深宫中的统治者了解官场和社会情况的重要渠道和君臣沟通的难得机会。这种谈话内容广泛，能看出谈话双方的微妙心理，也能看出深居简出的皇太后，对于世事和官场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她们驾驭政局的基本功力。

6月30日，丁日昌抵达天津，向李鸿章谈及陛见所言之事。

四年之后，总理衙门提出，李鸿章、沈葆楨系以南北洋通商事

务大臣,兼办海防事宜。李鸿章督办北洋数年,略有端倪,且海口亦较南洋为少。南洋地面辽阔,仅沈葆楨一人筹办海防,恐难以兼顾。拟请简派大臣一人,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督抚等将海防一切事宜,迅速筹办。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兵弁统归节制,以专责成而收实效。这一人选,被确定为丁日昌。^[40]

尽管有了南北洋同步发展的建军路线,但究竟如何实施,朝廷仍然飘忽不定。1879年5月11日,沈葆楨主稿并以同李鸿章合奏的形式,向朝廷建议: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皆有兵轮船常川驻泊,缺乏共同训练。需有威望素著之大将,于适中之地按期联艘操演,号令归一。请旨任命江南提督李朝斌为外海兵轮船统领,吴淞口为南北洋适中之地,各省兵轮当间两月一赴吴淞口,听该提督亲督合操。操毕仍回各省,何处有警,即由该提督率之以向何处。^[41]这是建立统一的外海舰队的设想,6月13日获得皇帝批准,但福建、广东表示反对。于是不到一个月,又根据丁日昌的建议,上谕飭令沈葆楨传知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即赴福建、台湾一带总统水师,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42]8月13日,又从彭玉麟请,令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总统闽局轮船,李成谋仍留长江水师提督之任。^[43]几个月中,变化繁纷,说明究竟如何发展海军,当局者并无全盘构想,南洋内部也充满门户之见。李朝斌曾主持过一次合操,福建派“扬武”、“威远”两舰参加,但以后就不再来,因为闽浙总督何璟“不愿其来”。沈葆楨只能寄希望“江浙两省总可按期不误。但得八船俱臻纯熟,亦得尺得寸之效也”。^[44]10月,浙江巡抚梅启照被召回北京,沈葆楨顿时对于浙江军舰能否再来失去把握。他关照李朝斌:“只能就江南现有之船极力勤操,俾臻纯熟而已。”^[45]

李鸿章对把新式海军的节制权放在南洋是耿耿于怀的。1880年12月3日,内閣学士梅启照奏整顿水师十条,其中提到上年合操旧事,浙江允之、福建驳之,原因是“以上海为总汇,似乎以提督节制提督,非所愿也”。建议“轮船统领照添长江提督之例,改为外海水师提督,节制沿海各镇,按照旧例,四季巡洋会哨,则畛域不

分,可收师克在和之效”。^[46]李鸿章表示,从前丁日昌早有“三洋水师提督”之议,现北洋俟铁甲两舰购到,海上可自成一军。拟请添设水师提督额缺。南洋船只未齐,或如照梅启照所议,暂将统领轮船的松江提督改为苏浙外海水师提督,节制苏浙沿海各镇。惟闽、粤、台湾与松沪相去甚远,势难兼顾,且福建轮船统领彭楚汉与松江提督李朝斌望均势敌,难相统摄,似应与广东联成一气。^[47]重提三洋海军旧说。此时沈葆楨已经作古,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无力与李鸿章对抗,将全国海军的重点建于上海显然已不可能,搞得不好反会给李鸿章全盘包揽过去,又不愿把南洋势力再分成江南、闽粤数摊,便决心守住现有营盘。他反对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海水师,主张沿海水师仍按其旧,各归本管提镇,一俟南洋两号铁甲舰购到,遴选勇略兼优、深谙驾驶之提镇大员统带,驻扎澎湖,保障台湾,南控闽粤、北顾江浙。^[48]南北洋大臣各打自己的算盘,全国统一的外海舰队或分作三洋建军的计划都无法实施。

1882年,朝廷中又有人提出将长江水师提督移驻吴淞口(原驻安徽太平),江南提督移驻淮徐,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旋因左宗棠、彭玉麟反对而作罢。

这样,迨至中法战争之前,尽管对海军建设的构想屡有争议,实际部署仍然是按南北洋两地同步发展。朝廷下拨的海防经费,也按南北洋两地分割。南洋大臣名义上统辖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外海水师兵轮船,但除江苏一省外,对浙、闽、粤就鞭长莫及了。

中国近代海军是从南洋起步的。1870年8月,直隶总督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提出了海军的训练编成问题。他说:“今中国轮船甫经修造,尚不尽如洋人兵船之式,洋枪洋炮甫经操练,亦不能及洋人技艺之精;至如召集水军出海操演,此时尚未议及;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二三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推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兹当闽沪两厂船成

之时,即当于两处选立统将、慎择船主,出洋操练。无论有警无警,穷年累岁,练习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终有可以即成之时。”^[49]

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饬令闽沪各择统将出洋操练,广东应准备轮船巡防海口。上谕说,各军舰都要由中国人驾驶,各省将领中有才具出众,熟习风涛沙线者,当随时保奏。即使山林草野中有长于海战者,亦当留心物色,量才超擢。^[50]

沈葆楨推荐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担任轮船统领,获得允准。从此新式轮船编成便与旧式福建水师平行存在。前者是船政局留闽舰只的管理、训练机构,不能笼统地被称作“福建水师”。旧式福建水师提督与轮船统领虽可兼任,但没有并为一职,更不是统辖关系。^[51]1872年9月李成谋调任长江水师提督,朝廷命彭楚汉继任,却命福宁镇总兵罗大春(次年升为福建陆路提督)接任轮船统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无论李、罗,对于近代海军皆为门外汉,所谓“操练”,不过虚应故事而已。

封建时代地方官制和军制设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防止地方割据和军人专权。清朝规定,提督、总兵等武职大员统兵,又受总督、巡抚节制。兵将分离,将皆升转,以防武官久踞一地,控制兵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出现了文人统兵的现象和兵为将有的局面,文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成为军人领袖。朝廷虽然有权调动各地督抚,督抚却都在自己的治域里各行其道,内轻外重局面开始形成。沈葆楨早年有过统兵作战的经历,但他毕竟是个恪守礼义的儒臣。当他服官马江时,对于福建海防筹划有方,威望望重,对于武官,也能指挥若定。然而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体系,没有广大的门生羽翼,更没有李鸿章那样的勃勃雄心,因此后来调任南京,人走茶凉,尽管朝廷授权他督办南洋海防,他却只能节制两江,不要说广东,就连刚刚离任的福建,也不完全服从他的遥控了。

同光年间,随着调入一批江南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和购买了几艘外国舰艇,江苏沿海和长江下游汇集起一批近代军舰。1870年9月30日,曾国藩交卸直隶总督一职于李鸿章,回调

两江总督。同日,他奏调福建前任台湾道吴大廷综理江南船政操练事宜。他认为,海军操兵之法,全在船主得人。既为一船之主,第一贵善于使船,合船水手士兵,皆可俯首听命。第二贵明于海道沙线,兼善阅看地图。第三贵娴于战阵,能察进退分合机宜。三者兼全,即洋人亦不可多得,中国武员中尤难其选。须从文员之中,得一素谙戎机,讲究地图,兼明洋务,而又不惮风涛者综理其事,始则博求将才,继则出洋督同操练,终则遍询外国水战事宜,暗师其法,取其所长,乃可日起有功。^[52]

从吴大廷的经历看,他曾先后担任福建盐法道、台湾道兼理学政、福州船政局提调,被认为是熟悉洋务的干员,接管江南轮船操练局后的八年间,也多次参观法、美、德国海军在吴淞口外的操炮演习,参考“英国水师阵法”和中国传统兵法,组织“操江”、“测海”、“威靖”、“恬吉”、“海晏”诸轮船进行近海操练,但毕竟不懂近代海军的业务。其驾驶人员,多在上海招募,各船管带和水手皆由长江水师挑选而来。他建议把负责驾驶的“船主”和负责军事指挥的“管带”两个职务,按照外国通行做法,合为一人充当^[53],并组织翻译海军专业书籍,供官兵学习。吴大廷是文人,在军中不忘做学问,曾将自撰的《读易随笔》三卷赠刘坤一,刘坤一回信说“阁下博学鸿才,而屈就乎此,虽属时务之急,终觉位置非宜”。私下却对别人说:“沪渎轮船,据统领吴桐云则称无一号可靠,而人亦有谓此君断非统领轮船之才。”^[54]李鸿章则直言不讳地告诉曾国藩,吴大廷“于此道本非内行”,“将来造成兵船,宜选能亲带出洋者认真操习。现有四船,尚在不商不兵之列”。^[55]1877年秋,吴大廷于养心殿为皇帝召见,以为多年辛苦,可获晋官,不料奉旨仍以海关道员用,大感失望,遂以病辞,次年去世。

沈葆楨主持南洋海防后,计划以吴淞口为全国海军的汇集之地。由于近代海军是一项新兴事业,缺乏统帅人才,他便同在福建时一样,企图借助旧式水师的将领。江苏地区水师包括江南水师和长江水师两支。江南水师系顺治初年所建,向分内河、外海两队,由江南水陆提督统辖。1869年,根据曾国藩的提议,改为内

洋、外海、里河三大队。长江水师，是同治年间将湘军水军立为经制水师而成的。在江苏有瓜洲、狼山两镇，其中狼山镇隶长江水师提督标下，仍听两江总督和江南提督节制，说明江南水师同长江水师具有重叠关系。1879年5月，沈葆楨奏请任命江南提督李朝斌为外海兵轮船统领，集中指挥各省军舰，但在实践中无法贯彻。他想派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回福建总统水师和轮船，彭玉麟认为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能够统领闽局轮船，无需将李成谋调回福建。关于船政局轮船统领的驻地，他建议设在澎湖，闽浙总督何璟主张设在基隆，船政大臣吴赞诚提出设在厦门。彭楚汉为了各不得罪，上奏说基隆、澎湖、厦门均属吃重，议定每月轮赴以上三地，周而复始。^[56]

南洋地区海军建设也长期不规范。在吴大廷提出合并“船主”、“管带”由一人担任建议的五年之后，依旧“行驶归船主，管带无从过问，俨若一船两管。水手自以为雇工，去留随便。礼拜休息，登岸嬉游，尤非用兵之法”。以致李朝斌再次提出合并二职，把“船主”改为“帮带”的建议，并取消星期日休假，规定每月初三、十八日前，出吴淞口，训练行驶和用炮之法。^[57]这次建议的效果不得而知。

广东原是近代海防首冲之区，随着清廷对外防御重心的北移，加强广东海防建设的种种建议便渐渐冷落下来。1866年，因洋面盗案迭出，广东巡抚蒋益澧与两广总督瑞麟会商，出银24万余两，向英国订购“安澜”、“镇涛”、“澄清”、“绥靖”、“飞龙”、“镇海”六艘兵船；出银4万两，向法国订购“澄波”号兵船。1872年，从船政局调来150匹马力木质军舰“安澜”号（与前购英舰同名），又在广州设局，建造了16艘内河小轮船，派赴东、西、北三江巡缉，这些军舰长度没有超过15丈的。刘坤一主政两广后，宣布他的舰艇无法开赴吴淞口合操，沈葆楨只能默认。

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是当时洋务阵营中的佼佼者，在许多大的问题上，他们引为同志，互相声援支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因各自所处的位置，常有矛盾，也是明争暗斗不断。沈葆楨是个擅

长吏治、精通时务的官员，在受命同李鸿章一起督办南北洋海防之后，他表现出良好的君子风度，主动把每年200万两南洋海防经费尽解北洋使用；南洋进口的军舰被北洋调去，反把已用数年的旧舰给他，他也接受了。李鸿章对他耍了很多政客手腕，他一概表现豁达。北洋地区的海军事业由此后来居上。1879年12月26日，沈葆楨卒于江宁任所，享年59岁。他的去世，使得南洋地区海军事业失去了重要的主持者。

本来，这个地区还有一个醉心海军的官员丁日昌。丁日昌自1875年底出任福建巡抚后，努力加强台湾地区的海防建设，旋因健康原因而开缺。据他自己说，他是台湾瘴气的第三个受害者。在他之前，福建巡抚王凯泰因驻台而病故，船政大臣吴赞诚因受瘴而半身不遂，他本人则是双足痿痹。李鸿章称丁日昌急流勇退，实因缺苦，不堪赔累。1879年6月，朝廷任命勒方琦为福建巡抚，勒即拟辞。李鸿章在给何璟的信中说：“自补帆（王凯泰）、雨生（丁日昌）、春帆（吴赞诚）巡台先后婴疾，林（达）、夏（献纶）又相继物化，外人多视台湾为畏途，军事吏治实亦难于整顿也。”^[58]1879年夏，朝廷赏丁日昌总督衔，会办南洋防务，他谢绝了。同时提出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59]11月5日，他更尖锐地指出，当年的湘军水师名将李成谋、李朝斌、彭楚汉都不宜统领轮船，因为他们只习长龙、舢板而不通轮船，万一稍失机宜，船失则人失，虽有智勇，又有何用？且这些提督年岁皆过五十，资望又隆，既不能经受海上风涛，也断不甘俯就西人绳墨。他含蓄地讽喻他们统领轮船，不过每隔数月选择风平浪静之日，于内洋校试枪炮而已，和大洋风浪中的实战状况完全不同。他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60]这是关于海军指挥官人选的一次严肃讨论。可惜这番远见卓识，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像是与他作对，半个月后，李鸿章特地奏请把他的老部下，陆军出身的丁汝昌留在北洋海防差遣。丁汝昌后来在海军中飞黄腾达，最终却葬送了北洋海军。沈葆楨死后，朝廷就很少垂询丁日昌了。1882年，丁日昌去世。

继沈葆楨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有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他

们对于南洋海军的发展均无大的建树。刘坤一、字砚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随刘长佑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曾国藩生前，他算不上湘军嫡系。然而随着老湘系人物的凋零和他开府两广、两江等重要地区，逐渐成为后期湘系的代表人物，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但他对海军的重视，一向不如李鸿章和沈葆楨。左宗棠1881年从新疆荣归，入阁拜相，已近70岁了。旋因军机处诸公恶其喧聒，被调出北京。他总督金陵后，依然时时沉湎在征讨西陲的煌煌业绩里，偶有间隙，便大骂曾、李、沈，日复一日，别人常常难以插上公事。到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当总督时，江南兵轮船共有“登瀛洲”、“靖远”、“澄庆”、“开济”、“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威靖”、“测海”、“馭远”、“金瓯”等12艘，统统划归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总统。1882年初，中国公使黎庶昌乘“馭远”舰赴日本履新，称该船屡坏屡修，海道生疏，原因是平日很少出洋。

中国近代海军虽由南洋起步，但不久北洋即后来居上。

雍正年间，朝廷曾在天津设立八旗水师，防御海口，到了乾隆年间，这支舰队训练生疏、技艺荒废，已成虚设。某次乾隆巡幸阅操，都统英俊老态龙钟，所传号令错误百出，部队杂乱，喧哗不已。皇帝一怒之下，立即将舰队裁汰，从此直隶洋面便无水师。

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并从北塘登陆，攻破京津。此后，中国沿海防御的重点开始北移。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美、德、意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一带示威，再次促使京畿地区的海防建设提上议事日程。8月，李鸿章从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年底，安徽巡抚英翰启奏，建议在天津设立海防水师提督专标，选择久著威望之大将兼辖水陆各营。李鸿章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解释说，久著威望的大将难得其选，兼辖水陆各营则目前并无水师。兵事只论强弱，不专在职分。虚设提督而无得力之兵、应手之饷，于事何裨？^[61]此后四年里，李鸿章除了从沪局调“操江”轮赴津为北洋巡哨，从闽局调用“镇海”舰来津使用和兴建天津新城外，在海防上没有采取引人瞩目的动作。

他需要在北方站稳脚跟。以至到 1875 年朝旨命其筹办北洋海防时,北洋仍处于“海口一无预备,赤地新立”的局面。

北洋地区近代海军事业,是在 1875 年以后才真正发轫的。筹办北洋海防的使命,使得李鸿章能够顺利地把山东、奉天等地的海防建设也统揽手中。

同治末年,随着海运取代漕运,山东的海防日益重要。巡抚丁宝楨狠抓山东绿营水师的整顿工作。丁宝楨,字稚璜,贵州平远人。他刚正威严,不畏权贵,最脍炙人口之事,是将出外招摇的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安德海斩首。1871 年,丁宝楨分设荣城、登州水师营,将从广东订购的 14 条拖缙船分拨 2 营使用。设立水师统领,由文登营副将充当。

1873 年 6 月,丁宝楨在登州调集文登营和前后水师营兵丁校阅。打靶时稀稀落落,未能一律如式;游泳时后营有 80 人能够下水,前营和文登营,能下水者各不过 30 名,且技艺未见精熟,泗水也不能耐久。丁宝楨当即开除射击无准及老弱之兵 111 名。文登营副将刘蒋华办事昏愦,不能得力,即飭濮州营游击李楹暂署。幸好奏调的闽局“飞云”轮已到,他乘坐轮船,周历长山、庙岛、黑山,直抵天津海面,再驶回山东,心情才转满意。

李鸿章筹办北洋海防消息发表不久,道员张荫桓向丁宝楨进献三策:一、从北洋海防全局着眼,当由直、东、奉三省合力建立海军,分置山东威海、烟台,奉天黑山湾,进击退守,可分可合;二、从山东海防着眼,当精选陆军,分扎登州、黄县、福山等地,既可合击登岸之敌,亦可用船载送援助天津;三、若以上两策饷力不足,则以登州为根基,再练陆军驻守烟台后山,逐渐再谋扩展。丁宝楨不同意先防登州的狭隘观点。他明确提出,“盖此时应注意北洋,兼顾东省……先将烟台炮台兴办,次及威海”,并派张荫桓总办防务。^[62]他虽然雄心勃勃,又时时以统筹北洋全局自许,但一直未能从李鸿章手中取得分文海防经费。1876 年,他擢升四川总督,继任巡抚文格毫无作为,山东海防事业便轻而易举地被李鸿章囊括过去了。

奉天地区原有旅顺口水师营,系为防缉海盗而设,共有10艘木质战船。经过160年的风吹雨打,大半朽坏,仅有两船尚堪应用,有时便雇商船搭配巡洋。1872年,暂署盛京将军瑞联奏准从闽局调拨“湄云”轮船,用作巡洋拏贼。李鸿章从来没把这支水师放在眼里。他早就说过,“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订造为简便”。^[63]按照这一方针,他先后向英国订购了10余艘炮艇和2艘巡洋舰,在大沽洋面云集起一批近代军舰。同时,他准确地抓住教育、训练、基地建设诸环节,使得北洋海军后来居上,迅速超过了经营多年的南洋。

李鸿章知道,要办海军,先要物色海军统帅。1878年初,他的一位淮军部曲来谒,马上被他看中。此人叫丁汝昌,原名先达,字禹亭。1836年11月18日出生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的一个贫苦农家。丁汝昌10岁便外出帮工,稍大又到豆腐坊学徒。咸丰初年,家乡大旱,父母病饿而死。1853年太平军攻克庐江县城,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程学启部,在安庆驻守约八年。后来,程学启叛变,投降了曾国藩,丁汝昌也被编入湘军。清军攻破安庆后,他被授予哨官、千总。1862年曾国藩把程部转授给李鸿章,丁汝昌随之改隶淮军。因作战骁勇,被刘铭传索之帐下,统率马队。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东西捻军的战争,官至总兵加提督衔,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他回家闲居了几年。1877年他赴京活动,谋获差使,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他不愿去西北苦寒荒瘠之地,转赴天津走老长官的门路。李鸿章说,现在创办海军,缺人统帅,你如果能赴英国留学海军,学成必当授予重任。于是丁汝昌借口伤病复发,呈请兵部暂缓行期,重新投入李鸿章的帐下。^[64]

李鸿章本来委派道员许铃身为水师炮船督操。许铃身是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父亲许乃普,曾任吏部尚书。二伯父许乃济,1836年在太常寺卿任上,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成为鸦片弛禁言论的代表人物。五叔父许乃钊,做过江苏巡抚。胞兄许彭寿,官至内阁学士。1875年总理衙门奏请预储熟悉洋务人才,保举许铃身及陈兰彬、李凤苞、何如璋、徐建寅、

许景澄等才堪出使,许铃身后被提名为出使英国副使和出使日本大臣,因李鸿章论其非才而中辍,发往福州船政局差委。1878年许铃身率“龙骧”等四炮艇北上天津,李鸿章命他同丁汝昌“会督管带各员认真操练”^[65],而为清流健将张佩纶坚决反对。张佩纶私下写信给李鸿章,提出当年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而今欲以许当彭,丁当杨,“虽在妇孺必不谓然”。张佩纶指陈三事,一是烟台条约谈判期间泄密;二是李鸿章上年坐船出海演炮,因潮浅不能入口,许铃身却率随同之船先行离去;三是性本轻扬,取受狼藉,挟妓冶游,招摇过市^[66]。1881年10月,张佩纶过天津时与李鸿章面谈,得悉“时‘镇北’各船均归提督丁汝昌管带,阴夺许铃身权”。^[67]李鸿章把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最终确定为丁汝昌。

就性格论,丁汝昌较内向;就能力论,丁汝昌较庸懦;就专业论,丁汝昌完全不懂海军。李鸿章选择此人,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曾说,李鸿章和他的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他私情,转展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僨事,贻误大局。这番分析,用在丁汝昌身上,也是合适的。创大事业,用人最为重要。当年曾国藩门下曾涌现一大批文臣武将,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骨干。而李鸿章手下,出众的人才就不多见了,这也是曾李两人的区别之处。

1879年,当“镇东”等4炮舰购回北洋后,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在北洋差遣,旋被派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以后,丁汝昌去欧洲接带“超勇”、“扬威”两巡洋舰,获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正一品封典,1882年因处理朝鲜“壬午之变”有功,得到赏穿黄马褂的荣誉。1883年被实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而到这时,非经制的“北洋水师”提法,已经时常出现于官方文件中了。

1881年春,张佩纶到天津,与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讨论海军发展规划。薛写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送他。这个材料,可

以看做李鸿章的智囊班子对北洋水师未来发展的构想。薛福成写道,创设北洋水师,须配置铁甲船2艘,巡洋舰3艘,新式木壳兵轮4艘,二等兵轮4艘,师丹式炮船8艘,根驳小轮船(gunboat,即炮艇)8艘,水雷船10艘。以津沽为10营,酌量分布旅顺、大连湾、烟台、威海卫等重要口岸,不时巡哨巡练。现在北洋已有炮艇4艘,水雷船1艘。津沽有“操江”、“镇海”,奉天有“湄云”、山东有“泰安”,即为4艘中等兵轮。北洋现已订购2艘巡洋舰,山东已订购2艘炮艇。在未来五年里可按计划把所需军舰配齐。添设外海水师提督,建阬津沽,裁撤天津镇一缺,改为北洋水师提督衙门。设立水师学堂造就海军人才,选拔出洋留学生统帅各舰。在北洋各重镇间设立海底电缆,以通信息。^[68]以后北洋海军成军,就是大致按照这一设想逐步实施的。

这年秋天,李鸿章借验收“超勇”、“扬威”两舰之机,前往旅顺考察。他看见旅顺水师营的几条朽坏的艇船搁在沙滩上,既无帆樯,也无炮位,显然多年未曾出海,便向朝廷提出裁撤。在此之前,他已消化了山东登莱水师,因此北洋地区不再存在旧式水师。这与南方各省继续实行师船和轮船双轨平行的体制相比,是明显的进步。

1882年,丁汝昌向李鸿章呈报了北洋水师官弁、水手、匠役的军服式样。军服仍是传统对襟,军官服是丝绸质,宽袍大袖,袖口宽达6寸,领圈、门襟和下摆,装饰着深色的宽边。根据官阶不同,袖口上饰有不同数量的金边。水手服是浅蓝色斜纹布。为了操作便利,上装要求掖入裤腰。军服的肩部有了识别符号(衣花);三等水手一道横杠,头等水手三道横杠,副水手头是一只铁锚,总水手头是两只交叉的锚加一个Λ字杠。匠役的符号很富有想像力,管油的画个油壶,升火画把铁铲,铁匠画个铁砧,最有趣的是鱼雷匠,符号是条大鲤鱼。^[69]这是海军正规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其他地区资格较老的兵轮船的士兵服,不过是把传统军服胸前背后大圆圈里的“兵”字改为“××轮船”而已。另据外国访问者一年前的报道,船政学堂练习船上的士官生服装完全同老百姓一样。李

鸿章手下一位海军军官去主持皇帝生辰的典仪，居然穿着类似寝用汗衫的白色衣服，手中摇着扇子。这位目击者说，没人能否认，在炎热的天气下穿这身宽松的衣服是舒服异常的，但显然很滑稽。^[70]现在海军有了自己的服装，比过去是一个进步，但同世界海军的样式还不完全一致。我们对比同时代中日海军军人的服装，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军装不仅体现军人的风范，也能体现与现代化接轨的程度。

三、官场内斗与琉球、朝鲜的外争

从同治年起到光绪十年初，朝廷一线工作一直由恭王主持。他在军机处的主要班底人马，为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

沈桂芬，字经笙，江苏吴江人，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干练有识，又以“洋务长才”自认，熟悉外国事务，甚得恭王倚信，也同宝鋆关系密切。文祥去世后，他成为恭王在军机处的主要助手。1878年，沈桂芬又援引湖南巡抚王文韶入军机，他同他的追随者，被人称为“南党”。史书记载他“躬行谨飭，为军机大臣十余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71]。沈桂芬在外交事务中，遇事持重，以保和局。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即为沈桂芬推荐，因此后来颇受诟病，郁愤致疾，于光绪六年的除夕（1881年1月29日）去世。

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工部尚书，曾当过同治帝的师傅，思想正统，是著名的理学家。沈桂芬病假后，他在枢廷秉笔，李鸿章顿感“洋务甚为隔膜”。^[72]他与依附追随他的一批言官和文学侍从，被称作“北党”。他们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为己任，面对吏治腐败，敢于上疏言事，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指斥贪官。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使慈禧太后更改

主张,从而煊赫一时,满朝侧目,人们称之为“清流党”。在沈桂芬去世之后,清流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作“前清流”。南党人士,在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进入军机后,奉翁为领袖,被称作“后清流”。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当时在政治上亦属保守正统,走的却是醇王奕譞的路线。

前清流抨击的对象,是那些直接主持政务、贪赃受贿、昏庸无能的大官僚。他们认为李鸿藻在军机处发言不受重视,因此频频施加压力。在对外事务上,他们一直是强硬的鹰派,凡稍谈对外妥协,一律斥为汉奸大佞,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比如他们就公开批评沈桂芬、王文韶的外交是“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但求苟且无事”。^[73]尽管他们对于战争的了解完全来自书本、传闻和想像,对于军事力量、武器装备的对比全不知情,对于枪林弹雨、血腥污秽的沙场完全隔膜,却以为自己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因而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清流的出现,一方面是19世纪80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慈禧太后在一个时期内故意纵容的结果,她要利用这股力量平衡其他政治派别。

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74],表面上两派势成水火,但在私下,却有不少沟通的渠道。以清流中的最著名者张佩纶为例,就能看出双方渗透的蛛丝马迹。

张佩纶,字幼樵,号羨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22岁中举,次年连捷进士,是光绪初年北京政治舞台上锋头极健的人物。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1879年,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给俄国,他上奏极言其非。同年,他上“疏陈大员于弟不宜破格保荐折”,批评四川总督丁宝楨特膺保荐大学士宝鋆之弟四川候补道宝森和刑部将翁同龢之侄刑部郎中翁曾桂列入京察一等,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峻峭,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中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本

人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75]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牵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王文韶而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四折，终于使王文韶挂冠而去。野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自谓愧对”^[76]。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今人不得而知，但张佩纶在政坛的杀伤力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就连他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然而张佩纶从不攻击李鸿章，这同他父亲张印塘早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官居安徽布政使，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有关，也同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字蔼青）私下为他们拉拢牵线有关。1879年5月，张佩纶因母亲去世丁忧，张华奎推荐他去北洋幕府相助，李鸿章欣然表示欢迎。^[77]张华奎在北京与清流走得最近，被人讥为“清流靴子”，也有人称其“捐班清流”，因是贵公子，自有一套与名士公卿交际的手段。未几，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过津，李鸿章助营葬之资千两。1880年4月，张佩纶又应李鸿章之邀，住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两旬，讨论海军建设的诸多问题，并观览周边炮台。他在日记中记载：“夜请合肥（李鸿章）定北洋水师规模，以阻浮议、戒因循，合肥遂以相囑。谈次及进退人才事，余以为此本朝强弱之机，未可委诸天数，合肥瞿然。”^[78]此后，张佩纶虽未入幕，但他们的私下交往更为密切。张佩纶对李鸿章说：“年来交谊已深，所以为公代筹者，非尽执古议，而颇参以时政。”^[79]积极人仕，大展身手的心情跃然如画。且不论张佩纶的实际操作能力高低，渴望摆脱单纯纸上谈兵，在军国大事中一展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正是许多清流人物的共同志向。在这点上，张佩纶同张之洞十分相近。而李鸿章，对张佩纶也十分看重，期望把李鸿藻门下的这员最孚时望的大将纳入帐下。李、张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洋务、清流集团的彼此攻讦和渗透转化，构成这几年政坛斗争的重要内容。

1881年，张华奎曾暗示张佩纶，李鸿章说他母亲年老多病，为作后事安排，囑张树声襄助处理淮军事务。意思是说，若李太夫人

故世,李鸿章必然要丁忧守制,希望届时张佩纶能协助张家父子。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1854年起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是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重要人物,因善于同名士交接,又被称作“诰封清流”。果然,1882年4月17日,李鸿章获准请假一月,去武汉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处探视母病,朝廷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及成行,李太夫人已于19日去世,24日,张华奎到达天津,为其父亲来天津接班做前期准备。26日,朝廷宣布夺情,要李鸿章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但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对于他是否真要坚持守制发生了争论。旧时值父母去世,儿子做官者须解除职务,在家守孝27个月,称作“守制”。但朝廷对重要官员,可命其不必去职,素服办公,称作“夺情”。在朝廷宣布夺情后,官员仍然坚持守制者,会引起舆论的尊重,以为其举措合符礼制。比如李鸿藻,连庶母去世也坚持去职守制,极受人们赞誉。此时,小圈子中主张守制者,仅袁保龄、周馥、章洪均等数人,他们认为此事将关系到李鸿章一生名节。也有不少人劝说李鸿章早点回津,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影响。李鸿章奔丧,他的夫人并不随行,继续留在天津,甚至连总督衙门都不想搬出,给人的感觉就是李鸿章马上要回来的。袁保龄、周馥力劝李夫人搬家,以免遭人议论。盛宣怀、刘含芳等人不愿在张树声手下做事,纷纷思去。整个督署内部陷于混乱。

袁保龄,字子久,河南项城人。父亲袁甲三,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长期在安徽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与淮系有着极深的关系。袁保龄本人14岁入邑庠,受知于李鸿藻。后随父在籍办团练,周历于各团之间,使苗沛霖部始终未能进入河南。张宗禹率捻军进攻陈州,袁保龄会合清军、团练,分筹堵御,迫使捻军退去。曾国藩一见奇之,日为国士。袁甲三去世后,朝廷赏袁保龄为内阁中书,1866年到阁补缺,先后参与校勘、编纂《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穆宗毅皇帝实录》、《玉牒》等重要官方文献。在阁13年,博览群书,精熟典章制度。1877年起,山西、河南出现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其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次年得

传染病而死。袁慨然以兄志未竟，豫民未活，呈请辞官归里，力肩赈务，尽括家资以救灾民，是晚清官场中难得的为官清正、极有责任心和办事能力的人物。上年，李鸿章以北洋海防交涉，求贤佐理，奏调袁保龄赴直隶委办海防营务。由于袁保龄既是李鸿藻的门生，与京中清流关系密切，又是世家子弟，与李鸿章渊源深厚，所以就成为沟通二李关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张树声是李鸿章离开北洋时自己选定的替手，3月21日，李鸿章在做离职准备的时候，一而把徐建寅从欧洲回国时所撰《德国海部述略》和中国驻长崎理事（即领事）余璘建议设立海军衙门的条陈转交张佩纶参考，一而告诉他，“振帅有志整备师船”。5月4日，李鸿章在给张佩纶的信中再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7日，袁保龄写信告诉张佩纶：“合肥（李鸿章）望公，将以水师相累，谅新帅当有同心。亦须看时局乃发，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80]袁保龄是张佩纶的好朋友，与张华奎的关系也不错。他透露的督署内幕，显然是可靠的。5月30日，李鸿章自天津乘“保大”轮南下奔丧，行前致函张佩纶，对他允诺协助张树声提出保留意见，称“恐致它日进退两难”，“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这一意见，是否出于李鸿章已明白自己即将夺情复出，张树声仍将回两广任职而做出的考虑尚待探讨，但却驱使张佩纶立即改变态度，回函张华奎，婉辞对其的邀请，并将张树声父子的活动连同他给张华奎的回信一同密呈李鸿章，以表白自己与他们并无更深的关系，使得张树声父子措手不及，^[81]31日，有上谕称张树声奏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并请加卿衔，“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张树声之奏著毋庸议，^[82]这证实张树声按照原先的约定开始了行动。而张佩纶则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得刚刚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讨了个极大的没趣。6月1日，张佩纶的密友陈宝琛又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部议罚俸9个月，^[83]虽得旨准予抵消，却使得张佩纶从此与张树声父子交恶。

张佩纶的这些举动,似乎是急于要向李鸿章表态。他事后写信告诉李鸿章:“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至清流,眩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又说:“高阳(李鸿藻)大不以为然……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潜公(陈宝琛)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惟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藹青(张华奎)不当大杖三百耶?”还说:“渠竟不知鄙人身份意趣,可怪已极。”这里,张佩纶显然在为他与张树声父子勾结在先绝情在后的表现开脱,其行为迹近政客,而与自己标榜的“清流”相差甚远。从根本上说,他对张树声父子翻脸,是基于李鸿章不久就要重返天津的判断。袁保龄说李鸿章“将以水师相累”,讲的确是真话。如果看得再深一点,不难发现,对张佩纶的安排,实际上是二李之间的一种默契。李鸿藻表而上反对洋务,暗中通过张佩纶、袁保龄,他也要在北洋插一脚。

张佩纶以名士做派解除同张树声父子的默契,李鸿章却不能这样处理人际关系。他把自己给张佩纶的信转交张氏父子一阅,又将此做法通报给张佩纶,他说:“振公荐贤之举,鄙意略嫌太骤。固事之而不能缓免,几失其乔梓之欢。然是以见其求才若渴,出于至诚矣……惟留侯处处要好,未免意气顿沮。鄙至尊处书则已向伊乔梓朗诵一过,不欲当面输心背而笑也。”^[84]由此可以看出官场关系的错综复杂。

虽然回绝了张树声的邀请,张佩纶当年却官运亨通。10月,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12月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次年5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一如既往,关心北洋海防。1882年初,他在“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中,俨然如洋务人士,大谈四洋海军建设。壬午之变后,他更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闭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

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85]倒是李鸿章,照例上折反对,很低调地说,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敌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故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必须由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又说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假如措解无缺,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而在实际上,岁得海防经费,仅及四分之一,岂能购备大宗船械?倘若足额拨款,则五年以后,南北洋两支水师,当可练成。^[86]两人各说各调,如演双簧,外人倒看不出他们的私下接近。李鸿章的复奏由幕僚薛福成起草,薛自称另一幕友章洪钧评价此文为汉唐以来奏疏中有数文字,与张佩纶的奏疏看来无甚异同,实则针锋相对,不读张之原文,不知此文用笔之妙。^[87]说明在李鸿章的核心幕僚中,对张佩纶存有不以为然之心。

1883年12月3日,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在他的倡导下,总署设置了海防股。^[88]通过参与实际事务,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倾向于洋务派,以致次年李鸿章在同总理衙门筹划成立海军部(又称海防衙门)时,专门推荐张佩纶主持。赫德也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说:“这人曾力主对俄作战,倡言以杀头严惩崇厚的罪状等等,锋芒毕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这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的产物。这位先生经过培养和适当驾驭,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新人物。”^[89]

同治朝最后几年和光绪皇帝登基的最初几年,大清帝国对外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虽说1874年同治帝的突然驾崩和1880年慈禧太后病恹恹地折腾了一年,还下诏全国举荐名医进京会诊,却换来第二年4月慈安太后的猝死和慈禧太后的康复,并重新主持朝政这样两件宫闱大事,在部分接触上层的懿亲贵戚、官僚士大夫中引起一些猜测外,各项政务依然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左宗棠在西北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洋务派倡言“求强”,在各省创办了许多军用和民用企业。容闳率领12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

学。尽管抽样统计表明,在1870至1880年9个重要省份中,40~50%的州县处于歉收,尤其在1877~1878年间,北方的山西、河南、直隶、陕西等省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干旱,造成1000余万人的直接死亡,饿殍载途,白骨盈野。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已被平定,朝廷毕竟可以坐下来喘一口气了。封建文人将这样一种恢复生息的局面,差强人意地叫做“同光中兴”。

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下,各种国际矛盾和危机却正在积累。1875年春,日本屡派军舰到朝鲜侦察和挑衅。9月20日,日舰“云扬”号又进入江华湾,企图占领江华岛草芝镇炮台,被守军击退,遂炮击永宗岛,并在该岛登岸,造成“江华岛事件”。总理衙门在同日本特使森有礼的谈判中妥协。次年2月,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规定朝鲜除釜山外,另开元山、仁川两港,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在各港口派遣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把西方列强强加于它的炮舰政策接了过来,用作对东亚邻国的侵略扩张。

日本又阴谋并吞琉球。1875年6月,日军正式进驻琉球,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中国的一切臣属关系。1877年6月,闽浙总督何璟向朝廷报告,琉球国王向中国求援。朝廷并不以为然,下旨琉球之事着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到日本后相机妥办,琉球使臣着飭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1877至1878年,日本国内政局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发起了萨摩藩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李鸿章还向日本政府提供了10万发弹药。9月24日,西乡战死。次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日本政府无暇在此困境中解决琉球问题,清政府也没有抓住短暂的有利机遇。从深层次来说,他们根本就认为不值得为了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去与日本打仗。1879年3月,日本把琉球国王尚泰掳往东京,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恭亲王却在奏疏中说,何如璋在日本办理琉球交涉事宜,欲假以兵力以示声威。但从中国现在局势看,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故仍然只能据理辩论。李鸿章则请求来华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设法调解。10月,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向总署递禀泣援,总署只是发给他们300两川资,将他们打发回国。

同年10月2日,钦差大臣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规定中国收回伊犁城,但沙俄割去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土地,使伊犁实际成为孤城,还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举国大哗。总理衙门和不少大臣指出,如此则伊犁成为弹丸孤注,控守弥难,收回后毫无意义。朝廷将崇厚革职下狱,定为斩监候,并派曾国藩的长子,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前往俄国,重开谈判。俄国为到嘴的肥肉又将失去而愤怒咆哮。1880年7月10日,沙俄国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亲王亲自主持有海军部、陆军部、外交部参加的会议,策划以海军袭击中国的海岸与港口。接着,列索夫斯基上将率领一支由4艘铁甲舰、3艘快速巡洋舰、3艘海防舰、6艘炮艇、4艘运输船和相当数量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出现在远东海面,扬言封锁渤海、黄海,直接威胁北京。^[90]李鸿章接到命令,着其严防天津海口,以备俄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在宍户玘开始谈判琉球问题。10月底,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准日本人入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91]。这显然是日本在趁火打劫。而总理衙门的妥协,是企图避免两条战线作战。消息传出,清议立即反对。惇亲王奕谿则表示,为防止日俄勾结,宜照恭亲王所奏办理。朝廷征询李鸿章、刘坤一意见,李鸿章说,宜购铁甲、齐船械,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亦当为之稍平。至于球案,原定需要由御笔批准,3个月内换约。可视中俄交涉的消息,倘伊犁问题能在3个月内议结,就拒绝批准《中日通商条约》。^[92]刘坤一说,琉球臣中国,只假我声灵,琉球臣日本,实奉其号令。平日无端剥削,无故拘囚,一任日本所为,琉球未尝赴诉中国,中国也未尝过问。故一旦夷为郡县,而要中国强与之争,务使日本俯首听命,琉球扬眉吐气,又怎么可能?他主张琉球国王在南部诸岛重新立国。^[93]

3个月中,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交涉归还伊犁和修改《里

瓦基亚条约》取得进展。审批《中日通商条约》一事便被搁置起来。中俄交涉的主要成果,是中国以增付400万卢布的代价,收回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中国外交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曾纪泽因此获得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美誉。但人们很少从全面的角度去评估中国外交的得失。此后,中日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琉球问题的条约文件,中国也没有就琉球问题向日本采取进一步措施。随着岁月的流逝,具有极为重要战略地位的琉球群岛便被日本完全吞并了。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日益加剧,朝鲜成了国际政治力量冲突的重要舞台,日、俄、英、美诸国觊觎的一块肥肉。从历史传统上看,朝鲜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对外隔绝,欧洲人曾称其为“隐士之国”。为了保护朝鲜以屏御中国东北的安宁,总署建议,把与朝鲜公牍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的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李鸿章和驻日公使何如璋都主张采用向各国开放朝鲜门户的方法,施展“以夷治夷”的平衡政策,以避免朝鲜成为某个列强的独占物。1882年5月至7月,了汝昌奉李鸿章之命,两次率军舰护送道员马建忠前往朝鲜,协助朝鲜与美、英、德国分别签订通商条约。

日本从《江华条约》签订后,在朝鲜获得了许多不平等权利,并对朝鲜统治阶层进行拉拢渗透,引起朝鲜人民的愤怒。朝鲜国王李熙,1863年12岁时,以旁支人承大统,由其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14岁,李熙与闵氏女结婚。1873年,大院君归政。但李熙十分庸懦,大权落入闵妃手中。闵妃引带外戚势力参政,和大院君遂成对立,各树党羽。在外交政策上,大院君是坚定的“尊王攘夷”论者,主张闭关锁国,反对对外开放。闵氏集团则在外国压力和清政府的倡导下,寻求对外开放,但他们对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在对外交涉中丧失权益的情况知之甚详,对琉球最近被日

本并吞也很关注,所以对能否依靠清政府保护,对付日本、俄国等列强的覬覦心存疑问,甚至在不少官员中出现了媚日的倾向。使得朝鲜内部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

1882年7月23日,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暴动队伍冲入王宫,杀死闵氏集团大臣闵谦镐和大院君胞兄、国相李最应,捣毁达官显贵的住宅,袭击日本公使馆,杀害8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夤夜逃往仁川。24日,大院君被暴动群众迎入宫中,掌握政权。闵妃在乱兵涌入宫中时,化装成宫女逃往忠州,与朝鲜派在中国的使节金允植联系,敦请清政府出兵,而暴动者乃至许多大臣和大院君,都把一个为了保护王妃而服毒的宫女尸体误认作闵妃。这一事件,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从群众自发的反腐败、反暴政开始,迅速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开放、反日本的政治斗争,带有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党派斗争色彩。

中国在朝鲜向不设官,兵变的消息至8月1日才从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知。此时,李鸿章已回合肥奔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署理。兵变发生后,枢臣担心日本借机介入,一面急召李鸿章还津,一面飭令张树声派水陆两军迅赴朝鲜。北洋营务处道员马建忠先前方奉张树声之命,赴合肥向李鸿章言事,甫到上海,即接电谕,命其立即返回烟台,与丁汝昌率军舰东渡朝鲜。8月7日,丁汝昌抵达登州(蓬莱),与帮办山东军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商援朝鲜事,并转交张树声亲笔信。8日,马建忠到达烟台,吴长庆则率幕僚张謇赶往天津。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为淮军“庆军”首领,因早年派系原因,与江西巡抚刘秉璋走得较近,在淮系内独自立异,结交朝贵以为攀缘,罗致文人以通声气,而不为李鸿章所喜。此时虽官居广东水师提督,却并未到任,仍带所部,驻防山东。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6岁中秀才,23岁入吴长庆幕府,时年29岁。虽尚未显达,已是吴长庆的重要助手。9日,吴、张抵达天津,与张树声闭门密谈东征大计。马建忠、丁汝昌则带领“威远”、“超勇”、“扬威”3舰从烟台出动。此前,黎庶昌致

电国内,主张对日强硬,并在解决朝鲜危机后“由我主持国是”。张树声对此表示赞同。同日,在华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提出了拘捕大院君的方案。11日,吴长庆、张謇乘轮返回登州,发布开拔命令。

张树声、吴长庆决策的核心,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事变。张树声虽为淮系中除李鸿章以外最有影响的人物,也是李鸿章离任前自己选定的继任者。但从前述的李鸿章、张树声、张佩纶三角关系中,我们已能感觉到彼此间的微妙关系。张树声临时替代李鸿章做“看守总督”,直督衙门里全是李鸿章留下的旧人。他要在短短数月中崭露头角,壬午之变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在李鸿章幕中的袁保龄、马建忠都主张对日强硬,薛福成更强调吸取日占琉球的教训,吴长庆所部又驻扎在烟台附近,便于调动,所以这次出兵行动部署得极为迅速周密。

10日,中国分舰队抵达仁川时,日本的“金刚”舰已先期到港。经过考察,丁汝昌12日乘“威远”回津向张树声汇报局势,马建忠同“超勇”管带林泰曾、“扬威”管带邓世昌坚守仁川。十天中,日本向仁川增派了7艘军舰,1营陆军,形势日益紧张。18日,“超勇”、“扬威”移泊南阳浦口。20日,吴长庆、丁汝昌率庆军2营4哨2000人分乘“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5船衔尾而来。^[94]吴长庆幕中,除张謇之外,还有一个23岁的青年袁世凯。袁世凯,字慰亭,是袁甲三的从孙,袁保龄的侄子。去年到登州投军,帮办庆军营务处。他于次日黎明,率500人赶往汉城,吴长庆也带大军随后出发。26日,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在汉城设计扣留大院君,由丁汝昌护送,冒雨夜行120里,次日清晨抵达南阳,登上“登瀛洲”舰,直送天津,^[95]旋幽于保定。

早在清军发兵之前,清政府即根据金允植的说法,把兵变的祸首推定为大院君,此说是否确有依据令人怀疑,把亲华排日的大院君说成是亲日派更是个错误。但大院君入宫后,乘机扩充势力,将其带走,显然可以保证清政府在朝鲜继续推行对列强均等开放的政策,也以此救平事端,防止日本的介入。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二

次直接参与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斗争，也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行动。事定之后，吴长庆部暂留朝鲜，袁世凯更是在朝鲜度过了漫长的12年。朝廷在平定壬午兵变中体会到海军的快速机动作用，甚为满意，以李鸿章创办有功，交部从优议叙。

朝鲜事变平定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小京官都大为兴奋，尤其是平常不满意李鸿章者，咸以为假使李鸿章不丁忧，办理此案，决不能如此迅速。这当然是一种揣测。8月13日李鸿章给张树声的信中讨论处理朝鲜方案，谓“先令马、丁二君带兵船速往，少作声势，帮同朝鲜君臣弹压缉拏魁首，一面商劝日本员将，勿遽动兵，静候缉匪……至调派陆军，尤须妥筹，由陆则道路阻长雨水多滞，转运费艰；由水则兵船装载无多，商船租雇费力。或可号称陆军继至，先声后实，俟眉叔（马建忠）等到彼察看情势再行稟办。计张虚声则护卫亲兵两营小队可矣；若大举有战事惟铭军在后路可调。统将勇疏于谋，似须添派稍有智略如吴殿元辈会同照料，庶冀操纵合宜。……鄙见商办得法，可无战事，仍是上年台湾成样耳。兵难喻度，英雄所见想亦大略相同。”此时李鸿章并不详知前方形势，所做安排，则与张树声大同小异，只是所调部队，不是吴长庆部。而日本此时军备未兴，显然也是清军能在处理壬午兵变时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

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阻止日本对朝鲜的干预介入，强化在朝的宗主权。但在随后的朝日谈判中，却没有正确指导外交斗争，致使日本在8月30日即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朝鲜向日本赔偿损失费55万元，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兵，并开放通商口岸。此时，中国海陆大军云集仁川、汉城，在取得战略主动的情况下，居然默认日本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海外驻兵权，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祸根，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败。

朝鲜事态给李鸿章马上返回天津创造了机会。他在同一封信中告诉张树声：“今中旨叠催，而前咨王夔翁（王文韶）文内原有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即赴津筹办之语。朝日纷争，虽未足云警报，究于海防微有关系。明知大才筹画，悉合机宜，即鸿章前去亦断无

所增益。圣意殷盼，岂敢漠视，自食前言？……粤中人来，谓沅帅（曾国荃）五月二十四日由湘登舟，忽病发而止。果尔则执事回任两粤固在意中。若无意南行，而鸿章被诏迫趣，终不免此行，只可专办通商，奉屈台旆驻省经理直督事宜，兄必力为筹助，无分畛域。服制期内，无再握畿篆之理。”^[96]此信意思十分明白，朝廷夺情，我李鸿章即将回任。曾国荃奉旨署理你的两广总督，现在看来因病不去了，你回广东应无问题。如果你不愿南下，则我俩合作，我署理北洋大臣，你署理直隶总督，如何？官场之中，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无处不透露着凛然的霸气，自然，这也显示出李鸿章在淮系中的盟主地位。

张树声在处理壬午之变中是得了分的。张謇在朝鲜时，撰“朝鲜善后六策”，向其建言。大意包括：或援汉例，将朝鲜废为郡县；或援周例，在朝鲜设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本，则三道出师，归复琉球。^[97]旋因李鸿章回到天津，嗤为多事，搁置不议。而张华奎却又将其早早携至北京，交五六清流密友传观。一时流传都下，潘祖荫、翁同龢咸以为善，宝廷、邓承修等人还专折上奏，连慈禧太后都引起关注，转询之李鸿章。^[98]在李鸿章看来，此事显然是张树声、吴长庆联手自立山头的又一举措，私下暗作防范置，欲将庆军改属马建忠节制，而令吴长庆回津待命。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愤不平，力劝吴长庆引退，并请其上奏解除本职住京。吴长庆开始同意，这就势必演化成与李鸿章的公开决裂，后经袁保龄、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没有实行。^[99]到1884年春，李鸿章又以越南形势紧张，复将吴长庆赴朝庆军6营一析为二，命吴长庆带正营3营回奉天金州一带驻防，留副营3营由吴兆有统带，继续驻防朝鲜；同时札委袁世凯办理该部营务处。吴兆有才能平庸，这为袁世凯后来乘势崛起创造了机会。袁世凯从此直接投靠李鸿章，一切更革，颇让吴长庆难堪。张謇为此特地写信痛斥袁世凯，此后，张謇与袁世凯20年不通音信。^[100]

1884年7月13日和10月26日，吴长庆和张树声分别病逝于

金州和广州。

四、炮艇、巡洋舰和铁甲船

“李-阿舰队事件”过去后的10余年里，朝野很少有人再提购买外国军舰，中国造船工业应运发展起来。由于国产军舰在舰型和作战性能上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产物，造舰所需的主要原料、设备、炮械等又依赖国外，所以到了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沈葆楨再次提出进口外国军舰，并命其法籍顾问日意格直接写信给英国公使威妥玛探询。总理衙门也派赫德及总署大臣董恂、崇厚与威妥玛接洽。威妥玛对此表示赞同，并致电英国外交部，力陈此事关系重要。但英政府以中日已经开战，英方也已经拒绝日本购舰为由，予以婉辞。10月底，中日签订《北京专条》后，李鸿章即派英人比德曼会见威妥玛，商谈购舰。威妥玛高度重视李鸿章的这种姿态，特派使馆汉文正使梅辉立前往天津拜访。新一轮的购舰计划在南北洋海防大讨论的热烈气氛中，开始悄悄地酝酿起来了。

积极为中国购舰出谋献策的，正是当年建议设立火轮船队以镇压太平天国，后来反因“李-阿舰队事件”而擢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推荐英国新制的炮艇，称其为攻守利器。总理衙门命李鸿章办理此事。赫德为此前往天津，多次讨论。

其实，无论是李鸿章还是赫德，对于军舰都不在行。赫德主要依靠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在国外收集信息，并同制造厂商保持接触。金登干推荐的这种被西方造船界称为“伦道尔”式炮艇的小型军舰，因其设计师伦道尔得名。它的首舰“坚定”号（Staunch），1867年12月下水。薛福成在1881年春写的《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中提到的师丹式炮船，指的就是它。其特点是在很小的舰体上装载巨炮，所以又称“蚊子船”。“坚定”号排水量180吨，装有1门9英寸口径的巨炮。^[101]这种设计思想在后来进一步发展，金登干向中国政府通报的，就有排水量260吨、载有10

英寸径 18 吨重大炮,排水量 320 吨,载有 11 英寸径 26.5 吨重大炮,排水量 440 吨,载有 12 英寸径 38 吨重大炮和排水量 1300 吨、载有 16 英寸径 80 吨重大炮的炮艇数种。^[102]李鸿章经与赫德磋商,决定购买 320 吨、440 吨炮艇各 2 艘。前者造价为每艘 23000 镑,后者造价为 33400 镑,分别合银 76659 两和 111322 两。此外运费 65940 两,总预算为 45 万两。^[103]这批船由设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包建造任务,阿姆斯特朗是一家从铸铁厂转型为生产军火和液压机械的英国公司,在火炮和液压技术方面,有领先的水平。1875 年春,李、赫议定购艇章程,中国近代大规模购买外国军舰的浪潮由此掀起。

1876 年 6 月 24 日,被英国人按希腊文字母顺序排列为“阿尔法”、“贝塔”号的二艘 320 吨炮艇,悬挂英国旗帜,由前皇家海军舰长勒·普里曼达吉和汉密尔顿驾驶,驶上了开往中国的遥远航程。如此之小的炮艇在茫茫大洋中,犹如两片树叶,上下颠簸、历尽周折,缓缓行驶了近 5 个月,终于驶抵大沽口。11 月 27 日,李鸿章偕同赫德前去验收。他对这洋玩艺儿表示满意,向朝廷报告说“所有炮位、轮机、器具等件均属精致灵捷”,决定将其命名为“龙骧”、“虎威”号,派船政学堂毕业生张成、邱宝仁担任管驾。又命张、邱会同来华的英国官兵将炮艇驶至福州船政局,募选管轮、管炮、舵勇、水手。为了便于训练,还决定每艇暂留 3 名英国教习。^[104]这次视察中发生了一起事故:一名英国水兵的来复枪走火,子弹从李鸿章头上飞过。而此时李鸿章幸亏坐着,否则中国近代历史的内容完全可能重写。

翌年春,440 吨炮艇“伽玛”、“德尔塔”号完工,金登干邀请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前去参观送行。郭嵩焘还亲手发射了大炮。然后,由英国军官琅威理和劳伦斯驾驶来华,被命名为“飞霆”、“策电”号。

“龙骧”等 4 艇引起南洋大臣沈葆楨、福建巡抚丁日昌的羡慕。沈葆楨致函李鸿章,请求分拨。丁日昌也主张进一步购买。在此之前,福建善后局已通过瑞生洋行在英国莱尔德公司购买了

“福胜”、“建胜”两艘炮艇,其实就是仿造“坚定”型的。但丁日昌认为“龙”、“虎”胜于福建所购蚊船不啻十倍。经总理衙门同意,决定请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通过海关总理文案税务司、赫德内弟裴式楷致电回国休假的赫德及金登干,征询价格有无变化。旋接金登干报告,四艘440吨炮艇的造价为13万镑,合银45万两。运艇回国及购买弹药,另需加银16万两。^[105]国内决定购买。到1879年8月,“埃普西隆”、“基塔”、“爱塔”、“西塔”四艇已经驶出埃尔斯威克工厂的船台,停泊在朴茨茅斯港了。11月,四艇抵达大沽,沈葆楨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西”、“镇东”。四“镇”原系应南洋需要而购,李鸿章却将其留下,而把已在北洋使用数年,船底铁板已经锈蚀,机器零件也有松损的“龙”、“虎”、“霆”、“电”送往上海修理洗刮,然后划给南洋使用。“龙骧”等四艇由沈有恒、许寿山、陈锦荣、何心川管带,放洋南下,从此划入南洋序列。

最早向李鸿章批评蚊炮船的是刘步蟾。他在向船政局提调吴仲翔呈交的《西洋兵船炮台操法略论》中,指出“蚊子船利于攻人,而无能自卫,只可用于守港”。吴仲翔立即将该文呈报李鸿章。李鸿章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物,经过观察,他也发现“蚊子船炮大船小舢浅底平,西国用为守港利器,行驶既缓,风浪宜避,只能在海口及沿岸浅水处追逐接战,似不宜于大洋。赫德因其船既由英国前来,自亦可施之海战,不知其涉历重洋须半年之久,无风与风小则行,风大则止,较之各项商船兵船不畏风浪行四十余日抵华者,大有径庭。若恃为洋面制敌之具,未必确有把握”。^[106]但他却继续呼风唤雨,制造舆论。他上奏折说:“蚊子船防守海岸最为得力,赫德所购,尤为各国罕有之新式”。建议广东、台湾至少各购2艘,宁波、烟台海口至少各购1艘,并“请敕下各该督抚臣,先其所急,迅速照议筹办,不准藉词委婉”。又说赫德解释蚊炮能制铁甲是专指日本铁甲而言,赫德指责中国人批评蚊炮船行驶慢,是中国人驾驶水平的问题。即使不能追赶铁甲舰,也可在海面拦截。^[107]

半个月后,皇帝下谕,命各该督抚迅速筹办,于是一场购买炮

艇的旋风便迅速席卷沿海省份。闽浙总督何璟说,尽管福州两遭水灾,库储如洗,但闽省密迩东洋,海防吃重,所以要在无可匀拨中,极力筹措款项。山东巡抚周恒祺说,山东早已委托李鸿章购买。两广总督刘坤一先是准备自行制造,不久他调任江督,继任的张树声立即决定订购1艘。浙江也表示了购艇意向。于是李鸿章转托赫德,在英国购买了第三批3艘炮艇。其中两艇归山东,命名为“镇中”、“镇边”,后来归入北洋海军序列,一艇归广东,取名“海镜清”。福建的购舰计划则发生变化,资金全被李鸿章挪去购买铁甲舰了。

明知已经吃亏,为了保证继续购舰的政治方针,壮大“海防”集团的声势,李鸿章不图收缩,反而出击,玩弄权术可谓阴柔老到。真是善算者无筹,善行者无辙,把“将欲歛之,必固张之”的谋略耍得天衣无缝。对于洋务派来说,这种政治手腕却是必需的。

后来,各地的洋务派官员对李鸿章所购炮艇颇有批评,所谈内容其实同李鸿章的观察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再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多以为蚊炮船是洋鬼子用来诈骗中国银帑而滥制的冒牌货,其实这并没有根据。“龙骧”、“虎威”长118英尺6英寸,宽27英尺,吃水7英尺6英寸,“飞霆”、“策电”长120英尺,宽30英尺,吃水8英尺。六“镇”长127英尺,宽29英尺,吃水9英尺6英寸。各艇长宽比在4~4.4左右,快速性较差。宽度吃水比在3~3.75左右,稳性好而阻力相当大。从舰体设计看,是不适宜于海上作战的。排水量小,却装着前膛巨炮。由于炮身不能转动,射击时靠调整艇身来瞄准目标。设计这种军舰的目的,是想作为水上炮台,就是用建造1艘铁甲舰的费用,建造10艘炮艇,在港口防御时与陆路炮台机动配合,击退敌人的进攻。克里米亚战争的经验证明,那些巨大固定的昂贵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船绕开。当时鱼雷还未被正式使用,水雷也只能在狭长水域中起作用,面对宽阔的海岸线,防守确实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所以伦道尔的方案得到了英国海军部的首肯。在战舰如云的不列颠,军舰分工细密,发明几百吨小艇作浮动炮台,本来不失为一种设想。1879年8月“镇北”等炮艇

出现于朴茨茅斯港时,《泰晤士报》曾作高度评价,认为其舰载火炮的穿透力,超过目前英国海军所拥有的最可怖的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15%，“中国人作此突然的冒险的一跳,已经跳到我们前面去了”。^[108] 这年,英俄间因争夺土耳其矛盾加剧,英国虑其大型军舰调来远东前即与俄国开战,曾密商李鸿章,准备借购“龙骧”等四艇,说明英国对这种军舰是很重视的。英国政府先后订购了26艘伦道尔式炮艇。此外的定单还包括:荷兰30艘,阿根廷、澳洲、意大利各4艘,丹麦5艘,希腊3艘,挪威8艘,俄国13艘,瑞典10艘。国外船史研究者认为,1876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的“金瓯”号军舰,其实也是一艘伦道尔式炮艇。^[109] 当时,国外对此种军舰尚在研制阶段,它的弊病是在以后使用中逐步显露出来的。但伦道尔式炮艇在世界军舰史上仍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当今的各种炮艇和导弹快艇便是它生命力的一种延续。问题在于,李鸿章开始迷信赫德的吹嘘,把它称为“攻守利器”,后来觉察了缺陷,但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仍向各省推荐。各省督抚对船学炮说同样一窍不通,也盲目跟着购买,结果在这场购舰热潮中,先后购买11艘,耗银150万两,及至使用,才发现与心中所想的外国巨舰目标相差甚远。尤其是金登干所谓“铁甲舰已经过时”的论断更是言之过早,中国海军所需要的,仍然是能与外国坚船利炮进行对决的大型军舰,而蚊炮船显然过于单薄古怪,并不能与铁甲舰角逐,这使得花费了巨款的官员们感到沮丧。这里最大的教训,是洋务派缺乏近代舰船知识,所费不赀,吃亏不浅,购舰活动尚处在探索之中。

1881年8月3日,英国纽卡斯尔港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下午,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在这里举行中国巡洋舰“超勇”、“扬威”的升旗仪式。在200多名中国水师官兵和30多位英国官员、制造商及女眷们的注视下,曾纪泽把中国龙旗冉冉升上了军舰的桅杆。水兵们鸣放了礼炮。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自从1862年总理衙门奏定中国国旗为中画飞龙戏珠图案的

黄色三角旗后,这面旗帜只在中国沿海和东亚、东南亚地区航行过,现在却在英国本土高高飘扬。原先中国订制英国军舰,都雇请英国官兵升英国旗驾驶来华交接。这次派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及英国总教习葛雷森,教习章斯敦率领 200 多名官兵前往英国接船,也是一个空前的壮举。所以,纽卡斯尔市议会决定在丁汝昌率军舰离开之前,向他致送一份祝辞。两周后(8月17日),“超勇”、“扬威”启程回国,这更是中国人驾驶中国军舰,悬挂着龙旗,首次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途经各国均鸣礼炮致贺,始知中国也有海军,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110]

订购“超勇”、“扬威”的主意也是赫德提出的。早在两年前的夏天,金登干就告诉他,时下海军界的意见和火炮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对铁甲舰不利。阿姆斯特朗公司已设计出新式的非装甲巡洋舰。金登干说,这种巡洋舰将被证明比现存的各种巡洋舰优越,如被中国政府选用,“您将再一次在海军科学方面居于领先地位”。^[111]这番话,对于赫德显然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他从此到处鼓吹铁甲舰靡费无用,劝阻中国不要购买。到了年底,当四“镇”驶抵大沽时,赫德专程前往天津接船。他向李鸿章推荐了阿姆斯特朗公司新制巡洋舰的图样,介绍这种军舰“可保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所以当时又译称“快碰船”,两艘造价 65 万两。李鸿章经向驻天津的法国海军军官咨询后,通过赫德电饬金登干购办。两舰排水量 1350 吨,马力 2400 匹,前后主炮口径为 10 英寸。李鸿章将其特点归纳为三条:船小、炮大、行速。“船小则价不甚昂,炮大则能御铁甲,行速则易于进退”。^[112]然而经过使用,发现军舰前后主炮过大,遇风颠簸,难于取准。初次巡海,尚能达 15~16 节,久则滞涩,仅驶 12~13 节。章斯敦干脆说这两条巡洋舰是骗人的东西,中国政府常常受人欺骗,他们将会感到非常失望。^[113]

丁汝昌 1880 年底偕葛雷森先期出国,照料造舰有关事项并在欧洲考察。邓世昌、章斯敦则率领官兵在吴淞操练,至次年乘招商

局轮船“海琛”号出洋。英国之行,使年轻的中国海军军人大开眼界。之前丁汝昌从未到过欧洲,邓世昌由于学业卓著,较早带船,失去了留学深造的机会。此行使他们弥补了对西方国家的感性了解,对于欧洲海军,有了一个直观的、近距离的观察机会。

“超”、“扬”回国途中经历了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超勇”得讯后前去寻找接济。在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至10月15日,两舰顺利抵达香港,历时61天。因接船有功,朝廷赏林泰曾果勇巴图鲁勇号,以参将补用;邓世昌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

1883年,左宗棠仿效北洋,在德国为南洋订购了巡洋舰“南琛”、“南瑞”号。两舰排水量1905吨,马力2800匹,时速13节。装备8英寸口径炮4门,4.7英寸口径炮4门。

赫德积极向清政府建议购买军舰是有其用意的。如果说在1874年他还囿于“李-阿舰队事件”的余悸而小心翼翼,尽量不露痕迹的话,到了1879年从英国休假返回中国后就直言不讳了。他在提议李鸿章购买“超”、“扬”两舰的同时,积极活动谋求插足中国海军。他向总理衙门建议说,南北洋只需各购2艘巡洋舰、8艘蚊炮船便可成军,反对购买铁甲舰。又说聘用的外国教习没有实权,必须派他担任总海防司。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计划:

可能组成两支舰队,每队由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协同一位海防司(正如一位海关税务司协同一位道台那样)领导。这两位海防司就是那两艘海防舰的舰长。他们在海防司所管辖的一个新衙门当差。这个大概将要设置的新衙门称作海防总署。我的官衔简称为总海防司。我的上司是总理衙门和负责海岸防务的总督(两位)。这项计划现已上奏皇上和交军机处审议,非常可能获得批准。^[114]

在所拟的总海防司章程中,他更规定用人、支饷、造械诸事,皆由他一人主持,南北洋大臣不得侵越,显然想把总海防司变为第二

个海关。此时俄侵伊犁、日并琉球，南北洋海防却进展缓慢，总理衙门急不择路，准备同意赫德的建议。李鸿章办理海防多年，成效未显，也想借助洋人的力量。他研究了赫德章程后写信对恭亲王说，这个文件“诚如尊谕，不免揽权，而欲令办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权也。惟既设海防大臣，又添派督办监司大员，亦不可全置不问，太阿倒持。谨就鄙见所及，于稍可迁就处概不置议，以免掣肘；于必须参酌申明之处，粘签呈核应否酌量增改，再行具奏”。^[115]沈葆楨则对赫德能否为我所用表示怀疑。他说：赫德所反复叮咛、再三致意者，在一权字。总署所十分慎重、难于立断者，亦在一权字。天下无权固不能办事，但真给赫德大权则实误我之事。他还以赫德以前推荐购买蚊子船、快碰船的例子，质疑赫德的海军常识。^[116]

这时，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写了《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剖陈理由，坚决反对任用赫德。薛福成，字叔耘，号庸盒，江苏无锡人。早年充曾国藩幕僚，后又随李鸿章办外交，是个有思想、通时务的人物。他指出，赫德虽长于理财，但“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尚且划分界域，而赫德独综其全；南北洋所派监司大员仅获列席会办，而赫德独筦其政；彼将朝建一议、暮陈一策以眩总理衙门，既藉总理衙门之权牵制南北洋，复藉南北洋海防之权牵制总理衙门，南北洋不能难也，总理衙门不敢违也。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也”。

薛福成还向李鸿章献计，如果总理衙门与赫德已有定义，不能中止，则可告诉赫德，总海防司必须亲赴海滨专司练兵，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则应由别人担任。他断定赫德贪恋利权，决不肯舍此就彼，这样其议也就不罢而罢了。

据薛福成记载，李鸿章接到这一建议后，踌躇数日。赫德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自己也实在不愿赫德分去权柄。最后，撮举要

言,函告总理衙门。赫德的总海防司之梦,终于落空。^[117]

赫德以了解西方坚船利炮行情炫耀于清政府,把向国外订购船炮看成是自己的禁脔。丁日昌曾委托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出洋时探询阿姆斯特朗公司蚊炮船价格,赫德获悉后大为不满,指责中国有人猜忌他。他指示金登干,订购快艇不要让郭嵩焘或李凤苞插手。金登干也公然以未接到赫德的通知,拒绝李凤苞和徐建寅去纽卡斯尔察看“超勇”、“扬威”等舰的情况。取消总海防司之议后,李鸿章不再托其购舰。同时,阿姆斯特朗公司也派退役少校布里奇福德到中国,作为该公司的代理。这样,反倒促使中国官员摆脱金登干的干预,直接探索与外国厂商订购军舰的途径。这些年份,正是世界海军急剧发展的时刻,炮艇、鱼雷艇、巡洋舰、装甲巡洋舰、铁甲舰等舰种都随着科技和制造业的发展而走向成熟。通过数年努力,中国最早一批熟悉军舰知识的外交人员开始成熟起来。

订购铁甲舰是洋务活动家议论已久的话题。

1875年,朝廷在任命沈葆楨、李鸿章办理南北洋海防的上谕中,批准购置一二艘铁甲舰,于是购舰之议在沈、李及丁日昌等人的书牍奏章中屡被提及。标榜“海防”、“自强”的洋务派,在购买铁甲舰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

沈葆楨、丁日昌主张迅速购船,由于南洋依靠福建、江南两局所造的十几艘军舰,已初具舰队规模。再添上铁甲舰,实力必将大增。北洋根底薄弱,即使购得一艘铁甲舰,也依然不能成军,反倒可能并入南洋。因此,李鸿章竭力阻挠购买铁甲舰的计划。他一面以无款、无人驾驶、无坞修理、无港停泊乃至国外亦将停造铁甲舰等理由搪塞沈葆楨等人,并以“南北洋面万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艘,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人所攫,转贻笑于天下”,^[118]讽喻南洋购船不可行;一面又不断根据赫德的推荐,大购蚊炮船和快碰船。至于他自己,则从未忘记购办铁甲舰对加强北洋海军实力的重要性,一直委托李凤苞在

国外为他打听行情。

早在1877年2月初,李鸿章从赫德来信中便得知土耳其在英国订造了二艘铁甲舰,现欲转卖出手,每艘出价合银80万两。从此这二艘军舰成了李鸿章手中的筹码,根据他的需要,在他手中随心所欲地翻动。

土耳其铁甲舰一名“柏尔来”号、一名“奥利恩”号,皆属较老式的“船腰炮房”式铁甲舰,排水量4830吨,马力3900匹,航速13节,装有4门8英寸口径大炮。李凤苞、日意格、金登干先后同土耳其领事接洽转购事宜,李凤苞认为,该舰式样陈旧,火炮较小,且无蒸汽自助装填弹药的功能,土耳其目前仍在英国订购军舰,显然不是缺钱才不要这两艘军舰。李鸿章并不急于购舰,就将此事搁置下来。当时英俄关系紧张,英国海军恐俄国从土耳其转购,便将两舰购下。以后,沈葆楨向李鸿章提出,土舰既不合用,可以另订新式,但李鸿章依然虚与委蛇,引而不发。

1879年秋,北洋筹得百余万两银子,拟单独购买一艘铁甲舰。为了在南北洋间保持均势,恭亲王想稍稍抑制北洋而扶持一下南洋。他上奏称南洋所缉洋面较北洋尤宽,经费却所拨无多,当“稍为裒益”,并以北洋铁甲舰专顾一口质疑李鸿章。^[119]李鸿章更是老谋深算,他立即取消已经准备的购买铁甲舰计划,改购“超勇”、“扬威”两舰。这是李鸿章有钱不愿让南洋分沾,宁愿购买不甚先进军舰的明显事例。以致沈葆楨极为失望,对丁日昌大发牢骚:“铁甲船事,弟进言于伯相者,不可以次数计,亦自厌其烦数,无如其不可以已也。”^[120]

这年年底,沈葆楨去世。临终前他口授遗疏说:“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愚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121]生前没能看到飘扬着龙旗的铁甲舰,是沈葆楨的遗憾。此后,俄国因伊犁问题,向中国调派舰队,李鸿章购买铁甲舰的行动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李凤苞报告说,英国愿意转售土耳其铁甲舰,两舰价格涨到543380镑,合银计

200万两。李鸿章仍颇为冲动,迭称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殊属可惜。在他力争下,朝廷同意购买。于是李鸿章指令李凤苞同英国海军部谈判。1880年5月13日,李凤苞报告说:“英海部易人,旧执政所允二铁甲均作罢论。”理由是“当此中俄交涉吃紧之时,新闻纸议论纷纷。英国家碍于公法,不能再践前言”。请示是否另行订造?李鸿章立即回电:“如所议无成,即查照新式,在英厂订造铁甲二只。”曾纪泽反对购买铁甲舰,担心此举会影响中俄伊犁交涉。李鸿章嘱咐李凤苞“坚持定见,毅然任之”。^[122]经过李凤苞、徐建寅在欧洲反复考察,于同年12月2日,选择德国伏耳铿船厂订造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这项订货,赫德直至次年1月下旬才刚刚知晓。接着,英商和法商积极活动,谋求获得第二艘的订单,但因索价太巨,李凤苞于次年夏天依然选择伏厂,订制了第二艘铁甲舰“镇远”号。李鸿章本来计划购买4艘铁甲舰,但后二舰因经费原因终没能购买。

李凤苞,字海客,号丹崖,1834年生于江苏崇明。他自幼聪颖,遍览群书,兴趣广泛,对自然科学广有涉猎。同治初年在编制江苏舆图时,为丁日昌赏识,旋介绍给曾国藩,调至江南制造局。在工作中学习了英语,参与译书馆许多西方科技军事著作的翻译。他靠捐资得候选道。1875年,他与李鸿章在天津初次相见,以渊博的学识给李鸿章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年后,出任海军留学生监督,1878年被任命为署理出使德国大臣,次年实授。

徐建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1845年生。他是著名科学家徐寿之子,早年也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同华蘅芳、李凤苞等人翻译西书,后调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任职,1879年10月被任命为驻德国使馆二等参赞。出国前,李鸿章特地嘱咐他在英、德留心铁甲舰的各种情况。

李鸿章对于西方铁甲舰的了解十分有限,他提出的要求,仅是式新价廉、吃水在20英尺以内,以适应中国港口水深等几条最简单的原则。李凤苞、徐建寅以前翻译过《行海要求》、《克虏伯炮说》、《造船全书》、英国《海军章程》,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

方的佼佼者。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和海军、造船理论均有一定的基础。官方身份和出使欧洲的有利地位,都能使他们绕开赫德的束缚限制,独立地按照本国要求,在国际市场上选购先进军事装备。“定”、“镇”两舰的设计,就是他们在英、法、德国考察了几十条铁甲舰,同英、德等国海军部反复研究后,综合英舰“英弗来息白”号和德舰“萨克森”号的长处而成。徐建寅曾说:“现在中国拟造之船,议仿‘英弗来息白’及‘萨克森’之制,集两者之长,去两者之弊……如此经营,似可列子当今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123]李凤苞则对葛雷森说,这是他本人几天几夜冥思苦想的结果。

“英弗来息白”号是英国人巴纳贝设计,1876年下水的铁甲舰,排水量11800吨,装有4门口径16英寸的前膛巨炮,据称是英国式最新、甲最厚、炮最大的“铁甲堡”式战舰。它与当时通行的“水线带”式铁甲舰敷甲部位不同,舍去水线装甲,将主机舱外长110英尺,宽75英尺一圈用装甲防护起来,水线下装甲厚16英寸,水线上装甲厚20~24英寸。在铁甲堡之外的艏、艉部安设装甲甲板,前后延伸30~40英尺,并向下倾斜,有力地支撑住船艏冲角。火炮采用旋转炮塔,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进步,且对角布局,可以使前后主炮同时射击,火力极猛。^[124]这种军舰的特点,是减少了包裹舰身的装甲重量,使舰体更为轻捷,相应也降低了造价。但旋转炮塔的装甲厚达16英寸,成本过高,旋机繁重,弹着旋缝,炮即碍射,^[125]加上空气不畅,药气密切,炮管升降受炮塔口限制,所以仍有不少未善之处。

“萨克森”号竣工于1874年,是德国当时最大最新的铁甲堡式铁甲舰,排水量7400吨,马力5600匹,航速14节。炮塔采用“露台旋炮”式,炮塔外用装甲环绕,本身不动,塔内之炮却能自动旋转。没有炮罩,较为灵便,又能避免旋转炮塔转动机构容易被敌击毁的弊病。缺点是炮多回不大(前台2炮,后台4炮,口径均260毫米),特别是后台,“倘一弹入台,则四炮之人皆将受伤”,^[126]对于实战颇为不利。

“定”、“镇”的主要技术参数为: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

米,排水量 7335 吨,航速 14.5 节。^[127]在设计中,集中了“英”、“萨”两舰的优点。如舰体主要仿照“萨”舰,炮台对角布局,则是吸收了“英”舰的特点,射击扇面较大,正向射击火力极猛。且从船舳移至前面,留出位置布置了二艘舰载鱼雷艇。装甲防护,采用“铁甲堡”式。船中腰用复合装甲环绕为堡,堡长 43.5 米。水线下甲厚 12 英寸,水线上甲厚 14 英寸。机器舱、弹药舱均在堡内。火力配置上,两个炮台各有双联装 305 毫米口径巨炮。艏艉各置 150 毫米口径炮 1 门。此外还有 3 英寸口径炮 4 门,5 管机关炮 10 门;船头左右及船尾共设鱼雷管 3 具。军舰动力装置,采用 2 台复合平卧式蒸汽机,6000 匹马力。舱内还设淡水柜 20 具,其制淡水机器每日可供 300 人食用。舰体内部结构,设双层船底和水密隔舱,军舰偶有触损,水也不能通灌。由于两船订制相隔一年,市场上钢价陡涨,价格有所上升。而装甲、装备却有细微不同;“定远”装甲全为钢面铁甲,舰上设有发电机 3 座;“镇远”水线下参用熟铁甲,发电机只设 2 座。^[128]李鸿章认为,两舰在德国订购,监工可在一处兼办,李凤苞可就近稽查,且一切细节无须重复驳论,故“所省实多”。

总的说来,“定”、“镇”两舰在当时堪称相当先进的军舰。虽说它们的装甲、吨位、航速、火炮口径尚不能属世界之最,但在远东却是无与匹敌。众所周知,英国是传统海军国家,德国则是刚崛起的资本主义新秀。李凤苞等最后选择在德国购舰,经济上的考虑是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为购买这两艘军舰,付出近 340 万两白银(约合 80 余万英镑)。倘若订购更为先进的英国军舰,财政负担就更沉重。^[129]

两舰订购后,英国拒绝向德国出口复合装甲,于是德国自行制造。清廷派首批留欧学习海军的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前往监造,并派管轮学生陈麟清带领匠首黄戴、陈和庆等十人到德随同实习。徐建寅回国后反映,“此辈虽谙西学,习气颇深,实未能事事考校”。李鸿章为此致函李凤苞说,徐氏“与陈季同、魏瀚等固未浹洽,而所论恐非无因。鄙人于铁舰一事独力提倡,筹款极艰,将来

若造不如法,议者必将蜂起,此私衷所尤兢兢者,乞执事随时督同各监工等,认真考校,勿任嬉游敷衍,蒙蔽草率,免贻后悔,是为至要!该学生等虽相从多年,切不可信之太深,不加督责也”。^[130]

此后,李鸿章又从国内派遣刘步蟾前往德国,准备学习接带“定远”。李凤苞曾在信中向李鸿章称赞刘步蟾,但又转述日意格的看法,认为刘“明敏而轻躁,恐易僨事”。李鸿章表示,刘步蟾“隶北洋数年,屡经严切教诫,近稍谨饬”。“该生轻躁诚所不免,晤时望加训迪”。^[131]

1883年,赫德又先后向李鸿章递呈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快碰船和加大快碰船图说。李鸿章将图说转寄李凤苞。李凤苞经与德国海军部讨论,认定赫德之船的前者“一遇风浪则炮难取准,偶受小炮即船已洞穿,徒欲击敌而不能防敌击,终不足恃”;后者价格过于昂贵。李鸿章遂决定在德国订购一艘新近流行的装甲甲板巡洋舰,这艘军舰排水量2300吨,马力2800匹,航速15节。火力系统包括1座双联装210毫米口径前主炮,1座150毫米口径后主炮,4具鱼雷发射管。载煤270吨,以每天用煤30吨计算,可供9天连续航行。^[132]该舰后来命名为“济远”号。

五、海防经费的收支

从1876年8月起,在世界的另一端,恩格斯开始撰写他的名著《反杜林论》。他在书中写道:“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总之,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33]

国防力量的对比,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水平的对比,是经济实

力的对比。工业落后的国家,可以依靠进口,把本国军队装备维持到一个较高水平,军火生意从来就是赚钱的大买卖。然而金钱财富的积累,却同经济结构、生产规模、资源状况、财政收入来源直接关联。这就注定了国防发展必须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

清廷决定采用南北洋并举建设海防的方案后,碰到的首要问题便是经费。清朝后期,朝廷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杂赋、租息、粮折、耗羨、盐课、常税、漕折、漕项等方面,以及新增的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续完、捐输、完缴、节扣,总计岁入近8000万两。常例开支,包括陵寝、交进银两、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廩膳、赏恤、修缮、河工、采买、织造、公廉、杂支,新增项目有营勇饷需、关局经费、洋款还借、息款,以补支、预支、批解排比核列,年支7000余万两。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朝廷耗资巨万,西北边陲用兵,也是用费浩瀚。所以当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后,感到最棘手的便是经费。他上奏说“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旁皇无措,展布何从?”又给总理衙门写信,表示北洋欲创设海军,非千万两预算不能集事。“从何开办,惟有静候卓裁”。^[134]

不久,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和厘金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所谓洋税,即海关税,向分六成和四成。60%用于户部所指定的各项常年开支,40%上缴户部,转入中央财政封存,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事实上,四成洋税这些年或提拨陕、黔、淮等军月饷,或留充机器局经费,有些并非紧要用款也在其中随便挪用。所谓厘金,是从生产运销日用必需品中抽收1%税款,称作“抽厘”,本是镇压太平天国时的临时筹款手段,后来也成了一项正税。厘金又分盐斤、百货、洋药三项,其中仅货厘每年即进款一千数百万两,实为大宗财源。

恭亲王具体计划,除津海关、东海关应提四成洋税及江海关四成洋款内扣除二成,拨充机器局经费依然不变外,镇江、九江、江汉三关应提四成洋税仍解户部存储;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台湾沪尾、打狗两口应提四成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总计

约二百数十万两,全部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楨兑收应用。江苏、浙江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 40 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 30 万两,总计 200 万两,亦拨南北洋海防大臣使用。两项合计,海防经费每年共达 400 余万两,^[135]实在是笔不小的款项,可见朝廷巩固海防的决心。

方案甫定,李鸿章即函沈葆楨,要求将拨款先解北洋。沈葆楨以北洋海防基础薄弱,应当尽力创办。他接任两江总督后,也向李鸿章表示:“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固不难于推广。”^[136]咨明各省关将款尽解北洋。然而不久李鸿章向沈葆楨抱怨:“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拨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137]接着,总理衙门和户部又议奏,从光绪二年七月第二个财政年度起,将关税中本解南北洋之款,以一半批解海防大臣,一半委解户部,陆续归还部拨西征饷银 200 万两。^[138]这样,每年拨款减去 100 万两。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两个财政年度里,各省关应解海防军费为 700 万两,而实际仅解 200 万两,不到名义拨款的三分之一。^[139]这一状况,除了说明各地财政拮据外,也反映出朝廷指令失范,不能化作各地的具体行动。这是晚清地方军阀势力兴起,外重内轻局面形成后的一个重要特点;文件的构想在实施中变形走样,更是历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

1877 年初,在讨论加强台湾海防建设时,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了修铁路、办矿务的主张,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所需经费,恭亲王决定从南北洋海防经费内拨取。具体做法是,从光绪二年七月起,关税仍以一半批解部库,抵还西饷,剩下一半中的一半,解交李鸿章,另一半,批解丁日昌兑收。所收厘金亦一分为二,李、丁各得其半^[140]。从总数上讲,北洋和台防各得 150 万两经费。

夏初,丁日昌忽然提出,听说春夏之际日本在英国订购了二艘

铁甲舰(按此说不确),显然针对中国。“人皆退而结网,我独临渊羨鱼。合全局而统计熟筹,臣又有不能不皇然改图、翻然决议者”。他说,铁路仅可专顾台湾,铁甲船则可兼顾沿海七省,所以铁甲船之应办又先于铁路。请将议拨台湾铁路经费改购中等铁甲船三艘,无事在澎湖操练,有事驻往南北洋听调,以期练成水师一二军。还说可以少购一二艘铁甲船,以其经费购买十艘蚊炮船,布置全台海口。^[141]这种主张,显然已超出他原先提出的“三洋海军”构想,企图以台澎为基础,自行建立一支舰队。朝廷命丁日昌详细咨商南北洋大臣,会同派员,分别订购。总理衙门还规定由丁日昌具体经理,以一事权而收实效。

丁日昌的主张,击中了李鸿章拖延购办铁甲舰方针的要害,自然使李鸿章大为不满。而在丁日昌看来,台湾购舰需详细咨商南北洋大臣,协调意见,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难以做到。不久,丁日昌本人病倒,回广东老家就医,由布政使葆亨、周恒祺先后代署。他自知无力再与李鸿章分庭抗礼,表示购置铁甲舰仍归南北洋大臣督办。闽浙总督何璟更主动将已解福建的经费交还李鸿章。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与此同时,因江苏筹办新式炮台、购备新式洋炮经费不敷,沈葆楨请求截留江海关解部二成洋税一年,部准六个月。随着南洋海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各项开支日益增加,原先积存的款项,迅速告罄,加之海防经费常被挪垫抽分,李鸿章又迟迟不购铁甲舰,也使沈葆楨十分不悦。1878年3月,他上奏请将海防经费仍按南北洋分解。根据李鸿章的说法,南北洋分款的确切时间,系从光绪三年七月第三个财政年度开始。^[142]

南北洋分解后,经费依然不敷。广东、江苏、福建厘金奉拨以来,就分文未解。浙海关洋税自另立招商局名日后,亦未解分毫。浙江、江西、湖北厘金及各海关洋税实解北洋者,每年平均不过30余万两,比原定200万两之数不及十分之二。因此,1880年4月,李鸿章请求自本年起停止提还西征饷银,仍照原议,分协南北洋经费;各省厘金与其拨多解少,不如实拨实解。江西、湖北各原拨30

万两,浙江原拨40万两,请按八成起解,不得再有短少。江苏、广东、福建厘金现皆不报解,请改拨他省有着的款。总理衙门研究后表示,同意停止提还西饷和将厘金改按八成指标报解。至于改拨他省款项,则毋庸议,应请旨催促。以后再有拖欠,查照迟误京饷定例议处。^[143]此后各省厘金便按八成指标起解,而广东、福建厘金60万两正式停止拨付。南北洋海防经费总额,从此改为300万两。^[144]但人们仍然习惯统称400万两海防经费。

从1875年至1880年6年间,北洋共计收入海防经费4826618两,平均每年80万两。1881年、1882年略有起色,共收2273263两,平均每年114万两。1883年、1884年锐减,平均仅得65.6万两,李鸿章只得提用淮军协拨和长芦运库银116万两弥缝额缺。1885年厘金、洋税共收73.3万两,李鸿章又动用直隶海防捐输112.8万两维持开支。^[145]每每陷人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的境地。

关于南洋海防经费的收入情况,目前所知甚少。光绪初年,刘坤一主粤,便以广东库款支绌,奏准免去协拨南北洋海防的厘金。当他1880年出任南洋大臣时,福建、浙江应解南洋的厘金也都获准留闽应用,江西厘金抵作薪饷,湖北省分毫未解(后划解北洋),南洋经费仅靠关税。在南北洋分解经费后的三个财政年度里,仅仅收到各省关经费40余万两,不及原拨数的十分之一。^[146]1884年曾国荃担任南洋大臣时,依然感叹“南洋防费除各省奏明截留停解划拨外,其余报解寥寥,已成坐困之势。而南洋应用款项,层见迭出,应接不暇”。^[147]南洋各省皆各自筹款,自谋发展。这一时期南洋海防经费,主要用于江苏沿海的炮台建设上。

由于南洋海防经费开支的史料十分匮乏,本书对海防经费支出的研究,集中在北洋海防经费这一线索上。

北洋海防初兴之时,大宗经费主要用于购买船炮军火。李鸿章使用165万两银子,向英国购买了“龙骧”等八艘炮艇和“超勇”、“扬威”号巡洋舰。以后虽不直接再用海防经费购买作战舰只,但仍陆续添置了一批运输船、练习舰和工程船。此外,还大量

购入枪炮、鱼雷、弹药和制造军火的机器。由于进口军火缺乏统一规划,造成引进枪炮型号、口径的混乱。据1886年统计,当时北洋各军营炮台(不含军舰)使用的火炮,竟达84种之多。^[148]这给国内兵工厂弹药生产带来极大的不便,从而进一步造成对进口的依赖。按历年海防报销折租率统计,1875~1884年,用于购买舰艇及辅助设施的开支达212万两,1885~1888年用于同类的开支仅28万两。前十年平均每年开支21万两,后四年平均每年7万两,减少了三分之二,以后便不见记载。1875~1884年用于购买枪炮弹药军火共支银231万两,1885~1894年用于同类开支的达300余万两。后十年比前十年平均每年增加开支30%。总计20年中,购买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

1880年起,北洋先后在大沽、旅顺建造船坞及附属工厂;又在旅顺、威海修筑了当时中国两大最新式军港,四周遍布炮台,形成防御体系。这一系列工程的总投资在380万两以上。其中除旅顺坞、厂、码头承包给法人德威尼,共耗资139万余两,由直隶海防展捐项下拨银63.1万余两,户部及郑工捐拨款53.9万余两,购买“致远”等四舰余款6.9万两移用外,所缺部分及北洋海防其他各项建设工程,在海防经费内动支共约240余万两。

北洋海防一笔更为巨大的开支,是薪粮公费。

薪粮公费包括三大方面:一是舰队例支薪粮公费,包括舰队官兵的薪俸、行船公费、医药费、酬应公费等。1875~1886年,这一开支达162万两,平均每年开支13.2万两。后来海军衙门规定,“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七舰及后来服役的“平远”舰的薪粮公费、燃料、维修费用,由海军衙门另行拨款,而六“镇”、“超勇”、“扬威”、“威远”、“康济”及其鱼雷艇、运输船仍由海防经费内拨支。1887~1894年间,共拨银275万两,平均每年34万两。(同期海军衙门对“定远”等舰拨款约390万两,平均每年48.8万两)。二是基地人员(包括水师营务处、港坞、炮台、学堂、医院)的薪俸及日常办公用费,20年中,共支约314万两,平均每年15万两。三是洋员薪俸川资。北洋海军常

年聘请外国教官、顾问,给予高薪水高待遇。随着舰队训练成军,所雇洋员日益减少。海军衙门规定:“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洋员经费,由海军衙门统一拨款(共拨约8万两)。其他洋员,一律由北洋海防经费支薪。1875~1886年,这一开支共达38万两。此后八年中,约支银75万余两。北洋海防经费中的薪粮公费总开支,约达864万两。^[149]加上海军衙门的直接拨款,人头费和行政费,总数在1200万两之上。

总理衙门和户部确定年拨海防经费400万两后,此款便成为众目睽睽的一大财源。每当朝廷财政拮据,便从其中大量腾挪抽调。1877年,山西、河南大旱,饿殍遍地,道殣相望。朝廷筹款办赈,命李鸿章筹拨海防经费20万两,三成给豫,七成给晋。李鸿章力争,指出海防经费关系军国大计,请勿分拨。朝廷虽表示同意,然而未过两月,又饬令李鸿章从海防经费项下拨银8万两运往山西,12万两解送河南。次年春,依左庶子黄体芳、编修吴观礼的请求,谕令将各省协解轮船机器各局用款,提取一半,分解晋豫办赈。查北洋海防经费报销折及其他有关奏折,仅1875~1880年6年间,就从海防经费中挪用了滇案恤款(按指马嘉理事件)20.3万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案20万两,京师平糶不敷价银7.4万两,直隶赈抚各属运米价脚银1万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拨解留美幼童经费28.9万两等等,^[150]加上提还部拨西征饷银共一百几十万两,海防经费腾挪抽调的总数是不容忽视的。

1875~1884年,是北洋海军发展的前十年。北洋海防经费共支出762万两。与实际收入相比,平均每年支出仅占66%。其中1875~1878年最低,仅用去47%。中法战争后,这一比例逐渐升高,超出92%以上。这种状况与李鸿章先是积累资金,投资于重点项目,以后主力军舰购到,海军支出日益繁多和固定化的实际状况是相符合的。李鸿章主持北洋海防20年,海防经费总支出约达2140余万两。^[151]

除了海防经费协拨外,李鸿章利用北洋海军拱卫京畿的有利地位,或向户部申请额外拨款(如旅顺基地建设费用),或从其他派系手中巧取豪夺,从而开辟了新的财源。这在“定远”、“镇远”等军舰购买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

李鸿章在购买铁甲舰时与南洋明争暗斗取胜,奥妙全在北洋本身没付购舰费用。

1879年,在李鸿章鼓动下,福建筹银130万两,决定购买4艘炮船,2艘巡洋舰,以李鸿章熟悉行情,全盘托其代办。总理衙门亦以北洋海防经费稍充,李鸿章已设法整理,南洋所辖洋面较之北洋尤宽,只有4艘炮艇不敷分布,决定从出使经费项下,拨银40万两,以助南洋(实指江苏上海地区)购买军舰。南洋拿出25万两,凑成65万两,准备购置2艘“超勇”级巡洋舰。可是不久,李鸿章又建议将筹款改购土耳其铁甲舰。他说“柏尔来”号归福建调用,福建当独任其费,可从购置蚊、快船的130万两内作抵。“奥利恩”号归南洋,应将南洋拟购巡洋舰的65万两作抵。此外尚短45万两,可明示中外统筹,或从出使经费内借拨,或酌借部库洋税若干。恭亲王同李鸿章商量,希望从北洋海防所存经费中设法匀兑,李鸿章一口回绝。不久,购买土耳其铁甲舰计划流产,李鸿章将前款改订“定远”、“镇远”。

“定远”舰价140.9万两,“镇远”舰价142.48万两,加上各项杂支、回国路费,共支银3399240两。挪用福建、南洋经费仅够购买一艘。李鸿章建议拨用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100万两;又说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从该局运漕水脚项下分年扣还,计每年拨还35万余两。可提三届还款100万两,抵作订造铁甲之需。^[152]看起来,他是为他人出谋划策,但不知不觉中,已打出“不分畛域”的旗号,最终一毛不拔,坐收渔利,将两大铁甲舰全部归入自己囊中。无怪南洋大臣刘坤一得悉李鸿章移款购置“定远”后,便知南洋无法染指,愤然致函军机大臣沈桂芬:“南北洋共此一船,即金甲、银甲亦属无济,不如专归北洋,以免兼顾为难。”说完气话,他又感叹南洋经费全失,“将为无米之炊”。在另外一封

信中,他向友人抱怨: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擲外洋,筹防弥觉束手,为之奈何?此次道出天津,与李鸿章议论铁甲船不合。似此情状,南北洋岂能和衷?^[153]

1883年,李鸿章用购买“定”、“镇”余款247 274两,加上从淮军第八案报销款内挪用的438 930两,共680 204两,购买了“济远”号巡洋舰。^[154]

在此之后,李鸿章1885年再次打着替福建购舰的幌子,动用户部提用神机营借怡和洋行洋款248万两,海军衙门转商部指拨各省展限海防捐输银751 117两,及江、闽、浙海三关洋药税厘266 187两,总计3 497 304两,购买了“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155]。李鸿章还用购舰费用在银行的利息7.8万两,略加补贴,又从英国购得头等大鱼雷艇“左队一”号。^[156]

合计以上各项购舰费用,耗银近800万两,皆从海防协饷之外攫取。李鸿章名义上号称代人办事,长袖善舞,银子滚滚而来,敛财手腕可谓高明,这是李鸿章开辟的第二财源,也是北洋海军实力迅速膨胀,超过其他地区跃居全国之首的秘密所在。

六、继续发展的海军教育

1874年2月,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的外籍雇员工作期满回国,船政学堂的课程由中国教员自行担任。次年1月,因“建威”号练习船损坏,日意格建议将新造的“扬武”号军舰改为练习舰。5月,学堂正式接收了“扬武”。又聘洋员德勒塞为总教习,闾顺为帆教习,阿务德为炮教习,将“建威”舰原有见习学员移人,复添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林、韦振声、史建中登舰实习。9月30日,“扬武”出海试航,一切顺利。于是便开始实施预定的出洋远航实习计划。

学堂与德勒塞拟定的计划十分宏大。它包括六个实习阶段:一、中国各海口;二、日本各口;三、小吕宋、新加坡、槟榔屿、利阿

玛；四、金山；五、印度各国；六、西洋各国并美洲。实际完成了前三个阶段。1876年2月4日，“扬武”从烟台起锚，前往日本。接着游历了南洋诸岛。侨居海外的华侨看到祖国军舰，十分激动和鼓舞，认为是百年未有的光荣。

“扬武”的训练水平也是船政局轮船中最高的。吴赞诚曾夸奖说，各船枪炮，“扬武”中靶最多，“飞云”次之，“济安”又次之，而“扬武”之中靶，则水手又不及学生。

当然，“扬武”舰上并非一切尽如人意。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舰上插着原先拟任“李-阿舰队”中方统领蔡国祥的旗帜。但他不常到船上来，要是来的话，便把自己关闭在一间位于船中部的、狭小而薰得很香的舱室里，里头有一个敬拜天后的龛。这位提督所积极参加的，是发给士兵薪水及监视刑罚的执行。他对蒸汽船毫无所知，而且连一个英文字也不会说。^[157]再往后，“扬武”归船政学堂的高材生张成指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舰从此竟“有名无实，练务为弛”了。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丁日昌决定重新聘请外国教师来学堂任教。1876年春，他通过日意格邀请嘉乐尔重返后学堂。前学堂聘请德尚、迈达。1878年初，后学堂又聘请了管轮教师穆理登。1880年5月，深受学生欢迎的嘉乐尔先生因病逝世，穆理登聘期亦满，改募邓罗任驾驶教师，理格任管轮教师，订立三年合同。不久发现理格不甚得力，一年后将他辞退，暂由老班学生担任教习，为新生上课。另一位教师邓罗，因颇称得力，延长聘期一年，每月加薪50两。以后又多次延长聘期，并获得五品顶戴和二等宝星的赏赐。考虑到轮机课程十分重要，船政学堂决定通过英国海军部另聘洋员来校任教。英国人推荐师丢瓦，但师丢瓦到闽后水土不服，力求辞职。船政大臣张梦元只能改派前学堂毕业生魏瀚兼任后学堂管轮教习。1884年底，张佩纶委托驻英公使曾纪泽，又在英国聘请赖格罗、李家孜担任管轮和格致教师。三年后，李家孜被张之洞调往广东，学堂又聘斐士博担任教师。

1881年，在朝野内外保守势力的影响下，清政府取消了容闳

倡导并得到曾国藩等人支持的幼童留美计划,学生奉召回国。从1872年起,共有120名少年被派往美国,从小学开始,逐渐升入大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到1881年,他们的平均年龄约在21岁。除少数人已大学毕业外,多数人正在学习,扣去因事故撤回国及在洋病故者外,遣返者共94名。尽管他们中无人学习军事,但官员们认为,这批人既然是从外国回来的,就应当与海军有关,结果有41人被分配到船政局和北洋水师。其中16人进入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八期补习。这批人中,詹天佑、欧阳赓二人已获美国大学学士学位,其余人也进入大学就读,所以他们在船政学堂的补习仅用了半年。在校期间,有二人重返美国,故毕业时仅14人。而后,欧阳赓又回美国深造,一人去世,一人调广东黄埔实学馆任教学,吴应科、宋文翔、徐振鹏、邓士聪等4人调往北洋水师,詹天佑、邝咏钟等7人留“扬武”舰任职。

这一时期,朝野对于海军事业日益重视,本来应是海军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随着沈葆楨调离船政局,船政学堂的管理就日益松懈下来。1880年12月17日,江南监察御史李士彬奏称:“闻福州船政初开局时……局中学生督课綦严。勤者奖之,惰者革退。近则专徇情面,滥竽充数,不一而足。”^[158]1884年10月23日,船政大臣张佩纶更指出,沈葆楨创校时,详立章程,遴选俊秀,学校十分整肃。近十余年来,考校生徒不无徇滥,而泰西机巧日辟,船政经费日绌,不免因陋就简,狃一得以自封,偷惰宽疲,后学堂尤甚。他飭令洋教习邓罗,酌将水师将弁应读之书,应学之技,增购洋书,开足课程,并取天津水师学堂章程,以补闽学疏漏。^[159]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竟要向开办才三年的天津学堂学习,可见其内部的松弛混乱已十分严重。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做些横向比较,有时是很有兴味的。就在半月前,10月6日,美国海军部长威廉·钱德勒签署了一道命令,决定在罗德岛新港的一所贫民院里,建立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美国虽然在很早就开始使用蒸汽舰和铁甲舰进行作战,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忽视海军建设。南北战争时,海军舰船曾达700

多艘,到了战后,大量军舰退役,或出售给商人改为商船。至1880年时,只剩下48艘军舰,还都是过时的老家伙。海军上将戴维·波特称其为“画在中国人的古代碉堡上的龙,只能起吓唬敌人的作用”。美国海军力量退居世界第12位,排在丹麦、中国、智利之后。1875年4月8日,在卢斯海军准将倡导下,国会批准招募750名16~18岁的少年进入学院学习。先在港内接受预科训练,然后到练习舰上学习火炮、船艺和其他技能。这个做法和船政学堂是十分相似的。接着,美国酝酿已久的海军改革开始出台。卢斯担任第一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他邀请马汉中校开设海军历史课。第一学年结束时,海军军事学院的全部设备,包括1张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图,4张借来的课桌和12把借来的椅子。卢斯将军说:“不仅没有教官,也没有课本。”人们对于海军军事学院能够存在几年抱有很大的怀疑。在当时,即使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也只教技术课程,卢斯却设想“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何将海战从单纯的经验阶段上升到科学的高度。”^[160]两年后,马汉出任第二任院长。尽管官方人士仍然横加干预,阻挠学院研究战略问题,只要求安排技术发展方面的课程,但马汉不屈不挠,坚持海军战略研究,将他在学院授课的讲义修订成《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从而确立美国海军发展的基本理论,为美国海军事业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61]如今,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军院校之一。

简单地拿中美之间的海军教育以及海军力量做对比,也许并不合适,因为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建设海军的目的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从美国注重海军教育之后极大地推动了本国海军事业的发展,而中国新办的海军学校日益腐败的事实中,可以总结出许多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1873年12月2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楨、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衔上奏,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法、英两国留学,深究造船之理,驾船之方。左宗棠还单

独给总理衙门写信,重申这一建议。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此也表赞成。1874年4月5日,沈葆楨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草拟了留学章程。在此之前,容闳曾组织幼童赴美留学,但向国外派遣军事留学生却没有先例。且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事绪繁多,控惚未及定议。1875年,沈葆楨趁日意格回国之便,挑选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随同前往英法进行考察。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进了英国高士堡学堂。沈葆楨、丁日昌还通过总理衙门转请英国公使,允许他们进入英国军舰实习,但未获成功。1876年春,他们和陈季同随日意格回国,魏瀚、陈兆翱则继续留在法国学习。

李鸿章从1876年起,对派员出国留学海军兴趣甚高,与沈葆楨、丁日昌、吴赞诚以及总理衙门之间函商的信件不绝于途。丁日昌推荐他的助手、船政局总考工李凤苞担任出国留学学生监督。此时李凤苞正丁忧在家,丁日昌和李鸿章仍坚持请他出山。1876年夏,李凤苞和日意格应召到天津,又随李鸿章前往烟台,谈判“马嘉理事件”。烟台海面上停泊着英、法、德等国军舰,李鸿章多次应邀参观。他注意到英国军舰上有日本青年军官在接受训练,这更坚定了他派遣学生留洋的决心。他们在烟台详细商定了出国培训计划和章程,确定派遣30人,留学三年,预算经费30万两银。其中制造学生14名,制造艺徒4名,驾驶学生12名。由李凤苞担任华监督,日意格担任洋监督。

1877年3月31日,李凤苞、日意格率领留学生及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祿,乘“济安”轮离开福州,驶往香港。5天后,他们换乘外轮驶上西行的航线。5月7日,船抵马赛,学习制造的人员留下了,其余人改乘火车北驶,前往英国。5月13日是星期日,李凤苞等正式前往伦敦中国公使馆,拜会了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次日,郭嵩焘在使馆设宴,邀李凤苞等小酌。席间讨论了这批学生的学习和实习问题。

经安排,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被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号、“李来克柏林”号、“狄芬士”号铁甲舰实习,

并获准给予军官伙食和床位优待。其余9人参加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严宗光、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被录取，学习驾驶理论。落选的林颖启、江懋祉被派往驻扎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爱勤考特”号铁甲舰，黄建勋被派往驻扎美国的“伯利洛芬”号铁甲舰。此外，制造学生魏瀚、陈兆翱、郑清濂、陈林璋进入法国削浦官学，梁炳年、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林怡游进入土伦海军造船厂，池贞铨、张金生、林庆升、林日章进入科鲁苏民厂，均学习制造理法。罗臻禄进入汕答佃学堂学习矿务。随员马建忠、陈季同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学习国际法。翻译罗丰禄，进入英国伦敦琴士官学，学习物理化学。艺徒陈可会入法国腊县船厂，刘懋勋入马赛铸铁厂，裘国安、郭瑞珪入马赛木模厂，均学习制造技艺。年底，船政局又派5名艺徒前往法国。其中张启正进入腊县船厂，王桂芳、任照、吴学铿、叶殿铎进入白代果德铁厂学习绘图及制造铁甲。这样，这一批出洋留学的学生生徒及随员人数共达38名。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严宗光、方伯谦等人进入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后，便成了公使馆的常客。郭嵩焘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有趣谈话。郭嵩焘还同李凤苞一起，参观了海军学院。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当然是多次击败拿破仑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如严宗光的《沅舸纪经》、李寿田的《笔记》、梁炳年的《西游日录》、罗臻禄的《西行课记》、杨廉臣的《日记》。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吴德章的心得：“闽厂数年，粗明格致算法，未睹厥奥也。验之施用，已属效不胜收。其微积编、新学、重学、运动诸法，皆素未所读，并得逐一推考，澈委知源，相与问难知新。视在闽时，不止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观此足徵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162]

1879年夏，严宗光因学业屡考优等，又经“纽喀什尔”舰实习半年，被吴赞诚先期调回国内充当教习。到了年底，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学业已成，也束装回国。他们除了较其他学生早

一年出国外,刘步蟾、林泰曾还先后在“拉里”号、“潘尼洛布”号、“阿其力”号、“威灵顿”号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学习了设防、备战、布置水雷、枪炮等技能。魏瀚、陈兆翱在削浦官学的每月考试,均为优等,还游历了比利时及德国克虏伯等大兵工厂。李鸿章为他们分别请奖。刘步蟾、林泰曾、陈兆翱以游击留闽尽先补用,并请赏戴花翎。魏瀚以知县分发省分补用,并请赏戴蓝翎。

其余学习驾驶的学生,此时也学习期满。李凤苞除另行安排英国海军炮队教习苏萃为他们讲授火炮、军火诸学,请美国水雷军官马格斐讲授水雷电气诸学外,林永升上“马那杜”舰;方伯谦上“恩延甫”舰,旋调“士班登”舰;叶祖珪上“李来克柏林”舰,又改“英弗来息白”舰,萨镇冰上“们那次”舰,后调“恩延甫”舰。均经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和美洲、非洲等地,至1880年春回国。何心川在“菩提西阿”舰实习时,随同参加了英国在非洲祖鲁的战争,后因病提前回国。

学习制造的学生,除梁炳年因病客死他乡外,郑清濂在削浦、多郎两厂的联合考试中考列一等。杨廉臣、吴德章次之,林怡游、李寿田、陈林璋又次之,均获得总监工的证书。还参观了法、比、英国的工厂。1879年春,李凤苞又送吴德章、杨廉臣赴卢爱尔和布坎晤士海陆各炮厂学习制炮,郑清濂、林怡游赴汕答佃枪炮厂学习验料炼造诸法。艺徒们也学业有成。此外还调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进入巴黎矿务学院,调艺徒王桂芳、任照、吴学镗学习炼钢和金相检验技术。至1881年陆续回国。

1879年1月,郭嵩焘出使任满,李鸿章推荐曾纪泽继任。5月,曾纪泽给李鸿章写信,认为派遣海军留学生无大益处,今后有人提议续派,请予以阻止。李鸿章认为曾纪泽不是没有见识的人,对他提出的这个看法感到迷惑。沈葆楨认为,派遣留学生“万万不宜阻止”。11月,重病在身的沈葆楨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提出留学生徒即将届满,请予蝉联。1881年,李鸿章与黎兆棠往返咨商,决定续选前学堂学生8名,后学堂学生6名出洋,并分拨经费10万两。由于后学堂毕业生有的被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学,有的担

任“威远”练习舰教练,最后只选中李鼎新、陈兆艺两人,连同前学堂学生共10人,前往英法。华洋监督仍由李凤苞、日意格兼任(李凤苞已出任驻德公使),翻译为陈季同,兼办文案为钱德,均为义务职,不受薪给。李鼎新、陈兆艺先入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次年上皇家海军的“斯卫福舒尔”、“诺尔参木顿”号实习,旋返海军学院进修炮术。1882年,又增派驾驶学生邱宝仁、林履中赴英留学。制造学生王庆瑞进巴黎桥路工程官学堂,黄庭、李芳荣、王回澜进法国芬屯伯鲁枪炮工程官学堂,王福昌进火药官学堂。魏暹、陈伯璋、陈才端派赴德国刷次考甫水雷厂学习鱼雷。魏暹因体弱多病,医生认为气候对其不适,令其回国,但他本人坚决要求留下。后改入法国阿克工艺学院,学习轮机。留学生中,王庆瑞因腕部患疔疮开刀致死。陈伯璋因学鱼雷自费购买试药,负债过多,李凤苞在经济上未予援助,因而自杀。^[163]从第二届留学生的学习专业来看,有的是首届没有的,但对他们的安排资助,显然较以前为差。

此外,早在1876年初,李鸿章曾借德国军官李勋协回国之机,委托他带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7名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其中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于1878年向郭嵩焘投诉在德国受李勋协欺侮,已被逐出营外。郭派使馆随员张德彝前去调查,同行的其他中国人反映卞为人自大,不受西人约束,王得胜为卞所惑,而朱耀彩年幼无知。张德彝觉得将他们遣返回国,不仅辜负李鸿章培养人才的心愿,也浪费了来回旅费,即通过德国海军部,将他们安排到海军学习。由于他们刚去德国时未派专人监督,待李凤苞带领福州船政留学生去英法留学后,李鸿章让他每三个月乘火车去一次德国,检查他们的学业。经李凤苞考察,发现卞长胜等人表现依然不佳,屡犯事故,贻笑实多。李凤苞向郭嵩焘报告说:德人最敬重中国人物,自得此七人,群怀薄视之心。李凤苞认为,此辈起自兵弁,本是无赖子弟。他把中国人通常对军人的这种看法告诉德国友人:“在营员弁,本非上品。”友人答:“如果以这种说法告诉德国海军部,必然更被薄视。去国

七万里留学军事,怎能如此轻率?”李凤苞闻之惘然,他得出结论:“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三人在德国水师学习恐不相宜。”他们不久就被调回国内,成为早期留学海军的一段失败的插曲。〔164〕

李鸿章在发展海军事业方面,雄心甚大。从1879年冬起,他开始筹划天津水师学堂。理由是“中国驾驶兵轮船学堂,创自福州船政。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且南北水土异宜,必须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北洋现筹添购快碰、铁甲等船,需人甚众”。〔165〕1880年8月6日,李鸿章正式行文,命天津道、津海关道和天津机器局道员许其光着手会议规划,勘定地基,遴派得力局员经理工程。19日,他又向朝廷奏请任命北上就医的前船政大臣吴赞诚筹办水师学堂和练船,获得允准。吴赞诚在天津机器东局一带勘定地基,遴派局员,绘图估料,兴工建造。并草拟规章制度。到了冬天,他回安徽庐江养病,李鸿章又任命福州船政局提调吴仲翔,总办水师学堂和练船事宜。〔166〕

天津水师学堂于1881年8月落成于天津机器局河东一带。校舍宽宏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参差,花木掩映,学习设施无一不备,还有观星台,供学习天文者使用。从现存的1882年的一份以李鸿章名义发出的招生告示中,可以看到当年是如何吸引青年加入海军的。

……本大臣前因北洋兵船陆续添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光绪六年七月奏设天津水师学堂,培植北地人材,以供器使在案。兹距开馆一年有奇,学生造诣,渐有端倪。惟额数未满,考投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人材。细揣情由,似由贍银少薄,未足招徕。今水大臣将该堂原订章程学生月给贍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酸之家感知感奋。从前闽省水师学生,半皆世家子弟,学成之后,皆任各轮船将领,游保二三品官阶,并有加勇号者。此间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合行示

谕,并将章程撮要开列为此示。仰士人民等知悉,无论直隶本籍及外省寄居良家子弟,年在十六七岁以内,资质聪颖,能作论文或小讲半篇,情愿投考者,开明年岁、籍贯、三代、自赴水师学堂报名,由该堂总办随到随考,秉公录取。尔等须知,今日之学生,即他年之将佐。优予之饷,原思亟得美材,大张吾军,是本深期继起。勿仍观望,其各奋兴,特示。^[167]

从告示所附细则看,基本属于仿效船政学堂的规章,学制亦为五年。根据学堂章程,在校期间,学生不得自行告退及请假完娶,亦不得应童子试。学生入学三个月后,根据成绩分别去留。正式录取者,依资质进境,分作一、二、三班。第一班归洋文正教习督课,第二、三班归副教习二员分课。每周安排五天,学习西学。所谓“西学”,第一年以英语为主,兼习浅近数学。第二、三年即以数学为主,兼习中西海道和天文导航。第四、五年,则进一步学习三角、力学、微积分、驾驶、御风、测量、蹇厘诸法。如果学习进度快,还要增设帆缆、枪炮、水雷、轮机理要和物理、化学、台垒学中有关水师的内容,以为将来出洋肄业打下基础。此外,还有两天专事汉文,授以《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读史兵略》。每天早晚,学生还要军训。章程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办法,学生在校学习任务极为繁重,每月仅能放假一天,端午、中秋放假3天,过年放假15天。学堂初建时,仅设驾驶专业,后因管轮人才需要量日增,便于1882年初夏,将原设天津水雷电报学堂改组为水师管轮学堂。^[168]这样,天津水师学堂的规模就日益完善了。

驾驶学堂的管理人员,设总办、监督各1员,洋文正教习1员,副教习无定数,文案、司事、操教习、汉文教习、医官、洋号手各1名,书识2名。管轮学堂总办由驾驶学堂总办兼任。另设监督、司事、洋文正副教习各1员,其余皆由驾驶学堂人员兼理。教师中,华籍人士大为增加。李凤苞推荐的留英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宗光长期在校服务。早在1876年,严宗光即被李鸿章留意,与张成等人一起调至天津,准备接带自英国进口的炮艇,旋因出洋学习驾驶的名单有缺额,他被改派留学。^[169]在英国时,严宗光又被郭嵩焘、李

凤苞、曾纪泽看好,认为他不仅懂得航海,更能探本寻源,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所以被提前召回国内,任船政学堂教习。陈宝琛认为他“器识闳通,天资高朗”,极力推荐给李鸿章。经李鸿章向黎兆棠索要,严宗光于1880年8月12日抵达天津,参与学堂筹备的各项工作。不过作为教师,他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能干,留美幼童就讥笑他上课很差。他在学堂的职务,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总教习”,而是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170]管轮学堂成立后,吴仲翔向李鸿章奏调萨镇冰担任洋文正教习,船政学堂帮教习郑文成为副教习,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为管轮学堂监督,均获李鸿章批准。^[171]1881年学堂还从船政学堂第四届驾驶班抽调许兆箕等4人来校任教。

学堂的办学规模,分别专业,各可开设三班,招生120名,但很少有三届学生同时在读。每届学生之间,都相差二至三年。1883年前后,驾驶学堂头班学生堂课接近结束,校方开始酝酿练船训练。李鸿章调“镇北”炮艇管带方伯谦任“威远”练船管带。命严宗光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联系,推荐练船正洋教习人选,制定练船章程,并组织对学生的考核。此后,练船正洋教习鲍察、练船驾驶教习倪耳森先后到任。1884年秋,新聘管轮正洋教习霍克尔到津,经他考试,认为在堂学生功课均有可观,惟英文尚浅,不敷学习深造之用。又建议在校舍旁增建一座厂房,供学生学习轮机修理。1884年,第一届驾驶班学生谢葆璋、沈寿堃、伍光建等30人毕业,派上“威远”号练习舰实习。李鸿章在奏折中曾记载了这届学生在校学习的情景:

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经飭监督各员严加约束,教习各员认真课导。欲其于泰西书志能知寻绎,于是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欲其于凡诸算学洞见源流,于是授以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欲其于轮机炮火备诸理法,于是授以级数、重学;欲其于大洋驾舟测日候星、积算器刻以知方向道里,于是授以天文推步、地舆测量。其于驾驶诸学庶乎明体达用矣。

然犹虑其成或失文弱也,授之枪俾齐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犹虑其或邻浮薄也,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渝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为之信赏必罚,以策其倦怠;为之月校季考,以稽其知能……今年春秋两季,经臣飭派委员罗丰禄邀同英、俄两国水师兵官到堂会考,该兵官等金谓,欧洲水师学堂所留以俟上练船后指授之学,此堂均已先时预课。罗丰禄亦谓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洋教习所未及课。^[172]

由于李鸿章的重视,天津水师学堂的办学质量逐渐赶上了福州船政学堂。

注 释:

[1] 傅角令、郑励俭:《琉球地理志略》,第73页。

[2] 沈葆楨:“闽厂轮船续行兴造片”(同治十三年七月),《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十八。

[3] 沈葆楨:“致林颖叔方伯”,《沈文肃公牍》,第一册,第104页;李鸿章:“论台防”(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李集·译稿》,卷二,页四十一。

[4] 《北京专条》(1874年10月31日),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辑,第343页。关于对“保民义举”之研究,参见陈在正:“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引起之中日交涉及其善后”,“扭曲中日《北京专条》的各种说法应加辩明”一文,载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第8-68页。

[5][13][21] 李鸿章:“致李瀚章”(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未刊稿)。

[6] 日本海軍省編:《山本權兵衛と海軍》,第281页。

[7]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筹办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十九。

[8] “湖广总督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条款”(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筹办同治夷务》,卷五十五,页二十一。

[9] “广东巡抚张兆栋奏呈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筹办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二十三。

[10] 李鸿章:“论善后事宜并教务厘务”(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李集·译稿》,卷二,页五十八。

[11] “大学士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筹办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四十。

[12]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二十四,页二十六。“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394~395页;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九,页三十四。

[14] 参见李鸿章:“奏保王凯泰凌焕片”(同治四年九月初八日),《李集·奏稿》,卷九,页五十二;“复何被宋制军”(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李集·朋稿》,卷十二,页十八。

[15] 李鸿章:“致李瀚章”(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未刊稿)。

[16] 见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八;“署山东巡抚漕运总督文彬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浙江巡抚杨昌濬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福建巡抚王凯泰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江西巡抚刘坤一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筹办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三十一,卷九十九,页三十四、四十四,卷一百,页二十二。沈葆楨:“复陈海洋水师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五,页二十二。

[17] 李瀚章:“奏议海防江防各事宜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合肥李勤恪公政书》,卷六,页二十;“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筹办同治夷务》,卷一百,页十九。

[18]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七日),《筹办同治夷务》,卷九十九,页五十二,卷一百,页二十八。

[19]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照录陕甘总督左宗棠签注丁日昌条陈单”,《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第314页。

[20] 丁宝楨:“筹议海防应办事宜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丁文诚公奏稿》,卷十一,页七;李宗羲:“复奏总理衙门六条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第72页。

[22] 李鸿章:“致丁日昌”(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丰润文史》第二辑,第75页。

[23]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二十五。

[24] 刘声木:《荃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第599页。

[25] 丁日昌奏折,见“李鸿章代丁日昌奏清单”(未刊稿)。李鸿章之评论见“复丁雨生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十四日),《李集·朋稿》,卷十五,页六。

[26]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12页。按翁在日记中所记反对的是“借洋税”，而从礼亲王复奏中表述的是反对“借洋款”。本书改从借洋款。

[27]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醇亲王奕譞等奏片”；同日“礼亲王世铎等奏片”，《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第118、119页。

[28]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第121~122页。

[29]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及附片”，《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第124~135页。

[30] 李鸿章：“致丁日昌”（光绪元年三月十二日），《丰润文史》第二辑，第78页；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李集·朋稿》卷十五，页二十九。

[31]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37页。

[32]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九。

[33]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集·奏稿》，卷四十六，页三十二~四十一。

[34]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第146~153页。

[35] “著李鸿章、沈葆楨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末海军史料》，第12~13页。

[36] 李鸿章：“致丁日昌”（光绪元年五月初四日），《丰润文史》，第二辑，第79页。

[37] 李鸿章：“致丁日昌”（光绪元年四月廿九日），《丰润文史》，第二辑，第81页；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李集·朋稿》，卷十五，页十六；沈葆楨：“李中堂”，《沈文肃公牍》，第一册，第385~387页。

[38] 李鸿章：“复文博川中堂”（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李集·朋稿》，卷十四，页三十二。

[39] 江村：《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第117~119页。

[40]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387~389页；又，丁日昌对该职力辞不就，其理由参见同书第389~392页。

[41]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沈葆楨奏折”，《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386~387页。

[42] 《清德宗实录》，卷九十五，页三，光绪五年五月庚寅条。

[43] 《清德宗实录》，卷九十七，页十四，光绪五年六月戊辰条。

[44] 沈葆楨：“复李军门”，《沈文肃公牍》，第三册，第1274页。

[45] 沈葆楨：“复李质堂军门”，《沈文肃公牍》，第三册，第1340页。

[46]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内阁学士梅启照折”，《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493页。

[47]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九，页三十四。

[48] 刘坤一：“复陈海防事宜折”（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刘集》，第二册，第596~597页。

[49] 曾国藩：“复奏彭玉麟等近况及江海水师有别等情片”（同治九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30页。

[50]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276~277页。

[51] 以往论者把船政局兵轮船和福建水师混为一谈是不对的。1872年李成谋调任，闽浙总督李鹤年上奏：“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奉旨调补长江水师提督，所遗提督篆，经臣李鹤年遵委福宁镇总兵罗大春接署。惟李成谋前蒙旨简派统领轮船，现因调补长江，距闽较远，势难兼顾，咨请选员接办前来。查轮船统领，责任甚重，必须大员经理，方足以壮声威……可否即令罗大春统领轮船，以专责成，伏候圣裁”（见《筹办同治夷务》，卷八十九，页六）。清廷后来命罗大春统领轮船，罗大春于1873年9月1日接长江贵担任福建陆路提督，同时又任轮船统领（参见钱实甫：《清季职官年表》第三册，第2574页；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页一），便是一个明证。

[52] 曾国藩：“奏调吴大廷综理江南船政操练事宜片”（同治九年九月初六日），《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16页。

[53] 参见李鸿章：“复综理轮船操练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同治十二年元月十五日）（未刊稿）。

[54] 刘坤一：“复吴桐云观察”（光绪元年七月十九日），“致刘仲良”（光绪元年六月初九日），《刘集》，第四册，第1783、1779页。

[55] 李鸿章：“复曾相”（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李集·朋稿》，卷十一，页七。

[56]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统领闽局轮船彭楚汉奏折”，《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429页。

[57] 李鸿章：“复总理轮船操练江南提台李”（光绪四年三月初五日）（未刊稿）。

[58] 李鸿章：“复何筱宋制军”（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李集·朋稿》，卷十八，页十六、三十六。

[59] 丁日昌提出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包括：一、海防会办应阅历深厚，精通海防；二、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宜选深谙外海水师之大员统领，延请熟谙水师之西员会同操练；三、请调李成谋去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四、船政局经费必须保证；五、船政局轮船当预储管理人材；六、江防仅长龙、舢板不能御外侮，宜辅以浅水轮船及水雷；七、日本废琉球，我此时海防未备周齐，只能予以谴责，俟我防务沛然，再兴问罪之师；八、对日需俟其先发，分投牵制；九、日本即便二三年不犯台湾，也必将北图朝鲜，我需预做准备；十、朝鲜需与泰西各国立约，以防日本并吞；十一、英、法、美、德中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十二、请速购铁甲船、水雷，并整顿营制、饷制、行政、用人；十三、筹办海防，需整顿吏治，团结民心；十四、严整军队吏缺；十五、沈葆楨宜来往金陵、上海两处；十六、健康好转，再上北京。若不能愈，也随时接受朝廷查询。见《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392~397页。

[60] “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412~414页。

[61] 李鸿章：“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集·奏稿》，卷十七，页四十九。

[62] 丁宝楨：“筹办海防折”（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丁文诚公奏稿》，卷十二，页十二。

[63]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七。

[64] 本书关于丁汝昌早年生涯，主要参考戚其章：“《清史稿·丁汝昌传》订补”，载《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第393~413页。惟戚文据《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否认《清史稿》称丁氏“初隶长江水师”说，证据尚不充分。《清史稿》的说法，当来自李鸿章：“丁汝昌统领海船片”（光绪七年十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四十二，页二十二。片称“该提督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嗣随刘铭传统带铭军转战南北”，这是正式保案中的文字。李鸿章为了使朝廷批准使用丁汝昌，可以回避其曾是太平军降将的历史，但不致为其伪造履历。故猜测丁汝昌确有长江水师（湘军水营）服役之经历。记此存疑。

[65] 李鸿章：“勘验英厂购到四船片”（光绪四年六月十七日），“筹议购船选将折”（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二，页一，卷三十五，页二十七。

[66]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一，页二十一。

[67] 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六年九月初七日条。

[68] 薛福成:“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庸盦文外编》,卷一,页二十四~三十。

[69] “北洋水师号衣图选”,《清末海军史料》,第462~469页。

[70] 寿尔:“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398页。

[71]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12366页,“沈桂芬传”。

[72] 李鸿章:“复曾頔刚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李集·朋稿》,卷十九,页二十三。

[73] 张佩纶:“再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涧于集·奏议》,卷二,页七十七。

[74] 吴汝纶:“与陈右铭方伯”(光绪二十一年闰月十一日亥刻),《吴汝纶尺牍》,第70页。

[75] 参见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一、卷二诸折;《王文韶日记》,上册,第451页;《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396页。

[76]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一),第253页。

[77] 李鸿章:“复张葛卿部郎”(光绪五年六月初六日),《李集·朋稿》,卷十八,页三十。

[78] 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条。

[79]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二,页十。

[80] 袁保龄:“致蕪斋”,《阁学公集·书札录遗》,页一~二。

[81][84] 关于李鸿章与张佩纶的通信,见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二月三日、三月二十日、四月十一日、五月五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八年四月十三日、十七日),载《张佩纶与李鸿章往来信札》(未刊稿)。从张佩纶给李鸿章的信看,他显然不像袁保龄那样迂腐,他在信中告诉李鸿章朝廷仍坚持要李百日后回津的消息,却不劝说李守制。

[82][83] 《清德宗实录》卷一四五,五十四~五十五页。光绪八年四月庚午、壬申条。

[85] 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涧于集·奏议》,卷二,页二~七。

[86] 李鸿章:“复议张佩纶堵藩服折”(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李集·奏稿》,卷四十四,页二十七~二十九。

[87] 薛福成:“代李伯相筹议先练水师再图东征疏”,《薛福成选集》,第189页。

[88] 许景澄:“致朱亮生观察”谓:“丰润到总署,创立海防股,议大减制

兵”，《许稿·书札》，卷二，页七。

[89] “赫德致金登干函”(1883年12月9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402页。

[9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3卷，第263页。

[9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议结琉球案折”(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日交涉史料》，卷二，页九。

[92]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球案宜缓允折”(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中日交涉史料》，卷二，页十四~十七。

[93] 刘坤一：“敬陈管见折”(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刘集》，第二册，第585页。

[94][95] 马建忠：《东行三录》，第68页。

[96] 李鸿章：“复张振轩制军”(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二十六。

[97] 张謇“朝鲜善后六策”现已散失，其要点可参见张謇：“为东三省事复韩国钧函”(宣统三年)，《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04~205页。

[98] 参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7页。

[99] “商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4~845页。

[100] 张謇等人写给袁世凯的信，是一份有趣的文件，对袁世凯嬉笑怒骂，颇有文采。因内容太长，不录。载《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7~22页。

[101] William Hovgaard: *Modern History of Warships*. pp. 244~245.

[102] “赫德总税司面译金登干来函”，《李集·译稿》，卷三，页八~十。

[103] 李鸿章：“议购船炮”(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李集·译稿》，卷三，页六~八。

[104] 李鸿章：“验收购到船炮片”(光绪二年十月二十日)，《李集·奏稿》，卷二十八，页十四。

[105] 李鸿章：“验收续购船炮折”(光绪五年十月十六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五，页二十二；又，李鸿章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海防经费销折”称：“订购‘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蚊炮船银六十万零八十六两八分八厘九毫，添购‘镇北’等四船弹药六万八千一百十二两七钱八分四厘六毫。”见《李集·奏稿》，卷四十八，页四十六。光绪五年十月十七日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信中说：“蚊船……即照现式，每只只需银十五万两。”见《李集·译稿》，卷十，页九。此处十五万两，亦是从四船六十万两推算而出，估计均包括运费。

[106]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五年十月十七日)，《李集·朋稿》，卷十九，页四；“条议海防”(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李集·译稿》，卷十，页六~七。

[107] 李鸿章：“筹议购船选将折”（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李集·译稿》，卷三十五，页三十；“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五年八月十一日），《李集·朋稿》，卷十八，页三十九。

[108] 寿尔：“田兔号航行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12~417页。

[109] 美国学者霍夫加德认为，伦道尔炮艇行动迅速，装载巨炮，虽然船身没有装甲保护，但由于小巧，敌人很难捕到。这种船是简单的移动炮台，对于海岸防御尤为有效。它的大炮对敌舰有很大的威胁。其缺点是炮体很重，整个船身不稳，只能在平静的水域作战，开炮时间间隔长，加上没有足够的装甲保护，容易被创伤（W. Hovgaard: *Modern History of Warships*, pp. 245）。安德森认为：伦道尔炮艇的意义在于，低级的炮船也能拥有大炮舰的头衔，小规模的海军有希望在低代价下实现火力升级。总的来说，它们解决了当时令人头痛的沿岸防御问题。当高速炮和鱼雷出现后，由于其造价低，沿岸防御效果更好，使得伦道尔炮艇的优势不复存在。但将大型火炮装载在小型舰艇上的创意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今世界上许多小型快速的配有导弹的战舰便是伦道尔炮艇历史价值的佐证（R. M. Anderson: *The Rendel Gunboats*, *Warship International*, No. 1, 1976）。

[110][112] 李鸿章：“定购快船来华折”（光绪七年十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四十二，页十七~二十。

[111] “金登干致赫德电”（1879年6月15日），《中国海关密档》，第八卷，第177页。

[113] “金登干致赫德函”（1881年10月21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641页。

[114] “赫德致金登干函”（1879年9月4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230~231页。

[115] 李鸿章：“议赫德海防条陈”（光绪五年七月十七日），《李集·译稿》，卷九，页三十八。

[116] 沈葆楨：“致李中堂”，《沈文肃公牍》，第三册，第1296页。

[117] 薛福成：“上李傅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庸盦文编》，卷二，页五十三。

[118] 李鸿章：“复沈幼丹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集·朋稿》，卷十七，页三十一。

[119] “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折，《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426页。

[120] 沈葆楨：“复丁雨生中丞”，《沈文肃公牍》，第二册，第645页。

[121] 沈瑜庆：《涛园集》，第173~174页。

[122] 李鸿章：“定造铁甲折”(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七，页三十二；“复李丹崖星使”(光绪六年八月十七日)，《李集·朋稿》，卷十九页三十。

[123][126] 徐建寅：《欧游杂录》，第85、86页。

[124] William Hovgaard: *Modern History of Warships*. pp. 303.

[125]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卷一，页八。

[127] 关于“定远”、“镇远”两舰的舰体数据，各种史料互有出入。许景澄“遵旨勘验定远镇远两船工料并接管情形折”给出长94.5米，宽18.3米，吃水6米。李鸿章“验收铁甲快船折”给出长298英尺5英寸，宽60英尺4英寸，吃水19英尺6英寸。T. A. Brassey: *The Naval Annual 1890~1895*年各版给出长308英尺5英寸，宽59英尺，吃水20英尺。显然各种数据测量的基准点都是不同的。笔者在为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复制“定远”舰模型时，同世界航海模型运动协会赵幼雄国际裁判合作，仔细测量和换算了各项资料，判定 *The Naval Annual* 给出的长度是舰艏艖凸出部分的距离；李鸿章给出的长度是舰艏甲板顶端（不含冲角）至舰艖凸出部分的距离。又，舰的宽度，根据“定远”总布置图换算，*The Naval Annual* 给出的尺度是合理的。许景澄、李鸿章奏折提供的数据要略宽30~40厘米，估计是两舷添装护舷木的宽度。笔者综合几方数据，在正文中列出各项技术参数，以备参考之用。

[128] 李鸿章：“验收铁甲快船折”(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李集·奏稿》，卷五十六，页十六；许景澄：“遵旨勘验定远镇远两船工料并接管情形折”(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四日)，《许稿·奏疏》卷一，页五。

[129] 从下表中可以比较英德在同类型军舰价格中的差距：

舰名	制造国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长	宽	吃水	价格(镑)		资料来源
								船价	机器	
英弗来息片 Inflexible	英	11800	6500	12.8	320英尺	75英尺	26.4英尺	648 811	146 457	T. A. Brassey: <i>The Naval Annual 1895</i>
征服者 Conqueror	英	6200	6000	13.3	270英尺	58英尺	24英尺	325 000	93 433	
泰米雷勒 Temeraire	英	8540	6500	13.8	285英尺	62英尺	27.2英尺	352 015	102 954	
萨克森 Sachsen	德	7400	5600	14	298英尺	60英尺	19.8英尺	423 178		
定远	德	7335	6000	14.5	94.5米	18米	6米	约370 000		定价据《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二十一

又据李鸿章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奏称：“定远”造价为141万两，“镇远”造价为142.4万两。用于运费、杂项开支约56万同。见《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42~

45页。

[130] 李鸿章：“复李丹崖星使”（光绪八年正月十八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二十三。

[131] 李鸿章：“复李丹崖星使”（光绪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二十五。

[132] 李鸿章：“验收铁甲快船折”（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李集·奏稿》，卷五十五，页十六~十七。

[13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77~278页。

[134] 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谢折”（光绪元年五月初十日），《李集·奏稿》，卷二十五，页十八；“论海防筹饷”（光绪元年五月十一日），《李集·译稿》，卷三，页十九。

[135] “奕訢等奏请由洋税厘金项下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光绪元年六月初十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15~617页。

[136]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八月十二日），《李集·朋稿》卷十五，页二十七；沈葆楨：“李中堂”，《沈文肃公牍》，第一册，第385页。

[137]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李集·朋稿》，卷十五，页三十三~三十四。又，李鸿章信函中，保留有许多各省欠款的记载。如光绪二年正月十二日给沈葆楨的信中说：“海防拨款，近接各处文牍，惟鄂厘可如数报拨。”三月六日给丁日昌信中说：“目前海防额款仅解到二十余万，力实不济。左相又大声疾呼，谓海防窒碍西局，以后必报解无几。”六月初二日给恭亲王信中说：“上年……准户部会同贵署奏拨每年额饷四百万两。幼丹履任后知各省空虚，有拨无解，容令尽数解交北洋。迄今一年之久，统计各省关仅解到银六十余万两，屢催罔应。”次年三月给吴赞诚信中说：“南洋海防额款号称岁二百万，每年实解不过四十万。”见《李集·朋稿》，卷十六，页一、页八；《译稿》，卷五，页四十一~四十一；《朋稿》，卷十七，页三，等等。

[138][140]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360页。

[139]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三年九月十六日），《李集·朋稿》，卷十七，页二十五。

[141] “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370~371页。

[142] 李鸿章在“请催海防经费片”（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中说，“查户部原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额款四百万两，自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止，统解北洋；自三年七月起，分解南北洋各半。”见《李集·奏稿》，卷三十五，页三十二。

[143] 见李鸿章：“请拨海防经费片”（光绪六年三月初一日），《李集·奏稿》，卷三十六，页二十一~二十四；“光绪六年三月初十日总理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451~453页。

[144] 李鸿章又说：“惟原拨经费四百万两，除去福建、广东截留之款，即使解足八成，合南北洋不过二百万余两，每处仅得百余万。”见“议梅启照条陈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九，页三十二。此处称二百万余两，算法不详。

[145] 北洋海防经费收入状况见下表。

光绪元年~二十年北洋海防经费收入细表

单位：两

年份 (光绪)	厘 金				关 税					海防捐	其他	共计收入
	江西	浙江	江苏	湖北	山海关	浙海关	闽海关	粤海关	江海关			
元-六	580 000	750 000	90 000	800 000	163 887	397 198	203 680	957 069	659 408		125 375	4 826 618
七、八	150 000	210 000	145 000	200 000	58 074	243 049	226 839	318 548	648 676		73 077	2 273 263
九、十	110 000	110 000	80 000	40 000	73 555	245 239	176 503	161 108	315 292		1 213 651	2 525 348
十一	40 000	30 000	45 000		43 684	128 717	103 468	100 000	241 950	1 128 199	47 778	2 862 143
十二				50 000	46 650	128 634			308 271	366 577	50 208	
十三	30 000	140 000		310 000	100 900	147 589			159 037		105 548	2 284 411
十四	90 000	180 000		260 000	98 280	15 634			448 658		67 747	
十五	收湖北、浙江、江西厘金、江、浙、山海关税厘共计									965 110	64 827	1 029 939
十六										1 387 880	76 363	1 464 246
十七	收各省关税厘金										73 624	1 334 339
十八										1 260 713	82 604	1 520 993
十九										1 438 389		
二十	2 646 392	475 720	3 122 115									
总计												23 243 415

注：本表及下页的“北洋海防经费收支结余一览表”的数据来源，见注[149]。

[146] 刘坤一：“南洋海防经费请飭粤海关迅速起解片”（光绪六年九月十二日），《刘集》，第一册，第375页。

[147] 曾国荃：“船炮价值开销疏”（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二十二，页四十六。

[148] 李鸿章：“北洋月支炮费表”（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十日），《李集·奏稿》，卷五十七，页十一~十四。

[149] 以上开支均按李鸿章和王文韶历年北洋海防经费报销折统计。见《李集·奏稿》，卷四十八、六十二、六十七、七十六、七十八；《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160~166页；《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269~270页；《清末海军事史料》，第660~661页。

[150] 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驻洋幼童勾

拨经费折”(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李集·奏稿》,卷四十八,页四十一;卷三十,页五。

[151] 北洋海防经费支出状况见下表。

北洋海防经费收支结余一览表

单位:两

项目 年份(光绪)	收入				支出(5)	结余(6) (4-5)
	拨款(1)	总收入(2) (1+6)	登除(3)	实际收入(4) (2-3)		
元~六	4826618		808084	4018534	2964233	1054301
七、八	2273263	3327564	1075	3328639	1630177	1698462
九、十	2525348	4223810	—	4223810	3295083	928728
十一、十二	2862143	3790871	222528	3568342	2947746	620596
十三、十四	2284411	2905007	230345	2674551	2594830	79721
十五	1029939	1109661	31810	1077850	997183	80667
十六	1464246	1544913	76368	1408545	1426038	42506
十七	1334339	1376345	73352	1299493	1278047	21445
十八	1520993	1542439	191405	1351034	1336739	14294
十九、二十	3122115	3136410	210814	2925585	2924640	945
总计	23243415	22957020	1845781	25876383	21394716	

注:“登除”栏数据,系在海防经费报销时扣除的非海防拨款数额。

[152] 李鸿章:“订造铁甲船折”(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李集·奏稿》,卷三十七,页三十二~三十三;又,定、镇二舰最终经费来源为:福建省关藩盐三库银60万两,福建省奏借出使经费20万两,总理衙门奏拨南洋购船价出使经费40万两,两淮商捐100万两,招商局拨还各省官本四届漕运水脚840 515两,四川省拨官盐税厘30万两,户部划拨30万两,总计3 646 515两,全系北洋海防经费之外款项。见《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42~43页。

[153] 刘坤一:“致沈经生中堂”(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刘集》,第五册,第2481页;“复刘荫渠”(光绪六年七月十二日),《刘集》,第四册,第1890页。

[154]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46~49页。

[155] 李鸿章:“定造快船报销折”,(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集·奏稿》,卷六十五,页九~十七。

[156] 李鸿章:“雷艇经费请销片”,(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集·奏稿》,卷六十五,页二十三~二十六。

[157] 寿尔:“田兔号航行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398页。

[158]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监察御史李士彬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249页。

[159] “光绪十年九月初五日兼署船政张佩纶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346页。

[160] 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第281~284页。

[161]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第165~177页。

[162]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205、207、531页。

[163]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759页。

[164] 参见《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441页；李鸿章：“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片”（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武弁回华教习折”（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李集·奏稿》，卷二十七，页四；卷二十八，页二十一；卷三十五，页三十三；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348~354页，第546页。

[165] “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460~461页。

[166] 参见“北洋大臣李札天津道、津海关道、天津机器局许道其光”（光绪六年七月初一日），《北洋纪事》（第十本）；“李鸿章奏筹办天津水师学堂片”（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清末海军史料》，第389页；李鸿章：“吴仲翔办理学堂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集·奏稿》，卷四十，页四十七。

[167] 张焘：《津门杂记》，第67~69页；又，《万国公报》，第361卷刊有“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内容与本告示相近，可参阅。

[168] 设立天津水师学堂管轮诵堂之初议，见“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水师学堂吴仲翔洋北洋大臣李”，提出轮船水师管驾与管轮相须为用，拟于天津水师学堂后隙地增建管轮诵堂。次年三月，机器局道员潘骏德、刘含芳又以原办水雷学堂诸生入学两年，中西功课无甚长进，建议将学生中资质学业略可造就者提归水师学堂，其资质次下者若愿赴大沽水雷营即发往学习。水雷学堂校舍七十余间，与水师学堂同在河东机器局内，相距咫尺，拟将所有校舍设备全部移交，改办管轮学堂。旋为李鸿章批准。见“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机器局潘骏德等禀北洋大臣李”，以上均载《北洋纪事》（第十本）。

[169] 见李鸿章：“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初四日、九月十四日），《李集·朋稿》，卷十六，页二十九。

[170] 严宗光（复）是中国留学生中理论学习方面的佼佼者。《郭嵩焘日记》中，有许多记录他们在英国交往的内容。光绪五年六月廿二日记：“刘伯因送康侯回自上海，见示曾毓刚日记一本，讽刺鄙人凡数端：……一论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虽属有意相抵而就近事理”（第三卷，第901页）。七月十

一日记：“又陵论颀刚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远甚，所带人从，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又陵言自有理，亦正嫌其锋芒过露。颀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第912页）从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来看，他对严宗光还是很赞赏的：（三月）“十三日，……核改答肄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挾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第168页）此后，薛福成1890年出使英国，他的日记中记录：“查旧卷，光绪十二年署洋督师恭萨克禀曾侯云……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出使四国日记》，第142~143页）。师恭萨克（通译斯基塞格）为第三届留英学生监督，这个报告，应当反映的是第一届留学生监督日意格、李凤苞的看法。1880年李鸿章在给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信中说：“丹崖星使（李凤苞）迭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复黎召民京卿”（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李集·朋稿》，卷十九，二十）。4月19日，张佩纶路过天津，李鸿章曾与他讨论海军人才。他的日记记载：“夜，合肥来话，询及水师将才。……伯潜（陈宝琛）称严宗光者，器识阔通，天资高朗，合肥已往调之来津矣。”27日又记：“黎召民书来，以严宗光不能即到见复。严，伯潜所荐士也”（《洵子日记》，光绪六年三月十一日，十九日）。此时严复年仅二十六岁，朝中硕臣，均以国上待之。但直到1887年底，我们从文献上看到他的职务仍只是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见“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会同沈保靖、罗丰禄详北洋大臣李”，《北洋纪事》（第十本）。关于他在天津水师学堂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后人所知甚少。1882年一位留美归国分在该学堂继续学习的幼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责他教学水平低劣。说“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梁诚（丕旭）致肖（Shaw）”，1882年3月6日，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载《传记文学》，第36卷第6期）。严复后来以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而享大名，但恐怕未必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好老师。

[171]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水师学堂吴仲翔详北洋大臣李”，《北洋纪事》（第十本）。

[172] 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集·奏稿》，卷五十二，页七~八。

第三章 马江之战前后 (1884 ~ 1885)

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们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于“力量”这个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持久力。

A. T. 马汉

一、战前风波

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实力兼并、贸易往来和典章文物制度的吸引,逐步形成了中原王朝控制周边邻国、周边邻国依附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

宗藩关系是中国封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以为,所谓属国,既非殖民地,也不是托管地,中华帝国的思想意识里并不含有近代国际社会的概念。宗藩关系的基本条件是遵礼仪,纳贡献,受册封,奉正朔,而中国作为宗主国,并不操纵或干涉朝贡国的内外事务。只是在朝贡国内乱时,宗主国才有责任出兵平定。^[1]这话分析得有理,但在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它也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通惠四海”、“万邦来朝”的大一统盛世虚荣的点缀物,而是调节同边远异邦民族关系,保证国内安定的缓冲阀。从《左传》上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淮南子》

说：“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到1881年云贵总督刘长佑说：“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矣”，^[2]都是主张把战略防御的空间，前出到国境之外。这是地缘政治学说在国土防御战略中的应用，现代学者有将此称为“国防掩护圈”的。当然，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濡，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地缘政治的应用，主要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同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攻扩张理论和殖民侵略，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近代，随着殖民势力东来，中国无力庇护藩属国，藩属国更是孱弱式微，结果宗藩关系便逐步瓦解。

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藩属国越南，发生了被法国侵略并吞的危机。

越南曾属中国版图。公元970年（北宋开宝三年）脱离中国，建立瞿越国。以后九百多年里，政权屡有更迭，却一直保持了同中国的藩属关系。18世纪起，欧洲人纷至沓来。1749年，法国人皮埃尔·波福尔在越南进行政治活动后，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密奏，必须迅速占领这个国家，以免落入英国人手中。接着，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法国与英国争夺霸权败北，失去了它的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和东印度殖民地。为了继续与英国对抗，传教士达特兰主教在1787年再次建议路易十六占领越南。此后，由于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60年代，它把越南南方五省纳入自己的控制，统称交趾支那。1874年，法国与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又称《第二次西贡条约》），宣布越南完全独立。就法国来说，这是企图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并在控制越南之后，打通进入中国云南的商路；对越南而言，它看到清王朝日益衰弱，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摆脱清朝对它的宗主关系，还梦想依靠法国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王国。

越南君臣惯于首鼠两端，反复无常，在大国夹缝中寻求生存。他们一面求庇法国，以摆脱清朝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国内统治，仍要借助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当他们看到法国势力图谋

并吞整个越南后,又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882年初到1883年底,阮氏王朝通过各种渠道,共向中国发出了三十余次请援要求。^[3]

中国朝野对于法国在越南的殖民侵略扩张早有警惕。1881年12月6日,总理衙门就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4]13天后,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上奏提出:“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越南存而吾之自强易,越南亡而吾之自强难,失其屏藩而欲以多方备之,虽有智者亦不知善其后矣。”^[5]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所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6]

除了这种增加防御弹性和战略主动权的考虑外,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字小之仁,也是清廷决定出兵援越的重要原因。此外,朝廷还看到,“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7]日本已在并吞琉球,若听任法国占领越南,那么缅甸、朝鲜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整个国家便岌岌可危了。

在越南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广东巡抚裕宽认为,越南政令不修,人情恇怯,无法与法国抗争。我若援助越南,异日法越之人俱将有词于我。一方频繁呼吁,一方藉端要挟。与其将来为难,不如不再干预。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担心出兵援越,耗中国之力为越南守土,于彼无益,于我有损。另一位前方的疆吏广西巡抚倪文蔚分析说,越南国政,横征暴敛,民怨甚深。如欲保护越南,必须改易政令,与民更新。否则费财劳师,无有穷期。保护边疆,却没有把握。^[8]这些议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为了遏制法国势力在越南的扩张、保卫中越两国的安宁,朝廷最后还是做出决定,出兵边境,援越抗法。

中越边境一带,群山连绵,坡陡谷深,人烟稀少,几条南北向的山口关隘,保持着两国人员和经济的交流,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东部的镇南关和西部的河口,是维系广西、云南与越南联系的重要孔道。

1879年,广西边军应越南邀请,入越助剿清军叛将李扬才。事定后酌留营哨驻守凉山、高平。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多次请求,广西增援部队进入北圻一带。

在西线,河口对岸保胜一带,驻有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刘永福早年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后来转赴越南,在六安州建立“中和团黑旗军”。1873年,法军侵犯北圻,他应越南约请,领兵抗法。1882年,清政府听从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的建议,作出暗助刘永福抗法的决策,同时谕令云南筹兵布防,以与广西边军遥相呼应。8月,西线清军以“剿办土匪”的名义越过边境,进入越南。

朝廷还密谕广东各兵轮剋期整顿,由吴全美统带,驰赴北部湾廉州、琼州一带操防,并不时驶往越南洋面,确探消息。

1883年2月,法国温和派共和党人茹费理第二次组阁。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550万法郎军事拨款,并增派军队和12艘各式舰船支援侵越殖民军的决议。黑旗军立即教训侵略者,19日,他们在河内城西的纸桥伏击法军,击毙交趾支那海军司令李威利(又译李维业)上校及官兵数百人。

李威利死后,正在瑟堡组建试验分舰队的孤拔海军上校奉命带旗舰“巴雅”号铁甲舰前往阿尔及尔待命。31日,孤拔被任命为“东京”分舰队司令(总司令衔),为他增配了铁甲舰“阿塔朗特”号、二级巡洋舰“雷诺堡”号,炮舰“益士弼”号、“蝮蛇”号、“野猫”号、“火枪”号,以及二级鱼雷艇45、46号。这样,这支分舰队连同原先拥有的舰船,共达25艘。

7月底,孤拔抵达西贡。法军兵分两路。陆路由北圻法军统帅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这支部队失败而归。海路由孤拔率军舰进攻越南首都顺化,一个月后,越南嗣德皇帝阮福时病薨,阮朝内部为继位发生争夺,孤拔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顺化。他迫使

越南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条约声称越南承认法国的保护权，越南只有通过法国才能与外国（包括中国）进行联系。10月，孤拔率军进入河内。12月，法国议会通过新的增拨军费和加派远征军的提案。12月11日，孤拔指挥军队进攻驻扎在山西的中国军队，中法两国的正面军事行动开始了。法国计划将中国海域分舰队和东京海域分舰队合组成中国海域舰队，并拟由孤拔担任总司令。在这个命令正式发布前，法国海军部的负责人多次要求孤拔，注意做好战时集中全部海军力量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

1883年5月1日，上谕命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9]在此之前的3月底，李鸿章刚刚请假获准，离天津回合肥营葬，又如此匆匆地将他召回，可见前线形势的紧迫。

李鸿章是中国变革的先驱人物，但从壮年步入老境，精力、气魄、胆略都大不如前了。在对外事务中，他历来主张忍让，可是每场冲突，朝廷总要他去处理。李鸿章本不以中国介入保护越南为然，此时知悉法国正在扩大战争，桂滇粤防军又是有名无实，因此不愿贸然前去。他一面上奏，提出法国志在逼胁从，面不在吞全越，说广东水师不能与法相敌，担心法舰扰我海口，请各省督抚自行调度，自己暂住上海，统筹全局，再定进止。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关系在京枢大老中展开公关活动。比如袁保龄就给李鸿藻写信，建议调李鸿章驻天津或坐镇上海。13日，朝廷同意他暂住上海。24日，张佩纶上奏，请召李鸿章回天津署理直督，又说曾国荃在广东调度乖方，请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广东。^[10]同日，李鸿章又收到津海关道周馥拍来的密电，报告法国方面密拟的议和办法，其中提到在法国势力范围和滇桂边界留出中立地带，以作缓冲，于是更拿定主意。到达上海后，他一面请张树声调丁汝昌带“超勇”、“扬威”、“威远”3舰来吴淞候派，为南下作准备，一面继续故意拖延行期。朝廷知他心事，6月20日下谕将他北调，仍回北洋大臣署任。7月13日，更采纳张佩纶前议，命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回两广总督本任，曾国荃来京陛见。在这场内部权力之

争中,李鸿章大获全胜,不过一年时间,他就收回了母亲去世前的全部权位。〔11〕

李鸿章认定中国无法与法国匹敌,主张运用国际法,将中越边界固定下来,以防止外国势力侵入,这也是他后来“乘胜议和”的基本思路。问题在于,在19世纪下半叶这样一个强权时代,仅靠国际公法,能否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如果不能,中国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1884年4月,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在前往广州就职途中,在香港会晤了新任法国“中国”分舰队司令利士比海军少将和旗舰“窝尔达”号巡洋舰舰长福祿诺海军中校。福祿诺1879年即率舰来华,居天津多年,与李鸿章熟识,还帮他斟酌过水师章程。经过德璀琳的斡旋,决定由福祿诺代表法国方面前往天津谈判。5月7日,福祿诺到津,他虽然是个低级别官员,李鸿章同他还是谈得情投意合。11日,双方签订的《中法简明条款》(即《天津专约》)规定:(一)北圻归法国人保护;(二)中国将在北圻的部队调回国内;(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四)中国允许通过北圻向中国内地通商;(五)法国与越南议改条约时,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的字眼。〔12〕接着,6月23日,法军在谅山北黎附近的观音桥交涉中国退兵时,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被打死打伤50余人,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失败。

1884年的北京,政局充满了诡谲的变数。由于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等人的昏庸怯懦,指挥失误,战事节节失利,后方朝野震怒。3月26日,朝廷下令革职拿问唐、徐,命贵州巡抚张凯嵩、湖南巡抚潘鼎新分别署理云南巡抚和广西巡抚。在表面的人事变动后面,孕育着一场剧烈的政坛风波。

事情又从张华奎而起。1882年张佩纶反悔为张树声帮办北洋海防的承诺,并与李鸿藻、陈宝琛联手给张树声难堪,使得张家父子耿耿于怀。上年,张佩纶又上奏把李鸿章搬回天津,面将张树声逐回两广,更使二张之间结冤加深,张华奎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

报复。据说他草拟底稿,通过王仁东,说动左庶子盛昱出头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13]王仁东(字旭庄)、其兄王仁堪(字可庄)及盛昱(字伯羲),都是著名的后清流人物。王仁堪还是光绪三年的状元,与盛昱为同年。他们虽科名较晚,却也都以才学和刚直著称,宛若数年之前的张佩纶、张之洞。王仁堪兄弟的祖父王庆云,曾任工部尚书,姐夫陈宝琛,则是前清流的健将,张佩纶的密友。王仁东本人,又是陈宝琛的妹夫。如果再深究的话,则唐炯是张之洞的妻兄,徐延旭是张之洞姐夫鹿传麟的儿女亲家,本来大家私下都是走得极勤、又相互提携的亲戚朋友,此时在对越作战的观点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王仁东还专门写了《与张佩纶绝交书》,谓“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张佩纶回书说:他的责任,并不在误保徐延旭、唐炯,不能出战的原因,实在是水师火器,与陈宝琛三年前所沥陈时一样,全未预备,贸然出师,实为兵家大忌。这种解释的口气,倒像是洋务大老李鸿章。“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今日身在局中,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绝交与否,听之中散”,^[14]张佩纶名士作派,如此回答。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王氏兄弟早已被张树声买通,作为他安插的“坐京”(专指受外省督抚委托,在京打探消息的人)。

张华奎要盛昱参张佩纶、李鸿藻,盛昱不愿,又无法推脱,便说不如参军机大臣。他以为漫漫地指斥一通军机大臣,军机并不会倒台。4月3日,他用清流式的激愤语言上折说道: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粤,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愆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璽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唐炯、徐延旭既经拏问,即当另简贤员,乃

就近于湖南用一潘鼎新，复就近于贵州用一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以奴才愚见揆之，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如此存心，殆不可问，是诿卸之罪也！该大臣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廿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讳饰素习悉数湔除……^[15]

盛昱没有想到，这封奏折却给慈禧太后借题发挥地利用了。

慈禧与恭王多年来就有矛盾冲突，近年来恭王精神萎靡，不思进取，也是事实。加上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久静思动，企图参与实际政治的野心，使得朝局大变。太后见盛折当日，对着军机大臣批评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对祖宗，盛折却留中不发。此时恭王并不在场，他被派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奠。4月8日发表懿旨，以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退休，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旋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6]这一轮新人马，虽然平均年龄降低3岁，论能力、论主见和原则性，总体上均不如老军机，但这样更便于慈禧太后驱使指挥。从此，晚清政局出现了

新的格局。

盛昱上奏，是慈禧太后等待已久的由头和机遇，直接触发了“甲申易枢”事件。这次易枢，受益者是醇亲王奕譞，参与幕后策划者，传说是醇王心腹孙毓汶。醇王因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为避嫌疑，不能直接进入军机处，便以礼王为傀儡，以孙毓汶为代言人。也有人怀疑翁同龢参与其事，因为翁历来与醇王走得极近，也与孙毓汶关系很深。从所得处分上看，他是最轻的和象征性的。张佩纶在盛昱奏上留中不发后就听说了传言，他写信密告李鸿章：“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张佩纶猜测涉及到的人，除他自己外，还有李鸿章、张之洞、吴大澂。待到事发，他又给李鸿章写信分析说：“乐道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此事“固上有积怒，实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庄因袒振轩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高阳罪，以任高阳为恭、宝罪，不过呈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但他又怀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此处，“虞”即指翁，因翁氏家乡为常熟虞山；“兴”指醇王，当时以明代兴献王比醇王；“乐”及“乐道”指恭王，因其所居为乐道堂；“高阳”指李鸿藻。^[17]李鸿章也极震惊，他回信说：“一朝同罢，汲取乳臭陋儒，更合足措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此后变态百出，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18]翁同龢自己，当然不会承认，但细读《翁同龢日记》，还是会发现线索。如盛折出奏前三四天，他称恭王见慈禧太后议事时，用了“极琐细不得体”、“刺刺不已”、“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等贬义的辞藻。4月6日，他记“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7日又记：“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19]盛奏引起翁同龢如此关注。细细体会翁氏心态，他倒更像是在等待盛折的结果。

到了5月，正是北京海棠初红，杨絮纷飞的春天季节。新班军

机大臣的心情,却没有随着春天的来临而舒畅起来。前线暂时沉寂。手握兵权的李鸿章正在力主和谈。京师里充斥着清流的激昂高论。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有六条可杀之罪,请旨明正刑典。

5月8日是福祿诺到达天津的第二天。早晨,北京的天空阴沉沉的,颇有下雨的征象。快到中午的时候,又刮起了大风。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里,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20]这道上谕,引得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说,清流帘卷不衰,朝廷倚作股肱,此次正要一试锋芒;有人说,书生典兵,必无善果,这是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沸沸扬扬,不一而足。

这个决定,从以后的结局看,确实是慈禧太后摆弄清流的权谋。清流气焰的张狂,在官场中已经引起普遍反感。醇王就说,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21]恭王、李鸿藻之后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自然容不下张佩纶者流。清流班头,最不晓办事之难,投入浊流中冲刷,颇能磨其桀骜不驯的火气。南北洋大臣曾国荃、李鸿章都是主和的,且是寿高位尊,弄两个书生在一旁不时撩拨,也可促其振作。本来,主战主和,水火不容,现在,把张佩纶放到福建会办军务,就能使和战局面都掌握在朝廷手中,真是妙不可言。宫廷政治的全部秘诀,就是操纵派系,玩弄平衡。慈禧太后到了五十岁的年头,可谓修炼得炉火纯青、收发由心了。

清流谈事议人,常是鞭辟近里,入木三分,却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只能凭人摆布。三人之中,吴大澂为长,时年49岁,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陈宝琛年仅32岁,此时正在江西学政任上,忽然简授新命,腾蹕云路,真是做梦也未想到;张佩纶更是春风得意。对他来说,闽浙总督不像南北洋大臣,没有办理海疆的使命,因此“会办”便是独当一面的钦差大臣了。

6月中旬,张佩纶、吴大澂和新近由山西巡抚迁署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联袂出京,前赴任所。会办海防,同纸上谈兵完全不同,三位新贵,决定先往天津,拜访前辈李鸿章。

应李鸿章邀请,他们前去视察北洋海军。初夏的太阳已很晒人,但站在鼓浪前进的“超勇”舰上,却觉得海风猎猎。“扬威”、“威远”、“康济”诸舰尾随“超勇”,不断演变鱼贯、雁行阵式,并在海上进行打靶表演,使新贵们眼界大开。

6月23日,舰队抵达旅顺口,一行人察勘了正在施工的炮台和船澳船坞工地,见到了分别多日的好友袁保龄。翌日乘舰前往烟台,与停泊在那里的六“镇”会合,军威更为壮观。接着又往威海观看德国教官哈孙指挥鱼雷营施放鱼雷。26日,二张登上福建派来迎接的“扬武”号军舰前往上海,吴大澂与李鸿章扬舲北旋。

临歧之际,依依不舍。几天的朝夕相处、促膝密谈,使得简授新命的钦差同洋务元老心意相通。出京前,张佩纶上奏请设沿海七省水师,提出参考五六个海军国家的编制,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因此必须设立外海水师和专门的水师衙门。请特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用兵轮,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节,以专责成。此后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师一军之饷。^[22]这本是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商量后待奏的主意,根据慈禧太后召见张佩纶时的懿旨,改由张佩纶上奏条陈,以使这个改变南北洋海军同步发展,统一全国海军建设的计划,不带有地方派系的痕迹。此次在津时,他又与李鸿章密议,决定用抽调闽局轮船回福州聚操的名义,把分布各省的船政局军舰重新集中起来,为统一七省兵轮水师张本。

“扬武”舰启航了。军舰缓缓驶出威海湾东口,载着七省海军的美丽梦想。对一艘巡洋舰来说,这个梦想并不算沉重,但对一个36岁的青年官员,他却感到紧张。张佩纶还不知道,就在他们到达旅顺口那天,观音桥事件发生了。从此,命运之神将不再对他青睐,任何海军计划将与他断绝缘分。

二、马江之战

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二海军大国。在 1882 年,它已拥有 38 艘铁甲舰、9 艘岸防铁甲舰、50 艘巡洋舰、炮舰和 60 艘鱼雷艇,总吨位达 50 余万吨。^[23]这是它推行殖民炮舰外交的军事机器。

6 月 30 日,一位法国军官在拍给海军殖民部长裴龙的电报中,提出海军分舰队采取强力军事行动,占据一地为质,对于强制中国履行《天津专约》是必不可少的。次日,法国对华谈判代表巴德诺也向茹费理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孤拔更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使得清政府措手不及。他在舰队的供应、引水员和翻译方面都做了准备。就在这时,福祿诺带着《天津专约》的文本回到巴黎。他认为李鸿章是真诚的,只有他拥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因此建议照顾李鸿章,避免把战斗引向北方。茹费理也担心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会引起国际纠纷。他给孤拔拍电说:“我们不明白突然袭击旅顺和威海卫这两个正在建设中的港口有什么好处。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照顾直隶总督。我们对我方军舰尚未到福州河感到遗憾。”^[24]法国政府批准了入侵闽江的计划,法国不仅在中越边境同中国作战,而且要到东南沿海来开辟第二战场。

7 月 12 日,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天津专约》,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赔偿 2.5 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13 日,裴龙训令孤拔:“遣派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25]14 日,孤拔率舰队离开上海南下,只留“德斯丹”号归巴特诺指挥。同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行至马尾附近的半屿搁浅。

16 日,清政府决定妥协,撤退北圻的中国军队。这样为中法之间的再次和谈提供了机会。朝廷同时谕令各地,“倘有法军前

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26]这实质是一个消极防御的指令。也在这天,奉命督办台湾事务的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台湾基隆。而朝廷得悉,孤拔将于明天进入闽江。

7月19日,清政府派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驰赴上海,与法国代表巴德诺谈判。法国同意将哀的美敦书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在谈判中,曾国荃提出,中国只能以抚恤的名义,给银50万两。由于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在前一天拜访了总理衙门,表示愿请美国总统向法国总统斡旋,这样大大增强了朝廷的自信心。军机处拍电拒绝给法国任何名目的银子,并传旨申饬曾国荃、陈宝琛,于是谈判又陷僵局。为了防止战争突然爆发,招商局所属轮船就在这天全部售给美商旗昌公司,悬挂起星条旗来。

8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孤拔命令“凯旋”号铁甲舰和“德斯丹”号巡洋舰攻击吴淞的中国舰队。由于法国政府担心这种袭击会引起国际问题,公开做了战争不危及上海的保证,这个命令遂未被实施。

法国人自然不甘心。茹费理说过,“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27]这是因为台湾孤悬海外,防御薄弱,又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供军舰商船补给。从地理位置来说,这里是控制太平洋局势的战略要地。8月2日,停泊在闽江的法国舰队接到法国政府“破坏基隆港防御工事暨市街,并占领附近煤矿”的命令后,利士比于次日乘“鲁汀”舰升火出发,在马祖澳与“巴雅”号、“拉加利桑尼亚”号会合,4日抵达基隆。另一艘法舰“费勒斯”号已经在这里等待两个星期了。

在刘铭传来台湾前,全岛防务归兵备道刘璈指挥。防御布局重南轻北,把主力放在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刘铭传到后,将原有和新增的15500余人重新布置,在台北设立大营。以基隆、沪尾为据点,以使防务中心北移。还加强了基隆炮台建设,在淡水海岸

埋设地雷,港口敷设水雷。这番紧张的调兵遣将,设防安炮,前后只有 20 天时间。

4 日下午,利士比派一位传令官上岸,把一份要求中国军队交出所有工事的劝降书交给守军。中国军队置之不理。

5 日上午 8 时,法舰开始炮击基隆炮台,滚滚浓烟和爆炸的火光弥漫住整个作战区域。由于中国炮台的火炮射程较短,没法达到法舰,炮弹的爆炸力也不足,射中法舰后没有产生致命的效果。经过一小时炮战,仓促构筑起来的炮台被法国舰炮摧毁了。

“费勒斯”号上的 80 名陆战队员换乘小艇进行登陆。其他军舰上的陆战队员也源源不断地涌上登陆点。法军的抢滩冲击取得了成功。中国军队退守附近的山头。次日下午,法军向基隆市街推进,遭到反击。刘铭传指挥守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展开数小时的激战。最后法军不支,丢下枪械帐篷,匆匆撤回军舰。第一次进攻基隆便这样失败了。

清政府对法方在和谈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法国代办谢满禄则继续勒索观音桥事件中的赔款,只是将数额减至 8000 万法郎。外交代表们相持不下。8 月 16 日,茹费理在上下两院对华作战拨款表决中获得必须的信任票后,决心扩大对华战争。他训令孤拔,如果法国要求再被拒绝,他应于知照外国领事及船舰后,立即在福州行动,毁坏船厂的炮台,捕获中国的船只。福州行动后,提督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一切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战斗。^[28]显然,法国决心扩大战争事态,并通过消灭福州的中国舰队,掌握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消除腹背之患,最终得以攫取台湾为抵押品。一场海军决战势不可免了。

7 月 3 日,张佩纶乘坐军舰抵达福州。

从闽江海口到马尾,水程共约 80 华里。两岸群山夹立,形势险峻。口外,有五虎门、壶江诸岛,兀立海中,为前哨防线。江口,琅琦岛的金牌和对岸的长门,各设炮台,总扼芭蕉、五虎、连江三个入口。两岸之间,还有南北龟岛,一向被称作“五虎把门、双龟守

户”的天险。张佩纶站在甲板上，细细察看了形势后，军舰驶入闽江。金牌、长门、瑯头、亭头、闽安、员山寨一一闪过，高高的罗星塔遥遥在望了。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缓，是闽江和乌龙江汇流之处。“扬武”缓缓地在江中调过头来，靠上码头。

船政大臣何如璋率领员弁士绅在码头恭迎钦差。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人，曾于1876年任驻日本公使，1880年回国，上年调来马尾任职。当天两人察勘了船政局。次日，张佩纶进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穆图善是满洲镶黄旗人，那拉塔氏，字春岩。早年为多隆阿部下，是八旗中的骁将。何璟，字筱宋，广东香山人，翰林出身，在闽浙总督的交椅上已经坐了八年。张兆栋，字友山，山东潍坊人，进士比何璟更早一科。张佩纶虽是后进，却是新贵，不知衔有什么秘命，又有李鸿章做奥援，所以大家对他恭恭敬敬，把大局全托“幼翁”主持。

根据分工，督抚驻省，将军驻闽江口，张佩纶与船政大臣驻守马尾。船政局一带原有陆兵2营，水师1营防卫，令参将杨延辉将南台所有漳、泉精壮编集成军，扼扎马尾。长门、金牌要塞，本有张得胜9营、方勋2营驻守，又从兴化、澎湖抽调潮普3营，以厚声援。惟有军舰缺乏，除了原有“扬武”、“福星”两舰外，从外地把“福胜”、“建胜”两炮艇调回待命。撤换闽安协副将蔡根业，由“扬武”管带张成署理，并管理船政局营务处，统带一切兵船。^[29]

局势越来越坏。14日张佩纶等向军机处报告，法国领事通知今日将有两艘军舰入口。目前中法尚未决裂，拦阻即背条约。朝旨规定彼若不动，我不先发。但法舰深入，我方便失主动。谅山中法已经开战，不能不作慎重考虑。^[30] 朝廷的答复仅是规劝法国领事，彼此宜遵条约，切勿生衅。军舰勿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31] 15日，张佩纶再报，孤拔明天进口，未便阻止。听说法国拟取福州为质押，如果朝廷不同意谢满禄的谈判条件，务乞于答复法国照会之前一二日速示福建，使闽军得先下手。否则敌人内外夹攻，我们就要中其奸计。^[32]

到18日，进入闽江的法国军舰共有“益士弼”、“雷诺堡”等4

舰。孤拔即在“益士弼”上。19日,法舰增至5艘。次日凌晨,将是法国通牒的最后期限。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限期已满,法国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阻拦,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33]张佩纶立即赶往船政大臣衙门,找何如璋进行布置。先派张成驾“扬武”和两艘小礮船驶入法舰锚地,与敌杂泊,阻其猝发,并准备以船相撞;又派2营部队进入周围阵地,命人在沿岸遍张旗帜,以作疑兵。这天风雨大作,法舰见清军调动频繁,也极为紧张。入夜,孤拔命各舰打开探照灯,防止突袭。由于法方此时尚未决定开战,张佩纶也不敢擅行决定攻击,双方紧张对峙,直至东方拂晓,度过了不眠之夜。天亮后,两艘法舰退至壶江口之马祖山,另一舰退至闽安。

形势依然紧张。何璟、张佩纶和何如璋分别电请朝廷饬下南洋速派军舰增援闽防。曾国荃一口回绝,李鸿章也电告总署,北洋轮船皆小,本不敌法之铁甲兵轮。又有3艘法舰现屯烟台口外,每日生火作欲动之势。旅顺孤悬海外,必须严备。倘令兵船远去,设有疏虞,咎将谁执?至于六“镇”炮艇,只可守口,不能海战。现调大沽北塘防护炮台,断难远去,去也无益,^[34]使得张佩纶大为失望。李鸿章还在给别人的信中讥讽:“马尾船厂危于累卵,幼樵屢电尚盛称军威,亦不自量力之甚矣。”^[35]惟有张之洞,看在多年友谊的份上,向福建派去“飞云”舰以作支援。此外,从浙江调回“伏波”号。

法舰除威胁马尾之外,又有数舰前往台湾,并扬言要攻打舟山、琼州。本来,法国舰队劳师远来,理曲人乏,深入闽江更是自人险地。中国军队以逸待劳,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但朝廷迟迟不定和战大策,以致法军反客为主,依靠军舰的机动性,使沿海七省陷入一片慌乱状态。孤拔率舰队进入马尾后,还横蛮无理地宣布,不准停泊于港内的中国军舰出入及改变泊位,不准在港内布雷及构筑防御工事,否则等于向法军宣战。中法在台湾交战之后,北京的希望仍在曾国荃的和谈,不下开火宣战的决心,福建方面只好忍气

吞声。

张佩纶只能不断地拍电报。

7月26日,他致电军机处:“闻法又密议船局为屏蔽,据则能禁口岸,轰则得摧。胜负呼吸,争先下手。”^[36]他征集了30艘帆船装满石头,停泊在长门附近,以备阻塞航道。朝廷答曰:“现在闽口有英、法等国保护兵船,德国兵船亦将前往。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藉口。着与何璟等相机妥办。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37]8月5日,张佩纶又致电军机处:“兵,诡道,不可先传。敌船至,始商各领事,无及;未到先商,是激法增船。互援是活着,先发是急着。舍两着,布置更难!不乘未定时先筹,若待敌船大至,当何所持耶?不敢屡渎宵旰,愿诸公审思。”^[38]直至8月17日美国调解失败,军机处才向各地传旨:“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39]又命福建不许放孤拔出口。^[40]张佩纶感到绝望。他向张之洞发牢骚:“旨云‘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怯战者即可藉口。无专权,无斗将,虽欲先发,能乎?愤闷!以闽为天阱,不准出口,尤奇。恐必愤事也。”^[41]

中法双方的军舰彼此在对方的火力圈内对峙着、恐吓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不堪负担。张佩纶出京时,何等翩翩得志?到闽后,醇亲王托周德润关照他珍重、勿蹈险。李鸿章、陈宝琛劝他干脆炸毁船政局,以杜法人覬覦。这当然都是空话,与大局无补。而未来的败局,张佩纶也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骏的信中,他无限感慨地写道:

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枢泽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尤且如何,国事可知……合肥(李鸿章)……不知何以胆怯如此?然内谋不决,酿至法大举入犯,则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42]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致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43〕

或许是台风过境,8月21日,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直到22日才渐渐平息下来。这天晚上8时,晚霞的余晖刚刚消失,黑暗笼罩住闽江。江上的民船仍在来来往往地行驶,船政局的工人坐在家门口乘凉。有的人在传说中法将要开战,有的人对流传已久的战争消息不再耐烦。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确切知道,这是和平的最后一个夜晚。

根据下午5时收到的法国政府训令,孤拔召集所有舰长到“窝尔达”号旗舰上开会。他下达了次日作战的命令。

停泊闽江的法舰共有9艘:二级木壳巡洋舰“窝尔达”号,排水量1300吨;炮舰“益士弼”号,471吨;“野猫”号,515吨;“蝮蛇”号,471吨,皆在罗星塔以西水域。二等铁骨木壳巡洋舰“杜居士路因”号,3189吨;二等木壳巡洋舰“费勒斯”号,2268吨;“德斯丹”号,2236吨,泊在罗星塔以东水域,总吨位达10387吨,共拥有火炮72门。在“窝尔达”号那个分舰队里,还有45、46号鱼雷艇。此外,二级巡洋舰“梭尼”号和通讯联系舰“雷诺堡”号,驻在金牌、瑛头一带江面,防止清军塞口封江,保障后路安全。

孤拔的作战计划是,23日下午2时左右,各舰利用退潮江水移转船身时起锚,低速前进。旗舰升起第一信号旗,这时鱼雷艇出动,攻击上游的两艘中国军舰。当第一信号旗下降时,全线开火。“窝尔达”号以左舷火炮掩护鱼雷艇,以右舷火炮攻击中国师船。“野猫”号、“益士弼”号、“蝮蛇”号从旗舰左舷出动,攻击马尾船政局附近3艘中国军舰。“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斯丹”号以左舷炮火击沉与它们舷侧相对的3艘中国军舰,以右舷炮火攻击成列的中国师船。“德斯丹”号随后驶人附近海关的水流汇合处,追逐中国水雷艇,再驶回旗舰“窝尔达”号附近。

这个计划的特点,是利用中国军舰船头系锚,退潮时船尾对着法舰,不能发挥前主炮的火力优势,交战时必须完成180度的回转,才能向法舰攻击。孤拔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但是,倘若中国军舰利用上午涨潮时先发动攻击,那么整个情况便会倒置,优势和主动权便掌握在中国海军手中。根据40多天的观察,孤拔断定中国人决不敢首先开火。这是孤注一掷的估计,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法国是个传统海军国家,在作战经验上远比中国人丰富。

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应约来到军舰。孤拔把法国政府的决定通知给他,商定次日上午8时,将交战消息通报各国领事,10时把战书送给闽浙总督何璟^[44]。

8月23日清晨,太阳从东面山头冉冉升起,波光粼粼的闽江犹如一幅金色的绸缎,一切是那样静谧。孤拔早早地起了床,像往常一样,他穿上中国绒制服,戴上白色的草帽,站到后桅甲板,仔细地观察着前方停泊的中国军舰。

一个多月来,福州船政局从省内及浙江调集了10艘军舰,加上张之洞派来增援的“飞云”,闽江上共泊有11艘。在罗星塔以西与孤拔的“窝尔达”等6艘对峙的,是“福星”、“扬武”、“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8艘大致以单横队展开。另有3艘泊在闽江南岸,即“济安”、“飞云”、“振威”,监视着“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和“德斯丹”。中国军舰的总排水量约9900吨,除了“福胜”、“建胜”是从英国进口的炮艇外,其他军舰都是船政局制造的,以“扬武”号为最大。“伏波”、“琛航”、“永保”、“济安”、“飞云”的排水量也都在1200吨以上,木质船身,没有装甲防护,共有火炮50门。以双方实力而论,悬殊并不很大。尤其是在罗星塔以西水域,法舰总吨位仅2694吨(不含雷艇),而中国军舰总吨位达6800余吨。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帆船,7艘载有鱼雷发射机的汽艇和若干装有杆雷的桨船。附近岸上还有7座新式炮台,为中国军舰提供火力支援。孤拔舰队深入危地进行挑衅,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他把希望寄托在突然袭击上。

白藻泰没有亲自前去递交战书,而是委托了一个传教士去执行这个任务。战书辗转周折,又经翻译,到何璟手中,已过11时(午刻)了。何璟开始误解战书内容,直到下午1时以后(未刻),方才急电船政局和长门炮台准备。^[45]这样就延误了战前的宝贵时间。孤拔不向近在咫尺的张佩纶宣战,而故意把战书递交福州的何璟,是利用传递消耗时间的权谋。所以,所谓提前四小时“宣战”,实际上同不宣而战差不多。加上中国官员的昏庸,孤拔果然如愿以偿。

清政府对于法国要在福州挑起战争的判断存在严重失误,对于布置战备更是麻木不仁。福州前敌指挥官的处置,也有重大失误。8月19日,法国代办谢满禄照会宣称,必须在两天里赔偿8000万法郎,否则下旗出京,由孤拔自取补偿。同时清政府又听说孤拔军舰要出闽江,于是急忙电令何璟等人勿任法舰出口。21日,谢满禄下旗出京,朝廷仍未意识到国家已到战争边缘,甚至以为这是法国人示弱的一种表示。张佩纶再次电求拨船四五只,四天内速到,指出惟此才可阻法开战。如此紧迫的军情,军机处仍拖至23日才向南北洋转寄派援的电旨。法使出京后,英国领事向福州当局提供了开战在即的情报。22日,洋教习迈达路经马尾,魏瀚前去拜访时,又证实了中法外交决裂的消息。这天晚间,就在孤拔召集军事会议的时候,何璟向张佩纶拍电,通报说,根据传闻,法国人可能明天趁潮进攻马尾。张佩纶回电严备以待,^[46]但以交战照会未至,仍然迟疑不决。23日清晨,英国领事再次向福州当局透露:“三日内法必开战,其意先将船厂轰,再行渡台。”^[47]马尾方面仍然一片平静。船政局照常开工,舰队也没有接到备战指令。届近中午时,何如璋对法国人的备战举动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命魏瀚再找英国领事探听消息。英国领事此时已往闽江下游的军舰上等待观战了,魏瀚居然弄来一条鱼雷艇前去寻访。

孤拔发现一艘中国鱼雷艇从上游开来,以为中国人开始进攻,立即命令把第一信号旗升至桅顶,45、46号鱼雷艇立即出动攻击。按预定计划,其他法舰要待鱼雷艇实施突击后才开火,可是“野

猫”号上的机关炮却“哒哒哒”地扫射起来。孤拔恐怕中国军舰回击，便下令降下第一信号旗。顿时，震耳欲聋的炮声响彻江面。中法马江之战提前开始了。此时是下午1时56分。

“扬武”舰实习军官，留美学生容尚谦首先发现“窝尔达”号桅杆上信号旗降落下来。他立即报告管带张成。可张成以为是法舰上有军官病死，下半旗致哀呢。正议论间，炮弹便如雨而至^[48]。这时另一位留美学生杨兆楠立即施放后主炮，第一炮便击中“窝尔达”舰桥，当场炸毙引水员汤姆斯和五个水手，孤拔仅以身免。同时木匠周宝用铁锤击断铁链，张成急令开船。然而为时已晚，46号鱼雷艇向“扬武”舳部发射了一颗鱼雷。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鱼雷命中了。“扬武”仍挣扎着开动，驶向岸边搁浅。46号鱼雷艇企图退出战场，但“扬武”的后主炮击中了它的锅炉。受了重伤的鱼雷艇歪歪斜斜地向下游驶去，躲进中立国观战军舰行列。战斗中，留美学生邝咏钟、薛有福、黄季良、杨兆楠牺牲，^[49]张成则在混乱中跳水逃生，为江水冲至上歧君竹乡江边遇救。

45号鱼雷艇的攻击目标是“福星”，它的鱼雷没有命中。“福星”在管带陈英的指挥下，同鱼雷艇接舷作战。陈英，字贻惠，福州人，船政学堂毕业生。他人极瘦弱，但作战英勇，指挥水兵们用步枪和手榴弹冰雹般地向法舰打去。一颗子弹击中艇长的眼睛。鱼雷艇狼狈不堪地逃跑，驶到美国军舰“企业”号的附近。

这时，陈英的侍从向他喊道：“‘伏波’、‘艺新’正向上游开驶，我们怎么办？”

陈英眦目大喝：“要我逃走？大丈夫食君之禄，宜在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

全舰官兵，声诺雷动，于是鼓轮前进，向敌攻击^[50]。

“窝尔达”号副舰长拉北列尔负责指挥小汽艇载水雷袭击中国军舰。他看到45号鱼雷艇未能得逞，便跳上“淮特”号（“窝尔达”号的舰载汽艇），向“福星”的螺旋桨部位发射鱼雷。“福星”被击中了，陈英中弹牺牲，三副王澐继续指挥开炮。军舰最后在熊熊大火中沉没。

又是一阵炮声从远处传来。孤拔喜出望外地喊道：“是利士比或是‘凯旋’号！”

果然是法舰“凯旋”号。这是一艘4127吨的装甲巡洋舰，原来泊在马祖。早晨10时，它驶入闽江，顺利地穿过沿江各炮台，进入战场增援。孤拔见状，立即命令“窝尔达”向“扬武”冲击。“扬武”船身的四分之三都着了火，就在即将沉没的一霎，一面中国龙旗升上了它的桅顶。炮手向法舰送来最后一炮，以致法国军官也称赞它“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

“凯旋”炮击“振威”，“振威”虽受重伤，但在管带许寿山的指挥下，向“德斯丹”冲去，准备同归于尽。许寿山，字玉珊，福建闽县人，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他平时以豪杰自命，也好交结天下豪杰。喜山水，善书法，能吟诗，有儒将风度。此时冒着枪林弹雨，毫不畏惧。一位外国目击者写道：“这位管驾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其高贵的抗战自在人的意料中。他留着一尊实弹的炮等待最后一着。当他那被打得百孔千疮的船身最后颠斜下沉时，他仍拉开引绳，从不幸的‘振威’发出嘶嘶而鸣、仇恨如海的炮弹……重创了敌舰长和两名士兵……这一件事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记录上均无先例。”^[51]

“飞云”由广东水师参将高腾云驾驶。高腾云行伍出身，人瘦弱，不善言辞。战斗中，手发巨炮，与三敌舰周旋。后被弹片炸断腿，又被炮弹炸入水中而殁，死事最为惨烈。

“福胜”、“建胜”两艇抵抗时间最长。在炮艇统带吕翰的指挥下，叶琛、林森林两位管带奋不顾身地向敌舰进攻。吕翰，字廉堂，广东鹤山人，也是船政学堂毕业生。当法舰驶入闽江后，他写下“翰受国恩，见危授命，决不苟免！”的遗书，并把老母妻儿送回老家，已作一死的决心。此时他短衣仗剑，督战发炮。额部被流弹打伤，血流满面，仍裹伤再战。有凫水逃生者，挥剑砍之。两艇直至2时32分之后，才被击沉。其中一艘被敌人240毫米大炮的榴弹击中，后部猛地沉入水中，船头高高竖起，龙骨几乎与水面垂直。摇晃了数秒钟后，才向右舷倒下，被江水吞没。

双方军舰的炮战持续了40余分钟。中国军舰除“艺新”、“伏波”两舰负伤后向上游逃脱外,其余九艘全被击沉击毁。另有一批旧式师船被击沉。共牺牲海陆官兵700余人,包括舰长6名,其他海军军官58名,新式军舰及旧式师船士兵695人。法军方面,死6人,伤27人,一艘未沉。^[52]

接着,法舰又与陆地炮台对射。4时55分,孤拔下令军舰退至炮台火力圈之外抛锚。

江面上漂浮着木板、篷帆和尸体,高高低低地露出沉没军舰的桅杆和部分上层建筑。江水被鲜血染成红色。人夜,罗星塔附近江上渔火点点,哭唤连绵。乡民们驾船打捞死难者的遗骸,位于战场下游的洋屿乡共捞起500余具尸首,其中尸体完整的仅132具,陈放在庙中,招亲属认领。这些全尸首,多是落水后为法国人用竹竿猛击淹死的。^[53]马江之战牺牲者的遗骸后来被葬于马尾山麓,并建立了昭忠祠。

当闽江上传来第一阵舰炮的轰鸣时,张佩纶刚刚拿到译毕的何璟电报。张佩纶立即带人登上中岐山观战。江面上枪林弹雨,浓烟烈焰,水柱冲天,血肉横飞。他目睹着一艘又一艘中国军舰沉没江底,心如火焚,万念俱灰,却拿不出一点办法。开战必败,这样的心理准备是早已有了的,却没想到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数月之前,京师之中,议论海防边务,那是何等痛快,何等气派,及至今日,方才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逭的绝望心情。天黑之后,张佩纶向朝廷发出了第一份马江战败的电报,自请处分,^[54]然后退居山后彭田村居住。后来人们出于对他及何璟、何如璋、张兆栋在战争中指挥失误的激愤,作词讽刺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语句自然十分刻薄了。

何如璋也是第一次经历战阵。当法国舰炮的轰击停止后,他仓惶地换上便衣,坐上竹舆,带着80余名勇丁,匆匆离开船政衙门,当晚宿在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乡施氏祠堂。何氏一行引起农民的好奇,竞相前来观看落难的船政大臣。第二天,他又派人回

局,取出库存的36000余两白银,押着前往省城。

24日,孤拔打算派陆战队员占领船政局,但临时改变了主意。因为局中有守军千余人,又有传说中国人早在船厂埋下大量地雷,于是决定用大炮摧毁这座由法国人帮助兴建的造船企业。由于吃水关系,他派吨位较小的“野猫”、“德斯丹”和“蝮蛇”号去执行。从上午开始,法国的炮弹雨点般落在车站、仓库和船台上,工厂熊熊燃烧,发出五次剧烈的爆炸声。据战后调查,除了船政局内新设立的炮台被破坏外,“砖砌之厂,以合拢厂、画楼为最,水缸厂次之,炮厂、轮机厂又次之,铸铁厂为最轻。架木之厂,以拉铁厂为最,广储所、砖灰厂次之,船亭、栈房又次之,模厂为最轻。船槽陡出江干,受炮最烈。新制第五号铁肋船身将要下水,被敌炮击穿90余孔。至学堂匠房等处,虽受炮较轻,而器具书籍亦有残缺”^[55]。

其余法舰则在罗星塔附近江面,搜索中国火攻船。停泊在闽江口处的法舰“拉加利桑尼亚”号企图闯入闽江,策应孤拔舰队,被金牌炮台守军击退。夜幕降临后,法舰泊在原先的锚地。次日凌晨4时,又有两艘中国水雷艇悄悄地向法舰驶去,可惜被法国人发现后迅速击沉了。

25日早晨,“杜居士路因”和“凯旋”号上的陆战队员登上罗星塔炮台,拆去3门克虏伯大炮作为战利品。11时,孤拔下令舰队启航,冲出闽江口。他换乘“杜居士路因”号,航行序列为:“凯旋”、“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德斯丹”、“窝尔达”、“野猫”、“蝮蛇”、“益士弼”。打头的两舰各拖带1艘鱼雷艇。

27日下午3时,舰队在金牌水道上游,与“雷诺堡”和“梭尼”号会合,协同进攻金牌、长门炮台。金牌、长门炮台的岸炮因射向固定朝外,不能向内射击,守军便以轻炮封锁航道,阻拦法舰。“杜居士路因”和“蝮蛇”号被击伤。28日清晨4时30分,法国舰队猛烈炮击两岸炮台,两军继续作战。这天,金牌炮台被法国舰队摧毁。

29日,法国舰队驶出闽江口,同利士比所乘的“拉加利桑尼

亚”号会合,共同驶向台湾。这天,法国“东京”、“中国”两个分舰队正式合并,组成远东舰队,孤拔任总司令。^[56]

探索马江之败的原因,可以找出许多经验教训。

从直接原因来说,这是朝廷犹豫于和战两端,不敢向法国侵略者决战的妥协心理造成的。按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不得超过2艘,时间不得超过2周。清政府在中法已经交战的情况下,居然允许敌国舰队深入本国军事要地40余日,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闻。美国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孤拔的来临使得清廷束手无策。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实力薄弱,而是在处理有关国际法的问题上,他们不知如何去做,诸如怎样叫孤拔退出港外^[57]。这就使船政局和所属军舰直接处在法国大炮的威胁之下。中国人又信守“不先发第一炮”的战争伦理,等待着“衅自彼开”,等于自己把脖子伸进绞索后,还在幻想等到刽子手收紧绳子的时候一脚踹死他。

聪明的战略家指出,战争具有四重性,即外交、经济、心理,最后一招才是军事。在第一颗子弹发射之前,军事战役的胜负往往已经决定了。有人把前三轮的较量称作为“寂静战场”的格斗。马江之战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外交与经济的较量,清政府敌不过法国,在心理方面,也是如此。心理上的优势,并不仅仅是道德正义论所决定的,它还依赖于经济和国防的实力后盾。近代中国,震慑于洋枪洋炮威胁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迷信精神万能、妄自尊大的顽固派是屡见不鲜的,能够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审时度势,制定正确战略的人物却是凤毛麟角。这使当道者的心理总是无法达到平衡。因此,在每次民族危机来临时,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左右摇摆和徬徨中贻误了战机。

当然,军事角逐对于战争胜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政治判断不等于军事指挥。农业民族的特点是重文轻武,军人地位很低。随着近代战争科学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军事指挥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专业色彩。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种趋

势,在引进军事装备的同时,没有着意进行军事家的培养,仍然依靠文官典兵。当时的高级军官,基本上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缺乏近代战争的基本训练。而新近毕业的船政学堂学生,地位尚低,得不到重视。这种做法,用于反对列强侵略的近代战争,显得极不适应。张佩纶是个突出的例子。不少人认为他纸上谈兵,书生误国。其实,做为一个言官,一个智囊,一个政治战略家,他是出色的。但他不是军事战略家,更不是战术家。当战争进入直接的武力对抗时,他只能在中歧山上顿足长吁。没有总参谋部,没有合格的战区指挥官,远至枢廷,近至前线,仅靠一伙文官来控制战争,怎会不失败呢?这个教训,清廷一直没有记取。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日本大本营中已拥有一批懂政治、懂军事的指挥人才,清政府依赖的仍是这批文官和行伍。

在讨论了各种原因后必须指出,当时军队的基本素质较差,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近代抵御侵略的民族战争史上,除了运用人海战术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外,在绝大多数角逐中,无论是旧式八旗、绿营、防军,还是用外国最新装备武装起来的海军,基本没有取得过成功。马江之战揭开了中国近代海战的第一幕,从这天起,到清王朝覆灭止,两支中国舰队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竟从未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仅仅归罪于政治腐败和装备落后是不够的。清朝军队中,虽然不乏为国捐躯的烈士,但是,作为一支军队,它在整体上缺乏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集体英雄主义气概,缺乏主动寻求战机、力求全歼敌人的军人勇气,缺乏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娴熟的作战技能。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望风披靡。

三、东南战局与议和

8月26日,马江之战爆发的3天之后,朝廷终于降旨,对法宣战。

法国人从《京报》上获悉了这一消息。但法国因与英国争夺

埃及,正闹得不可开交,从而引起欧洲局势的紧张,所以不宣布同中国正式作战,只是把在中国进行的侵略行动说成是一种“报复状态”。^[58]这样,它便能继续利用香港等“中立”口岸作为基地,并从英、美等国获得物资补给。

9月1日,法国舰队驶至台湾洋面,孤拔将旗舰转移至“凯旋”号上。清政府不知法舰去向,一时各地探报消息纷至沓来,有说法舰将入长江,已雇引水员在吴淞等待;有说将攻打北洋口岸,还有说将攻打广东,直至3日仍不得要领。

由于宣战诏书的颁布,京师里主战派势力大盛。文学侍臣们猛攻主和派,把办洋务的人一概目为汉奸,最终使得慈禧太后颁发懿旨,一下子撤去总理衙门周家楣、吴廷芬、昆冈、周德润、张荫桓、陈兰彬等六位大臣,但被攻击得最厉害的阎敬铭却获保全。7日,朝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漕运总督杨昌濬帮办军务,张佩纶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召何如璋来京。19日革何璟职。11月12日,撤去张佩纶会办职务。

孤拔在台湾洋面多次与国内联系,力主向华北采取行动,先占烟台,再占威海、旅顺。但法国海军部令其攻占基隆,以作为补给中心和煤炭供应基地,并作为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抵押品。法国舰队开始在台湾洋面集结。9月13日,刘铭传向北京电告法国调兵4000人攻打台湾,台北紧急万分,请饬南北洋速遣救兵。18日,军机处向李鸿章寄电旨,着其竭力援救,保全台湾。李鸿章则不断报告,法军可能随时攻打北洋。直至28日才接到李凤苞的报告,法国已饬孤拔全力进攻基隆,准备久占。

29日下午4时,法舰“胆”号、“德拉克”号、“尼夫”号、“鲁汀”号和“巴雅”号接到孤拔的命令,从马祖向基隆出发。次日,“拉加利桑尼亚”、“德斯丹”和“凯旋”号向淡水出动。30日上午,孤拔的分舰队在基隆洋面同“梭尼”、“雷诺堡”和“杜居士路因”号汇合,完成了进犯基隆的布置。

在第一次基隆保卫战后,刘铭传估计敌人还将再次进犯,决心亲率主力,防守基隆。基隆清军共9个营。以曹志忠部6个营防

守港湾东岸,以章高元部2个营及陈永隆1个营防守西岸。另以孙开华部扼守淡水。将士们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10月1日上午6时,法舰“巴雅”号向基隆狮球岭发炮。接着法国登陆部队在舰炮掩护下,从“尼夫”号换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发起登陆冲击。章高元、陈永隆率部实施火力反击,双方激战四小时。法军改从山头迂回,章高元等率部退出山口,继续抵抗。将士们已在炎瘴溽湿的酷暑中坚守了两个多月,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但在法国侵略者面前,斗志旺盛,顽强搏斗至黄昏。也在同一日,利士比率“拉加利桑尼亚”等3舰进攻淡水,淡水前敌营务处李彤恩向刘铭传告急。此时基隆、淡水皆处万分紧急状态之中,刘铭传手中无后备梯队可供调遣。考虑到淡水为基隆后路,距台北府城仅30公里,淡水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军瓦解,他因此作出了集中力量,增援淡水的决定,连夜率曹志忠、章高元部从基隆拔营,驰赴淡水,仅留300人防守狮球岭,实质上是主动放弃基隆。第二天,法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基隆。他们发现,基隆煤矿的机械早被拆走,1.5万吨存煤也被毁去,不由对刘铭传果断敏捷的作风感到惊讶。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富有经验的对手了。由于法军人数有限,他们虽然控制住了基隆,却无力扩大战果。中国军队在四周山头迅速建立起新的防线。

淡水河口,清军早已沉下一队满载石块的民船,并布设了电发鱼雷,形成一道屏障。海滩边的低矮丘陵地带,又建有两座炮台,法国人称作“红堡”和“白堡”,直接封锁了沿岸的登陆地点。在得到基隆清军主力增援后,守军士气大振。10月2日上午6时35分,红堡守军利用太阳初升,法舰在眩目光线照射下无法瞄准海岸目标,而炮台又被晨雾笼罩的有利时机,首先向敌人发起炮击。双方激战3小时,打破了法军原定10时发动进攻的计划。利士比只能把新的进攻日期改到10月6日,并向基隆的孤拔求援。孤拔派“杜居士路因”、“雷诺堡”和“胆”号运载临时组建的加强营前去增援,由“拉加利桑尼亚”副舰长马丁中校指挥。淡水法舰序列,包括“蝮蛇”、“拉加利桑尼亚”、“杜居士路因”、“凯旋”、“胆”、

“德斯丹”和“雷诺堡”号。法军的目标是攻占白堡，以控制设在白堡的水雷引爆站。然后再用“凯旋”号的500公斤黑色炸药水雷，炸开封锁航道的沉船障碍，以打通驶往台北府城的航路。

5日晚间起，狂风大作，海浪翻腾，气候异常恶劣。这使法军的进攻延至8日方才发起。马丁中校因病不能指挥登陆战斗，改由“雷诺堡”号舰长波林奴中校指挥。上午9时零2分，登陆攻击开始，载有陆战队的小艇离开军舰向海岸划去。3分钟后，7艘法舰的舰炮开始猛烈轰击清军海岸防御工事。法军登陆部队共计600人，分为5个连队。法军登陆后，绕过红堡直扑白堡。这时，埋伏在油车口的李定民、范惠意，埋伏在大炮台山的章高元分别率部出击，合围法军，民军张李成率众从后部拦截。双方激烈地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杀。

11时45分，一个法国陆战队员走上港口灯台的石山上，用手势发出信号：

“我们被逼后退，没有军火，损失严重！”

接着法军全线溃退，争先恐后地爬上海边的小艇，向舰队方向逃跑。这便是中国史书称作“淡水大捷”的战斗。^[59]根据法方发表的数字，法军共死9人，失踪8人，伤49人。刘铭传报告朝廷，此役“馘首级二十五颗，内有兵西二名。枪毙约三百名。”^[60]孤拔承认，“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因此我放弃占领淡水埠口。因为我们军队员兵，仅勉强足供基隆之用。”^[61]

抗登陆作战是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法军凭借其夺得的制海权，在舰炮掩护下，遂行登陆行动，清军依托炮台和各种障碍物，乘敌立足未稳，进行强力反击，法军进犯淡水的计划至此被粉碎。

法军侵台期间，福州、香港、厦门等地电报线路同时中断，使得朝廷不清楚前线的战况。10月8日晚间，李鸿章秘密约见法国驻天津领事林椿，探求谋取和平的途径。同样，法国方面也不知淡水之战法国已败。直到两天后，法国公使巴德诺才从孤拔处得悉失败的消息。11日，巴德诺把孤拔报告的要点电告茹费理。其中提

到孤拔已决定放弃占领淡水,并拟以8至10艘军舰,由利士比指挥,封锁台湾西海岸线。其余军舰,由孤拔率领北上。巴德诺对孤拔袭击华北的计划,依然信心不大。^[62]

李鸿章14日才接到刘铭传从厦门转来的电报。在中国本土作战,信息传递竟比上海与巴黎之间的外交电报慢3天,清政府对前线的指挥行为可想而知。

10月20日,孤拔宣布自23日起封锁台湾。法国人把这一行动解释为:“当我们愿意时,可以恢复谈判。它使我们有权对中国采取一切战争措施而不必宣战;因而也可使英国不致宣告中立,而不让我方船舶进入其补给港及碇泊港,如香港和新加坡。并使我方有权捕获那些悬挂中国旗的船舶。”^[63]

法国的做法引起英国强烈不满。英法两国在埃及已经发生激烈的冲突,此时法国又在英国的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东南沿海挑起战争。11月26日,英国政府通知法国说,它认为“中法之间已存在着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并宣布中立,封闭香港,禁止法国前去装运燃煤和修理船只。^[64]

法国人继续一意孤行。1885年2月1日,巴德诺在写给茹费理的信中,抱怨法国政府在去年没有迅速地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北方。建议禁止从海上运输大米到华北口岸,来迫使清廷妥协。接着,法国政府发出通知说,从2月26日起,它将把运往广州以北口岸的米视为战争违禁品。当时的稻米,大多是雇请悬挂英、美旗帜的船只运输的。英国拒绝接受法国人擅自规定违禁品的作法。

清政府除了积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外,还组织东南沿海往台湾运输物资,以支持台湾的抗法斗争。本来,法国人仅靠15艘军舰,要想有效地封锁台湾海峡十分困难。但是它摧毁了船政局所属军舰,中国其他舰队没有及时前来支援,就使得法国有可能掌握住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沿海各省,特别是福建军民,采用夜航、偷渡等各种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枚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往台湾,为台湾的抗法斗争提供了保证。台湾人民积极参加军队,为守军源

源不断地补充兵员。云南、广西军队也相机向越南境内的法军发起攻击。在各方支援下,台湾军民终于度过了封锁带来的困难,有效地抵御了法军的入侵,为抗法战争作出了贡献。法国人承认,“我们的海军舰艇在漫长的海岸线面前,显得兵力不足,致使封锁无明显效果”。

台湾的气候、环境,也使法国人受到损失。10月23日,孤拔报告国内,由于伤寒或霍乱病的流行,已有11人损失,56人住进医院。到11月9日,法国陆地部队已有350人因健康原因不能执勤。

为了打破法舰对台湾的封锁,11月1日,朝廷批准了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从江宁发来的建议,着南洋派军舰5艘,北洋派军舰4~5艘在上海会齐。帮办军务大臣杨岳斌由汉口抵沪后,即统率各舰增援福建。左宗棠这年6月从两江总督任上内召,重入军机,这时老态龙钟,且受同官倾轧,至9月,再次外放。调军舰之事,因事先未同曾国荃讨论,所以曾国荃大为不满,表示南洋只能派出“开济”、“南瑞”、“南琛”3舰。^[65]

曾国荃不愿将南洋军舰主力援闽作战,自己把军舰说得一无是处,谓之“不足当铁甲一炮”,“炮小舢薄易被轰沉”。“敌船坚而且速倍于华轮,海中相遇,既无退步,万难脱身。数日之煤用完,寸步之行难驶”。李鸿章对调派北洋军舰也颇不以为然。他在向总理衙门转发曾国荃的报告时,又添上“北洋仅有快碰船二艘略可行海,实太单薄……勿论无大帮兵轮可派,即有船而无将帅,岂能用命济事?”^[66]

这种拥兵抗命的行为激怒了朝廷。5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分别寄旨,对曾国荃峻词申饬,着交部严加议处。并命他立派军舰,与李鸿章派出之船在上海会齐,驶往福建,速解台湾之危,责其“倘再迁延观望,致误戎机,自问当得何罪?”^[67]

在朝廷重压下,曾国荃只能从命,并保荐长江水师总兵吴安康统带南洋五船。李鸿章也报告说,除留丁汝昌统带六“镇”炮艇及

“威远”、“康济”练习舰留守旅顺口外，派林泰曾、邓世昌管带“超勇”、“扬威”两舰南下，与南洋5舰会齐密商，相机前进。

英国宣布对中法战争保持中立后，北洋原先聘请的英国海军教官琅威理即以回避为由，请假回国。早在马江交战之前，朝廷已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命李凤苞在德国避雇军官50人来华交李鸿章调遣。这既是援引德国法律中退役官兵可受聘它国作战的规定，也是利用了德国人对法国人仇恨的心理。10月，李凤苞报告共雇得24人，李鸿章对其中的海军总兵式百龄特别感兴趣。式百龄曾参加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海战，在天津会晤李鸿章时又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一通海军战略，使得李鸿章大为倾倒。李鸿章认为，“中国创练（水师）未久，勉效步趋，将材非咄嗟能办。遽当劲敌纵横洋面，实虑船炮人才一无可恃，转资敌用而损国威”，不仅决定把北洋“超”、“扬”两舰交给式百龄统领，还建议朝廷飭令吴安康，与式百龄“妥为联络商办，或有训练未精，见识未到之处，可属式百龄随事帮同教练指示，以增益所不能”。^[68]

11月19日，曾国荃经与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函商，确定南洋派出“开济”、“南琛”、“南瑞”、“澄庆”、“威靖”（后改“驭远”）5船援闽，20日夜，式百龄率“超勇”、“扬威”两舰驶抵上海。由这样两支分队凑合组成的混合编队，本来就是同床异梦，难以合作的。恰好12月4日，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李鸿章乘机要求调南北洋7舰驶往朝鲜，朝廷认为未便全数掣动，允许将北洋2舰调回。南洋5舰仍由式百龄带往福建。李鸿章再次电奏，说式百龄谓南洋各船素未学习西洋操法，不愿统带，请旨让该洋将一同北回。北洋军舰终于退出了与法国海军正面交锋的东南沿海战场。

南洋五舰，慢吞吞地开始了修理加固，12月28日曾国荃奏报，根据式百龄的建议，“南琛”、“南瑞”的炮位需加铁柱六根。各舰的舵楼均须用2寸钢板遮蔽。除“南琛”外，其他四舰还需添配哈乞开斯机关炮。这些工作又拖延了20余天。直到次年1月18日，军舰方才驶出洋面，前往浙江沿海。5舰的主官是：“开济”管带徐传隆，“澄庆”管带蒋超英，“驭远”管带金荣，“南瑞”管带徐

长顺，“南琛”管带袁九皋。五舰的排水量，分别为2200吨、1268吨、2800吨、1905吨、1905吨，总计10078吨。

吴安康，字激三，湖南沅陵人，早年投效湘军。1874年曾管驾“海安”舰赴日本察看情形，游历各岛。旋改管带“惠吉”舰，从此进入江南内洋外海水师，充操练轮船营务处。吴安康虽在海上服役10余年，却从未经历海战。这次受命统带分舰队援闽，心中不免战战兢兢。

1月26日，南洋五舰驻泊浙江南田，31日驻泊浙江玉环。2月初，听说福州口外法国舰队防守严密，便滞留在温州洋面。2月3日，孤拔在得悉南洋分舰队驶至浙江洋面的消息后，把封锁台湾的任务交给副司令利士比海军少将，亲率“巴雅”号、“侦察”号、“益士弼”号、“梭尼”号到马祖澳，并命“尼埃利”号、“凯旋”号前来会合。6日下午，“杜居士路因”号也到了。7日，七舰向北截击，直抵吴淞口外。10日，南洋分舰队退驶定海，11日回到吴淞口，12日复过定海。法国舰队则因燃料不足，“杜居士路因”号于10日退回基隆。

2月13日早晨5时30分，按照当日航海晨光推算，天还是黑糊糊的。法国舰队的“侦察”号在檀头山洋面发现了中国军舰的踪迹，法国舰队立即发出攻击信号，追了过去。中国分舰队也发现了敌人，转舵逃跑。不久，中国舰队一分为二，吴安康率航速较快的“开济”、“南琛”、“南瑞”3舰驶往宁波镇海口，“驭远”、“澄庆”两舰航速较慢，便避入三门湾的石浦。以南洋5舰对法国6舰，实力相差并不悬殊，然而南洋诸舰毫无斗志，不战自退，不仅失去了与法舰决战的机会，还为法舰分割消灭南洋分舰队创造了条件。

法舰也一分为二。孤拔命“凯旋”号、“梭尼”号和“益士弼”号进入石浦，监视“驭远”和“澄庆”，自己率“巴雅”号、“尼埃利”号和“侦察”号追击南逃的“南琛”等3舰。因浓雾，法舰丢失目标，孤拔率舰返回石浦海域。午后1时，完成了对石浦各个进口的封锁。14日，“益士弼”和几艘汽艇深入港湾，探明“驭远”、“澄

庆”停泊在东门岛和石浦之间。此时舰上水手勇丁，已有多人悄悄地登陆开了小差。是晚11时30分，孤拔派遣“巴雅”副舰长戈尔敦中校和水雷官杜波克上尉分乘两艘装载鱼雷的汽艇驶入石浦港。这天是除夕夜，岸上的爆竹声盖住了汽艇发动机的声响。翌日凌晨3时45分，汽艇向“馭远”发射了鱼雷。“馭远”尾部受伤，舰上官兵全无斗志，管带金荣怕弹药舱被轰击，遂打开底舱阀门放水，将军舰自沉。“澄庆”舰则是在未受伤的情况下，也放水自沉。沉没地点，在石浦镇天妃宫两侧。^[69]

“开济”、“南琛”、“南瑞”此时停泊在镇海口招宝山一带。镇海是浙东门户，甬江从这里通向宁波。浙江巡抚刘秉璋布置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率本标练兵1000人和楚勇2500人防守甬江南岸，驻金鸡山，在山上筑有“天然”、“自然”两座炮台。记名提督杨岐珍率淮勇2500人防守甬江北岸，驻招宝山。游击钱宝兴率兵驻梅墟，以作后路策应。招宝山的威远炮台、金鸡山的靖远炮台和小港口的镇远炮台，归守备吴杰指挥。港中还有“超武”、“元凯”两舰及红单师船以作联络。宁绍台道薛福成为宁防营务处，同知杜冠英为海防营务处，宁波知府宗源瀚为营务处提调。所有水陆兵将均受欧阳利见节制。镇海守将虽然早已枕戈待旦，但担心南洋3舰会招来法舰的人侵，因此千方百计设法使南洋军舰离去。2月14日，薛福成给远在江宁的曾国荃拍电，指出“目下以保全师船为上策。闻敌计在毁我师船，或乘虚犯长江。似宜趁敌船未到，急调三轮回沪，先顾门户，添备子药、煤米，可以进退自如。否则法以一二铁甲停泊浙洋，三轮又被牵阻，长江益虚矣。”^[70]曾国荃也担心剩下的3舰再遭法人袭击，16日给吴安康发出撤回的指令，并称一切责任由他承担。

可是三舰管带害怕再遇法舰，不敢将军舰驶出洋面，而水兵多为宁波人，此时思家心切，无心恋战，便借口吴安康赴石浦处理“馭远”、“澄庆”两舰事宜，无人作主，继续蜗居镇海。19日，曾国荃再向浙江发电，申明“为今之计，以保全三船为上策。如撤三尚未回船，即由三管驾相机冲出，驶回吴淞、江阴。但须探明镇海口

外有无法船拦阻。如已封口,只可稳守。若能乘隙冲出来,保全三船,统领管驾皆有功无过”。^[71]刘秉璋发给前敌的电报说得更为露骨:“三管驾怕死,徒以引敌,万难同心。途中无法船,宜令驶回。”^[72]为了保证回程安全,薛福成派外国人同吴安康部下的军官乘轮船从宁波至上海探路。他们发电通知,洋面上没有法舰。接着又从上海派轮南下,26日安全驶抵宁波。经过如此周密的准备,4舰于当晚10时趁着黑夜小心翼翼地驶出镇海。没过多久,他们又以发现法舰为由,慌慌张张地返回镇海,抛锚在口外的七里屿。

法舰直到28日才驶抵镇海口外。3月1日下午,孤拔率4艘法舰驶往镇海航道附近抛锚。下午,他乘“尼埃利”驶近口岸进行侦察,发现了躲在港中的中国军舰。清军炮台发炮,打断法舰桅杆上的支索。“尼埃利”号遂与炮台展开对射。由于距离较远,双方均无伤亡。“德拉克”、“巴雅”、“凯旋”三舰没有参战。法舰在完成侦察行动后,返回停泊地。在此之前,镇海守军已在江口用木桩设置障碍,又预先用高价在上海收买了熟悉甬江航道的外籍引水员,这些都为保卫战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而镇海守军同仇敌忾,英勇作战,更是战斗胜利的根本原因。

2日以后的战事,中方史料还有多次记载,而法国档案中全无记载,其真实情况,尚待进一步考证。3月下旬以后,战事完全停止。^[73]镇海保卫战至此告一段落。以后法舰在镇海附近多次游弋,但没有发生冲突。

浙江沿海的两次作战,法舰在军事上均未占有明显优势。南洋军舰望风披靡,殊为可耻。镇海保卫战虽然获得成功,但以万余名陆军和3艘军舰对付敌人4艘军舰的远征,赢得十分勉强,是个消极守口防御的典型战例。由于东南沿海战场清军皆成惊弓之鸟,镇海之战总算是对朝野上下的一帖安神剂。

法国的战略方针是东取台北,西取谅山,据地为质,勒索赔款,在派出舰队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侵略活动的同时,在中越边界也

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1885年2月,清军在陆路战场东西两翼皆陷入被动,形势告急。

2月17日,朝廷起用在籍宿将,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他在距镇南关十里之关前隘,筑立长墙,添挖深壕,巩固防御阵地。3月21日,冯子材率军主动出击法军据点文渊,鼓舞起军民的信心。

24日,法军向关前隘长墙守军发动攻击。冯子材身先士卒,跳出长墙,持矛大呼,冲入敌阵。全军将士大开栅门,向敌人涌去。当地群众和部分散兵游勇也主动前来助战。经过激战,中路法军111团1营300余人大部被歼灭。下午3时,中国军队发起反击,夺回东岭被敌占领的堡垒,并击退进攻西岭之敌。法军三而被围。全线崩溃,仓皇逃回文渊。冯子材率军追出镇南关。这一仗,共歼法军千余人,是法军挑起战争以来所受创伤最大的一次,史称“镇南关大捷”。

27日,法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即引起巨大的震动。众议员们强烈批评政府的远东政策。29日,清军收复谅山。31日收复谷松、屯梅等地,茹费理内阁就此倒台。

也在此时,在东南沿海指挥法国海军作战的孤拔,为了摆脱始终只能局促基隆一隅的困境,于3月28日率领“巴雅”、“德斯丹”、“杜沙佛”、“安南人”等舰和1个营的陆战队,袭击了防御比较薄弱的澎湖。澎湖列岛在马公、四角屿、荷兰屿等处设有炮台,守军千余人。29日上午7时,法舰炮击西屿炮台。30日,法军在鸡姆澳登陆,清军多观望不前,惟绥靖中营副将陈得胜率部抵抗。次日,法军继续进攻,陈得胜力战阵亡。同日,法军八九百人,在双头跨登陆,副将周善初乘船逃走,澎湖落入法军手中。

镇南关大捷使得陆上战场出现了转机。形势变得对中国有利,但并非像有的人想像的那么顺当,似乎冯子材就此能一举南下,将法国势力赶出越南。事实上,法军从镇南关后退百里,迅速在郎甲地区完成新的集结。除了从宣光调第一旅沿河而下,转赴郎甲以外,又从台湾的孤拔舰队急调一团增援,并把月前从法国调

来的 5000 援军从海防分运东京。法国议会还决定增派 8000 ~ 9000 人增援。到 4 月下旬,北圻的法军已达 25000 人,加上越南冲锋兵共达 37000 多人。还加强了炮兵、骑兵、炮艇的配置。而南下追击的清军,总数不超过 15000 人,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如果战线向南展开,后勤补给将产生更大困难。〔74〕

其次,在镇南关大捷的同时,法国又占据了澎湖,取得了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第二个“担保品”,造成战争结局戏剧性的微妙变化。法国原想依靠占领基隆和在越南战场的胜利来形成谈判的王牌,却没料到镇南关的惨败;清政府本可利用镇南关大捷对抗法国的胁迫,却没料到澎湖的陷落。这样,清政府不得不置越南战场的胜利不顾,首先收回基隆和澎湖,而法国也不得不放弃台、澎,以换取它在越南的利益。

再次,交战双方都不想继续这场战争,急欲寻求解脱的途径。就清政府而言,一方面,由于从 1884 年秋天以后,法军已完全控制顺化阮氏王朝,越南政府在中法冲突中完全倒向法国,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援越的意义。战前那种认为越南政权不值得扶持的意见,逐渐随着战争带来的创伤和疲劳情绪而占了上风。另一方面,日本在朝鲜的渗透使清政府焦虑不安,急于结束南方的战场以便应付日本在北方的挑战。就法国而言,也期望早日结束同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巩固和消化它在越南攫取的新的殖民利益。尤其整个谈判是以 1884 年《天津专约》为基础的,这正是法国发动战争的预定日的。在法国内部,对于政府远东政策有许多批评和压力,茹费理内阁倒台后,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战争未能取得的一切,并且恢复和平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镇南关大捷后,中国外交官首先提出了乘胜议和的主张。3 月 30 日,出使英俄大臣曾纪泽和出使法德意奥大臣许景澄相继发回电报。曾纪泽说:谅山克复,茹费理下野,此时若能议和,中国极为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总理初升时速办。许景澄说:德国外交部约见我,传达首相俾斯麦意见,认为中国谅山战胜,可乘机议和,否则战祸无已。德法有隙,所以专劝中国。〔75〕

4月1日,李鸿章也从天津向总理衙门发电,表示“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76]就当时情况而论,乘胜议和恐怕是最佳的选择。军机处向张之洞电寄的上谕指出:现在广西刚刚收复谅山,法军即占据澎湖。冯子材、王德榜部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77]集中反映了朝廷在权衡大局后所下的决心。

4月4日,金登干与法国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中法停战条件》和《停战条件解释》,规定中国政府批准1884年《天津专约》。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签订《中法天津条约》。

6月11日,孤拔因患赤痢和严重贫血症,死在澎湖。

15日,法军从基隆向澎湖撤退。他们在岛上留下500余官兵的坟墓。7月22日,法军完全撤出澎湖。25日,法国宣布解散远东舰队。

中国方面的善后工作更早就开始了。2月11日,上谕命将张佩纶、何如璋发军台效力赎罪。张成定斩监候,秋后处决,交刑部监禁。何璟、张兆栋业经革职,免再置议。4月25日,上谕将石浦之战首先逃走的“驭远”舰副队总李时珍严惩正法,蒋超英、金荣革职发军台效力。^[78]至1886年,张成获得赦免释放。

1888年,张佩纶成满,从张家口返回天津。他先到李鸿章府上任家庭教师,后娶自己的女学生,李鸿章最钟爱的女儿鞠耦为妻,一跃而成东床快婿,彻底从清流变为淮戚。张佩纶以前曾两次结婚,原配为长期担任军机章京的大理寺卿朱学勤之女儿朱芷芬,继室为陕西巡抚边宝泉的女儿边粹玉,虽说鞠耦是第三任夫人,他们的婚后感情却极好,生育了一个儿子叫张志沂,张志沂的女儿,就是后来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

打了一年的中法战争就此结束了,法国人取得了他们原先想攫取的一切。平心而论,清政府从介入越南事务,到签订停战协议,都是从当时当地的政治、军事、外交格局做出的决定,很难说停战就是

卖国。有的评论家认为中国不应该乘胜议和,认为中国是“不败而败”,这其实只是纸上谈兵的观点,对清政府来说,这样的结果也许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在无法取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面对强敌入侵,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是积极抗争,不惜以承担更大失败为代价,来维护国家的尊严,还是适度妥协,以较小的损失回避全面战争或危机升级,历来是决策者极费踌躇的两难抉择。主战者往往能保持道义上的优势,主和者则极易陷入“卖国”的罪恶泥潭。

政治有时是一种表演,但在表演背后,隐含着决策者在国家谋略上的识见。同一切其他谋略一样,国家谋略所依托的是手中的牌点,所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后国家在民族危亡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所能采取的国策必然是变革和妥协。所谓变革,包括从实行富国强兵的经济和军事制度改革,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增强整体实力;所谓妥协,是不断地在失败中退让,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利益以换取时间。在国家决策中,妥协是弱势状态下不可缺少的政治行为,关键是在赢得了喘息时间后,能否卧薪尝胆,不失时机地进行主动的变革,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换取时间只是为了短暂的苟延残喘,最后来到的必然是革命的风暴。

中法战争显示了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的英勇精神,也极大地暴露了朝廷的腐败和军队在各方面的落后,更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寻求生存之路,仍是中国政治家优先考虑的大问题。

四、海防建设的再次讨论

新的危机仍在发展。

清政府本来以为,拘禁大院君,扶植闵氏集团后,朝鲜内部的党争可以缓和,却未料到主张开放的人士中还有亲华、亲日、亲俄三派。亲华派被称作“事大党”,亲日派被称作“开化党”。清军驻朝,使得亲华派得势,加剧了同亲日派的矛盾。亲日派开化党人,

是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首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和官吏，他们觉察到清政府的腐朽，要求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日本按照其大陆政策，企图将中国势力驱逐出朝鲜，扶植亲日势力，建立傀儡政权。

开化党与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共同策划，在1884年12月4日庆祝邮政局成立的宴会上，刺杀亲华派主要官员闵台镐、赵宁夏、尹泰骏等多人，砍伤闵泳翊，金允植因事不在现场而免难，是为“甲申政变”。然后，开化党伪称清兵作乱，招日军保护，占领王宫，控制国王，组织新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6日，清政府在朝驻军，应朝鲜议政府右议政沈舜泽的请求，由袁世凯统率，开进王宫，逐走日军，将国王迎至清军军营中。政变失败后，竹添放火烧毁日本使馆，逃往仁川领事馆。11日，竹添乘“千岁丸”回国，竟不让金玉均等人同行，还打算把他们交给朝鲜政府。后来在日本船长的帮助下，金玉均等被密藏在船的底舱，带到日本。^[79]20日，当丁汝昌、式百龄率“超勇”、“扬威”、“威远”3舰载方正祥军一营从旅顺赴朝时，政变已经平息。

日本政府利用“甲申政变”，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政府大臣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对华宣战。一些团体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膺惩清国大会”，有的团体甚至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同法国联合进攻中国。明治维新活动的重要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如果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那么日本就“永为东邦之盟主”，所以“吾辈之躯早不足爱，当挺身战死于北京军中”。改进党的尾崎行雄和犬养毅更直截了当地说，“干涉朝鲜内政，务必予以并吞”，即便引起对华作战，也是“为国家所最希冀者”。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出兵干预会导致日中两国在朝鲜发生战争，其客观效果是在北方牵制住中国，有助法国占领台湾，这与日本在南方的利益相冲突。最佳选择，应寻求事件的和平解决。同时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战备尚未完成，这一计划才未被采纳。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指出，对清作战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只要比较一下两国的舰队情况就可以知道。^[80]于是日本内阁派井上馨为特命全权

大使,前往朝鲜进行谈判。井上避开日使参与政变的责任,只强调日本公使受到朝鲜人的攻击、公使馆被焚、侨民被杀,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朝日汉城条约》,朝鲜政府承诺谢罪、赔偿和抚恤,并新建日本使馆和护卫兵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吴大澂赴朝调查事件原委,吴大澂在中方有效控制了汉城局势的情况下,没有追究日方责任,再次放弃宗主国的权利。这个妥协,显然与中国当时正在与法国作战,不欲两面受敌的考虑有关。

次年2月,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进行外交谈判,以解决双方的争端。双方最后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81]李鸿章以为照约双方撤兵,于全局有裨,却没料到这一条约为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李鸿章与伊藤在天津的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向本国方面发表了对对方的评估。

李鸿章告诉总理衙门: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82]

伊藤博文说: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

情形,再行办理。……惟现时则不可妄动”。^[83]

令人感慨的是,伊藤博文的这番谈话,中国方面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不久即看到了。中国建设海军的努力,是否只有几年的热情呢?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对对方的研判,不幸都一言中的。又过十年,他们在马关相会,彼此心中不知又作何等想法?

事大党方面的闵妃集团看到中法战争中国的失败和甲申事变中日国的表现,感到中日两国都靠不住,渐渐产生与俄国接近的想法。1883年,李鸿章推荐前任德国驻天津领事穆麟德为朝鲜外务协办兼总税务司。1885年初,穆麟德建议朝鲜外务署与俄国商订条约,由俄国借调军官为朝鲜训练军队,俄国则得到朝鲜东海岸元山湾的使用权。这样,俄国海军便能取得一个不封冻的海军基地,使它的海军大大向南发展。穆麟德的举动,据说与德国外交部的指令有关。俾斯麦政府在欧洲为对付法国,极力阻止俄法接近,采取了“引诱俄国熊到远东牧场去”的策略,怂恿俄国在亚洲扩张,从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势力。引俄南下引起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李鸿章要求朝鲜国王李熙废弃对俄条约,并将穆麟德解职。在此同时,英俄之间因争夺阿富汗发生冲突,两国间几乎爆发战争。英国为扼制俄国势力南下,于4月15日派舰队占领巨文岛。

巨文岛位于朝鲜半岛南端与济州岛之间的济州海峡,由西岛、南岛、古岛组成一个小岛群,三岛鼎足而立,中间形成一个可泊巨舰的天然港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舰队在此屯泊,可以直接控制毗邻的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监视中、日、俄三国在朝鲜的行动。起初,李鸿章对此事并不反对,认为“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84]4月16日,英国外交部密咨曾纪泽,表示愿与中国订立密约,以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换取中国不反对其占领巨文岛。曾纪泽复函,询问立约式样及如何保护中国的权利。清政府反对与英立约,命李鸿章酌议具奏。李鸿章此时意识到事态严重,复奏称“若允英据此岛,俄必将索永兴湾,日本亦必有词,后患更大”。^[85]5月4日,李鸿章写信给朝鲜国王,嘱其不可轻允。10

日,丁汝昌率“超勇”、“扬威”抵达朝鲜,递交李鸿章信,劝说朝王。16日,丁汝昌率舰前往巨文岛察看。朝鲜派参判严世永和穆麟德随舰前去质问,发现湾内泊有6艘英舰,2艘商船,岛上悬有英国国旗。英国舰长麦乞伊说,此举系为防俄,请丁汝昌往长崎与英国舰队司令交涉。18日,丁汝昌等来到长崎,会晤英国远东舰队司令陶威尔,仍不得要领。

英俄阿富汗危机在5月间开始缓和,但巨文岛问题又造成新的矛盾。俄国驻华公使博白傅到总理衙门吵闹,要占领永兴湾作为英占巨文岛的补偿。还提出要占领对马岛,引起日本的紧张。而在英国外交部,则有人提出,该岛孤悬海上,没有陆地依托,战时需调动大批军舰,保护其不被敌舰击毁,这样必将分散英国远东海军的力量,反而得不偿失。经过中国方面长时期的折冲,1887年2月7日,英国军舰从巨文岛撤退。

1885年,慈禧太后在召见中法两国商议划定中越边界广西段划界大臣邓承修时,深为感慨地说:“此番立约,实系草草了事,朝廷吃亏在无水师。”这是痛定思痛后的一个重要总结。邓承修说:“无水师决难争胜,不独马江之败为然,即去岁刘永福之败,亦系江水暴涨,不能立脚,该国轮船驶入,遂败也。且基隆澎湖已失,声息不易通,军械不易运,危在旦夕,不得不作此收场。”中国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法国就无法在东南沿海地区横行。整个战争的结局,也许会有很大的不同。中法战争的事实,再一次把海军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上年秋天,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重返阔别18年的福州。在考察了船政局和长门、金牌炮台后,他对于中国军事装备和造船工业的落后感慨万千。1885年3月,他上了一封名为“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的奏折,再次强调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他说:“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优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86]这份耿耿忠心,使慈禧太后深为感动。加上李鸿章不久

前也上了一道请办武备学堂以培养海军人才的奏折,促使朝廷在1885年夏季再次发起一场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讨论。

6月21日,朝廷颁布上谕提出:

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枪械应如何精造,均须破除常格,实力讲求。至于遴选将才,筹画经费,尤应谋之于豫,庶临事确有把握。着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图善、曾匡荃、张之洞、杨昌濬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毋得蹈常袭故,掇拾从前敷衍之词,一奏塞责!^[87]

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因食一种叫做“缸盖米”的粘腻食物,造成消化不良,痰凝气喘,突然病故,终年73岁。左宗棠的去世,使得中国海防建设失去了一位规划者和实施者,也使湘淮系权力制衡的天平产生重大的倾斜,湘系失去了一个能与李鸿章相颉颃的人物。从此,海防建设的计划主要由李鸿章来主持,海军发展的重点也终于转向北洋一隅。

9月30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将海防建设的讨论扩大至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及醇亲王。讨论主要环绕设立海军衙门、确定海军发展的重点、落实海军发展的经费、加强海军人才的培养、重视舰炮军火的制造等问题展开,涉及问题较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更为深入。设立全国性的海军管理机构,裁汰旧式师船,建设现代海军,开矿设厂,加强基础工业建设等等,在上层官僚中成为共识。总理衙门最后归纳说,各种见解“皆为统筹全局起见。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88]并获懿旨允准。这样,南北洋海军同步发展的建军路线正式被修改了。

注 释:

- [1] 见林明德:“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李鸿章评传》,第216页。
- [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第1187页。
- [3] 桥粟、宗麟、壮强:“试论中法战争中清阮宗藩关系的实质和作用”,《广西社会科学增刊·中法战争史专集》,第7页。
- [4]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现拟预筹办法折”(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中法交涉史料》,卷二,页一~二。
- [5] “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法交涉史料》,卷二,页三。
- [6] “直隶总督张树声奏请命岑毓英经理越南南[北]圻片”(光绪八年四月十四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七,页二十二~二十三。
- [7] “总理衙门奏法越兵端已起亟宜通筹边备折”(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法交涉史料》,卷二,页十七。
- [8] “裕宽奏法越如换新约中国不必预闻片”(光绪八年四月十九日),“岑毓英奏密陈越南实在情况我军只宣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使之拒法片”(光绪八年十月十一日),“倪文蔚密陈越南国势分界保护实无把握片”(光绪九年正月十六日),《中法交涉史料》,卷三,页十、二十三、三十。
- [9]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密陈越南边防事务折”(光绪九年四月初一日),《中法交涉史料》,卷四,页三。
- [10] 袁保龄:“上高阳师相”,《阁学公集·书札》,卷一,页四十五;张佩纶:“制敌安边先谋将帅折”(光绪九年四月十八日),《涧于集·奏议》,卷三,页二十五~二十六。
- [1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1535、1557页。
- [12] “中法简明条款”,《中法战争》(丛刊),第七册,第419页。
- [13] 关于张华奎说动盛昱弹劾张佩纶、李鸿藻,见祁景颐:《涵谷亭随笔》,载《近代俾海》第十三辑,第120页;李宗侗:“敬悼溥心畲大师兼述清末醇王对恭王政争的内幕”,《传记文学》,第4卷第2期;黄潜:《花随人圣庵摭忆》(二),第558页。其中祁景颐为清工部尚书祁世长之孙,李鸿藻之外孙,李宗侗为李鸿藻之孙,说明李鸿藻家族对此事皆持同一看法。
- [14] 黄潜:《花随人圣庵摭忆》(一),第122页。
- [15] 转引自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下册,第406~407页。
- [16] 《清德宗实录》,卷一七九,页十~十一,十二,卷一八〇,页五,光绪十年三月戊子、己丑、壬辰条。

- [17]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三，页三十五、三十八。关于此处分析，可参见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64页。
- [18]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张佩纶与李鸿章往来信札》（未刊稿）。
- [19]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1818页。
- [20] “上谕”（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五，页六。
- [21] “袁昶致张之清函”，《袁忠节公手札》，上册，页三，转引自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57页。
- [22] 张佩纶：“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折”（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涧于集·奏议》，卷四，页二~六。
- [23] H·帕姆塞耳：《世界海战史》，第577、578页。
- [24] 勒内·里斯贝特勒：“我们与中国在东京的冲突，1884~1885”，《广西社会科学增刊·中法战争史专集》，第239页。
- [25] “裴龙致孤拔”（1884年7月13日），《法国黄皮书》，载《中法战争》丛刊，第七册，第225页。
- [26] “军机处电寄上谕”（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四日），《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九，页三。
- [27] 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39页。
- [28] “茹费理致巴德诺”（1884年8月16日），《法国黄皮书》，载《中法战争》丛刊，第七册，第249~250页。
- [29] 唐景崧：《请纒日记》，卷五，页六~七。
- [30]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来电”（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到），《中法交涉史料》，卷十八，页三十九。
- [31] “军机处电寄穆图善谕旨”（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中法交涉史料》，卷十八，页四十。
- [32]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等来电”（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九，页一。
- [33] 李鸿章：“寄会办国防张学士”（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172页。
- [34]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六月初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183页。
- [35] 李鸿章：“复张樵野京卿”（光绪十年六月初六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五十四。
- [36]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等来电”（光绪十年六月初五日到），《中法

交涉史料》，卷二十，页十二。

[37] “军机处寄何如璋谕旨”(光绪十年六月十六日)，《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十一，页二十。

[38] 张佩纶：“致总署”(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涧于集·电稿》，页十三。

[39] “军机处寄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臣等电旨”(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第502页。

[40] “总署来电”(光绪十年七月初一日)，《涧于集·电稿》，页十九。

[41] 张佩纶：“复署粤督张”(光绪十年七月初一日)，《涧于集·电稿》，页二十。

[42][43] 张佩纶：“致安圃侄”，《涧于集·书牍》卷三，页五十五、五十六。

[44] 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45~549页。

[45] “何璟、张兆栋8月23日(七月初三日)未时(13~15时)向朝廷报告：“午刻接法领事照会，言巴日要开战，已告知长门、马尾准备”，载《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第512页。从这封电报的内容看，似乎尚不知悉马尾之战已经爆发。因此何璟等人不需作伪，可信度较大。午刻的范围为11~13时，而罗亚尔记载，孤拔斐白藻泰10时向何璟送出照会，递交照会当在这段时间中。又，何璟未时向朝廷报告法国宣战事，则给长门、马尾的电报亦应同时或稍早发出，即下午1时以后。后来左宗棠在查办此案的奏折中提到“初三日法国照会何璟，何璟据电张佩纶等。翻译甫毕，炮声已隆隆矣”。载《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246页。这些记载当为可信。有关马尾之战宣战的情况，还可参考俞政：“马江宣战考”，《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75~94页。

[46]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折”(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七日)，《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249页。

[47]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248页。

[48] “刑部尚书锡珍等奏折附片”(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534页。

[49] 过去一些著述认为詹天佑也参加了“扬武”舰上的战斗，这一讹误源自1884年8月25日上海《晋源西字报》的报道，该报道由邵友濂于9月4日译寄总理衙门，见“光绪十年七月十四日江海关道邵友濂函”，《中法越南交涉档》，第四册，第35~36页。英文原文，见The Fighting at Foochow, *The Shanghai Courier*, 25 August, 1884。事实上，詹天佑于当年2月已调任船政后学堂教习，没有直接参加作战。他本人晚年回忆，当时他冒险到江边观战，见官兵落水，就跳入闽江泅水救人。见《铁路巨擘詹天佑》，第69、71、73页；《詹天佑生平志》，第35~36页。

[50] 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清末海军史料》,第303页。

[51] 罗蚩、高文:《法国人在福州》,转引自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第185页。

[52] 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所附“死亡将士姓名”,《清末海军史料》,第307~315页;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57页。

[53]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法战争》丛刊,第三册,第134页。

[54]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电”(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戌时),《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第512~513页。按:翰林院编修潘炳年参劾张佩纶:“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逃走。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跳而奔,途仆,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之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次日奔鼓山之彭田乡。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逃得之。”见《福州马尾港图志》,第146页。此说被广为引用,其实不确。张佩纶本人在奏折中提到,交战后,“臣一面飭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与水师相应,一面升山颠观战。”见“水师失利自请速回折”(光绪十年七月初十日),《涧于集·奏议》,卷四,页二十六。“法船退后,臣查点机厂料件,偶有遗失”。见“陆军接仗情形片”(光绪十年七月初十日),《涧于集·奏议》,卷四,页三十。另一个佐证是,当晚戌时(19~21时),张佩纶即向朝廷发出战事失败的电报。当时为有线电报,躲匿禅寺是无法发报的。战后左宗棠等奉旨查核潘炳年的指控,复奏指出:“查彭田距马尾十五里,以省城言之,则在鼓山之后,以马尾言之,则在鼓山之前。据该司道等复称,张佩纶于是日登山观战,战毕退驻彭田。初四日清晨,驰赴马尾,仍回宿陈禹谩家,次日移居陈芳年新屋。嗣后往来彭田马尾之间,十五日始回驻马尾厂楼……并未一抵鼓山之麓,亦无乡人拒不纳之事。惟彭田在马尾中歧之后,鼓山亦有中歧,或因此讹传耳。”见“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七日),《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246~247页。这个调查是站得住脚的。

[55] 何如璋:“船厂受伤查照机料清册并局存经费一起移交折”(光绪十年八月十五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二十五,页十七。

[56] 杨志本、王苏波:“中法战争中的孤拔舰队”,《广西社会科学增刊·中法战争史专集》,第73~83页。又,过去史学界沿用林绳武:“海滨大事记”和李世甲:“缺嘴将军”的说法,认为孤拔在率舰冲出闽江口时被击毙。此说不确。见高炳康:“中法马江战役孤拔伤亡问题的探讨”,《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17~221页。

[57][5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397页。

[59] 罗亚尔:“中法海战”;“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奏折”(光绪十年八月十

五日、二十四日),《中法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60~573页,第五册,第562~564、577~578页。

[60] 关于淡水之战法军伤亡人数,本书所引为法国登陆部队指挥官波林奴报告的数字,载法国海军部档案BB-4.1959,第150页。转引自黄振南:“关于淡水之役的几个问题”,载《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第79页。又法国公使巴德诺根据孤拔报告的说法,为死6人,失踪11人,伤48人,这里除伤亡人数相差一人外,死亡和失踪人数之和与波林奴的数字是一致的,估计是对找不到的人的不同认定方式。见“巴德诺致茹费理”(1884年10月12日),《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丛刊,第七册,第266页。刘铭传的数字,见“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奏折”(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第578页。

[61][62] “巴德诺致茹费理”(1884年10月12日,10月10、11日),《法国黄皮书》,载《中法战争》丛刊,第七册,第266、265页。

[63]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第37页。

[64] “1884年11月26日格兰威尔勋爵致瓦定敦函、致曾侯爵函等”,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9页。

[65] 左宗棠奏称:“两江督臣曾国荃虽明知南洋防务不能松懈,然不能不先其所急,拟调派兵轮五艘,并咨商直隶督臣李鸿章,于北洋抽调兵轮四五艘,开赴上海取齐。”见“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折”(光绪十年九月十四日到),《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78~79页。曾国荃发电向李鸿章解释说:“左侯奏商派南洋五船,向日左办事总是独抒忠爱,从未采听人言。至于事理之能行与否,利钝成败,左均未深思。”见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324页。

[66]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九月十六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321~322页。

[67]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电旨”(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94页。

[68] 李鸿章:“轮船联络德国水师片”(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集·奏稿》,卷五十一,页五十三。

[69] 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74~586页。根据罗亚尔的记载,“取远”舰被鱼雷轰沉后,舰体直立在水面上。“澄庆”舰则被岸上炮台当做法舰击沉。又据曾国荃奏报:“初一日寅刻,法西又以小火轮夹杂于被擄渔船之中,乘黑潜入。偷放鱼雷。该两船后艄均被碰伤。其船上水手平素未经过战阵,相率凫水潜逃。蒋超英、金荣力为阻扼,犹冀补救。詎两船受伤之处,逼近火药舱,倘被轰燃,不特全船人命尽成灰烬,且恐祸延居民,殃及商船;又恐法人掳去船炮,不

得已亟放水管引以自沉,救全船炮。蒋超英、金荣志在与船自没,经弁勇扶掖上岸。”见《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415页。又据石浦同知黄幼臣报告,“驭远”、“澄庆”两舰入港后,停泊在天后宫前,离石浦城甚近。“是夜卑职正在督率团丁各处梭巡防守,间闻有大炮之声,随即赶赴江边瞭望,但见我兵轮上开炮数响,随即寂然,并未见有法船进口。嗣于四鼓后,又闻大炮连声,卑职立即亲至天后宫前阅视,仍见系我兵轮所放。乃至黎明,忽报兵轮有沉没之信,当即会同竹山巡检李燮臣等前往察看,则见‘驭远’轮船业已入水,而‘澄庆’轮船亦渐欹侧,有欲沉之象。至该船兵勇人等,于一到石浦后已见纷纷窜逃,斯时并管驾、水手一概不知何往……惟查该轮船因何致沉之故,其中情节甚属可疑。若系被法船轰坏,现在法船尚未进口,何尝与之交战?倘云为水雷轰破,是处居民甚多,左近并不曾听见震动,且闻该船有自行凿沉等弊,即请速委干员前来查办。”载《金鸡谈荟》,卷五,页二十五。指挥实施偷袭的法国军官戈尔敦用嘲讽的口吻说:夜袭中国两舰的命令一部分是中国人自己执行的。巴德诺认为:“很可能实情就是如此:‘澄庆’号舰长想找借口逃到岸上,并想把自己船只的沉没归咎于我们的鱼雷艇,遂与他的船员串通,自动把船弄沉了。”见法国外交部档案《政治通信·中国》第67卷,第117页,转引自《近代中国海军》,第297页。几种说法,录之备考。

[70] 薛福成:“除夕递金陵”,《浙东筹防录》,卷四,页三。

[71] “两江曾电”(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五辰刻),《金鸡谈荟》,卷五,页二十八。

[72] “刘抚致朴丞电”(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金鸡谈荟》,卷六,页十一。

[73] 关于镇海之战的考证,参考黄振南:《中法战争诸役考》,第242~284页。

[74] 庾裕良:“镇南关-谅山战役刍议”,《广西社会科学增刊·中法战争史专集》第49~50页。

[75] “出使俄英国大臣曾纪泽电”,“出使法德义奥国大臣许景澄电”(光绪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367页。

[76]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一年二月十六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462页。

[77]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385页。

[78]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中法战争》丛刊,第六册,第284~285页;《清德宗实录》,卷二百五,页八,光绪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79] 参见杨昭全:《朝鲜1884年的政变》。

[80]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6页;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

题》，第163～164页。

[81] “天津会议专条”(1885年4月18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辑，第365页。

[82] 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五日)，《李集·译稿》，卷十七，页八～九。

[83] “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600～601页。

[84]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476页。

[85] “译署来电”(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七日酉刻到)，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492～493页。

[86] 左宗棠：“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左集·奏稿》，卷六十四，页八。

[87]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1943页，光绪十一年五月丁巳条。

[88]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旨会议海防折”(光绪十一年)，《清末海军史料》，第58～66页。

第四章 海军衙门的设立 (1885 ~ 1894)

中国还需要许多年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海军国家，使我们英国感到恐慌或忧郁。中国的海军还在摇篮时代。

寿 尔

一、史所未有的新机构

中国古代没有全国性水师指挥机构。清代八旗、绿营水师，是各地将军、督抚指挥下的辅助兵种。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造船购舰热潮，使沿海各省云集起一批近代军舰，迫切需要编队；而从近代海军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出发，也要求有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1883年，朝廷在总理衙门中添设海防股，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凡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枪炮、弹药，创设机器、电线、铁路及各省矿务皆隶于一统。^[1]这是一个管辖国内各项洋务事业的部门，也可以看做是即将问世的海军衙门的前身。

海军衙门的设立，是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大约以中国驻日本长崎理事余蔭的建议最早。1881年，他上书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军衙门，保边固圉。接着，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也提出建立水师衙门的建议。何在马江之战中仓皇出逃，名誉扫地，但在战前，却以究心洋务著称。他说：

筹办水师之大略，苟非统归一人节制，则备多力分，情势隔膜，徒有虚名，究无实际。诚以防海异于防陆，陆军可以分省设守，海军则巡防布置必须联络一气，始无兵分势散之虞。七省濒海之地，港汊纷错，互有关涉。风轮瞬息，瞬息千里。苟分省设防，则事权不一，呼应不灵，守且不能，何有于战？拟请旨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举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并将现有之兵轮调齐，定为等差，编成舰队，分布合操，以资练习，按年责效。^[2]

何如璋在出奏前，曾拿奏稿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请马建忠议复。马建忠支持何如璋的想法，具体提出海部当由一知兵重臣领之，另立军政、典选、广储、粮糈、会计五司，经理庶务。并设一咨询性质的议事处和一个监督性质的稽查使。^[3]后来由于李鸿章以丁忧去职，接着中日朝和中法交涉事起，这一计划被暂时搁置了。

1884年初，总理衙门因越南局势告紧，海防吃重，打算在沿海七省专设一个海防衙门，将各省船政、营制、海径、饷需诸大端均归一重臣经划，并有意让李鸿章出任海防大臣，专驻烟台。李鸿章很早就参与这个方案的策划，他曾命袁保龄密议对策，袁保龄为他提出六条建言。^[4]但李鸿章对总署的提名表示婉辞，坚持海部应由总理衙门主持，他可依外省督抚兼任京衔的做法，参与海部的有关工作，并呈《德国海部述略》、《日本海军说略》。李的本意，是不想做有职无权，远离京津的“海防大臣”。他说，我为北洋海军耗费心血，连头发也枯萎了。若不自量力，好为大言，以七省海军自居，早就成为众矢之的而颠簸。他告诉张佩纶，我与你可以同调唱和，但恐怕权力、“无贝之才”和“有贝之才”（即人才和钱财）均不够，仅靠二三个中等人物奔走其间，万分吃力。请问阁下有什么办法？但他还是直接向总署提名张佩纶，说他“廉介耐劳，年力正可有为，海部设后，若令周履海疆，蒐讨军实，商略机宜，似于训练制造诸事必有裨益”。^[5]而在袁保龄给张佩纶的信中提出：“海防军权归一，乃克有济，公与合肥、高阳堵危局，探本源，在此一举。合肥

欲会中外之通，亦老于变世之言，朝右以为何若？下走与参未议，辄就狂瞽为篇，已交卷而未誊录，敢将初稿秘呈，乞良友与吾师共教之，勿遣外人知之。”^[6]信中提到高阳、吾师，均指李鸿藻，显然，李鸿章通过张佩纶、袁保龄与清流后台李鸿藻暗中已经达成默契，建立海军衙门，是洋务派和清流的共识。二李私下的政治联系，大人超出人们想像。然而不久，李鸿藻与恭亲王所领之军机处全班倒台，此事未行。5月，张佩纶奏称“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7]6月，刘铭传奏称“朝廷廑念海防，似宜另设海部衙门”，^[8]筹设主管海军专门机构的建议已广为流行。此事前后原委，李鸿章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有详细记录：

幼樵京卿奏设水师衙门，特请派重臣经画一事……先是幼樵在总署创发此议，恭邸、兰相（李鸿藻）多颺之，遂欲以兹事委之，鄙人实苦才力不及，曾于二月十三日详复总署，请仿东西各国之例，在京添设海部，或令不才襄助商榷，嗣闻枢意不以为然，仍拟奏请在外设水师衙门。正缮奏间，朝局忽更，因而中止。幼樵赴闕召对时又奏，奉懿旨飭陈，乃下南北洋先行会议，俟复奏后，想仍飭枢译会同户部妥议也。^[9]

同时，李鸿章私下又与曾国荃联系，做分头主持水师衙门的准备。他说：“两张（即张之洞、张佩纶）及吴（大澂）、陈（宝琛）两会办心精力果，当愿分赞斯役，应否由执事与鄙人合力肩承，谨钞与总署往复函及译德日创立海部规模述略寄呈鉴核。”^[10]显然，在李鸿藻倒台之后，北洋与清流先前达成的合作依然未变。李鸿章还抓紧同新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阎敬铭沟通：“幼樵整顿水师之议，实为自强要务……公有其意提倡乎？”^[11]

中法战争后的善后讨论中，对建立海部问题，议论更为集中。李鸿章主张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并设专办此事之人。左宗棠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驻扎长江。穆图善认为海部宜设天津，置尚书部曹，直、江、闽、粤四督分兼海部尚书。吴大澂则说，应在北京添设海军衙门，特派亲王总理，节制沿海督抚。在封疆大吏中，选派一员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衔。^[12]1885

年9月,李鸿章奉召入都陛见,在京逗留20余天,慈禧太后单独召见5次,还同醇亲王、军机大臣广泛接触,密商设立海部之事。10月初,总理衙门上奏,提出此事重大,应派王大臣综理,并于疆臣中简派一二人会同办理。^[13]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指定了办理海军事务的人选:

着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14]

10月24日,醇亲王等奏称,海军“事属始创,头绪纷繁,若待另建衙署,恐需时日。查神机营署内尚有空闲房间,稍为修葺,可敷办公。名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所有咨札文件,拟即借用神机营印信,以昭简易”。^[15]同日获懿旨允准。至此,海军衙门作为一个机构,算是成立了。^[16]

新设海军衙门在体制上的最大特点,是一个由醇亲王主持的中央机构,在人员配置规格上,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总理衙门。原定南北洋大臣分头主持的构想被否决了。李鸿章为此特向曾国荃解释:“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鸿章事烦力惫,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悚惧!”^[17]

海军衙门创办之时,从衙署到公章都借用神机营,其办事人员亦多是神机营的军官,简直像个依附于神机营的临时机构,缺乏作为全国海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应具有的地位。

神机营是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后,为了加强京师和皇宫的警戒所设立的禁卫部队,从八旗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中挑选出一万名精壮士兵组成。神机营衙门设在米市大街和王府井大街之间的煤渣胡同,^[18]大约是在今日王府饭店的位置。门前有四株两三人合抱的老槐树,隔着米市大街与设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遥遥相望。神机营之西,是冰盂胡同,即贤良寺

所在地。李鸿章到京办事,总是在寺西的跨院下榻。这个地点选得十分合适。此时醇亲王和善庆皆兼管神机营,顺理成章地把神机营事务同海军衙门事务扯在一起。直到三年后,《北洋海军章程》正式制定,海军衙门才上奏,请求颁发“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防”。^[19]

醇亲王拟在西四牌楼粉子胡同奕将军宅建立海军衙门的正式办公地点,但这个计划在他生前一直未曾实现。1892年春,在庆王主持下,经广丰、祥茂、天德、兴隆四厂施工,海军衙门新址落成,海署才迁入办公。^[20]

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成为一个独立军种,在中国军队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慈禧的懿旨,海军衙门大臣以奕譞总办,奕劻、李鸿章会办,善庆、曾纪泽帮办。这一安排,不久受到了挑战。

1886年1月20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上奏,反对李鸿章参与海军事务。黄体芳,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三年进士。黄体芳本是清流健将,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为“翰林四谏”,以辞锋犀利著称,敢言人所不敢言者。他指责李鸿章身任封疆,事务繁多。无事必不能巡阅,有事复不遵调度。上年朝旨饬“超勇”、“扬威”赴援南洋,李鸿章留不遣发。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不顾缓急,专以保护畿辅为名,以为朝廷无以夺之。又称李鸿章所用之人皆贪诈卑污之辈,若让这些入遍布海军,一旦有警,祸甚噬脐,海之何及?故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电催熟悉西洋事务的曾纪泽迅速回国筹练海军。奏上,京师震动。因为这是中法战争后沉寂一时的清流又一搏击力作。尤其奏中“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21]数语,更在士大夫中传诵一时。黄体芳此奏,集中反映了朝廷内外各种派别对李鸿章的仇视、警惕和忧虑情绪。

慈禧太后大怒,下懿旨将黄体芳交部议处,罪名是“妄议更张,迹近乱政”。又颁上谕,着李鸿章仰体朝廷格外成全,优加依畀之意,确切筹办,总期他日成效昭然共睹,履众望而答殊恩。^[22]一打一拉,恩威并施。既警告清流不要过于张狂,又迫使李鸿章俯首帖耳,更加勤勉和谨慎。吏部奉旨议处,其时满尚书崇绮因病告假,汉尚书徐桐本是个极顽固的守旧分子,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右侍郎李鸿藻,又是昔日清流领袖,因此对黄体芳着意回护,提出“按照妄行条奏,降一级调用。公罪,例准抵销议处”。慈禧雷霆未息,又大发作,颁下懿旨:“所议过轻,殊未允当。兵部左侍郎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吏部堂官,着传旨严行申饬!”^[23]于是,黄体芳左迁通政使,对海军衙门的人选,再也没人敢发议论。比较有趣的,倒是黄体芳所遗兵部左侍郎一职,改由曾纪泽转任。

李鸿章本人对曾纪泽并无恶感。海军衙门大臣人选发表后,他便给曾纪泽写信:“明春旋旆,译署及海军署均待襄赞主持,艰巨非异人任也。”当他听说曾纪泽以患病为理由,不愿就职的消息后,更以忠君大义相激励,并嘱其趁回国之便,考察西洋各国海军设施。^[24]

1886年12月11日,曾纪泽结束了八年的出使生涯,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14日,慈禧太后召见他,讨论了海军事宜,太后还询问了许多外国船械方面的事情。当时的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和庆郡王皆不懂军事。李鸿章远在天津,道路相隔。因此衙门的日常事务,皆由曾纪泽主持,规划细密,为人称道。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曾纪泽自欧洲归国,李鸿章以其为曾国藩之子,待其亲近异乎寻常。曾纪泽年富气盛,略示欲得两江总督之意。李鸿章说:“以你的才地勋劳,且承先德,哪有不可得的。不过江南地大不易治,先试诸陕甘如何?”曾纪泽怒曰:“虽死也不去。”此后,醇王又几次询问李鸿章如何安排曾纪泽的位置,李鸿章说:“慢慢地增加他的才华吧。”曾纪泽就此郁郁以终。^[25]曾纪泽1884年11月在出使英法俄国大臣的任上得授兵部右侍郎,1886年1月改左侍郎,以此名分和资历,他欲立即开府两江,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是

值得怀疑的。

同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制一样,海军衙门也实行满汉双轨,但又仿总理衙门,以王大臣为统领,其额员为4~6人。1890年醇亲王薨逝,次年任命庆郡王奕劻总理海军事务。此外,担任过海军衙门大臣的还有山东巡抚张曜(1888~1891)、台湾巡抚刘铭传(1890~1891)、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1891~1895)、两江总督刘坤一(1891~1895)、恭亲王奕訢(1894~1895)。惟有奕劻和李鸿章与这个机构相始终。海军衙门大臣分为总理大臣、会同办理大臣、帮同办理大臣,但没有明确规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大臣全由部臣疆臣兼职,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负责海军衙门事务的。

根据海军衙门的组织建制,除了管部大臣外,还设有总办文案翼长2人,帮总办文案4人,管股章京12人(其中管理海疆股、管理款项股、管理船政股、管理军械股章京各3人),主稿章京3~4人,轮班当月章京5~6人,印务参领2人。^[26]这些官职,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初,皆由旗人担任,且在其他衙门挂有职衔,说明海军衙门尚无实缺。1886年7月,御史朱一新建议海署办事章京,宜满汉人兼用。这个建议没有被朝廷理会。直到1892年,才由李鸿章推荐,委任了一位汉人傅云龙担任帮总办文案。衙门中的旗员,不仅不懂海军,也不懂一般军事知识,只是把海军衙门当作擢进的终南捷径,使得这个机构日益腐败。

从理论上讲,海军衙门有负责海军建设和海军调度的军政军令大权,但在实际上,它的权限仍然限制在军政方面,这样使得海军的领导体系出现了日常军政权掌握在不谙海军事务的满族部员手里,军令权掌握在不谙军事的皇帝和文官(军机大臣)手里,舰队指挥权掌握在不谙近代海战的前陆军将领手里的混乱局面。在负责军政、军令的最高当局和舰队之间,还夹有一层带有利益集团倾向的封疆大吏。这种状态,对于海军事业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1886年5月,天津城里一片忙碌。大大小小的衙门和上上下下的官员,都在为迎接醇亲王的到来,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虽说

正是春归北国、杂树生花的时节，要人们却无意踏青赏景——这是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以来第一次巡阅北洋水陆各军，自然要给他留下好的印象。无论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津海关道周馥、北洋水师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心中都有些惴惴不安。5月1日，丁汝昌率舰从大沽前往旅顺，用10天时间进行巡阅前的合操演练。

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生于1840年10月16日。10岁时，因哥哥咸丰帝登极而封为醇郡王，32岁正式晋封为醇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姐，生育了四个儿子，一、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在1874年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做了当今皇帝。侧福晋刘佳氏，生了三个儿子。老五载洋，后来袭了王爵，是宣统皇帝的本生父。老六载洵，在二十余年后重兴海军时，做了海军大臣。

光绪入宫后，醇亲王就辞去一切官职，在家赋闲。慈禧是个猜忌心很重的女人，惟恐有人利用醇亲王的皇帝本生父身份。醇亲王诚惶诚恐，置身事外，倒也太平了几年。但他内心不甘寂寞。中法战争中，恭亲王失宠，慈禧命醇亲王参预军国大事，他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恭亲王的地位，位于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亲王府，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自从中法战争中恭亲王被罢黜，李鸿章同朝廷之间的直接沟通联系中断了。他在写给新任军机大臣许庚身的信中说：“内外政局屡变，皆出人意料之外。”今后“赖公等持危扶颠，千济艰巨。弟虽谤满天下，他日或犹得山野之幸民也”。^[27]就道出了惶恐不安的心情。虽说并不缺乏传递中枢机密消息的来源渠道，但位若恭亲王之尊，又能在皇太后面前为他调停缓冲，施加影响的人物却没有。这次醇亲王出京，巡阅北洋，为李鸿章重新建立与最高层的直接联系创造了机会。

5月12日，醇亲王以巡阅水陆各军事向慈禧太后请训。14日早晨启节出都，乘马行40里，至通州换坐长龙座船，沿北运河南下，16日抵达天津。李鸿章乘小轮船出迎，驻津文武官员在红桥码头恭候。各军统领营官全身披挂，领队在20里外沿途跪接。醇

亲王天潢贵胄，位高体尊，随从人数庞杂，上至高级幕宾，下至戈什哈兵弁、夫役、护卫、太监，约有 230 余人。帮办海军大臣善庆，海军衙门总办文案恩佑随同巡阅。然而醇亲王十分谨慎，节制下属不得骚扰地方，也坚辞不乘太后赏坐的杏黄轿，只乘黄绉四人肩舆。他的行辕设在南城外海光寺，布置朴素简便，不取秾丽及黄赤诸色。

醇亲王随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他是慈禧太后的的心腹。按清朝祖制，太监无故不得出京。1869 年，大太监安德海奉慈禧之命出都，往南方采办宫中用物，即被山东巡抚丁宝楨诛于济南。李莲英这次虽奉太后之命，亲自观察海防建设，却也不敢招摇，布衣布鞋，手执醇亲王的长竿烟筒和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一副恭顺的模样，不受地方官员的奉迎贿赂，也使钻营巴结之徒大失所望。^[28]李莲英出京，有说慈禧指派，亦有说系醇亲王主动请求，无非向慈禧表明心迹，以释慈禧猜忌之心。李莲英亦是乖巧之辈，怵于安德海前车之鉴，不愿招惹言路抨击。然而慈禧以李莲英作为她私人观察员的意图，却是无疑的。几个月后，御史朱一新上奏，请预防宦寺流弊，将李莲英此行比作唐朝太監监军。慈禧太后以醇亲王所奏“该总管太监沿途小心伺应，实与府中随往太监无异，绝无丝毫干预外事”为由，申饬朱一新以虚诞之辞，希图耸听，给其以主事降补的处分。^[29]

17 日上午，醇亲王接见各国驻津领事后，视察了天津武备学堂。中午，登“快马”小轮船沿海河驶人大沽，改乘“海晏”号轮船。随行人员登上“保大”号轮船。次日凌晨，一轮满月照映着万顷碧波。排水量 2800 吨的“海晏”轮在北洋“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5 舰和南洋“南琛”、“南瑞”、“开济”3 舰左右护卫下，乘潮出大沽口。“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 炮艇尾随其后。浩浩荡荡，舳舻相接，蔚为壮观。傍晚，舰队抵达旅顺口。

醇亲王管海军而不谙海军。上年奉旨总理海军后，就感叹“轮船之制，苦不深悉”。李鸿章这次的接待方针，是想以海军建

设的最新成果,给醇亲王一个新鲜而强烈的刺激,以加深其对海军事业的印象。20日,醇亲王一行登上黄金山炮台,李鸿章调集“定远”、“镇远”等八舰表演演阵打靶,又看刘含芳训练多年的鱼雷艇表演发射。旅顺口新修的海岸炮台,也竞相开炮,连环打靶。一时间,黄金山麓炮若雷鸣,撼地震天。整个演习共耗军舰、炮台炮弹各百余发,鱼雷1具,水雷8具,约合银万余两,是北洋水师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21日,醇亲王视察老蛎嘴炮台和鱼雷厂。午后登“海晏”轮南下,深夜抵达威海。22日,阅“镇东”等6炮艇打靶并检验“定远”、“镇远”、“济远”3舰质量,旋开赴烟台。23日展轮返回大沽,继续巡阅津沽防军。^[30]

28日,醇亲王结束了北洋之行,午宴后登舟回京。李鸿章陪送至北运河桃花口。醇亲王口诵李白的“赠汪伦”作别,李鸿章当即占诗献呈:

雕弓玉节出天阊,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切云戈櫓耀荣光。
欣飞禁旅严千帐,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乎持看献瑞,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却愧屯田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漫吟潭水答云璈。^[31]

醇亲王和诗曰:

岂学烟波稳放阊,直如仙路咏鳞裳。
从兹舟楫期同济,自昔邦家藉有光。
立雪情联瞻雅度,投醪才拙愧戎行。
后生崛起知谁健,勉继勋酋我武扬。

放怀碧海接天高,知是骖鸾抑驾鳌。
最喜貔貅皆赳赳,漫疑鸛鹤各劳劳。

藩篱势固神京拱，节钺功深圣母褒。

自问清人独何幸，蜃楼看罢听仙瓊。^[32]

两人的诗都写得堆砌而雕琢，毫无值得称道之处。但这次视察活动，对李鸿章和醇亲王双方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直接接触，迅速缩短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醇王还表示愿将他和李鸿章、善庆在天津海光寺的合影找画家摹绘，送给寺僧，以传佳话。

李鸿章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醇亲王回京后上奏：“北洋现只‘定远’、‘镇远’、‘济远’三铁舰，‘超勇’、‘扬威’两快船可备海战之用。南洋仅‘开济’、‘南琛’、‘南瑞’三船行驶尚速，炮位尚大……惟此数船，合尚嫌单，分则更少。俟明年英、德新订快船四只北来，合之北洋现有五船，自成一队，仍俟筹款有着，再行续商订购。”^[33] 一年前，因福州船政局轮船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灭，朝廷电谕李鸿章“着照前购钢面铁甲快船定购四只，供台澎用”，^[34] 四船即“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现经醇亲王寥寥数语，便纳入北洋范围，李鸿章焉能不喜？

经过这次阅兵，醇亲王对海军未来发展也有了初步想法：“海防关系重大，久远之计。将来船只成军，自应请专设提督等额缺，妥定章程，以专责成而固军志。”他还注意到“北洋为京师拱卫，李鸿章所部各队分布各隘，力量并不见厚”。“练兵先须选将，今未雨绸缪，尤以教练人才为第一义”，故得出“陆军不宜遽裁，学堂仍须推广”^[35]的结论。

在北洋之行中，醇亲王甚至对铁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铁路事业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以致海军衙门也卷入到兴办铁路的事业中去，对中国铁路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醇亲王还打算在1888年再赴北洋海口，但后来未能成行。故这次检阅便成为近代海军史上惟一一次亲王阅兵。

醇亲王没有恭亲王那样的办事之才，性格也较软弱和谨小慎微。且处于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常是想办事又怕遭猜忌，每每有意取悦慈禧，以显忠诚。其当政之日，办成的事情不多。但在实际事务中，他毕竟了解一些西方的情况，对于洋务运动中的许多措施继

续给予支持,对海军发展也始终关注。1887年后,醇亲王屡遭慈禧猜忌,在家养病。1891年1月1日醇亲王奕譞薨逝,李鸿章电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各军舰下半旗10日致哀。^[36]这是西礼,也是首次在中国海军中采用。

二、西苑、颐和园与海军费

海军衙门主管全国海防建设,进而负责审批各省进口海防器材、过问铁路建设等等,管辖范围涉及洋务活动的许多方面,筹划海军经费则是其直接分管的重要事务。

户部奏定,从1886年起,原解南北洋收支的海防经费拨归海军衙门收放。这对南北洋来说,无疑是极不情愿的。1875年总理衙门和户部奏定从关税厘金项下年拨海防协饷400万两,虽然从来解不足额,但毕竟是笔地方上可以直接支配的巨大款项。现在把财权收至海军衙门,李鸿章表面上不便公开反对,便以退为进,多方要挟,屡屡致函醇亲王,要其保证北洋海防的浩繁开支:

伏查北洋目下常年薪饷等项连“定”、“镇”、“济”三舰在内,岁需一百二三十万两。新建旅顺船坞等工及找发采购制造等项,约需一百四十余万两……通计北洋光绪十二、十三年需饷近二百万,新购英德四舰之饷,尚未计及……前准户部奏明将南北洋经费拨归海军衙门,南北洋应需各款,随时咨请运用。鸿章方幸策需有着,得以专力操防……计明年实应向海军衙门请领一百二三十万两,皆系确需之数,难再撙节。均恳筹画早定,源源接济。或派员先期赴海军衙门请领,或催各省速解北洋,由海军衙门作为收放,均听钅裁……事事苟简,虽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鸿章束手无策,实不敢当此责任也。^[37]

海军衙门的经费来源,除了常年海防协拨外,还在开办时,特拨粤省余存洋款42万余两,闽省造船余存洋款60万两,部库所存

神机营息借洋款 108 万两,各省海防捐款 100 余万两,总理衙门匀拨出使经费 25 万余两,总计 300 余万两。这些存款息款,“日拨日消,其涸立待,嗣后无以为继”,^[38]而各省协拨依然解不足额。且东三省练饷每年近百万也要海军衙门筹付。不到一年,海军衙门便感到焦头烂额,无以应付,只得采取变通办法,将海防协饷仍归南北洋收放,海军衙门只负责支付“定远”、“镇远”、“济远”3 舰及以后购到的巡洋舰的日常开支。^[39]于是,海军经费的来源便形成两个方面:一是日常开支,继续从海防协饷内支用。1887 年至 1894 年,北洋方面共获得 1000 余万两协款,^[40]平均每年 130 万两,南洋 1886 年从海防经费获得 100 余万两,以后每年仅得 50 余万两。^[41]二是海军衙门直接拨款。提供“定”、“镇”、“济”、“致”、“靖”、“经”、“来”7 舰及后来增加的“平远”舰薪粮公费、燃料、维修费用。这笔款项为北洋独得。从 1886 年至 1894 年,共约 400 万库平两。^[42]清朝则例常有不可解者,诸如海军经费之如此划分,就说不出来什么道理,只能归诸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细细考察,奇怪更多。例如“致”、“靖”、“经”、“来”4 舰洋员经费,在海军衙门 8 舰薪粮公费中统一拨款,其他洋员,包括北洋海军总查,“定”、“镇”、“济”舰外籍教官,则一律由海防经费中支薪。

海军衙门从成立到撤销,共为全国海军筹拨了 2000 余万两经费。为了筹款,使出了浑身解数。海防经费虽已奏定由各省径解南北洋支用,海军衙门仍有责任为其催款。1887 年 6 月醇亲王专折上奏,指责江苏、浙江、江西拖欠应解厘金,并指出福建、广东两省应拨海防经费,已经奏归本省使用,沪尾、打狗二口税款亦归台防,则户部不能再以虚数并入海防协饷,应别筹的款相抵,获懿旨允准。户部从各省海关新收洋药加厘项下,指拨 65 万两以补缺口。^[43]海军衙门又将南北洋海防经费银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每百两扣除 6 两平余,用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 8 舰薪粮公费。据统计,1887 年至 1894 年 8 年间,平余划抵共 20 余万两。此外还有人奏议过川淮盐斤加价、开办印花税等办法。

除了增设各种捐税杂款外,鬻官亦是当时“开源”的重要途径。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以海防紧迫,饷源枯竭,设筹无方为名,奏请于北洋开设“军器捐输”。经户部商议后,决定请旨予限一年。所谓捐输,亦称捐纳,是由朝廷以授予官衔来取得捐款的一种办法。清朝在开国之初和乾隆年间都曾采用过。鸦片战争后,财政支出激增,战争、灾荒不断,于是广开捐输。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均可购买,造成吏治腐败、流品混杂,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1879年朝廷下令停捐,然未歇数年,因直、鲁等省发生水灾,为办赈济而于1883年重开捐输,其时已是明知有害而饮鸩止渴了。

新开的海防捐例规定,捐银1000两准给蓝翎,捐银2000两可得四品以下官衔,捐银3000两可得三品以上官衔,均准给花翎。^[44]兴办之初,报捐者甚为踊跃。至1886年初,直隶一省即收入白银150万余两。开捐3年,直隶共收银达212万余两之巨,除拨给旅顺建造船坞用款63万余两外,均归北洋海防开销。^[45]广东省3年共收捐银1132000余两,统归本省使用。这一做法,被海军衙门接承过去,于是年年奏请展限,进一步鼓励捐纳。1886年至1888年,海军衙门收到各省解来海防捐款银1578058两。^[46]1889年,因黄河年前在郑州决口,朝廷为复修大堤,暂停海防捐而开郑工捐。次年复开海防新捐,在捐例上再作新的优惠。然而报捐者日少,处于畿辅之地的直隶省,5年中仅收库平银1179670余两;湖南省1890年至1893年间,共得63175两;江西省1890年至1893年底年间共得115615两;地处西南的四川省,1890年后两年仅收银31000多两。^[47]捐输收入已成强弩之末了。

仔细研究近代海防经费,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海军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以海军建设主体部分北洋舰队为例,建设这支舰队的全部开支,包括二十年的海防协饷,购买西方军舰费用,以及军舰官兵薪粮、燃料、油修费等,共用去白银3500万两,仅占同期国库开支的2%左右。^[48]远远低

于全国陆军部队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这笔款项在洋务运动各项新兴事业的投资中,耗费又是最为巨大的。北洋海防协饷开支总额,相当于同期江南制造局以及福州船政局从创办到中法战争爆发17年总支出之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再也没有谁像“国家那样感到苦恼的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以前建造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49]对于一个近于崩溃的封建国家,即使是年度预算2%的海军军费,仍是不胜负担。更新军队装备,建设近代化海军,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清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国家,没有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和广泛的财源,仅靠各种捐厘税金,要维持一支近代化海军是十分困难的。朝廷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筹措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并且激化各方而的矛盾。

人们还有一个疑问:屡屡申言缺乏经费的海军衙门,其筹集到的款项是否都用到海军事业上去了呢?

对于慈禧太后来讲,京西三山五园的绮丽风光是难以忘怀的。青年时代在那儿度过的美好情景更是记忆犹新。以至她人过中年之后,对于修复园子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历代帝王都修苑囿,或是在宫禁之旁起盖别院,或是在城郊和外地兴建离宫。这种风气,清代尤烈。西山一带,连绵二十里,逶迤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建起来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香山的静宜园等一大片皇家园林。紫禁城皇宫中附会《礼记》、《周礼·考工记》建造的宫殿群落,体现了封建时代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刻板的布局,高度规格化的建筑风格,大面积相同的色块和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紧密相套的四合院,常常使人产生沉闷压抑的心理负担。所以康熙已降各位皇帝都常年居住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既处理政务,又游燕逸乐。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举火焚烧了经营百年的西郊林苑,使得惯于奢侈享受的清朝皇室在北京附近竟无处避暑消夏。环绕着复修苑囿,晚清政局出现了各种大小事件,而修园经费,又和海军经费扯在一起。

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谋复修圆明园,而与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及朝野大臣发生激烈冲突。为了缓和折衷,有人建议改修三海。未过多久,同治帝暴病而崩,4岁的光绪帝载湫继位。两宫太后再度宣布垂帘听政,三海工程对她们不再有直接意义,于是便告停工。

三海位于紫禁城西侧,一片秀丽的山水包蕴在高大的土红色宫墙之内,因南海、中海、北海三个著名的湖泊而得名。三海面积2500余亩,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湖光潋滟,回映着四岸的亭台楼阁,景色绝佳。到了1885年,慈禧太后考虑到光绪帝即将亲政,自己归政后若要重修圆明园,不但国家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又会遭到反对,于是决定援引同治年旧例,于6月21日下懿旨重修三海。根据档案记载,事实上工程在此之前已经动工。

三海工程包括三海所有的殿宇、房屋、道路、河池、假山、堤泊、点景花园,电灯、铁路、冰床、朱车等等,重点在南海的瀛台,中海的丰泽园、仪銮殿、西苑门一带。全部工程有一百多处,几百个项目,整个大修工程经费总额约在白银600万两左右。^[50]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513万两。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解银、海军衙门、神机营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的借拨银为2294329两,占总经费收入的44.7%。以后海军衙门还代奉宸苑借拨欠发厂商实银66万余两。从1891年至1895年,三海在正常岁修和为慈禧太后庆寿工程中,又从海军衙门挪借141.5万两。总计1885年至1895年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

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51]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海军衙门有固定的经费收入,因此在用款时有很大的机动余地。在营建三海及以后营建颐和园的过程中,醇亲王控制的海军

衙门确实起了调剂资金的作用。醇亲王深知其中的奥秘。在后世看来,皇太后、皇帝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恣意调拨全国财富,其实不然。封建国家机器本身具有制约机制。它通过祖制祖训、部院规章、御史谏官和朝野清议来平衡天子的言行。从这个角度看,皇太后、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但另一方面,制度都是人创的。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最高统治者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巧立名目,以避开制度对其的束缚。诸如以海军衙门为中继站,调节缓冲内务府施工急需的银帑,就是例证之一。海军衙门所垫的款项虽然后来如数归还,慈禧太后孜孜以求的三海工程也如期竣工了。拆东墙补西墙,受损的依然是海军。

李鸿章显然精通此道。处于封疆大吏的立场,他既希望巴结皇太后以巩固慈眷;又不愿因建造园囿,使得海防经费挪用过多而影响北洋实力;更知道哪些挪垫是不合规矩、摆不上桌面的,因此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有时积极表示赞同,有时找理由婉辞,有时还用海防名义向外商借款以保工需,^[52]在夹缝中居然左右逢源。

到了修建颐和园时,挪垫进一步发展成为挪用。

1886年11月19日,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庆邸(按指奕劻)晤朴庵(奕诤),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湖)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溱阳(按:指承德避暑山庄)也。^[53]

这段话透出一个大秘密:虽然三海工程正以慈禧归政后颐养之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进行施工,皇太后依然未能忘情西郊的旖旎景色。复修清漪园之事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清漪园是乾隆皇帝1750年为庆贺母后六十寿辰而兴修的林苑,位于圆明园西侧,万寿山、昆明湖都是园中的景致。慈禧太后深知圆明园局面过于散漫,复修工时浩瀚,且是一马平川,有水面无山色,反不如清漪园倚山傍湖的翠微灵气,还能抬出乾隆帝为母后修园祝寿的先例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是以选定清漪园作为自己晚年的另一处怡乐之所。三天以后,翁同龢再谒醇王,他记录这次访问是“深谈时局,

极耿耿也”。所谓时局,当指复修园囿的工程及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反应,翁同龢在政治上是走醇王路线的,他显然是最早知悉这一秘密的上层官员。

园工是悄悄开始的。醇亲王找了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在湖内修建水操学堂做理由。昆明湖水操是乾隆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训练水军故事,于1751年开始在昆明湖定期进行操练。当时还专门建造了16艘大型战船,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这种训练当然只是象征,军事意义并不很大,到了19世纪更与海防无关。醇亲王以祖制为借口,却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在奏折中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御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的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54]接着,被英法联军毁坏了26年的东宫门、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长廊、排云殿、后山佛殿、南湖岛诸殿、十七孔桥等建筑便开始动工修造了。李鸿章自然知晓这一计划。1887年8月15日,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表示:“禁苑工款及万寿山各座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苴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55]

纸包不住火。随着时间推移,清漪园动工复修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弄得朝野沸沸扬扬。袁保龄在给军机章京钱应溥的私信中一针见血地说:“昆明(湖)习水战,赋绝好题目,借款得所藉手,挥洒较易。”^[56]1888年3月13日,皇帝发布上谕,向天下诏示此事。上谕宣称,三海修缮将次告竣,现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量加修葺,以备慈舆临幸。园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侍奉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洽。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57]从此颐和园工程便公开进行了。到了1889年1月16日,紫禁城中贞度门发生火灾,火势延及太和门。这在当时看来是不祥之兆,表明人怨激起天怒,天意示警。再加上不少臣工对工程的批评,慈禧太后不得不发布懿旨,表示“遇灾知微,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58]这样,园工缩小了规模。1891年6月4日,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以后常驻园中。

而园工中尚未完成的项目,则加紧施工,直到1895年上半年方告结束。

颐和园工程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现在尚难考证清楚。根据承办工程的算房对1888年至1895年修建的佛香阁、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等56项工程估价,约为318万两。^[59]1886年以修建水操学堂名义拨款67.8万两。^[60]而1886年至1887年修建的仁寿殿、玉澜堂、排云殿、长廊等建筑缺乏明确的造价资料。鉴于整个三海工程用银为600余万两,这批建筑估计不会超出此数,因而推算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约在1000万两白银上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传说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修造的,清末维新党人梁启超首创将园工同甲午海战失败相联系的说法,以激起人们对慈禧太后的仇恨。挪用的确切数额则说法不一,多则谓8000万两,少则仅300万两。一般的看法认为在2000~3000万两。^[61]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清宫档案,海军衙门在1888年把45.3万两银挪至园工。^[62]次年,奕劻又决定每年从海军经费中腾挪30万两交颐和园工程处。^[63]至1894年共挪用180万两。1891年3月25日,奕劻奏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衙门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数,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64]以后又从出使经费中挪垫了工程银100万两,申明从海军巨款260万两生息项下按年拨还。^[65]从这些数字统计,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稽的腾挪共达325.75万两。1889年1月6日,海军衙门还在奏折中提到“平余、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66]根据海军衙门的规定,北洋海防经费的平余,划抵下一年度“定远”等八舰的粮饷油修经费,而海军衙门发放的八舰经费及东三省练兵饷,则由海军衙门拨付时扣除。有人统计,从1887年到1894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

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 86 万两。按照平余专备“工作”之需的说法,这笔款子也被挪用于园工。^[67]此外,海防捐和新海防捐被挪至园工的,约在 250 ~ 350 万两之间。^[68]所有数字相加,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 750 万两。

在三海和颐和园大兴土木的时候,朝廷财政正十分窘迫。以 1888 年为例,这年户部在正常的年度开支之外,又筹拨皇帝大婚典礼费 500 万两,郑州河工 600 万两,山东河工 289 万两,制钱工本 90 余万两,铜本 50 万两等等。大工未尽,大礼方兴。将历年铢积寸累之余罄于数月,只能大量腾挪海军衙门的经费了。庆郡王私下坦承以昆明湖替代海防建设是其无可奈何的苦衷。庆郡王(1894 年封亲王)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禧亲王永璘之孙。他在政务上比醇亲王更无建树,但在谄媚慈禧和接受贿赂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谄媚和腐化的升级标志着一个王朝没落的加剧。到这种时候,祖制、规则、谏议就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这里,还应提一下“海军巨款”事件。

1888 年 10 月底,醇亲王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69]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旨意,立即通报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江西巡抚德馨等人:“去岁在京时,醇邸即以此事相属,当以‘工程太大,费用不貲,外省情形素所深悉,恐难办到’,一再婉复。邸谓:‘目前海部、神机营两处解款皆可支用,将来事务仍须奉商。’今年二月朔日遂见明谕,以万寿山大报恩寺及延寿寺为将来慈圣六旬祝嘏之所。”他对张之洞说:

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且时逾五稔,尚可分岁经营。但每年得二十万,五年积成百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议,便可观成。……此为功力,岂可测量?^[70]

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

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能于江粤集得大宗，此外略加附益，便有成数。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将来能在外筹还固佳，即至无可挪填，统俟凑齐后，再行酌量办理，谅无不可。^[71]

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72]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这笔款项称为“海军经费”，“以海防、工作并为一案词意尚觉浑融”，^[73]“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74]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懿旨严行申饬，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共25人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

更有意思的是，督抚们虽然向皇太后行了贿，却害怕同样的索贿经常发生，将使他们难以应付，所以大家要为自己留下余地，不能显得地方财政过于富裕。同时，在清末，修园圃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同治年间复修圆明园的争议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还记忆犹新，督抚们当然也会小心翼翼地顾忌到自己身后的名声。好在海军衙门总办章京恩佑早已表示，“除两广不动正款外，各省择无碍京协各饷之正杂诸款腾挪挹注，分别奏咨办理”，^[75]所以，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在奏折里明白地告诉皇帝，粤省虽然认筹100万两，第一期应付的5万两也已划出，但现在一时难以指定专款名目，故只能先向百川通商号借垫。^[76]四川总督刘秉璋也汇报说，他汇出的银子是藩司商同盐茶道、官运局各向商号借得，俟以后岁收盐厘除拨解京协各饷外，即以盈余分年归还。其最后一笔5万两款项，挪用的是官运局的运本。^[77]其他各省的划款途径，还有盐斤加价、厘金、地丁收入等等。^[78]所有这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居然在正式公文中陈述于庙堂之上，近乎在同皇太后报生意账，这在清朝前期显然是不可想像的，一方面说明了大员们了无顾忌的末世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疆大吏对朝廷腐败的一种蔑视。比如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已经安排好了报效，又说尚未想好出处，只得向

商人借垫,是否还有揶揄一下朝廷的用意呢?张之洞是一个聪敏机灵的读书人,再过十几年,他还敢说向各国宣战的上谕是“矫旨”,公然发起“东南互保”呢。

还需说明,醇亲王、庆郡王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甚至在工地上张贴的告示也落款海军衙门,给人以海军衙门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修园经费也非海军衙门独任。260万两巨款虽然打着海军名目,其实完全是各地督抚对慈禧的报效,不能算在海军经费的账上。从事后来看,这笔款子的本金全部存在外国银行及借给开平矿务局,^[79]利息用于解还从出使经费中挪用的100万两。但颐和园工程毕竟妨碍了清季海军的发展,从而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海军教育的全盛时期

近代中国的第三所海军院校——昆明湖水操学堂是1887年1月8日开学的。海军衙门总办文案恩佑、学堂总办潘骏德、署总办惠年、提调奎昌、王福祥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学堂宗旨是在满族人中造就海军人才。这天午时,60名满族学员按照中国传统庠序私塾的规矩,恭恭敬敬地向孔子牌位行礼,从而开始了他们新鲜的西学生涯。那伙出席开学典礼的官员,一个小时后又赶到毗邻的万寿山排云殿,主持拱梁仪式。

匆匆筹建昆明湖水操学堂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掩饰清漪园的土木工程。但醇亲王上半年巡阅北洋海军所产生的新鲜印象,无疑也对这所学堂的诞生起了重要的催产作用。醇亲王承认,“此次查阅北洋,于武备、驾驶、管轮各学堂悉心究考,见其地理、戎事、测量、算化等学,有条不紊,实足为济时要务。因思八旗之众,聪颖骁健者实不乏人,只是为见闻所囿,虽具美质无可表见。亟当乘时教练,预储异日将材。”^[80]他说:“昆明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81]当时从国外考察归来的人,常常推崇欧洲

民族的尚武精神。介绍在这些国家,虽贵为太子皇族,也要到海军服役的故事,这对于自诩擅长骑射征战的满清权贵,也是强烈的刺激。可是,在长期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熏陶下,没有任何贵胄子弟有意加入海军,只能在健锐营、外火器营官兵子弟中,遴选通晓文义的八旗青年前来就学。就清朝统治者而言,他们看到海军这一新式军种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希图造就满族海军人才,以便将来更好地控制海军。这所学堂的出现,反映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近代军事技术工程教育,开始渗入八旗子弟中去了。

昆明湖水操学堂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安排教学,也分作内外学堂。外学堂设在玉带桥和西堤偏西北处,有校舍 116 间;内学堂设在幽风桥偏西北处,有校舍 103 间,是从前清漪园耕织图、水村居旧址。

内学堂学生课以西法测算、天文、驾驶诸学;外学堂学生教以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诸法。李鸿章派来西学教习,还有一些教习是从金州水师营调来的。八旗子弟对于学习海军兴趣不大。经过 5 年学习,只有 35 人期满肄业,派往天津水师学堂考校。结果有 24 名学生成绩超过 180 分。喜昌、荣续分获第一、第二名,其英文、测算、推步等学的分数,不逊于天津水师学堂历届毕业生。这批合格学生被留在天津进一步深造,余下 11 人咨送回旗,自谋生路。^[82]留津学生中,又有 12 人被神机营调用,剩下一半,后来上“通济”号练习舰实习。最后 3 人在练习舰训练尚未结束前,又被神机营调走。^[83]所以最终学完海军教育全部科目的人是不多的。

先后担任过昆明湖水操学堂总办者,有潘骏德和王福祥;曾任帮总办者有惠年(一度署总办)、德峰;曾任会办者,有宜霖;曾任提调者,有奎昌、常瑛、瑞沅、载林、桂祥。这些人本无海军背景,不过将此视作一个补缺的衙门。

五年学习,仅培养 24 名学生,68% 的合格率,然而海军衙门却利用这一时机,大肆保举请奖。请奖人数计海军衙门和学堂官员教习共 46 人,识者以为“彼等只知升官晋级而罔顾国家利益,直视军国大事如同儿戏”。^[84]这是清朝官场吏治腐败却又人所周

知,官员们人人为之的通病。

学堂还有为慈禧太后驻蹕时服务的责任。海军衙门在天津机器局制造了“安澜”、“翔云”、“捧日”三艘船只,以供慈禧游览昆明湖时乘坐。海军衙门的一些文件提到,“该学堂演试轮船,原为恭备拖带‘安澜舫’御坐船,系属要差,自非寻常操船可比”。“内学堂恭备轮船,外学堂恭备颐和园电灯与西苑电灯……该员等夙夜在公,无间寒暑”。^[85]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所学堂为皇室宫廷服务的性质。

第一届学生毕业转赴天津后,学堂又招收了第二届 40 名学生,但不久甲午战争失败,海军衙门撤销,这所学堂也就停办了。如今,水操学堂遗址无存,只有那艘永远开不动的汉白玉石舫,静静地泊在万寿山的西侧,默默地注视着时代的巨变。

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影响下,广东、江苏等地也相继仿效,办起了海军学校。

1887 年 8 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吴大澂联衔上奏,将广东原办博学馆改为水陆师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四所海军院校。博学馆原名实学馆,是张树声督粤时,用前任总督刘坤一捐其兼粤任海关所得平余银 15 万两,奏明生息,作为储养洋务人才的基金兴办的,地处黄埔长洲。1882 年实学馆校舍竣工开学,1884 年更名博学馆,主要学习西学知识。改作水陆师学堂后,又在附近购地 47 亩,修建了设备完善的新校舍。1887 年调前福州船政局提调、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任总办。

按照学校规模,广东水陆师学堂分为管轮、驾驶、陆师三科,各科同时招收 70 名学生。开办之初,从博学馆挑选了 70 余人学习海军,经过考试,陆续淘汰剔除,二年后仅余 38 名。1889 年秋,又从福州船政学堂调来已在堂学习三四年的 37 名学生,根据其实际水平,或另编一班,或插入博学馆旧生的班中,继续受业。还从天津招致了 20 名曾经读书,略有根底的幼童进行英语、算学训练,以期将来向水、陆师方向发展。聘英人李家孜为驾驶教习,爱德门为

管轮教习,德人欧拔次为陆军教习,兼教水师学生操演。并增设教习、稽察、文案、医官等多员,^[86]詹天佑担任英文教习和海图馆教习。以“广甲”舰为练船,委派刘恩荣为练船总管,程璧光为副总管。学堂的年度预算为6万两,练船薪粮杂费每年约需4万两。

1893年,谭钟麟调任两广总督,他辞退陆师教习,解散陆师学生,裁汰水师学生名额,仅留96人,改校名为水师学堂。^[87]

江南水师学堂开办较晚。中法战争之后,两江总督曾国荃在讨论海防计划时,即打算在南京下关设立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但这一构想没有实施。1889年冬,詹事府詹事志锐条陈海军事宜,建议各省广设水师学堂,教之海军诸学,以为筹防第一要务。经海军衙门议准,咨行两江总督,转飭江南筹防局议复。筹防局总办桂嵩庆向曾国荃建议,南洋理应创办水师学堂。于是,1890年初夏,江南水师学堂在江宁开办起来。

江南水师学堂设在仪凤门(今兴中门)和挹江门之间的花家桥,地广约三四十亩,南北狭长。校园系仿英国水师学堂常习之式,请上海著名西式建筑专家,稍变其制,设计建造的。公客厅、客厅与学生住房、饭房、睡房皆照华式。西学堂、工艺房、洋教习房则仿西式。另有操场,设高桅,供学生练习桅上操法用。十余年后考入该校的周作人,曾对校舍作过详尽的回忆。

学堂分驾驶、管轮二科,各计额设学生60名。创办时将原设鱼雷学堂裁撤,优等学生转送旅顺鱼雷营加习海操,其余留归学堂。^[88]向社会公开招生的,要求年龄在13岁至20岁之间,已读二三经,能作策论,文理通顺,曾习英文三四年者。除了考试中文外,还要加考英文、翻译、地理、算学四门,须四门皆有可观者方能中选。文化考试之后,“由西医体检,证明身无隐疾,再由本人家属出具甘结及绅士保结,声明身家清白,并非寄籍外国,亦不崇奉异邪等教”。在学五年之中,“不得自行告退请假完娶,不得应童子试”。学习训练中,“如有他虞,各听天命,倘若藉众滋事或畏难逃学,除将该生开除外,还将提其家属,追缴历领贖银”。^[89]然后留堂试习四个月,最后确定是否录取。如此严格的要求,使招生颇为

不易。1892年《格致汇编》报道，“至馆生徒仅八十名”，“验学者之年貌，略皆在十六七至二十四五岁之谱”。^[90]

江南水师学堂各项规章主要仿效天津水师学堂。根据英文深浅，资质进境，把学生分作三班。英文胜者为一班，每月每人除饭食外给贍银4两；次者为二班，贍银3两；再次者为三班，贍银2两。未滿四个月的试习生，只供饭食不给贍银。

驾驶学生除要求精通英文外，需学几何、代数、平、弦三角、中西海道、星辰部位、升桅帆纜、划船泅水、枪炮步伐、水雷鱼雷、重学、微积、驾驶、御风、测量、绘图诸法、轮机理要、格致、化学等课程。管轮学生需习气学、力学、水学、火学、轮机理法、推算绘图诸法，并由洋教习领赴机器厂、绘图房、鱼雷厂、木厂，实习打铁、翻砂、铸铜、修理轮机诸项手艺。并规定了定期考试制度。1892年10月17日，学堂总办桂嵩庆特请江南制造局著名英国翻译傅兰雅到校，主持五天大考。驾驶班平均分数2196分，管轮班平均分数为1866分（3200分为满分）。按例凡得全分之半者得到上取，得全分三分之一者为次取。因此，学堂的教学还是很有成绩的。^[91]

海军衙门成立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重点移至北洋，海军教育的重点也移至北洋。天津水师学堂的各项规章成了其他学校创办时的楷模。随着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天津学堂的各项制度更加完备了。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

凡挑选海军学生，须身家清白，身无废疾，耳目聪明，口齿清爽，文字清顺，年在十四岁以上十七岁以下，已读二三经，能作论及小讲半篇者。准其父兄觅具保人，送堂考验。如其合选，留堂学习英文三个月。由堂中总办大员甄别，择其聪俊者留堂肄业，名为海军官学生。^[92]

学制改为四年。肄业后，经北洋大臣大考中式，派上练船学习1年。对于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

及一切船上应习诸艺,都要通晓。又通过春秋两考,便准保以把总候补,获得七品官资格,然后回校重新学习6个月。考试合格,再拨入枪炮练船学习3个月。成绩优秀的,即保以千总候补,其列次等的,为尽先候补把总,分派各兵船差遣练习,遇缺外补。^[93]

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1887年毕业第二届曾兆麟等20人,1890年毕业第三届刘传授等19人,1892年毕业第四届曾宗巩等19人。管轮班1888年毕业第一届黎元洪等19人,1889年毕业第二届严文炳等13人,1891年毕业第三届吴毓麟等16人,1894年毕业第四届谢天佑等11人。再加上昆明湖水操学堂毕业生、威海水师学堂即将毕业的学生,19世纪90年代起有大批海军士官生进入北洋海军服务。而舰队这几年又未添置新船,使得人与岗位的矛盾日益突出。1893年,丁汝昌建议变通旧章,将京津两学堂毕业生先派人枪炮学堂学习6个月,上“康济”练习舰学习鱼雷、水雷技艺6个月,再上“威远”练习舰学习练艺2年。广历东南洋沿海,考察风涛沙线,两年之后再按章补等。李鸿章表示同意,并上奏说明。^[94]

学堂总办吴仲翔在校任职5年后,于1886年离职回任福州船政局提调,总办一职由会办吕耀斗继任。严复于1889年晋升为学堂会办,后又升任总办。^[95]严复说话依然锋芒毕露,老乡陈宝琛说他“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环我如犍牛耳。闻者弗省,文忠(李鸿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96]他在给堂弟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堂弟劝他多走李鸿章的门路,他后来复信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97]这是一种近乎矫情的评论。严复在北洋官场厮混多年,岂能不知亲近李鸿章的道理?严复是才子,官场须关系,这都是实情。李鸿章对他本是极欣赏的,他抽上鸦片,李鸿章还劝他:“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

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二人关系出现疏远,原因不详,但恐怕未必就是陈宝琛所说的忧国忧民,语气激烈。严复儿子说他“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他显然把兴趣放到科举上,于1885年捐了个监生,以后4次参加乡试,皆铩羽而归,连个举人都考不上。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抱怨:“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98]对学了横写的外国文字(旁行书)很不是滋味。后人研究严复,都是从戊戌变法时代的思想家、翻译家人手,很少有人客观地讨论他在英伦归国后执教津门十几年的思想脉络和工作表现。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些年里,严复对自己所从事的海军事业其实兴趣不大,他一直追求的,是另外一条入仕的道路,而那条路,在当时士大夫看来,才是人之常情的正途。

除了天津水师学堂外,丁汝昌又于1889年在刘公岛西南端向南坡上,兴建威海行营海军学堂。利用冬季南巡机会,在上海、广东招收学生36人,次年6月开学。另有自费生10人前来旁听。丁汝昌兼任学堂总办,直隶候补道李继刚任委员,实际负责学务。1891年派丁幼章为提调,后由郑汝成继任。委王学廉为总教习,以后又由郑汝成担任。美国人马吉芬为洋教习,冯琦任英文教习,余芝春、谭家复为汉文教习。操练教习向练营借用,西医官由海军医院借用。学堂所有章程悉照天津水师学堂及《北洋海军章程》办理。惟内堂外场课目略有变通。^[99]

1894年,吴纫礼等46人毕业,放假回籍。中日战争后,转入天津水师学堂续习1年,分发军舰实习。

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学堂进一步衰落。中法战争后,裴荫森出任船政大臣。他力图扭转颓风,批准增购外洋书籍、教学仪器,继续招生。聘用外国教习,恢复艺圃,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为了解决“扬武”号练习舰在中法战争中沉没,学生无处实习的问题,还购买了英商“美那”号夹板船,改名“平远”,用作学堂练习舰。

派往欧洲的留学计划仍在进行。1886年4月6日,海军第三

批出洋肄业学生,在华监督周懋琦、洋监督法员斯恭塞格率领下,取道香港前往欧洲。其中包括船政后学堂驾驶、管轮班历届毕业生陈恩焘、贾凝禧、周献琛、刘冠雄、黄鸣球、邱志范、郑文英、王桐、陈伯函、曹廉箴、张秉圭、罗忠铭、陈寿彭、陈鹤潭,前学堂制造班第三届毕业生卢守孟、郑守箴、林振峰、陈庆平、王寿昌、李大受、高而谦、陈长龄、林志荣、杨济成、林藩、游学楷、许寿仁、柯鸿年,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学生郑汝成、陈杜衡、沈寿堃、伍光建、王学廉等33人。^[100]驾驶生留学3年,制造生延长为6年。周懋琦评价说,在英国学习测绘海图、巡船练船兼驾驶铁甲兵船的陈恩焘、贾凝禧文武兼资,最为出色。周献琛于练船用帆、驶风之学尤肯不惮劳苦。学习操放炮枪队阵兼学铁甲兵船的刘冠雄、黄鸣球、邱志范、王学廉、郑汝成、陈杜衡、沈寿堃、郑文英,学习兵船管轮的王桐,考试成绩优等。学习水师兵船算学、格致的,伍光建最为出色,陈伯函、曹廉箴次之。学习水师海军公法、捕盗公法及英语的,张秉圭、罗忠铭较优。陈庚(寿彭?)次之。在法国学习海军制造、算学、化学、格物学的有郑守箴、林振峰。学习海军制造之学的4人中,陈庆平、李大受将来可胜轮船铁路总监工之任,陈长龄、卢守孟可胜轮船监工之任。此外,陈鹤潭病故,罗忠铭中途撤回。只有杨济成考不及格。^[101]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届留学生所学的专业,已大大超出海军驾驶和造船技术,甚至超出了一般的工科。林藩等6人进入法国教育部“律例大书院”,攻读国际法等近代法学课程,反映出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兴趣。

第三届留学生出洋后,船政学堂第九届驾驶学生所剩无几。船政局为节省经费,将“平远”号练习舰改作运输船,驾驶学生送人北洋“威远”号练习舰实习。以后又需练船,再将从南洋调回收坞的“靖远”号轮船改充。

这一时期创办的海军学校,还有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大沽鱼雷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和旅顺口鱼雷学堂,更在北洋施医局、天津储医局总医院的基础上,开设北洋医学堂(1893年),为海军培

训专业医务人员,这也是全国第一家西医院校。近代海军教育此时达到全盛时期。新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对于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然而在此时,科举制度的根基尚未动摇。不少进入新式学堂,甚至出洋留过学的人,依然被视为杂途出身而受到歧视。

鉴于这种情况,李鸿章在1887年6月上奏,要求之乡试之年,允许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学生教习,就近由直隶总督遴选参加考试,以免学生千里迢迢返回原籍。^[102]今天虽然已无法弄清有多少海军学生曾企图通过科举以获得正途出身了,但最终获得进士及第的却一个也没有。看来学习声光化电的,确实做不了八股制艺,而历史的发展,最终以新式教育埋葬了科举制度。

四、由盛转衰的福州船政局

江南制造局从1885年建成“保民”号军舰后,便偃旗息鼓,停止了造船业务,成为单纯制造枪炮弹药的兵工厂。中国两大造船基地,只剩福州船政局一家了。

马江之战后的半个月,朝廷任命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兼署船政大臣,先前丧魂落魄的张佩纶重又恢复了自信。他在“筹办船政事宜折”中,提出整饬局章、筹集军火、增筑炮台、统筹经费四策。^[103]未几张被革职,由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署理船政。在以后的五年中,船政局事业进一步得到发展。

1884年12月18日,船政局第五号铁肋船“横海”号下水。“横海”是在上年5月17日安上龙骨的,本当1884年夏竣工,因马江之战被伤,战后日夜赶工,终于一切就绪。“横海”与“威远”、“超武”、“康济”、“澄庆”是同型船,张佩纶登舰视察时,认为设计中留载的地位过宽,配炮的吨数尚少,仍带有商船之式,指示工程处在设计第六艘铁肋船时完全采用军舰式样。

船政局所制第一艘2200吨级巡洋舰“开济”号拨归南洋使用后,左宗棠决定向船政局续订2艘。1884年1月,两舰先后安上

龙骨,开始施工,同“横海”舰兼营并制。三舰同工,是船政局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1885年12月23日,第二艘巡洋舰“镜清”号下水。1886年10月15日,第三舰“寰泰”号下水。与“开济”相比,两舰在舰底两旁添设了艏龙骨,在望台上添设了1副双灯电机,以防敌人雷艇夜间偷袭。还在舰艏增添2具鱼雷发射管,舰尾改配190毫米口径大炮1门,将三枝木桅改为钢桅。^[104]以上诸舰皆调往南洋。

1887年春,船政局开始建造第六号铁肋船和钢甲快船,“寰泰”舰亦只剩扫尾工程。估计一到秋间,三舰中当竣工两舰,故需预筹接续之工。此外,经费拮据,薪资料件苦无可指之款。如何将船政局蒸蒸日上的势头发展下去,正是裴荫森日夜谋划的重要问题。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决定请船政局代制1600匹马力巡洋舰1艘,2400匹马力穹甲巡洋舰3艘,每舰协拨番银9万两。代制中等浅水兵轮4艘,每舰协拨番银3万两。虽说八舰之工,粤省仅付区区48万两,为造价之半,可是裴荫森认为“粤济闽厂经费之不足,闽协粤省工力所有余,制造、用船均属公家,自无庸两相比较”,协造计划遂为谈妥。^[105]8月6日,第六号铁肋船下水。船政局将此船拨给广东,取名“广甲”,作为协造计划中的第一舰。

“广甲”较前面5艘铁肋巡洋舰作了较大的改进。该舰排水量1300吨。装有1600匹马力复合卧式蒸汽机1台,航速14节。舱面配有二支钢桅,一支木桅,能张帆以收风力,节省能源消耗。舰上装有150毫米口径钢炮1门,120毫米口径钢炮4门,连珠炮4门,鱼雷发射管2具。^[106]

协造中的3艘穹甲巡洋舰,命名为“广乙”、“广丙”、“广丁”。1889年8月28日,“广乙”舰下水。1891年4月11日,“广丙”舰下水。“广丁”于1889年11月4日安上龙骨,旋因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海军发展有不同看法,奏请将造船计划暂行缓办,船政局便将“广丁”改作本厂自造之舰,易名“福靖”号。^[107]一般认为3舰为同型舰,排水量1000吨,功率2400匹马力。但档案中留有的有关军舰尺度和装备的记载是有所不同的。“广乙”配有150毫

米口径前主炮 1 门,120 毫米口径后主炮 2 门、连珠炮 2 门。^[108]
“广丙”配有 120 毫米口径前主炮 2 门,120 毫米口径后主炮 1 门,
五管 37 毫米口径哈乞开司炮 4 门,6 磅子哈乞开司炮 4 门,鱼雷
管 4 具。^[109]

此外,拟定建造的 4 艘浅水军舰,仅成“广庚”1 舰。“广庚”
排水量 320 吨,功率 400 匹马力。^[110]

19 世纪 80 年代,是船政局兴旺发达的时代。除了施工安排
上数舰并造,大大缩短了周期外,更重要的是一批造船技术骨干正
在迅速成长。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留
学归来的学生成为船政局的中坚。他们运用所学的西方造舰知识,
独立地担负起船政局的军舰设计、施工指导和监制任务。裴荫森
称赞说:“该学生等于制造之学研虑殚精,不特创中华未有之奇
能,抑且馥馥乎驾泰西而上之。”^[111]

1885 年 7 月 4 日,裴荫森主稿,并与左宗棠、穆图善、杨昌濬、
张兆栋联衔,向朝廷提出“试造新式兵船疏”。他们总结马江之战
教训,认为法国的上等炮艇,不过与“福胜”、“建胜”等船争猛,上
等兵船,不过与“南瑞”、“南琛”争快。但凭着二三艘铁甲舰,便纵
横闽浙洋面。马江之役,九船同沉,石浦之役,五船俱退,证明沈葆
楨当年所说“无铁甲而兵船恐致失所恃”的判断是正确的。奏折
又说,根据魏瀚等人的报告,德国最新创制了“柯袭德士迪克”、
“十飞礼”、“则唐”等 3 艘钢甲舰,较北洋新订“定远”舰船身略小,
较“济远”舰马力稍轻,但驾驶容易,费用较省。每舰工料银预估
40 万两。闽省如有这样的军舰三数号,炮艇、快船得其所护,则胆
壮气扬,法人断不敢轻于启畔。^[112]这个奏折被用轮船送到上海,
再以五百里驿传的急件方式,向北京递送。

李鸿章接到这一奏疏的副本后,与回国述职的李凤苞进行讨
论,旋对船政局计划进行了全面驳斥。李鸿章认为,裴氏“所称船
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马力速率亦小,钢甲既薄,尤不
若钢面铁甲之坚。估价虽略少于‘济远’,然欲以此敌西国之铁甲

舰,恐万不能。裴臬司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鼓惑……尚祈朝廷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帑金,是为至幸”。^[113]并将该钢甲舰与“济远”舰的性能作了全面的比较。然而慈禧太后却亲笔在裴折上写下懿旨: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着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促,毋得草率偷减,乃至有名无实。^[114]

如此恳切的语言,由皇太后亲笔写来,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是极为罕见的,真实地反映出最高当局在中法战争之后对于海防建设的焦虑心情。

1886年春,裴荫森委派魏瀚出国选购钢甲舰料件,至秋天回国。12月7日,裴荫森率员绅工匠,共捧龙骨,安置船台。钢甲舰开始全面施工。1888年1月29日,钢甲舰下水,命名“龙威”。“龙威”舰前段装甲厚5英寸,后段装甲厚6英寸,机器舱、锅炉房、弹药舱外的防护装甲,宽5英尺,厚8英寸;舱面甲厚2英寸,炮台甲厚8英寸,排水量2100吨,2400匹马力,时速45华里。军舰的武备包括:260毫米口径前主炮1门,120毫米口径辅炮1门,120毫米口径后主炮1门,连珠炮4门,鱼雷发射管前后2具。^[115]

“龙威”属于装甲巡洋舰,从其型制看,比铁甲舰要低一个层次,属于不同舰种。李鸿章抓住裴荫森用“钢甲船”偷换“铁甲船”概念的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当时军舰的防护材料,有生铁甲、熟铁甲、钢面铁甲(亦译康邦甲,即复合装甲)和钢甲四种,以钢面铁甲和钢甲最为流行。二者孰优孰劣,西方国家也是见仁见智,评价各不相同。^[116]“龙威”是用钢甲材料作防护的巡洋舰,和铁甲舰显然不是一回事。作为国产巡洋舰,其舰种样式,制造水平,工艺标准,则比原先建造的军舰有了很大的进步。外国专家来厂参观,也诧为奇能,称赞不已。

1889年5月15日,“龙威”舰由“靖远”号练习舰管带林承谟

暂行管驾,出洋试航。次日出芭蕉口至白犬洋,行驶数周,甚为平稳。下午燃放主炮,忽然右副轮机出现故障,原来是折损、脱落了两颗螺丝。旋抛锚修理,又命杨永泰为管驾,黄鸣球为帮带,于9月28日再次试航。10月20日,“龙威”在上海展轮,准备驶往天津候验时,发现小轴汽机力量不足,即在耶松船厂订购备件二副,裴荫森还派后学堂管轮洋教习斐士博赴沪调查,并暂时革去负责轮机制造的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的顶戴。12月12日,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南下,勘验了“龙威”舰。认为“舱位工程布置妥帖,大机器两副亦复坚固灵通。闽厂首次试制之船,能是亦足”^[117],决定将此舰调拨北洋。琅威理还按照新式军舰的要求,提出增修镶配百数十处。次年5月16日,“龙威”舰随北洋海军北上,根据李鸿章的意见,舰名改为“平远”。^[118]

李鸿章虽然调入“平远”,但对于5年前造舰时的争议依然耿耿于怀。6月23日,李鸿章率周馥、罗丰禄、刘汝翼,乘火车驶往大沽口,换小轮船出海,登“平远”亲自校验。他评价说:“平远”钢甲、锅炉等均系新式,洵属精坚合同。惟嫌吃水过深,行驶稍缓。较之“定远”、“镇远”两铁舰固多不及,即较自“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速率较少,而制价实较节省。以之归队操练,聊助声威,尚未可专任海战。^[119]文中颇多曲笔。

任何落后国家在发展近代造船工业乃至整个近代工业的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李鸿章对此应当体会最深。即使是从国外进口,也是走过许多弯路,付出大量学费之后,才渐渐地精明起来。“平远”代表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虽然尚未脱离仿制阶段,但在制造中,不用洋员,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独运精思,汇集新法,绘算图式,脱手自造,这是很了不起的。船政局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国际船舶买方市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专业知识,便能购到先进的军舰。这对于中国造船企业,是重要的刺激和比照系统。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应当利用国际市场的最新水平,促进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不应以此来苛求和打击民族工业,更不能仅以进口为满足。

李鸿章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由此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对于船政局继续造船也不以为然。他以洋务宗师、新式海军鼻祖自居,傲视天下,咄咄逼人,挂公正评价之名,行门户派系之实。这种态度,无助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这也是他个人品质中的弱点。“平远”建造过程中的争议,是洋务集团内部湘淮系争斗攻讦的一个缩影。这种争斗,贯穿于海军建设的各个方面,作为内耗,不断销蚀着洋务运动本身向前突进时的锐气。

1549年,明人唐顺之编辑的《武编》中,记载了一种叫做“水底雷”的水中爆炸兵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操纵拉索引爆水雷。1590年左右,又出现了叫做“水底龙王炮”的水雷,用线香作引信,利用黑夜顺流飘放,当接近敌船时,香尽火发。1621年,还发明了以绊索引爆的触发飘流水雷。水雷在中国出现,比欧洲要早二百余年。^[120]

19世纪中叶起,水雷在西方国家海战中开始经常使用,并出现了专门运用水雷进攻的蒸汽艇。攻击的方法,有将水雷用绳悬于艇后引敌舰触发的,称作拖带水雷。有将水雷缀于伸出船头八九米的铁杆上进行攻击的,称作撑竿水雷。1866年,英国工程师怀特黑德在奥地利海军上校勒皮斯研制机动水雷的基础上,发明了新式自航水雷。因其形状细长,被称作鱼雷。1872年,怀特黑德开设鱼雷工厂,开始成批生产“白头”鱼雷。以后,德国人又做了改进,研制出刷次考甫磷铜鱼雷。^[121]

1878年1月26日,在俄土战争中,俄国鱼雷艇用刚刚装备的白头鱼雷,击沉了土耳其蒸汽护卫舰“英蒂巴”号。鱼雷艇小队的攻击战术,受到各国海军界的瞩目。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法国人也运用鱼雷艇攻击,击沉中国旗舰“扬武”号。鱼雷在近代海战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洋务派领袖早就认识到鱼雷兵器的重要性。除了1880年前后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均载有舰载小鱼雷艇或鱼雷发射管外,1882年,北洋向德国订购单管鱼雷艇四艘,广东向德

国订购了“雷龙”、“雷虎”、“雷中”三艘鱼雷艇。1884年,广东又在德国订购了八艘鱼雷艇,以八卦名之,即“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兑”。中法战争后,张佩纶提出,鱼雷快艇为水师必不可少之利器,奏请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头号双筒鱼雷快艇一艘,在刷次考甫厂订购磷铜鱼雷十具。裴荫森署理船政后,更明确提出,“海防利器,攻剿莫捷于鱼雷,守口莫猛于水雷”,^[122]主张自行制造。他招募学生陆汝成、杨仰曾试制各式水雷。1885年,刷次考甫鱼雷运到,在德国留学鱼雷、水雷制造的陈才端也艺成回国。裴荫森派他仿制鱼雷,“不使外人傲我所无”。^[123]

在伏尔铿船厂订制鱼雷艇的计划,因该厂不能承造,遂改在德国挨吕屏什好厂制造。1886年9月24日,鱼雷艇由德国海军军官驾驶抵达福州,命名为“福龙”号。“福龙”1500匹马力,时速23海里,船头配有鱼雷发射管2具,哈乞开司五管连珠炮2门。^[124]裴荫森计划在研究“福龙”的基础上,仿制鱼雷快艇。1886年船政局鱼雷厂落成,开始制造水雷。以后又向刷次考甫厂订制修理鱼雷机件。旋因经费不足,终于没有形成批量生产鱼雷的能力,建造鱼雷艇队的计划也未能实现。1890年,新任船政大臣卞宝第认为,“孤行一艇,殊不足以助声威”,奏请撤去,于海口改设水雷营,即以岁养鱼雷经费为水雷营经费。无论南北洋,只要拨银6万两,即可将“福龙”调去应用。“福龙”^[125]旋拨归北洋操练。

南北洋水师对于鱼雷的兴趣并未就此消失。船政局所制“广乙”、“广丙”、“福靖”诸舰,都配置了鱼雷兵器。有些史料称其为“猎舰”或“鱼雷快船”,当可属于雷击舰的范畴。北洋海军也继续向国外订购了左队一、二、三号、右队一、二、三号鱼雷艇。其中“左队一”号系英国百济公司所制,马力1000匹,时速26英里。配有哈乞开司炮2门,格林炮4门,鱼雷管2具,船价及附属装备、火力系统共耗银74452两,杂支11546两。^[126]另外五艇则是从德国购买散件回国组装的。显然,李鸿章对鱼雷兵器的认识,要比卞宝第高明得多。

中国人从19世纪80年代起对鱼雷快艇产生兴趣,但这种兴趣远未达到后来的那种程度。

中法战争后,船政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很大的进展。

船政局原有一座木质船槽,可供修理1500至2000吨左右的舰船。随着造船事业的发展,它已难于适应维修大型军舰的需要。尤其是北洋“定远”、“镇远”诸舰每年南下避冻,如果没有大型保养基地,只能进入上海、香港的外商船坞维修。1886年1月6日,裴荫森提出在距离船政局八里水程的红山建造船坞。这一建议被海军衙门以“经费竭蹶,实难为继,应俟筹有定款,再议兴造”和“闽坞尚非急不可缓”为理由搁置。^[127]1887年底,裴荫森与郑清濂、吴德章等人经过多次踏勘,另选青洲作坞址,自行开工。

青洲距船政局约3里。中间隔着均竹港。船政局为此专门筑起通济桥,使两地联成一气。裴荫森认为,坞址土实港深,形胜天然。坞近山根,大半石骨,以石为底,料省工坚;与船厂邻近,往来方便,便于修理;坞口江岸可泊轮船百艘,无用另建码头,这些都是青洲建坞的优点。建坞之款,拟用船政局常经费。工程进行至五分之二时,因闽海关经费欠解,难以维持,于1889年9月4日奏请暂行停工。至次年4月17日复工,1896年全部完成。船坞长38丈,宽10丈,深2丈8尺,^[128]连同它周围的面积计29.3万平方尺。内设抽水厂、机器厂、官厂(官员宿舍)、丁役房、水手房、木料亭、机房等设施,共耗银49万两。青洲船坞仅次于旅顺船坞,是中国第二大船坞。它不仅容纳当时国内最大的军舰,还修理过外国的军舰商船。只是当它建成时,中国海军发展的浪峰已经过去,船政局也由盛转衰。船坞没有发挥它预期的作用。

船政局还根据造船业务的发展,进口和自制了大量机器设备。1885年,设立了电报局。为了解决原料问题,曾计划开采福建附近的穆源铁矿并自炼钢铁,还打算自行铸造大炮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由于经费匮乏,这些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船政局的发展势头在1890年左右被打断了,其标志是裴荫森

的调离。由于船政局经费来源于闽海关的固定拨款,经营不计成本,产品不作商品出售,无偿调拨给各省使用,使得它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资金矛盾日益突出。根据朝廷规定,福州海关每月应拨经费5万两,可是从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底62个月中,船政局实际得款仅166万两,平均每月26774两,为应拨款的一半。^[129]随着舰船品种的升级换代,造船成本日益增高,经费不仅不增,还严重拖欠,船政局越发难以维持,造船周期也就拖得很长。针对这些困难,裴荫森想了很多办法,与广东协款建造军舰,便是其中一种。朝廷也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总理衙门大臣认为,“光绪二三年以前,两江督臣沈葆楨、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任内,位望较崇,随时将需款为难情况据实奏明。每奉特旨催解,各将军督抚亦气谊交孚,力筹应付,故经费裕而成船多。以后船政大臣如黎兆棠、张梦元、裴荫森,以两司调管船政,不能不事事禀承督抚将军。名为专管,实与司道兼权无异。所谓权势较轻,不足振全局,扩前功者。”^[130]解决的方法,是提高船政大臣的级别。

1890年4月20日,裴荫森被召往北京,闽浙总督卞宝第兼管船政事务。从此以后,船政大臣皆由闽浙总督或福州将军兼管。但这样做的效果更糟。除了总督、将军公务繁重,无暇经常前往船政局督促检查外,这些官僚本身对造船全无所知,也毫无兴趣。所以船政局就日趋停滞和没落。至1894年4年间,除将“广丁”改名“福靖”并制造完毕外,仅仅建造了“通济”号练习舰。如此缓慢的进度,在船政局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底62个月中,船政局得到的闽海关解款仅118万两,平均每月19032两,为应拨款的38%,^[131]大大低于裴荫森任内所得数。可见用总督、将军兼管船政以筹经费的打算是完全失败的。前后对比,人们更应对裴荫森等人任内的苦心经营深表敬意。

当年左宗棠创办船政局时,对船政大臣人选极费斟酌,认为关系事业的兴衰成败,这种考虑是很有远见的。1890年之后,船政局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些发展,但失去了从宏观角度统筹全局发展的核心人物,因此一蹶不振。正如它的兴建,是洋务运动兴起的

最早几抹霞光一样,它的没落,也透出了洋务运动的衰象,同北洋海军在成军之后便停滞不前的状况是完全一致的。

注 释:

[1]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 8779 页。

[2] “光绪八年九月二十日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 534 页。

[3] 马建忠:“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适可斋纪言》,卷三,页七~八。按书中称此文作于光绪辛巳冬,即光绪七年冬,而何如璋之奏的日期为光绪八年,故疑为光绪壬午冬之误。

[4] 袁保龄:“建海防衙门议”,《闾学公集·文稿拾遗》,页二十九~三十九。

[5] 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光绪十年二月十三日),《李集·译稿》,卷十五,页二十九~三十。

[6] 袁保龄:“致绳愆”,《闾学公集·书札》卷二,页四十三。

[7] 张佩纶:“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折”(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涧于集·奏稿》,卷四,页三。

[8] 刘铭传:“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刘铭传文集》,第 54 页。

[9][10] 李鸿章:“致曾沅甫宫保”(光绪十年五月初九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五十三。

[11] 李鸿章:“致闾中堂”(光绪十年五月十八日)(未刊稿)。

[12][13]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光绪十一年),《清末海军史料》,第 59~60 页。

[14]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十五,页四,光绪十一年九月庚子条,即九月初五日。按《光绪朝东华录》作九月初六日,当从《实录》。

[15] 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清末海军史料》,第 233 页。

[16] 史学界通常把 10 月 12 日(九月初五日)作为海军衙门成立之日,似不妥。因为该日懿旨仅规定奕讜总理海军事务,没有明确提出设立海军衙门。且又指令奕讜同奕劻、李鸿章等详慎规划后再上奏。因此海军衙门应是 10 月 24 日(九月十七日)奕讜上奏获懿旨允准后才成立的。

[17] 李鸿章:“复曾沅甫宫保”(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李集·朋稿》,

卷二十,页六十。

[18] 震钧称:“神机营署在煤炸胡同。”见《天咫偶闻》,卷三,页十八;朱新:《京师坊巷志稿》,第110页称:“煤渣衙衙,渣作炸,神机营衙门在焉。”

[19] “奕譞缮具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防满汉文黄模奏请铸颁抄折”(光绪十四年),《清末海军史料》,第504~505页。

[20]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注[56],《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234页。

[21]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17~19页。

[22]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二,页二~四,光绪十一年十二月辛巳条。

[23]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二,页十五,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己丑条。

[24] 李鸿章:“复曾劄刚袭侯”(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六十二、六十三。

[25] 刘体智:《异辞录》,第83页。

[26] 据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引《大清缙绅全书》及《万国公报》,第三卷、第二十五号,载《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234页。又,据王文及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先后在海军衙门当过差的人员包括:总办文案翼长(总办章京)恩佑(神机营全营翼长,镶红旗汉军副都统,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蒙古正白旗人)、尚思懋(正红旗汉军副都统,汉军镶蓝旗人),帮总办文案(帮总办章京)望岫(四品衔兵部郎中,通政使参议,满洲正红旗人)、阿麟(记名知府,户部郎中)、奎煥(内閣侍读学士、云骑尉,太仆寺少卿,蒙古镶白旗人)、常明(记名御史,工部员外郎,浙江道御史,满洲镶红旗人)、明惠(记名副都统,满洲镶黄旗人)。又,曾担任过印务参领:傅云龙(候补道员,汉人),管理海疆股章京崇纶(大理寺丞,满洲正蓝旗人)、丰仲(候选通判,汉军正黄旗人)、荫斌(礼部候选员外郎,满洲正黄旗人),管理款项股章京维松(副参领,蒙古镶白旗人)、铁良(工部员外郎,满洲镶白旗人)。又,曾担任过印务参领:麟瑞(候选州同知,满洲正蓝旗人),管理船政股章京寿山(候选员外郎,汉军正白旗人)、金如铿(京营游击,满洲正黄旗人)、彦忠(礼部笔帖式,满洲正黄旗人),管理器械股章京耀濂(理藩院笔帖式,蒙古正黄旗人)、庆宽(内务府员外郎,满洲正黄旗人)、宝文(宗人府笔帖式,满洲镶蓝旗人,宗室),主稿章京载林(吏部候补主事,满洲镶蓝旗人,宗室)、耆龄(工部候补主事,汉军镶黄旗人)、联魁(兵部郎中,满洲镶红旗人)、丰培(工部候补主事,满洲镶红旗人),轮班当月章京英文(满洲镶蓝旗人,宗室)、色克图(蒙古镶黄旗人)、色楞额(蒙古镶黄旗人)、钟俊(满洲镶黄旗人)、全顺(满洲正黄旗人)、春龄(满洲镶黄旗人)等。

[27] 李鸿章：“复许星叔少司寇”（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四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五十四。

[28]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近代神海》，第一辑，第2~3页。

[29] 1886年9月21日，御史朱一新上奏，称“宗藩至戚阅兵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将何以诘戎兵而崇体制？矧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之唐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并称“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等语。见“豫防宦寺流弊疏”（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佩弦斋文存》，卷首，页二十三。次日懿旨，谓朱一新所奏与醇亲王面奏李莲英随行情况大相径庭，又深宫不得已苦衷句意尤不可解，着其明白回奏。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2149页。24日，朱一新回奏称：“今亲藩远涉，内侍随行，在朝廷为曲礼宗亲，在臣庶则以为创见。群情过虑，不免惊疑。风闻北洋大臣曾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也，该太监遂乘之。沿途办差者误谓王舟已至，骇人观听，众口喧传。臣恐事或失真，未敢遽尘圣听”。又谓不得已之苦衷，系指皇太后体恤醇亲王，而令太监同往云。见“明白回奏疏”（光绪十二年八月廿七日），《佩弦斋文存》，卷首，页二十七~二十八。25日懿旨，称该御史风闻不实，“既料及内侍随行系深宫体恤之意，何又目为朝廷过举？”“诸臣陈奏事件，总应专就本事，剴切敷陈，若仅取快词，不按事理，务必藉端立说，以遂其倾轧之私……殊与整饬纪纲，实事求是之意大相刺谬”。“朱一新着以主事降补”。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2151~2152页。

[30] 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清末海军史料》，第232~251页。

[31] 李鸿章：“丙戌四月随醇亲王巡海呈教”，李国杰辑：《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鸿章遗集》，卷六，页十九。

[32] “醇邸和诗”，《海军衙门函稿》，第一册（未刊稿）。

[33][35] “奕譞奏查北洋炮台水陆操防机器装备水师学堂情形折”（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一日），《清末海军史料》，第252页。

[34]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1977页，光绪十一年六月辛卯条。

[36]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323页。

[37] 李鸿章：“筹议海军经费”（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集·海稿》，卷一，页十一~十二。

[38][39] “海军衙门奏展限海防捐输预筹海军经费折”（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26~627页。

[40] 关于这一时期北洋海防经费收入细表，参见本书第二章注[145]。

[41] 奕譞等在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奏请按原议筹拨洋药厘银一百

万两折”中称：“岁出之项，北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南洋用款七八十万。现在撙节度支，北洋仅拨银九十余万两，南洋仅拨银五十余万两。”见《清末海军史料》，第637~638页。又，南洋1886年支款数，见“海军衙门奏展限海防捐输预筹海军经费折”（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27页。然而在事实上，这种划拨往往是难以落实的。比如江西，光绪十二年应从厘金项下拨解海防经费30万两，按8折计为24万两。当年解海军衙门5万两，其余款项海署命就近解往南洋。此后七年里，先后分9次解款13万两。光绪十九年，南洋大臣派员往江西守催，才又于四月十三日再解2万两，依然缺额5万两。见“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方汝翼片”（光绪十九年四月），《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221页。

[42] 据《李集·奏稿》，卷六十二、六十七、七十六、七十八；《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160~166页；《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269~270页；《清末海军史料》，第660~661页所载李鸿章、王文韶奏折统计。奏折中凡有京平数，皆按100两京平等于94两库平比例，转成库平银。

[43] “户部奏拨补海军衙门经费片”（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36~637页。

[44] “户部议定海防报捐五项新章”（光绪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23~625页。

[45] 1885年，北洋海防经费从直隶海防捐中收入1 128 199两，1886年收入366 577两。旅顺船坞工程从直隶海防捐内拨款631 433两。合计2 126 209两。见《李集·奏稿》，卷六十四，页十九，卷六十九，页三十三。

[46] 据第一历史档案馆：“醇亲王府档清二，第195、197、198号”。转引自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其中1886年收入1 004 525两，1887年收入271 823两，1888年收入301 710两，总计1 578 058两。张文统计作157万7千余两，有误。

[47] 直隶、四川海防新捐收入，见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湖南、江西的海防新捐收入，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179、219、253、257页。

[48] 1874~1894年，北洋海防协饷共支银约2140万两，购买军舰开支约800万两，“定远”等8舰经费共支银420万两，旅顺船坞工程支银140万两，总计3500万两。这一时期，清政府财政支出平均每年为8000万两。见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

[4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2页。

[50][51][54] 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52] 1886年6月,奉宸苑以三海工程款不敷,奏准从存人汇丰银行生息购买“致远”等军舰专款中暂提银30万两,被李鸿章以购舰急需备款为理由拒绝。是年底,醇亲王以工程紧急,嘱李鸿章“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借洋七八十万之谱”,以后再分派闽海关及江海关按年报效归款。李鸿章派周馥向德国华泰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银90余万两,岁息五厘五。醇亲王称这种交易“为转移计,非有事辄勒捐也”。见《李集·海稿》,卷二,《电稿》,卷七诸函电。

[53]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060页,光绪十二年十月廿四日。

[55] 李鸿章:“综论饷源并山东热河各矿”(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李集·海稿》,卷三,页六。

[56] 袁保龄:“致钱军机”,《陶学公集·书札》,卷四,页五十。

[57]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二,页一,光绪十四年二月癸未条。

[58]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三,页四,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丁酉条。

[59] 颐和园管理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颐和园》。

[60]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醇亲王府档清二,第198号”,转引自张利民:“朝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

[61] 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数,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过去较为流行的挪用三千万两说,系源于梁启超、王世铤等人的叙述。梁谓:“自马江败后,戒于外患,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各款三千万,思练一劲旅。其后海军之款,日日加增。积之十年,其数可想……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楣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见梁启超:《瓜分危言》,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王称奉宸苑司三海工程,贪污中饱。“海军各堂司贖见如此得金,谋皆修清漪园,动款三千余万,而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鱼肉尤甚。”见王世铤:《造陶庐日记》,转引自郑天杰、赵梅卿:《中日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第238页。此外,池仲祐《海军大事记》称“园工无已时,而海军款二千余万尽数输入颐和园之用矣”。见《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83页。这些说法,距离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并不足信。现代史学家中,有不少人对这一悬案做了研究。肖一山同意“三千万两说”。见肖一山:《清代通史》,第3卷,第935-938页。罗尔纲认为“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见罗尔纲:“清季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转引自郑天杰等:《中日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第239页。张利民认为“不会大于一千万两”。见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邹兆琦认为“估计挪用总数为一千二

百万至一千四百万两之多”。见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考”，《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叶志如、唐益年认为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的上限估计为六百万两左右，挪用海军经费当然更少。见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62][63] “奕谥奏每年由海军经费拨颐和园工程用款三十万两片”（光绪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84页。

[64] “奕劻等奏新海防捐暂垫颐和园工程用款片”（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85页。

[65] “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奕劻、福锃奏”，转引自于道成：“颐和园修建年代考”，载《近代京华史迹》，第476页。

[66][74] “海军衙门奏为筹集巨款用备海军要需折”（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41页。

[67][68] 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考”，《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

[69][70][71] 李鸿章：“复两江制台张”（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一日），“复两江制台曾”（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李文忠公尺牍》，第十册。

[72] 260万两海军巨款的来源为：广东100万两，两江70万两，湖北40万两，四川、直隶各20万两，江西10万两，见《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167页。

[73] 李鸿章：“复两江制台曾”（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尺牍》，第十册。

[75] 刘秉璋：“筹解海军要需银两谨将起程日期恭折具陈”（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74页。

[76] 张之洞：“筹解海军备用银款分年按季解津折”（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52~53页。

[77] 刘秉璋：“筹解海军要需银两谨将起程日期恭折具陈”（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刘秉璋片”（光绪十六年五月），《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74~75、93页。

[78] 具体来说，广东认筹100万两，自光绪十五年（1889）起，分作五年，每年应解20万两。每年又分四季，每季交银5万两。两江认筹70万两，分作二年，每年按季在正杂各款内腾挪。直隶认筹20万两，来自藩库拨节年耗羡银2万两，六分平银2万两，外销款银2万两；长芦运库拨正课银5万两，外销款银3万两；天津道拨清剥变价银2万两；海防支应局拨天津厘捐银4万两。四川认筹20万两，经藩司商同盐茶道、官运局向商号借款15万两，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年二月分别汇往天津，俟以后岁收盐厘除拨解京协各馆外以盈余分年归还。最后5万两，从官

运局运本下暂挪。江西认筹10万两,计光绪十五年、十六年两年各5万两解清,一半为厘金,一半为地丁银。湖北认筹40万两,分三年解清,在本省所收川盐斤加价内开支,计光绪十五年14万两,十六、十七年各13万两。参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52~53、49~50、48、50、74、93、53~54、64、86、105、63、112页。

[79] 260万两巨款的存放地点为:汇丰银行存银1072900两,德华银行存银440000两,怡和银行存银559600两,开平矿局借用527500两,见李鸿章:“请添拨备倭饷需折”(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集·奏稿》,卷七十九,页十七。

[80] “奕譞等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清末海军史料》,第395页。

[81] “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海军衙门函稿》(未刊稿),第二册。

[82] 李鸿章:“考校内学堂学生”(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李集·海稿》,卷四,页二十二。

[83]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796页。又,关于昆明湖水操学堂毕业生人数还有其他说法。如池仲祐在《昆明湖水师学堂纪略》中称:“甄别后得四十名留堂肄业,光绪十八年三月毕业,派赴天津水师学堂。”转引自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794页。《清末海军史料》所载“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册”中昆明湖水操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为36名。

[84] 见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232页。

[85] “海军衙门为昆明湖闸板蓄水以资水操学堂演练事致奉宸苑咨”(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奕劻等奏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各员请奖折”(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末海军史料》,第401、406页。

[86][87]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776~777页。

[88]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三,页七,光绪十七年正月己卯条。

[89] “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523~525页。

[90][91] “南洋水师学堂考试纪略”,《格致汇编》,第七卷,第4期。

[92][93] 《北洋海军章程·考校》。

[94] 李鸿章:“变通学艺期限片”(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集·奏稿》,卷七十七,页二十九。

[95]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第11页称:光绪十六年“直隶总督李文忠公派为总办水师学堂”。按:据李鸿章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与海军衙门谈论昆明湖

水师学堂来天津考试时,提到“当即邀熟谙西学之罗道会同水师学堂吕道、严道认真考校”(《李集·海稿》,卷四,页二十二),则吕耀斗此时当仍在学堂任职,严复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确切年份待考。

[96]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第8页。

[97] 严复:“与四弟观澜书”,《严复集》,第三册,第730~731页。

[98] 严复:“送陈彤甫归国”,《严复集》,第二册,第361页。

[99] 吴纫礼:“北洋威海水师学堂事略”,转引自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798~804页。

[100] 《船政奏议汇编》,卷三十二,页四~六;卷四十一,页八~十二。按卷三十二所载裴荫森光绪十二年四月初七日奏中有罗忠铭,卷四十一所载裴荫森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奏中无罗,另开陈寿彭。薛福成日记载周懋琦向他禀告出洋学生情况,共列举学生34人,称罗忠铭撤回,又提及有陈庚者。见《出使四国日记》,第144~145页,林庆元在《福州船政局史稿》中考证,认为陈寿彭确系出国,船政学堂历届毕业生名册和第三批留学生名单中漏列他的名字。又认为陈庚系陈寿彭之误,见该书第156、160页。

[101]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44~145页。

[102] 李鸿章:“学堂人员请一体参加乡试片”(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八日),《李集·奏稿》,卷六十,页十九~二十。

[103] 张佩纶:“筹办船政事宜折”(光绪十年九月初五日),《涧于集·奏议》,卷四,页六十一。

[104]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24~325页,345~346页。

[105] “光绪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64~366页。

[106]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68~369页。

[107] “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卞宝第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422~423页。

[108][110] “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十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95~396页。

[109] “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卞宝第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427页。

[111] 裴荫森:“寰泰快船试洋并陈厂务情形折”(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三十六,页十。

[112] 裴荫森：“恳准拨款试造钢甲兵船折”（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二十七，页七。

[113] 李鸿章：“议驳船政局请造兵船”（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李集·译稿》，卷十七，页四十。

[114] 慈禧亲笔懿旨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四辑，第832页。

[115]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79页。

[116]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介绍称：“钢面铁甲创于英之略墨耳厂……造法有二：其一，设造长五迈当阔二迈当厚二百四密里之甲，先造熟铁甲长三迈当，阔千八百密里，厚三百十密里；又造钢板厚五十密里，长阔数同。两板用螺钉栓连（栓于四角），中间相距百二十五密里。入火烧红，立置冶坑中，于相距处三面作匡而空其上，铸钢汁灌入。俟凝结后，钢铁粘连，乃拆其匡，以辊轴夹之，即成所造甲式。其二，不用钢板，置熟铁板于坑，留空处三分之一，遮以界壁，灌钢汁于内，使空处充满，凝成钢面。余同上法。”“钢甲为法克磊苏厂创制。其法先作甲模，自炼矿料熔铸而成，压以百吨重之气锤。锤路上下五迈当。锤后烧熟，用油浸透，钢含炭千分之五”。“康邦甲、钢甲各谓其精。主康邦者，谓钢铁切配融合无间，得外钢内柔之益。炮弹遇空而阻，变为摩擦力，或钢力弹碎，其质粘著熟铁，不致迸落。若纯用钢造，虽坚不粘，或值击碎，全甲俱裂矣。主钢甲者，谓铁合钢究患力弱，制炼稍疏，尤易震折，不若全钢之完固。二家互有善摘，尚无定评……然钢甲视康邦增昂，而著效未详确，法义而外，用者寥寥无闻也。”见卷九，页二十~二十五。

[117][118] “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四月初六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404、415页。

[119] 李鸿章：“查验平远快船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六十八，页十二。又，“平远”舰体设计，长宽比(L/B)为4.9，过于短阔，是船政局所制军舰中快速性最差的军舰，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120] 李少一、刘旭：《干戈春秋——中国古兵器科技史话》，第144~146页。

[121] 爱德华·霍顿：《潜艇发展史》；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卷一，页二十七。

[122] 裴荫森：“制造各种水雷并厂署被风损伤估修片”（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二十九，页十四。

[123]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23页。

[124] “光绪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51页。

[125] 卞宝第：“国防拟设水雷营变通筹款折”（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船政奏议汇编》，卷四十三，页七。

[126] 李鸿章：“新购雷艇定销章折”（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十日），“雷艇经费请销片”（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集·奏稿》，卷六十二，页四十，卷六十五，页二十六。

[127]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奕譞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40页。

[128] “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日裴荫森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383页。又据陈公远：“马尾的船坞”称，青洲船坞长360英尺，宽93英尺，深25英尺。见《福州马尾港图志》，第97页。

[129][131] 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第216页所附拨款表。

[130] “总理衙门奏复遵议闽督船政情形请派大员督办折”（光绪二十二年），《船政奏议汇编》，卷四十六，页二十五。

第五章 北洋海军成军 (1885 ~ 1894)

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上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

何天爵

一、购舰活动的继续

1884年9月7日,大清帝国出使法、德、意、荷、奥钦差大臣许景澄乘坐英国“咕士”号邮船离开上海,前往欧洲。这天距清政府向法国宣战,刚刚过了12天。中法间的外交折冲,李鸿章通过金登干在秘密进行,许景澄反倒置身事外。好在持节五邦,他便径往柏林,与前任钦差大臣李凤苞办理交接。

许景澄,字竹笈,浙江嘉兴人,翰林出身,今年39岁,以往的仕途一直是平坦而风顺的。他在国内虽留心洋务,却未想到自己会终生从事外交。当然就更不知道15年后,他作为总理衙门大臣,会因为反对用武力进攻各国驻华使馆,而被绑赴菜市口斩首。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确实,细数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留下的多是辛酸,甚至有洗刷不掉的污点。但在他第一次出使欧洲的3年任期中,给人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对海军事业做出的贡献。

朝廷正对李凤苞生疑。不少人看不惯这个捐资出身的外交

官,国内一直流传着关于他的风言风语。最近又有人弹劾,说他在订购铁甲舰的交易中,损公肥私,侵吞了数十万两银子,而军舰质量大可怀疑。^[1]所以许景澄在正式拜会李凤苞的次日,便接到国内发来的电旨,着他将铁甲舰详细勘验工料,如不坚固,据实参奏。倘将来船只到华,如查与承验不符,就惟他是问。^[2]

许景澄不敢怠慢,立即调集订舰合同详加研究。递交国书后,他偕同李凤苞及参赞朱宗祥、翻译糜音泰、随员杨兆璠,乘火车前往基尔,正式勘验停泊港中的“定远”和“镇远”。

“定”、“镇”二舰已经竣工多时,雇请驾驶回国的德国舰长、水手也早已安排妥当。因中法交战,法国人扬言要在公海截夺,使得清政府不敢命令军舰回国。而德国政府以保持中立为名,也下密令禁止两舰行驶,军舰便滞泊在基尔港。许景澄的勘验十分顺利,在监工陈兆翱、协同管驾刘步蟾的指点下,花了几天时间,把这两个钢铁机器的庞然大物,里里外外检视了一番。一切皆与合同相符,他正式同李凤苞办了交接。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两舰甲厚炮巨,订制颇为妥善,不得以(交付)迟而没其实也。”^[3]

麻烦出在“济远”舰上。许景澄一行转赴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验收了“济远”号巡洋舰后不久,便发觉这艘军舰的设计是有毛病的。19世纪80年代,流行装甲甲板巡洋舰,它不在军舰侧舷敷甲,而是在舰体中层水平方向铺设弧型装甲。其中央拱起,两侧斜至水线下,像个龟壳覆盖住主机舱。敌弹即使穿透侧舷,也无法穿透这层装甲。它以舰体轻盈赢得速度,当时译作“穹甲快船”。关于穹甲的设计,英国与德国各有特点。简单说来,英船穹甲顶部高出水线,德船穹甲则与水线相近。^[4]“济远”系德国人依照英国军舰“赫士本”号制造,它的穹甲用钢面铁甲制成,斜坡深入水线4尺,穹甲顶部低于水线。英国人认为这样做,倘战时船舷水线下被击穿,则水入船内穹甲之上,穹甲未损而船仍会沉没。此外,其“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水管迂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人水。”而“炮房之药气闷人,令台之布置不密,尤其弊之小者”。^[5]

许景澄后来几次在日记中写道：“十八子（李凤苞）偏执，致‘济远’误。”“‘济远’穹甲太低，致英议其人。”“丹崖所办公事与自诩之长，不能附和。尚无一言达（总）署，以尽前后任交谊。”^[6]在许景澄的主持下，向伏耳铿船厂提出了交涉，决定对“济远”进行修改。从该舰回国后实际使用的效果看，一些主要问题似乎得到改善。

应当指出的是，“济远”的技术问题，并非全由德方故意滥制造成。伏耳铿船厂是初次试造，本未尽善，厂里办事人并不讳言其失。^[7]英德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互相攻讦，早在决定购买“济远”时，李鸿章已向恭亲王声明：“英人知敝处在德厂购船，忌嫉实深。赫德亦颇恨丹崖之洞察其弊。”^[8]1889年起担任驻英公使的薛福成，在研究了购舰旧档案后，也在日记中指出：“外洋匠师务求相胜，亦犹自古文人之相轻，虽有佳文，欲指其瑕不患无辞。”^[9]

许景澄也并没有仅仅为了照顾同前任的交情，便把责任一人担揽下来。接船不久，他在给总理衙门章京钱应溥、袁昶的私信中，就透露了“济远”的缺点。次年8月，使馆参赞王咏写信给袁昶，更详细介绍了“定”、“镇”、“济”三舰接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信中写道：“‘镇远’工料不及‘定远’，而当时价值计增十万（如平面钢甲改用熟铁甲等事），此弟所未喻者也。”“‘济远’速率十五海里，不为不多，鱼雷二筒安置船尾，差为善法。然船面甲台西国并无其式（法国有二小船，不及千吨，为‘济远’所本，然初无炮台），德海部新定一船，仍而不用，必有深意。不然岂西人智术皆出李丹崖下哉？”并细数了“济远”改装前的毛病。^[10]此信在京师广为流传，由于传播中的失真，问题被说得更为严重，以致太仆寺少卿延茂据此狠狠参了李凤苞一本。称“‘定远’一船质坚而价廉，‘镇远’一船质稍次而价稍涨，至‘济远’一船质极坏而价极昂”，又说此事“自海上喧传，直抵都下，人人骇异，咸谓苟非李凤苞勾串洋人侵蚀肥己，必不至船质与船价颠倒悬殊至于此极。数日以来，人言啧啧，岂尽无因？”^[11]此时李凤苞已经回国，正在李鸿章幕中办理北洋军务和天津水师学堂有关事务，在千夫所指的气氛中，终于被革去职衔，孑然一身，野服南归，回老家崇明，整理他的西方军事

学译著去了。^[12]

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3天,朝廷记起了新军舰,命将其驾驶回华。7月3日,许景澄来到基尔港,先是祭天,然后登舰,为船员饯行。“定远”舰管驾为伏司,“镇远”舰管驾为密拉,“济远”舰管驾为恩诺尔,3舰共雇外国水手员弁400余人。刘步蟾和使馆随员杨兆璠分乘“定远”、“镇远”随船照料。典礼完毕,军舰拉响了汽笛,驶上东行的航线,10月抵达大沽。

11月17日,李鸿章亲赴大沽口验收军舰,18日乘舰试航,前往旅顺口视察东西海岸炮台。海上波涛汹涌,北风呼啸,军舰却如履平地,航行得十分平稳。望着舰首飘扬的龙旗,李鸿章志满意得。出海归来后,他写信告诉醇王:“王詠霓等所指各弊未尽确实。”^[13]

1885年8月4日,当“定远”等3舰正在大海中向着东方行驶的时候,李鸿章收到了一道电旨,命他按照“济远”式样再购4舰。当天,他向曾纪泽、许景澄发出电报,指令他们在所在国各自订购2艘装甲甲板巡洋舰。

许景澄立即同伏耳铿船厂磋商,要求修改“济远”的设计缺陷,如升高穹甲,增加储煤舱,放大轮机舱。德国人提出,新军舰可设计为装甲巡洋舰,即除了保留原先的装甲甲板外,再在舰舷水线部位敷设立甲。装甲巡洋舰的设计思想源于俄国人。19世纪70年代,A. A. 波波夫设计了最早的“海军上将”号,其特点是增强了侧舷的保护,但因装甲薄于铁甲舰,依然能够保持较快的航速。许景澄把谈判的详情多次电告李鸿章,李鸿章表示同意。9月18日,许景澄与伏耳铿代办哈克斯他耳议定订购快船草合同。草合同规定所订之船仍仿“济远”式样,第一船工价300万马克,于1887年1月20日前造成。第二船工价294万马克,1887年4月20日前造成。伏厂再按上述船价扣除1厘,即59400马克。^[14]合同虽未明确制造装甲巡洋舰,但这个念头一直在许景澄脑海中萦绕。

曾纪泽与英国海军部联系订购军舰事宜后,英国人交给他两份说帖,皆为阿姆斯特朗公司著名工程师,时任英国海军部验船官怀特所撰。一份论述“济远”舰之弊,指出该舰设计中的8项缺陷,一份介绍英国新设计的军舰。新舰排水量2300吨,轮机马力5500匹,时速18海里。比较“济远”有10个优点。^[15]它的设计,同1884年下水的英制智利巡洋舰“爱斯米拉达”号十分相似。“爱”舰排水量3000吨,是根据阿姆斯特朗勋爵主张的舰体轻、速度快、火炮大的原则建造的先进军舰。曾纪泽把两份文件译寄李鸿章和许景澄,对究竟制造何种军舰展开了争论。

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9月在一份报告中说,曾纪泽受到英国人影响,在怡和洋行和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支持下,极力阻挠向伏耳铿船厂和德国其他造船厂订购军舰。说曾纪泽宣称伏耳铿为中国制造的铁甲舰完全不能使用,经不起海上风浪。这些言论虽未能阻止向伏耳铿造船厂续订两条新军舰,但引起一定程度的不安。巴兰德的看法是片面的。曾纪泽确实指出了德国人设计中的毛病,他也一直不接受装甲巡洋舰的设计思想,认为断不能制一舰兼擅铁甲、快船之胜,并将理由电达国内,但他对购舰始终是认真负责的。他和许景澄彼此交换了草签的合同,再将新舰说帖分送英、德两国海军部听取意见。怀特指出了德国设计中的问题,德国海军部的脱里西也分析了英国新船的利弊。这种争辩,对于提高所订军舰质量无疑是有好处的。

10月15日,庆郡王奕劻交给醇亲王两封国外来信。一封作者是舒文,另一封就是前述王咏霓的信,都是批评“济远”舰的。三天前,醇亲王刚被宣布总理海军事宜,看到来信,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致函军机处:“新购四船,决不可照‘济远’定造。”^[16]第二天,慈禧太后也知道了此事,她下懿旨将军舰暂缓定造,并命详细查勘“济远”舰。^[17]

此事折腾了一通以后,经李鸿章解释协调,终于又重新发动。对英德军舰之争,李鸿章表示“海军甫设,不妨并存其式,他日驶行日久,利病自见,再专择其一推广仿造”。^[18]于是曾纪泽建造了

英式穹甲舰“致远”、“靖远”号。许景澄则与德方改订草合同,将军舰正式定为“水线甲堡之船”即装甲巡洋舰,这便是“经远”、“来远”。“经”、“来”排水量 2900 吨,马力 3400 匹,时速 15.25 海里,两舰各加价 47 万马克。根据后来李鸿章的报销折,“致”、“靖”两舰的购舰费用共合银 1 697 453 两,“经”、“来”两舰的购舰费用共合银 1 739 761 两,由神机营息借怡和洋行洋款及部拨各省捐款及江、浙、闽三海关洋药税厘款项支付。^[19]

这场争论甚至引起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注意。他指示伏耳铿船厂,“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的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20]应当说,英德所制军舰各有特点,在当时也都是先进的。

为了保证军舰质量,船政衙门派遣曾宗瀛、张启正、林鸣坝、黄戴、陈和庆、裘国安前往英、德两国,协同使馆官员朱宗祥、王詠霓,进行现场监造。^[21]

1887 年初,李鸿章派遣琅威理及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率 400 余名官兵,赴英德接收军舰。邓世昌等 4 人分任“致”、“靖”、“经”、“来”号管带,邓世昌还负责经理文报、银钱。德使巴兰德提出,德制军舰来华所雇管轮帮驾,必须用德人,否则将来评论该船会不公平,万一发生一点最小事故,也会被英国人予以充分利用。李鸿章急电琅威理,转告了必须雇请德人的意思。又电许景澄,要他向德国人声明,须将琅威理作为中国水师官看待。德国欲派帮驾管轮,须受中国水师官节制。^[22]9 月 12 日,飘扬着龙旗的“致远”等 4 舰,拖带着在英国定制的“左队一”号鱼雷艇,起碇回国。舰队沿途进行了各种编队训练和单舰训练。11 月 28 日,舰队驶抵香港。12 月 1 日,到达厦门。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康济”、“威远”及南洋“琛航”在厦迎候。

“致远”等四舰原为增强台澎防务所购。然而中法战争的硝烟飘散后,台湾防务的紧迫性就不很明显了。1885 年秋,朝廷决定先建北洋水师一支,所以醇亲王在那年 10 月谈到购舰时,便透露了“将来船既归北洋编伍,自以垂询北洋”^[23]的意图。次日上

谕也明确宣布“此项船只造成，即应归入北洋水师操练”。^[24]当新购军舰和北洋水师在台湾海峡会师的时候，台湾巡抚刘铭传不识时务地给李鸿章打电报要办接收，李鸿章要醇亲王表态。1888年1月4日，海军衙门电告刘铭传：“所购英德四快船，本署已于上年三月奏明归北洋海军应用，自毋庸由台湾具奏。”^[25]刘铭传碰了个灰头土脸。

二、《北洋海军章程》和北洋海军成军

“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回国后，为北洋海军制定章程，以使这支舰队经制化的任务，便被提上议事日程。按照清朝规定，没有被朝廷批准营制、饷制和官制的军队，都不是正规部队，也没有正式军官编制。要使军队长期存在，就必须以规章条令形式使其正规化。

1888年5月5日至16日，李鸿章借验收“致远”等四舰之机，第四次出海巡视他的舰队。行前，关于制定海军章程的设想已经有所讨论。视察结束后，他饬令文武将领悉心筹议，参加起草工作的有周馥、丁汝昌、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等人。李鸿章本人因出海感冒，卧病经旬，减少了许多应酬接待，但仍参加讨论，端午痊愈后，更是详加关注。讨论所依据的范本，大半采用英国海军章程，部分参仿德国，或仍遵中国旧制。经过半个多月努力，至7月中旬写出底稿。7月15日，李鸿章向醇亲王函告此事，并派周馥携带《章程》底稿进京呈阅。由于朝廷已在5月19日发表周馥为直隶按察使的任命，所以8月1日总理衙门上奏，请将周馥暂留海军衙门，创办《海军章程》，俟拟成再行赴任。^[26]在以后的两个月里，醇亲王数次接见周馥，商改《章程》。周馥同海军衙门总办章京等进一步对底稿进行了修订。9月30日，海军衙门正式向慈禧太后奏呈《北洋海军章程》，三天后，奉懿旨“依议”，《章程》遂为定稿，颁布实行。

从上年起,醇亲王便患重病,濒危数次,直至过了年,才慢慢调养过来。《章程》进呈的次日,醇亲王上奏,声称大纲已定,请求开去管理海军衙门及神机营差使,得以安心调养。懿旨不准,算是对醇亲王的抚慰。

《北洋海军章程》有多种版本传世。一为十二款的红格手写稿本,估计是周馥向醇亲王呈送的底稿或底稿副本。一为铅活字十三款印本,估计是在北京讨论修改时所印。一为铅活字十四款通行本,包括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铃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方面,是正式奏定之后印行的版本。三个版本,一个比一个严整细密,反映了拟订工作的不断深化。

《章程》是一个重要的文件,它的颁布,标志着北洋海军这支洋务运动中创建的舰队,至此正式成军。《章程》是新式西方近代军队制度开始在中国推行,而传统的中国古代军队制度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时两种体制交替消长的产物。它已包含中国近代军制改革的许多内容。比较1865年曾国藩奏定的《长江水师事宜》、《长江水师营制》,可以明显看出《章程》所具有近代西方海军制度的色彩。然而北洋海军毕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学习“洋务”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保留下传统军队的痕迹。

人们通常认为,晚清军制改革是在甲午战争后开始的。战前,枢臣大吏对于西方军事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坚船利炮这类表面观感上,没有从军制建设的角度来进行军队近代化建设,只重视改进军队的器用而轻视变更军队的体制。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全面。洋务运动中,海军建设走在陆军建设前面,它除了引进新式军舰大炮等装备外,在军队的编制、管理、纪律、训练和兵役制度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旧式军队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洋海军章程》所规定的内容,反映出晚清军制改革在19世纪80年代的海军中已取得长足进展。

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经历了征兵制、世兵制、府兵制、募兵

制、卫所制。17世纪初,女真兴起,以部落为单位组成“旗”,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旗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1615年,努尔哈齐将满族人编成八个旗,以后又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清统一全国后,以汉族人为基础组成绿营。绿营兵是清朝军队的主力,在兵役制度上,实行兵皆土著的原则,只用本地人当兵。一列兵籍,便终身不能改动。绿营拔补,凡骑兵拔于步兵,步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无余丁,方募于民。所谓余丁,是将营中清出的火粮收养兵丁子弟,每名月给饷银5钱,以备出缺挑补。余丁拔补,使得绿营成为世兵制。绿营兵制保证了军队的稳定兵源,避免了募兵制随意往来脱离的弊病;且余丁生长兵家,自小耳濡目染,较易训练。然而随着绿营的腐败衰退,积习日深,这支军队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并代代相传,愈加不可救药。太平天国被镇压后,练军防军作为清朝主要的军事力量,在兵制上对绿营制度进行了冲击,而最先效法西方军制进行全面改革尝试的,当属北洋海军。

《章程》将北洋海军官兵分为军官和士兵两个独立系统。海军士兵包括弁目、士兵和练勇。练勇是备补兵员,额设250人,分作三等。招收沿海船户、渔户年轻者进行训练,并为其设立练勇学堂和练船。征集的条件,一是年龄在16~17岁,身高4.6尺以上为率,18岁以上以4.7尺以上为率。二是须由练勇学堂督操官或练船管带官,会同驾驶大副、医官三人察看合适,然后收录。三是应募者当自书姓名,略能识字,刑伤犯罪之人不得征募。四是应募者必须由父兄保人出结,订明服役年限。遇有各船士兵告假、革退、病故,即在练勇内挑补。这样就打破了绿营的世兵制,并防止了各舰管带直接招募劣等者混充兵数。士兵包括水手、炮目、各色当差兵匠。水手分三等,三等水手由一等练勇调补,炮目由一等水手考升。各色当差兵匠,包括管旗、管舱、管油、鱼雷头目、鱼雷匠、升火头目、升火匠、电灯匠、锅炉匠、洋枪匠、油漆匠、帆匠、木匠、铜匠、铁匠等,属于技术水兵。有的从机器局、鱼雷局中选充,有的向社会招募,各以技艺优长,于船上相宜方能补人。^[27]

军官分作战官和艺官两类。战官指各舰管带和大、二、三副。

艺官指各舰管轮官。《章程》规定,无论战官艺官,都须从水师学堂毕业,受过专业训练。这在中国军队史上,首次明确封禁了行伍向军官晋升的道路,大大提高了军官的素质。在以后的清朝陆军军制改革中,虽也努力提高军校士官生的地位,但始终未能像海军那样形成制度。海军的这种做法,适应了高度技术性、专业性和精细的岗位分工需要,也符合世界军制发展的方向。

《章程》根据海军各个岗位要求,对官兵的晋升提出了严格的规定。同时还明文规定了军官的服役年龄。“自授职守备之日起,按资推升,无论在船在岸当差供职,总以二十年为限。”^[28]根据海军军官 15 岁进入海军学堂学习开始计算,退役年龄约在 45~50 岁,从而保证了海军的年轻化。

军衔制度是近代军制的重要内容。军衔是国家根据军人的职务、军事素质和专业素质、资历、贡献以及军兵种或勤务区,分授予每个军人的衔称,用以表明其身份、地位和荣誉。军衔是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最末一级士兵的完整的军人等级体系。军衔制产生于 15 至 16 世纪,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以劳绩军功获得职衔,为平民出身的军人提供了进身之阶。军衔制度有利于军队统一编制、指挥和训练管理,有利于提高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有利于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并使人事管理制度化。中国古代在周朝就有了官职、序品之分,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官衔”的说法,表示官吏的阶位。其与军衔制的区别,在于没有包括士兵的等级体系。清朝武官的官阶分为九品十八级,相对应的官职便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等,然而并非所有获得官职者都能实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以军功而记名的提督达 8000 多人,总兵、副将更不计其数,而全国的实缺提督不过十余人,总兵几十人,副将一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显然是补缺无望,只能搞“借缺补署”,即以高级武官的品位,做低级武官的职务,官衔与实职明显脱节。《北洋海军章程》想解决官职和官衔对应的问题,规定了舰艇官兵从管带、大副、二副、三副到水手总头目(水手长)、水兵、当差兵匠的完整职务序列;又保

留了提督、总兵、副将至经制外委的职衔，并同舰艇职务做出了对应规定。《章程》说，“查英国海军官制，其提督一、二、三等，或会办海部，或统领各军，或督办各口船政。德国一等提督系海部大臣兼摄，其二、三等提督则统领海军巡防要地。”^[29]所谓英德“一、二、三等提督”，其实是海军上将、中将、少将，是军衔。而在北洋海军中，提督除了是一种官职（舰队司令）外，已转换为一种官衔。提督以下，总兵到经制外委，都从传统的官职中分离出来。鉴于北洋海军从上到下建立了完善的等级制度（虽然在《章程》中士兵等级序列是归入职务序列的），可以说这里已经有了军衔制的雏形。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北洋海军军官和士兵间还设置了“弁目”层次，包括炮弁、水手总头目、寻查等下级官佐，由士兵中的优秀者升任，最高可升至实缺千总。^[30]就其实质而论，类似西方军队中的军士和军士长。

北洋海军在俸饷制度上，也与传统绿营有了较大变化。绿营官员的俸薪，分为俸银、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四种。俸银是正禄，指朝廷发给武官的银米。因以年计，也称年俸。薪银、蔬菜烛炭银为生活费，心红纸张银略等于办公费。绿营官员的俸薪银十分低薄，尤其乾嘉以后，物价上涨，正俸银两难以维持生活，于是另加养廉银，也作为武官固定的常年收入，且养廉银高出正俸银几倍至十几倍。发给士兵的银米称作饷，因以月计，又叫月饷。绿营饷章规定兵饷分三等支給，马兵、字识为一等，月支银2两，米3斗；战兵为二等，月支银1.5两，米3斗；守兵为三等，月支银1两，米3斗。绿营水师支饷，也分马、步、守三等，同陆上部队相同。

绿营士兵的实际所得，要比明定饷章更低，因为还有名目繁多的扣除。例如扣建，即以30日为大建月，月饷照章支发；不足30日为大建月，扣存不足天数之饷，留抵闰月加银。又如军械费，官兵须自备军器甲冑，其费用动支军人钱粮额支，分期在俸饷内扣还。还有朋扣、赔椿银、皮脏费、衣帽费、房费、营务日常开支银、赏恤银等项扣除。军官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克扣，名目繁多，除了战时

的掳掠外,平时主要通过克扣粮饷和吃空额来敛财。有人统计,以每名士兵每月被扣半两银子计算,一支3000人的部队总共便是1500两。至于部队缺额常有三四成之多,兵饷便为军官侵蚀。可吃的空额还殃及于战马,左宗棠曾揭发,光绪初年甘肃绿营额设20831匹官马,全部有名无实。而在东南沿海,绿营水师还将装备的战船私下出租给商人,按月私分租金。当时人指斥谓“久充统领,无不坐拥厚货至十数万或数十万百万者”,^[31]而士兵则生计竭蹶,无力养家。由此带来军备废弛,军事素质低下,自然不足为奇。

军人是一种职业。在战时,需要军人牺牲生命来保卫国家、社会乃至文官和平民的安全,在平时,则应给予较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这在现代国家已经成为常识,但在中国古代,却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宋代养兵140万,被史家推为“积贫积弱”的重要根源。明代仅卫所之兵就多达300多万,创下历代政府养兵人数的最高记录。清代前期,除八旗兵外,养绿营官兵60多万,比之前朝并不算多,但每年的粮饷支出即达1300万至1400万两,约占当时财政总支出的一半。后期加上湘淮军和练军、防军,人数达近百万,财政开支更为庞大,这对于一个封建农业国家来说,越来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当时,绿营所扮演的武装警察角色尚可勉强维持,但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却暴露出不堪一击的虚弱本质。倘若面对工业时代的铁甲舰和克虏伯大炮,旧式军队更是无法应战,需要全方位的重建。其中,提高军人待遇,克服军内腐败,是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为了吸引优秀人材进入海军,北洋海军在俸饷制度上进行改革,努力剔除绿营积弊,较大幅度地提高官兵待遇。《章程》指出:“盖以海军为护国威远之大计,不宜过从省啬也。中国海军创设,饷力未充,未能援引(英国海军饷章),但兵船将士终年涉历风涛,异常劳苦,与绿营水陆情形迥不相同。不能不格外体恤,通盘筹计。”其制定俸饷的原则,是参照当时北洋水师实际所发银数的范围,略加增损。军官薪俸,四成为本官之俸,视官职大小而定;六成

为带船之俸,视船只大小而定。而绿营例支廉、薪、蔬、烛、炭、心红、纸张、案衣、什物、马乾等名目,一概删除。^[32]

通过薪俸调整,海军军官的法定收入大大超过绿营武官。例如绿营提督,其俸银为 81.693 两,薪银 144 两,蔬菜烛炭银 180 两,心红纸张银 200 两,养廉银 2000 两,合计年收入为 2605.693 两。而海军提督,官俸为 3360 两,船俸为 5040 两,合计 8400 两,为前者的 3.2 倍。绿营总兵的各项年收入总计为 2011 两,海军总兵为 3960 两,为前者的 1.97 倍。绿营副将的各项年收入总计为 1177.4 两,海军副将为 3240 两,为前者的 2.75 倍。绿营参将的各项年收入总计为 743.3 两,海军参将为 2640 两,为前者的 3.55 倍。此外《章程》还规定各舰有“行船公费”,除水线下船底油漆及天棚、炮罩、帆布、绳索、通信旗帜、用于修理的铜、钢、铁、木材料可专项申报核发,煤炭、弹药随时具领外,其水线以上船舱内外应用油漆、油斤、纸张、棉纱、砂布、购买淡水、煤炭装卸、雇人引港、更换国旗、军装、采购零星物品、管带自雇幕僚、文书的费用,皆在行船公费中开支。“定”、“镇”二舰每月各核定 850 两,“致”、“济”、“靖”、“经”、“来”五舰为各 550 两,“超”、“扬”二舰为各 320 两。该项费用实行总额包干,实际上给管带们留出了很大的弹性支配空间,未必全是《章程》规定的开销范围。由此可以想见,林泰增、刘步蟾当时每月有 330 两的正当收入和 850 两的“买单权”,邓世昌、方伯谦、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每月有 270 两的正当收入和 550 两的“买单权”。

同样,海军士兵的月饷也高于绿营。刚入伍的三等练勇,月饷为 4 两,而一等水手为 10 两,一等炮目为 20 两。当差兵匠的收入更高,鱼雷匠 24 两,电灯匠 30 两,连在岸当差的夫役,月饷也有 3 两。有人测算,当时一户自耕农的年耕种收入在 33~50 两之间,19 世纪 80 年代一个宁波纱工的年工资为 13~23.5 两,一个山东工人的工资为 18.3~60 两,说明北洋海军的最低收入,已达到普通农户或工人的中等以上收入。这种变化,有利于提高军队素质,提高海军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33]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以长方形黄色飞龙旗作为国旗,以替代1862年为军舰和商船制定的三角形龙旗。还设置海军将领指挥旗,以便于海上交往和识别。^[34]中国国旗的出现,并非由于政治或外交方面的需要,倒是为了海军海上联系和交往,海军率先开始了同国际的接轨。

军事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其他制度一起,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清王朝在被迫面向西方开放的过程中,对海军制度进行各种探索和改革,本质上都是用西方文明来强化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以延续自己的统治。但当西方军制被纳入清王朝军队时,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文明也开始了碰撞。清廷在开始海军军制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动摇统治机器的基础。历史的辩证法便是如此。

1888年是个平静的年份。世界编年史上没有记载下什么特殊的事件。中国政坛也很宁和。关心朝政的人知道,宫中正在酝酿皇帝亲政。

5月20日,三海工程竣工,慈禧太后前往巡幸,这是她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地方。

7月27日,懿旨诏告全国,皇帝明年正月大婚,亲裁大政。慈禧太后选中自己二弟桂祥的二格格叶赫那拉氏为光绪皇后,原户部右侍郎长叙的女儿他他拉氏姐妹为瑾嫔、珍嫔。

10月,30岁的广东士子康有为,趁来京参加秋闱之际,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极言时危,请求变法。但这个文件没能上达给皇帝。

到了12月17日,邸报上登出上谕,以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记名提督林泰曾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记名总兵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35]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1888年这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后来竟会如此紧密地纠葛在一起、互为因果,引发出近代史上一连串的风波:1895年,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朝廷被迫与日本签

订《马关条约》，康有为再次疾呼变法。1898年，皇帝采纳康梁主张，诏定国是，百日维新。慈禧太后在守旧大臣支持下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将皇帝囚禁在南海瀛台，将珍妃打入冷宫。经过十年的风风雨雨，人们重新来看1888年，便茅塞顿开地感受到歌舞升平景象下潜伏着的深刻危机。

如同“水师”这个名词一样，“海军”在清朝人的心目中，也同样具有两重意义。当它单独使用时，是指以舰艇为主体，在海洋江河上作战的军种；当它和某个区域名称结合使用时，又是指担负该战略海区作战任务的海军建制单位，即“舰队”。如“广东水师”、“北洋海军”，实际便是“广东舰队”、“北洋舰队”。需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末，作为“舰队”意义上的“海军”，只有北洋一处独用。而在1888年之后，北洋舰队在正式文件中，便再也不叫“北洋水师”，而只叫“北洋海军”了，这是其成军的标志之一。

由于史料缺乏，现已不知北洋海军在正式任命提督这一最高职务时的详情，但想必会有隆重的庆典。然而军官们更关注的肯定是顶戴的下一步分配。根据《章程》，北洋海军额设副将5缺、参将4缺、游击9缺、都司27缺、守备60缺。这是一次极好的晋升机会。由于北洋办理海防十余年来，凡水师员弁，仅于出洋接船及援护朝鲜案内酌量附保，从未专案褒奖，所以管驾、管轮、大二副等官阶皆小，若必各按本班补缺，即无从安排。故决定若无合例应补人员，即以官小者通融升署，俟数年后，再按实缺补授。惟官小升署，须以三级为断。如参将、游击、都司准升署副将缺，游击、都司、守备准升署参将缺，如此等等。不准小至四级，以示限制。也有个别人是高官阶借补低缺。李鸿章和丁汝昌经过仔细商量拣选，在1889年2月20日，皇帝大婚前五天，正式将5副将、3参将、7游击、21都司、46守备人选确定，上奏皇太后、皇帝定夺，旋获允准。随着电报传来的喜讯，82位海军军官，一齐向京师方向下跪，叩谢皇恩浩荡，遥祝龙凤呈祥。

这次任命的军官主要有：

中军中营副将以花翎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借补，委带“致

远”舰；中军左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方伯谦升署，委带“济远”舰；中军右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叶祖珪升署，委带“靖远”舰；左翼右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林永升升署，委带“经远”舰；右翼左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邱宝仁升署，委带“来远”舰；提标中军参将兼理粮饷事宜以花翎四品衔山东候补知府严道洪借补；左翼右营参将以花翎补用都司黄建勋升署，委带“超勇”舰；右翼右营参将以花翎补用都司林履中升署，委带“扬威”舰；左翼中营游击“镇远”舰副管驾以花翎补用守备杨用霖升署；左翼中营游击“镇远”舰总管轮以花翎补用游击陆麟清补授；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李鼎新升署；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总官轮以总花翎补用都司余守顺升署；精练前营游击以花翎补用游击林颖启补授，委带“威远”练船；精练左营游击以参将衔补用都司萨镇冰升署，委带“康济”练船；精练右营游击以蓝翎都司衔补用守备戴伯康升署，委带“敏捷”练船；提标中营都司督队船大副事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吴应科升署；中军中营都司“致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陈金揆升署；中军中营都司“致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补用把总刘应霖升署；中军左营都司“济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沈寿昌升署；中军左营都司“济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梁祖全升署；中军右营都司“靖远”舰帮带大副以蓝翎五品军功补用千总刘冠雄升署；中军右营都司“靖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林登亮升署；左翼中营都司“镇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何品璋升署；左翼中营都司“镇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王齐辰升署；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帮带大副以花翎补用都司陈策补授；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孙姜升署；左翼右营都司“超勇”舰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黎星桥升署；左翼中营都司“定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江仁辉升署；左翼中营都司“定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把总陈楠升署；右翼左营都司“来远”舰帮带大副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林文彬升署；右翼左营都司“来远”舰总管轮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伍廷山升署；右翼

右营都司“扬威”舰总管轮以蓝翎补用守备陈学书升署；后军右营都司以蓝翎五品顶戴补用千总蓝建枢升署，委带“镇西”炮艇；后军前营都司以都司衔补用守备李和升署，委带“镇南”炮艇；鱼雷左一营都司以都司衔补用守备蔡廷干升署，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精练后营都司练勇学堂督操官以副将衔补用游击刘学礼借补。^[36]

在冗官繁多又无战事的年代，北洋海军军官的这次升迁是十分快捷的。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至北洋服务十余年，能授、署二、三品实缺，不能不令他们在其他地区服役的同学侧目，也显示出朝廷和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特殊关注。

根据《章程》，北洋海军在编军舰共 25 艘。即“定远”、“镇远”号铁甲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号巡洋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号炮艇；左队一、二、三，右队一、二、三号鱼雷艇；“威远”、“康济”、“敏捷”号练习舰；“利运”号运输舰。《章程》指出：“海军一枝，局势略备。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目前库藏支绌，固难遽议添购，而规画久远，造端不可不宏。拟俟库款稍充，再添大快船一艘、浅水快船四艘、鱼雷快船二艘、庶战舰可敷用。另添鱼雷艇六艘，练船一艘，军火船一艘，测量船一艘，信船一艘。”^[37]这个分析是中肯客观的。然而自从北洋海军成军以后，添补新舰的速度大为减缓。到甲午战争爆发，仅新补巡洋舰“平远”号、大鱼雷艇“福龙”号和新调闽局运输舰“海镜”号，舰队总计排水量 4 万吨。

仔细研究《北洋海军章程》及清政府内部各项文件、当时人的函牍公文，我们发现，北洋海军提督的职责是统领全军的操防事项，归北洋大臣（而不是直属海军衙门）节制。他能管辖的，仅为各军舰及舰上官兵，以及提标所辖的中军参将兼理全军粮饷事宜、管轮参将稽查全军轮机事宜、提标游击稽查全军军械事务、提标都司充督队船（旗舰）大副等数名助手，海军测量画图翻译及各

船文案支应人员和威海海军学堂、威海行营机器厂。此外,设在天津的总理水师营务处(负责协调北洋大臣与海军提督、各局坞负责人关系、商榷操防事宜、稽核功过、监视操练、会同各局所筹商储备各事、布置各项任务)、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俸饷及各厂坞经费、收支报销,相当于北洋海军财务部)、天津军械局(为淮军、海军军火收发总汇,相当于北洋军械部)、天津水师学堂、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天津机器制造局、大沽船坞,设在旅顺口的旅顺船坞、旅顺应添船械局(专管各军舰一切器具添换购置)、旅顺军械局(总理北洋海军枪炮弹药一切军火事宜,稽察考核各舰收发存储)、旅顺鱼雷营,均由北洋大臣任命官员管理,不受北洋海军提督节制。李鸿章说,设计这些管理体制的依据,是西方国家此类职务皆受命于海军部,而“与提督各不相辖”。^[38]但在中国,此类极为重要的管理、保障、教育部门,不隶属海军衙门而直属北洋大臣,就很具有“中国特色”了。其结果,只是削弱海军提督的权利,增添了很多掣肘和扯皮,虽然便于李鸿章本人的控制,却大大不利于北洋海军自身的管理和战时协调。

三、两大海军基地

海军基地是为保障海军兵力驻泊和机动而建立的军事基地,具有指挥、通讯、后勤、岸防等功能,为舰队提供战斗保障和后勤保障,并且建立海岸防御体系,以构成易守难攻的要塞。基地建设是近现代海军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抓住这个环节,有利于整个海军建设的迅速进行。李鸿章在面对旧式水师向近代海军的历史转变中,认准这一重要环节,展开了营建基地的巨大工程。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像一双有力的臂膀,怀抱着渤海,是北京的天然屏障。清朝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和防御要求一向极为重视,但对海军基地的选址则颇费周折。前后十余年中,烟台、大连湾、天津、旅顺口、威海卫、胶州湾等地点先后被提了出来。

经过较为详细的讨论,逐步统一了对建港必备条件的认识,并最终在多处候选地址中确定旅顺口、威海卫为基地。李鸿章在给醇亲王的信中写道:

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易。^[39]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是个天然良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602年,明朝便在这里设立水军,1714年,清朝再次设立水师营,将登州裁汰的30艘战船移运于此,以备操演巡哨,兵士皆为八旗丁壮。然而旅顺口长期以来只是清朝小型水师的屯泊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国防要地,它的重要性也未引起朝廷的瞩目。

在近代,营建旅顺口之初议,据说发自李凤苞。1875年,李凤苞在天津初会李鸿章时,提出“关外旅顺一口,为京师东北要害,宜早为备”。李鸿章命其乘船往度形势,规为海疆重镇^[40],但直到1879年,李鸿章在给总署和沈葆楨等友人的书信中,所瞩目的乃是大连湾。不久,他派洋员葛雷森、哥嘉前去考察测量,发现大连湾口门太宽,非有大枝水陆军相为倚护,不宜立足,而以当时北洋的兵力而论,一时还难以办到。故于次年7月下决心改变初衷,决定“先择著名险要之旅顺口屯扎以扼北洋门户”。^[41]李鸿章旋派县令陆尔发随同德员汉纳根、英国上校柯克再往旅顺口,查勘修建炮台和船坞之所,并于11月命汉纳根先修建黄金山炮台。1881年4月,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前往旅顺考察,确定了在黄金山后修造船坞的计划。同年,李鸿章在给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信中两次提及“将来拟在旅顺口扼扎老营”,“惟该口虽甚扼要得势,凡筑炮台、添陆军,建军械库、煤厂、船坞,至少须费百万以外,一时未易就绪”。^[42]11月,李鸿章在大沽口验收了“超勇”、“扬威”舰后,亲率幕僚周馥、马建忠、黄瑞兰、章洪钧、薛福成及提督周盛传、刘盛休、

总兵唐仁廉，一同乘舰，查勘旅顺口，深感该口实据北洋险要，“洋面至此一束，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43]更坚定了将此地建设成“北洋第一重捍卫”的信心。旅顺基地选址遂成定局。

威海卫在山东半岛北端，与旅顺口遥遥相望，互为犄角。此地汉代名石落村，元代名清泉亦。1389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设威海卫。1403年建城。城临海湾，湾中有岛，疏峰拱秀，砥柱中流，成为海湾的天然巨屏，并将湾口分为东西两口。因岛民祭祀先祖刘公而得名刘公岛。尽管郑观应在1874年出版的《易言》中已经设想，“为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接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44]丁宝桢也于1875年派张荫桓前去考察，提出将威海卫建成“轮船水寨”的建议，^[45]但马建忠1882年6月途经此地时，威海依然是个环境幽洁、民风淳朴的小城。此后，李鸿章命刘含芳在刘公岛操练鱼雷营，并购买民地，以备建设海军基地。1884年6月，李鸿章出海巡阅，在谈到威海防务时说：“该处濒海，南北两口地阔水深。若筑台设守，需费极巨，一时不易措办。”^[46]两年后，醇亲王的视察报告也谈了同样的困难。直到1887年后，朝廷出于渤海防御的全盘考虑，决定从江海、浙海两关洋药加厘内多拨30万两，以期十年中逐渐经营威海、大连湾，威海作为津、旅、威三角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才迅速发展起来。

1886年，许景澄上奏建议在胶州湾建立海军屯埠。在此之前，李鸿章曾派刘含芳带兵轮前往查勘测量。刘含芳认为该湾口门小于威海而不如旅顺之紧固，口门三岛，炮台之费昂贵，而转运军需尤难，且地处偏僻，断非目前之兵力财力所宜使用。^[47]刘含芳只站在渤海防御立场，没有看到胶州湾地处南北洋交界之处，上可屏登莱，下可控江浙，并且遥对济州海峡，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醇亲王把许景澄的奏折转寄李鸿章后，李于6月电令丁汝昌、琅威理再次率舰前去考察。根据琅氏的看法，这里“实为海军之地利，南北洋水师总汇之区”。^[48]7月，御史朱一新也提出经营胶州湾的

建议。李鸿章却坚持认为，胶州湾即被敌占，亦仅肘腋之患。北洋目前兵力财力皆缺，断难远顾胶州。这一重要建议因此被推迟了。1889年5、6月间，李鸿章巡阅海军，抵达胶州湾，亲眼目睹形胜，旋奏请截留山东海防捐，作为建筑烟台、胶州湾炮台之费。1894年5月，李鸿章再抵胶州，此时由登州镇总兵章高元承办的青岛、团岛、团岛炮台，基址已具，又于青岛前建设大铁码头一座。由于甲午战争，胶州湾海军基地工程没有如期完成。

综观北洋海军基地选址活动，不难看出，洋务派的着眼点在于拱卫京师。在此意图下，选定旅顺、威海、大沽三地形成三角防御体系，对横扼渤海湾咽喉，内卫京师，外御侵略，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就中国具有漫长海岸线而言，洋务派对海军基地的考虑尚在较低层次。他们对军港本身的自然条件考虑较多，对其他制约因素和宏观战略方面考虑较少。尤其是旅顺口，在其刚开始建设时，朱一新就提出过批评，认为口门狭处仅容一船，敌易封锁；无内河通运腹地，转运甚艰；后路太窄，敌易登陆；口内沙线胶滞，战船难以成列，疏浚则费巨帑。^[49]甲午战前，郑观应更尖锐指出：“旅顺濒南后路连接大连湾，由大连湾再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东、北两而皆海，狭仅七十里。倘敌人于此登岸，坚筑营垒以断我后，再以铁舰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则旅顺遂成绝地。援兵、军火、饷道皆不通矣。”^[50]从甲午中日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的实际状况看，这些批评不无道理。

1876~1879年，当从英国订购的炮艇相继驶回后，李鸿章开始筹划建设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原来设有船坞，光绪初年从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调来驻巡北洋的“镇海”、“操江”轮，煤料维修，皆由该局承办。“镇海”、“操江”吃水分别为11.8尺和10尺，而四“镇”不过9英尺6英寸，利用机器局旧坞，是能满足炮艇维修任务的。李鸿章弃旧营新之目的，显然是将大沽船坞作为当时海军的主要维修基地来营建的。就扩充实力而言，他总显得既有远见又有魄力。

大沽船坞建设进展甚快。1880年2月创议,3月在大沽购用民地一百亩,4月聘用英员葛兰德为船坞总管,安的森为轮机总管,斯德浪为收支委员。5月,委罗丰禄为大沽船坞总办。6月,甲坞开工,由天津四合顺包揽工程,盖轮机厂、马力房、抽水房,从国外购入机床20余台。又盖大木厂、起重架、绘图楼,设模样厂、铸铁厂、熟铁厂、熟铜厂。当年12月竣工,招募工人600余名,工匠3000余名。1884年,兴建乙、丙两坞。1885年,兴建丁、己两坞。次年续盖办公房、西坞抽水机房、西坞军械库。1892年建炮厂。其中甲坞长320尺,宽92尺,深20尺。^[51]大沽船坞和天津机器局一起,使天津成为北洋海军军火的主要生产基地和舰队的维修基地,但其船坞规模较小,且是木坞;再加大沽口河道太浅,难泊巨舰;地处直隶湾,既不利于出击,又太抵近北京,故难进一步扩充为大型的海军停泊场。后来李鸿章的兴趣便转向旅顺。1890年旅顺船坞落成使用后,北洋海军主要维修基地迁往旅顺,大沽船坞的地位明显下降,直到甲午战争后,旅顺、威海皆失,才又显重要。

李鸿章加强了大沽口炮台的建设。大沽设防可追溯至1404年(明永乐二年),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在大沽口南北两岸添筑水师汛衙署兵房及两座炮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舰队曾北上闯人大沽口,清廷派琦善与义律会谈,劝说英国人返回广州谈判。接着,清廷加强了大沽口炮台的防御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于1858、1859、1860年三次进攻大沽口,其中两次攻陷。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着力加强大沽口的防务力量。至1884年,大沽口南岸共设大炮台4座,小炮台40座,派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统协兵1800人守御,亲军炮队1营接应。北岸设大炮台2座,平台6座,派记名总兵刘祺统直字2营驻守,副将史济源带保定练军1营为接应。又命丁汝昌调派“镇东”、“镇西”、“镇北”、“镇中”炮艇入口与炮台相倚护。北塘口南岸设炮台2座,平台3座,派署广西提督唐仁廉统仁字、义胜各1营、通永练军3营分驻设防,调“镇南”、“镇边”2炮艇与炮台相倚护。直隶提督李长乐统武毅马步4营、提标练军马步2

营驻芦台为后应。

天津是北洋大臣驻节之地,李鸿章在天津还设立了总理水师营务处、天津海防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所以天津是北洋海军重要的管理枢纽。1887年4月,津海关道周馥被任命总理北洋水陆营务处,督办旅顺船坞工程,联络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水陆将领,布置防务。此外,由于北洋海军军舰燃煤均采用唐山开平煤矿所产煤块,因此专门铺设了中国第一条自造铁路——唐胥路,以保证燃煤从唐山经大沽转运旅顺、威海、烟台各处。大沽码头在北洋海军后勤保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旅顺海军基地是洋务运动中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旅顺口内由老虎尾半岛延伸,天然地分为东西两澳,北洋海军主要营建了东澳。东澳亦称东港,东南北三面共长4106.8尺,西面拦潮大坝长934尺,形如方池。西北留一口门,以便军舰出入。四周全砌大石岸,由岸面至澳底深38.2尺。周围泊船,毫无风浪摇动。东港东北,为旅顺船坞,长413尺,宽124尺,深37.98尺,坞口以铁船横栏为门。全坞石工用山东大块方石,垩以水泥,凝结无缝,平整坚实。还建有修船各厂九座,包括锅炉厂、机器厂、吸水锅炉厂、吸水机器厂、木作厂、铜匠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占地48500平方尺。在东港南岸建仓库4座,东岸建仓库1座,备储船械杂料。这些厂、库结构,均用铁梁铁瓦,以防火灾。港坞四周,联以铁道,间设起重铁架5座,并建丁字式大铁码头,专供军舰上煤运械。又在澳东建造小石码头,以便修理雷艇炮船。澳坞各厂、库码头,设电灯46座,还铺设自来水铁管,引10余里外山泉至工厂码头,以供官兵工匠饮用。^[52]

近代战争中,随着军舰攻击炮火越来越猛,海岸防御配置也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旅顺基地沿海一侧依山形地势,共筑有九座海岸炮台。以旅顺口口门为界,口东(俗称海东)五台,口西(俗称海西)四台。从东迤西依次为老蛎嘴(崂嶗嘴)后炮台、老蛎嘴炮台、摸珠礁炮台、黄金山副炮台、黄金山炮台、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

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除老蛎嘴炮台为穹窑式外,其余皆为露天式。共配置火炮 58 门,包括 200 毫米以上口径巨炮 9 门。

由于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之端,孤悬海中,没有广阔腹地,南关岭附近的蜂腰部,极易为敌人登陆而切断后路。为弥补这一缺陷,又在金州至旅顺大道东侧,依次筑起松树山、二龙山、望台北、鸡冠山、小坡山、大坡山炮台。各炮台间及松树山至刘家沟西北端,沿丘陵筑起一道长墙,将各炮台连结成炮台群。在大道西侧的案子山,修建东、西、低炮台,亦以长墙连接,构成炮台群。两个炮台群的交叉火力,能够有力地封锁金州至旅顺的大道。还在大连湾修筑和尚岛、老龙头、黄山、徐家山等 6 座炮台,构成旅顺后路的又一道防线。

旅顺基地工程建设分为两阶段。1880 年至 1885 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修筑炮台,同时进行疏浚口门、船澳、挑挖船澳土方,修筑船澳石坝、泊岸,添建库房等工程。李鸿章聘请德国人汉纳根监造炮台,派县令陆尔发帮同办理。随着工程展开,又于 1881 年派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去设立营务处工程局。黄是李鸿章的同乡,同治元年起,即入淮军幕府,办理文案,1879 年由工部主事指捐道员分发直隶。据当时文献记载,此人任性乖张,贪鄙无能,言语狂妄,似有心疾,文武将吏皆不愿与其共事,再加上不懂工程,任职一年,怨声四起。1882 年 8 月,回籍奔丧的李鸿章直接写信给张树声,建议将其撤回,改派袁保龄前往。^[53]

袁保龄出身名门,却无贵介公子的纨绔习气,也算不得李鸿章的嫡系亲信。他临危受命,接管工程营建时,对土木工程、会计核算,乃至军舰炮台等各项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全无所知,就下决心一切从头学起。早在上年夏天,他甫到北洋幕府,曾奉命对北洋各口岸进行考察,认定“齐辽各口形势,其关锁渤海、拱卫留都,无逾旅顺者”。^[54]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师为骊珠,旅顺威海皆为鳞爪。譬诸贵家世疾,书室中几案精洁,架上宋槧本纷然罗列,而其家子弟皆务饮博,不知以巨金营此室将何用?”^[55]所以他发宏愿,以建设旅顺军港为己任。秋冬之交,他乘轮前往工次。此后 5 年间,他

履冰践雪，登凭版筑，忍辱负重，无片刻闲暇。自谓每夜“非交丑（时）不能熟睡。幸筋力顽壮，每日奔走尚不知疲”。“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自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已渐渐白矣”。^[56]其间曾有吏部安排进京引见，李鸿章以工程缺乏接手者挽留他，袁保龄也说早将仕途看作游戏三昧，当年出京，已将十六七年的京官资格弃之如脱屣，岂能年过四十反而斤斤计较？遂一笑置之。遗著《阁学公集》，十卷“公牍”，几乎全谈旅顺工程，筑坝挖泥、建坞修桥……事无巨细，却都一一考虑周全，不能不使后人对这位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产生深深的敬意。

袁保龄主持的工程，主要是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周边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及军港内部的道路、库房、码头、小型机器厂等。其中尤以拦潮大坝最为艰巨。大坝为整个项目中的首要工程，将东港与入海口分开。此工程原由黄瑞兰经手，在袁保龄接任时已近完成。由于坝底淤泥四五丈未曾挖净，且坝身收坡太小，故产生渗漏下塌，随时有崩溃的危险。袁保龄到任后，想方设法予以补救，一方面增高加厚旧坝，另一方面又在东面加修备坝以为候补方案。从他到工之日起到1883年底，工程一年之中数次发生危情。尤其是从1883年10月28日起，连日雷雨，潮水大涨，狂风巨浪，工程告急。10月31日上午，大坝南段在一二分钟内突然陡陷5尺，下午又进一步陷落8尺许，几乎与水面持平。南段四十余丈近中段二三十丈处均出现横裂大缝。袁保龄率局员及民工在提督宋庆及所部毅军3营、总兵王永胜及所部护军营1营3哨官兵的全力配合下，奋力抢险。所幸11月1日起，天气转晴，风势减弱，潮水亦小。他们使用我国传统河工办法，层土层阶加筑护坝小埝。10日，昼夜狂风震撼，拔木破屋，为袁保龄到旅顺后所见到的最大风势，大坝依然经受住了考验。至19日，所有塌陷之处，全部堵闭合龙。^[57]袁保龄在给周馥的私信中说：“敝工竭一年之力，澳工将近九分，而坝工陡塌四十余丈。变生顷刻，不遑措手，几令人心胆俱碎。请各队伍帮忙不过

场面文章。”“仰天太息，涕下弥襟，代人受累乃至此极。上帅（李鸿章）稟中咬定牙不说前人一字坏处，以力避世俗倭卸之习。待公爱我，一倾吐之”。^[58]其后，袁保龄督率部下，于冰雪风雾中植立坝上40余日，仿栗毓美石坝纯用块石护坝之法，终于使得大坝获得坚稳。

袁保龄刚到旅顺时，因缺乏技术顾问，根据德璀琳的推荐，聘请德国工程师善威任工程局帮办。由于善威没有主持过这么巨大的工程。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中国官员在工作中发生了许多分歧。1886年10月，在袁保龄的建议下，中方决定用招标方式聘请外国公司承包，工程进入第二阶段。英德法三国就此展开激烈竞争，最后法国辛迪加以最低造价，并由上海法兰西银行及法国驻天津领事林椿承担担保十年的担保而中标。袁保龄则因主持从德人手中收回工程的繁忙活动，“竭二十昼夜之力，笔秃唇焦。幸得就绪，计节公帑十七万余金”，而心力交瘁，中风病倒，晕绝复苏，后延请曾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名医汪守正诊治，方渐恢复。^[59]他曾说：“税务司德璀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旅役荐德人善威为工员，两年无尺寸效，犹以华官掣肘为辞，荧惑长官之听。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根所由来也。”^[60]他请求退休，李鸿章以其久任要防，乃派刘含芳督工，仍以袁保龄任防务。1889年8月19日，袁保龄病逝于旅顺，终年48岁，朝廷追赠以内阁学士。

法国负责工程的总工程师，初为德威尼，后为吉礼丰。^[61]承揽项目，包括大石坞、各修理厂、储料库、办公住人各屋及船澳泊岸、铁道、码头、电灯、自来水等设施，共需银125万两，工期30个月。1888年，又增筑船澳拦潮石坝及铁码头，追加经费14.35万两，展期6个月，至1890年11月9日全部竣工。^[62]李鸿章派丁汝昌、周馥、刘汝翼验收。工程总的质量是高的，历尽兵燹战乱之后，不少设施至今仍在用。但也有些问题。如机器局与船澳毗连基址，用砖石水泥筑成，砌缝中有渗水现象。^[63]此后，由龚照珩负责，又在基地内陆续添建了一些新的厂房设施。至甲午战争之前，

旅顺堪称远东一流、配套完善的海军基地。

袁保龄曾为黄金山炮台撰对联曰：

大海澜回忆从前唐战辽征往昔英雄垂信史

高山天作愿此后镐京丰水中兴日月丽神州

又为白玉山行宫撰对联曰：

创四千年未有之规愿成渤海屏藩留都堂奥

环九万里无远弗届漫谈昆明池水汉武旌旗

可惜现在这些对联早已不存，人们也早已淡忘了袁保龄这个名字。今天的旅顺口白玉山巅，竖立着日本人为纪念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而建立的表忠塔。

如果说，旅顺基地的主要使命是军舰维修保养之区，威海基地则主要是舰队聚泊和补给之所。威海刘公岛全面建设起自1887年，岛上修建了北洋海军提督衙门和大批营房。从威海乘船上岛，远远就能眺见提督衙门前高耸着的两支巨大旗杆。拾级而上，穿过辕门，便是正门，门上高悬“海军公所”匾额，出自李鸿章的手泽。提督衙门有三进院落，前、中、后厅，东西厢房及跨廊连成一休，占地1万多平方米，是丁汝昌坐镇议事的地方。刘公岛上建造了机器厂、水师学堂、医院，各式建筑鳞次栉比。由于岛上饮水困难，特地修筑了甜水库，并在提督衙门院内及炮台等处修筑水池多座，内有过滤泥沙设备，储存雨水。还为外籍雇员设置了俱乐部。由于刘公岛是海军提督丁汝昌驻节之地，所以李鸿章称“威海卫为北洋海军根本重地”。^[64]参与领导基地施工的官员，有刘含芳、戴宗骞、龚照琦、张文宣等人。

刘含芳，字芎林，安徽贵池人。1862年即随李鸿章淮军东进上海，为李办理军械后勤。先后参与旅顺口、威海卫的工程指挥。总办威海卫鱼雷营，充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局，凡屯防营、筑炮台、设机器厂、造弹药库、开学堂、办医院，皆手定章程，躬亲履勘，联络将领，督率工匠，跋涉风涛，无间寒暑。1888年署津海关道，1891年，授甘肃安肃道，为李鸿章奏请留用。

1892年调任山东登莱青道，监督东海关。李鸿章称创办海军，“该道艰难缔造，历年最久，经手事件最多”。仍请于地方公事之暇，兼管营务。^[65]

戴宗骞，字孝侯，安徽寿州人。同治初年入李鸿章幕府，1880年随吴大澂办理吉林边务，后率绥军移防京畿沿海一带。1888年兼统巩军，移防威海卫南北岸，督修炮台。其中巩军驻南岸，绥军驻北岸，李鸿章奏称其所建炮台结构精严，壁垒一新。对他本人的评价是“志趣廉正、经济宏通，实为文武兼资之选，深堪倚任”。^[66]

龚照琦，字鲁卿，安徽合肥人。1871年入北洋制造局当差，后捐纳同知，保知府，1885年捐道员，1890年保二品顶戴，任直隶候補道。旋调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兼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龚照琦负责督造威海大铁码头，墩柱用厚铁板钉成方形桩，直径四五尺，长五六丈，中灌水泥，直入海底，较之各处所设铁码头，工程尤巨。

张文宣，字德三，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外甥张士珩的堂兄。1871年中武进士，1880年被李鸿章调为管带亲军副营，驻防旅顺，修筑黄金山炮台。1887年调防威海，率亲军正副两营驻扎刘公岛，先后修筑岛上各座炮台，因功以总兵记名简放。^[67]

威海基地营建较晚，其防御体系的设计布局也更具有近代化、大型化的特点。海湾北端设有北山嘴、黄泥嘴、龙庙嘴3座海岸炮台（通称北帮炮台）；海湾南端设有皂埠嘴、鹿角嘴、龙庙嘴3座海岸炮台（通称南帮炮台）；北帮后路，有合庆滩陆路炮台；威海卫城北，有老母顶陆路炮台；南帮后路，有所城北、杨枫岭、摩天岭3座陆路炮台。又在刘公岛上建立东泓、南嘴、迎门洞、旗顶山、公所后、黄岛等炮台。其中公所后炮台是地阱炮台。其炮设于地下，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轰击，可以圆转自如，四面环击。发射后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气，降还地阱。黄岛原是邻近的一个小岛，经填海筑道，与刘公岛相连，安装巨炮。又在刘公岛南面的日岛上，建立地阱炮台，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威海海湾南出海口的防御力量。威海南北帮及刘公岛西岸，还各设火药、军械等库。此外在南北帮

还设有水雷营。

从防御体系来看,威海基地似乎壁垒森严,但其布局设计是有缺陷的。甲午战后,英国人泰莱曾指出两条:一是南部的内陆炮台,其内侧没有保障,敌人可从此面进攻;二是岛上及他处皆无测量射程的设备。^[68]负责工程的汉纳根解释说:“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曾具稟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而职此之故,遂与当事者意见不洽。”^[69]根据对威海南帮炮台的实地观察,不难看出,鹿角嘴、皂埠嘴、所城北、杨枫岭、摩天岭、龙庙嘴诸炮台,由海湾而陆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防御体系。其对外有连绵的交叉火力,彼此互为依庇。所谓对内并无保障,不能兼顾后路云云,系指海岸炮台与陆路炮台之间不能对射,亦即陆路炮台倘被攻破,海岸炮台自身缺乏后路防御力量。这类批评,从事后总结的角度看,有一定道理。更明显的问题在于,皂埠嘴炮台选址过于偏西,虽能与日岛炮台遥相呼应、封锁海湾南口航道,却为东侧高坡阻挡视线,难以有效控制东、南方位的海区。龙庙嘴炮台则过于深缩港内,对湾口防御作用不大。一旦为敌所夺,反易用来射击港内舰队和刘公岛。倘若能将龙庙嘴炮台移至皂埠东山,则南帮炮台的布局就更为严密了。

短短几年时间,恬静的威海湾,成了第一流军港。一队队的士兵开进了新筑的炮台,给荒瘠的山梁海角带来了生气。暮春时节,炮台四周开遍了朱红色的花朵,五个尖瓣,在微风中摇曳。据说这花儿是外乡的士兵们带来的,只盛开在炮台周围。时隔百年之后,炮台早已坍塌,士兵也化为白骨,惟有那些小花仍在盛开,红红一片,悄悄地散发着幽香。

四、北洋海军的训练

海军初创时期,主持海防计划的洋务派官僚重点着眼于扩充

舰只,对于训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马建忠曾批评说:中国自筹办水师以来,徒以分省设防,划疆而守,号令不齐,器械不一,平日既无统属之分,临敌难收臂指之效。南北洋师船相遇,且不能以旗号通语,更何望其合操布阵?^[70]直至1885年,吴大澂仍然指出海军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北洋之船,遇台澎之风,则茫无措手;南闽之弁,于渤海之沙礁则漠不关心。”^[71]这种状况和当年绿营水师划地而巡、迁地弗良的状况变化不大,与近代化海战需要大规模协同、远距离支援的要求相差甚远。

北洋海军起步晚于南洋。由于李鸿章吸取了海军初建时的教训,抓住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四个环节,使得舰队发展后来居上。

海军训练,从内容上可分为共同科目训练和专门训练两大类。共同科目训练是海军官兵一切训练的基础,包括条令、枪炮、损伤管制、游泳潜水等方面的训练。专业训练是海军官兵根据职责分工,加深进行的技术训练,包括远海训练、枪炮训练、水中武器(鱼雷、水雷)训练、帆缆训练、通信训练等等。

军官的训练是在水师学堂和练习舰实习中学得,并在服役后通过实践进一步巩固的。《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战官“虽已补缺带船,应随时温习旧业,推广新知。每年夏季,饬由水师学堂将行海事宜出题数道,寄交提督转发各管带官、大、二、三副等拟作,仍将各卷呈由提督汇送学堂,评定甲乙、报明北洋大臣,分别记奖记过”。^[72]对于艺官,则要求其在上船五年内深明汽机理法,并能修理汽机、锅炉。^[73]由此可见,尽管海军军官在学堂已经获得较为扎实全面的基础知识,仍然要在任职岗位上不断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对弁目、水手来说,其共同科目训练是在当练勇时,在练习舰上完成的。《北洋海军章程》要求一等练勇对船艺项下荡桨、把舵、量水、接缆、张帆、叠帆等法,枪炮项下四轮炮操法、大炮操法、洋枪操法、刀枪操法都能训练掌握。^[74]有些共同科目,如步兵轻武器训练在军舰上也反复进行。李鸿章1891、1894年两次巡阅海

军,均调集各舰小队登陆操演陆路枪炮阵法。他在奏折中赞扬其“精坚快利,旋转如风,为各处洋操之冠”,^[75]说明北洋舰队具备两栖作战能力。又如“致远”等四舰在欧洲回华途中,就多次进行“或操火险或操水险”的损伤管制训练^[76]。

弁目、水手专业训练的方法,主要由高一等的弁目水手教授。《章程》对于炮目,特别订出了应“善于教人”的要求。特种技术兵匠,还要专门训练。如鱼雷匠的培训,由鱼雷局派人担任,或由各船铜铁匠进修鱼雷技术后再来考充。近年发现的北洋海军教材《电气问答》、《水雷问答》,就是专供培训用的。^[77]

船队经常考核各级官兵的训练成果。通过的项目,还要定期复考,以防遗忘。考试后发给“凭单”,作为擢升时的参考。训练同考核密切相连,是国防近代化的要求和特征。

海军训练,从其范围看,又分单舰训练和编队训练。

单舰训练指以一艘军舰为单位进行的训练,包括武器训练、船员代理职责和多能训练、舰艇长训练、单舰战术训练等等。目前很难找到北洋海军单舰训练的材料,但北洋海军是按照英国海军操典进行训练的,因此,1872年江南机器局译书馆所译英国海军部编《水师操练》一书,为我们了解北洋海军的单舰训练提供了侧面的参考依据。《水师操练》规定单舰武器训练是:“新出海之船,操练炮法,先使船上一切人同操一法,各人作各人之事,快速整齐,并须声明作事之理。次则各哨分操各法,要以能极速极静为贵。”武器训练还包括“各炮任意分放”(任意射)、“一边之炮同时排放”(同向炮齐射)、“暗号操练”(放炮不喊口令,全看第一炮手手势,以适应实战中炮声极响,无法听清口令的情况)等。《水师操练》还具体规定了船员代理职责和多能训练(“减人放炮”)、战术训练(“将战时预备各事”、“夜间备战”)等内容。^[78]

北洋军舰每年春夏秋三季沿海操巡,周历奉天、直隶、山东、朝鲜各洋面,东北各岛。冬令驶往南洋江、浙、闽、粤洋面要隘,南至东南亚各埠。从舰艇长训练的角度看,这种操巡包含熟悉风涛、沙线和提高驾驶水平,是必不可少的训练环节。

《北洋海军章程》以条令形式对单舰训练做了规定：“各船逐日小操一次”，^[79]即日操。从现存的“致远”等舰从英国回华途中操练的秋季操单，可以看到日操在上午8点45分至11时45分，下午3点至4点进行。^[80]《水师操练》称：“天气若不炎热，必上午操练备战之法，至于极热为度……遂操各种放炮之法约三刻。下午齐集带刀带洋枪之人，轮流操练手枪用法。”^[81]北洋海军每天操练形成制度，迨至甲午黄海大战前，各舰仍进行日操。

编队训练，当时称“操演阵法”，是指二艘以上军舰参加的协同训练。阵法是海军战术的重要内容，对于夺取海战胜利常常起着关键作用。在帆船时代，好的阵法能帮助舰队在投入战斗前抢占有利的上风位置，并能根据战术进展来决定是逼近敌舰还是避开敌舰。但一旦投入战斗，就产生出两种战术思想。“正规派”主张在取得海战全胜前不应不惜代价保持队形，使指挥官随时掌握各舰的位置，以便随时撤出战斗。“混战派”主张接敌后军舰有权机动攻击易毁的敌船，主要依赖舰长的判断力和经验。进入蒸汽船时代后，航行技术和火炮功能都有了很大发展，抢占上风已不太重要，但阵法依然是取得胜利的保证。1873年，江南机器制造局译书馆曾出版《轮船布阵》一书。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译出《船阵图说》，以图说形式详细介绍了118种阵式变化。北洋海军主要据此为条令，进行阵法训练。

编队阵法训练，通过大操、会操、会哨等形式进行。《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舰队每月大操一次，两个月全军会操一次，北洋各船每年须与南洋各船会哨一次。^[82]

为了及时掌握训练状况，衡量训练成果，北洋海军建立了定期阅操制度。根据规定，舰队每年由北洋大臣阅操一次，每逾三年由海军衙门请旨特派王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83]但这些实际上都没有做到。北洋海军成军后，共举行了两次阅操。一次是1891年5月23日至6月9日，李鸿章与海军衙门大臣、山东巡抚张曜巡阅舰队。前往旅顺途中，各舰分行布阵，声势浩荡。夜间以鱼雷艇演习袭营阵法，其他各舰整備御敌。又调集各舰鱼贯

打靶,旋以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演放鱼雷。夜晚合操,水师全军万炮齐放,无稍参差。1894年5月7日至27日,李鸿章同帮办海军大臣定安最后一次巡阅了舰队。这次调集南北洋21艘军舰,是近代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检阅。

大规模阅操,能锻炼舰队协同指挥、编队变阵、实弹射击、战术进攻和防御的能力。这对于弹药本有限制,平时操练不准多用的中国舰队,是弥足珍贵的大好时机,阅操对提高舰队训练素质起了一定作用。

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用西方新式军舰大炮和训练方法建设起来并正式成军的海军。它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政界和知识阶层曾产生过一阵振奋,历次阅操,舰艘云集,舳舻相接,也给并不精通海军的朝廷权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后向朝廷报告,“各将弁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各将领文武等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布阵整齐,旗语灯号,如响斯应”。^[84]连一向与北洋龃龉极深的湘系洋务派首领刘坤一,也承认南洋训练水平远不如北洋。他请李鸿章“转囑禹亭军门(丁汝昌),于南船抵津后赐之教督,俟会操时,谕令南船一切进止,皆视北船为标准”。^[85]李鸿章自己也有些陶醉。1891年巡阅海军后他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86]人们被北洋海军显赫的声势迷惑,不仅承认其训练、装备精良,甚至寄予超越实际的期望。甲午战争爆发后,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文士,依附皇帝,坚决主战,这种决心,显然同“北洋海军可恃一战”的判断有很大关系。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批评明朝官军的训练说:“其所习所学,通是一个虚套。与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一字相合。及其临阵,又出一番新令,却与平日耳目闻见无一相同。”“如此操练一千年便有何用?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看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

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路。谁曾按图对士,一折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87]这是旧式军队的通病。

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实际表现验证以往的阅操,可以发现阅操并不能真实反映训练的实际情况。十多年里,北洋的训练确实取得了成绩,但在封建腐朽空气的侵蚀下,内部逐渐变质,原先规定的训练条令、科目成为具文。各种弊端纷纷而生,最终在海战中真相大白。北洋舰队军官战后的总结呈文,揭露了训练中的隐私内幕,为准确评价其训练提供了重要论据。“来远”帮带大副张哲深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88]可谓痛定思痛后悟出的教训。

北洋海军训练的最大弊端,是缺乏实战训练,每每虚应敷衍。军官们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89]“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90]至于编队训练,“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坐总结说:“平日操演船阵,阵势总须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91]后来黄海之战失利,就同平时训练弄虚作假、缺乏战术背景有很大关系。

以上弊端与训练时缺乏严格号令直接有关。海战时阵法号令至关重要,如果平时操练精娴,临敌必无踉跄误失之弊。然而北洋舰队平时旗号灯号多有迟久答应,一令即出,须催促再三,方能应命,用之已惯。^[92]及至战时,怎能不误事呢?

顺便指出,北洋舰队口令皆用英语,外国观察家将此作为衡量训练水平的标尺,其实徒具形式。新上舰的水手听不懂口令,便导致指挥失灵。甲午战前,郑观应即指出:口令“依照西音,徒劳无益,不若改习华音,易习得体”。^[93]战后舰上军官更提出应当将各器械名目操演号令译成中文,既易学习,而且保密,临事亦不致舛错。^[94]说明根据中国国情修改增补外国规章条令十分重要。

虚应敷衍,训练松疲,同海军日益腐败,纪律懈弛有关。中法

战争之后,李鸿章重聘英籍顾问琅威理时,袁保龄认为或可助丁汝昌整顿海军一番。他说各管驾太纵恣,丁汝昌又太软弱,他和周馥为此深忧。^[95]当琅威理离开舰队后,军纪涣散的情况更为明显。此外,考核擢升制度的废弛也直接影响训练质量。海军官弁士兵的训练,是同考核、晋升直接联系的。但在封建官场裙带作风和拉帮结伙恶习影响下,军官中形成闽人圈子,士兵则有北方人圈子,造成“在军中资格较深,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人军便庸其上”。^[96]各种训练自然变成空话。这同李鸿章也有关系,他派丁汝昌主管海军,丁不习海军,威令不行。琅威理去职后,对于部下训练是否得法,全然无从考察。周馥回忆说:“余订《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相国阅操亦示宽大,谓此武夫,难拘绳墨。”^[97]

练勇训练日益腐化,使北洋海军丧失后备兵源。练勇是正规水兵的后备军,按章额定250人,但后来却大大突破。1891年招募即达1400人。^[98]沿海百姓,将其作为吃粮拿饷的所在。许多年龄不足的少年,也设法走门路投军,造成老少强弱,敏钝不齐。训练则流于形式。甲午战前经过两个月训练的练勇,皆仿绿营习气,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看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舰上官兵斥其“只充死人之数”。^[99]

由此可知,和平年代耀武扬威的北洋海军,骨髓里早已存在导致失败的基因。因此,薛福成在1893年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100]郑观应也在1894年指出:“船既坚矣,图既精矣,而驾驶未习,仍与无船同也。火器利矣,而施放未习,仍与无火器同也。水军成矣,水营立矣,而士卒未习;士卒习矣,而将领未得其人,是以军与营资敌也。”^[101]这话同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说“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102]的意思是相吻合的。

近代化战争,向将军和士兵都提出了高度的技术、训练要求。

国防近代化不仅仅是装备更新。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必须用爱国主义精神做指导思想,施之以严格的训练,认真吸收先进技术,才能保持其战斗力。李鸿章注重武器装备更新,对训练却放任自流,结果使得北洋海军成为沙滩建筑。这是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五、北洋海军中的外籍雇员

北洋海军在引进装备的同时,还聘用了一批外籍雇员。

外籍雇员按其工作性质,分为高级顾问、一般教官、舰艇战术技术军官、工程人员。此外还包括一些为临时任务聘请的人员。

所谓高级顾问,是指李鸿章特聘协助海军最高负责人进行训练、作战以及舰队日常管理的外国顾问,是外籍雇员中地位最高者。有时还被指派执行某项特别任务,但其职位称呼并无明文规定。

1880年,李鸿章在筹备练习舰时,欲觅熟悉军舰规制的外国教习,赫德向他保荐了英国人葛雷森。葛雷森10年前即入中国海关,曾任巡船管驾,又做过粤海关副税务司,1879年回国度假,旋随四“镇”回华,李鸿章命他兼管炮艇出洋操巡,但私下认为他在英国海军仅当过水兵,并未当过军官。5月12日,四“镇”及“操江”轮在大连湾驶往海洋岛途中,邓世昌驾驶的“镇南”号误触暗礁,后经葛雷森指挥出险。李鸿章便命他协助督练炮船的丁汝昌,担任总教习。次年又派他前往英国接带“超勇”、“扬威”回华。由于他几次指出在英订购军舰的缺陷,赫德和金登干都对他产生不满,称他是“一个被事业上获得成功以及他被放在一个他受的教育和训练程度不配担任的职位所宠坏了的人”。^[103]于是他们改为推荐琅威理。在1882年以后的两个财政年度里,葛雷森仍以六“镇”炮船总教习的名义支薪,但地位显著不如从前。^[104]1882年9月,李鸿章聘请琅威理担任北洋水师总查(The Chief-Inspector)。

1884年10月,琅氏因中法战争回避归国,李鸿章又根据李凤苞的推荐,委托德国人式百龄统带“超勇”、“扬威”舰南下援闽,但式百龄未获得什么总教习之类名号。1886年,北洋海军重聘琅威理担任总查。四年后,因“撤旗事件”,琅氏辞职回国。此后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便再也没有聘请高级顾问。

一般教官和舰艇战术技术军官人数甚多。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后人所知是不全面的。从各种奏折材料及其他资料中陆续提及的人物中篹梳,至1884年底大致包括:“龙骧”等四船洋教习富思德等11员,“镇北”等四船洋教习吉必勋、哥嘉、李福,“镇中”等二船洋教习必第、印都,六“镇”炮船总管轮巴尔伯、德伦,“超勇”快船洋员哈必登、拜列员,“扬威”快船洋员章士敦,“扬威”总医士鲍德,水师总教习倪乐顺,水师总管轮葛雷德,水师操练教习雷登,枪炮正教习鲍察,水师枪炮副教习立克路司,天津水陆各营洋号总教习毕格里,炮台教习额德茂,鱼雷总教习哈逊克、赖乏,监工福来舍,鱼雷轮船总教习区世泰,鱼雷轮船管炉教习卜里士刻,大沽口水雷营教习满粟士,旅顺口鱼雷营教习密勒克,水雷教习施密士,水师练船正教习伦察,练船驾驶教习倪耳森,水师练船帆缆教习嘉格蒙,练船帮教习马吉芬,监造练船法乐,水师候差洋员丁龄,天津水师学堂管轮教习霍克尔、副教习希耳顺等。^[105]1885~1886年,有从驾驶“定远”等三舰来华的400位外国官兵中留用的管驾、管轮教习密拉等30员,“济远”三管轮卢察审,水师练船正教习鲍察,练船驾驶教习倪耳森,水师枪炮副教习立克路司,练船帮教习马吉芬,水师操炮教习雷登,鱼雷总教习福来舍,帆缆教习嘉格蒙,管理挖海机器船勒威,天津水陆各营洋号总教习毕格里,大沽口水雷营教习满粟士,旅顺口鱼雷营督操密勒克,操炮教习额德茂,帮办旅顺口工程善威,旅顺口工程局派管浚澳潮标舒尔次,导海挖泥机器轮船教习丁格、温瓦而脱,操炮教习古柏尔、雷登、费纳宁、赖世、锡伦司、希勤司,水雷教习罗觉斯、纪奢(即余锡尔),贝孙、海麦尔等。^[106]1888年,北洋海军留用了运送“致远”等舰回华洋教习中的雷礼等13人。1889年,北洋海军雇佣教习、洋员34人,其

中包括“致远”等四舰酌留洋员 9 人,1890 年,北洋海军共雇教习、洋员 29 人。至 1894 年甲午黄海之战中仍在北洋海军服务的 8 名外籍雇员是:汉纳根,“定远”管炮洋弁尼格路士、余锡尔,帮办“定远”副管驾泰莱,帮办“定远”总管轮阿壁成(又译亚伯烈希脱),总管“镇远”炮务哈卜们(又译赫克曼),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工程师普菲士。^[107]

这些洋员主要承担舰队训练、军舰部门训练、技术兵种训练、练习舰训练和海军教育任务,有的直接负责某一部门的操作。此外,在修建海军基地和后勤保障设施时,也聘用了一些外国技术人员。

总的说来,北洋海军雇佣洋员,对于舰队建设起了很大作用。海军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抵御侵略的功能。西方列强既要侵略中国,又向中国提供军事顾问;清政府既要发挥外籍雇员的作用,又要维护中国主权,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从外籍雇员中最著名的人物、两次担任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身上,我们可以集中地看到这种矛盾的体现。

琅威理,1843 年 1 月 19 日出生于英国。14 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 岁入海军实习。以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1863 年随“李-阿舰队”首次来华。1877 年又为金登干所聘,护送炮艇前往中国,颇得郭嵩焘、丁日昌的赞赏。所以,当李鸿章在 1879 年委托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访觅外国顾问时,曾纪泽便告诉他,根据金登干的推荐,琅威理新近又将送炮船来华,其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这年 9 月,英国海军上将古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他谈到择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说琅威理明练可靠。^[108]恰好 11 月,琅氏护送四“镇”抵津,李鸿章与他晤谈数次,又看他调阅操演,甚为满意,便当面延聘,月薪 600 两。

琅威理表示,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他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得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

中的升迁。李鸿章立即请曾纪泽与英国海军部洽商,而英国海军部却犹豫不决。一则不愿其现役军官为中国训练军队,二则琅威理既为中国所聘,应该留职停薪,海上年资亦当暂停计算。此事遂陷入僵局。直到威妥玛、赫德、金登干等人出面多次活动,才使事情有了转机。

1882年秋天,琅威理带着他的随从爱斯德来中国任职,头衔是副提督衔(The Brevet Rank of Vice-Admiral, 名誉中将衔)北洋海军总查(他在英国的军衔是中校),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他还根据国际惯例,为舰队制定了中外海军交往的礼节,扩大了中国海军的影响。^[109]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请假回国。1886年1月应邀重返中国。此时他已升任英国海军上校,故月薪增至700两。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以后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他的头衔全称是“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110]

1887年,琅威理带队前往英德两国接收“致远”等4舰。琅以“靖远”为旗舰,升提督旗指挥一切,直至厦门与丁汝昌会合前仍高悬提督旗。^[111]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舰队训练任务多由琅威理主持。接触过他的人说:“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112]丁汝昌在琅威理第一次辞职后曾说:“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舳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去冬濒离烟台时,贻示一书,略曰:水师已有一半功

夫,未竟而去,耿耿此心有不能寝食者。若从此守住,则后来或可一线到底;若见异思迁,则前功尽弃。我深愿为中国出死力,奈国法不准。如中国能与我订立合同,常为中国水师之官弁,我所应得本国终身廉俸,中国亦能认给,则我亦不难舍英趋中,冲锋陷阵,惟命是听,盖我有妻子儿女,胥恃此也。”“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113]他日夜操演,士卒欲求离船甚难。在他的作风影响下,无人敢出差错,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114]的说法。琅威理自己也回忆,某次“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115]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巅峰。

1886年,琅威理重返北洋海军。在第二次签订的服务合同中,中方不仅要求琅威理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并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除非作战对象是英国。对此项条件,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还有不同意见,^[116]但琅威理与中方的关系似乎没有中法战争前那么融洽。当醇亲王检阅海军时,琅威理为了某种怠慢或其他的事而一直不悦。^[117]不久,在秋天发生的“长崎事件”中,访问日本的北洋海军官兵遭到日本人的追杀,而琅威理却“一意袒倭”,使得丁汝昌对他大为不满。^[118]但琅自己却认为在中国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授权。他以眼疾为理由,在《北洋海军章程》获得朝廷批准的第二天(1888年10月1日),向李鸿章请假回国治病。^[119]同时,琅威理给金登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如果明年3、4月份身体转好,而英国外交部又要求他返回中国的话,他自然会回去。但他本人很不愿意回去。^[120]赫德对此批评说:“如果琅威理能坚守岗位,而不是每隔几个月中断工作回家一次,他会有所长进和少抱怨些。我对他已无能为力,他已实际掌权——能接触到合适的人物,因此完全应该由他自己来办。……如果他不能下决心留下干上五六年时间工作的话,那就干脆辞职,这样对大家——他本人、我、海军等,都有好处。他具备优秀的品质,但大自然没有赋予他某些最重要的品德。”^[121]从赫德与金登干这阶段的通信中,我们已能预感到琅威理随时会挂冠

而去。^[122]

1889年初,琅威理在伦敦拜访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谈及他在中国的令人不满的处境。他认为,如果发生战争,中国人不会信任他指挥舰队。如果为了英国的利益的话,他可以暂时放弃自己的国籍。在他看来,中国人迟早会因朝鲜问题与俄国开战,而日本会站在俄国一方。首相让他找海军大臣汉密尔顿勋爵谈话。^[123]琅威理于3月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返回中国。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4日,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来远”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琅威理、林泰曾、刘步蟾督带“定远”、“镇远”、“超勇”、“扬威”在香港维修。3月6日,“定远”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北洋海军提督旗图形为黄灰黑蓝红五色,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124]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3月7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125]制四色旗自然是调和折衷之语。但李鸿章的电报,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舰队远航西贡、新加坡、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威理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请求。

琅威理回国后,逢人诉说其在华受辱。8月18日,驻英大臣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退全体在华英籍人员。薛问“能否转圜,邦交有益”。^[126]20日,英国公使华尔身向李鸿章询问琅威理辞职缘由。李鸿章否认与英国首相约定琅威理与丁汝昌平行。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127]22日,他又致电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

达。似与邦交无涉”。^[128]

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请求,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诺加,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129]中英之间的海军合作关系进入低潮。

探究琅威理在中国的贡献和结局,对于研究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国家对华兴建海军的态度显然是有典型意义的。《海军大事记》的作者池仲祐认为,“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而军中上下公牍,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人言之,中国海军显有中英两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提督,两总兵也。”琅威理因撤旗事件“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把琅威理辞职,仅仅看做他本人没有弄清自己的地位。^[130]事情显然没有这样简单。

就英国政府而言,派遣海军顾问,其目的是既想控制中国海军,又要抵制其他国家在华势力的扩展。早在1880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便向国内报告,美国上届总统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正在被提名,“当然这是美国使馆的花样”。“美国人如果能干的话,非常可能颠覆这个国家。”他还提到德国公使巴兰德的一个舅爷也被提名。威妥玛说,改组中国军队之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一个国家手中。而如果我们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131]1881年10月,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到,李鸿章可能任命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担任北洋海军的总司令,法国人则在推荐戈威因和努瓦康担任这一最高职,而英国领事馆和公使馆则阻挠他控制中国海军的活动。他愤愤地写道:“该死!该死!!该死!!!”但又透露“目前是哥嘉和葛雷森在掌权,海关的控制是牢靠的”。^[132]1882年春,金登干密函英国外交部官员庞斯福德和海军上将凯古柏,要求英政府支持向中国派遣海军顾问的请求。外交部立即请海军部同意这个要求。然而海军大臣答复说:“中国如有强大海军,对我们是否有利,尚有疑问。”经过争论,海军部才给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对英国政府的这种拖拉作风很不满意。他再次抱

怨说:为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他已奋斗了25年。假若他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手中“一般都掌握有最长的一组同花牌和最后的王牌,应该打赢;但是我的搭档——英国官场——忘记已出了什么牌,记不得别人有什么牌,有牌不跟,不叫王牌等等,虽然我们第十三墩得分,对手还是能赢决胜局”。^[133]

中法战争后,赫德更露骨地对金登干说:“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想抓到海军领导权,但我保持海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中国需要琅威理:那么好的开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必促他来华!”^[134]琅威理重返中国是由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向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提出来的。当琅威理到达上海后,赫德并不清楚清政府对琅的安排,但他却极为关注。他说:“琅威理也许出任水师衙门的总查或总海军司。如果他谨慎从事,一定会前程无量。”他告诉金登干,丁汝昌“竭力要把琅威理掌握在自己之手,可是我已电告琅威理在事情未在天津妥善定局之前,不要同这位能说会道的老君子打成一片”。^[135]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在领导权是在我们手中,但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我国的利益,我们应当继续将它掌握在我们手中。”^[136]

在赫德和金登干的活动下,英国政府对琅威理来华就聘开了绿灯。海军部1885年10月要求琅威理立即动身前往中国,琅威理对通知的“命令”口气感到不快,因为他妻子即将分娩。现在尚无证据证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琅威理更像是一个固执地注重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对于工作也极端负责的英国职业军人。但以上引文,集中表述了英国政府以及赫德等人企图通过琅威理,对中国海军以及对中国政府产生更大影响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撤旗事件的处理,表明中国官方的正确立场,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李鸿章努力保持舰队不受外籍雇员的控制,在必要时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回答要挟。这些都是可取的。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员同清政府

仅仅是雇佣关系,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力。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此。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近代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刘步蟾与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事实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进口炮艇来华后,北洋水师官兵已与外国雇员发生过类似冲突。李鸿章曾在给吴赞诚的信中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137]琅威理是一个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他的管理风格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在1889年8月,有谣传说丁汝昌即将退役,而丁本人也认为他的继任者无法与琅威理共事。^[138]这话是空穴来风吗?谁是丁汝昌的继任者呢?老海军军人中,有人认为琅威理是侵略主义者,供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刘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国多年,深悉交际和交涉的窥要,看琅威理不过是番将客卿,并不是上级领导。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是以琅威理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由此引发撤旗事件。还有人说,赶走琅威理是中国海军军官的计谋。“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众将怀安,进谗于李傅相(鸿章)面去之”。^[139]事实上,确实有理由作此怀疑。自从《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琅威理岂会不知道舰队只有一个提督,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荣誉衔的顾问?问题在于,如果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撤旗举动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受到侮辱,事情才会转向责问李鸿章能否给他放一个实缺上来。

尤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赫德后来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140]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作为对比,日本海军也是英国人一手训练起来的。皇家海军的英格斯上校为日本海军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141]英格斯本人回忆说,他在日本服役时,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与日本的高级将领接触。^[142]日本海军从英国人的教育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他们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时,欧洲军官便体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143]对于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海军,没有理由简单地认为,列强对中国就是要控制,对日本人就是要扶持。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人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并从中探寻有益的启迪。

六、跛足而行

自从朝廷做出了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的战略决策后,中国的海军事业便出现了跛足而行的不平衡现象,因为这一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牺牲其他地区海防建设,来保证京师安宁的构想之上的。但是,即便对于北洋海军这朵娇纵独放的花朵而言,它的成长也是屡经风雨,渐成畸形,终究没有结出人们长久期待的果实。

朝廷把北洋海军看做维系其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的重要支柱,广泛运用于镇压国内人民反抗。1888年夏,台湾吕家望番社起事,清军镇压未能平服。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要求下,李鸿章派

丁汝昌率“致远”、“靖远”前去镇压。两舰8月28日到达台湾卑南,除了担当送信、探事任务外,还将“致远”舰炮卸下,运至陆路,协助清军进攻。^[144]邓世昌因此擢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145]1889年底,北洋海军南下避冻时,刘铭传再次请求“致远”、“靖远”协助恒春“剿番”。^[146]1891年秋,长沙哥老会起义,重庆、芜湖、镇江教案迭出。李鸿章又派“经远”、“靖远”前往上海驻防镇慑。^[147]以往有些论者只强调北洋海军的对外反侵略功能,而回避其作为封建国家机器维护统治秩序的事实,这种态度其实大可不必。

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发展更为艰难,只是在1890年新装备了一艘国产巡洋舰“平远”号。1891年6月,李鸿章、张曜巡阅北洋海军,奏请在胶州、烟台添筑炮台,方获皇帝允准,旋又接上谕转发户部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李鸿章大感失望,他写信给云贵总督王文韶抱怨说:“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148]又在奏疏中说:“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149]

主持户部这一决策的,是户部尚书翁同龢。翁同龢,是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的师傅,在中法战争后,又成为后清流的领袖。作为一个官僚,他在伺候慈禧太后的种种非分财政开支方面,不像前任阎敬铭那样耿直不阿;作为正统士大夫的魁首,又有强烈的忧国忧民责任感,常常成为洋务派的掣肘。翁同龢后来辅佐皇帝变法,在历史上留下了声名。但这次停购外洋枪炮的决策,却给海军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听到停购外洋兵舰的消息后,也顿足叹道:人方基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户部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曾这样为自己辩护:

查光绪十七年四月间,臣等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藉资弥补。前此既未尝议停,后此亦未阻购办。况自限满,迄今业已一年有余,新疆、甘肃、福建、安徽、湖南等省皆有购办大批外洋枪械之案,

湖北则有添购外洋炼铁机炉之案，而北洋独未购办，是必该省船械足用，无待外求，非因部章为之限制亦可知矣。且查北洋历次报部销案，多与例章未符，一经奏请，均系照案核销，臣部并未拘以常格。^[150]

就事论事，户部的解释写得滴水不漏，李鸿章对于光绪十九年下半年以后为何不要求购舰，却没有做过什么解释。可能在他看来，即使提出购舰也是白说。他明白，此时户部在财政上首先要保证的，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各项费用开支。他犯不上在这节骨眼上去争论购船经费问题。

周馥《自订年谱》中形象地概括了争斗中双方的心态：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飭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余复力言之，相国嗟叹而已。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余起病召见，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措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在户部竟如此！”^[151]

从李鸿章这方面言之，对于长年拨付给他的海军经费并没有用好。有个外国人揶揄说，有许许多多府台、道台以及诸如此类的官员栖息在中国海军的索具上。^[152]事实上，栖息在中国海军索具上的外国人也不少。另一位观察家注意到，“常年有许多买卖的

代理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其中有出卖枪炮的人;有出卖回轮手枪、军需品、剑、马兵装备、步兵装备、炮兵装备、药品、外科器具、膏药、裹伤纱布、绷带、病院设备、帐幕、旗子、火药与炸药的人。”为了达到推销商品的目的,他们和李鸿章的“部属及翻译结交朋友,他们贿赂李的幕客和门房。他们拜会李的厨师,奉承他的理发匠。他们寻求领事甚或外交官们的援助。他们花了钱,有时是斯文地送些贵重的礼品,有时是更直接更粗鲁地进行贿赂”。^[153]

北洋海军官兵都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头几年的歌舞升平气氛中,纪律明显松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154]然而事实上却非如此。我们从方伯谦自订的《益堂年谱》中得知,他于光绪十一年在福州朱紫坊购下房屋,十三年五月盖威海屋,十四年四月又在威海盖“福州式屋”,八月盖烟台住屋,十一月落成,次年春“搬入住”。十七年二月,又记有“刘公岛寓”。^[155]从实际情况来说,不允许高级军官在岸上建立个人住宅显然是不人道也是不现实的,但造得如此之多,却显示出方伯谦确实有钱。同时,他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分别金屋藏娇。《北洋海军章程》颁布于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此时琅威理正在军中,说明就在北洋舰队管理得最为严格的时候,违规的行为依然各行其是。琅威理离开舰队后,将士们纷纷移眷刘公岛,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156]丁汝昌本人更是在岛上起盖铺屋出租,收取租金,并同方伯谦在出租房产之事上发生龃龉。甚至与方伯谦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157]丁汝昌还自蓄家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158]

其实早在1882年,袁保龄私下就曾告诉张佩纶:“现在任事者,黄呆而坏,丁浮而贪,恐非徒无益而已。津中诸同人惟海关周玉山观察及章琴生太史尚关心此事,亦极言两人之不胜任”。^[159]此处黄指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当年办理旅顺工程局,因为“任

性乖张”而被撤职。丁即指丁汝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160]此时袁保龄从京中调往北洋方才一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汝昌不是合适的海军领导人选，但不知为何，作为主要幕僚，他和周馥都未能将此看法影响李鸿章的决策。

毫无疑问，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简单地说是陆军将领出身而任海军提督就是一大错误并不公允。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从军舰弹药、燃料保障、航道疏浚，到人事调动，薪水发放等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却是不争之事实。1888年6月，北洋海军派舰参与镇压台湾吕家望番社起事，事定之后，各地要求在请功奏折中附带保荐各自子弟亲朋的开后门信件纷至沓来，如九秋落叶，扫却不尽，丁汝昌告诉台湾巡抚刘铭传：“故每有托函当即婉谢，怨讟之言所不敢计也。”然而他自己，也写条子给刘：“余中子年已及冠，虽经童试，难以成名。昨承友人顾念，为捐江苏县丞，拟恳宪台附入后山案内，赏保一阶。……第以晚年一线之延，得不代图地步，为日后生发之路。”^[161]虽是舔犊之情，反映的是清朝军队立功奖励制度的失范，每次庆功请奖，必然滥用权力，夹杂进大批无关人员，与朝廷玩一场移花接木的游戏。当事人明知别人无耻，却轻易地原谅自己。奖惩制度被褻渎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就一钱不值。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习成风，视为故态。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官兵淫赌于香港。北洋海军还用军舰载客跑运输挣钱，甚至利用军舰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162]另外，军舰应发之饷，应备之物，例由各管驾官向支应所领银包办，弊端由此而生。各船每月包干的数百两行船公费，为购置灯油、机器房车油、棉纱绳，以及油船所用，管带常私扣归己，致使船舱机器擦拭不勤，零件损坏，大炮生锈。^[163]吴趼人在小说《二十年目睹怪现状》中揭露，南洋兵船在上海一家专供兵船物料的铺家买煤，账上记一百吨煤价，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管带就贪污那余下的煤款，所以“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地席丰履厚起来”。这种

情况,北洋海军自然也不能避免。人们常说腐败源于收入太低,因此应当高薪养廉。但实际情况是,北洋海军将领,这些受过正规西式教育和训练的学生官们,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第一批受到最好的启蒙培养的先行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忧国忧民之心。但在国家优渥的待遇下,他们在经济上却贪婪不止,出现的是结构性和共生性的腐败。究竟何等高薪才足以使他们束手呢?政治学研究表明,产生腐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论或收入低来概括,究其实质,权力造成腐败才是不争的事实。越是有钱越是腐败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屡见不鲜,因此需要以制度和监督来限制。

我们进一步探究,不难发现,李鸿章早在创建淮军的时候,就不注重曾国藩建湘军时所倡导的“忠义血性”精神养成,只注重用粮饷来驱使官兵。创建北洋海军的时候,他注意了新装备的引进和开设新式院校,意识到未来的海军军官不可能从旧式水师将领中选拔,只能在学堂毕业生中选用,并力主把学生送到国外留学。对于因生计的原因进入海军院校的师生,他也能理解他们期望科举获得正途的苦心,特地奏请朝廷允许其参加乡试。在制定《北洋海军章程》时,努力为海军军官争取到很高的个人报酬。他对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的学生极为稔熟,视之如子弟,关注着他们一步一步地成长。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因嫖妓与日方发生冲突。事后李鸿章说:“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164]对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大。但最终,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和激励,养成其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传统和必胜信念,这支用新装备包裹起来的军队中的许多人,在封建军队的酱缸里,迅速地被同化了。袁保龄在世的时候,曾担心“闽材辈出,学力不懈,几几争胜泰西。而‘忠义廉节’四字似未专力讲求,大本未立,恐盘根错节,心志不能不变。数年来辍戎事之末,窃以此事为忧,有心人当早计及之矣”。^[165]此言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舰队内部人事关系也趋复杂。闽人小圈子排挤非闽系的矛盾

已闹得公开化了。甲午战前,有人控告广东籍高级将领,“致远”管带邓世昌鞭挞水兵致死。据说邓世昌平时“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刘步蟾力主追查,因找不到死者的尸体才被丁汝昌压了下去。^[166]

总之,仔细观察北洋海军,便不难发现,这支新型舰队在封建毒素侵蚀下,正在日益腐朽。这样的军队,在和平年代,还算是一种摆设,而当风云突变,它能打胜仗吗?

北洋如此,南洋又如何呢?

中法战争后,两江总督曾国荃有过发展南洋海军的宏大计划。1885年7月,他在“遵旨筹议海防折”中,开出了应购数十艘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的一揽子清单,请由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诸省分年协款。为了加速海军建设,还要求在二年内借洋款240万两以供购舰之需。然而上谕却说,借洋债以购兵轮,究非长策,着另筹办法具奏。^[167]这样,购舰之事便被搁置起来。以后,朝廷决定先发展北洋海军一支,南洋海军的发展便遥遥无期了,除了将这年秋天江南机器局建造的“保民”号军舰编入现役外,十年里未添一艘作战舰艇。1886年3月17日早晨7时半,“横海”舰又在澎湖古贝地方遇雾沉没,原来已粗具规模的南洋兵轮船,从此只能苟延残喘了。

按照规定,长江下游的新式兵轮船统归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总统,但李成谋并不管事。1888年奏定的《北洋海军章程》规定:

现时南洋兵船尚少,未定经制,亦未设有专管提督。每年节过春分以后,凡南洋兵轮船如“南琛”、“南瑞”、“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类能海战者,应由海军衙门调归北洋合操,即暂归北洋提督节制,逐日督同操练,视如北洋兵船一律办理,不得稍分畛域,并就近由北洋大臣随时阅操……节过秋分以后,南洋兵船仍回南省各岛巡练。^[168]

南洋军舰每年中竟有一半时间归北洋节制。

1889年春,根据章程的要求,曾国荃派轮船营务处开复提督

衔暂行革职总兵吴安康率领“南琛”等6舰赴北洋合操。南北洋军舰混合编队,在北洋、朝鲜沿海、海参崴一带进行操巡。次年5月24日,曾国荃正式奏请任命吴安康为六船统领。^[169]8月16日,曾国荃又奏,李成谋因有长江五省水师之责,自上年以来,商请另行派员总统南洋各号军舰,请派布政使衔前山西按察使陈澍暂行总统。^[170]陈澍是湘军老将,对于近代海军并不熟悉。10月12日,李鸿章、曾国荃又联名奏请开复吴安康暂行革职处分,殊批允准。^[171]11月22日,曾国荃去世。他担任两江总督近七年,对南洋海军发展无甚建树。

1891年5月16日,署理江督沈秉成奏,以记名提督前安徽寿春镇总兵郭宝昌接任南洋兵轮船总统,裁撤前设统领名目。南洋可供海战6舰,分为左右翼。袁九皋任左翼翼长,统带“南琛”、“镜清”、“保民”并兼带“南琛”舰,吴安康任右翼翼长,统带“寰泰”、“开济”、“南瑞”并兼带“寰泰”舰,均受总统节制调遣。^[172]

曾国荃死后,刘坤一三下江南,出任江督。他注意到南洋兵轮船岁支薪粮银40余万两,修理煤油之费10余万两,而“船多苦窳,徒涉虚糜”,便饬令郭宝昌同左右翼长及各管驾官认真检查,“何船亟须整修,何船可以改造,何船必应全换,以及炮位是否与船相称,可否彼此互易以期合宜,详细禀候核办,不得含糊迁就”。通过检查判定,“寰泰”、“镜清”、“开济”3舰工料坚致,“保民”次之,“南琛”、“南瑞”又次之。“龙”、“虎”、“霆”、“电”4炮艇,质本单薄,舰龄又长,估计在实战中难以应敌。将“威靖”、“测海”2舰改作运输舰,“登瀛洲”改为练习舰。^[173]设立练勇学堂,招募练勇120名,并着重提出训练问题,准备招募外国教官。刘坤一的这些主张,得到主持海军衙门的庆郡王奕劻的支持。这年7月,海军衙门大臣、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南洋6船装备太差,遇有战事,断难得力。不如收停厂澳,每年节省50万两开支。期以10年,另建铁甲坚船。庆郡王复议指出:“南洋各船练习有年,历经北洋调阅合操,已著成效。现在北洋一支业已练成,南洋自当次第兴办。”故不同意将军舰全停的说法。事实上,从国防的观点看,将南洋全部

军舰裁撤10年,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经过讨论,庆郡王提出仅将“龙”、“虎”、“霆”、“电”4炮艇暂行裁减,所省开支专款存储,以供添置新舰。^[174]此后,刘坤一又将“溲海”舰及早已裁撤停泊在上海的“金甌”舰调拨湖北使用,将南洋议裁之“福安”轮调拨安徽使用。^[175]截至甲午战前,南洋兵轮船总吨位仅约14000吨。

9月4日,皇帝命刘坤一帮办海军事务。^[176]

年底,刘坤一给各舰高级军官发出通知,要求各营将弁认真整顿,协同训练,加强纪律。1892年1月17日,刘坤一又奏,南洋酌裁兵轮人数薪粮,轮船总统一差暂行停止。各军舰责成两翼长督率操防。^[177]这一系列协调动作,都是为了强化他本人对南洋兵轮船的全面控制。

按刘坤一的设想,南洋应订类似“致远”级的巡洋舰2艘,配以鱼雷艇和原有兵船,分布长江中下游。他与李鸿章书信往返,讨论购舰事宜,李鸿章建议他吸收当年左宗棠订购“南琛”、“南瑞”时完全交给外国代办的教训,仿效北洋委派李凤苞、曾纪泽、许景澄等外交官直接进行购舰谈判的经验,并从船政局借用监造人员。然苦于经费无着,延至1894年初,才决定向德国订购4艘鱼雷艇。其中在伏耳铿船厂订造2艘,后来命名为“辰”字、“宿”字号,艇排水量90吨,马力700匹,航速18节。配有鱼雷发射管3个,哈乞开司1磅炮4门,“宿”字艇另配12毫米口径炮2门。在什好船厂订造2艘,后来命名为“列”字、“张”字号。二艇排水量62吨,马力900匹,航速16节。配有鱼雷发射管3个,哈乞开司1磅炮4门,总计合银40余万两(含运费、保险)。^[178]这4艘鱼雷艇第二年冬天运到中国时,中国已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大变局,原先臃肿如云的北洋海军早已灰飞烟灭,海军衙门也被解散。所以南洋次第兴办第二支海军,从此成为空话。

南洋如此,等而下之的广东又如何呢?

清流健将张之洞1884年由山西巡抚升署两广总督,因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国军队,名噪一时。他悉心经世致用,逐渐

成为洋务派的头面人物。督粤五年余,他对广东地区的海军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广东曾是清朝水师力量最强的地方,但这里的水师如何向近代海军转化无人问津。按说闽粤皆属南洋,但南洋大臣鞭长莫及。中法战争后,张之洞采用了自筹资金的方法,在夹缝中艰难地迈出了更新改造广东水师的步履。

同曾国荃一样,张之洞在1885年10月也开出了海军发展的一揽子建议。他主张建设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舰队,而粤洋海军,拟配铁甲舰3艘,铁甲鱼雷舰6艘,分成三队,合为一军。他要求朝廷每年从洋药税厘中拨出专项经费80万两,期以五年,完成建军计划。^[179]正是在他拜发此疏的同一日,朝廷宣布了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的决定。张之洞的这个计划遂成画饼。

当李鸿章借着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的令箭,迅速膨胀他的舰队的同时,张之洞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两广有种赌博,专猜闹场考试的士子中试的姓,称作“闹姓”。每逢试年,“闹姓”赌票不下千数百万。官方对此先为禁止,旋即开禁,从中抽税,收入甚丰。1885年,张之洞从闹姓捐款内提银30万元,交署理广东水师提督方耀,采用香港洋船厂图式,建造了“广元”、“广亨”、“广利”、“广贞”4艘浅水炮艇。^[180]这些军舰的功率在65~78匹马力,性能也不先进,但适用于广东海口、内河使用,且造价低廉,制造容易,所以张之洞的兴趣十分浓厚。他还让署理广州协副将邓安邦、顺德协副将利辉等邀集文武官绅捐资造舰,自1886年至1888年,集资42万两;飭盐埠各商竭力襄助,三年内集银38万两,共计80万两;计划在福州船政局建造8艘军舰,又在黄埔船厂自制2艘浅水炮艇。^[181]至1891年,先后制成“广甲”、“广乙”、“广丙”、“广戊”、“广己”、“广庚”6艘。在此期间,黄埔船厂还制成“广金”、“广玉”2艘550吨级的炮艇。张之洞1889年9月调任湖广总督,他的后任李瀚章对于这种自筹资金实现旧式水师装备向近代海军转化的计划兴趣不大,其他军舰的建造便被停止了。

6年中,广东共制军舰12艘,总计排水量约7000吨,尚不及北洋“定远”一艘。1887年春,海军衙门曾令张之洞将所造“元”、“亨”、“利”、“贞”4艇开赴天津试操察看,张之洞回电称,四船只能行驶内河及浅洋近岸。曾到汕头,因遇风,行驶已甚勉强。开往闽洋、北洋自更困难。对此,海军衙门十分惊讶,指出倘若这样,遇事只可守不能战,虽多何益?不如裁小养大,“庶海战有资,不必专恃外援”。^[182]

张之洞解释说:广东现有兵轮大小共29艘,除分拨各营、县捕盗外,在省河仅14艘,“皆只能充缉捕转运供差之用,无一兵轮,虽守口亦不足。故上年创造四浅轮,聊备守御。现拟续造船只较大、能出海助战之兵轮,可赴北洋阅看”。字里行间,可见广东局面之狭促。张之洞又说:“粤欲造舰而无款,经费系零星捐凑,不动正款,并设法十分节省,始克奏办。”^[183]这里说的确是实情,以致后来甲午之战,“广丙”舰在刘公岛投降,有人竟向日本提出,“广丙”不是北洋军舰,希望日军能予归还,遂成笑柄。这个故事从某种角度反映出广东地区海军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它发展过程中,全然未得海军衙门在财政上的帮助。

广东可供出洋作战的军舰仅“广甲”、“广乙”、“广丙”3艘。1891年,“广甲”开赴北洋,参加了李鸿章的校阅海军活动。1892年李瀚章又派副将余飞雄统帅3舰赴北洋随同操练,以提高驾驶及作战水平。^[184]广东新式军舰数量少,吨位小,没有集中统一指挥的机构,依附于旧式广东水师之中,将其称作“广东海军”是不确切的。

至于福州船政局所属轮船,在中法战争中覆灭之后,始终没有恢复起来。战后所建军舰,留局的仅“福靖”1艘,距离建设一支独立舰队的要求更为遥远。

总之,朝廷1885年后开始奉行的先建北洋一军的方针,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大量的金钱、舰只集中于北洋,使北洋海军后来居上,实力最为雄厚,但又进一步造成淮系尾大不掉,李鸿章拥兵自重的局面。跛足而行,也使海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

显然,朝廷和洋务派首领对于近代海军这一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战略打击、威慑和防御力量认识得很不充分。依然囿于旧式水师划疆而守、分地设防的特点,指望分战区逐步完成装备更新,使旧式水师变为新式海军。这在湘淮两系控制地方军权的情况下,必然引起争夺,并使新创建的海军也成为地方势力的附属物。

注 释:

[1] 李凤苞从留学生监督转任出使大臣后,屡遭弹劾批评。有人说他为负贩小夫,钻营保荐。在国外不守定制,挟妓出游。见李鸿章:“查复李凤苞被参各款”(光绪九年正月二十日),《李集·奏稿》,卷四十六,页一。有人说他所订之船质量窳劣,甚至从“数百万巨款一人开支,难保无收受花红等弊”开始推测,发展到参奏其“购买铁甲船二只,价三百万两,以二成折扣,侵吞六十万金以肥己囊。又闻包修船屋糜费巨款数十万两,将来船之好坏不可知,而该员已盈箱充橐”。见张佩纶:“遵查出使大臣李凤苞参案折”(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涧于集·奏议》,卷六,页二十;“内閣学士尚贤奏各国照会洋字译译往往错误请照会各国令其译就汉文并参奏李凤苞等片”(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六日),《中法交涉史料》,卷十八,页二十四。甚至在相隔10年后,还有人说他在购买“定远”等三舰时,“与洋员金惜理朋比为奸,侵蚀至百万上下。‘济远’原价三十万,报销六十万。”见“福建监察御史安维峻奏请慎购快船片”(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九,页三。李凤苞人品不算很好,在购舰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贪污数十万,上百万两之说,显然也是言过其实的。“定远”造价37万镑(约合银140万两),应当说是很便宜的。参见本书第二章注[129]。很难设想在二条军舰的订货中能贪污如此巨款。至于说是德方给的回扣,数目也过于惊人,等于白送了一条2000吨级巡洋舰(“济远”造价为68万两)。德国人在竞争军舰订货时,似不至于下这么大的贿赂。英使威妥玛则另有一说。他怀疑德国政府在偷偷负担二条铁甲舰的部分造价,以图一方面刺激重工业,一方面增加它在远东的政治影响。见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第220页。又,《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七称,李凤苞“经手在伏尔铿厂购铁甲船二艘,然以婪取多,恐运至中国必被觉察,乃密存伦敦英国大银行。共约四千镑。又恐持取票据或致查出,乃仿四法于交款之时,使银行主人书一字于己掌中,旋即抹去。约取款时,必须取款人能将此掌中所书字写出,方准给付。后李回华……已而死,遗嘱中忘将此事写明,其子钟英托人至银行关说,欲提取此款。行主人曰,必须如约能书掌中字则付,否则不能,但可

取利。于是此巨款竟不能至华云”。录之备考。

[2] 许景澄：“验收济远钢舰片”(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四日)，《许稿·奏疏》，卷一，页七。

[3] 许景澄：“致朱亮生观察”，《许稿·书札》，卷二，页七。

[4]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22页。

[5][7][10] 王詠霓：“与重黎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利病书”，《于湖题襟录》，第三册，第168页。

[6] 《许稿·日记》，页十四、十五，乙酉十月十八日，丙戌二月二十一日条。

[8] 李鸿章：“请辞退英厂快船兼论法事”(光绪九年五月十三日)，《李集·译稿》，卷十三，页十三~十四。

[9]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29页。

[11]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太仆寺少卿延茂片”，《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6页。按王詠霓写信日期是8月19日(七月初十日)，恰是3舰启航的一个半月后。许景澄为防止军舰到华验收时发生意外，先做布置也是有可能的。

[12] 李凤苞是1885年回国述职的。10月，李鸿章以“定远”等舰将抵北洋，奏请将李凤苞调赴北洋。得旨“李凤苞着交李鸿章差遣委用。仍随时察着，如不得力，即行奏撤”。见《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十五，页七。李凤苞不久革职返籍，篋中存有在欧洲翻译的《陆战新义》、《海战新义》、《布国(普鲁士)兵船操练》、《铁甲船程式》、《美国兵枪法》、《各国水雷鱼雷制》、《雷艇图说》、《城堡新义》等手稿，拟自行出版。旋因长期劳累，终于病倒，1887年8月7日去世。见民国《崇明县志》，卷十二“人物·宦迹”，卷十六“艺文”；俞樾：“三品卿记名海关道李君墓志铭”，《春在堂全书·杂文四编》，卷二，页三十一。

[13] 李鸿章：“报验‘济远’兼陈军舰避冻”(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李集·海稿》，卷一，页一。

[14] 许景澄：“译录与德国伏耳铿厂原订造船合同”，《许稿·附录》，卷十二，页二十六~二十七。

[15]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28~131页。

[16][23] 奕谟：“致军机处”(光绪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清醇亲王信函选》，《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17] “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懿旨”，《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5页。

[18] 李鸿章：“复曾劄刚袭侯”(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六十一。

[19] 李鸿章：“定造快船报销折”(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集·奏

稿》，卷六十五，页九~十七。

[20] 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69页。

[21] 《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四辑，第917页。

[22] 李鸿章：“寄柏林许使”（光绪十三年正月廿六日），《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791页。

[24]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十六，页六，光绪十一年九月甲寅条。

[25] “海署致台湾刘省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910~911页。

[26]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六，页九，光绪十四年六月甲辰条。

[27] 《北洋海军章程·考校》，十四款本。

[28][30] 《北洋海军章程·升擢》，十四款本。

[29][37] 《北洋海军章程·船制》，十四款本。

[31] 李秉衡：“奏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李秉衡集》，第295页。

[32] 《北洋海军章程·俸饷》，十四款本。

[33] 关于绿营贪污及当时社会阶层收入的比较研究，参见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第64~94页。

[34] 《北洋海军章程·武备》，十四款本。

[3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第2536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壬戌条。

[36] 李鸿章：“海军要缺拣员补置折”（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李集·奏稿》，卷六十四，页一~十三。

[38] 《北洋海军章程·水师后路各局》，十四款本。

[39] 李鸿章：“论旅顺布置”（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李集·海稿》，卷一，页十七。

[40] 俞樾：“三品卿记名海关道李君墓志铭”，《春在堂全书·杂文四编》，卷二，页三十一；民国《崇明县志》，卷十二，页四十七。

[41] 李鸿章：“议造铁舰并留戈登”（光绪六年六月十五日），《李集·译稿》，卷十一，页十三。

[42] 李鸿章：“复黎召民京卿”（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六、十二。

[43] 李鸿章：“订购快船来华折”（光绪七年十月十一日），《李集·奏稿》，卷四十二，页十八。

[44] 郑观应：《易言·论水师》，《郑观应集》，上册，第129页。

[45] 丁宝楨：“筹办海防折”（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丁文诚公奏稿》，卷

十二,页十二。

[46] 李鸿章:“出洋巡阅情形片”(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七日),《李集·奏稿》,卷五十,页九。

[47] “刘含芳查勘胶州湾条陈”,《李集·海稿》,卷一,页二十六。

[48] “琅威理布置胶澳说帖”,《李集·海稿》,卷一,页二十六。

[49] 朱一新:“敬陈海军事宜疏”(光绪十二年六月),《佩弦斋文存》,卷首,页十九。

[50] 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郑观应集》,上册,第757-758页。

[51] 王毓礼:“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历史沿革”,《清末海军史料》,第156-158页。

[52] 李鸿章:“验收旅顺各要工折”(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集·奏稿》,卷六十九,页三十一-三十二。

[53] 关于黄瑞兰情况,参见李鸿章:“黄瑞兰不堪任用片”(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集·奏稿》,卷五十一,页五十四;“复张振轩制军”(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李集·朋稿》,卷二十,页二十六。

[54] 袁保龄:“致吴仲悻同年”,《阁学公集·书札》,卷一,页三十九。

[55] 袁保龄:“致丰润”,《阁学公集·书札》,卷一,页四十二。

[56] 袁保龄:“致海关观察”,“致张篔石姊丈”,《阁学公集·书札》,卷一,页五十二;卷四,页十七。

[57] 袁保龄:“南坝陡壘抢护补救情形禀”(光绪九年十月初七日),“旧坝塌卸堵闭合龙禀”(光绪九年十月二十日),《阁学公集·书札》,卷二,页三十六-四十,卷三,页二-四。

[58] 袁保龄:“致周玉山观察”,《阁学公集·书札》,卷二,页十七。

[59] 袁保龄:“复张中丞”,《阁学公集·书札》,卷四,页四十七。

[60] 袁保龄:“致高勉之”,《阁学公集·书札》,卷四,页四十九。

[61] 关于法国辛迪加承包工程的有关情况,见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123-128页。

[62] 李鸿章:“旅顺兴办船坞片”(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验收旅顺各要工折”(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集·奏稿》,卷六十二,页七十一;卷六十九,页三十二。

[63]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79页。

[64] 李鸿章:“请添威海大连湾水雷折”(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七十二,页九。

[65] 李鸿章:“刘含芳兼管营务片”(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李集·奏

稿》，卷七十七，页十五。

[66] 李鸿章：“奏保刘含芳等片”（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八日），《李集·奏稿》，卷七十三，页三。

[67] 张士珩：“书从兄文宣死难事”，《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325～327页。

[68] 秦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录》，《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55页。

[69] 林乐知、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汉纳根军门语录》，卷七，页四十一。按，关于基地问题，见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第420～440页。

[70] 马建忠：“上李傅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事”，《适可斋纪言》，卷三，页一。

[71] “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奏”（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575页。

[72][74] 《北洋海军章程·考校》，十四款本。

[73] 《北洋海军章程·升擢》，十四款本。

[75][86] 李鸿章：“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李集·奏稿》，卷七十二，页三～四。

[76][80] 余思诒：《楼船日记》，卷上，页五～六。

[77] 杨根有：“北洋海军的教科书《电气水雷问答》”，《文物天地》，1990年第2期。

[78][81] 英国战船部原书，傅兰雅口译，徐建寅笔述：《水师操练》，卷首，页十五及全书各卷。

[79][82][83] 《北洋海军章程·简阅》，十四款本。

[84]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2107页，光绪十二年五月癸巳条。

[85] 刘坤一：“致李中堂”（光绪二十年二月），《刘集》，第五册，第2079页。

[87] 戚继光：《纪效新书》，第17页。

[88][92][96] “张哲深呈文”，《盛档之三》，下册，第398、399页。

[89][99] “高承锡呈文”，《盛档之三》，下册，第407页。

[90][91] “沈寿堃呈文”，《盛档之三》，下册，第403页。

[93][101] 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第880、877页。

[94] “李鼎新呈文”，《盛档之三》，下册，第411页。

[95] 袁保龄：“致袁世凯信”，《袁氏家书》，卷六，页二十五～二十六。

[97] 周馥：《周恂慎公全集·自订年谱》，卷上，页二十七。

[98] “来远舰水手陈学海回忆”，戚其章：《北洋舰队》，附录，第212页。

[100] 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盦全集·海外文编》，卷二，页十八。

[102] 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70页。按，关于海军训练，见姜鸣：“北洋海军训练述论”，《东岳论丛》，1986年第6期。

[103] “金登干致赫德”（1881年11月25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663页。

[104] 葛雷森离开北洋水师的确切时间不详。光绪十一年丁汝昌在给的一封信中说：“自分手后，曾寄信四五次，当均收到。从去年下半年未得来信。……昨奉一信，知阁下已到上海……去冬中堂商总税司，电约阁下来华。中堂并有信来，云阁下到北洋水师，应办何事相宜，着昌议复，昌愿先与阁下面商再禀，方为妥善”。丁汝昌：“致西友葛雷森”，《丁汝昌集》，第42页。从丁氏函稿存底的排序看，应在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二日之前，则葛雷森约在1884年已离开中国，1885年初又返回。其后仍在海关工作，1890年10月6日病逝于英国。

[105] 参见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集·奏稿》，卷四十八、五十八、六十一；王家俭：“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载《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74页。

[106] 李鸿章：“海防收支清册”（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李集·奏稿》，卷六十四；王家俭：“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载《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74页。

[107] 李鸿章：“海防报销折”（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李集·奏稿》，卷六十七；“光绪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奏片”，《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159、165、178、183页；《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156页，第六册，第43页。

[108] 李鸿章：“条议海防”（光绪五年九月十一日），《李集·译稿》，卷十，页六。

[109][130][147]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85、490、492页。

[110] 见李鸿章：“寄沪局译交提督衔琅威理”（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复丁琅两提督”（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等，《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763、766页；及《海军衙门函稿》第一册（未刊本）所载“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为呈复事”。

[111] 关于海军指挥旗的使用，余思诒记载：“凡同群水师必有督船。督船他往，次者代统之。两船同阵，亦必有一船统率。督船必悬主将旗。若小队一群

见大队督船主,立即撤旗放舢板登船进谒,此水师之通礼也。丁军门为北洋统领,凡在军门之次者,见督船自应撤旗。琅总理以恩赐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今虽至厦门,尚未交船,故仍悬督旗也。”见《楼船日记》,卷下,页三十。

[112] 余思诒:《楼船日记》,卷下,页八。

[113] 丁汝昌:“致袁(子久)观察书”(光绪十年),《丁汝昌集》,第34页。

[114] “北洋舰队水手谷玉霖的回忆”,戚其章:《北洋舰队》,附录,第209页。

[115] 林乐知、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英琅威理军门语录》,卷七,页二十九。

[116] 参见王家俭:“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73页。

[117] “赫德致金登干”(1890年10月17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五卷,第270页。

[118] 丁汝昌:“致周玉山观察”(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丁汝昌集》,第68页。

[119] 李鸿章:“台北交丁提督”(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1007页。

[120] “金登干致赫德”(1888年12月14日),《中国海关密档》,第四卷,第822页。

[121] “赫德致金登干”(1889年2月10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五卷,第20页。

[122] 比如1888年1月15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中说:“琅威理也在谈辞职,海军的大权很有可能要从英国人手中失去。”10月19日金登干致赫德的信中,又提到“要是琅威理辞职,您也许会来电告知,那我就可能去向庞斯福德爵士是否他知道有任何合适的人选”。见《中国海关密档》,第四卷,第678、803页。

[123] “金登干致赫德”(1889年11月11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五卷,第4~5页。

[124] 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戚其章:《北洋舰队》,附录,第230页。

[125] 李鸿章:“香港交水师总兵林泰曾等”(光绪十六年二月七日),《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205页。

[126] “英京薛使来电”(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二卷,第272页。

[127][129] 龚宪一:《李鸿章年(日)谱》,第226~228页。

[128] 李鸿章:“复伦敦薛使”(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272页。

[131][152] 季南:《英国对华外交》,第218、233页。

[132] “赫德致金登干”(1881年10月16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639页。

[133] “赫德致金登干”(1884年4月7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三卷,第511页。

[134] “赫致金第289号电报”(1885年10月17日),《中国海关密档》,第八卷,第503页。

[135] “赫德致金登干”(1886年1月24日),《中国海关密档》,第四卷,第280页。

[136] “赫德致金登干”(1886年11月15日),《中国海关密档》,第四卷,第422页。

[137] 李鸿章:“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三年九月初三日),《李集·朋稿》,卷十七,页十三。

[138] “赫德致金登干”(1889年8月24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五卷,第89页。

[139] 林献圻:“中国海军职业为何国人独多”,《清末海军史料》,第604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63页;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页。

[140] “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9月2日北京去函Z字第630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5页。

[141][143] See W. Laird Clowes; *The Nav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Navel Annual, 1895.* pp. 90-91.

[142] “金登干致赫德”(1894年11月23日伦敦来函Z字第909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03页。

[144] “丁镇由基隆来电”(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991、997页。

[145] “甲申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群公事略”,《清末海军史料》,第355页。

[146]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177页。

[148] 李鸿章:“致王文韶函”(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朋牍》,第十九册。

[149] 李鸿章:“复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八日),《李集·奏稿》,卷七十二,页二十八。

[150] “户部奏遵议李鸿章奏东征倭寇筹费为难各情请飭核实办理折”(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177~178页。

[151] 周馥:《周恣慎公全集·自订年谱》,卷上,页二十七~二十八。

[153] 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68~470页。

[154] 《北洋海军章程·官制》,十四款本。

[155] 方伯谦:《益堂年谱》,《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第535~538页。

[156] “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霖说:“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照常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见《盛档之三》,下册,第939页。

[157] 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21页。

[158] 《冤海述闻·大东沟海战纪实》,《普天忠愤集》,卷五,页二十五;又,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丁汝昌》,谓丁汝昌“自蓄家伶,费至三十万。辄犹万盏灯,一夕至八千金,将士和之”。见第348页。

[159][160] 袁保龄:“致黄斋”,《陶学公集·书札录遗》,页五、页二。

[161] 丁汝昌:“禀(刘)爵帅”(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七日)、“禀刘爵帅”(光绪十四年十月廿日),《丁汝昌集》,第105、103页。

[162] “墨贤理致赫德函第24号”(1887年1月10日),《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20页。

[163] 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第880页。

[164] 李鸿章:“复宁绍道薛”(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册。

[165] 袁保龄:“致水师学堂吕庭芷观察”,《陶学公集·书札》,卷四,页四十一。

[166]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第374页。

[167] 曾国荃:“遵旨筹议海防折”(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清末海军史料》,第42~45页。

[168] 《北洋海军章程·简阅》,十四款本。

[16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第2731~2732页,光绪十年四月丁未条。

[170] 曾国荃:“派委陈澧总统南洋兵轮船”(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三十二,页四十一。

[171] “李鸿章曾国荃奏请开复吴安康暂革处分折”(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末海军史料》,第565~566页。

- [17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第2884页。光绪十七年四月壬寅条。
- [173] 刘坤一：“筹办南洋防务考核兵轮及交通学堂折”（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酌改南洋兵轮片”（光绪十七年五月廿六日），《刘集》，第二册，第688、684~685页。
- [174] “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总理海军事务奕劻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615~617页。
- [175] “刘坤一片”（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光绪朝硃批奏折》，第六十五辑，第208页。按，该片中提及的“福安”轮船难以查考，名称恐有误。
- [176] 《清德宗实录》，卷三百，页二，光绪十七年八月癸巳条。
- [177] “刘坤一奏南洋兵轮暂停总统片”（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末海军史料》，第569~570页。
- [178] “刘坤一向德国两厂订购鱼雷炮艇及鱼雷炮位弹药片”（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九日），池仲祐：《海军实纪·购舰篇》，《清末海军史料》，第122~123、170~171页。
- [179] 张之洞：“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张集·奏议》，卷十三，页一~十三。
- [180] 张之洞：“试造浅水轮船工竣折”（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张集·奏议》，卷十七，页十八~二十。
- [181] 张之洞：“续造兵轮折”（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张集·奏议》，卷二十一，页二十八~三十二。
- [182] “海署来电”（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六日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816页。
- [183] 李鸿章：“译署送海军衙门”（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819页。
- [184] “光绪十八年六月初六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奏”，《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618~619页。

第六章 甲午海战及北洋海军的覆灭(1894 ~ 1895)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

一、寂静战场的较量

日本是以所谓“富国强兵”的纲领,来摆脱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厄运的。具体说来,就是以军国主义的,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形式,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不去抵御英、美、法、俄的压迫,而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作为补偿,把人民要求与列强平等的愿望,转变为掠夺新领土的战争。

早在1855年,当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和俄国签订通商条约后,日本的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说过,日本与两国媾和既成定局,就不能由日方背约。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

国。他具体描绘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覲;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1]这些主张,广泛影响了他主持下的松下村塾的弟子们——包括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式成为日本政治家奉行的最高国策。

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震慑,也是极深的刺激。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根据上年河村海军卿提出的海军第六次扩张案,日本实施建造3艘二等海防舰的计划。他们特聘法国人白劳易主持设计,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排水量为4278吨的“严岛”、“松岛”、“桥立”先后在法国和横须贺下水。这3艘军舰,各配有320毫米口径巨炮一门,以对付“定”、“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航速也高出“定”、“镇”1.5节。由于设计时片面而追求攻击能力,而忽视了防御能力,以致后来担任海军大臣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将其称作“手持利刃之赤身裸体兵”。这3舰的服役,加上第五次扩张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排水量均为3709吨),使得日本海军实力得到充实。^[2]顺便说一句,“浪速”、“高千穗”同中国军舰“致远”、“靖远”一样,都是怀特设计的作品,而白劳易,则是怀特的学生。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讨论了中日开战的时间,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的实力之前,即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设想日本要吞并盖平以南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同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4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29.4%,其中1893年达到32%。^[3]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以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发展海军为由,指出日本必须迅速

发展海军,要求以中国舰队和在未来战争中可能支持中国的英国远东海军为假设敌。1890年,新任海军大臣桦山资纪进一步推算,认为中国军舰总吨位已达64702吨,在造的新军舰、鱼雷艇、通报舰总计约达2万吨;英国在远东的军舰吨位为33467吨,中英海军共计达12万吨。而日本海军仅5万吨,急需弥补7万吨差距。据此又提出海军第八次扩张案。^[4]在两次扩张案中,共购买或建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号、4160吨的“吉野”号、3172吨的“秋津洲”号巡洋舰、1584吨的“八重山”号通报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由于日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中国军舰,而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也迅速赶上了中国海军。

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大将,1893年提出《军备意见书》。他认为欧洲目前正保持着势力均衡,不会立即发生战乱,但列强正在计划对东方进行侵略。当十年后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时,这种侵略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不出十年将对俄国进行一场战争的话,事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并尽快寻找机会对华作战,夺取东亚盟主的地位,这是绝对必要的前提。^[5]《军备意见书》预见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也预言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这些构想和判断,反映了日本在国家战略上的主动性、周密性和扩张进攻性;反映出日本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和独立思考。日本犹如一架制造精良的时钟,嘀哒嘀哒地前进着。它不依赖某个外国的庇护,却又巧妙地折冲于西方列强之间,按照本国的生存发展战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一旦认为需要,便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动用它的军事机器,投入对外战争。这恐怕是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与之对比,清政府的国家战略就显得软弱、被动和漏洞百出。

尽管中日海军互为假设敌,但在战前,却还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其中北洋海军曾经有过两次引人注目的访日活动。

第一次访问是在1886年。这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俄国也在觊觎元山口外的永兴湾。他命令丁汝昌、琅威理前往朝鲜东海岸釜山元山一带巡游,以作声势,并至海参崴,迎接参加中俄勘界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澂。21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抵达元山。8月6日,北洋舰队将吴大澂送至摩阔崴,留下“超”、“扬”在海参崴待命,其余4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夹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事件。

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情的起因现在很难说清楚了。英文《长崎快报》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英国驻长崎领事给驻日本公使的报告称:“大约事情起于二十三晚妓区之小纠纷。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6]在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的冲突,丁汝昌严飭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又与日警发生冲突。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便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热水,掷石块。还有人手持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手无寸铁,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混战结果,水兵被打死

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市民负伤多名。李鸿章分析,“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旋即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途径开始谈判。延至次年2月,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抚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7]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军人的一句流行语。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李鸿章把“定”、“镇”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竟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1891年夏,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再次访问日本。

7月5日下午3时,北洋海军6舰从神户抵达横滨。舰队随着“定远”发出的旗号,变换队形,驶入港口。“定远”鸣21响礼炮,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亦鸣21响礼炮作答。港中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丁汝昌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的现象”为题报道了观感: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

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8〕

日本记者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因为舰队出发前,李鸿章鉴于“长崎事件”,电飭丁汝昌严加管束。不久,有经验的日本军官看出了缺陷:大炮没有擦干净,并且像洗衣坊一样晾晒衣服。〔9〕军服的质料和大炮的保养性质是不同的,后者更直接地反映出舰队的战斗力。

北洋舰队在横滨停留了两个星期。日本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有一次,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设宴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觥觞酬酢之际,丁汝昌说: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他说,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它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10〕真是豪情壮志,溢于言表。这对日本又是一次很深的刺激。

中国海军军官也对日本舰队进行了观察。刘步蟾报告丁汝昌,日本海军实力已迅速提高,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朝廷已同意户部意见,停购外洋船炮军火二年。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中国方面失去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她打算好好乐一乐。

年初,慈禧颁布懿旨,为文武官员晋封加赏。庆郡王、总理海军衙门大臣奕劻,晋封为庆亲王。大学士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正白旗汉军都统、帮办海军大臣定安,两江总督、帮办海军大臣刘坤一,均赏戴双眼花翎。江南水师提督谭碧理加太子少保衔,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均赏加尚书衔。北洋海军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均赏给宝寿字一方,大卷八丝缎二匹。〔11〕

京师里,从紫禁城、西苑三海到颐和园、万寿寺,各处均已修缮

一新。银子花得如流水,仅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宫门至紫禁城西华门,所经道路两旁,要分六十段点景,分别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等,共需耗银 240 万两。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狂欢中,朝廷对于朝鲜的一场农民起义将导致中日大战毫无思想准备。在穷奢极欲的挥霍中,国防开支却全面紧缩,拮据万分。北洋海军打算增添“镇远”、“定远”120 毫米口径快炮各 6 门,“济远”、“经远”、“来远”120 毫米口径快炮各 2 门,共计 18 门,以及更换“威远”105 毫米口径后膛炮 3 门并子药等件,共需用银 613 040 两,都难以筹措。李鸿章只能建议,先购“镇”、“定”2 舰需用快炮,“济”、“经”、“来”、“威”4 舰应购各炮,俟前项炮款付清之后,如果备用款仍可腾挪,再行陆续添购。^[12]

这年春天,北洋海军从香港南行,至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各埠游弋训练,4 月底回到天津。5 月,正逢北洋海军三年大阅之期,朝廷派李鸿章、定安出海会校。7 日至 27 日,李鸿章、定安先后视察检阅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澳等地的舰艇部队、海岸炮台和军事学堂。丁汝昌率北洋“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9 舰,记名提督袁九皋、总兵徐传隆分带南洋的“南琛”、“南瑞”、“镜清”、“寰泰”、“保民”、“开济”6 舰,记名总兵徐雄飞率广东的“广甲”、“广乙”、“广丙”3 舰在大沽口会齐,随同出海。“威远”、“康济”、“敏捷”3 练习舰先赴旅顺口守候。21 艘军舰编成的混合舰队声势浩荡,桅樯如云。然而李鸿章并不像以前几次那样乐观开朗,而是忧心忡忡。他在向朝廷汇报这次阅兵的报告中写道:

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規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13]

中国海军正是在这种后难为继的局势中,迎来了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最后20年,朝鲜一直是国际斗争中的一个热点。

甲申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事变与大院君一派无关。由于中国驻朝人员渐多,对其国内情况加深了了解,搞清楚其国王阉弱,闵妃及其外戚专权。大院君掌权期间,对内虽有贪暴,对外也持保守,毕竟是亲华的,而闵妃集团,则在中、日、俄三国间摇摆。所以袁保龄、袁世凯叔侄力主释放大院君回国,以便更好地控制朝鲜国各种政治派别。日本方面,在签订了《天津条约》后,为调整对华关系,防止俄国渗透,也建议中国释放大院君。

此事的另一个背景,是醇王已在1884年参与朝政,其个人地位,与大院君一样,都是皇帝的本生父,故以为挫辱朝鲜国王、太上皇为非礼。在不久发生的另一次朝鲜与俄国勾结的外交事件中,醇王就明确地告诉李鸿章:其他事我能参与讨论,惟独韩事牵涉李是应,太后帘前面陈以及与同事集议实有难处。^[14]袁保龄等人是否看透这一层利害关系后人不得而知,但释放大院君,造成闵妃集团的恐惧和不满,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清政府的离心,对于朝鲜的政治稳定,其实是不利的,这为甲午战争中大院君成立亲日傀儡政府的事实所证明,当然这是后话。

李鸿章还看中了在处理“壬午事变”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通过总理衙门,委任他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伴同大院君一起返朝。袁世凯机敏能干,一方面积极劝谕朝鲜政府进行改革,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坚持朝鲜对中国的从属地位,苦心孤诣地挫败各个国家拉拢朝鲜投入其怀抱的政治企图。他是个枭雄,在朝鲜地位特殊,常采取横加干涉的做法,在一些方面也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由于朝鲜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李鸿章对朝鲜事务的处置方式,明眼人早就看破,这个东北亚的火药桶,早晚必会出事。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1891年在给兄嫂的家信中说,当年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楨鉴于林则徐开启边衅之覆辙,不敢请申挾伐,转贿以五十万两银子,于是琉球、越南、缅甸先后沦亡。我本人光绪七年来

天津时,朝鲜开海禁之议初起,李鸿章欲借通商诸国,以钳制俄人,不能不说是老谋硕画。起初朝廷不置可否,一任李鸿章所为。到了醇王主政,李鸿章议将朝鲜作为局外之邦,醇王奏称,琉球、越、缅诸国,皆洋人来取,我不与争而已。而朝鲜,人尚未取,我已先予,将来必不免人訾议之。其议遂寝。而国家对朝政策,遂不能前后贯注了。朝鲜于中国关系甚大,又介于俄罗斯、日本之间,其危特甚。^[15]这个判断很有见地。信中提到1875年沈葆楨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的妥协,是基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力主抵抗反被道光帝革职的教训,透露出鸦片战争失败带给清朝官场的政治后遗症是极为深远的。罗丰禄,字稷臣,福建闽县人,是福州船政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1877年首批海军留学生前往英法留学,罗丰禄作为随行官员参与管理,可见他在当时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在1880年带领留学生回国后,经李鸿章奏调,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兼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对李鸿章的外交思路应当是最为了解的。

1886年8月,袁世凯迭电报告,朝鲜国王派人向俄使韦贝致送密函,请求俄国派军舰保护,以使朝鲜永远不受他国辖制。俄国久欲在亚洲寻觅海军军港,得此机会必然喜出望外,而英、日必不甘心。他建议李鸿章迅速采取外交和军事措施,表示只要有五百兵,应可以废除朝鲜国王。李鸿章立即致电驻俄公使刘瑞芬,请其向俄国外交部表示朝鲜为中国属国,望俄国勿接受此函。同时,命正在日本处理“长崎事件”的丁汝昌,将对日交涉事宜交给中国驻日外交官员,速带军舰赶往仁川,配合袁世凯行动。在中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朝鲜国王幽杀送信人蔡贤植,派大臣声明联俄之事为小人伪造,向袁世凯提供情报的闵泳翊逃往香港,俄国方面也否认此事,事情就无法追查下去了。^[16]事后,反而有人责怪袁世凯多事。醇王也致函李鸿章,说“韩廷经此一震,或可潜消异志。袁守精于侦察,急于事功,却非通筹并济之道。较之老成硕画,相去太远。似宜预储通品,为他日替人之备”。^[17]李鸿章接信后,为27岁的袁世凯辩护,称各国驻韩者颇怪袁世凯多事,是因为嫉忌朝鲜

为我所属。袁世凯精明刚躁，我每每切谏，要他镇静勿忧。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他身在行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也较熟悉，权宜用之。惟其洋务素少历练，年资稍轻，诚如钩谕，宜预储通品，为他日替人，不过实在说来，通品也不易得。^[18]袁世凯继续受到李鸿章的宠信，1893年实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办事。

1894年上半年，朝鲜发生了两件大事：金玉均被刺和东学党农民起义。

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甲申事变”后流亡日本，日本政府以对其加以保护为由，将他放逐到小笠原群岛和北海道，直至1890年才解除对他的看护。1892年，朝鲜政府派李逸植到日本，主持暗杀开化党人。李在东京结识了曾在法国留学的朝鲜人洪钟宇。洪钟宇短发西装，能操各国语言，也与金玉均等人相识，同意参与暗杀金玉均。金玉均此时对日本政府的狡猾成性和背信弃义已有认识，也同清政府驻日公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及汪凤藻建立了联系。据说他想会见李鸿章，讨论东亚的未来。1894年3月27日，金、洪乔装日本人，同中国使馆翻译吴静轩及一名日本仆从乘“西京丸”号轮船抵达上海，住在日本人吉岛德三所开的东和洋行。次日下午3时，洪钟宇在旅馆中枪杀了金玉均。29日，租界当局逮捕了洪钟宇。消息传到日本，引起舆论哗然。几乎就在同时，朝鲜刺客李逸稷在日本企图暗杀开化党另一领袖朴泳孝未遂被捕，日警旋进入朝鲜驻日使馆，逮捕朝鲜人权东寿、权在寿。对日方擅入使馆捕人的行动，朝鲜方面表示抗议，朝鲜驻日使臣俞箕煥离开东京回国。朝日关系进入紧张状态。

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李鸿章安排“威靖”舰于4月12日将洪钟宇及金玉均尸体抵往朝鲜。朝鲜守旧派大臣对金玉均被刺欣喜若狂，趁夜进行戮尸。这时，日本则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指称金玉均之死是中国政府策划的，要求对华宣战。外相陆奥宗光和参谋长川上操六都积极主张扩大对华和对朝的侵略，但认为仅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之死而宣战，理由尚不充分。正好东学党发动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前去镇压，于是日本政府找

到了借口。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是由崔济愚首创的一种民间宗教,它融合儒、释、道三教,排斥西学(即基督教),以确立东国(朝鲜)之学为目标,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朝鲜政府把东学党作为异端邪说来镇压,1864年将崔济愚处死。但东学党在第二世教主崔时亨领导下,继续活动,1893年,东学党势力大盛,他们进入汉城,聚讼咒法,要求为崔济愚伸冤,同时在各国公使馆前张贴“驱逐倭洋”的标语,使得外国人十分恐慌。各国公使筹议调集军舰,以防不测。袁世凯表示中国有弹压之责,请各国静候。在他的请求下,李鸿章派“靖远”、“来远”驶入仁川,以后又派“济远”、“经远”前去替代。^[19]

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当过东学道接主的全臻准率领下,举行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起义。6月1日,起义军占领了李氏王朝的老家全罗道首府全州。

日本一直密切注视事态发展。5月9日,驻防仁川的“平远”舰协助将朝鲜官军运往全罗道的群山,日本使馆立即派员询问朝鲜外务署,“平远”舰前去为何,华兵是否下船等等。袁世凯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请求中国平息内乱,中国作为上国是难以推辞的。1885年《天津条约》规定中方派兵需行文知照日本,并没有中国派了日本也要派的文字。日本若要出兵,恐怕不过是保卫使馆,调兵百余名而已。^[20]

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乞援书。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为了摸清中国态度,曾派翻译郑永邦会见袁世凯,劝诱中国出兵,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接着,日本代理公使杉村瀚又于3日亲自会见袁世凯,催促中国出兵。袁与杉村私交甚好,他再次错误地以为日本不会干预。其实在6月2日,日本政府已做出了出兵决定,陆奥宗光、川上操六和外务次官林董商定,出兵人数为六千至七千。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乘“八重山”舰返回任所。6日,李鸿章饬令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赴牙山、仁川护商,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诚率淮军1500人,分乘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依照

《天津条约》，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同日把这一消息照会日本。

日本看着中国落入预定的圈套。8日，派一户兵卫少佐率领步兵一大队从宇品港向朝鲜进发，在清军到达牙山的同时，从仁川登陆。10日，大鸟拒绝了朝鲜政府提出的不要带兵返回任所的要求，在4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下进入汉城。另有50名陆战队员，乘“顺明”小轮水路赴汉城。12日，清军1200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16日，日军7000人在仁川全部登陆。

在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的同时，东学党起义军同政府签订了休战条款。11日，义军退出全州。中国军队并未与义军发生接触。13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会谈双方撤兵。日本政府本来已无理由继续向朝鲜增兵，为了达到侵略目的，竟荒谬地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清政府明确表示，日本无权干预朝鲜内政。但日本利用控制汉城的有力地位，逼迫朝鲜接受它设计的“改革”。到了这一步，中日两国的正面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日本政府准备发动战争，还需进行外交上的努力。

随着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政治民主、废除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野的改进党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国权的主张，激烈攻击伊藤博文内阁同英国进行的修约谈判方案，以致日本内阁在1893年底下令解散国会。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做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21]

由于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国担心影响它所垄断的欧洲至远东海上交通线，英俄关系开始紧张。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筹码，这为日英接近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既想要英国放弃它在日本已经取得的特权，又要英国默许它对朝鲜发起战争，外交谈判上难度极大。经过五十余次正式谈判和私下磋商，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又离间中英关系，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订立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勋爵在签约后对青

木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青木报告说：“英人的意思，让日清两国把力量置于朝鲜的北端或全部，而自己不费劳力，以防止俄国南侵。”^[22]日本看准了英国的基本立场，便放心大胆地在朝鲜进行了军事冒险。

为了阻止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李鸿章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早在6月20日，他便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预。俄国政府先是对此事表示了很大兴趣，训令驻日公使希罗多渥劝告日本共同撤兵。日本拒绝了。李鸿章进一步建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政府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却决定退出漩涡。俄国认为，卷入朝鲜这场纠纷，可能导致卷入战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俄国的军事力量尚不充分。此外，英国正在等待时机，当俄国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就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从而造成俄国外交上的孤立。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的时候，也请求英国调停。英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大事态，会把中国完全推入俄国怀抱，便由欧格讷出面，进行了几次斡旋，要中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总理衙门表示，先要日本退兵，然后再行商议。日本乘机诬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又宣布即使中国政府派出改革朝鲜内政的委员，对于日本在朝鲜独力进行之事项，亦不准置喙干涉。欧格讷为了阻止中日战争爆发，曾建议本国同俄国舰队联合进行武装示威，但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合。”^[23]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24]这是向日本暗示，未来的战争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

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曾这样评价俄国的调停：“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这番话用来形容英国的行为也是完全合适的。赫德又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

的……它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25]这倒是说出了各国进行调停的本来面目。

此外，李鸿章自己还有独辟对日外交行动的惊人之举。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告诉日方他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得日本人明显感到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坚持双方先从朝鲜撤兵再开谈判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4日，荒川报告陆奥，伍廷芳和罗丰祿被李鸿章秘密授予了谈判的使命。15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李鸿章好像倾向于同意陆奥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16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方能开展谈判而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26]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祿奉命到日本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这一倡议立即答复。^[27]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于下午3时到盛宣怀的天津海关道衙门密谈。盛在会面中告诉荒川，中国军队派往朝鲜是为了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28]

在李鸿章这方面想来，这一高级别谈判的建议必定会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日本政府。但不知何故，荒川己次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却拖延到23日晚间8时30分才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上午11时50分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误，当天他回电荒川：“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与日本的敌对行动还没有开始，日本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因为在朝鲜，目前仍不断发生政治事件。然而，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29]由于

现在没有找到这封电报到达东京后,日方究竟采取过什么具体的指令,以暂缓侵朝日军在汉城,以及联合舰队在朝鲜海域的军事行动的材料,于是,人们将李鸿章如此重大直接的求和行动忽略了。

罗丰祿的这次外交试探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极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迄今不知是谁给李鸿章授过权。按说如此重大的事件,必须有最高当局的直接命令,即使是军机大臣,也只能是转述皇帝、皇太后的谕旨。然而,没有任何线索透露朝廷的这种立场。所有已经发表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发给李鸿章的指令,都是要他做好开战准备。那么,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是李鸿章自行决定与日本进行高层接触,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日在朝鲜即将发生的军事对抗平息下去。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擅自开展的外交活动,在甲午年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然而,这却是日本外交档案中记录的事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决断能力不得不做出新的考虑。联想到1900年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借口保护使馆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占领北京。南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这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居然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的策划,同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这种骇人听闻几无可能的选择,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却考虑到并着手安排了。此事虽然后来由于朝廷起用他重返北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城下之盟而作罢,但提醒我们,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极为复杂。在甲午7月,他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寻求和平,显然是判定慈禧太后不愿在六旬大寿之年爆发战争;对于日本,他所统辖的海陆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但有一点,李鸿章似乎有把握,倘若他以外交手段将密布的战云消退,他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外国人曾说,中国有两个外交部,一个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个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集体议事的官僚机构,每一个外交使节来访,所有大臣都要参加接见,大家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总办大臣,却没有一个人负责。北洋大臣衙门则是李鸿章的单人外交部。李

鸿章坐镇天津,对北京的外交方针一直产生着直接影响。这次求和行动,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冒险,一方面,他绕过正常渠道,通过罗丰禄直接提出访日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盛宣怀放出空气,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不过是做做样子。22日罗、盛二人的行动,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双簧。由于日本方面没有积极配合,终于在日军进攻朝鲜王宫和挑起丰岛海战后作罢,就此湮没在浩瀚的外交文书和当事者的心底了。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中的重要手段。李鸿章看到了各国的矛盾和打算,他希望运用纵横捭阖,来消弭中日之间紧张的军事对峙,以阻止战争爆发,用心可谓良苦。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期望太高,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他指望用中国方面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换取日本的让步,这就完全失算了。这个失算,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配置和增援时机,在战争准备上陷于被动。以致7月23日,日本军队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了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时,就完全措手不及了。

日本方面也确实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是荒川的电报延误一整天,使得整个议和行动失去了回旋的时间余地。这个延误是故意的还是简单的技术故障?其次,日方既已允诺罗丰禄密访日本,为什么没有做出响应的协调动作?是日本政治家与军方在和战问题上无法协调,军方不顾一切可能的政治运作,非要发动一场战争,还是由于时间和通讯原因,无法进行联络,或是日本最高当局打定主意,就是要通过战争逼迫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证分析的课题。

二、丰岛海战

战前,日本海军以“松岛”、“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8舰作为常备舰队,“吉野”、“八重

山”、“葛城”、“大岛”、“摩耶”、“天城”6舰作为警备舰队，“金刚”、“天龙”、“筑波”、“满珠”、“千珠”、“馆山”6舰为练习舰，“磐城”作为测量舰，“鸟海”作为预备舰，分属横须贺、吴、佐世保海军镇守府。“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洲”、“比睿”、“海门”、“爱宕”、“凤翔”9舰没有编入现役。

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朝鲜后，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立即着手战争准备。他命令“吉野”、“八重山”从横须贺驶往朝鲜西海岸，监视中国向朝鲜派兵的情况；急令率“松岛”、“千代田”、“高雄”在福州访问的常备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将三舰带回釜山转赴仁川；命令前往中国观察北洋海军校阅后逗留在烟台的“赤城”，经威海转往仁川一带侦察。这样，加上原先停泊在仁川的“大和”和“筑紫”，朝鲜西海岸云集了多艘日舰。

7月10日和19日，日本海军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称西海舰队，并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的主要军舰编成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联合舰队的序列为：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本队第一小队：“松岛”、“千代田”、“高千穗”；本队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第二游击队：“葛城”、“天龙”、“高雄”、“大和”；水雷舰队母舰：“比睿”；护卫舰：“爱宕”、“摩耶”。^[30]

17日，日本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同日根据天皇的特别指令，恢复枢密顾问官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子爵的现役，接替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是主战派的头目，主张将日本海军舰队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组成庞大舰队，采取攻势方针，消灭中国海军有生力量，夺取制海权。这同中牟田海军中将所主张的“舰队守势运动”完全不同。所以日本《国民新闻》报写道：“谁人不谓桦山氏的就职意味着现内阁对于清韩问题的最后决心呢？”成立联合舰队正是桦山就职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大本营根据海军的胜负，决定了三种作战方针：

第一，若海战大胜，取得黄海制海权，陆军即长驱直入北京；

第二,若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

第三,若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海军守卫沿海。

19日,陆奥外相向英国代理公使巴健特宣布,中国政府若在5天内不接受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修正方案,日本政府将不再与中国进行会商。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询问陆奥,如果过了这个期限,日本舰队发现中国舰队后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问题?陆奥回答:“作为外交上的顺序,没有什么问题。”^[31]

7月23日是个晴朗的星期一。早晨7时50分,伊东祐亨在“松岛”号上发出信号,通知各舰长来旗舰开会,布置联合舰队出航朝鲜的任务。11时,第一游击队3舰由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驶离佐世保港,前往牙山。下午4时,伊东率领联合舰队其余12艘军舰及6艘鱼雷艇、运输船“门司丸”号,以单纵队离开军港,前往朝鲜。桦山资纪乘坐“高砂丸”号,为联合舰队送行,他在船桅上挂出信号:“发扬帝国海军荣誉!”联合舰队舰艏相接,缓缓消失在晚霞夕照的天际。

袁世凯与大鸟圭介在6月12日会谈时约定双方不再增添军队,至17日更达成了日军撤退四分之三,留250名驻扎仁川;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400名驻扎仁川附近,俟肃清农民军后再行全撤的口头协议。因此李鸿章在13日、18日两次电告叶志超,命其暂驻牙山,不要引兵北上仁川、汉城,以免激化双方矛盾。^[32]但鉴于日本仍在增兵,仁川日舰已达8艘,而中国军舰仅“操江”在仁川,“济远”、“平远”、“扬威”在牙山,因此又令丁汝昌在刘步蟾、林泰曾两人中委派一人,统带数舰,速往仁川。^[33]23日,林泰曾统带“镇远”、“超勇”、“广丙”抵达仁川。

次日,叶志超急电李鸿章,仁川至汉城扼要各处,均被日军控制,且时来牙山窥探。我愈坚忍,彼愈猖獗。请将彻底情况转告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又称牙山屯兵为无用之地,拟移军阳城。^[34]丁汝昌也去电,打算将北洋军舰调回威海,厚集兵力再图

大举,李鸿章此时因正托俄国调解,故于25日电囑叶志超静待勿动,又电丁汝昌通知林泰曾静守,不可遽调回威示弱。^[35]这天,李鸿章收到上谕,提出日本侵朝,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命妥筹办法,不要待日本占了主动再图补救。

26日,林泰曾再电李鸿章,认为仁川泊船,战守皆不宜。拟以一二船驻仁探信,余船驻牙山备战。请速派三艘雷艇来牙。李鸿章转询丁汝昌意见。丁汝昌表示,林的布置是根据不得示弱的指示精神设计的。在他看来,水陆添兵必须大举,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仍主张将“镇远”等军舰调回,与在威海各舰齐做准备,以待主力决战。^[36]李鸿章同意了。于是丁汝昌立即命令“康济”7月1日前往仁川,带饷接应“超勇”、“扬威”、“平远”,派“超”、“扬”驻牙山,“平远”、“操江”驻仁川,“康济”随同“镇远”、“济远”、“广丙”回威海。

在此半月,由于李鸿章对日本的意图未能判断准确,因此在海军使用上缺乏总体打算,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威慑力量而做些临时调度。

7月2日,皇帝发布上谕询问:李鸿章督练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北洋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者若干,着详加奏复。李鸿章汇报说:海军就现有铁甲巡洋各舰,助以蚊船雷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未敢轻窥,即不增兵饷,亦断不致稍有疏虞。^[37]

9日下午,俄国公使喀西尼接本国训令,派参赞巴布罗福、领事来觉福往见李鸿章,告之刚刚接到俄廷复电,日韩事显然是日本无理,但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再与华会商善后,未便用兵力强勒口人,至于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国不愿预闻。李鸿章至此方才意识到调停无望,决定对日作战,但又感到“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38]

11日,叶志超来电提出进退三策:速派水陆大军北来,叶部由牙山前进,择要扼扎为上策;撤回军队,迫日同撤,彼若不依,秋初再图大举为中策;守此不动,使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为下策。

李鸿章表示他倾向中策。^[39]然而皇帝不同意,认为日军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复,殊属非计。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移扎要退两便之地。又谕李鸿章,速派水陆部队待进,加强旅、威防务。李鸿章把“要退两便之地”解释为平壤,计划派5艘轮船去牙山转运军队,命丁汝昌派5舰前去护航。^[40]在此期间,“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给其父亲写信,谈他对局势发展的看法:

日本覬覦高丽之心有年矣。兹值土匪作乱……高王请救兵于中国,中国兴兵靖难。日本乘此机会亦兴兵。……要中国五款:一曰高丽不准属中国,二曰要斧(釜)山,三曰要巨文岛,四曰要兵费二十五万,五曰韩城准日本屯兵。如不照准所要,决定与战。且此番中堂奉上传,亲临大阅海军,方奏北洋海军操练纯熟,大有成效,请奖等语,自应不能奏和,必请战。亦飭北洋海军及陆营预备军火水药候战,海军提督请战三次……但皇上以今年系皇太后六旬万寿,不欲动兵,屡谕以和为贵。故中堂先托俄国钦差调处,日本不听;后又托英德钦差,亦不听,必要以上五款。然此五款,系中国万不能从,恐后必战。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41]

陈京莹是中级军官,对外交和宫中政事并不了解,他转述的中日交涉,是他在军中听到的传言,细细琢磨和回味这些传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海战只有三成把握,是北洋海军内部战前对己方力量研判的一个基本共识,与前述李鸿章指出“窃虑后难为继”是一致的。他说军中员弁想到马江之战,均“战战兢兢”,揭示了海军内部的普遍心态。他自己,则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布置朝鲜军务的日子里,后清流文士再次扮演主战派角色,

侃侃高论,同10年前中法战争时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其代表人物侍读学士文廷式指责北洋海军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力主对日作战,并请给北洋海军以先发制人的便宜行事权。15日,皇帝指派清流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处理朝鲜之策。16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大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然而翁同龢等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的结果,仍是一面备战,一面和商,同皇帝的主战决心大有区别。进入7月以来,北京的天气晴晴雨雨,令人难以捉摸,中枢对于朝鲜局势的指导也是飘忽不定,缺乏明确统一的连续方针。

16日中午,李鸿章通知叶志超,将派轮船至牙山接运其部,并散布假消息,声言撤退,至洋面大青岛一带再转驶大同江登陆,同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的援军在平壤会合。^[42]叶志超表示用商船渡兵十分危险,打算从陆路转移。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建议,既然运兵去和运兵回同担风险,不如不撤叶军,另用轮船载运军队前去增援。李鸿章接受了这个建议。17日,他决定调北塘护军统领吴育仁部2000人,由记名提督衔总兵江自康统带赴朝,雇英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运送。又因轮船行至牙山口外,需换驳船行70里抵岸,而叶志超手中仅有30艘驳船,每船载30人,轮船齐至,万一日军袭击或阻挠,进退维谷,十分危险,遂决定21、23、24日分三次发船。^[43]马玉昆、卫汝贵的部队,亦由跨黄海运至平壤改为沿海岸运至大东沟。

20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驱逐清军,限于22日答复。夜间,又照会朝鲜,要求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章程。战争已是一触即发。李鸿章要叶志超保持冷静,“谁先开战即谁理诘”,^[44]同时令丁汝昌派军舰至牙山巡护。21日下午6时,“爱仁”载江自康部离大沽前往牙山。22日上午9时,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离威海驶向牙山。这支分舰队的任务是守护运兵船完成登陆行动,留“威远”往来仁、牙,换“扬威”随队回航威海。^[45]

22日上午,李鸿章收到从长崎发来的情报,获知佐世保的11

艘日舰 20 日出港,去向不明。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但李鸿章却是认真看待的。他立即命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护,以保障运船安全。他说:“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46]丁汝昌通知“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9 舰及 2 艘鱼雷艇升火待发,并向李鸿章报告:“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又说“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战。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47]

电报半夜到达天津。傍晚 5 时 30 分,“飞鲸”轮已载着 700 名士兵和 47 匹战马离开大沽。本来决定“飞鲸”改往新城运送盛军赴平壤,它在大沽的载运任务,由次日启程的“高升”号完成。但命令下达时,已有大批粮饷、军械、帐篷和 200 名士兵上了船。经过商量,这个航次还是开行。谁也没料到,这样竟使 700 多名士兵避免了一场葬身鱼腹的厄运。

但李鸿章仍未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22 日下午,他在总督衙门接见了俄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布罗福。巴布罗福谈及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的行为十分不安,俄驻朝鲜代办韦贝屡次与大鸟圭介调处均未有成效。日军在汉城筑炮台,作据城状。现已电请俄国,请求派兵驱逐。李鸿章问俄国海军现驻摩阔崴军舰几只?巴布罗福说有 大舰 10 艘,调往仁川甚便。李鸿章说,贵国如派军舰,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巴布罗福表示,一旦接到本国回电即知会中方。当晚,李鸿章又接到驻英公使龚照璠的电报,谓英国政府已电令其驻日公使警告日本要对战争爆发负责。^[48] 这些消息对李鸿章紧张焦虑的战前情绪无疑是一帖安慰剂。此外,也正是在这天,他安排罗丰禄向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表示了派罗做密使,到东京与伊藤博文直接谈判朝鲜问题的意向,他在等待东京的回话。他判断日本在此形势下不至于立即挑起战争,而丁汝昌貌似请战的言辞后却掩盖着胆怯。所以李鸿章立即去电将其训斥一顿:

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

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扬威”可即调回。^[49]

这样，北洋海军主力的出海计划取消了。这天，佐世保的联合舰队和大沽口的“高升”轮几乎同时出发，一场力量悬殊的海战即将发生。李鸿章停止舰队出航的命令看来是一个巧合，却反映出他对敌我形势完全失算。在7月上、中旬，中国军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兵力调动，以取得战场主动，可是时间白白浪费了。日本武士敲响了战争之门。

方伯谦率领“济远”等3舰23日抵达牙山。24日清晨4时，“爱仁”号运兵船来到。6时，驳船亦到。于是立即换乘，仅一个小时，1150人和116箱弹药全部移上驳船。8时，“爱仁”返烟台。下午2时，“飞鲸”轮到达，“济远”、“广乙”派各船随带汽船帮助装运士兵、马匹和军需。

5时半，前往仁川交送电报的“威远”舰回到牙山，带来了日军昨天攻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的消息。在仁川的英国军舰舰长罗哲士透露，大队日舰将于明天开到。方伯谦立即命令官兵抓紧帮助陆军卸船，又令“广乙”、“威远”迅速升火开船回国，路上若遇“高升”等运兵船，可令其速返威海卫或天津。由于“广乙”随带的汽艇已进入白石浦江，“广乙”不能立即动身；“威远”是条木舰，行驶缓慢，不堪炮击，单独回国，若遇敌船袭击，只能徒失一船。遂于当晚11时，改令“威远”先赴大同江一带，等待“济远”、“广乙”到齐后一同回国。^[50]

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起锚，鱼贯驶出牙山口。这时夜色清朗，繁星满天，微风拂煦，海不扬波。东方的天际尚未透曙，西面的夜幕更是一片不可名状的深邃。两舰向西疾驶，至5时半，南方的地平线上显现出几缕淡淡的黑烟。7时，看清是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迎敌。^[51]

日本联合舰队驶离佐世保后，一直搜寻中国军舰未得。这天早晨4时30分，第一游击队来到忠清道西岸浅水湾安眠岛附近，与“八重山”、“武藏”等舰相遇后，又向丰岛一带搜寻。6时30分，遥见远方有2艘蒸汽船冒着黑烟疾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下令各舰戒备，以15节航速向前逼近。当相距5000米时，辨认出是中国军舰“济远”和“广乙”号，按照出发前的训令，在牙山湾附近遇到中国舰队弱小时，不必发动攻击，只有在遇到强大的中国舰队时才发动攻击。显然，日本海军领导人把战机定在决定胜负的会战上。此时，舰队参谋釜谷忠道大尉却认为：“究竟是强是弱，都必须通过战争来判断。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攻击。”^[52]这样就奠定了在丰岛对中国舰队开仗的军事行动。

日舰此时正处在丰岛附近狭窄水道，不利于作战机动，便向右偏转16度，向东驶去，然后再向左转舵16度，追击中国军舰。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43分30秒，“吉野”放一空炮。45分，“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火。52分，“济远”发炮还击。55分“秋津洲”开炮。56分，“浪速”开炮。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53]——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传统。

刹那间，宁静的海面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3艘日舰与2艘中国军舰展开了对射。虽然按双方实力相比，中国分舰队比日本少一艘，总排水量少7800余吨，火炮少50余门，航速也较日舰慢，但中国军舰依然沉着回击。“浪速”未及开炮前，“济远”的炮弹已在其舰首20余米处爆炸，弹片将其信号索截断，“济远”桅炮炮弹从空中扫向“吉野”。

日舰也猛烈轰击“济远”，不久，一颗炮弹落在指挥台附近，大副沈寿昌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沈寿昌是19世纪70年代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120名幼童之一，也是北洋海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上海人。又有一颗炮弹在前炮台爆炸，枪炮二副柯建章被弹片打穿胸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上舰实习的练习生黄承勋奋然登上炮台，召集炮手装弹射击。这时又一块弹片将黄承勋的手臂炸断，两个水兵抬他去包扎。他摇摇头说：“他们各有自己的职

责,不要管我了。”说毕气绝,时年21岁。坚持在前炮台发炮而牺牲的还有水勇正头目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鹏以及其他一些水兵。前炮台边积尸累累,竟至火炮无法转动。

战斗刚打响时,“广乙”趁日舰围攻“济远”,向“吉野”和“秋津洲”之间疾驶,企图切入。“吉野”害怕“广乙”发射鱼雷,向左紧急规避。7时58分,“广乙”又逼近“秋津洲”至600米处,正要发射鱼雷,忽被炮弹击中桅杆,桅炮炮手当即从空中坠落。此时战场上空浓烟笼罩,敌我军舰除了在偶尔的间隙里露一下面外,几乎难以分辨。蓦然,“浪速”发现“广乙”已逼近其舰艇三四百米处,立即向左转舵,并用前主炮、左舷炮及机关炮向“广乙”疾射。炮弹击中“广乙”舰桥。几乎同时,“广乙”的一发炮弹穿透“浪速”左舷,由内部钻过后部钢甲板,炸断备用锚并炸坏锚机。^[54]“广乙”趁势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海战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济远”管带方伯谦的表现。方伯谦,字展堂,福建侯官人。16年前,他在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回国后,担任过“威远”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时,他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炮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朝鲜事起,他于6月6日至7月初,曾先期前来观察事态。他向李鸿章建议集中使用兵力,以威、旅基地为依托,不宜分防仁、牙。又谓海军当添新式快船和快炮,才足以威慑日本。^[55]在丰岛海战中,有说他躲进舱中装甲最厚处,也有说他与沈寿昌并立望台指挥,沈寿昌中弹时,脑血溅洒在他的身上。^[56]

8时20分左右,“济远”后主炮的一颗炮弹穿入“吉野”右舷,打坏发电机,又穿过机舱防御装甲,落入轮机舱,可惜竟未爆炸。“济远”趁机向西撤退。日本3舰穷追不舍。这时,忽见西面有三道黑烟,不知何国舰船正向战区驶近。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转换航向,前去追击东撤的“广乙”,“吉野”、“浪速”仍然尾随“济远”。不久,日舰看清驶来的是中国军舰“操江”号和英国商船“高升”号。“浪速”接着超越“吉野”继续对“济

远”发炮。8时53分，“济远”升起一面白旗，但并不停轮。“浪速”紧追，两舰相距3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发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济远”的火炮便停止发射。海面上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军舰的蒸汽机在“呼呼”地呻吟喘息。“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轮信号，准备与它接近。^[57]

“浪速”发现从右舷驶过的“高升”号上有中国官兵，便用旗语打出“立即停轮”的信号。“济远”利用机会加足马力西撤。“吉野”紧紧追击。到12时38分，两舰相距2500米，“吉野”右舷炮开始射击，连发6炮，皆在附近海中爆炸，溅起巨大的水柱。^[58]这时，“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用后主炮仔细瞄准，急发4炮。首发命中“吉野”桅楼，第二发也命中，第三发打偏，第四发击中要害。“吉野”舰艏开始低俯，不敢再追，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舰得以在26日清晨返抵威海。

趁着日舰围攻“济远”，负伤的“广乙”向朝鲜西海岸踉跄面退，至十八岛附近搁浅。全舰1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0余人。管带林国祥纵火焚舰，率残部70余人登岸。其中20多人逃至朝鲜大安县，后由地方官雇两小船送其回国，9人雇船于8月4日到达成山。林国祥带54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队。叶军已走，便辗转赴仁川，经英国领事帮助，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途中为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回国。

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设计并督建的旅顺、威海海岸防御炮台竣工后，于90年代初返回德国。新近他从欧洲再来天津，打算与德瑾琳的女儿结婚。听说中日在朝鲜展开军事对峙，风声鹤唳，大有一触即发的气氛，便自告奋勇地要去朝鲜观察形势。李鸿章同意他搭“高升”轮前去牙山。他在“高升”号离大沽启锚前的最后一刻登上了轮船。

“高升”是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所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它于7月20日从上海开抵大沽后，被清政府租用。23日，淮军仁字军帮

办高善继及营官骆佩德、吴炳文率两营官兵共 1100 多人，乘该船前往牙山。

25 日晨，“高升”驶近牙山湾，远远已能看到朝鲜的陆地了。大约 8 时，汉纳根和船长高惠梯注意到一艘日本军舰正迎面驶来。隔了 10 分钟，又发现有 3 艘日舰尾随其后，他们感到有些紧张。9 时左右，第一艘军舰从“高升”左舷驶过。它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白旗和一面日本海军旗。其实这是“济远”，但“高升”船上的人并不明白。“济远”把它的旗降落又升起，这个举动使得汉纳根以为日舰正按和平时代的礼节，向“高升”表示问候。^[59]

据“济远”舰军官说，他们在发现“高升”和在它后面护航（其实不是）的“操江”后，立即挂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号。^[60]但汉纳根和高惠梯事后都没有提到这种信号。汉纳根只注意到右后方的“操江”正在减速并调头回驶。日舰向“操江”驶去，有一艘已经介入“高升”和“操江”之间了。^[61]

前出的日本军舰是“浪速”号。大约在 9 时 15 分，“浪速”向“高升”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停了下来。这时两船相隔四分之一英里。日舰对装有中国援兵的英国商船颇感棘手，“浪速”向“吉野”、“秋津洲”靠拢，似乎想商量对策。“高升”挂出信号，询问能否继续前进。“浪速”回答：“抛锚，否则承担一切后果！”^[62]并乘机追赶“济远”。这时，坪井航三从“吉野”上发出命令，呼唤“浪速”和追赶“广乙”的“秋津洲”归队。“吉野”通知要把捕获的舰船带回群山冲锚地，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汇报。^[63]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派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船上的中国军官看到事态紧急，再次表示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汉纳根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高惠梯，并且约好，必须坚持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64]

日本人登上“高升”轮。他们检查了有关文件。高惠梯船长提醒人见，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人见充耳不闻，只是问道：“高升”

是否跟着“浪速”走？高惠悌说：“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但是我抗议。”^[65]人见返回“浪速”后，东乡平八郎向“高升”发出立即起锚的命令。^[66]

“高升”上的官兵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激动起来，拒绝“高升”跟着“浪速”走。高善继说：“我辈白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怕死？吾家身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佩德、吴炳文也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67]汉纳根劝高惠悌再与日舰联系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再发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再派小艇前去。

这次是汉纳根与人见善五郎谈判。他说：“船主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68]

东乡得悉这一要求后，用信号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即乘小艇离船。但中国士兵控制住所有救生艇，高惠悌又发信号：“我们无法离船”。于是，“浪速”便向“高升”驶来。在相距150米处，它的船头悬起一面红旗，右舷鱼雷管发射出一枚鱼雷。接着，右舷五炮同时轰鸣，进行了5次齐射。“高升”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蒸汽和煤屑弥漫在空间，天昏地暗，白昼变为黑夜。“高升”激烈地震动着，迅速开始下沉。此时大约是在下午1时。^[69]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会水的人纷纷跳向大海。不会游泳的人，便在船的高处用步枪射击日舰，作垂死的抵抗。一艘日本小艇驶来。它只搭救落水的欧洲人，并向水中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高惠悌和大副田浚林被救上“浪速”号，汉纳根靠游泳幸免于难。

这天上午10时离开牙山返航的“飞鲸”号，在丰岛海面上目睹了“高升”沉没的惨剧。当时船头先沉，船尾向上，忽然翻转45度，然后全船下沉。至1时半，没入水中，只有桅杆露出水面。事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起2人；汉纳根等112人游至海岛，被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英舰“播布斯”

号运回 87 人。其余官兵全部殉难了。^[70]

在“浪速”盘查和击沉“高升”的同时，“秋津洲”竭力追逐“操江”。“操江”是 24 日早晨 3 时，离烟台前往威海，取得了汝昌托带的文书后，又于下午 2 时前往牙山的。舰上载有 20 万两饷银和一批军械。当它在丰岛海面看到日本袭击中国舰船时，立即转舵西驶。但由于航速仅 9 节，故至 1 时 50 分，被“秋津洲”追上。“操江”降下国旗投降。搭船而行的中国电报局洋匠弥伦斯原系奉派接管汉城的电报局，他见势不好，便将随身携带的密码本毁弃，并劝“操江”管带王永发销毁丁汝昌的文书，把饷银投入海中。文书销毁了，20 万两饷银却未及投海。2 时 10 分，“秋津洲”派人登上“操江”，驾驶该船于 7 月 28 日返回佐世保。被俘的中国官兵被押着游街，受尽屈辱和折磨。^[71]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认为日舰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是粗暴违反国际法的。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指望由此引起英国政府的干预。陆奥宗光则十分紧张，担心此事难以调解。日本法制局长末松谦澄解释说：“浪速”是在中日两国已经交火之后，向“高升”行使“交战者”权利的。“高升”虽属英籍船只，可在事变中，船长被夺去行使职权的自由，即“高升”号为清军军官所劫夺。“高升”号船主与清政府订有契约，一旦开战，该船即交清政府。这种解释，完全是强词夺理的狡辩。因为丰岛海战是日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挑起，中日两国要到 8 月 1 日才正式相互宣战。中国租用“高升”号，得到英国公使欧格纳的同意。当丰岛海战爆发后，船长要求退回出发港口是完全合理的。英国政府起初有意干涉，但随着中日战局的确定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努力，使得英国政府不欲多事。英国外交部后来居然认可了日本的说法，认定“高升”号在遭到拦截前中日双方已经开始交战，不必正式宣战即可开始战争。“高升”号当时受雇向朝鲜运送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日本有权拒绝该船继续往目的地。为保持中立，高惠梯船长准备服从“浪速”舰长的命令，但中国军官奋力夺取了控制权，意欲交战，准备积极反抗日军，使“高升”号

事实上成为交战一方。“浪速”舰长也就有权将其作为交战船对待。英国外交部说,法官找不到任何一条国际法原则来替船主向日本索赔,倒是中国政府应负赔偿责任^[72]。英国国际法学家胡兰德也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击沉“高升”在国际法上是合法的^[73]。这样就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李鸿章对此无可奈何,指望英国干涉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最后只能由招商局出钱,向怡和轮船公司赔偿了“高升”轮的损失^[74]。这是中国战时外交的又一次惨痛失败,在强权时代,国际法往往只是胜利者手中的武器。

三、黄海大海战

7月24日是丰岛海战爆发的前一日,北京犹如处在台风眼中,一片平静。这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准备参加四天后的皇帝生日大典。翁同龢晨起无事,兴致勃勃地出东便门,乘舟沿通惠河到二闸看水。日记中记录说:“徜徉野店看闸,水声如雷鼓。”^[75]

这天,张謇给翁同龢写密信,对北洋海军的人事变更出谋划策。信中说:“丁须即拔,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准人复据海军(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惟江非水师,恐与驾驶事不行,转为士卒所轻,则左翼之林泰曾、右翼之刘步蟾似可择一。若论者有词,可以策励,似林逾于刘。”^[76]此处丁指丁汝昌,“武毅军江提督”似指江自康,惟江自康属仁字营系统的记名提督衔总兵,而非武毅军,究竟何人,尚待考证。张謇在中日正式交战之前,就如此深入地与翁同龢讨论淮系的人事进退,值得关注。尤其张謇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曾随吴长庆入朝,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不少熟人,他所谈到丁汝昌等人的情况,应当说是有所依据的。不过,张謇在密信中提到日本海军的情况,却不准确,尤其他说日本虽有五艘铁甲舰但都已过时,“余二十九舰皆

名巡海快船,无铁甲也,亦远不及我快练船”^[77],更是误导了翁同龢,对翁同龢的主战决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人不知道,7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是这样评价中国海军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装备方面远不及日本。自琅总兵离去后,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委托丁提督管理,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不如说是名陆军,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他的习性和能力,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欧格讷还提到“镇远”管带林泰曾三天前提出请求开缺,被丁汝昌拒绝,而实际上是李鸿章拒绝了林泰曾的离职要求。李鸿章表示,谁再提这类申请,就将其处斩。欧格讷说:“我深怕诸如日本目前似乎企图突然发动强有力的侵略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害怕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将遭到一次导致现行极不完整的体制彻底解体的打击。”^[78]无可否认,英国外交官的观察是细致和准确的。

7月28日,朝鲜局势已完全恶化了,朝廷却仍未想好应对方略。

这天是皇帝万寿圣节,紫禁城里依然庆贺如仪。清晨略有些薄雾,迷迷糊糊的,在夏日实为罕见。5时刚过,大小臣工已从东华门进入皇宫,在太和殿前循班排列。朝鲜使臣穿着圆领大袖的礼服,手执牙笏,站在西边末尾。7时,刚满23岁的皇帝升殿,苍白的脸上,毫无喜悦之色。群臣按例庆贺舞蹈。8时,赴宁寿宫畅音阁听戏。畅音阁是座三层崇楼的戏台,阁的两侧,悬着一幅楹联:

动静叶清音,如水仁山随所会

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和

写的是海内晏和的升平景象,此时看来,尤为触目惊心。庆亲王、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奉旨筹措对策,他们在太和殿吃完御赐筵宴,又到会典馆去吃了真正果腹的午餐后,便云集军机处值庐商议。然而,一则前敌形势莫辨,消息极少;二则书生虽有心杀贼,

却无策典兵。因此议而无决,依旧前去听戏,这时,天空中淅淅沥沥地飘洒起细雨来。^[79]畅音阁的专场文艺演出至晚上7时才散,面在宫外焦虑等待的张馨,再一次写信给翁同龢,建议将丁汝昌革职,仍留前线,戴罪效力。

根据报告,丁汝昌27日率北洋海军9舰,开往汉江洋面巡游,寻找日本舰队。牙山的叶志超部则音讯杳然。皇帝和军机处不知道,李鸿章给丁汝昌的指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80]因此丁汝昌只是虚晃一枪,未见日舰便折回威海。29日,皇帝询问丰岛海战和朝鲜陆战场的情况,关于朝鲜,李鸿章一点准信也没有。他回奏说叶志超军在牙山一带打死一千多日军,平壤被日兵占领。其实平壤并未失陷,叶军也从未取得如此战绩,倒是在这天从成欢败退。中国最高当局,就是在一片混沌中指挥作战。

从丰岛海战战场回航后,方伯谦向李鸿章发出电报,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日船紧迫,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被即转舵逃去”。又说“装运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日船击拿;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小岛西南,亦被日船击中三炮,遂停查面沉”。^[81]

丁汝昌也是两眼漆黑。他向李鸿章发出的丰岛海战正式报告称:“兹已分诘管带、员弁、水手,均称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余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英语厘米centimetre的音译)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击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回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带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又说“广乙”毫无消息,“迄今莫视,必被

击沉”。^[82]

这两个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比如完全不提“高升”、“操江”驶入战场与“济远”当时所处位置等细节,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李鸿章得报后,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进行了核实,得知没有提督死、“吉野”沉的消息,在电报中斥责丁汝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又命北洋海军进入戒备状态,各船保持常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83]

近年来,有人使用“广甲”管轮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来为方伯谦翻案。卢文写道:“‘济远’自雅山逃归,船中血肉狼藉,三军望之骇然。方管带禀报丁汝昌,陈明其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敌,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丁概置若罔闻,仅问‘广乙’、‘威远’何往?方答以‘威远’不堪御敌,故令其先行远避。‘广乙’遇敌与战数时之后,不知所之。丁曰:令尔保护载兵之船,竟被击沉,全军尽覆,五艘同出,一艘独归,保护之谓何不力可知矣。且悬挂白旗辱国甚,孰尔有何面目归来见我,独哓哓不休道功绩耶?方无言面退,丁乃电奉李相,请治方悬挂白旗辱国之罪,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具实奉覆,李相传谕探明‘广乙’确实情形再行审究。”^[84]

卢毓英这里的记录存在问题:第一,从前引档案可知,方伯谦回威海后,有权直接向李鸿章上禀,丁汝昌不能阻止他报告战况的权利;第二,方伯谦是否向丁汇报了升白旗的情节暂且不说,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不仅只字未提请治方伯谦悬挂白旗辱国之罪,还误传所谓“提督阵亡、‘吉野’沉没”的谎言;第三,更没有“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之事。由此再看卢氏解释挂白旗是为“诱敌”的说法便觉勉强。反观《中倭战守始末记》记载“倭奴击我‘高升’轮时,方望风而循……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调询‘济远’管旗头目,始悉溃逃各节,独以寡众不敌怨之”^[85],以之比较对“济远”的实际处理,似乎后者的说法更近于事实。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李鸿章传达总理衙门的意见,要海军往仁川截击日本运兵船。他再次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86]2日,丁汝昌率6舰第二次巡弋朝鲜大同江的洋面。

这天,朝廷电话李鸿章,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折回威海,不知做何进止?^[87]李鸿章次日汇报:丁汝昌云,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可冀取胜,若入汉江寻敌,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又说丁汝昌已赴朝鲜洋面,发现日本运兵船即行截击。^[88]皇帝对此并不满意,指出威海僻处山东,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或借此藏身?着查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5日又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倭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89]龙颜震怒,锋芒显然已指向李鸿章。

李鸿章赶紧申辩说:“西人金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90]他给丁汝昌布置了战略意图,要他每月带队往返威海与大同江口两次,相机击逐日舰及运兵船,并就近前往鸭绿江口巡查,使日舰不敢肆行窜扰,以稳定局面。

6日,李鸿章再电丁汝昌,转告丁他已接获上谕,要查看丁“有无畏葸纵寇情事,不得有片词粉饰”。李鸿章告戒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循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副在天桥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颞顽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91]显然,李鸿章对丰岛海战的实情已有所耳闻,对丁的呵斥十分严厉。

9日,丁汝昌率10舰第三次出洋。10日至大同江口,寄泊樵

岛。11日继续梭巡。12日西驶海洋岛。13日清晨回到威海,依旧一艘日舰也未见。而在这一期间,伊东祐亨率领联合舰队21舰,于10日直薄威海卫口外挑衅,与刘公岛炮台展开火炮对射。11、12日清晨,又派数舰至旅顺口、威海卫洋面巡游,弄得北洋全线紧张、草木皆兵,飞檄丁汝昌回航守御。

13日,皇帝责问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当重治其罪。于是,丁汝昌只得在14日第四次匆匆率舰出巡渤海,经鹿岛、秦皇岛回至大沽,掩护“图南”等运输船装运军火煤炭前往旅顺。

近一个月中,丁汝昌率舰队来去匆匆,奔波往返于威海、大同城、旅顺一线,不敢行驶出北纬37°线以南地区,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日舰,实际竟像有意捉迷藏,以回避主力决战。这种行为,使得激进的士大夫大为不满。李鸿藻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92],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情绪。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弹劾,清议汹涌,力主撤换丁汝昌。这批人以翁同龢为领袖,松散地云集在皇帝周围,常被后人称作“抵抗派”。

无论皇帝,无论“抵抗派”中的激烈分子,对于如何正确使用海军,其实都无把握。23日,军机处直接电令丁汝昌,称威海、大连湾、旅顺口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日船阑入。倘有疏虞,定治丁汝昌重罪。^[93]这道训令表明,朝廷对于海军的使用,与李鸿章并无二致。同日,李鸿章派汉纳根前往襄助海军防剿事宜。汉纳根与丁汝昌相商,称因无快船可以飞驶查看敌舰动向,且敌舰不免还要前来窥伺,所以“水师现在不能甚做大事”。^[94]

25日,庆王奕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及翁同龢、李鸿藻在军机处讨论军情。在议论到御史高燾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军情,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两个折片时,翁同龢、李鸿藻坚决主张要将丁汝昌治罪,否则难孚公论。军机大臣额勒和布提出先请

北洋保举替代之人然后再降旨，孙毓汶主张以电旨传达而不要明发，翁同龢均不同意，两方展开激烈争论。最后写成一个意见，报皇帝定夺。^[95]次日明发上谕，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戴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96]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寄谕旨：“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曲为迴护，致误大局。懍之！”^[97]显然，光绪帝对于丁汝昌的避战已经极为痛恨了。

丁汝昌的避战，既有其自己的胆怯，也有李鸿章的掣肘。李鸿章的避战，既有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有对海军战略的错误认识。关于后者，人们历来极少论及。

中国近代海军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蹂躏造成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通过进口和自制军舰，至1889年，其规模冠亚洲之首，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国、日本之前。由于朝廷对于建设海军的重要意义和国家防务重点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缺乏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认识，因此对于海军战略以及海军发展中的一些基本构想，考虑极不充分。其中对于在战略防御总态势下，中国海军究竟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法，通过控制沿海海域以取得制海权，还是放弃海上角逐，倚据海岸炮台和陆军进行陆基作战这个涉及海军建设的基本战略方针，长期没有取得正确的认识。

军事学上的防御理论，包括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类。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由于海洋的特殊性，除了毗邻海岸的近海地区外，在本国和敌国领海之间，往往隔着辽阔的公海。海军外线作战具有广阔的舞台，积极防御的纵深地带，有很大的弹性。在战争状态下，能否利用这种弹性，将海军的作战前沿尽量前伸，创造机会进行主力会战，从而消灭敌方主力，夺取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区的控制权，确

保己方海上行动自由和安全,同时剥夺敌方的海上行动自由和沿海安全,是衡量各国海军战略和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尺。这里的关键,是争夺制海权。

明朝抗倭战争中,文臣武将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胡宗宪认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说:“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云:“所谓必于海中截杀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解矣。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也指出,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并从战术原则上提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铕胜小铕,多船胜寡船,多铕胜寡铕而已。”^[98]在这种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中,已经孕育了制海权的光辉思想。对倭作战,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发达的造船技术,也是主张海权论者的重要依托。

到了鸦片战争时,由于英国舰队在武器舰只的性能上优于中国,广东水师无法在正而海域同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主力决战,致使中国海战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一页上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观点。这一针对清军水师装备落后,从破敌战术出发提出的专守防御理论,对于当时人们确定海军战略,起了消极作用。在魏源的同时代人中,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发生过从重陆防到重海军的变迁,但人们却把它忽视了。

1873年,傅兰雅、华蘅芳联合译出了曾经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普鲁士军官希理哈的著作《防海新论》。书中介绍了海军防御的两种样式。一种是抵岸封锁的积极防御,“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人”,从而使本国的防御线一直前出至敌国的领海线,这被称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一种是保卫本国海港冲要的消极防御,即在本国沿海要塞屯扎重兵,实行专守防御。^[99]这个说法,本来并不全面,因为它疏忽了抵岸封锁和海口防御之间,还有广泛的海域可供角逐,可是李鸿章居然

奉为圭臬。本来他就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00] 此时读了《防海新论》，更评论说：“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01] 说到底，便是主张放弃海上决战，放弃争夺制海权。这恐怕正是 20 年后北洋海军穿梭于威海、旅基地之间，回避与日军主力相遇的奥秘所在。此后，尽管李鸿章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过“海上如练成大枝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艘，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覬觐潜消，鄙人窃有志焉”^[102] 之类豪言壮语，但基本属于幕僚执笔的应酬文字，算不得他自己真正的海防战略思想。

1885 年，天津机器局刊印了李凤苞节译的奥国海军军官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所著的《海战新义》。书中归纳了五种最主要的海战样式：一是舰队出海寻求对敌国舰队的进攻；二是舰队在本国海岸防御击敌；三是派遣舰队攻击敌国海口或本土，牵制敌国舰队的行动；四是当敌国舰队将集中于我海岸时，我舰队出他处机动，以吸引和分散敌方兵力；五是将我海军分编成数队，分别行动，在机动中创造战机，适时集中各队击敌一部。书中提到：“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而弱国须守候机会，以伺候强国一分股之船。”这是在中国海军学术词汇中首次使用“海权”这一名词。^[103] 但我们迄今尚未见到中国海军人士当时就寻求海上主力决战，创造机会聚歼敌国舰队的任何讨论文章。即便将海军的作用局限在海岸要塞防御上，对于海陆联合作战的指导理论和合成训练，也没有认真研究和演练，从而建立自己的海军战略战役理论体系，以指导战争实践。

几乎没有中国人知道，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之后，制海权已不

仅仅只是海军战略的概念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 1660~1783 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 1660~1783 年历史的影响》两部著作,从而震动了世界。制海权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直接联系。马汉风靡世界,英国人为他倾倒,法国人把马汉著作印发给海军每一艘舰艇,日本也很快出了译本,用作军事院校的教科书。惟有中国依然故我,虽然濒临大海,仍是大陆国家的胸怀。

日本在华间谍宗方小太郎 8 月上旬的报告书中写道:

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噫!今日之事,惟有突击之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104]

由此可见,连一个日本间谍也已清楚地看到海上决胜的重要意义,看透了决定双方国运的,不仅是简单的军力对比,还有力争胜利的精神状态。

北洋海军不去主动寻找战机,争夺黄海制海权,日本就抓紧时间往朝鲜运兵。从 7 月 25 日到 9 月 12 日,在联合舰队护航下,分四次向朝鲜运送了 2800 余名官兵。并在 8 月 12 日把临时锚地从隔音群岛改为长直路。8 月 16 日,联合舰队再次改编。新的编队序列为本队:“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高千穗”、“浪速”;第二游击队:“金刚”、“葛城”、“大和”、“武藏”、“高雄”、“天龙”;第三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大岛”;本队附属舰:“八重山”、“磐城”、“天城”、“近江丸”;鱼雷艇母舰“山城丸”。9 月 13 日,当日本舰队护送陆军登陆的任务完成后,桦山资纪命令

其北驶大同江口,寻找北洋海军主力决战。14日至16日,日本军舰在渤海及朝鲜西海岸广泛游弋,寻找战机。桦山乘坐由商船改装为军舰的“西京丸”同行观战。按照“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方针,日本舰队主动出击,志在必得,不管中国舰队如何回避,一场海陆决战必将发生。

8月21日,叶志超率牙山残部历经周折,转战千里,撤至平壤,被朝廷委为“钦派总统诸军”,节制入朝的各支陆军部队。9月7日,协助李鸿章办理军务的周馥、盛宣怀联名给丁汝昌去电,告之有人建议北洋海军乘日本国内空虚,直捣长崎,得胜即回扰仁川。建议者认为,此时日军在朝鲜元山、仁川登陆,船已分散,我以整攻散,以实击虚,是难得的好机会。李鸿章的意见是,现日军进逼平壤,海军能否助叶志超战,或直接进袭日本本土,请丁即与汉纳根妥筹径报李鸿章。^[105]此一甲午战争中最为重大的进攻性战略构想,后来未见丁汝昌回复而夭折。

9月12日,日军兵临平壤城下。15日,开始对平壤发起总攻。为了接济在朝部队,李鸿章派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5艘轮船,运送刘盛休部12营6000人,从大连湾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再辗转前线。15日,北洋海军奉命到大连湾,担任船队的护航任务。16日凌晨,运输船装卸完毕。丁汝昌先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镇南”、“镇中”14舰及“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号4雷艇,起锚出发,命运输船于一小时后启程,循护航舰队航迹前进。

月光倾洒在万顷碧涛上,也给军舰披上银白色的寒光。秋夜的海风微微吹来,使人心旷神怡。然而,丁汝昌的心绪却不平静。经过十几年海上颠沛,他对于如何驾驭这支全国最新式的舰队算是懂点皮毛了,但能否指挥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却毫无把握。李鸿章对他指挥舰艇作战的能力也表怀疑,特派汉纳根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可是汉纳根这个前陆军尉官又有多少海军知

识？战前丁汝昌多次呼吁更新炮械，到中日宣战后总算运来 20 门格鲁申 1.79 英寸口径速射炮。但与日舰装备的速射炮数量相衡量，还是难成比例。想到万一要同日本人决战，他真有点不寒而栗。

16 日午后，舰队和运输船队平安抵达大东沟。丁汝昌命“平远”、“广丙”两舰泊于口外，“镇中”、“镇南”及鱼雷艇护送运输船进入江口，上溯 15 海里，将增援平壤的军队运至远离战区的大东沟。此举本来就荒唐，说明中国舰队此时连直驶大同江的勇气也消失殆尽，只得用整个舰队护送 5 艘商船，贴着辽东半岛海岸蹒跚东行。舰队中更无人知道，这天平壤已经陷落，而日本舰队正向海洋岛方向驶来。

17 日早晨，天气晴朗。7 时左右，运输船队接到指令，可以自行返回港口^[106]。舰队则在锚地停泊。9 时，各舰按例进行了一小时的常操。10 时，“镇远”的瞭望哨发现南方天际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轻烟。他加强了警戒，不时用望远镜严密地注视着这个方向。不久，已能看清 8 艘日本军舰正向这个方向驶来，于是发出战斗警报。此时正值午饭之际，官兵们纷纷涌出餐厅，奔向战斗岗位。丁汝昌、汉纳根、刘步蟾在“定远”舰桥上发出“立即起锚”的信号，各舰烟囱吐出浓浓黑烟，北洋海军 10 舰以 5 节航速向南迎击。

鉴于敌舰距离尚远，旗舰发出抓紧午餐的命令。瞭望哨这时准确地报告说，前方日舰共 12 艘。丁汝昌下令舰队把航速提高至 7 节。

北洋海军在迎敌时，最初排出的是五叠小队。“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的两艘军舰前后错开，呈梯队状。因此，远远望去，模样上有点像夹缝鱼贯阵。^[107]

自从丰岛海战后，北洋海军已做好了海战准备，各舰除留一艘六桨小艇外，将其余救生艇全部卸除。一来显示全体官兵与军舰共存亡的决心，二来也是清除容易被敌击中的目标。为了第二个

需要,各舰还把与战斗无关的索具、木器、玻璃窗乃至“定”、“镇”两舰主炮塔的钢炮罩皆留在岸上,以减少火灾燃延和炮弹造成的空气震荡。军舰涂上深灰保护色,速射炮之间用砂或煤包堆置起来,以作防护。当战斗命令下达后,水兵们迅速关闭所有无关舱门,从弹药舱提取炮弹。所有的炮口,都森森地指向远处驶来的敌舰。

日本舰队这天上午6时30分抵达海洋岛附近。他们没有找到中国舰队,便向大洋河口附近的大鹿岛海域进发。10时23分,正在航行中的第一游击队,在右航方向极远处的海平线上,观察到一缕黑烟,接着又出现几缕。至11时30分,日方判定迎面驶来的正是北洋舰队。伊东祐亨下令,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为前导,以“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6舰组成的本队在后跟上,以单纵队向东北方向迎击。为保护乘坐“西京丸”观战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安全,命令“西京丸”、“赤城”两舰转移到本队的左舷。^[108]

海军编队的最高航速,是以编队内航速最低军舰的最高航速来确定的。联合舰队中的“吉野”时速23海里,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高的巡洋舰,但“赤城”航速仅10节,大大低于其他战舰速度。伊东把参战军舰分为两个编队,以充分发挥第一游击队的快速机动作用。

丁汝昌见日舰以单纵队向己方驶来,便根据战前预定方案,命令舰队改变队形,以双横队迎敌。第二列的军舰与第一列夹缝排列,而前后交错的各对姊妹舰彼此结为小队。^[109]他下达的训令规定:

1. 战斗中,各姊妹舰或编为一个小队的军舰,尽可能留在一起,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2. 主导原则是保持舰艏向敌;
3. 所有军舰必须遵守一个基本规定:随同旗舰运动。^[110]

以双横队迎战单纵队,显然是受1866年利萨海战战例的影

响，^[111]打破一般的单纵队侧舷交战常例。可怕的是，由于北洋舰队在行进变阵中航速没有保持好，侧翼诸舰开始落到后面。结果当舰队逼近敌舰时，呈现的竟是一个散漫的单横编队，中间突出，像个倒“V”字形。其序列为“济远”、“广甲”、“致远”、“靖远”、“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112]战线拉得很开，弱舰散在两翼，缺乏保护。单横队不是丁汝昌的本意，但已无能为力。这时，日本第一游击队迅速驶过北洋舰队主力正面，企图包抄其薄弱的右翼。丁汝昌在洋员泰莱的建议下，命令全队同时向右转移4度，企图在临战前改变为左翼单梯队阵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12时50分，中日舰队相距5300米。这时，“定远”右主炮塔305毫米口径巨炮首先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第一炮，揭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不幸的是，那炮的后坐力竟使脆弱失修的舰桥当场震塌，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113]而他在战前又没有明确谁是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中国舰队从一开始便失去了统一指挥。

在火炮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一般采用三发试射、修正定位的方法。中国舰队利用重炮射程远的特点，先发制人，力争战场主动。5分钟后，“松岛”325毫米口径炮塔被“定远”150毫米口径舰炮击中，两名炮手负伤。接着，“定远”又连连中“松岛”。中国其他各舰，也以主炮猛轰日本联合舰队本队6舰。

日本舰队冒着弹雨向前迫近。12时52分，“松岛”在中国军舰3500米处，首先开炮迎击。55分，“严岛”开炮。同时，第一游击队的“吉野”开炮射击右翼最弱的“超勇”、“扬威”。58分，“桥立”开炮。1时，“千代田”开炮。整个海面被浓烈的硝烟所笼罩。^[114]日舰摧毁了“定远”的信号装置，破坏了中国旗舰同其他军舰的联络手段。

战斗开始时，中国舰队的V形编队顶部正好楔入了日本舰队之间，将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一截为二。中国舰队集中攻击日舰本队。“严岛”右舷被一发210毫米的炮弹击中，11名水兵被杀伤。

接着,又一炮弹穿过右舷,在汽罐室爆炸,6名水兵伤亡。1时10分,“桥立”主炮塔被击中,分队长高桥义笃大尉、炮术长濑之口觉四郎大尉和二等兵曹广重源槌被炸死,7名水兵负伤。“比睿”在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与本队拉开距离,慌不择路,企图突入北洋舰队阵中,从“定远”左舷通过。^[115]中国军舰集中向其攻击,顿时将它的舰体、帆樯、索具打得体无完肤。接着,“定远”一发305毫米炮弹贯入其侧舷,在后桅处爆炸。大军医三宅贞造、大主计石塚铸太、少军医村越千代吉等17人当场毙命,分队长高岛万太郎大尉等32人负伤,整个后甲板被彻底破坏了。“比睿”拖着浓烟烈火,逃出重围。

第一游击队利用舰速优势,迅速通过中国舰队正后面,包抄中国舰队右翼薄弱的“超勇”、“扬威”。“超”、“扬”进行顽强抵抗,击中“吉野”后甲板,引起堆积在那里的炮弹、火药的连续爆炸,浅尾重行少尉和一名水兵被炸死。又炮击“高千穗”和“秋津洲”,“高千穗”右舷后部被炮弹撕裂了一道大口子,“秋津洲”的永田廉平大尉等5名官兵被炸死。又一发炮弹击穿“浪速”一号炮台下的水线部分,引起海水灌入。但“超”、“扬”毕竟是旧式巡洋舰,航速慢、火力弱,在第一游击队的猛烈攻击下,终于燃起熊熊大火。“超勇”舰体渐渐向右舷倾斜,依然发炮不止,至1时30分沉没。^[116]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有人抛长绳相救,他不就而亡,时年42岁。黄建勋是福建永福人,15岁考入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十年后被派赴美国留学,担任过“镇西”管带,1887年,任“超勇”管带。他为人慷慨,尚侠义,性沉默,出言憨直,不喜作世俗周旋之态。^[117]及至战时,临危不惧,从容赴死,有古烈士之遗风。

“扬威”情况与“超勇”相似。由于内部隔舱俱为木结构,因此难以扼制火势的蔓延。接着军舰开始下沉,舱面进水,首尾两炮间不能通行,弹药也无法提取。无奈之中,向北面大鹿岛方向撤退,后来搁浅在近岸海边,水兵纷纷跳水逃生,管带林履中,愤然蹈海成仁。^[118]

左翼的战斗仍在继续。中国舰队猛攻另一艘弱舰“赤城”号。

双方距离仅 800 米,中方炮火先是击伤“赤城”分队长佐佐木广胜大尉,击毙海军少尉候补生桥口广次郎等。1 时 25 分,又将正在舰桥上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少佐当场炸毙,鲜血和脑浆溅满海图桌,蒸汽管被炸裂后,使得航速下降,弹药供应也被断绝。“赤城”只能一面抢救、一面撤退。“来远”乘胜追击,2 时 15 分,再次击中舰桥,炸伤代理舰长指挥作战的航海长佐藤铁太郎大尉。“赤城”急放尾炮,击中“来远”前甲板,造成“来远”起火撤离。

乘坐“西京丸”观战的桦山资纪看到“比睿”在 2 时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旗号,又看到“赤城”陷于合围之中,便于 2 时 15 分挂出“‘比睿’、‘赤城’危险”的旗号,召唤第一游击队回援左翼。“定远”“镇远”及其他 2 艘中国军舰立即集中火力攻击“西京丸”。四发 305 毫米炮弹、一发 210 毫米炮弹、二发 150 毫米炮弹、四发 120 毫米炮弹相继从 200 米处飞来,在两舷、上甲板、轮机房爆炸,使得蒸汽管破裂,蒸汽舵无法转动。“西京丸”挂出“我舵故障”的信号。接着,一发 150 毫米炮弹和数发速射炮弹横扫后甲板,将舵及信号机装置破坏。另一发炮弹洞穿下甲板,摧毁五个舱室,引起大火燃烧。“西京丸”只能用手工操舵,艰难地调转航向。这时,正遇上前来助战的“平远”、“广丙”和鱼雷艇“福龙”。“福龙”向“西京丸”连续放射 3 枚鱼雷,其中有一次攻击双方距离仅 40 米,可惜都未命中。使得“西京丸”得以逸去,单独返回日军锚地。

战斗极为惨烈。丁汝昌本来不能指挥海战,负伤后便坐在甲板上,鼓舞官兵杀敌。中国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事迹感人。“镇远”主炮在发射中,忽然中弹,一个炮手的头骨当场被炸碎,血迹飞溅。其余炮手毫无惊惧,将尸体搬开后继续射击。炮术长的弟弟战前来舰访兄,因故未能离舰,此时也在炮台上协助作战,哥哥负重伤后,他略作安慰,仍回岗位。为了防止通气管把甲板上的火焰引入机舱,水手们把风斗卸除。这样,机舱内温度升至华氏 200 度。舱内人员冒着高温工作不息。“来远”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弹中,脚跟被弹片削去,竟毫无察觉,依然奔跑如飞。

至下午2时40分左右,中国舰队损失“超”、“扬”两舰,但“平远”、“广丙”及诸雷艇前来参战,大中型军舰仍有10艘。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退出战场,仅剩9艘。中国军舰虽然顽强作战,但缺乏统一指挥,只是以两铁甲舰为核心,相邻诸舰自行协调,各自为战,处于内线防御态势,加上弹药储备不足,大口径火炮减少发射,用小炮抵御攻击。而日舰减去了弱舰,反而丢掉包袱,便于机动,以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个单纵队,前后环击,并以速射炮的优势,向中国军舰倾泻弹雨。

第一游击队在看到“西京丸”发出的信号后迅速左转,回驶北洋舰队正面。本队则驶过中国舰队右翼,继续右驶,企图包抄后路。2时34分(一说2时45分),“平远”的一颗炮弹击中“松岛”左舷。炮弹从士官次室穿入,水雷长事务室、左舷鱼雷发射管、油槽及主炮机件均被炸坏。3时10分,“平远”炮弹击中“松岛”左舷中央鱼雷室上部,炸死鱼雷发射员2人。日本舰队也拼命回击,致使“来远”、“平远”、“广丙”相继起火。“定”、“镇”两舰临危不惧,依凭坚固装甲与敌周旋激战。3时30分,二发305毫米口径巨弹命中“松岛”4号炮位,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大爆炸,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状如雷电崩裂。军舰上空白烟翻腾,形成一个大火海。海军大尉志摩清宜等28人当场毙命,68人负伤,^[119]死者的头、手、足、肠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炸得难以分辨。那些断骨上,肌肉早被烧毁,就像火化后的白骨,粘糊糊的鲜血沿着船体倾斜方向汨汨流去,滴着鲜血而微微颤动的肉片贴在炮身上,尚未冷却。^[120]爆炸使大部分火炮被击坏,指挥塔内的舵机受损,各种电缆被炸得乱七八糟。“松岛”失去了作战能力,伊东祐亨只得调集军乐队员充当炮手和参与灭火,至4时,“松岛”悬起不管旗,命令各舰自由行动,伊东率幕僚将旗舰移至“桥立”。

第一游击队始终保持建制和高度机动,并不停地射击。北洋舰队中航速最高的巡洋舰“致远”号此时已受重伤,水线下有10英寸和13英寸炮弹击出的大洞。而水密门隔舱的橡皮,因年久破烂,难以起到防堵海水贯通全舰的作用,海水汹涌地灌入,使军舰

随时有沉没的危险。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孤注一掷,用舰艏冲角向从阵前掠过的“吉野”拦击。他在指挥台上镇静地大声喝道:

我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不过就是一死,用不着纷纷乱乱!我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这就是报国呀!

在他的激励下,全舰官兵同仇敌忾,鼓足马力,一面用抽水机不停地抽去舱中海水,一面向日舰勇敢地冲击。日舰见状,紧急逃避,并向“致远”发出雨幕般的炮弹,终于将“致远”击沉。^[121]“致远”的头部首先扎入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它仍在旋转的螺旋桨。接着,整个军舰渐渐在海上消失,留下一个巨大的漩涡。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1849年10月4日),死于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按农历推算,恰好45岁。^[122]

“致远”沉没,是北洋海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济远”管带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便驾舰退出战场,向旅顺口方向逸去。“广甲”管带吴敬荣见状仿效。这时,“靖远”、“经远”、“来远”也负弹累累,火势蔓延,便随之而去。4时16分,“平远”、“广丙”也因负伤,退出战场,驶往近岸修理。第一游击队4舰追击“靖”、“经”、“来”至大鹿岛一带。首先集中攻击“经远”。“经远”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以一敌四,从容发炮,忽被弹片击中头部,血流满面,当场牺牲。林永升,字钟卿,福建侯官人,是个性情和易的人,从不在众人面前训斥部下,和部曲感情深厚,战斗中表现极为英勇。他死之后,帮带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也先后殉国。日舰向“经远”发射鱼雷和排炮,使其火势越烧越大,至5时30分,从左舷翻倒海中,不久沉没。^[123]原先烈火翻腾的海域上空,一下被漆黑的浓烟所笼罩。

由于“经远”与敌相持,使得“靖远”、“来远”得以扑灭火焰,堵塞漏洞,施行各种损管措施。当日舰见“经远”即将沉没,掉头

前来攻击时，二舰背倚浅滩，沉着应战，直到战斗尾声。

坚持在海战场上的中国军舰，此时只剩“定”、“镇”两舰。日本舰队本队五舰环绕着“定”、“镇”继续猛攻。两舰巍然屹立在茫茫大海中，鏖战不息。日本设计“松岛”、“严岛”、“桥立”专为对付“定远”、“镇远”。舰上装备了320毫米口径巨炮，认为可以贯穿30英寸厚的装甲。在“定”、“镇”的装甲及炮塔护甲上，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深度没有超过4英寸以上的。以致日本水兵三浦虎次郎惊叹地叫道：

“‘定远’号怎么还不沉呢？”^[124]

下午5时45分，太阳西垂，暮色将临。伊东感到单凭“严岛”、“桥立”、“千代田”及负伤的“松岛”、“扶桑”，要击沉“定”、“镇”几无可能。于是下令升信号旗召唤第一游击队归队，一起驶回临时锚地。

“靖远”、“来远”见日舰退去，便往“定”、“镇”两舰方向驶去。“靖远”管带叶祖珪，知道“定远”桅楼被毁，主动升旗，招集其他军舰集中。“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平远”、“广丙”6舰尾随日本联合舰队撤退方向追击了一阵，便转舵退回旅顺口。

持续了5个小时的黄海大海战至此结束。

18日凌晨，“济远”首先驶抵旅顺。方伯谦称，“济远”舰首漏水，火炮均坏，不能发射，所以退出战场。余船仍在交战，胜负不明。旅顺的人们才知道昨天下午，中日海军已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会战。营务处道员龚照珪立即把情况电告李鸿章。

6时，天已大亮。丁汝昌率领舰队，到达旅顺口。“广甲”因天黑和慌不择路，在大连湾外三山岛搁浅。丁汝昌右面头部及颈项至右臂，被火烧伤，左臂和左脚也有撞击伤和挤压伤，被人抬下“定远”。他布置各舰人坞修理后，便考虑如何向李鸿章汇报战况了。

电文颇费斟酌。评功摆好，推诿责任，保奖参劾，都是官场的大学问。然而时间紧迫，不及核实，上午便把第一通电报发往天

津。这个电报讲了中方的损失后,声称击沉3艘日舰^[125]。

以今天的眼光细核黄海海战的失利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五条:

一是丁汝昌指挥无能。丁汝昌下令用横阵迎击联合舰队的纵队,一直是后世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即丁汝昌完全不懂海战指挥和在海战开始后中断了对舰队的控制,使得舰队失去统一协调,完全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最后陷入一片混乱。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虽行伍出身,却晓畅文墨,能自己起草文函。惟领兵15年,始终未能认真学习海军业务。近代海军是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指挥官需要多年的专门培训。丁汝昌以陆军将领来统率这样一支新式舰队,主要凭资历治军。他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有精深的海军知识,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世界海军史上的怪事。他曾这样坦率地批评一个弄坏了昂贵鱼雷的外国“专家”：“损失一个鱼雷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不满意你装成专家。我是海军提督,我能够假装知道关于军舰和航海的一切事吗?”^[126]他敢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懂行的海军军人,这份勇气固然可爱,但到作战时就一筹莫展了。负伤真是他解脱自己的最好理由。丁汝昌本人或许并不怕死,裹伤后仍坐在甲板上,用微笑和鼓励的话语激励官兵作战,但舰队最高指挥官仅能作此动作,海战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编队变阵的错误。以散漫的单横编队迎战日本单纵队进攻,是丁汝昌始料未及的,说明北洋海军的军事素质存在很大问题,造成了后来交战中的一系列被动。“定远”大副沈寿堃战后写道：“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此皆平时操演未经讲求,所以临时胸无把握耳。”北洋海军由五叠小队变为夹缝雁行的双横队,并不是旗舰的临时措置,而是早有预案的。那么,这一战术动作怎么又会失败呢?沈寿堃认为,关键在于将领之勇怯不同。“勇者过勇,不符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他问道：“致败之由,能勿咎此乎?”^[127]这个责问是切中要害的。

三是“济远”、“广甲”等舰的临阵脱离。在下午3时30分以前,中国舰队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及若干鱼雷艇与日本舰队9艘军舰鏖战,双方在舰艇数量和吨位总数上略有出入,但很接近。3点30分,“致远”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逃离战场。接着“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丙”也陆续退出,使得正面海战场上仅剩“定”、“镇”两舰,顶住5艘日舰的轮番进攻。中国巡洋舰此时都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难以继续坚持作战。退出战场修理和逃离战场回基地,对于战争结局已无很大区别。当“经远”遭到日本第一游击队4舰进攻时,“靖”、“来”、“平”、“丙”也没能给予必要的援助,等于是坐视“经远”遭劫而沉没。但是“济远”和“广甲”的退出毕竟造成军心的动摇,也使舰队左翼完全瓦解,责任十分重大。

四是军舰航速落后和弹药供应不足。前已指出,至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军舰在总吨位与航速上,都已接近和赶上中国。而在黄海大战中,日舰在航速和速射炮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北洋舰队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为“致远”和“靖远”,时速为18节,其余各舰皆在14至15节之间。日本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外,第一游击队其他各舰的航速亦在18至19节,从而取得机动灵活的有利条件。此外,日舰装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如“松岛”、“严岛”、“桥立”各装有11至12门4.7英寸口径速射炮,“吉野”装有4门6英寸口径速射炮、8门4.7英寸口径速射炮,而中国舰队速射炮却极少。^[128]根据报道,4.7英寸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8至10发炮弹,6英寸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5至6发炮弹,而同样口径的旧式火炮,其发射速度为50秒钟1发。这样,日舰在速射炮上占有压倒优势,它能把炮弹雨点般倾泻到中国军舰上来。此外,日本虽然拥有320毫米口径的巨炮,其规模仅次于英国和意大利海军所拥有的两种巨炮,但在海战中并没有发挥原先期待的作用。整个战斗中仅发射13次(“严岛”5发,“松岛”、“桥立”各4发)。相比之下,“定远”、“镇远”两舰上的8门305毫米口径主炮却大显威力。可是,中国舰队的弹药准备却有问题。海战前半个月,赫

德在一封信中透露：“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洋舰队每一门炮只有二十五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虜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一无举动！他想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129]这个问题到海战爆发时仍未解决。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弹药供应极为不足。到战斗结束前半小时，“镇远”舰305毫米口径主炮的爆破弹全部打光，仅剩15发穿甲弹，150毫米口径炮的148发炮弹也全部打完。“定远”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说“如果再过30分钟，我们的弹药将全部用尽，只好被敌人制于死命”。“敌方炮弹则绰绰有余，直到最后还一直猛烈射击”。他把弹药供应的责任归咎于天津当局者的贪污腐化。外国记者肯宁威也说，这“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130]此时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的，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张士珩自然成了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但近年来从档案中保存的北洋海军弹药统计资料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当年二月到八月，天津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提供了182发305毫米口径爆破弹（开花弹），740发210毫米口径爆破弹。海战中，“定”、“镇”二舰8门305毫米主炮分别发射了120发和94发炮弹，到海战结束，剩余的爆破弹连同陆上库存数量为243发，剩余穿甲弹（钢弹）244发；“靖”、“来”、“济”舰7门210毫米主炮分别发射103发、30发、53发炮弹，剩余的爆破弹连同陆上库存数量为852发，剩余穿甲弹163发。显然，要么军舰上其实并不缺乏炮弹，要么相当一部分炮弹没有运上军舰，被堆放在旅顺、威海的基地中。假如由于是后一原因造成弹药供应不足的话，只能说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前的作战准备极不充分，丁汝昌对此难辞其咎。^[131]

五是训练水平和装备保养水平低下。在这场海上大决战中，中国舰队没能击沉一艘敌舰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福龙”鱼雷艇抵近向“西京丸”发射3发鱼雷，居然都无法命中目标，暴露

出北洋海军训练水平极为差劲,前述编队变换队形失败,也显示出同样的问题。“致远”因水密门橡胶封条失修,导致军舰中弹后迅速沉没,以及邓世昌在舰上蓄养宠物犬,都使人们对于这支舰队的许多过去不太触及的深层次问题产生联想和思索。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在演习时做一些诸如预定靶位的“手脚”,以及克扣军饷和维修费用,据说在军队中是历来存在的,假如在战时能够击败敌人,倒也一俊遮百丑。然而没有和平年代的刻苦训练和上下同心的英雄主义精神,平日军纪涣散,军官腐败,到了战场上能指望产生克敌制胜的奇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失利,是这支军队所必然要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往在讨论海战失败的原因时,一些论者仅从装备上寻找原因,其实,倘若将日本舰队的装备与北洋海军交换一下,谁能获胜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吉野”是1893年9月底在英国竣工的军舰,“桥立”是1894年6月26日在日本竣工的军舰,能够那么快地将其编入现役并形成作战能力,日本海军的训练和管理能力不值得引人深思吗?

战败原因显而易见,却不能如实上报。丁汝昌要给自己洗刷,要为舰队变阵失误解脱,又不能得罪张士珩。说来说去,只有“济远”、“广甲”的临阵脱逃,可做一篇参奏的材料。但“广甲”管带吴敬荣,又是丁汝昌的小同乡,也要曲意回护。恰好李鸿章细心,在接到龚照琦报告战事的电报后回电查询:“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于是丁汝昌顺水推舟,把方伯谦抛出去做替罪羊。

19日,丁汝昌派“济远”前往三山岛牵引“广甲”出险,未获成功。方伯谦见远处有日舰驶来,而本舰炮械全坏,失去作战能力,便避入大连湾。后来又派“金龙”拖船去拖,也未成功,于是就地将军舰炸毁了。

20日,丁汝昌因伤势恶化,头脚皆肿,两耳流血水,眼不能睁,日流黄水,脚也发肿,皮肉发黑,疼痛异常,言语稍多,便感心悸,不能自持,请在林泰曾、刘步蟾中择人暂代职务。李鸿章选择了刘步蟾。接着,丁汝昌向李鸿章发出关于战况的第二个汇报:

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舰观望星散。日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复回归队，“超勇”舱内被敌炮击入火起，驶至浅处焚没。“扬威”舱内火起，又为“济远”拦腰碰坏，亦驶至浅处焚没。查战时，“定远”、“镇远”舱内亦为敌弹燃烧，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皆无失事。“超”、“扬”若不驶至浅处，火即可救。“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闻自该管带等中炮阵亡，船方离队，如仍紧随不散，火亦可救。“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三山岛东搁礁。……窃自日寇起衅以来，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谓日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此次“来远”、“靖远”如不归队，“定”、“镇”亦难保全，乃“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警效尤而期振作。余船请暂免参，“定远”、“镇远”异常苦战，自昌受伤后，刘镇步蟾尤为出力……^[132]

这份报告，有意打乱时间顺序，回避问题要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整个海战失败的原因全推到方伯谦一人身上，甚至造成“超”、“扬”沉没在“济远”逃跑之后的印象。又为丁汝昌整队集中的战术摆好，似乎“超勇”、“扬威”、“经远”只要不离旗舰，火灾便能扑灭，而船不致沉没。报告末尾，还为刘步蟾单独添上“尤为出力”的考语，而整个战斗究竟如何进行，却没有实事求是地说明。

李鸿章接电后，奏准将方伯谦以临阵逃脱罪名即行正法，吴敬荣虽随同逃跑，因丁汝昌称其“惟人尚明白可造”，革职留营，以观后效。^[133]24日清晨，方伯谦被从床上拖出，穿着一身茄青色纺绸睡衣，押到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斩首。

方伯谦临阵脱逃，罪无可挽，成了祭祀死难将士的一具牺牲。^[134]但仅此远不能弥补黄海大战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消极影响。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仍为部下蒙蔽，不知丰岛、黄海两战真相。龚照珩在给李鸿章报告中竟说：“此次日舰伤重先退，可

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135]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奏说,丰岛海战时,“广乙”管带林国祥独与日本三船鏖战,及船身受伤将沉,犹开足马力,突撞“松岛”,与之俱没。^[136]这种纯属胡诌的表彰,使得林国祥被破格提拔为“济远”管带,接替方伯谦的遗缺,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制造假信息,并以假信息自欺欺人,这是王朝末日吏治腐败的典型表现。

10月5日,李鸿章根据丁汝昌海战报告,为死难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请恤。邓世昌的事迹早已传遍都下,所以除同林永升一样,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外,还被赐予“壮节”谥号。同日,李鸿章还转呈丁汝昌所撰《海军劝惩章程》,援引邓世昌船沉不愿独存之例,建议今后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137]这个建议被允准了。

23日,朝廷颁谕,刘步蟾以记名提督简放,并赏换格洪毅巴图鲁名号,林泰曾赏换霍伽助巴图鲁名号,丁汝昌着交部议叙。其他得到奖励和提升的,也都是“定”、“镇”两舰的军官。此外,赏洋员汉纳根二等第一宝星和提督衔。^[138]

四、亡羊未能补牢

黄海大战,北洋海军损失惨重。羊既已亡,当务之急是补牢。战争尚在进行之中,下一步的态势,谁也不能逆料,清政府迫切谋求从国外购买军舰军火。

其实,尚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这么做了,可惜收效等于零。

购舰活动分为两条途径进行。一条是赫德通过金登干进行联系,一条是李鸿章通过驻外使节开展谈判。

事情一开始很顺利。7月5日,金登干报告,阿姆斯特朗公司能制最快速的巡洋舰,10个月交货;小型捕雷驱逐舰,5周内交货。第二天又补充说,如果中国急需军舰,英方还可将为别国定制的军

舰优先供应。^[139]16日,李鸿章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嘱其在中日开战前,购置船速23、24节的巡洋舰赶运回国。^[140]26日,金登干证实,英国尚有一艘与“吉野”同类型,但较大,速度、火力亦较高的巡洋舰,索价34万镑。另外还有一艘捕雷舰可卖。^[141]

以后便开始繁文缛节的公文旅行。直至8月2日,上谕才明确表示,拨银200万两购舰。然而中日已经宣战,英国宣布中立,在英国已不能直接购置军舰了。

战争期间倒卖军火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南美各国都有兴趣。李鸿章的老朋友,怡和洋行老板克锡透露,智利在英国建造的3艘巡洋舰,式样先进,愿照原价出售,李鸿章立嘱龚照瑗予以订购。21日,龚照瑗报告,已同智利议妥购买两舰,即“恩卡拉达”和“普拉脱”号,由智利包运,签订合同10天后便可成行。另外一艘大型巡洋舰“布兰可”号,航速22.5节,在欧洲也是精良的奇货。有人议论说,中日海战,谁得此舰谁能取胜。该船造价35万英镑,日本出价40万英镑,智利不卖。克锡透露,需要50万镑才能成交。智利又抛出一舰,马力6500匹,航速18.5节,索价26.5万镑。李鸿章认为“布兰可”十分精美,惟索价太昂。后面那舰价低但行驶稍缓。如打算购买,连同运费杂款,共需30万英镑,即210万两银子。^[142]正在筹划之际,又闻智利翻悔,说是保持中立。实际上可能是日本暗中阻挠。

接着又有消息。阿根廷本年在英国订造一艘巡洋舰,时速18节,愿用该国国旗运送来华,开价9万英镑。此事刚开始谈判,价格已扶摇直上至15万英镑。此时又得悉日本在英国订购的一舰,因挂日本旗,行驶至亚丁,被英国方面扣留。这样就更增添了军火市场的紧张气氛。在此期间,龚照瑗受命打听,能否购英国商船来华,然后再改装成军舰。

9月1日,龚照瑗报告,阿根廷军舰已经谈妥,商船则不易改作军舰。又报秘鲁有2艘1881年建造的军舰,因一艘未曾付价,便一直停在英国。李鸿章因嫌其航速仅16节,兴趣不大。到了16日,伦敦又来电报,因英国严禁军舰出口,并追究送船出保人和

借旗国，^[143]阿根廷军舰交易搁浅。

在此同时，李鸿章转托北洋海军鱼雷教习福来舍及德国泰来洋行商人德尔廉，企图从德国进口四艘鱼雷猎船。他还请驻德公使许景澄打听行情，并安排运船回华计划。但迄至战争结束，中国没能从德国购得一舰。

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谋求军舰的秘密交易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李鸿章仍不死心，决心把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10月4日，赫德从北京给金登干去电，要他想法到巴西、智利等国觅购军舰。11日，克锡通知李鸿章，智利准备抛售7艘巡洋舰。其中“爱斯米拉达”号建于10年之前，是“致远”、“靖远”的设计母型。“康德尔”号、“林则”号两艘虽小，航速达21节。李鸿章怦然心动，认为至少应立即买下4舰。^[144]谁知智利与阿根廷关系忽然紧张，不愿出售军舰，这事又成泡影。龚照璠只得调过头来，重新谋求另一桩巴西在德国订购军舰的转售贸易。同样，新的努力依然劳而无功。

11月上旬，西方报纸透露出“爱斯米拉达”号被日本购去的消息。克锡立即急电询问，回讯是卖给了厄瓜多尔。无疑这是为日本代买的。智利的军火代理人表示，中国只要把15万英镑存入某一银行，并愿意把船价出到25万英镑，他就可保证军舰不落人日本手中。但北京又不要“爱斯米拉达”号，而要其他军舰。这些朝三暮四的变化和外国掮客的两面手法，加上日本人的活动，终于使购买智利军舰的计划完全落空。

11月22日，金登干从伦敦向北京发出如下电报：

“爱斯米拉达”号巡洋舰已售与日本，由法尔巴来索至日本港口仅保险四十万镑。其他各舰除“布兰可”以外，料均将为日本抢购。我们认为购舰的谈判业已结束。^[145]

这天是旅顺口失守的日子。中国人在世界军火市场上与日本的竞争也归于失败。中国人此时深切地感受到没有自己国家基础军事工业的苦涩和被动。12月4日，“爱斯米拉达”号悬厄瓜多尔国旗，离开法尔巴来索前往日本，军官和水手都假充作旅客。这艘

军舰,后来改名“和泉”号。

黄海大战后,汉纳根声名大振。他要求派他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才继续留在北洋海军服务。这种要挟,为中国方面难以接受。尤其他刚得宝星,再赏穿黄马褂更无可能。于是汉纳根离开了海军,到北京活动,他给翁同龢写了《谨拟整顿水师刍言》,建议今后海军衙门要直接管理海军船只、船坞、制造局、人事和经费。海军衙门现时应派一精明公正的洋员为海军司,驻天津总理各事,以期大战大胜。水师提督应派一洋员帮同督理操练打仗事。这里提到的海军司中,似乎就有他本人的影子。10月28日,他又建议朝廷另建一支10万人的新式陆军,这是袁世凯组建北洋新军之肇源。次年3月5日,汉纳根同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儿埃尔莎小姐结婚,不再过问军事。后来他投资开发山西并陘煤矿,成为一个富翁。

李鸿章开始为北洋海军重新寻找一位外籍顾问,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早在10月21日赫德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最先透露出这个意图。11月4日,赫德前往英国公使馆,向欧格讷转述了皇帝的圣旨。9日,他又正式通知了金登干。经历了当年撤旗事件之后,要重新聘请琅威理,这对极要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件难堪的事。但既然别无选择,干脆就把话说得十分坦率。13日发布的上谕宣称:

琅威理前在北洋训练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在本年战事未能得力,亟应力加整顿。着总税务司赫德传谕琅威理迅即来华,以备任使。^[146]

琅威理此时在英国得封港担任后备舰队指挥官兼“毁灭”号军舰舰长,统率着皇家海军后备队的38艘军舰。他对于邀请他重返中国大摆架子。公开的理由是英国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现役军人身份前往中国,又不愿辞去现任的海军职务,只有在战后当英国政府许可时才可能前往。但私下却提出了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如必须由皇帝以玺书形式颁给他海军最高职衔等等。^[147]

他始终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于是赫德指示金登干另外寻找一个海军顾问。

两个人选提出来了：一个是海军预备役上尉邓禄普，他是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驻中国的代表。另一个是前日本海军顾问，现任英国皇家海军炮厂监督的英格斯。对于邓禄普，垂赛海军上将认为，他比琅威理高明得多，但是对付中国人时可能不够耐心。^[148]

英格斯便成了热门人选。有意思的是，他竟是金登干的表兄。11月20日，金登干约他和垂赛上将在军人联合俱乐部会面，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英格斯表示，他并不想做中国海军统帅，把全部的舰队掌握在手。他的目的只是教练，有需要时，偶然统帅全军，以使中国的统帅和舰长们能够学习怎样指挥。英格斯说，他和日本的官方关系早已断了。他强调愿意“割断旧日的情缘，在中国另结新欢”^[149]。

他们的谈判真有些一厢情愿，以致赫德不得不给金登干浇一兜冷水。他回复说：“英格斯一定不行。曾经在日本充过教练的人，在此间不会受到欢迎。”^[150]他算是摸准了中国人脾气。天朝的自大、虚骄和偏见，决不会接受英格斯这样的人。

还在金登干往返于伦敦和得封港之间，为琅威理重返中国进行斡旋交涉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美国人马格禄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薪300两。通过丁汝昌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151]

马格禄原是天津的一艘拖船“金龙”号的船主，并无海军背景。在此之前，曾协助北洋海军前往三山岛拖拽搁浅的“广甲”出礁未成。北洋海军的一位洋员评价他说：“彼已过中年，且以沉湎于酒著名。此老迈之要手殆视此役为莫大之机会而跃赴之无疑，然以斯人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丁提督，此事尤为残酷。”^[152]自他上任后，并未为海军做出什么积极贡献。聘他任职，实是多此一举。

这又要分析中国人的心理了。李鸿章为什么非要给北洋海军找一个外国顾问，甚至完全不顾他是否精通海军呢？李鸿章指望

马格禄来指挥？来管理？还是仅仅自我安慰一下？

黄海大战的同一天，清军在朝鲜陆战场的防线完全崩溃。叶志超率队从平壤撤退，狂奔五百里，直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平壤失守使得朝野震动。

17日，军机处决定给李鸿章处分，拟了两条：一是严议；一是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请皇帝定夺。皇帝选择了后一个处分。

9月19日，黄海大战后的第三天，皇帝下旨着赶紧修复各舰，以备再战。23日早晨8时，日舰“浪速”、“秋津洲”驶至威海附近挑衅。炮台开炮后才退去。24日，烟台、旅顺、大连湾附近洋面，均发现日舰行踪。皇帝命海军加强防御。李鸿章同日命令丁汝昌、龚照瑛，务必于十日内修好“平”、“丙”、“济”、“靖”4舰，在威海附近游弋。又命四“镇”同大雷艇在口外巡探，以壮声势。^[153]“定”、“镇”等舰，则需一个月方能修竣。

28日，李鸿章给丁汝昌、刘步蟾去电，对北洋海军今后的指挥权作了安排。电报说：

禹亭伤痕渐愈，前虽据情奏令刘镇代理，不过代拆代行方式，旨令伤愈仍行接统。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望仍勉力视事，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154]

这份温词慰勉的电报，表现出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极大关注。虽然他深知丁汝昌不通海军，但对北洋海军其他将领更不放心。按照海军的排名序列，林泰曾位居第二。但林泰曾为人柔弱，故在丁汝昌负伤后，李鸿章超擢了刘步蟾。刘步蟾性格刚烈，锋芒毕露，能否协调全军，李鸿章没有把握。权衡之下，他希望丁汝昌早日重返岗位。

28日，李鸿章通知丁汝昌和旅顺守将，根据情报，日本将派大队北犯，尤其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犯旅顺后路，毁我船坞，命令各炮台加强戒备。海军加强修舰，并择可用者常出口外，靠山寻

查,略张声势。10月2日,李鸿章再次电告,日本将派2万陆军,乘船在旅顺附近或山海关一带登陆。“定”、“镇”必须加紧修理,数日内出海,往来威、旅之间,使得日本运兵船不敢深入。他警告说,此事关系北洋全局甚大,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延宕,误我大计,定行严参!丁汝昌虽病,但必须认真督催,不得被人把持摇惑。4月,李鸿章第三次发出指令,日本26艘运兵船即将内犯,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济”、“靖”、“平”、“丙”6舰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在电报中,李鸿章意味深长地说:“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蹶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155]

可是丁汝昌仍不理睬。不知出于胆怯,还是伤势未愈,或者军舰确实难于修复,北洋海军依然毫无动静。及至9日,终于引来一道严厉的上谕:“丁汝昌臂受板伤,因流黄水,并非伤重难期速痊者可比。而请假调理,竟可置身事外。着吴大澂确切查明。”^[156]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汝昌宣布回舰视事,订期出海。10月16日诸舰修理竣工。18日下午5时,北洋舰队从旅顺开拔,前往威海。这时距黄海大战,整整已有一个月了。

局势如此紧张,北洋海军却按兵不动,李鸿章固然想保存军舰实力,指示丁汝昌不必与日舰寻战,但并没有允许其伏匿军港,避战不出。从这点上研究黄海海战的得失,不难看出,北洋海军损失的不仅是5艘军舰,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作战的信心,从而自动地放弃了制海权,再也不敢与日本海军角逐,为日本进攻中国本土敞开了大门。北洋海军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拱卫渤海海湾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据原“广甲”管轮,此时留在“定远”舰差遣的卢毓英记载,北洋海军“诸君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驰日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魂,亦触目惊心。谁无父母,孰无妻子,寄生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人孰无情,谁能遣此,所以作醉生梦死之态者,亦知身非金石,何可日困愁城?不得不假借外物,庶有以遏制此方寸地也”。^[157]这便是“定”、“镇”二舰在旅顺基地修理期间北洋海

军的内幕真相。

9月27日,皇太后和皇帝在西苑颐年殿东暖阁召见翁同龢与李鸿藻。太后命翁同龢密往天津,询问俄国公使喀西尼调停之事。并命翁同龢“责李某何以怠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不问乎?”翁同龢表示此行只代朝廷传述:“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次日清晨,翁同龢微服出京,在通州乘一种叫做“卫膀子”的小船,航程40余小时,30日上午到达天津。关于此行,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他“见李鸿章传皇太后、皇上谕慰勉,即严责之。鸿章惶恐,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158]但在野史里,人们记录的是另外一番内容: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薄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159]

此话因系亲李派人士所记录,倒也不能全信,比如翁同龢回京后就没有“不敢言战”,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李鸿章阵营对前些年户部停止购买军舰的不满,也有推卸战败责任的意思。

9月29日,朝廷起用罢黜十年的恭亲王奕訢,命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事务,会同办理军务。恭亲王龙钟老态,已经毫无办事魄力,也没法力挽狂澜了。

黄海大战的号外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击破敌之气势,使我日旗高照黄海之波涛。”

军方却在加紧休整,准备发动新的战争。

海战之后,日舰“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回国修理,余舰在仁川进行整编和抢修。至9月22日深夜,各舰抢修基本完工。这天下午,伊东祐亨命“浪速”、“秋津洲”前往威海、烟

台、大连湾、旅顺口一带侦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23日下午5时出港,分作两起,向海洋岛方向巡弋。24日午前,在大洋河口同“浪”、“秋”会合。派“磐城”、“小鹰”及23号鱼雷艇前往鸭绿江口测量航道,为侵入辽东半岛做好准备。

9月2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将陆军第一、第二师团及第二十二混成旅,编成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与入朝作战的山县有朋大将指挥的第一军协同作战,分左右翼侵入中国东北地区。从9月22日至10月22日,日舰一直在渤海湾及西朝鲜湾地区大肆活动,侦察军情,补充弹药,运送军需。10月19日,大山岩和伊东祐亨在朝鲜大同江口的渔隐洞海军锚地会晤,协商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的地点问题。根据海军的建议,登陆点选在花园口。同日,19艘运兵船抵达渔隐洞,20日又来6艘,22日又来11艘,装载第一师团的部队,集结待命。

10月下旬,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正是登陆作战的良好季节。23日上午8时,新编组的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3舰起锚出航。接着,本队“桥立”、“严岛”、“浪速”,第二游击队“扶桑”、“葛城”、“金刚”、“高雄”诸舰,护送16艘运兵船,驶出大同江口。24日早晨6时30分,抵达登陆地点花园口。先期于22日出发的“八重山”、“千代田”、“筑紫”、“鸟海”、“大岛”5舰已于23日黄昏时占领了登陆地带。^[160]

花园口是辽东半岛南岸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登陆点,散散落落地住着四十来户居民,西南距金州80余公里,距大连湾100公里,距貔子窝约37公里。从这里登陆,东可进攻岫岩州、九连城、安东,西可进攻金州,袭击大连湾、旅顺口的后路。由于海岸较浅,大船不能抵达,清军没有设防。日军在此登陆,可谓出其不意。但是花园口锚地距海岸约4海里,登陆部队需换乘汽艇牵引的舢板,还得在满潮时行驶运送。且海湾内礁岸环立,地势复杂,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日军分三起在此登陆,整个行动延续至11月7日方才结束,前后共达半个月。^[161]共运送登陆人员24049名,马2740匹。

按说登陆和抗登陆作战是最为惨烈的作战样式,在没有空军配合从而构成海陆空立体作战,以及没有大型登陆舰船和两栖车辆的情况下,防守方依靠防御火炮体系和以逸待劳的纵深配置,灵活快速的增援速度占据主动,使得登陆方的进攻及上岸后有效地控制登陆场并压制防守火力都极为困难。在近代抗登陆作战中,清军曾取得过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和1885年淡水之战的胜利。从世界范围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登陆作战,大多数都失败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辽东花园口的抗登陆,还是后来山东荣成的抗登陆,清军都没有有效地组织实施,日军几乎是在平静安逸的状态下实施了登陆行动。

24日上午8时,驻守貔子窝的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已经得悉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消息。可是到26日晚间,李鸿章才获得两项不相一致的报告。一是驻守大连湾的总兵赵怀业来电,称有倭兵2000人在貔子窝登陆;一是庆军提督黄仕林来电,报告有倭船36艘,带民船百余艘在花园口登陆。李鸿章感到困惑,命令防守旅顺诸将速探严访,并于来路要口,多埋地雷,散队埋伏,不得轻易接仗。^[162]

情况不久便明了,清军却毫无动静。因为也在24日,日本第一军从朝鲜水口镇渡过鸭绿江。25日,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形势一片紧张。此时旅顺、大连、金州地区的守军,包括姜桂题、程允和、黄仕林、张光前、卫汝成、徐邦道、赵怀业部约30营。29日,津海关道盛宣怀曾给驻守金州、旅顺口诸将去电,称与其坐待敌人来攻,何不乘其未定而攻击之?其实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28日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徐邦道给李鸿章去电,称部队不敷分布,请从旅顺口拨兵增援,李鸿章就明确电复说,他们只要各守营盘,来路多埋地雷,并无守城之责,拒绝增派部队。^[163]李的意图,是扼守旅顺后路南关岭,以逸待劳。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消极防御战略,为日军在花园口顺利登陆,最后攻占旅顺口创造了条件。

11月3日,日军第一师团由貔子窝出发,西攻金州,6日占领金州。7日,日军进攻大连湾。赵怀业望风披靡,将北洋经营多

年,筑有大批坚固炮台和充裕储备的大连诸炮台拱手留给日军。这样,旅顺口后路防御俱失,旅顺基地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日本部队在花园口登陆时,北洋海军诸舰停泊在威海军港,毫不知情。25日晨,2艘日舰至威海口外,故作疑兵。丁汝昌率“定”、“镇”、“济”、“靖”、“平”、“丙”及2艘鱼雷艇出击,日舰循去。28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带舰前往大连湾大孤山一带游巡,探明日舰登陆情况,当晚,丁汝昌率6舰2艇启航,次日上午抵达旅顺,下午前往大连湾。行至东北河,以军舰过于单薄,前去吃亏无益为理由,又说要修理“定”、“镇”的锚机,便折回旅顺了。^[164]

皇帝对海军在黄海之战后毫无动作,十分不满。11月2日,撤消丁汝昌所有前次议叙之案。3日又谕,倭氛现已迫近金州,旅顺后路危急,着李鸿章速调就近海防兵勇往援,不得以金州非直隶辖境而稍存委卸。6日再谕海军前往貔子窝截击日军各舰,阻其后路。^[165]然而到了此时,丁汝昌考虑的已不是如何进击,而是如何撤退了。

11月5日,日本军舰来旅顺口窥伺,被海岸炮台击退。这个消息没有激起军民的斗志,反而更使旅顺口陷于混乱。老百姓早已开始逃难,市面上十室九徙,食物无处可买,衙门机关里的官员也纷纷走避。旅顺船坞的工匠仅剩寥寥数人,马上连工也要开不出了。丁汝昌向李鸿章拍电,请求返回威海。他陈述了三条理由:

一、大连湾倘若失守,敌人必扑旅顺口后路。我方军舰停泊口内,不能施展,无能为力;

二、敌舰来攻,旅顺口口门窄小,我舰不能整队出击,且“定远”、“镇远”出口,还得等待涨潮。倘若过急,冲出反而不易;

三、旅顺口外敌人快艇过多,夜间偷袭,我舰缺少快炮,实难防备。^[166]

李鸿章考虑再三,回电表示:“旅本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汝自妥酌。勿得张

皇胆怯,致干大戾。”^[167]这封电报,实质是要丁汝昌在保持镇定,不要惊慌的前提下便宜行事。在李鸿章心目中,北洋海军是他惨淡经营多年的私产和政治筹码,因此,军舰决不能毁弃。

前线吃紧,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庆贺日期却来临了。封建君主不仅是“朕即天下”的专制者,同时也是臣民百姓的道德楷模。对于这两条,慈禧太后从来都是运用精熟的。10月29日,她下旨停止原定11月2、3日(十月初五、初六日)由皇帝率王公百官和皇后率妃嫔、公主、福晋、命妇举行的筵宴,^[168]仅在生日那天(11月7日,十月初十日)前往皇极殿,接受皇帝和王公百官的庆贺。^[169]这场筹备多年,耗银近一千万两的六旬大庆,在日军的炮火下,草草收场了,这不能不使老太后愤愤不平。当她乘舆抵达锡庆门外,再迈步进入皇极门前那片开阔的前庭时,正好目睹九条蟠龙在海浪中腾跃的著名照壁。那一瞬间,不知她良心是否萌动,反思过自己的肆意挥霍给海防建设带来的损失?抑或仅仅怨恨日本人坏了她的大庆?抑或诅咒前方将士作战不力?

即使庆典缩小了规模,人民群众还是把祝寿同前线败绩联系起来。有人将庆寿贺词中的“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改为“一人庆有,万寿疆无”,表达对这场带来灾难的庆典的愤懑。

正是在11月7日,大连失守了。

这天晚上,丁汝昌见局势紧张,便带舰匆匆离开旅顺,返回威海。但局势并没有像他估计的那样严重。日本占领大连湾后,休整十天,所以李鸿章立即给丁汝昌去电,称“昨电旨方令汝与刘步蟾带船往皮(貔)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力固不能,然如此仓皇出走,恐干重咎!”并责问他为何不带尚未修竣,但能勉强行驶的“来远”一同返威?^[170]

由于旅顺告急,朝旨严催派兵往援。金州、大连湾失守,已使旅顺后路接济切断,海军撤离旅顺,更使旅顺的海上交通断绝。8日深夜,李鸿章电召丁汝昌立即来津面谈机宜。电报说:“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刻即起碇,

勿迟误。”^[171]

10日,丁汝昌率舰队到达天津,与李鸿章、汉纳根商讨军事行动。汉纳根认为,军舰护送兵船去旅顺,会给海军机动带来牵制,运船也难保护。丁汝昌不愿护航,宁愿带6舰赴旅顺口巡游,遇敌即击,相机进退。^[172]这时,他接到总理衙门转来的措词严厉的上谕:

前于初三日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飭李鸿章身亲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此外电询侦查之件,亦多无复电。当此军情万紧之时,岂容如此玩误。现在旅防日危,该督更无筹画,但付之“焦急”两字。“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起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贻盗矣!着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慎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着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173]

天津会商决定,丁汝昌率舰回防旅顺,原定由海军护航运往旅顺口的嵩武军章高元部八营,改用商轮运往营口登陆。13日下午3时,丁汝昌率领舰队离沽,翌日上午9时到达旅顺口。他登岸拜访陆军诸将领。谁知到了下午6时,又忽然以日军已到达距旅顺30余里的三间铺,崂崂嘴炮台附近的小平岛,也出现数百日兵和2艘鱼雷艇为由,仓促撤离旅顺。^[174]这次撤退,显然是违反天津会商精神的。

战争爆发后,威海守军封锁了刘公岛东西两侧进入海湾的航道,仅在东口留下一个600码宽的通道,用浮鼓做出标志。由于连日风大水溜,浮鼓向东飘流,又逢枯水季节,“镇远”舰在14日凌晨进入威海军港时,不慎触礁。弹药舱下,撞出三条口子,分别长6.5尺、3.5尺和9尺。帆舱下撞出一条口子,长17尺。煤舱锅炉

舱下,也撞出三条口子,最长的一条达11尺。此外在水力机舱下,有一道宽2.6尺,长3.9尺的裂缝。^[175]海水顿时涌进“镇远”底舱。管带林泰曾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感到事故后果严重,又担心别人认为他畏战,故意制造事故,因此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损管措施后,于16日一早服毒自杀,时年43岁。

“镇远”的触礁事故,使得原先力量已很单薄的北洋海军,再也不敢出海作战了。14日夜间,李鸿章给丁汝昌拍电说:“内意视旅极重,章镇已令由营口去,此外无援,仍赖汝率船时往游弋也。”^[176]20日又去电询问,“兵船何时始能赴旅游巡?”^[177]仅是催促而已,李鸿章自己也无可奈何了。

16日,皇帝颁谕,以旅顺告急,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为由,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同日召见直隶候補道徐建寅,派他前往北洋察看。^[178]次日,徐建寅又接军机处转来的谕旨,命他详细察看“定远”、“镇远”等舰炮位情形,并赴机器局查验炮弹现存若干,是否敷用,据实上奏。^[179]又命李鸿章,将海军各舰开赴大沽口,让徐建寅详查。^[180]

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攻。18日,徐邦道率部在旅顺北面土城子一带阻击日军,因后援不济,退回旅顺。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路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诸炮台,并占领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在金州组织反击战没有成功。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琦不顾李鸿章的死守训令,乘小舟从旅顺逃往烟台。22日,旅顺陷落。北洋海军惨淡经营了十余年的远东第一流海军基地就此落入敌人的手中。

根据旅顺口的战略位置和防御配系,只要有旺盛的士气和充足的给养,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也证明了这点。然而清军仅守6天就告失守,这支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

事后有人传说,李鸿章闻日军战胜则喜,闻旅顺口陷落则面无戚容。他的老朋友吴汝纶为他辩诬,说李鸿章听到平壤之败,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181]其实此时,李鸿章的心中一定比任何人都苦涩,又岂是

一个“威容”所能概括的？

五、威海卫保卫战

朝鲜事件初起时，朝廷中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实力都是估计不足的，将日本看成是“蕞尔小邦”，以为只要天朝震怒，便可一举荡平，因此主战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开战之后，随着中国海陆军的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及其恭亲王、庆亲王、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开始试探妥协的途径。根据恭亲王建议，太后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翁同龢等帝党人物，虽然提不出挽救时局的良策，但坚决反对议和。在他们看来，妥协就是卖国。他们保持高亢的抗敌论调，某种程度上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

战争爆发后，北京的粮价开始飞涨，从最初的3两4钱购140斤攀升至12两购100斤。京官们开始安排眷属还乡。北京至津沽的车价涨至七八两乃至十余两也往往不可得。京师绿营兵奉调出征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千云霄”之惨。目击者记载：“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薰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按指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182]这与成千上万日本男女挥舞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枢臣默坐哀叹。最后决定起草诏书，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丢失疆域城池，本该深究查办，但此时撤去李鸿章，就无人收拾局面，统领将士。翁同龢日记曾载，慈禧太后在指斥李鸿章贻误军机后，也深感淮军难驭，只能表示暂不可动。这就是近代军阀控制军队的厉害之处。

26日,慈禧太后在仪銮殿单独召见枢臣。在讨论完旅顺局势后,她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前方形势紧迫,内廷却闹家务,不由得枢臣大吃一惊。

瑾妃和珍妃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这对姊妹花刚进宫时,一个14岁,一个12岁,都是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并不懂得什么政治。进宫之后,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后不睦,她们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宠爱。尤其是聪明伶俐的珍妃,不仅参与协助皇帝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披阅奏章时,也从旁窥伺,体察懿旨。她还恃宠在皇帝面前举荐私人,一个是她的兄弟志锐,一个是她的蒙师文廷式。皇帝虽然亲政,却缺乏羽翼,难以同太后形如密网的控制相抗衡,极想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驱使,又苦于难觅亲信。不管这二人是否牵扯两妃的裙带,都不失为当朝名士,思之再三,决定提拔志锐为礼部侍郎,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她甚至还效仿慈禧卖官鬻爵,河南巡抚裕宽为谋福州将军一职,通过太监高万枝去走她的门路,被李莲英发觉告密于慈禧太后。

在老于世故的皇太后看来,年方十八的珍妃不正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吗?这是她断断不能容忍的。且看朝中,志锐公然参劾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御史安雄峻、张仲忻、侍读学士文廷式、侍郎长麟也点名指斥李鸿章,其势汹汹,宛然形成一股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不大遵从她的控制。而在后宫波谲澜中,她又偏向娘家侄女隆裕皇后,于是便迅速做出罢黜两妃的决定,并授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远地放逐出京,又命内务府处死高万枝,将河南巡抚裕宽开缺。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有泼辣手腕。皇帝虽然主战,内外战场均是不堪一击,以至次日翁同龢到瀛台看望他时,发现皇帝居然“意极坦坦”。

在两妃遭贬的同日,皇帝以丁汝昌救援旅顺不力,厥咎尤重,将他革职留任,命其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又促李鸿章即日前往大沽、北塘巡阅布置。次日一早,李鸿章出巡沽、塘。他给威海守将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张文宣发电:

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

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酋首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准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183]

这是李鸿章对威海保卫战下达的指令。其要点是:第一,不许放弃炮台逃跑;第二,敌舰来攻,丁汝昌应率舰出港,依辅炮台火力,在近海作战,不得前往大洋决战。

27日,御史安维峻等京官60余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称前方将士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汝昌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廷,绝不能伤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安维峻们预计,若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故建议将丁汝昌即行开缺,授署理长江水师提督彭楚汉为海军提督,或即擢汉纳根为海军提督。命新提督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184]显然,这些高谈阔论不着边际的北京言官们是很富有想像力的。但这种被称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监察制度,同样不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28日,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惟恐不速……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慑将弁畏葸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185]12月12日,他更指名请将丁汝昌、龚照琦以贻误军机将领明正典刑。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他以捐资正八品的县丞出身,竟然做到从二品的巡抚,这在当时堪称凤毛麟角,全

凭“忠直”出名。这一系列的参奏,引出17日皇帝发布上谕,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86]18日,皇帝又命李鸿章详细遴选,奏保海军统帅,并提出李和、杨用霖、徐建寅三个人选供李鸿章考虑。20日,李鸿章回奏,以为三人均不合适。21日,皇帝进一步通知李鸿章,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即着刘步蟾暂署,着李鸿章遴选保奏。丁汝昌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迅速起解。^[187]

消息传来,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海军刘步蟾暨各舰管带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和督办军务处,恳吁挽留丁汝昌。理由是临阵易将,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军民不免失望。23日,皇帝再谕:“丁汝昌着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在向威海传寄这一谕旨时,附作说明:“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188]他的这一解释,恐怕是某种幕后活动的结果,但到此时,也确实难以挑出合适的海军提督人选了。

此外,还需对舰队其他人事问题做出安排。林泰曾死后,“镇远”管带暂由副管驾游击杨用霖暂行护理。杨用霖,字雨臣,福建闽县人,17岁投人“艺新”炮舰,随管带许寿山学习英语、枪炮之学,靠苦心钻研、掌握业务而得晋升,英语和驾驶技术均极出色。琅威理誉他将来可成为亚洲的纳尔逊,严复称他日后必为海军名将。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镇远”管带为左翼总兵,循例当由此时军阶最高的中军右营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升任。而上谕却指名“平远”管带李和,说闻他“练达出色,且赋性忠勇,如果属实,即可调充‘镇远’管带,以期得力”。^[189]李和是广州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在同学中不算出色。1889年授后军前营都司,管带“镇南”炮艇,旋任“平远”管带,在黄海大战中表现还属勇敢。但是,且不说从都司擢至总兵是连跳回级,就凭他朝中有人保奏,已使李鸿章十分不悦。因此,最后仍定杨用霖暂时护理,俟事机稍定,再择人简放。这样,既显示破格使用,鼓励士气之深意,又把对李和的任命撇在一边。

12月8日,徐建寅奉旨抵达威海,9日往刘公岛查验北洋海军,10日返回烟台。他本是参与订购“定”、“镇”诸舰的当事人,又翻译过《水师操练》、《轮船布阵》等海军著作,所以同丁汝昌讨论战守机宜,舰艇机窥,皆深知要领。丁汝昌请求将他调派威海,或派留船,或为提督帮办,或为监战大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建寅又被皇帝召回北京,担任督办军务章京。他回京后,对于所考察的北洋海军主要军官写出了如下的评语:

“定远”管带刘步蟾:“言过其实,不可用”;

代理“济远”管带林国祥:“人尚可用,操守难信”;

“来远”管带邱宝仁:“奸猾不可用”;

“靖远”管带叶祖珪:“朴诚可用”;

“平远”管带李和:“朴诚可用”;

代带“镇远”杨用霖:“朴诚可用”;

“广丙”管带程璧光:“尚可用”;

“康济”管带萨镇冰:“朴诚可用”;

“威远”管带林颖启:“尚可用”。^[190]

我们不知道徐建寅这些评价的依据,却从他的评语中,打开了观察北洋海军将领的一扇窗户。在这番紧锣密鼓的人事考核和调整中,威海卫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占领旅顺后,日本决策层对新的作战方向产生分歧。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主张在辽东扩大战果,派兵在山海关登陆,威胁北京,逼使清政府投降。首相伊藤博文则认为,如果直隶作战取得成功,中国必定满朝震惊,暴民四起,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引起列强干预。其次冬季在直隶作战,交通不便,即使经此辛苦占领北京,而清政府瓦解,日本失去和谈对手,在政治策略上反而不利。据此他向大本营提出,在辽东半岛坚持冬季宿营,以陆军之一部及整个舰队进攻威海卫和台湾,从而消灭北洋海军主力,控制台湾。

12月4日,桦山资纪正式通知伊东祐亨,大本营决定由第二

军第二师团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合编成“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进攻威海,消灭北洋海军。^[191]

23日,“高千穗”前往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爱伦湾、桑沟湾一带侦察,并把情况向伊东作了汇报。早在1889年,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已到荣成湾进行间谍活动,发现荣成湾口宽约4海里,水深4~5呎,海底为泥质,便于舰船抛锚,距威海30海里,是袭击威海后路的最佳路线。伊东迅速做出决定,将荣成湾选作日军的登陆地点。

甲午战争前,山东全省陆军的三分之一分布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登州府地区,拱卫威海卫海军基地。道员戴宗骞统率绥字军4营10哨共2100人,驻威海北帮;总兵刘超佩统率巩字军4营共2000人,驻威海南帮;总兵张文宣统率北洋护军2营共1000人,驻刘公岛;总兵孙金彪统率嵩武军3营、烟台练军1营共2000人,驻烟台;道员李荣光统率嵩武军、登州练军、荣字练军各1营,共1500人,驻登州。总计兵力8600人。中日宣战后,清政府迅速扩充增补山东半岛军队,以对付日本的覬覦。李秉衡认为,日军可能从宁海、酒馆、威海后路、荣成四个方向来犯。他在宁海的上庄、城关、龙门布置了12营3哨共6300人;调遣集中在烟台附近的济字右营、精健前营、泰靖左营、河成左营共2000人前往荣成县城附近,并在俚岛附近增派河定左营,均归副将阎德胜节制。戴宗骞也调派巩字中营3哨300人,由哨官戴金镛统辖,驻扎荣成湾的龙须岛。荣成地区的清军兵力达到2800人,整个军队分布在成山头、荣成至宁海、烟台的300里防线上。

在当时,海军基地防御体系的指挥权属于海军还是陆军,各国做法不同。清军规定由陆军管辖,但没有统一协调基地管理和防务的机构。此外,海军基地内的局、坞负责人,皆由北洋大臣通过海军营务处管理,不向海军提督负责。从设计者的初衷看,显然是为了防止军人专权,企图让各军种、各部门相互制约,但结果造成指挥系统的多元化。战争爆发后,戴宗骞和张文宣皆要求扩充军队,直接守卫威海基地的陆军部队达到1万余人,均不受海军提督

的节制。丁汝昌只能以海军提督的身份和前淮军将领的资历,同戴宗骞协调。戴宗骞待部下刻薄,克扣士兵军饷以肥私,造成士兵的不满。丁汝昌出于对威海防御的考虑,曾劝说戴宗骞发给欠饷,并从海军经费中挪款为刘超佩的巩军垫饷。这不仅没有使戴宗骞回心转意,反而加剧了二人的矛盾,^[192]对于保卫威海基地是十分不利的。

12月中旬,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向李鸿章推荐的两个美国人威理得、浩威到达烟台。据刘含芳接见后向李鸿章汇报,他们声称自己挟有奇术:建造的炮台,敌人海军无法攻入;不使用水雷就能在48小时内使炮台口岸布置严密;运兵登陆,经过敌炮台,鱼雷艇接近敌舰,都能使敌人看不见;无论敌舰开行停泊,都能将其击沉,亦能将其活捉;经过敌方布雷区无危险,接近敌人炮台舰队无声响;能将商船改制成精强战舰。^[193]美国人还宣称,倘若试验见效,中国当付给他们1万美元。若用此法杀敌建功,应酬给100万美元;若用此法擒敌军舰和运输船,付给该船价值15%的报酬。^[194]

刘含芳信疑参半,但想到如果真能试有成效,击沉日舰,倒是转危为安的良机。决定18日派“左队一”号鱼雷艇将他们送往威海,又通知北洋海军中的留美学生,对他俩进行考验。丁汝昌与这两人交谈后,仍不敢决定,请示李鸿章,李鸿章又请示北京。神秘的美国人竟使皇帝也着了迷,22日下谕,同意在试验有效的前提下,付给定银。

从京津到威海,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怪人身上。丁汝昌特地把探听来的消息详细报给朝廷。关于所称敌舰无法攻入口岸,是用药水装管,埋于口门,似沉雷法,价省功倍。关于运兵登陆和舰船行驶不被看见,是用药水装管,用机器喷发出烟,使敌闻烟退却。关于击沉、活捉敌船以及改制商舰为军舰,均是在舰上装备药水管。而“水师无响声”云云,是翻译错误,亦是用药水毁敌舰队炮台。两人言之凿凿,把中国官员都弄糊涂了。战争如同化学试验,谁也不知应当如何辩驳论证。而美国人开列的试验器材,烟

台、上海均无货色，需要转询香港。最后李鸿章表态：“所言情形，是必精于化学者，中国苦无此种教师，无论其办法有无把握，不妨试验，留之必有用处。”^[195]这样，又等了一个月。直到次年1月中旬，好不容易通过怡和洋行把药料买齐，又从烟台购油四种，存在民船，准备运往威海，不料19日竟被火烧去。威理得至此不愿再干，打算回国。浩威自告奋勇，愿意留下，这场临战前的插曲才告收场。

到了年底，朝野对军事局势绝望，御史安维峻上奏，公开搏击当政者。他说李鸿章有私财寄顿倭国，故不欲战，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料军火，日夜望倭贼东来，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有言战者，动遭呵责。还迷信美国人有雾气者，以此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与其争论。他又批评正在秘密商议的议和计划，说市井流传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皇太后既已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李莲英何等人物，岂敢干政？如果属实，当律之祖宗法制。最后他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以振士气。^[196]

安维峻在思想观念上属于正统派士大夫，攻击李鸿章的罪责，也有很多不实之辞，但他的奏疏，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李鸿章的愤怒不满。尤其是锋芒直指慈禧太后，说出了政界最为忌讳的内幕，真是极有胆略的。这番高论，使得怯懦的皇帝感到震骇，被踩住了痛脚，出于无奈，决定交刑部治罪。经翁同龢极力圆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顿时，安维峻名满天下，访问者萃于门，钱送者塞于道，大名鼎鼎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决定亲自护送他前往戍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就在处置安维峻的同日，朝廷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197]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将前线的最高指挥权，从淮系转到湘系手中，是对李鸿章的一种惩罚。接着，便对北洋海军的指挥权开刀。

徐建寅从威海返京后，曾访晤翁同龢等京中大老，细言丁汝昌

不能整顿海军,闽籍军官结成帮派等情况,保举候补道马复恒取而代之。^[198]1895年1月7日,刘坤一给李鸿章的电报指出:“海军提督缺悬已久,此间公论,均以马道复恒力能胜任。事难再缓,似可径行保奏。”^[199]接着又有上谕,飭马复恒来京引见。李鸿章对这种攘夺海军指挥大权的做法显然不能接受,他立即给丁汝昌去电,询问马复恒才具魄力,是否尚堪造就?黄海之战,是否在船驾驶?中外各员,能否妥协?望即日筹度,据实密复。^[200]

马复恒是三品衔候补道,差使为办理北洋海军营务处,以前曾管带“操江”、“康济”、“海镜”等舰。他算不上杰出的海军领导人,之所以被提名,只是权力斗争所致。丁汝昌对这份充满暗示的电报心领神会,复电说马复恒未曾参加黄海大战,现在他已知道提名,表示才力不具,万难胜任,中外各员亦未能协调,恳切力辞。李鸿章据此答复刘坤一,强调马之才具不长战船,阅历亦少,难以驾驭洋弁,因此不宜出任提督。建议令刘步蟾署理提督,马复恒与徐建寅会办海军营务处。^[201]这样便将刘坤一的提名顶了回去。1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转发海军帮办马格禄称颂丁汝昌的电报,进一步借外国人的话堵朝廷的口。时局已坏到极点,朝中大员仍在明争暗斗。中国人的大量智慧谋略,就是这样销蚀在官场的角逐折冲之中。

在此期间,通过美国斡旋,1月5日,朝廷派总署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议和全权代表前往日本。抵达广岛后,伊藤博文认为双方媾和时机尚未成熟,便借口中方全权不足,拒绝接受,要中国另派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的代表前往,这次和谈失败了。

日军计划从1895年1月19日开始,从大连分批运送陆军前往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登陆。这一情报,在1月12日之前已为清政府得悉。皇帝命李鸿章、李秉衡飞飭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虞。关于海军,上谕说:“若遇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应如何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着

李鸿章悉心筹酌,飭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并先行复奏。”^[202]

14日,刘含芳报告,英国海军提督斐利曼特尔率领8艘军舰,离开烟台,前往成山头,等待观看日军登陆,显然军情已很紧迫。16日,皇帝再谕李鸿章、李秉衡分飭各将领,昼夜侦探,务当遇贼即击,勿蹈魏子窠覆辙。可是前敌采取的措施却很无力。除了戴宗骞下令禁止威海、成山头附近民船下海,并命防队轮流巡守外,别无其他布置。

18日上午6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命令“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驶往登州(今蓬莱)海面游弋,转移清军视线,牵制防御力量,以掩护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真实企图。下午4时50分,派遣“高千穗”驶往威海港外侦察,监视北洋海军行动。19日上午9时15分,代用巡洋舰“相模丸”、“西京丸”,通信船“江户丸”驶离大连湾,接着,担任护航先遣舰的“八重山”、“爱宕”、“摩耶”及联合舰队本队、第二游击队相继起锚出航。午后,装载着陆军第二师团15000人的运兵船也逐次出发。

20日凌晨,残月朦胧,东方未晓。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灯塔熠熠生辉,遥然在望。二千一百十四年前(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求不死之药。相传徐福东渡扶桑,成为第一个到达日本的中国人,给当时的日本带去了华夏文化。过了9年,秦始皇不见徐福回返,御驾亲征,来到成山头,期望与仙人会面而终不可得,只得命李斯在此立下“天尽头”的碑石。方士骗他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始皇备下连弩,欲与大鱼搏战一番。可是从琅琊至荣成,均不见大鱼,惟有望洋兴叹。岁月流逝,江山依旧。成山头那一堆堆峥嵘嶙峋的红礁巨石,日夜经受着惊涛巨浪的拍打。成山之巔,好事者筑起秦始皇庙,以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眺望沧海,等待徐福归来。始皇泉台有知,也绝不会料到,如今登岸的,竟是一支来自日本的侵略大军。

凌晨4时,“八重山”等3舰抵达成山头南侧的荣成湾龙须岛。5时30分,侦察队换乘小驳船驶向岸边。担任防御任务的巩字军戴金镛部,调集二门2磅小炮和枪队,埋伏在岸边渔船后,发

炮阻击。日舰用舰炮对岸轰炸。巩军寡不敌众,向荣成方向撤退。日舰继续炮击。至9时,再派登陆队上岸,控制成山头灯塔,切断电信局同威海的联系。下午3时,攻占荣成县城。担任防御的河防营部队,早已全行退去。

这天上午,联合舰队护送19艘运兵船先后抵达荣成湾。第一游击队诸舰也从登州、威海驶来会合。伊东祐亨派鱼雷艇部队前往威海监视北洋海军。登陆部队迅速搭建舟桥,至21日登陆完毕。接着第二批12艘运兵船,第三批19艘运兵船在23日驶到。全部登陆部队共计34600人,3800匹马。

李鸿章在20日一早收到丁汝昌报告日军40余舰船驶抵荣成湾开炮的消息。对于这个迟早便会发生的事实的突然来到,他似乎束手无策,急匆匆地给威海守将拍电说:“荣距威尚百里,山谷丛杂,(山)东兵能否设法埋伏邀截,以牵制之。威防只能守炮台长墙,曷任焦系。”^[203]刘超佩回电表示,他将亲督绥巩军1200人及大炮,前往成山与日寇拼战。但李鸿章又来电说,敌众我寡,若有伤损,徒挫锐气,应令相机退守,现日军趋重南路,北岸稍松,命戴宗骞拨二三营速赴南岸。其北岸空虚,调孙金彪部前来协守。

根据这一训令,刘超佩部退回威海。坐待敌军到来。似乎在威海东南采取抗登陆行动,只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事。日军在荣成湾的登陆和休整持续了5天,中国军队居然没有任何动作,门户派系的隔阂给日军提供了极大便利。

威海卫保卫战中海军使用问题,丁汝昌经与马格禄商量,决定采取依辅炮台,港口抵御的方针。他说:

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彼倘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若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

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船闯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舫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204]

这一防御计划，本质上仍是单纯海口防御思想的产物。丁汝昌因此在日军登陆时，不闻不问，置身事外。伊东祐亨后来承认，“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李鸿章并不主张海军躲在基地内死守。他惦记着铁甲舰，所以向朝廷请示：“如事到万难，计惟保全‘定’、‘镇’。乞俯察。”当天得旨：“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205]

22日，张文宣给李鸿章去电，称丁汝昌要出口浪战，岛船皆不保。李鸿章立即回电申斥：“口外如有敌船窥窬，丁军门自应开出口门，与炮台夹击，汝未经战阵，胆怯恐无长进。”同日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戴宗骞派兵前往南岸拦截日军，北路托他相机照顾。“昌自顾不暇，何能兼顾北岸？”李鸿章看出丁汝昌的胆怯，回电训斥：“口外有无敌船？若敌船少，应出击。多则开往口门，与炮台夹击，即是兼顾北岸，何谓自顾不暇耶？”^[206]这天收到上谕：“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策。”^[207]但李鸿章没有下令北洋海军前去袭击在成山登陆的日军。23日，他又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208]这个电报，给丁汝昌留下了最后的退路。

这天，钦差大臣刘坤一抵达天津，同湖南巡抚吴大澂同去拜访李鸿章。他们讨论了威海局势，对继续留用丁汝昌督率海军达成谅解，由刘坤一出面挽留丁汝昌。

24日，丁汝昌又电李鸿章：“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209]丁汝昌此时正处在戴罪鞫问，等待起解的境地，情绪低落。

用他自己的话说,“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210]因此不敢采取在海岸炮火掩护下,寻机袭击日军登陆部队的作战方针。在进退皆难的绝境中,选择了株守军港、坐待援兵的下策。李鸿章对此已无可奈何,只能回电说,“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廷旨与岷帅(刘坤一)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211]

25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抵达荣成,日军兵分两路,开始向威海进犯。第六师团由黑木为楨中将指挥,称右纵队,沿荣成至威海大道,进犯威海南帮炮台。第二师团由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称左纵队,沿荣成至烟台大道,从虎山北上,进攻杨家滩,切断南帮烟台清军后路,以与右纵队会师。

李秉衡得悉日军登陆,急调嵩武军左营营官孙万龄驰往荣成迎敌。21日,孙万龄在羊亭以东遇到阎得胜率河防营从荣成败退,于是合军返回羊亭。22日,孙部抵达白马河西岸的桥头。戴宗骞亦派管带刘树德率3营与孙配合作战。25日,清军在白马河阻击日军,激战2小时,取得小胜。但由于阎得胜、刘树德部没有配合,使得孙万龄部不得不撤退。威海门户就此洞开。

威海南帮,为透迤的丘陵地带。防御炮台群,包括环海的皂埠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座海岸炮台和所城北、杨枫岭、摩天岭、莲子顶等陆路炮台。皂埠嘴炮台位于南帮炮台群的最东端,与海中的日岛炮台遥遥相望。从这里俯瞰威海湾,碧波粼粼,景色如画。清军在此装有2门280毫米口径大炮,3门240毫米口径大炮和1门150毫米口径大炮,是威海诸炮台中火力最为强大者,有力地封锁住东口航道。鹿角嘴炮台有4门240毫米口径大炮,龙庙嘴炮台有210毫米、150毫米口径大炮各2门。陆路炮台的火炮亦很强大。所城北炮台有2门150毫米口径大炮,1门120毫米口径大炮。杨枫岭炮台有150毫米、120毫米口径大炮各2门,75毫米口径行营炮16门。摩天岭炮台有8门80毫米口径行营炮。莲子顶

炮台有2门150毫米口径曲射炮,2门75毫米口径速射炮。在陆路炮台以南,沿皂埠村至海埠修筑了一道15里的长墙。墙外挖有深5尺、宽1丈的堑壕。壕外埋设地雷。李鸿章命令担任防守任务的刘超佩堵守长墙,以逸待劳。敌若越墙而入,则专守炮台。他强调“只有死守一着,无退步,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又密令丁汝昌察看刘超佩是否死守。“彼若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臼,弃入海旁。”^[212]

由于龙庙嘴炮台距离其他炮台过远,被划出长墙之外,守兵仅40余人。12月2日,丁汝昌到南帮视察后,向李鸿章提出此台实难守住,倘万不得已,请求拆卸炮栓、钢圈底,以免为敌占领之后用来轰击海湾中的北洋军舰。1月24日,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电报后,约张文宣到南帮会晤刘超佩,决定将各炮台备用火炮零件先运至刘公岛。在炮台中安排敢死队员,待形势紧张时破坏大炮。对龙庙嘴炮台,则决定放弃不守。

丁汝昌的决定受到戴宗骞的反对。他将这一行动称之为胆怯,还添油加醋地夸大白马河小胜的战绩,由此引起李鸿章对丁汝昌的不悦。丁汝昌不服,揭发说南北帮炮台只有一班士兵,倘若受伤,无从添配。除了皂埠嘴、北山嘴炮台设有营官外,其余炮台只设哨官、哨长,日岛上连军官也没有。各炮台均无后墙,也无小炮洋枪,没法防守。李鸿章得悉后,又对戴宗骞、刘超佩不满,去电训斥说:“看此情形,该统领营哨官皆不以守台为重。试问不守台,不靠炮,将守何处?”刘超佩则申辩说:威海南口各炮台均在海边,后面依山,较炮台高。东西长墙十五里,靠山而筑,敌人拉快炮上山,各台受敌,万不能守。佩坚守长墙,联络炮台,果如守住,万无一失。又说丁汝昌称龙庙嘴不守为妙。李鸿章被弄糊涂了,他只得命令戴宗骞,“究竟龙庙嘴应守与否,应令戴道迅速亲往察酌形势,与丁面商定夺,勿得固执己见,聚讼误事。”^[213]

当威海守将进行口舌之争时,日军继续向威海逼近。29日,左纵队占领温泉汤,右纵队占领九家疃,形成对南帮后路的包围态势。30日清晨,右纵队分成左右翼,以左翼队大部分兵力进攻摩

天岭。摩天岭是威海南岸的制高点,对控制整个战场形势关系极大。这里的炮台是临时构筑的。营官周家恩率数百士兵抵御敌军的轮番进攻,北洋海军也派出“定”、“镇”、“来”驶至南岸发炮助战。经过几个回合,守军官兵牺牲殆尽。日军夺取摩天岭大炮,掩护右纵队进攻杨枫岭。11时,杨枫岭守将陈万清下令撤退,南帮海岸炮台失去了后路屏御。

在此同时,日军左纵队向位于南帮炮台之南,介于南北帮炮台之间的虎山地区发动进攻。指挥防御虎山阵地的刘树德,指挥防御南北虎口的戴宗騫皆弃军退却,虎山失守。

在杨枫岭得手后,日军右纵队又向南帮海岸炮台发起攻击。龙庙嘴炮台果然最先陷落。日军用龙庙嘴岸炮轰击鹿角嘴炮台和长墙,鹿角嘴的守兵逃散。另一支日军同时还攻占了杨枫岭东北的百尺崖所和所城北炮台。

南帮只剩下皂埠嘴一处炮台了。倘若这一炮台落入日军手中,将被用来轰击刘公岛、日岛和海湾中的北洋舰队。在日军总攻前,丁汝昌曾派人前往,准备在情况危急时毁台。但刘超佩拒绝他们进入炮台。此时丁汝昌再遣敢死队员乘鱼雷艇,冒着弹雨登上皂埠嘴,抢在日军登上炮台前点燃地雷引线。中午12时10分,当占领炮台的日军正往旗杆上悬挂日本旗时,地雷引爆了。

仅仅一个上午,整个南帮炮台的防御便全盘崩溃,清军以逸待劳、以长墙为掩蔽的战略完全破产。战斗中,日军死伤将卒228人,清军死亡二千余人。李鸿章对南帮败局十分震怒,他打电报给丁汝昌等,命将刘超佩及各台守卫营官就地正法。他再次训示说:“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贻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貽后患。务相机办理。”^[214]

如同今天许多人对困守刘公岛战略不满一样,当时天津核心圈子内的人物其实也看明白这一点。这天,罗丰禄就在给其爱妾的两封私信中批评说:“倭人在山东荣成湾上岸,我军水陆皆不往阻,与貔子窝之局何异?今将至威海,而陆军将领或守营盘,或守炮台,无一愿出队而扼险要者,与旅顺之局又何异?……倭人常谓

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威海军务既紧，丁禹亭、刘子香、戴孝侯皆有电来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国家仍无补也。”^[215]然而，他们远在后方，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前线的军情。

兵败如山倒。2月1日，日军经过激战，渡过双岛河，控制威海以西、以北一线，完成了对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战略迂回。威海卫城内守军丢盔卸甲，纷纷溃散。金钱顶电报局的电报生也逃避一空，威海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2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威海卫，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北帮海岸炮台中，北山嘴炮台位于最外侧，正对西口航道要冲。装有260毫米口径平射炮6门，90毫米口径平射炮2门。祭祀台拥有240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口径平射炮各2门。黄泥沟炮台略弱，装有210毫米口径平射炮2门。此外，合庆滩陆路炮台，装有150毫米口径平射炮2门，老母顶陆路炮台，装有80毫米口径行营炮2门，战争中又临时建立东里乔、棉花山、佛顶山、柴烽顶、遥了墩、远望墩等6座临时炮台。戴宗骞的绥军，原先在北帮共有6营，但在南帮炮台保卫战中溃散了5营，剩下的1营，在2月1日也哗变溃散。整个北帮炮台仅剩19个人。丁汝昌为了防止北帮炮台被敌军用来攻击刘公岛，亲自前往北岸，强劝戴宗骞移驻刘公岛，并挑选卫士杨发、炮弁施辉藩、炮手戚金藻等组成敢死队，炸毁炮台和弹药库。戴宗骞在到达刘公岛的第二天，吞金自尽。

至此，威海沿岸全为日军占领，刘公岛成为危如累卵的孤岛。

丁汝昌定下“倚台守岛”战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定下以死报国的决心。在威海尚未被围之前，他派员将海军的有关文件送往烟台。

1月30日，当日军进攻南帮炮台时，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对刘公岛发动攻击。31日下午，天气忽然转坏，北风骤起，大雪纷飞，气温急剧下降。次日上午，联合舰队撤离威海海口，前去荣成湾避风。天寒地冻，虽给日军进攻造成障碍，但对困守孤岛的北洋海军

官兵,也带来很大困难。

丁汝昌、牛昶昞、张文宣派人去烟台,通过刘含芳向朝廷发出最后的告紧文书:

昌等现惟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未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飭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以救水陆百姓千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云。^[216]

2月3日,天气转晴。上午9时45分,日本舰队驶至距日岛外4500米,皂埠嘴炮台1000米处,向守军发动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开炮猛烈还击。中午12时57分,刘公岛炮台发射的炮弹击穿“筑紫”左舷,穿透中甲板,并使舰体也受到很大破坏,迫其退出战场。下午2时39分,又有一弹击中“葛城”大樯上部,直至3时45分,战斗方告结束。这天攻防双方炮战之激烈,不亚于黄海之战时的程度。

威海东西两口,此时早用防材和水雷堵塞起来。西口由黄岛至北山嘴,设置防材2层,水雷7层;东口从东泓至日岛,设防材2层,水雷5层;日岛至鹿角嘴,设防材1层,水雷5层;防材用1.5尺径、长约12尺的木材相并横置,环以3条一寸三分粗的铁索而成。防材下端系以巨绳,并将铁锚抛于海底固定。东口防材的最南端,留有狭窄通道,但无航标,夜间航行极为困难。要攻入海口,必须切断铁索。3日夜间,伊东祐亨派二艘鱼雷艇企图偷入港中,没有成功,仅切断了一条铁索。

4日下午,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求见丁汝昌。由“镇北”炮艇领航,英舰“拉格兑”号进入港内。斐氏同丁汝昌进行了会谈。^[217]会谈内容估计同劝降活动有关。

同日,伊东接到报告,得悉东口防材在鹿角嘴山脚附近有少量空隙,涨潮时小船能勉强通过,于是决定再作偷袭。5日凌晨2时,日军10艘鱼雷艇,乘着残月清辉,悄悄从阴山口出发,3时20分驶抵龙庙嘴。月亮已完全隐没,进港时,14号艇搁浅,18号艇未能通过防材,其余8艇皆潜入港内。

3时50分,北洋海军警戒舰发现偷袭的日军鱼雷艇,立即发出报警火箭。北洋海军诸舰纷纷向日艇开火。22号艇在退却时慌忙触礁,舵机被损,后搁浅于龙庙嘴附近礁石,靠帆布救生艇分批撤退。其他五艇的攻击也被击退。

惟有9号艇得手。它被北洋军舰发现后,仍冒险突进,蓦然发现前面有一艘两桅大舰,立即发射鱼雷。此舰正是“定远”。几乎在9号艇发射鱼雷的同时,“定远”的炮弹打中了它的锅炉,造成大汽管爆炸。然而“定远”的左舷舦部也被鱼雷击中,随着猛烈的爆炸,舰体开始倾斜。水兵们立即关闭水密门。丁汝昌下令军舰向东口行驶,赶在尚未沉没之前,在刘公岛南岸浅滩搁浅,以利用舰炮,增强东口的防御。9号艇被日军放弃,其乘员换乘19号艇退出龙庙嘴。

5日的偷袭,对北洋海军待援计划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定远”陷在泥淖之中,海水汨汨涌人,至当天下午,锅炉熄灭。丁汝昌被迫离开这艘旗舰,移驻“镇远”。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劝阻。“定远”官兵遂搬往海军公所居住。但是,清军对龙庙嘴一带的空隙,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6日凌晨,日军重施故伎。伊东命令第三鱼雷艇队至西口发出灯光信号,以迷惑中国人。第一鱼雷艇队5艘鱼雷艇则从东口偷袭,其中4艇先后混入港内。北洋海军为了加强防范,不断地用探照灯四处照射,这反倒使日本人能看清港中军舰的位置,鱼雷攻击再次奏效。“来远”号被击中后几分钟便底朝天,上层建筑朝下地倾覆了,乘员仅二三十人得救。“威远”、“宝筏”中雷后沉没,仅烟囱和桅杆露出水面,一片凄凉景象。3舰伤亡官兵200余人,惟“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上岸嫖妓未回,幸免于难。^[218]

伊东祐亨决心在7日向刘公岛发起总攻。天刚启明,他率领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8舰驶往刘公岛西口,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相浦纪道海军少将率领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第三游击队“大和”、“葛城”、“武藏”、“海门”、“天

龙”，第四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赤城”15舰驶往刘公岛东口。7时23分，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阵形向刘公岛逼近。12分钟后，距刘公岛5800米，刘公岛守军首先开炮。7时38分，日本旗舰“松岛”开炮。一场空前激烈的海陆攻防战开始了。

7时40分，一发清军炮弹掠过“松岛”舰桥，贯穿烟囱，炸伤舰队航海长高木英次郎海军少佐等3人。7时50分，“桥立”舰被击中。8时零5分，“吉野”左舷中弹，第六号速射炮的炮盾、第二号舢板及上甲板和传令管被击碎。接着“秋津洲”、“浪速”也先后中弹。

前一天，丁汝昌曾布置鱼雷艇出击日舰。未料“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济远”鱼雷大副穆晋书等人却密谋趁机向烟台逃跑。此时，当双方炮战正酣际，北口木筏门忽然打开。“左队一”、“左队二”、“左队三”、“右队一”、“右队二”、“右队三”、“福龙”、“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队甲”、“中队乙”等13艘鱼雷艇及“飞霆”、“利顺”汽艇向外冲出。伊东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派出鱼雷艇来冲乱日舰队形。谁知这些鱼雷艇却向西面逃跑。于是第一游击队立即实施追击。鱼雷艇毫无斗志，大多数在一出港便被击毁或搁浅，“福龙”、“右队一”、“右队三”逃得较快，在金山寨口至养马岛一带被日舰追上俘虏。“左队一”、“左队三”航速最快，在驶过烟台芝罘山之后，仍被追逐而来的“吉野”、“高千穗”击沉，仅有王平、穆晋书等人逃生。“福龙”管带蔡廷干被俘后，被关押在日本大阪的一个寺院里。蔡廷干是容闳第二批选派到美国留学的幼童，1881年回国后，曾在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学习鱼雷技术。甲午战争结束后，他担心遣返回国会受到清政府的处罚，还委托其美国老师，此时正在日本的诺斯罗普博士出面，要求暂居日本。诺斯罗普博士为此事专门拜访了日本文部大臣兼临时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及陆军大臣大山岩，因为大山岩的夫人当年也是诺斯罗普的学生。^[219]

日本第二、三、四游击队此时在占领南帮炮台制高点的日军配合下，向日岛发起攻击，日岛原是露出海面的岩礁，配置有2座

200毫米口径地阱炮和6门其他火炮,原先由3名外国人、40名步兵和25名水兵防守。因为那些步兵没用,改派萨镇冰带着30名水兵接守。这天日岛受到猛烈的轰炸。据香港《孖刺新闻》战地记者肯宁咸报道,地阱炮由于没有反射镜,所以要有有人在炮台外面引导射击方向,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但年轻的水兵毫无畏惧。受了伤的,裹伤再战,多次击中“扶桑”和“筑紫”。后来,敌炮击毁了一门地阱炮和厨房及军官营房,倒下来的炮又妨碍其他炮的使用。丁汝昌见日岛无法再守,下令守军撤回。^[220]

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护军死伤300多人,尸首粉碎,血肉横飞。但中国军队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

8日夜,日军派汽艇偷入东口,用炸药爆破防材,用斧锯切断铁索。南口防材被破坏达400米,门户洞开。9日上午,趁着漫天大北风,日舰再次发动攻击。丁汝昌亲乘“靖远”,带领“平远”,驶至日岛附近,以炮火支援刘公岛守军。搁浅的“定远”也开炮助战。不幸“靖远”被皂埠嘴炮台日军炮弹炸穿左舷,逐渐下沉,丁汝昌、叶祖珪原打算与舰共沉,后被水兵拥上汽艇转移。

刘公岛的陷落迫在眉睫了。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又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卢毓英的住处,适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无意中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一笑,朗声吟道:“伤心岂独息夫人?”念毕,飘然而出。这里,他们吟诵的是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句,讲的是春秋时楚文王灭息国,虜息国国君的夫人而归,生二子,但息夫人始终不同文王讲话,以表自己的志节。当晚,刘步蟾服鸦片自杀。^[221]

六、龙旗飘零

坐镇天津的李鸿章焦虑万分,无可奈何。由于各部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烟台以东清军归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由李

鸿章的淮军负责,彼此互不相干,而南方调来“勤王”之师又不听李秉衡调遣,这样就出现了威海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支援的奇怪景象。

自从威海电报局被日军占领后,李鸿章失去了对前方情况的系统了解。7日晚,他收到刘含芳电报,根据王平等人抵烟台带去的消息,刘公岛、日岛尚在,而大部分舰艇已丧失。9日,又听说突围的鱼雷艇全军覆没。眼看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其痛苦心情可想而知。10日,刘含芳转来丁汝昌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222]李鸿章踌躇一日,无所措置,次日晚间,将电报转发总理衙门了事。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11日夜,丁汝昌得到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师莱州,陆援绝望。同时,他又收到刘含芳派人转送的李鸿章命其突围的电报。他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商议对策。早在5天前,当日本鱼雷艇进港击沉“来远”那会儿起,岛上已出现崩溃的危险征象。数千名岛上居民聚集铁码头,哀求生路,一部分士兵也参与其间。经好言劝慰,方才散去。7日晚,护军各营士兵鼓噪,云集码头或挤上“镇远”,要求乘舰离岛。洋员泰莱、克尔克、瑞乃尔前去访问牛昶昞、马复恒、丁汝昌,劝他们投降。丁汝昌断然拒绝,认定决不投降,否则他将自杀。也在这一天的上午(巳刻),李鸿章密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资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223]接着,朝廷又一次密谕李鸿章通知丁汝昌设法突围。刘含芳接电后,回报说前已分二路发信未回,现派人将密谕抄作密码再送。^[224]8日,各舰水兵跪求丁汝昌放其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慰勉固守,并承诺11日援兵若还不到,届时自有生路。10日,一部分士兵挟持张文宣至丁汝昌的住所,胁迫他投降。不久,牛昶昞和各舰管带亦来。丁汝昌慨然道:“你们想杀我可速杀之,我岂会吝惜这条生命?”众人嘘唏不

语。丁汝昌命瑞乃尔出外安抚士兵，外面依然喧闹不已。瑞乃尔回来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为得计。”丁汝昌沉思良久，命令诸将领候令，同时炸舰。诸将不应，因为怕沉舰投降，会触怒日本人。至此，丁汝昌明白，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在11日晚间的会议上，丁汝昌提议突围烟台，无人答应。几次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也无人动手。^[225]

刘公岛如同一个垂死挣扎的晚期病人，肌体一面调集起最后的能量抵抗外敌的入侵，另一面，病灶也在迅速地蔓延到全身。官兵中弥漫着失败主义的颓丧绝望情绪。卢毓英承认，他同沈寿堃怕日军占领后受辱，决定买一点鸦片烟以做服毒自尽的准备。他们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二钱烟土，旋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先尽一乐，临到自杀时另想办法，并称此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于是点起烟灯，吞云吐雾，置外间事不闻不问。^[226]呜呼！这样的军人，岂会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战，而献身？这样的军队，不要也罢！

北京的官僚得不到刘公岛的确切讯息，却也处在极度焦虑之中。文廷式上奏，要求对海军官员分别严惩。他说：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而“定远”被轰之时适在“镇远”，其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使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天神同愤。刘步蟾是个巧言谄媚，行为卑鄙的人，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朝廷误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谁任其咎？海军营务处道员罗丰禄，阴险狡诈，惟利是图，闻与日本海军将领皆相狎习，海军不战，该员实是主谋。他故意使海军军械缺乏，人心涣散，其罪不在丁、刘之下，应请旨分别正法拏问，以泄天下之愤。此外，会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张翼，总办北洋水师学堂道员严复，亦有应得之咎。严复性尤狡猾，主持闽党，煽惑人心，似应从重查办。^[227]锋芒所指，已从前线波及天津了。

丁汝昌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不管任何理由，到了这一步，他决不奢望还有活下去的可能。他特地请了6个木匠打制棺材，他本人甚至还躺进去试试大小，并给每个木匠两块钱的赏金。^[228]他

已经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了。

12日上午，“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乘“镇北”号炮艇出，悬白旗至日舰阴山锚地，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229]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位舰队司令，在为海军服务了17年后，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他所说的官兵“届时自有生路”，“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就是代其乞降。反正后来的事，他不管了，也管不了了。当时中外人士，莫不称赞丁汝昌保存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以他的死，使部下得到了解脱。但对于这支他亲身参与创建的近代化舰队的覆灭，他有着不可宽恕的责任。

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杨用霖是北洋海军中惟一未经学堂正规培养而从基层奋斗，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高级军官。上年黄海海战中，为防范有人降旗投降，他亲自将战旗钉死在桅杆上。此时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他口诵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手枪自戕。当部下听到枪声冲入他的住舱时，只见他端坐椅上，头垂胸前，鲜血从鼻孔汨汨地流向胸襟，而枪依然握在手中。杨用霖是真汉子，即使是自杀，他也比选择服食鸦片的三位上级更壮烈更为军人化。他发出的，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程璧光将投降书送至日本旗舰“松岛”号上。投降书全文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兵勇民人之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东。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230]

伊东祐亨接书后,召集主要军官幕僚开会,商议受降事项,并复书丁汝昌,表示接受投降,日方将在明日受降和接缴军用物品之后,用船护送中方人员至双方认为妥善之地,并建议丁前往日本,以待战争结束。并称可用他的军人荣誉担保而无须英国舰队司令官做保证人。要求中方在次日10时前对该信做出确答。^[231]

13日上午9时,程璧光乘坐“镇边”炮艇,再次来到“松岛”,他称丁汝昌昨晚写完复信后自杀了,并递交了复信,要求将投降日展限至16日。伊东同意展期,条件是必须在当日下午6时前,由一负责的中国士官去“松岛”,就军舰炮台及其他军器的交缴以及释放在威海的中外人员事项订立确实条款。伊东强调,前来协商的士官应为中国人,不得为外国人。

下午5时,牛昶昞作为威海卫守军代表,与程璧光乘“镇边”,来到“松岛”舰。双方谈判持续了5个小时,牛昶昞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清军投降条件。14日下午,牛、程再登日舰,商讨投降细节。牛昶昞以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的身份,同伊东祐亨一起在投降书上签字。双方议定的投降条约共计十一款,其要点是:

开列岛中中外文武各员名单,以上人员须立誓现时不再预闻战事。日方许于15日正午后乘“康济”舰遣返。

岛上士兵须开列总数,自14日5时至15日午正止,陆续遣返。

牛昶昞负责承办移交兵舰炮位之任。并将其他一切器械集中,开列清单向日方移交。日方同意“康济”舰不在收降之列,拆去炮械后,供遣返中外军官及丁汝昌等人灵柩所用。^[232]

15日拂晓起,狂风怒吼,海浪汹涌。中国军舰无法出海。日舰除“松岛”仍在阴山口抛下双锚外,其余皆撤至荣成湾避风。16日上午9时,程璧光乘“康济”来到“松岛”,缴出威海卫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属统计表,以及不再参与对日作战的宣誓书。共计投降5124人,其中陆军2040人,海军3014人。^[233]

17日上午10时,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

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下午1时，“松岛”号军舰乐队奏起“君之代”，日军全体人员齐集甲板，雀跃狂欢。

下午4时，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载运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騫及“济远”大副沈寿昌、“广丙”大副黄祖莲的灵柩及一千余军民，黯然离开威海卫基地，前往烟台。张文宣的灵柩，护军差并不允用“康济”载运，另用民船，单独启行。此时汽笛低回，寒雨潇潇，北洋海军烟消云散了。

乘“康济”到达烟台的官员，包括道员牛昶昞、马复恒，“靖远”管带叶祖珪，“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林国祥，“威远”管带林颖启，“康济”管带萨镇冰，“广丙”管带程璧光；以及六“镇”管带蓝建枢、吕文经、黄鸣球、陈镇培、林文彬、潘兆培及大二副，正副管轮，精练后营（练勇学堂）营官刘学礼，学堂委员李继纲，机器厂委员张尔梅、杨作宾，还有护军营官和13名洋员。

2月25日，刘含芳给李鸿章去电，汇报处理来烟台海军官兵的处置情况。已将“镇远”、六“镇”兵勇发饷遣散，其余军舰兵勇亦陆续遣行。拟将海军军官在开河之后送往天津，听候发落。李鸿章当即回电：“海军有缺大小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则官亦虚悬，均应斥革，令其各回原籍。”不准他们去天津。^[234]他同意了刘含芳的另一请求，由程璧光替代萨镇冰，担任“康济”管带。次日他再次向刘含芳重申：“船失人存，有何用处？况吾已交卸他往。应飭同陆军营哨官一并南归。”^[235]这无疑反映了李鸿章失落和颓唐的悲观心理。

3月初，朝中有人上奏，称刘公岛失陷后，日人将丁汝昌等灵柩并军民四千余人送至烟台，军舰均为倭掳。情节支离，未敢深议，请旨深查。6日，皇帝下旨，着李秉衡详细查明奏复。李秉衡向牛昶昞、马复恒核查，他们坚持说投降决定是丁汝昌做出的。丁在派程璧光送降书去倭船开船之后，仰药自杀，至晚而死。^[236]李秉衡据此上奏提出，若死事属实，对丁汝昌只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无庸深论。4月9日，朝廷颁谕，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黄祖

遵照军官阵亡例从优议恤。业已革职的丁汝昌无庸置议。^[237]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的投降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也使他的部下免除了处分。直至1910年4月25日,朝廷方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了丁汝昌的原官原衔。^[238]

甲午战败,人人痛诋海军误国。一时间,似乎拨银数千万两营建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且海军衙门系中法战争后醇亲王创办,素为恭亲王不喜,趁机釜底抽薪,将该衙门撤除。3月12日上谕称: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岛舰失陷,时局艰危,遵议更定海章程,非广购战舰巨炮不足以备战守,非合南洋统筹不足以资控驭,非特派总管海军大臣不足以专责成。目前各事未齐,衙门暂无待办要件,拟请将当差人员及应用款项暂行停撤,以节经费。其每年应解海军正款,亦请统解户部收存,专为购办船械之用。又奏,海军内外学堂亦请暂行裁撤。均依议行。^[239]

门户派系之见,竟使朝廷在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先将海军衙门撤消,毫无振兴复仇之志。

接着,4月28日,皇帝又颁上谕,将林国祥、叶祖珪、邱宝仁、李和、林颖启、林文彬、黄鸣球、陈镇培、潘兆培、蓝建枢、吕文经、何品璋、李鼎新、马复恒、牛昶昞、严道洪等人一并革职,听候查办。三个月后,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总计三百十五员名。现在舰艇全失,各缺自应全裁,以昭核实;并将关防印信钤记一律缴销。仅存之‘康济’一船,不能成军,拟请改缺为差。”^[240]从此,北洋海军的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了。

从1874年讨论南北洋海防,到1895年北洋海军覆灭,前后历时21年。曾几何时,这支舰队无比显赫,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军事近代化事业的象征。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海军便从它的巅峰状态跌落下来,直至全军覆灭。对此人们有过许多评论,其中两位当事人的话是值得咀嚼体味的。

李鸿章说: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241]

李鸿章又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242]

赫德则说：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243]

他们的话，从不同程度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对海军事业的影响。面对垂死的封建帝国，既不想触动本质，又要起死回生，任何人都力不从心。李鸿章的话，虽有替自己洗刷辩白的成分，但异常坦率，也说出了这个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实际所处的可怜地位。赫德的话，从较为旁观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反复曲折。倘若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范围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岂不感觉到这位英国人早已十分精明地看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那种慢性病态？

另有一位剑华道人，在甲午战败后回忆起数年前的往事：中国在中法战争之后创设海军衙门，宏辞伟议，纲目条举，引起日本方面的恐惧。议院中议论纷纷。这时，著名政治家和汉学家副岛种臣佝偻而起，微笑陈词说：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

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244]

副岛种臣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他的议论,也为我们探究北洋海军的覆亡提供了注脚。

在国事艰难的关头,2月22日,李鸿章应召抵京,当天召见于乾清宫。早在13日,皇帝已发出上谕,派他出任议和大臣,赏还翎服、黄马褂,开复处分。李鸿章是个久历官场的政治家,当然知道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指名要他前去谈判,并要赋予赔偿军费、确认朝鲜脱离中国及割让领土的全权。把这些列入接受和谈的前提,无论谁去签约,必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而拒绝使臣之命,显然又不可能。

根据常识,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通过继续战争以扭转危局,或是进行妥协以谋求和平,都是主权政府保护其根本利益的不同手段。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中,即便在劣势下的和谈和妥协,都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行为。皇帝召见时,李鸿章首先声明,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如日本占地勒索赔款,户部恐也无款。翁同龢表示,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款,亦当努力筹措。孙毓汶、徐用仪着急了,认为这样闪烁其辞地兜圈子无济于事,因为不答应割地,便不能为和谈铺平道路,而继续战争,国家已无此力量。李鸿章说,请翁师傅一同去日本议和。翁同龢赶紧推脱:若我以前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行呢?李鸿章又表示,割地是不可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众人相对默然。

此后几天,李鸿章和枢臣不断地在御前讨论议和对策,不断地奔走于各国使馆。28日,慈禧太后说肝气发作,臂痛腹泻,拒绝见人,表示“一切遵上旨可也”。但皇帝也不同意割地。^[245]3月2

日,太后密召李鸿章,授权“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地均予。”^[246]4日,光绪单独召见李鸿章密谈。6日,李鸿章出京。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战争。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守,新调的湘军一败涂地。日军完成了“作战大方针”的第一期计划,准备在华北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并派舰队南下,3月23日在澎湖强行登陆。26日,在马公成立“澎湖列岛行政厅”。

日军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持续八个月的战斗,已使它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日本在中国连连得手,也触犯了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受到列强很大压力。在诸多因素作用下,日本政府同意议和。14日,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李经方及随员共计32名官员和92名仆从,分乘“公义”、“礼裕”二轮从天津前往日本,19日到达马关。24日下午4时,李鸿章在双方会谈结束返回旅馆途中,遭到日本人小山六之助的刺杀。凶手从路边用手枪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颧骨处,双方谈判一度中断。4月17日,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定了《讲和条约》十一款,即著名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废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三、中国赔款库平银2亿两;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五、日本人得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六、在订约后一年内中国分两次交清1亿两赔款,并重新签订通商行船章程前,日本派兵占领威海卫。

在所属的另约中具体规定,驻守威海卫的日本军队不超过一旅团。在驻守期间,中国政府每年贴交库平银50万两。日军驻守范围,包括刘公岛、威海卫沿岸40华里以内。^[247]

在马关谈判的第一次见面时,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谈起了中国的情况。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答:“维时闻贵大臣纵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

月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248]回想十年前两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观感,历史竟是如此难堪和无情。

李鸿章当然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乃至签订《马关条约》,必定是他自己个人声誉的完全毁灭。他的女婿张佩纶也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亲属,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借讨论李鸿章归国后是否应借枪伤请假休息一事,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 蕙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蕙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蕙之血,亦有鞠鞫之血;非惟蕙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249]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文中“蕙”即张佩纶的自称(张号蕙斋),鞠鞫为张的夫人,李鸿章的女儿李经琦。

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250]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披露,李鸿章“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251]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署去电,说李经方回国后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智不清,断难胜此巨任。^[252]并要求科士达也给北京的政要拍电报以取消成命。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253]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我们读到“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又隐含着多少政海波澜呢?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照会日本,要求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便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三国认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妨碍了他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影响到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日本被迫向列强让步,但要求中国增加3000万两赔款。这或许是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所取得的惟一成果。

注 释:

[1]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第7页。

[2][4] 日本海军省编:《山本権兵衛と海軍》,第274~334页。

[3] 参见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27页;林子候:“甲午战争前日本之内政与备战”,载《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第290页。

[5][23][31]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45~46页,第81页注①,第78~80页。

[6] 于家俭:“中日长崎事件交涉”,《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149~159页;李鸿章:“复宁绍台道薛”(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复钦差出使日本大使臣徐”(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尺牒》,第二、四册。

[7] 李鸿章:“复宁绍台道薛”(光绪十二年八月初六日),《李文忠公尺牒》,第一册;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89页;李鸿章:“寄日本徐使”(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酉刻)、“徐使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酉刻到)、“寄译署”(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699、701、779~780页。

[8][10] 实松讓:《わづ日本海軍》,上卷,第99~101页。

[9] J.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pp. 165.

[11]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页五~七,光绪二十年正月辛卯条。

[12] 李鸿章:“海军铁甲快船拟分年添购快炮陆续付款折”(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李集·奏稿》,卷七十八,页一一二。

[13] 李鸿章:“校阅海军事竣折”(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集·奏稿》,卷七十八,页十六。

[14] “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二年八月初六日),《海军衙门函稿》,第二册(未刊稿)。

[15] “罗丰祿致二哥二嫂函”(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一日)、“罗丰祿信稿”,在字第16号。转引自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45页。

[16] 关于朝鲜联俄事件袁世凯的情报及李鸿章的处置往来文报,参见《李集·海稿》卷二及《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697~714页有关内容。又据朝鲜海关税务司墨贤理的说法,朝鲜联俄文件系英国驻朝鲜总领事贝克伪造。袁世凯在事件中“并不是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反而变成人家戏弄的傀儡”。见“1886年12月26日墨贤理致赫德函第二十三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8页。

[17] “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二年八月初八日),《海军衙门函稿》,第二册(未刊稿)。

[18] 李鸿章:“论朝鲜局势”(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李集·海稿》,卷二,页十三。

[19]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辰刻)、“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540、553页。

[20] 参见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681页。

[21]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第141页。

[2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册,第59页。

[24]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日战争》丛刊,第七册,第153页。

[25] “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7月8日北京去函Z字第621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49页。

[26] 关于李鸿章派伍廷芳与荒川的接触及荒川7月12日至16日间同陆奥宗光间的电报联系,见陆奥外务大臣致驻天津荒川领事电:“调查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态度不同之训令”(1894年7月13日发);驻天津荒川领事致陆奥外务大臣电:“报告李鸿章和总理衙门态度不同之情报出处”(1894年7月14日下午3时发);驻天津荒川领事致陆奥外务大臣电:“李鸿章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之报告”(1894年7月15日下午6时50分发);陆奥外务大臣致驻天津荒川领事电:“李鸿章渴望朝鲜问题之解决应拒绝正式交涉之通知”(1894年7月16日发);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九册,第269、270、272页。但16日到23日之间陆奥与荒川的电报(双方的第四到第六号),日本外交文书却没有披露,有待进一步发掘材料。

[27] “伍廷芳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盛档之三》,上册,第59页。

[28] 驻天津荒川领事致陆奥外务大臣电:“李鸿章计划派遣密使去日本之报告”(1894年7月23日晚8时30分发),《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九册,第281~282页。

[29] 陆奥外务大臣致驻天津荒川领事电:“不特别反对李鸿章派遣密使之通告”(1894年7月24日发),《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九册,第282页。

[30][54] 日本海軍軍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戰史》,上卷,第63~75、89~90页。

[32] 李鸿章：“寄朝鲜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十日午刻），“复叶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697、707页。

[33]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07页。

[34] “叶军门来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24~725页。

[35] 李鸿章：“复朝鲜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酉刻），“复刘公岛丁军门”（同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26~727页。

[36] “丁军门来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35页。

[37] “李鸿章复陈海陆兵数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页五。

[38]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63页；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39]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63~769页。

[40] 李鸿章：“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申刻、六月十三日辰刻），“寄刘公岛丁提督”（同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73~774、755~776页。

[41] 转引自干记华：“甲午英烈，家国情长——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及其甲午遗书所见”，载《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第27页。

[42] 李鸿章：“递朝鲜成欢交叶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80~781页。

[43] “盛宣怀致叶志超函”（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盛档之三》，下册，第56~57页。

[44] 李鸿章：“复叶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94页。

[45] “盛宣怀致叶志超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盛档之三》，上册，第14页；“满德上李鸿章禀”（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盛档之三》，下册，第80~81页；“丁军门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巳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94~795页。

[46]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00页。

[47] “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亥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二

册,第804页。

[48]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酉刻、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01-803页。

[49] 李鸿章:“复丁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05页。又据《冤海述闻》称:“念二日下午三点钟,大队在威海已升火将自行矣。丁提督电爵相,告以行期。右翼总兵刘步蟾偕行,揣时方议和,当轴必不轻衅,竟将丁电私加‘遇倭必战’四字,爵相得电,果为所悚。复电令缓行。是以船已起锚,忽然不开。后爵相电丁,有云吾用汝不着,候日俄启衅,令汝观战以长胆识等语。盖旋觉其怯也。丁不知刘私添电文,接电竟不解其何意。”此说系孤证。丁致李电报中没有“遇倭必战”四字,但有“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说法,有悖于李鸿章“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后发制人的训令。在这一时期,李鸿章对丁汝昌似乎十分不满,去电中每每申斥。如7月4日丁汝昌电李鸿章,拟于初十日(12日)带舰探巡汉江、外冰洋、大同江一带,五六日回威。李回电称:“汝拟初十内带八船换巡汉江、大同江一带,五六日即回。此不过摆架子耳。诸船派仁、牙两旬,竟不敢分一船往大同……大同江是我将来进兵要口,既往巡,即须在彼妥酌布置。备护陆军同去同回,有何益处?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见《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48-749页。7月16日,在布置为叶志超军转运平壤时,李鸿章又对丁汝昌说:“商轮现已备齐,但汝必须统海军大队,在牙山海口护叶军出口,一路同行,送入大同江口,担保必无他虞,我与叶始敢放胆为之。若但以游弋迎护为词,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见《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83页。这类语气在给他人的电报中未见。又,1905年刊行的《李文忠公全集》未收丁汝昌致李鸿章的上述电报及李的回电,但在战后刊行的《中东战纪本末》中的“甲午战事电报录”却收录了李的回电。民间多以此作为讽刺丁汝昌的素材。如曾朴《孽海花》第二十四回中闻韵高说:“这必是威毅伯檄调海军赴朝鲜海面,为牙山接应。丁雨汀不敢出头,反饰词慎防日军暗袭,电商北洋。所以威毅伯有这复电,也算是善戏谑兮的了。传之千古,倒是一则绝好笑史。”文中闻韵高、威毅伯、丁雨汀暗指文廷式、李鸿章、丁汝昌。

[50] “瓦连日记摘抄”,《盛档之三》,下册,第81-83页;《冤海述闻·牙山战事纪实》,载《普天忠愍集》,卷五。

[51] 《“济远”舰航海日志》,转引自威其章:“甲午丰岛海战史实考”,《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第31页。

[52]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89页。

[53] 关于丰岛海战的开始时间,历来各书有不同说法。此处取《“济远”舰航海日志》记载的说法,见《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第31页。

[55] 《冤海述闻·方管带驻韩日记并条陈防倭事略》,《普天忠愤集》,卷五,页二十七。

[56] 关于方伯谦匿避舱内之说,流传甚广。如李鸿章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回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见《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55页。《东方兵事纪略》记载:“‘济远’之奔,‘吉野’追甚急。‘吉野’为新式快船,每四刻能行二十三海里,势将及,管带方伯谦先树白旗,继而树日本旗,倭追如故。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素甚弱,问何人助我运气?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击,……伯谦既度生还,归威海,遂称击毙倭海军总统以捷闻。”而说方伯谦挺身指挥的史料,为《冤海述闻·牙山战事纪实》所载。据戚其章考证,大副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皆在7时56分左右阵亡,而“济远”与日舰周旋交战历一个多小时。见《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从》,第31~32页。很难想像,一艘无人驾驶的军舰能在3艘火力、航速、吨位远远超过自己的军舰围攻下应战,并安全撤退。有史料说,沈寿昌牺牲后,柯建章继之,柯死,黄承勋“奋然登台,召集炮手装弹”。按柯系枪炮二副,黄系练习生,都谈不上指挥军舰。所谓登台,当指登炮塔,能否据此即断定方伯谦在望台指挥,笔者因缺乏第一手史料,只能存疑。至于《冤海述闻》关于丰岛之战的描述,诸如“吉野”升白旗龙旗而遁,“济远”因舵机受伤,转动不灵,追之不及云云,则是欲盖弥彰的假话,使人有越描越黑的感觉。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为方伯谦翻案的许多文章。一些研究者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深入探讨了许多细微的技术环节,但也存在着似是而非的推论和假设。比如台湾海军退休中将林潇藩,为史料记载方伯谦在海战中畏缩怕死,不敢在驾驶台上指挥作战,而蔽匿在甲板下船舱中有重甲保护之处的行为辩护,认为当时海军军舰,皆在甲板下特造一间有厚甲环绕保护之小舱间,称为指挥塔,战时管带必须进入指挥塔指挥,此规定与指挥官怕死与否无关,他批评指责者的“无知与不求甚解,令人为之气短”。然而我们遍寻北洋海军的各种舰图,只能发现指挥塔是设在甲板之上的。何况“济远”是老式的装甲甲板巡洋舰(又译穹甲快船或防护巡洋舰 armour deck cruisers),它不在军舰侧舷敷设装甲,而是在舰体中层的水平方向铺设弧形装甲,其中央拱起,两侧斜至水线下,像个龟壳覆盖住主机舱,敌弹即使穿透侧舷,也无法穿透这层装甲,在其之下,根本没有专设的厚甲环绕保护的指挥塔。所以,另一位台湾海军退休中将刘达材批评说:“以当时装备的条件,一个庞大舰队海上运动部位的保持,航船的操纵,炮火的指挥和弹着的修正等等,一位船长如何能在甲板与水线下指挥作战?这是最普通的海军常识。”见刘达材:“雪甲午耻”,载《尖端科技》1998年第9期。又如,林潇藩指史料记载方伯谦丰岛海战时不敢开炮迎敌,幸赖水手李仕茂、王国成攘臂而起自动开炮退敌为“不可能与莫须有之事”,理由是军舰炮

火配有4~6名炮手组成炮班,专司平日之保养和战时之运用射击,其他舰上水手,未经训练,例均不预焉。而王、李二人“既称为水手,自非炮手,可见并非炮班中人,未曾接受枪炮专业训练,且其力素弱,又只有两人,一人运炮,一人装弹,如果能够达到射击任务,则炮班之六人编组岂非多余?”参见林瀚藩“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中日甲午战争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第334~361页;林瀚藩《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第35~36页。这又是局外之谈,因为丁汝吕的报告中早已指明“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此外,林瀚藩显然不知道,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济远”舰设正炮弁一员,副炮弁二员,此外并无“炮手”编制,倒是规定各舰从练勇(见习水手)到三、二、一等水手,都必须会操炮,一等水手必须“深明大炮操法,无论派充第几炮手,均能称职无误”。在敌军直追的非常情况下,水手怒方不争,自行奋起还击,又何尝不可?因此,对丰岛海战中方伯谦表现的这类考证,虽然在同样并不了解北洋海军的其他论者看来,以为取得了专业知识上的突破,但对真正解决方伯谦的评价之争,其实并无推动。

[57][58][63][66] 《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91~95、94、97页。

[59] Mr. von Hanneken's Report. *Vladimir: The China-Japan War*. pp. 354 ~ 355. 按,《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发表的外瑞芹译《日舰击沉“高升”号实况文件三种》,系译自*The China-Japan War*一书的附录,但在翻译时有删节,以致使得文件所表述的含义有些不清。本书直接参照原文。

[60] 见《冤海述闻·牙山战事纪实》。又,《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92页也说“操江”接到“济远”信号开始西撤。惟“高升”继续前驶。但在“操江”号上的丹麦人弥伦斯说,“济远”未悬旗通知,见《盛档之三》,下册,第146页。

[61] 通常认为“操江”和“高升”在途中相遇,然后结伴而行。也有人认为“操江”系为“高升”护航。而汉纳根的证词明确说,他是在看到日舰(包括“济远”)迎面驶来后,才发现后面的“操江”的。Mr. von Hanneken's Report. *The China-Japan War*. pp. 355.

[62][65] Captain Galsworthy's Report. *The China-Japan War*. pp. 366.

[64][68] Mr. von Hanneken's Report. *The China-Japan War*. pp. 355 ~ 357.

[67] 池仲祐:《海军实纪·高大令次浦事略》,《清末海军史料》,第367页。

[69] “高升”究竟是被鱼雷还是炮火击沉的,汉纳根和“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大副田浚林的说法不一。前者认为是鱼雷命中船舳部,后者认为没有命中。*The China-Japan War*. pp. 357, 368. “高惠悌声明”(1894年8月4日)、“田浚林陈述”,“英国外交文件”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一册,第351、339页。此外,“东乡平八郎击‘高升’号日记”称系以两次发射右舷炮将“高升”击沉,见《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33页。而《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98页则说发射了鱼雷

和舷炮,没有说明鱼雷是否击中。

[70] 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71] “弥伦斯致博来函”(1894年8月14日),《盛档之三》,下册,第145~149页。又,《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95页称,“操江”系上午11时40分投降。

[72] 关于英国海军部对“高升”号的赔偿意见,参见《英国外交文件》中“备忘录”,“外交部致印度支那轮船公司”(1895年2月5日),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一册,第10~12页,第544~545页等。

[73]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91页。

[74] 关于赔偿金额参见“高升号索赔备忘录”,《欧格纳致金伯利函》,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第649~650页。“欧格纳致金伯利函”(第125号),“印度支那轮船公司致欧格纳函”(1895年3月12日,6月14日等),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一册,第916~917,985页。

[75]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11页,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二日条。

[76][77] “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第449~450页。

[78] “欧格纳致金伯利函”(第220号,1894年7月26日),《英国外交文件》,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一册,第287~289页。关于林泰曾要求“开缺”,在另一份英国外交文件中被译作“请求休假”。见“宝士德致欧格纳函”(1894年7月25日),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一册,第308页。

[79] 本书中关于天气的描述俱依历史记载,如本日气象,参见《李鸿藻先生年谱》,下册,第697页所引李氏日记,及《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13页。

[80] 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12页。

[81]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14页。

[82] “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25页。

[83] 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28页。

[84] 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22~23页。

[85] 转引自戚其章:《中日甲午海战史论丛》,第162页。

[86]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36页。

[87]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二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

第 841 页。

[88] 李鸿章：“复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 844 页。

[89]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酉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 853～854 页。

[90]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 854 页。

[91] 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 855 页。

[92] “李鸿藻致翁同龢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第 442 页。

[93] “军机处电寄丁汝昌谕旨”（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七，页二十七。又，在北洋海军服务的美国军官马吉芬战后回忆说：“当八月十日威海卫被敌舰队袭击后，北京总理衙门即一再严令丁提督曰：‘无论事件如何，理由如何，北洋舰队勿得再行出航于山东高角与鸭绿江口线以外。’”见归与：《中日海战评论撮要（续）》，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躬历是役之述评，《海事》，第 10 卷，第 3 期。

[94]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 918 页。

[95]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 2722 页，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条；“军机处奏商阅发下折片电报等件拟缮电旨送呈片”（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 58 页。

[96] “上谕”，（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 65～66 页。

[97]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 67 页。同日《翁同龢日记》又记：“昨丁汝昌革职之旨呈诸东朝，以为此时未可科以退避，姑令北洋保替人来再论，事格不行矣”（第五册，第 2723 页），则慈禧太后似乎并不主张立即处分丁汝昌。此中可见光绪与慈禧的不同态度。

[98] 王在晋辑：《皇明海防纂要》，卷七，页十五；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 458 页；归有光：“御倭议”，《明经世文编》，第四册，第 3099 页；俞大猷：“呈浙福军门思质王公揭十二首议福建楼船击倭”，《正气堂集》，卷七，页二。

[99] [普鲁士]希理哈：《防海新论》，卷一，页十。

[100] 李鸿章：“筹议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集·奏稿》，卷十九，页四十七～四十八。

[101]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六。

[102] 李鸿章：“复黎召民京卿”（光绪八年九月十八日），《李集·朋稿》，卷三十，页三十三。

[103] [奥]阿达尔美阿：《海战新义》，卷二，页十六。

[104] 《宗方小太郎日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115页。

[105] “威海去电”（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八日），《盛档之三》，上册，第134～135页。该书编辑者认为，提出此项建议的“德公”为赫德。此时，赫德人在北京，且他与李鸿章之间交换意见，不需用“密禀”的方式，故推测“德公”似为德璀琳。

[106] 詹姆士·艾伦：《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近代史资料》，总57号，第51页。

[107] 参见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冤海述闻·大东沟故事纪实》，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考证见姜鸣：“关于黄海海战中国舰队接战队形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108]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报告”（明治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231页。

[109] 丁汝昌下令变换的接敌队形，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细节。丁汝昌在海战后写给李鸿章的报告称：“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134页。“镇远”舰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说：“我舰队形实为鳞次横阵，以两铁甲舰为中心线，顺次排列于鳞状也”，见《海事》，第10卷，第8期。前去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也报告说：“华阵初定，本作‘二’字形者……”。见《中东战纪本末》，卷七，页四十九。惟“定远”洋员泰莱回忆说：“时指挥舰队排布之信旗已发出……为诸舰相并横列（line abreast），以主舰居中”，见《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54页，使许多学者在理解阵形上发生分歧。我以为，line abreast所指的仍是双横队，并以W·莱德·克洛斯在英国《1895年海军年鉴》上所撰《中日海战》一文中对line abreast的解释为证据进行考证，见姜鸣：“关于黄海海战中国舰队接战队形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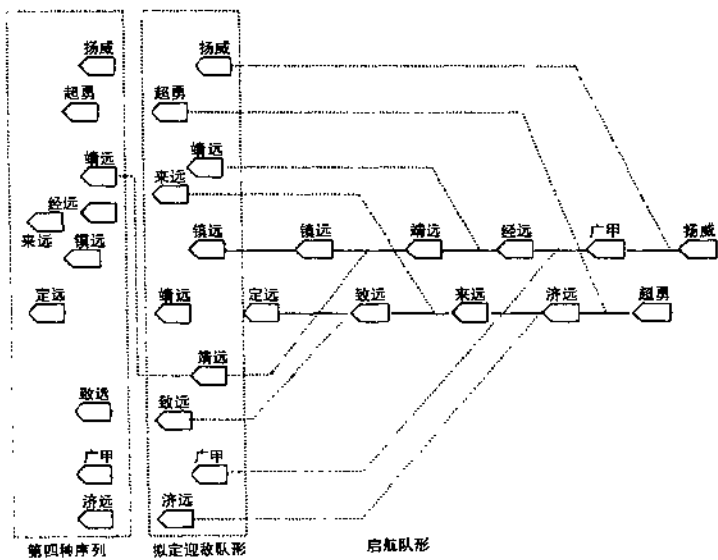
[110] W. L. Clowes: *The Nav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Naval Annual, 1895*, pp. 110.

[111] 据说以双横队迎战单纵队，系根据琅威理在舰队时所推荐。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说：“传闻似此阵法，系受自我英琅军门，固属其妙，然非实谙海战者，不能成此阵。”（见《中东战纪本末》卷七，页四十九）美国军事历史学家T. N. 杜普伊指出：“丁将军似乎也受到利萨海战中特洛特霍夫的影响，或者无意识地追随了影响特洛特霍夫的某种战术理论。”见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第253页。丁汝昌有限的海军知识,主要来自琅威理的传授。1866年后的23年间,世界上未曾发生大的海上冲突,利萨战役创造的铁甲舰队作战模式,对于尚无海战经验的北洋海军,显然提供了借鉴。有的研究者难以接受预定阵式的说法,他们认为北洋海军知道一百多种阵式变化,决不会在没有见到敌人前就预定迎敌队形。其实,对北洋海军编队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太高。甲午战后,海军守备高承锡在总结呈文中指出:“水师迎敌阵式,当于平日议定交锋变化阵图,常常操练。或以两队船只,一作敌船,一作我船,在洋作交锋变化之式,操作烂熟,不致临敌之时阵乱致败之患”,见《盛档之三》,下册,第409页,说明平日训练中存在问题很多。其次,战前拟定队形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秦莱的回忆中曾提起“提督开战事会议”一事,只是他本人未曾参加,关于拟定队形及变阵的部署并不完全知悉。又,“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平日操练船阵,阵势总须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则可置之。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各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临时既无生疏舛错之患,亦能出奇制胜。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雷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分队分击,致遭其所困。皆平时操演未经讲求,所以临时胸无把握耳。”见《盛档之三》,下册,第403页。话中包含着对预定阵式的批评。

[112] 中国舰队展开迎敌队形的排列,有不同说法。第一种序列认为从左到右为:“济远”、“广甲”、“致远”、“来远”、“定远”、“镇远”、“经远”、“靖远”、“超勇”、“扬威”,系根据伊东祐亨1894年9月21日战况报告的附图(载《廿七八年海战史》)确定的。又见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1980年出版),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1985年出版)。第二种序列认为从左到右的排序为“济远”、“广甲”、“致远”、“经远”、“定远”、“镇远”、“来远”、“靖远”、“超勇”、“扬威”。英国《1895年海军年鉴》、《日清战争实记》(1896年出版),浅野正恭:《近世海军史》(1903年出版)等书用此说。且《1895年海军年鉴》说明其材料依据,亦来自伊东祐亨报告。此外,伏拉底米尔《中日战争》(1896年出版)所附图示,除将“广甲”误作“威远”是个明显错误外,其余9舰排列也用第二种序列。二种序列的区别,在于“经远”、“来远”位置的更换。鉴于它们是一对外形相同的姊妹舰,在海战中被对方混淆是有可能的,故推测这两种序列是一种史料的衍化或修正。郭毅生、汤沁安根据“镇远”洋员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一文,怀疑上述序列。马吉芬说,“定远”以左为“致远”、“济远”、“广甲”,“镇远”以右为“来远”、“靖远”、“超勇”、“扬威”。郭、汤认为,马吉芬在“镇远”服务,故“来远”傍“镇远”之右必为可信。他们排出第三种序列是:“济远”、“广甲”、“致远”、“靖远”、“定远”、“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见“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1981年出版);戚其章等:

《甲午黄海海战队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张玉田:《中国近代军事史》(1983年出版)等书均持此说。然而第三种序列无法解释在前两种序列中“靖远”为何被日方排在第八号位置。查郭毅生文章据以立论的《中日海战评论摘要·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躬历是役之述评》是篇译文。该译文有两个错误:一是军舰总数仅九艘,二是无“精远”舰名。郭文在引用时采用推理方法,将“精远”改为“经远”,又注明缺“靖远”一艘位置。其实,准确的译文是:当时我舰由10舰编成:“定远”(旗舰)、“致远”、“济远”、“广甲”4舰张于左翼,“镇远”、“来远”、“靖远”、“超勇”、“扬威”6舰张于右翼。见《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73页。在这里漏脱的一舰竟是“经远”,而“靖远”依然排在第八号位置。马吉芬的回忆录中还附有一幅午后零时30分的交战图。在图上,“经远”被画在“来远”之右、“靖远”之左。这还不是一个孤证。在另一位现场目击者斐利曼特尔的回忆录所附的开战之际中国舰队的排列队形,其排序为“济远”、“广甲”、“致远”、“定远”、“镇远”、“来远”、“经远”、“靖远”、“超勇”、“扬威”。载《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42-43页,亦即形成第四种序列(见下图)。对于这种说法,以及“靖远”为何违反战斗中姊妹舰在一起的训令,跑到右翼去,并被所有目击者牢牢定在第八号位置。目前尚难解释清楚,只能存疑,上述介绍可参见下图。



[113] 关于舰桥震坍,见秦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记实》;王炳耀:《中日战辑》。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称丁汝昌系

“立于‘定远’将台之上，为炮震落台下，伤足不能起立”。惟丁汝昌战后自称是因日舰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他左脚夹在铁木中，身不能动，被火烧伤。见《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1013页。本书采用第一种说法。

[114] 《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177~179页。

[115] 各种史料和研究著作，根据各自对北洋海军编队序列的认识，来描写“比睿”在中国军舰中穿越的位置。如《廿七八年海战史》称从“定远”和“来远”间穿过（上卷，第179页），Vladimir: *The China Japan War* 称从“定远”和“经远”（King-Yuen）间穿过（pp. 172）。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称从“定远”和“靖远”间穿过（第121页）。惟孙、关书系引证 Vladimir 著作为依据，在翻译中把“经远”译为“靖远”（“靖远”英译作 Ching-Yuen），有误。

[116] “超勇”沉没时间，见《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188页；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26页称系2时23分沉没。录之备考。

[117] 池仲祐：《海军实纪·黄镇军菊人事略》，《清末海军史料》，第357~358页。

[118] 关于“扬威”沉没原因，有诸种说法：1. 丁汝昌在战后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致远”沉后，“扬威”舱内火起，又为“济远”拦腰碰坏，亦驶至浅处焚灭。”见《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1022页。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另一份报告中说：“扬威”行驶太迟，致离大队，及受敌炮弹炸焚之时，又未能极力灌救扑灭，虽为“济远”碰伤，究因离队而起，咎有应得。”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将守备郑文超革职留营效力片”（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29页。2. 池仲祐在《海军实纪·林镇军少谷事略》中说，“扬威”起火后，“济远”横驶，碰及“扬威”，“扬威”益受伤，断不能支……敌炮纷至，舰渐沉没。公登台一望，奋然蹈海。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58页。池仲祐在《海军实纪·甲午战事纪》中又把黄建勋、林履中说成同时落海。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20~321页。3. 《东方兵事纪略》曰：“‘济远’见‘致远’沉，大惧，转舵逃跑，撞‘扬威’舵叶。‘扬威’行愈滞，敌弹入舱，立沉于海。”（卷七，页十）4. 《中东战纪本末》曰：“济远”见“致远”沉，慌忙逃走，误至浅水处撞上“扬威”。“‘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水渐汨汨而入。”（卷四，页十一）我以为，第一，以上四项，除了汝昌报告外，都不是第一手材料。而丁的报告，对海战描述并不确切。这个报告要为海战失败寻找理由，将方伯谦定为导致战斗失败的罪魁，因此对其所称“济远”拦腰碰坏“扬威”一说，当持慎重态度。第二，海战初期，“济”、“扬”分别位于舰队两翼，在各种海战图示中，都没标出过两舰相遇轨迹。因此，丁、池所称在“超勇”沉没（1时30分）前后，“济远”撞坏“扬威”之说难以成立，日本及其他现场观察报告也都未提到这点。第三，倘说“济远”撞沉“扬威”系在“致远”沉没之后，亦即3时30分以后，则“扬威”早已不在场。第四，称“济远”将已搁浅的“扬

威”撞沉则更不对。若“扬威”此时真搁浅的话,地点当在战场北方大鹿岛一带,而“济远”逃跑路线是往西回旅顺,南辕北辙,全不相干。第五,按照清制,海军管带在战斗中当与军舰共存亡。这是北洋海军管带在军舰被敌摧毁后纷纷自裁的原因所在。倘若“扬威”沉没的原因主要是“济远”撞击所致,则林履中便可不自杀。由于没有更多史料,以上问题只能存疑,以待进一步考证。

[119] 关于“松岛”中弹,有不同记载。李鸿章的奏折(《李集·奏稿》,卷七十九,页七~八)、伊东祐亨向大本营的报告(《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235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均称系“定远”击中。马吉芬的回忆(《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83页)称系“镇远”击中。日本联合舰队航海长高木英次郎少佐则称“定”、“镇”主炮同时发射,其中一弹击中“松岛”,见《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207页,录此存考。

[120] 平田胜马:《黄海大海战》,第204页。转引自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34~135页。

[121] “致远”沉没的原因,史学界长期采用《东方兵事本末》所称中鱼雷说。其实日本记载中未提到鱼雷。参战的洋员马吉芬称中炮弹。汉纳根称被日舰320毫米炮弹击中水线,炮弹从舰体的一侧打穿到另一侧。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7册,第288页。北洋海军军官曹嘉祥、饶鸣衢称系“致远”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中炮不多时即遭沉没。见《盛档之三》,下册,第401页。今从炮弹击沉说。根据海军惯例,水密门橡皮保养属军舰日常维护范畴,应从“行船公费”中开支费用,这个问题显示出“致远”舰的日常维修保养显然存在问题。

[122] 《番禺县志》卷二十三上记载:“世昌堕水,义仆刘忠同堕,以浮水木槌与世昌,使援以济,拒弗纳。复经他舰救出,世昌环视全舰荡没,慷慨言曰:‘事已至此,义不独生!’奋身投海而歿。”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396页。按这一说法,邓世昌是被救一次后,自己又投海的。此外,臧其章五六十年代从山东访谈的北洋水师水手的回忆中,听到邓世昌落水后其所豢养的爱犬太阳犬来救他的故事,如“来远”水手谷玉霖说:“邓管带见致远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日所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了,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独生,跟狗一起没入海中。”另一位“来远”水手陈学海说:“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来。据我所知,致远上只活了两个人,一个水手头,一个炮手,是朝鲜船救上来送回威海的。”见臧其章:《北洋舰队》第210、216页。又据参加甲午海战的“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少校战后回忆:“‘致远’舰内幸存者只有七名海军士兵,他们依靠

舰桥上的救生圈,被海潮冲向岸边,被一只帆船救出。他们所说,各不相同,难以置信。但惟有一点说法一致。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狂犬亦为主人而殉死。想来义犬救主之说,自古以来屡有所闻,但为犬舍命者,恐邓舰长首创先例,实乃不幸之人。”见《廿七八年海戰史》别卷,第582页。各种说法,录之待考。

[123] “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报告”(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廿七八年海戰史》,别卷,第252页。

[124]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04页。

[125]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1003页。

[126] J.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the Naval Development. 1839 - 1895.* pp. 165.

[127] “沈寿堃呈文”,《盛档之三》,下册,第403页。

[128] *The Naval Annual*, 1895. 第六章“东方战争的教训”,第130页称中国没有一门速射炮。但第五章“中日海战”中,称中国战前收到20门1.97英寸格鲁申(Gruson)式速射炮,它们被平均地分配给“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广甲”等10舰。此外,“经”、“来”原各有3门3磅速射炮,“致远”、“靖远”原各有2门3磅速射炮。“广甲”原有1门4.7英寸口径速射炮,“平远”原有8门3磅和1磅速射炮(第109页及102页表)。

[129] “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北京去函Z字第630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5页。

[130] “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射历是役之述评”,《海事》,第10卷,第3期,“肯宁威乙未威海战事外纪”,《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319页。

[131] 黄海海战后,总理衙门奉旨调查天津军械局弹药供应情况。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四日,李鸿章向总署呈交天津军械局光绪十九年底至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存发枪炮清册。其中提到本年二月至九月共发放北洋海军各舰305毫米炮弹342颗,210毫米炮弹840颗,150毫米炮弹927颗。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五册,第137页。盛宣怀档案记录,九月初四日,初十日向北洋海军提供305毫米开花子炮弹(即爆破弹)160发,210毫米炮弹、150毫米炮弹各100颗,总计360发。见《盛档之三》,下册,第565,570页。十一月十二日,徐建寅奉旨到威海调查北洋海军弹药情况,他的报告说,九月初以后,天津机器局、军械局已造炮弹三百余颗运送威海(即上述360发)。目前在军舰上和在北洋海军存库的305毫米开花弹(即穿甲弹)403发,钢弹244发;210毫米开花弹952发,钢弹163发;150毫米各

种炮弹 1548 发。见“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扣除九月份运到之数,黄海海战前北洋海军弹药应是不匮乏的。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发射炮弹数,见日本海軍軍令部:《廿七八年海戰史·黄海役》(秘本),第 162 页。

[132][133]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 1022 页。

[134] 笔者对丰岛海战的指挥问题和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处死的问题一直持谨慎态度。关于方伯谦在丰岛、黄海两次海战中的表现,一百多年来,海军界、史学界皆有不同评论,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方伯谦的侄孙女、美籍华人方偃祥女士回国,为方伯谦“平反”而四处奔走呼号,掀起一波热潮。她投书有关衙门,致函有关学者,请求他们改变学术观点。1991 年 9 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在福州举行了“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并于会后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主办者明知这个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却过于急促地做出超越学术评判的政治结论,提出“讨论问题的标准是一致的,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甚至在开幕式上就宣称“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绝非逃兵,他蒙冤被害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之一大新闻”。见《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第 579 页。这自然是学术界前所未闻的大新闻,若此则连讨论会也无须举办了。事实上,学术界对于方伯谦的研究远非达到一致。1994 年参加了山东威海“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台湾学者吕实强先生,就曾报道了当时的情况:“方氏家属和若干故旧,多年来一直有人出来为其鸣冤。近年来,因鸣冤者之努力与同情者之日增,1991 年 9 月,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福建师大历史系、福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八个单位联合发起举办一次‘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与会者几乎一致地认为或偏向方氏被杀死系冤杀。虽然如此,一般学者并不以为然。这次举办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方偃祥女士以七十高龄、健康情况并非甚佳的情况下,不远万里迢迢,从美国赶来参加。一篇文章《甲午战争中的海战》还不够(因为那是在分组会议中发表,她希望在全体会议中再表示),大会又安排她在闭幕前专题报告一场中,让她说几句话。当她发言时,不惜反复意叠,申诉她伯公的冤枉,坚持要大家接受她的意见,对此事加以平反。对于如此高龄的一位老太太,如此恳切的呼吁,大家自然深受感动。惟历史是历史,个人感情是个人感情,在没有证据之前,是无能为力的。与会后,我曾向好几位对此问题深具研究的学者询问过,包括对甲午战争研究极有成就的戚其章教授在内,咸以为以现有的史料,尚不足以翻案。不过几乎所有由福建来的学者,都支持方偃祥女士的呼吁。”见吕实强:“甲午战争一

百周年学术研究会”，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9期。吕实强先生作为这场讨论的旁观者，一言中的，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显然，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所以大家对这场翻案，保持了严肃的冷静态度。方女士本来追求的目标，是想说明方伯谦之死是一场冤案，但当此种要求变成谋求“宏扬民族魂，继承爱国精神”，“树立方伯谦的爱国将领形象”的时候，事情就走得太远了一些。由她出资，出版了王宜林所著的《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再由方女士广泛送人，以扩大影响，为方伯谦翻案造势。该书于1997年8月8日在福州市举行首发式，书中称撰写此书是为了确立方伯谦的“英烈地位和不朽荣誉”。同日，福州市有关部门在朱紫坊举行了“方伯谦故居”、“海军世家”的揭匾仪式，媒体报道称“甲午海战沉冤今日昭雪”，为方翻案至此达到高潮。出于学术良心和道义感，笔者与刘申宁是在年11月22日上海《文汇报》上撰文《方伯谦是民族英雄吗？》，指出将方伯谦打扮成民族英雄，不仅是嘲讽历史，也是愚弄当世，认为“‘民族魂’是对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英雄和先驱人物的具有极高褒奖性评价的尊称。仅凭现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把方伯谦树成‘英烈’，将其弘扬为‘民族魂’，不仅不可以，而且是极不严肃的。”接着，12月3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刊载危兆盖的长篇专论《冤乎？不冤乎？方伯谦研究又起波澜》，12月5日广州《南方周末》发表翟明磊的长篇采访《方伯谦是民族英雄？》，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对方伯谦评价问题纷纷发表看法。1998年1月17日合肥《新安晚报》刊载陈开仁文章《方伯谦如何成了民族英雄》，更指出福州方伯谦讨论会是方偏祥赞助的。1998年初，王宜林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文汇报》，指控该报所属的《文汇报》发表书评，造成该书滞销和退货，侵犯了他的“著作使用权、获得稿酬权、作者名誉权”三方面的损失，要求判处被告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使得这场翻案事件增添了戏剧色彩。王宜林当庭出示的证据表明，《甲午海将方伯谦》是由方偏祥出资出版的，这自然会使人考虑该书立论上的公允性，也理解了为什么书中对传主会出现超乎常规的谀美。在法庭辩论中，王宜林得悉《甲午海将方伯谦》属于非法出版物，自己的诉求不仅得不到法律支持，还会受到法律追究之后，即在判决前撤诉。关于方伯谦的学术争议将来还会持续，笔者衷心希望新史料新观点不断面世，但此类讨论一定要按照学术的规则进行，并排除各类不必要的干扰。

[135]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1047页。

[136] 文廷式：“奏请擢用林国祥片”（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页十四。

[137] 李鸿章：“海军惩劝章程片”（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李集·奏稿》，卷七十九，页十一。

[138]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第3478-3480页，光绪二十年九月戊戌条。

[139] “金登干致赫德”(1894年7月5日伦敦来电第798号，7月6日伦敦来函Z字第878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88页。

[140] 李鸿章：“寄伦敦龚使”(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781页。

[141] “金登干致赫德”(1897年7月24日伦敦来电新字第822号，7月26日伦敦来电新字第821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88、89页。

[142]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酉刻、二十三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811、816页。

[143] 参见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酉刻，二十九日酉刻，三十日卯刻，八月初二日戌刻、亥刻，八月十八日申刻)，“寄伦敦龚使”(七月二十五日卯刻，三十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926-1000页。

[144]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40页。

[145] “金登干致赫德”(1894年11月22日伦敦来电第832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02页。

[146] 《清德宗实录》，卷二五二，页二，光绪二十年十月己未条。

[147] “金登干致赫德”(1894年11月17日伦敦来电新字第779号，11月17日伦敦来函Z字第907号，11月18日伦敦来电新字第778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98-100页。

[148][149] “金登干致赫德”(1894年11月20日伦敦来电新字第776号，11月23日伦敦来电Z字第909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01、103页。

[150] “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11月25日北京去函Z字第641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06页。

[151] 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八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67页。关于马格禄的国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日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06页称为美国。孙克复、关捷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第325页及其他一些论述称为英国，今从前者。

[152] 秦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52页。

[153][154] 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并龚道”(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巳刻)，“寄旅顺丁提督并刘镇”(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1033、1051页。

[155] 见李鸿章：“寄旅顺黄张姜程各统领并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九月初

一日巳刻)，“寄旅顺丁提督龚道”(九月初四日午刻;九月初六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2、10、16页。

[156]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九，页一。光绪二十年九月甲申条。

[157] 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2页。

[15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3~2734页，光绪二十年八月廿八日、九月初三日。

[159] 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一辑，第231页。

[160][161] 《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册，第307~317、325页。

[162][163] 李鸿章：“寄旅顺姜程黄张各统领”(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戌刻)，“寄大连湾赵统领等”(十月初一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79、96页。

[164][166] “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三十日戌刻到，十月初二日戌刻到，十月初九日丑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91、102、129页。

[165] 《清德宗实录》，卷三五，页十一、十二、十八，光绪二十年十月戊申、己酉、壬子条。

[167] 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29页。

[168] 《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三十七、三十九。转引自李鹏年：“慈禧六十寿庆”，《清宫史事》，第106页。

[169] 《清德宗实录》，卷三五，页十九，光绪二十年十月癸丑条。按，不少史书称慈禧在军情紧迫的情况下，依然大肆祝寿。这种指责缺乏依据。应当说，慈禧太后做了克制和冷静的让步，取消了原已缩小的一些庆祝活动。

[170][171] 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未刻)，“寄丁提督”(十月十一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38、140页。

[172] 参见李鸿章：“寄译署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巳刻)，“寄译署”(十月十四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44、152页。

[173] 《清德宗实录》，卷三五，页二十四，光绪二十年十月丙辰条。

[174] 李鸿章：“寄译署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七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62页。又，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称：“中旬以后，旅顺日益危逼。汝昌知旅顺堕则北洋门户失，大局震惊，罪且不测。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鸿章置之，谓‘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卷四，页十二~十三。这一记载，曾被广泛引用，其实不合历史真实。

[175][177]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巳刻、二十三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206~207、193页。

[176] 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63页。

[178][180] 《清德宗实录》，卷三五二，页八~九、十六，光绪二十年十月壬戌条、癸亥条。

[179][190] “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

[181] 吴汝纶：“答陈右铭”（乙未闰月十二日），《吴汝纶尺牍》，第71页。

[182] 高日生：《龟献编言》，《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第558~559页。

[183] 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219页。

[184] 安维峻：“请诛海军提督丁汝昌疏”（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第533~534页。

[185] 李秉衡：“奏旅顺失守如何惩办将士请训示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李秉衡集》，第167~168页。

[186][187] 《清德宗实录》，卷三五四，页十三、二十二，光绪二十年十一月癸巳、丁酉条。

[188] 李鸿章：“寄威海戴道张镇刘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299页。

[189] 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96页。

[191] 《廿七八年海战史》，下册，第1~4页。

[192] 戚其章：“试谈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守将不和的原委”，《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第221~223页。

[193] 李鸿章：“寄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274~275页。又，这两个美国人11月5日从美国来华途经日本时，曾被日本逮捕，至11日释放。日方知悉他们“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份供应鱼雷式炸药的合同，用于借助一项新的方案摧毁船只”。日本人为此搜查了曾经搭载过他们的英国轮船“盖尔人”号和法国轮船“西德尼”号。见“外交部致皇家法官函”（1895年1月5日），《英国外交文件》，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一册，第479页。由此揣测，他们所用的药料油料在次年1月19日被火烧去，恐怕就很有些蹊跷。

[194][195] 李鸿章：“寄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巳刻），“寄译署督办军务处”（十一月二十八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278、300页。

[196][197]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第3515~3516页，光绪二十年十二

月甲辰条。

[19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62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9] “刘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34页。

[200][201] 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申刻),“寄刘视帅”(十二月十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34、336页。

[202]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45页。

[203] 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戴统领等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56页。

[204]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47~348页。

[205]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刻),“寄东抚李丁提督戴道等”(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61、363页。

[206] 李鸿章:“复张镇”(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巳刻),“复丁提督”(十二月二十七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65、366页。

[207] 李鸿章:“寄东抚李威海将领”(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67页。

[208]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69页。

[209] “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74页。

[210] 丁汝昌:“致戴宗霁书”(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二日),《丁汝昌集》,第224页。

[211] 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74页。按,一些史书皆引《时事新编》,初集,第四卷“论丁军门掣肘恨事”记载,称丁汝昌在日军荣成登陆后,请求率舰出击,被李鸿章阻止云云。根据对当时电报的分析,丁、李皆无主动出击荣成湾的打算。但李鸿章要求北洋海军保持机动,若有少量日舰至威海卫口外骚扰,就驶出口门,与炮台夹击日舰。必要时突围至烟台,以保存军舰。而丁汝昌连驶出口门的计划也没有,抱定了在威海与船共存亡的主意。因此,抑李扬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212]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69页。

[213] 李鸿章:“寄威海戴道刘统领”(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申刻),“寄

戴道”(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79、380页。

[214] 李鸿章:“复丁提督张镇”(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397页。

[215] “罗丰禄致委函”(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罗丰禄信稿》内字第1519号,转引自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上层人物的心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52~153页。

[216]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415页。

[217] “北洋舰队水手陈学海、苗秀山的回忆”,转引自戚其章:《北洋舰队》,附录,第220、223页。

[218]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70页,又据卢毓英记载:“米远管带邱彪臣及其口弁水手计五十余人均遇救,威远管带适有事登岸,其所有员弁皆溺亡。”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4页,则邱宝仁是晚在舰上。

[219] 见《日清战争实记选译》,《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八册,第251~255页。关于蔡廷干在美国留学事,参见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第85页。又,《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八册,第253页谈及留美幼童事时,称“杨儒”云云显系容闳之误译。称“在哈德福德的杨儒的后任是反对杨儒教育意见并最终使杨儒计划破产的吴”,译者加注称“吴”为译音。其实此处吴即留美幼童驻洋肄业局总办吴嘉善,字子登,咸丰二年进士,《清史列传》有传,《李文忠公全集》中亦有提及。容闳《西学东渐记》中称之为“留学界之大敌”,见《西学东渐记》,第101页。

[220] “肯宁威乙未威海战事外纪”,《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321页。

[221] 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页。刘步蟾自杀之日及自杀方式,据“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稟”,《清末海军史料》,第338页及卢毓英记载。卢毓英说刘步蟾是在六月十六日(2月10日)晚服毒,十七日(11日)午后始绝。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页。又据《东方兵事纪略》,刘系元月十五日(2月8日)用手枪自杀,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71页。

[222]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432页。

[223] 李鸿章:“寄烟台刘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417页。

[224] 参见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申刻),“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戌刻到),《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418页。

[225]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72页。

[226]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6页。

[227]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奏请将军失律在事人员罗丰祿等分别惩处折”（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412页。

[228] “定远”舰军官容良的回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史》，第84页。

[229] 丁汝昌于12日在刘公岛服鸦片自杀，但究竟在这天的什么时间段，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是以丁汝昌名义向日军发出的投降书，究竟是丁氏生前所拟就，还是在他死后为别人所冒名？考证这个问题，必须以慎重的态度，引证不带偏见的直接证据。北洋海军投降后，主持投降活动的威海营务处道员牛昶昞、办理北洋海军营务处道员马复恒等向清廷报告海军覆亡的禀报中说：“丁提督见事无转机，对职道昶昞等言，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不得已函告倭水师提督伊东云，本意决以死战，至船尽人投而后止。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贵军人岛后，中外官兵民人等，不得伤害，应放回乡里等语。派‘广丙’管驾程璧光等送往倭提督船。程璧光开船之时，丁提督已与张镇文宣先后仰药，至晚而死。”（“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清末海军史料》第338~339页）这一说法在王文韶奉旨调查海军投降原因时被认可并转奏，见“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五，页二十七，也被清政府接受。此后，北京官场中有人提出此一事件“情节支离，未敢深信，请旨飭查”，清廷派李秉衡再次调查。李秉衡调查后，依旧认定丁汝昌是在安排了乞降活动后才自杀的。见李秉衡：“奏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李秉衡集》，第219页。所以朝廷三月十五日发布上谕：“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愆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84页。由于牛昶昞、马复恒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为了推卸对海军投降的责任，他们的证词尽管是直接证据，但存在着作伪的可能性，探索此案尚需寻找新的史料依据。以往史学界引证较多的另一个论据，是蔡尔康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中的记载：丁汝昌“再召中西各员会议，佥称实已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以救生灵。乃于十八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乘坐‘镇北’小舰，高揭白徽……投递降书。……十九日，‘镇北’又入日营，而下半旗。……及接见程差弁……则曰：昨带贵提督公牒及私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服生鸦片一大剂。刘总兵、张总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总兵皆已殉节，我辈无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议勉强办理而已”。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192~193页。蔡尔康的材料，因属二手，其真实性仍可怀疑。近年发现的“广甲”管轮卢毓英回忆提供了新的旁证，卢毓英记录“十八日（即2月12日）丁统领命候补直隶州借补游击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英文情愿输服之书，并请释海军士卒，命‘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乘‘镇北’蚊船悬白旗

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先是海军仅剩‘镇’、‘平’、‘济’及‘康济’、‘广内’五艘并蚊船六艘，盖以军伙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口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意遂决，命陈书而献之”。卢毓英还写道：“元月十八日夜，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及黄岛陆军统领张得三（即张文宣）服毒而亡。”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48页。在卢氏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参与起草降书的中方人员为陈恩焘。陈恩焘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五期毕业，也是第三批赴英国的留学生。光绪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由李鸿章提名担任北洋海军提标游击总管全军军械，属于丁汝昌直接管理的军官。在刘公岛上的美国人马吉芬也说：丁汝昌“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见《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96页。主张北洋海军投降文书是在丁汝昌自杀后由别人伪托丁氏名义撰写的学者，他们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的说法：“勇丁、水手露刃掇汝昌，汝昌稍慰之，人舱仰药，张文宣继之，十八日晓夜四更许，相继死。牛昶昞召诸将并洋员议降，瑞乃尔请如汝昌前议，沉船毁台乃议降事，诸将及英员皆不许。于是英员浩威作降草，仍托诸汝昌语，管带闽人某译华文，牛昶昞署以海军提督印。黎明，‘广内’管带程璧光乘‘镇边’艇，悬白旗，诣倭军乞降。”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72页。当时同在岛上的外籍雇员泰莱回忆：“十二日晨，丁提督自杀。此际情形，予无直接之见证，惟得自谣传及瑞乃尔之报告而已。……盖丁死后，马格禄、好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抵道台牛氏家，遇瑞乃尔。好威倡议假丁提督之命作降书，并亲自起草。书成，译作中文，并钤提督印信。”见《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67页。惟泰莱已事先声明“予无直接之见证，惟得自谣传及瑞乃尔之报告”，这就是说，以他的回忆来定论本身是不可靠的。而姚锡光因当时并不在刘公岛上，他的看法，法律上属于传来证据，本质上同蔡尔康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属于同一档次的材料，难以作为直接证据立论。也有学者以《丁氏宗谱》记载丁汝昌“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时初”为据，则该宗谱因与当事人丁汝昌有重大利害关系，同样不足以立论。或有以《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为论据，则且不说方志人物传也属传来证据，其中所说丁汝昌“召营务处牛昶昞而谓之曰：‘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耳。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牛诺之。汝昌遂仰药殉。……时〈正月〉〔二〕十一日也”。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383~384页。按：该丛刊续编第一册所载“凡例”称，衍字上加〔〕，增补脱漏字上加〈〉，这条史料本身在时间问题上就存在错误，即使按照编者的主观意愿，将二十一日的“二”字定为衍字，又人工补上“正月”二字作为脱漏字，则正月十一日为2月5日，正月二十一日为2月15日，日期完全错误，又岂能拿这样的方志记载来作论据，否定《清史稿·丁汝昌传》所载“遂以船降，而自仰药死”的记录呢？此外，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说：“军民闻丁已死，聚集千人至水陆营务处，追总办道员牛昶昞用德人瑞乃尔前策。牛亦以为不可，然百端

劝谕,众仍不从,乃用丁汝昌名致书日将。”见《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95页,将策划投降说成是有“千人”参与大活动;刘声木认为,“当时所以投降者,实各舰管带与军门幕府无为张鹤楼孝廉尔梅,熟商定计。孝廉本属书生,身临危地,首先畏死,与闽人同意,是以定计投降。军门原未知之也,及知之,已仰药死矣。此无为常曜东茂才师必森所告之余者,茂才师即闻之于孝廉自谓,当不诬也。”见刘声木:《袁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第1095页,因均系二手孤证,难以作为可信材料使用,录此备考。就我自己而论,在本书的初版中,也采用了丁汝昌自杀后别人冒用他的名义撰写降书的说法,但现在仔细查证了所有已公布的史料(尽管卢毓英的回忆中也有讹误,如说“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应当是伊东等等),我认为将丁汝昌排除在起草投降文书之外的根据尚不充分。从严谨的学术规范出发,目前没有充分的论据推翻王文韶、李秉衡的调查结果,希望学术界能够发现新的材料,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230] 见投降书手稿影印件。

[231] “日清战争实纪提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273、274页。

[23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册,第170~172页。

[233] 《甲午中日海战史》,第213页。

[234] “烟台刘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辰刻到),李鸿章:“复烟台刘道”(二月初一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453、454页。

[235] 李鸿章:“复烟台刘道”(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458页。

[236] “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墓”,《北洋海军史料》,第338~339页。

[237] 《清德宗实录》,卷三六三,页十七,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丙戌条。

[238] 《清宣统政纪》,卷三十三,页二十八,宣统二年三月庚申条。

[239] 《清德宗实录》,卷三六二,页二,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戊午条。

[240] 《清德宗实录》,卷三七〇,页二,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庚午条。

[241] 李鸿章:“复新疆抚台陶”(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廿二日),《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十九册。

[242]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

[243] “赫德致金登干”(1895年2月3日北京去函Z字第651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82页。

[244] 剑华道人:“记日本议院论中国创设海军事”,《郑观应集》,上册,第761页。

[245] 参见《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80~2783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初八日。

[246] “汪委员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张集·电牍》卷二十二,

页四。

[247] 《马关新约》(1895年4月17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14-619页。

[24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25页。

[249] 张佩纶:“致合肥”,《张佩纶与李鸿章往来信札》(未刊稿)。

[250] “欧格纳外交报告”第138号(1895年4月12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第661页。

[251] 《科士达日记》,1895年5月18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第628页。

[252] 李鸿章:“寄上海交李经方”(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548、549页。

[253] 李鸿章:“寄李经方”(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551-552页。

第七章 海军发展的第二个浪峰 (1895 ~ 1911)

翁同龢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建议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R. 赫德

一、瓜分军港的狂潮

李鸿章4月18日从马关登轮回国。到达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接着弹章纷纷,斥其卖国误国。在舆论压力下,朝廷于6月5日和16日,先后把主张对日议和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开缺出军机处,命翁同龢、李鸿藻任总理衙门大臣,清议更为热烈了。8月28日,上谕命李鸿章入阁办事,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从此李鸿章失去军权,赋闲京师贤良寺。有人劝其退隐,他说:“于国实有不能忽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赖谁乎?”^[2]于是次年又有出使俄、德、法、英、美的外事活动。

8月25日,王文韶上奏,根据李鸿章上年奏定《海军交战赏恤章程》所定抚恤金数额,编制名册,合计北洋海军阵亡殉难101人,应给付恤银13150两;受伤304人,应给养伤银8990两,总计22114两。^[3]北洋海军的各项善后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朝中其他大臣对于振兴海军的兴趣不大。9月,在讨论时务时,刘坤一就说,目前巨款难筹,将领难得,不必遽复海军名目,不必遽办铁甲舰,暂就各海口修理炮台,添造木壳兵轮,或购制巡洋舰、鱼雷艇以资防御,并派水师学堂子弟出国游历,总期先有人后有船,俟款项充盈,不难从容购办。^[4]2.3亿两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近于崩溃,难以再拨款重兴海军,这是事实。但可悲的是,自从北洋海军覆灭之后,中国这个濒海大国仅有的那么一点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被全然打消了。此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只是把海军发展的战略目标局限在近海的极小范围之内。

1895年底,日军将退出辽东半岛,朝廷从南方调集军舰北上布防。12月2日,南洋的“开济”、“寰泰”舰抵达旅顺。中国接收湾旅委员、候补直隶知州顾元勋和龙殿扬同舰到达。10日,“镜清”、“南瑞”和福建的“福靖”3舰亦达。18日,顾元勋代表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旅顺船坞公所各处台、坞、厂、库。根据顾元勋的报告,船坞幸未损坏,材料扫数被日军运走,仅剩铁船门、大起重架、汲水机器等。机器厂的设备被拆去七成,余下的既无皮带,又无手具,难以开动,^[5]满目疮痍的凄凉景象。20日,黄金山炮台重新升起中国龙旗。

京中言官没有放过李鸿章和他的僚属。12月4日,御史王鹏运上奏请严谕疆臣痛除因循积习。他说当年李鸿章在任时,凡各营统领及营哨官每次谒见,例收门包48两8钱及33两3钱不等。是以钻营成习,无一有耻之将。又说天津水师学堂为将来复修海军之枢纽,而总办伍廷芳,犹是李鸿章私党。更有道员闽人罗丰禄,禀性阴狡,暗中把持,现尽引闽厂学生凡曾在刘公岛投降者,相率来学堂中,希图复用。将来海军重整,必仍此溃军降虏充塞其中。^[6]7日,文廷式又奏,罗丰禄金壬阴诈,前者设法倾轧琅威理

而去之,后又主持闽党立意不战,举十数船以降敌。近闻王文韶又受其蒙蔽,收罗数百降将溃卒,皆罗丰禄巧为说辞。他日再购铁甲,又将归其驾驶。文廷式指控说,罗丰禄在烟台等处广开店铺,经营闽人产业。大东沟一战,欲救方伯谦,私改汉纳根电报,后经汉纳根查出,且欲控之朝廷,始由北洋奏准正法。总之,罗丰禄实为汉奸,海军复设,断不可再用闽人旧党。^[7]

次年1月18日,王文韶复奏,指出所参罗丰禄私改电报,因李鸿章办理军务电报皆未移交,汉纳根本人则早已回国,故无从根究。又称方伯谦正法后,罗丰禄唆使其家属鸣冤亦无其事——实际上,直到今天,从公布的李鸿章、盛宣怀电报档案中,人们也没有找到过汉纳根指控方伯谦的电报。王文韶说,罗丰禄办理水师营务处最久,其人亦颇读书,因熟悉外语与往来交际,遂以洋务著称。罗丰禄在王文韶初到天津时,已随李鸿章出使日本,回京后,仍随李鸿章办理议约事,至今在京未回,实无“相信不疑,惟言是听”之事。^[8]罗丰禄次年随李鸿章出访欧美,11月23日奉命出使英国,出京过津,与王文韶有匆匆一晤,从此去国万里。

1896年1月21日,王文韶奏,拟调道员黄遵宪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奉硃批允准。但黄并未到任。3月,王文韶在汇报北洋海防的奏折中说,旅顺东西南岸的11座炮台,大连湾的6座炮台,台身被毁甚多,药库兵房均遭拆毁,各台70余尊大炮全数毁失无存。修复需银20万两,添置各项炮位,需银200万两,一时实难筹划。又说海军需重具规模,非二二千万两不可。“从来时事多艰之会,镇静者从容坐理,而或失之因循;任事者慷慨图功,而或患于虚矫。微臣……既不敢愒日玩时,以蹈苟安之咎;亦不敢握苗助长,以重欲速之愆。窃据北洋现在情况,详加筹度,惟有就已成之规模,用现有之财力,需以岁月,逐渐经营,不事铺张,不求速效,无论得尺得寸,总期实事求是。”^[9]王文韶早年在两湖做官,后以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出名,担任过云贵总督。他在官场以圆滑著称,奉“多磕头、少说话”六字为圭臬,有“油浸枇杷核子”的绰号。这道奏折写得不温不火,什么实际问题也没解决,正是王文韶风格的典型写照。

话又说回来,北洋海军覆灭后,整个渤海门户洞开,毫无防御能力的局面毕竟使人尴尬。幸好战时在英、德两国订购的驱逐舰“飞霆”、“飞鹰”号在1895年底驶回国内。驱逐舰是19世纪末叶新出现的一个舰种,从鱼雷艇、雷击舰发展而来,此时主要用于护航警戒。“飞霆”为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排水量720吨,马力800匹;“飞鹰”为德国伏耳铿船厂制造,排水量850吨,马力5500匹,航速24节。^[10]朝廷又批准王文韶的请求,将船政局1894年制成的“靖远”运船改为练习舰,更名“通济”。这样,加上“康济”号练习舰,“湄云”号运兵船,北洋仅有5艘军舰。

1896年春,“开济”、“镜清”、“南琛”等舰返回南洋。上年末,南洋在德国订制的“辰”、“宿”、“列”、“张”鱼雷艇已驶至中国。但两江总督刘坤一显然无意趁此机会发展海军,壮大声势。加上南洋诸舰舰龄较老,舰型较落后,到了1897年6月,刘坤一干脆上奏,将“开济”、“镜清”、“南琛”、“南瑞”、“保民”5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4艇酌减人数经费,“登瀛洲”、“威靖”仍改运船,“寰泰”改为练习舰,每年节省经费16万两,专款存储,以备将来购舰之用。整个南洋兵轮船,仅维持在勉敷巡操的状态。^[11]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看起来阻止了日本霸占辽东半岛的狂妄计划,其实正是瓜分中国的前奏曲。俄国因太平洋舰队基地海参崴冬季结冰,一直企图南下寻找不冻港。1895年11月,沙俄政府以“还辽事件”后俄日关系紧张,俄国军舰不能再去日本海港过冬为由,向清政府要求借泊胶州湾。清政府难以拒绝这一请求。27日,驻俄公使许景澄向俄国外交部声明,“朝廷重顾邦交,允令暂泊”,“一俟春融,务即开去”。这样,俄国海军实现了南下计划的第一步。

1896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朝廷派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前去祝贺。李鸿章在俄国时,代表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清廷签订此约的目的,是为了联络俄国,共同防御日本。俄国则企图通

过谈判,达到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进入中国境内,联结海参崴,从而避开西伯利亚东部的冻土带,大大缩短工程周期的目的,并且全面渗透入中国东北。在谈判中,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向李鸿章劝诱说:俄国既然宣布了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将来就要遵守这一原则。为此,俄国必须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给中国以军事援助。俄国的兵力日前集中在欧洲部分,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必须有一条路线尽可能短的铁路。李鸿章在俄国的谈判,是朝廷在甲午战争后出现亲俄联俄热潮的产物。当时李鸿章与国内的往来密电,均由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与张荫桓用二人亲自轮流保管的密码本翻译、抄写后分递两宫和军机处,并由翁同龢等人多次组织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李鸿章对条约内容的所有修订细节,均及时请示国内,取得批准,并未发现有擅权或者忽略细节的地方,因而完全是一种国家行为。清政府的联俄决策,目的是想结一强援制衡日本,为扭转战败后的外交弱势局面寻找出路。

俄国的目的达到了。6月3日签订的《中俄密约》规定,“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并规定“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12]

清政府却被玩弄了。5月13日,在李鸿章同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及财政大臣维特初次会谈密约时,俄方出示他们起草的约文草稿,第一条是:“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夺俄国属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立即照约办理。”^[13]19日,罗斯托夫斯基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8字,以使俄国对于中国的允诺和共同防御义务大大缩小,这点也得到中方决策层的认可。^[14]李鸿章在签约之后,曾沾沾自喜地说,从此可保二十年无事。其实俄国除了攫取了在中国的筑路权外,非但没有履行保卫中国的责任,还进一步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活动。

由于中俄之间的签约是绝密的,外间一直猜测纷纷。不久,上海的《字林西报》、《万国公报》披露了包括十二条款的“密约”文

本,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按照这一文本,中国除了允诺俄国在东北修筑铁路外,还有三条涉及海军基地方面的内容:

九、俄国向来在亚细亚洲无周年不冻之海口。一时该洲若有军务,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水师诸多不便,不得随时驶行。今中国因鉴于此,是以情愿将山东省之胶州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十五年为限……

十、辽东之旅顺以及大连湾等处地方,原系险要之处,中国极应速为整顿各事,以及修理各炮台等诸要务,以备不虞。既立此约,则俄国允准将此二处相为保护,不准他国侵犯。中国亦允准将来永不能让与他国占踞。惟日后如俄国忽有军务,中国准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暂行让与俄国水陆军管泊屯于此,以期俄军攻守之便。

十一、旅顺口、大连湾等处地方,若俄国无军务之危,则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涉……[15]

四分之一世纪后,出席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次公布了中俄密约,证明上述内容并不存在。同年,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1895年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胶州湾供我们使用。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港口不方便,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利用这项特权。”[16]这也就否认了1896年中俄密约中所谓租让胶州十五年的说法。但在当时,人们都确信中俄密约允诺俄国人租借胶州湾,从而引起远东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也诱发出列强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当普鲁士在19世纪70年代初完成全德统一后,就开始积极向外扩张,投入了列强在华的一系列争夺和角逐。它加入竞争虽然为时较晚,但劲头十足,手段也更蛮横霸道。到了90年代末,它不再满足军火和一般商品的输出,还要到中国攫取据点,以作为扩大在远东影响的桥头堡。

从1860年到1872年,德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兼地貌学家李希霍芬8次来中国考察。1868年,他首先建议德国并吞舟山

岛,认为“这个岛是易于设防的,并且由一个舰队可以控制和华北与日本的交通”。而到次年,他通过对山东的全面调查,就建议占领胶州湾了。他分析说,第一,胶州交通方便,有广阔的发展余地;第二,山东有位置优越而质量良好的煤田;第三,中国有无穷伟大、非常便宜和智慧的劳动力。这些,对于德国最后确定占领胶州湾作为侵华根据地,并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5年3月11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耳男爵在致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中将的极密件中提出,如果中国继续失败,德国有权参加干涉,并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帝国海军的一个或几个储煤站和军港。4月17日,何尔门开出了在华建立军港的三组地点:甲、舟山群岛和厦门(包括鼓浪屿);乙、胶州湾和大鹏湾;丙、莞岛(朝鲜南端)和澎湖列岛。^[17]这一密谋正是在德国参与干涉还辽事件的前一个星期。德国人明白地表示,他们参与还辽事件,目的就在于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补偿。这年年底,德国公使绅珂和马沙耳分别在北京和柏林正式向中国政府和外交官提出让与一个军港的要求,均遭婉拒。

次年6月,李鸿章参加完沙皇的加冕典礼后来到柏林,马沙耳再次向他要求割让一块海军基地。11月3日,德国海军司令克诺尔海军上将协助李鸿章访德后在德国休假的德瑾琳进行了谈话。德瑾琳这个清政府的德籍高级雇员对克诺尔说,胶州湾极值得德国争取,他列举了该湾的七大优点。同时,德国政府又收到巡洋舰队长铁毕子海军上将报告,认定胶州湾冬季不冻。

19日,德国驻俄国大使拉杜林公爵致德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的公文中,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件:昨天,中国公使许景澄派使馆参赞美国人金楷理极秘密地暗示德方,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干脆攫夺一个港口据为己有,否则中国人不会因此而感激。金楷理说:

中国人绝对不会懂得这种思想方法,道义取得的观念对于他们是绝对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们惟一能懂的语言。如果德国不干脆地取它所希望或需要的,华人只会把它当作

是一种软弱的表示,而决不会认为是崇高的大公无私的
证据。^[18]

威廉二世在报告上批注:“正确!这正是我两年来对外交部
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都是我多年来拥护的思想!”

许景澄此举的动机和目的是一个费猜的谜。推测起来,大致
有两种可能:一是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在德国人思想的影响下逐
渐变为亲德派,不愿俄国在华谋取更多的利益,希望德国人也分一
杯羹。二是不满李鸿章对俄外交的大量失误,企图利用德国力量
抗衡、抵消俄国在华势力,因此玩起“以夷治夷”的外交游戏。不
管是哪种指导思想,其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作为外交官作出此
类举动,是极其严重的叛国行为。

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在1896年就职以来,一直谋求在中国获得
海军基地而未获成果。这使威廉二世十分恼火。1897年2月,他
在一份文件上批注说:“经过这样的拒绝将是个耻辱,那是最后
一次。”以后“无须再询问!地点定后,立刻占据”!^[19]5月5日,海
靖报告首相,根据海军部顾问福兰西斯等人考察,中国海湾中只有
胶州湾一处值得考虑。三门湾、厦门皆不适宜,并指出俄国对胶州
湾并没有提出要求。8月7日至11日,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密谈
胶州湾问题。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俄国在没有取得一个心目中
已经决定的更北的海口前,还有意保证在该港的进出,但允许德国
人共同使用。在它撤出时,不反对把该港交给德国占领。两国君
主对于使用胶州湾达成了私下谅解。9月21日,德国正式通知俄
国,德国舰队将在胶州湾过冬。10月1日,海靖把这个决定通告
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立予拒绝。但此时德国的准备已经就绪,只要
寻找一个机会便可发动了。

正巧机会来了。11月1日深夜,两个德国传教士韩理和能方
济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教堂被当地大刀会成员杀死,本堂神甫薛
田资仅以身免。事后,地方官没有及时将此事报告朝廷。6日,威
廉二世谕令德国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对巨野教案以巨额赔款
并立即缉凶,就派舰队占领胶州湾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同日草

拟了发给驻扎在吴淞口的棣立斯海军上将的谕令,要他率领全部军舰驶往胶州湾,占领合适地点,用任何方式勒索(此电于次日深夜发出)。7日,德皇以此事征求沙皇意见。沙皇表示,对于德军开入胶州湾,既不能赞成,也不能说不赞成。因为他近来才知道胶州湾仅在1895~1896年才暂时属于俄国。^[20]同时,海靖从汉口向总理衙门发出电报照会,清廷至此方知巨野教案。

朝廷飭令山东巡抚李秉衡迅速捕捉凶手,以扼制事态恶化。李派臬司毓贤处理。毓贤胡乱捕捉了惠二哑巴等9名无辜群众,称此事是盗窃钱财引起的谋杀案,企图缩小事态,然而无济于事。10日,棣立斯海军上将率领“德皇”号、“威廉亲王”号、“鸬鹚”号、“阿高那”号军舰从吴淞口前往胶州湾。

13日,德国舰队抵达胶州湾。为了掩盖德军的军事行动,棣立斯先派几名军官携翻译登陆,拜访清军守将章高元,诡称此行是进行军事演习。章不知其诈,还准备当晚设宴招待德国军官。

14日上午7时,海面风平浪静,崂山上弥漫着晨雾。德军由500人组成的陆战队,乘快艇登上青岛栈桥。章高元的守军3营1500人,毫无戒备地看着德军从总兵衙门前穿过,还说参观演习后,守备部队将大有所得。德军顺利地占领了军械库、弹药库、俯瞰炮台的高地和可以炮轰总兵衙门的地点后,向清军发出限3小时内退出女姑口、崂山之外,48小时内全部退清的最后通牒,^[21]章高元这才大吃一惊,经与棣立斯进行了一场毫无结果的交涉后,被迫率部队撤出青岛,移驻青岛山后的四方村一带。德军对大于自己兵力二倍的中国守备部队如此懦弱无能也感到惊讶。“威廉亲王”号鸣炮21响以示庆贺,棣立斯召集陆战队员,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

章高元当天即向山东巡抚李秉衡两次电报德军入侵的情况,但奇怪的是,李秉衡和北洋大臣王文韶两处均到15日才向总理衙门发电汇报。^[22]这天下午3时,德使馆参赞贝威士拜访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敬信、崇礼、许应骥、张荫桓5人参与接见,贝威士一字不提德国海军在胶州湾的军事行动。^[23]待他走

后,总理衙门大臣才看到王文韶、李秉衡的电报,于是一方面回电,要李秉衡抓紧拿办凶手,另一方面致电出使德国公使许景澄,要他向德国外交部询问,为何因教士为盗戕害,而影响数十年的睦谊?这种做法,究竟是德使海靖专擅的行为,还是接到了国内的训令?[24]本日中午,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在颐和园值班,由于没有任何特殊情况,他好整以暇地设宴,邀礼亲王餐叙,作陪的是刚毅和钱应溥。他们“剧饮纵谈甚畅”,到下午四点方散。4位军机全然不知道德国出兵青岛,总理衙门没有向他们通报胶州湾的消息。[25]当日晚间,李鸿章紧急赶往俄国使馆,约见俄国代办巴布罗福,向他出示了山东拍来的电报,要求俄国政府立即派舰队到胶州湾,对德国的侵略表示抗议,并促使德国人撤离。[26]

16日,翁同龢看到了李秉衡和王文韶发来的电报。他与恭亲王商量后,立即起草了两道电旨,一飭李秉衡:“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并命迅速审讯凶手。[27]一命许景澄与德国外交部交涉。同日,王文韶在给总署的电报中承认,此案甚难收拾。李秉衡素不喜欢谈洋务,深恐办理未能妥协。朝廷既已发表他升迁四川总督,由陕西布政使张汝梅担任山东巡抚,请饬张速赴新任,速结教案。[28]然而德军得寸进尺,继续逼迫章高元退兵,并在各山口挖沟架炮,声称16日下午3时进攻。章高元无奈,再次退兵沧口。李秉衡急电总署请战,次日朝旨予以驳回。

在清政府的心目中,德军是一支兵精械利冠甲欧洲的部队。淮军的新式操练,便采取德国陆军操典。北洋海军的主力舰也主要购自德国。在以往的中德交往中,从未发生武力冲突,所以清廷中枢对德国在胶州湾事件中的霸道行径,既震惊,也害怕。翁同龢日记17日记载,“上意力持不战,述慈圣言,甚忧劳也。”[29]同日,军机处向李秉衡转寄电旨:

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

收拾耶？^[30]

20日，军机处再传电旨：

电奏所陈各节，朝廷所稔知。其应争处在此，其难办处亦在此。洋人举动，全在势力。力不能胜，必受大亏，此战事所以当慎也。^[31]

这便是当时朝廷和枢臣的真实心态，一种打破了天朝大国迷梦后反过来形成的自卑恐惧心态。

朝廷本想借助外国的力量迫使德国撤退，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只能谋求妥协。德国则继续显示强硬立场，20日，威廉二世在给沙皇的信中宣称：“不论是什么原因，德国对中国的关系目下显然是处在屈辱的地位，皇帝将用所能用的一切方法，一劳永逸地将它纠正过来。”^[32]威廉二世决定派皇弟亨利亲王率领第二舰队前往中国。第二舰队包括一级装甲巡洋舰“德意志”号（7320吨）、二级巡洋舰“格希翁”号（4200吨）、“开泽林·奥古斯塔”号（6056吨）3艘。12月15日，威廉二世亲临基尔军港，检阅第二舰队。当晚，在行宫为亨利亲王送行的晚宴上，发表了轰动世界的“铁拳”演说，表示出德意志帝国企图在全世界扩张强权的野心。他说：

在我德意志军旗保护下的我德意志的贸易，我德意志的商人以及我德意志的船舶，要享有与其他列强在这方面的同等权利，并受到保护。德意志的贸易因有能受到德意志国权的安全保障的自觉，才能发展起来。国权即是海上权，海上权与国权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两相辅而促进国运之发展。若缺其一，则不能期望国家强盛……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海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欲试牵累或妨碍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挥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33]

次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99年。租期之内，中国不得治理。如果德国在租期未满之前，自愿将胶州

湾归还中国,则由中国偿还在此所用费项,并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与德国。^[34]德国随后设立“胶州湾保护领”,归海军部管辖,最高长官为胶州总督,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充任,又将租界地分为青岛、李村两个行政区。此后,青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

从此胶州湾沦入德国之手,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强行占领,前后共达17年。

清廷曾指望俄国成为自己的战略同盟者,18日,俄国代办巴布罗福通知总理衙门,俄国舰队已接到驶往胶州湾的命令,这使李鸿章产生了一阵喜悦和欣慰。19日,他亲自致电俄国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希望他转请沙皇出面调停。到了20日,巴布罗福再次通知清廷,俄国已改变决定,撤消俄舰驶往胶州湾的命令。李鸿章和其他大臣大为失望。

李鸿章及同僚始终不知道俄德之间和俄廷内部的大量活动。其实早在11月8日和9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已给俄国驻柏林代办巴伦连发两份电报,要他通知德国,在巨野教案中,俄国支持德国派舰队前往胶州的步骤,同时宣布俄国也将派舰前往。俄国强调,俄舰不是为了参加敌对行动,而是为了表明他们自1895年以来就有“投锚优先权”。这就把他们介入胶州湾事件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了。但是,俄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海港并不是胶州湾,其不断强调所谓对胶州湾的投锚优先权,实质上是为了换取德国对俄国占领中国其他军港的承认。11日,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建议,鉴于山东的既成事实,俄国应当不失时机地占领大连湾或海军部指定的其他港口。接着,俄德两国之间达成谅解,德国承认中国北部和朝鲜属于俄国势力范围。

12月1日,中国驻俄国公使杨儒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

(俄)外部云:德事愿效力,而难于措词,或请于中国指定港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藉口,德或稍敛迹。已电署使,仍囑转陈。窃以为德果因此就范,亦无把握。胶事俄先知情,貌似交好,恐不足恃。^[35]

这个电报,传递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俄国已正式提出要一个港口停泊军舰,二是胶事俄国事先知情。此后俄国果然向中国索要军港,16日,3艘俄国军舰驶入旅顺口。^[36]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回忆说,在11月24日沙皇召集的讨论远东局势的会议上,穆拉维约夫宣称,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的港口,目前正是占领或夺取旅顺口、大连湾的时机,这两个港口在战略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不久,俄国外交官在北京的谈判陷入僵局,维特发电报指示他们去拜会李鸿章和张荫桓,允诺各给他俩50万两银子的贿赂。根据俄国档案记载,李鸿章当时就接受了贿赂。戊戌政变后,俄国人又批准向张荫桓支付1.5万两。^[37]

与此同时,俄国军舰陈兵旅顺,2000名陆战队员也在旅顺登陆。俄国还协调外交政策,取得德国对其远东战略的支持,并宣布不再积极过问朝鲜事务,撤回在朝俄员,以换取日本不反对其租借旅大。在当时情况下,清军确实无力与俄国发动正面军事冲突,朝廷内亲俄派势力颇盛。一些官员还自欺欺人地相信,俄国占领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的侵略,因此向俄国军舰提供燃煤,在国际上也没有取得其他国家的外交同情。最后清廷被迫让步,1898年3月28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中俄旅大租借条约》,订明“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得有足为可恃之地”,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38]这样,中国北方最大最重要的军港便沦于俄国人之手了。

《中俄旅大租借条约》签订的当天,德皇威廉二世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组成为一队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39]

德、俄两国的得手引起英国极大的不安。《北华捷报》报道说,当俄国占领旅顺口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对于中俄密约“是否确有其事尚抱有怀疑的人,尽除疑云”。^[40]历来在对华侵略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此时觉得落后了,几乎丧失了对一切事务的支配权。英国象征性地向旅顺口派出一艘军舰,以表明“英国船舶有

充分权利访问旅顺口和其他中国口岸”。^[41]同时竭力在中国南方的封疆大吏中活动,胁迫和引诱他们提出联英主张。1898年3月7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给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的训令中说:“如果俄国有了旅顺口和大连湾的租借地,那么俄国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将增加到损害英国利益的程度。”^[42]不久他又说,“由于北直隶湾的势力均衡已经因旅顺口的租让给俄国而实质上有了变更,所以在日本人离去之后,按照旅顺口租借的同样条件,取得威海卫的租借是有必要的。”^[43]英国外交官立即展开活动,在与日本取得默契之后,强迫清政府允诺将威海租借给英国。

5月9日,清政府将《马关条约》规定的最后一笔赔款付清之后,日军开始从威海卫撤退。王文韶派前山东候補道严道洪、前“威远”练习舰管带林颖启前往接收威海,英国人也参与了接收,并在先升中国旗后,并悬英国旗。7月1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刘公岛、威海卫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10英里地方,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44]条约虽然规定中国军舰可以使用威海卫湾水面,但事实上,威海卫刘公岛,已不能作为海军基地,为中国军舰提供各种服务和后勤保障了。

瓜分中国沿海军事基地之风迅速蔓延。这年4月,在法国胁迫下,中法交换照会,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期99年。接着法军便占领了广州湾。同月,中日两国交换照会,宣布中国政府不将福建省内地方让给或租给别国。也就是说,清政府承认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从此以后,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都先后落入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手中,这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

赫德记载说,在胶州湾危机最严重的日子里,翁同龢曾来访问他,问他是否还有时间去做以前建议的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于推动改革,今

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45]险恶的国际形势,再一次把中国人逼迫到改革变法的大门口。

列强的瓜分狂潮唤醒了中国人。从1898年初起,北京讲求变法维新之风大盛。康有为迭次上书皇帝,力求大集群臣,明定国是。已经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出版了他译述的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改良与保守两股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6月11日,皇帝下诏更定国是,变法自强。15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皇帝于瀛台,“百日维新”失败。

也在这年5月29日,65岁的恭亲王奕訢在他位于前海西街的府第中溘然长逝。至此,除了李鸿章以外,早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的“同光中兴名臣”,皆已谢世而去。李鸿章本人,则在次年逐出北京,远远地放到岭南去做两广总督。清王朝最后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本想挽回大厦倾覆的危机,至此世纪之末,谁也无回天力了。9月28日下午4时,当维新党人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下脑袋的时候,大清朝也就斩断了它自己最后一次被拯救的希望。

二、再造海军的初步措施

1898年9月21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日子。这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下诏革去“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工部主事康有为的职务。康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当天从天津乘轮船南下上海。

就在这天,中国在伏耳铿船厂订购的“海琛”号军舰北上驶抵大沽。康有为匆匆亡命途中,不知是否留意这艘新舰。“海琛”是1896年5月总理衙门指定许景澄向德国订购的3艘穹甲巡洋舰

中的最后一艘。另外两艘“海容”、“海筹”，已分别于7月27日、8月24日先期驶抵大沽。军舰排水量2950吨，航速大于20节，功率7500匹马力。火力系统包括克虏伯式150毫米口径炮3门，105毫米口径炮8门，60毫米口径炮2门，鱼雷发射管1个，单价16.3万英镑。^[46]

政变之后，北洋海陆军权落入慈禧太后宠臣荣禄手中。在讨论复兴海军战略时，他重复当年李鸿章观点，主张向洋厂订造，反对“专恃闽厂为海军之大计”的主张。

第二年夏天，在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到达大沽。从外形看，它有点像日本巡洋舰“吉野”号，排水量4300吨，功率17000匹马力，航速24节。配有阿姆斯特朗式8英寸口径炮2门，4.7英寸口径炮10门，阿式47毫米口径炮12门，阿式37毫米口径炮4门，鱼雷发射管5个，每艘计328242英镑。^[47]同期到华的，还有德国实硕厂制造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鱼雷艇。

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使北洋海军的实力猛增了18000余吨，尤其“海天”、“海圻”，属于二等巡洋舰，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仅次于“定远”、“镇远”的大吨位军舰，对于复兴海军，能够起到核心力量的作用。可惜从此以后，清政府向西方购舰的活动又停滞下来了。

1903年2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南洋兵船购造多年，机老钢薄式陈行缓。奏请将陈旧各船悉数裁停，节存经费，岁可得20万两，10年合计200万两。即以另购外洋新式浅水快船六七艘，驻于长江一带，以资巡防。^[48]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将“南琛”、“南瑞”、“保民”、“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7艘艇及不得力的小差轮一并裁停。四个月後，新任江督魏光燾援引张之洞前奏之案，请以节存之款另购浅水快船，旋向日本川崎船厂订购550吨浅水炮舰“江元”号。约定如果制造合适，再行续造3艘。这样就开了两个先例：一是南洋从此专注适用于长江航行的浅水军舰；二是清政府向外购舰的对象，转向近邻日本。

次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川崎船厂订购“湖鹏”、“湖鸞”、“湖鹰”、“湖隼”4艘雷艇和“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6艘浅水炮舰。鱼雷艇每艘合38万日元,炮舰每艘合45.5万日元。

1905年7月15日,“江元”号驶抵上海。从各种性能参数看,国内船厂是完全能够自造的^[49],但南洋仍向日本续订了3艘同型舰,即“江亨”、“江利”、“江贞”。

1907年春,“楚同”、“楚泰”、“楚有”三舰到华。这种军舰,排水量780吨,功率1350匹马力,时速13节,配有阿式120毫米口径炮二门。^[50]夏季,“湖鸞”、“湖鹏”两雷艇到华。雷艇排水量仅96吨,发动机功率却有1200匹,时速27节。^[51]

至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舰艇全数到华,总计排水量5700吨。这批军舰,构成未来长江舰队主力。

威海战败之后,北洋海军军官全部被裁汰,士兵被遣散。高级军官中,叶祖珪待罪天津,邱宝仁、林国祥不知所向,以后未见复出。萨镇冰回原籍福州。不久,萨夫人陈氏去世,萨本人处境十分悲惨,只能就城内缙绅之聘,教授各子弟西学。^[52]水兵的情况流传后世的更少。那位在丰岛海战中出名的“济远”炮手王国成,返回故乡文登后,拿丁汝昌给他的500两赏银,购地40亩,原想务农为生,但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先是妻子姚氏患病而死,王国成为生计所迫,又去旅顺谋事,不久也因生活无着,归乡不得,客死旅顺,死时年仅33岁。^[53]

1898年9月,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上奏,保举萨镇冰“练海军兼习陆战,历年管驾兵轮,痛除积习,操行允属可信”。在此之前,萨已被起用为吴淞炮台总台官,旋任“通济”练习舰管带。上谕着荣禄详细察看,据实具奏。

次年4月17日,光绪皇帝召见前北洋海军副将叶祖珪、副将衔补用参将萨镇冰,着开复革职处分,分别赏加提督衔、总兵衔,统领和帮统北洋“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各舰及鱼

雷艇,仍归北洋节制。“选择朴实勇敢熟悉驾驶之员,督同认真操练,以为整顿海军始基”。^[54]旋任命刘冠雄任“海天”管带、萨镇冰兼任“海圻”管带。

同一时期,1898年1月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派崇明镇总兵陈旭统带南洋兵轮。^[55]至1901年11月,又将南洋兵轮改归江南提督李占椿接统,以使水陆各军联为一气。^[56]

1902年,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开复原北洋海军军官林颖启(原“威远”管带)、李鼎新(原“定远”副管驾)、李和(原“平远”管带)的官职。1903年,袁世凯奏保萨镇冰才堪破格擢用,奉旨以水师总兵记名简放。又将原北洋海军军官蓝建枢、何品璋、程璧光、林文彬开复原官。^[57]

进入20世纪之后,朝廷对于海防建设又趋重视,海军将领也迭获加官。由于北洋海军武职实缺均已裁汰,新授北洋军舰将领的官缺只能向南洋、广东旧式水师借用。1903年,实授叶祖珪为温州镇总兵、萨镇冰为南澳镇总兵。两人均留在北洋统带海军。1904年又授叶祖珪为广东水师提督,仍留北洋差遣。^[58]

1904年深秋,李鸿章的老助手周馥开府两江。他在考察了南洋舰艇设置及其他有关情况后,于次年1月18日提出南北洋海军联合派员统率的重要奏折:

臣此次南来,察看各兵船,亟应分别裁留,认真整理。非重定章程,不能革除旧习;非专派大员督率,不能造就将才。查有现统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本船政学堂出身,心精力果,资劳最深。拟将南洋各兵舰归并该提督统领。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各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归其一手调度。南北洋兵舰官弁,均准互相调用。现在兵舰虽不足一军之数,而统率巡防,须略仿一军两镇之制。即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兵舰器械支应一切事宜有与海军相关者,并准该提督考核,会商各局总办道员,切实整顿。前委管驾各官,有于海军尚欠练习者,酌量撤换……近日屡与北洋大臣臣袁世凯往复电商,意见相同……理合会同北洋大臣臣袁世凯合词恭

折具陈。^[59]

这一主张形成了南北洋海军合并的局面,从而改变了过去分战区建设近代海军的传统方针。南北洋海军合并,不仅使得中国海军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集中了机动兵力和实力,而且也为后来按海军战略使命划分舰队功能奠定了基础。

海军合并后,叶祖珪在上海高昌庙江南制造局中,暂借房屋,设立海军办事机关。未几,他因病去世于上海军次,年仅53岁。5月16日,朝廷任命萨镇冰为广东水师提督,其实就是由萨镇冰统领南北洋海军,所以他未去广东履任。两天之后,又派李准署理广东水师提督。^[60]从船政学堂早期学生的能力才干来看,无论叶祖珪还是萨镇冰,都算不上最为出众的人才。但既然那些杰出的同学不是死于甲申、甲午之役,就是受挫于其他种种事件,历史便把他们推到了前台。

为了重新培养造就海军人才,海军教育的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1896年,边宝泉在整顿船政局的奏折中令人心酸地指出:

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心。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华后,皆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揆诸养才用才之初心,似相刺谬。^[61]

接任的裕祿,具体提出了船政学堂和艺圃重新招生的问题。1897年4月开始,不仅规定一般平民子弟可以报名,还允许20岁左右举贡生员参加考试。由于船政学堂和船政局近40年来的影响和社会思潮的转变,因此投考者甚多。经过逐个遴选,最后挑选前学堂学生80名、艺圃艺徒60名。以后,后学堂也恢复了招生。

接着,裕祿又开始选派第四批海军留学生,本着“宜精不宜多”的原则,计划从前后学堂学生中挑选10名,分送英法两国,学

习驾驶和轮船制造。可是英国外交部通知中国公使罗丰禄,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名额已满,无法接受中国留学生,结果只能向法国派出前学堂第四届制造班学生施恩孚、丁平澜、卢学孟、郑守钦、黄德椿、林福贞6人。鉴于人数较少,不设洋监督,仅派吴德章担任监督。^[62]他们1898年出国,原定学习6年。可是留学经费无着,最后在1900年被撤回国内。

经历了甲午之战后,威海水师学堂解散,天津水师学堂也奄奄一息。1894年招人的第六届驾驶班学生,正逢1898年毕业。管轮班学生,1897、1899年毕业了两届,按四年学制推算,当属1893、1895年进校的。1898年之后的招生情况,由于资料缺乏,不得而知。到了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学生们四处星散,这所学校便停办了。

江南水师学堂还维持着,但也弄得乌七八糟。该校学生中后来出了两位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从他们的妙笔下,人们窥见了许多正史上未曾记载的内幕。

如同大多数海军学堂的学生一样,周氏兄弟也是因家道中落,想找个无需交纳学费的学校而进入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是1898年报考该校管轮班的,入学考试的试题是“武有七德论”。周作人入校晚三年。他的初试题目是“云从龙风从虎论”,复试题目是“虽百世可知也论”,都是酸腐不堪的八股题。周作人回忆说,入学一个月后,学校进行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更加要命,叫做“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考得大家一败涂地。

江南水师学堂原分驾驶、管轮、鱼雷三班。到1901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管轮班原设头、二、三班,每期三年,此时将三班也裁去。但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进入二班,便增设一种“副额”,来替代三班,称作额外生。每星期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课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及驾驶管轮等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语讲解,所以总名如此。

学生每天的日程是,早晨6时起床,然后吃早饭,练习打靶,8时上课至12时,中间休息10分钟。午饭后练习体操。下午1时30分至4时继续上课。吃饭后队列训练。每周还要练习爬桅杆一次。

据周作人记载,该校不少教习都是极迂阔极无知的。譬如有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又如体操教习乃是本校的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吸鸦片,人弄得很黑瘦,只会喊几句英文口令,挥舞几下酒瓶似的木制棍棒。至于教学内容,也颇古怪。英语念的是印度教材,只发到第四集为止,学生们无从理解那些“太阳去休息、蜜蜂离花丛”的诗句。^[63]鲁迅回忆说,那会儿他“几乎一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 ‘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云从龙凤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鲁迅还写道:

学校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吽! 唵耶吽! 唵! 耶! 吽!!”^[64]

如此弥漫着封建霉味的地方,却是讲授西学的学堂,着实令人惊讶。学生纪律更是涣散。老班学生,对于学堂规章制度熟视无睹。早饭号响过,他们还在高卧。厨房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形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哪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的称号是少爷)需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后慢慢地吃。^[65]鲁迅对该学堂的评价是“总觉得不大合适,

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66]

不要以为这是文人事后故作渲染。1905年2月，襄办练兵事务大臣铁良在奉旨密查江南防务的密折中说：“查该堂立法甚善，规模已极宏敞，学生敏捷英武者居多。惟教法太旧，堂规松懈，以致学生入学数年，尚未登舟演习。且查堂内小机器厂，屋内尘垢积满，不似逐日操作气象。所存鱼雷多碰伤者，办理殊欠认真。”^[67]足以证明周氏兄弟记载不诬。何况铁良作为练兵大臣，高高在上，走马观花，有许多底层的情况还看不到呢。

1905年春，江南水师学堂第四届驾驶班和管轮班学生毕业，适值整顿海军，经叶祖珪派人考试合格后，分拨南北洋各军舰练用，并派第三届管轮班毕业生朱天奎赴奥地利学习制造，又派船政学堂许建廷、李国堂，黄埔水师学堂毛仲芳、林国麋赴英国留学。同年，南洋在日本订购“江亨”、“江利”、“江贞”3舰，除派饶怀文前去监造外，又选第三届管轮班封燮臣，第四届管轮班王孝慕、李承曾、胡恩浩、萨君谦等5人随往学习新式机炉制造。^[68]

进入本世纪以来，前往日本留学成为知识界的一种风尚，海军留学的重点也转向日本。起先，是从海军学堂的毕业生中选拔，如1906年江南水师学堂第五届驾驶班17名毕业生中，有12名被派往日本。后来去日本者日见广泛，有的是国内海军学堂尚未毕业就去了，有的甚至连国内学堂都未必读过。根据记载，1906年赴日留学海军的，除上述江南水师学堂12名外，各省还选派36人。1908年派了50人。^[69]

1909年，护理两江总督樊增祥奏请将江南水师学堂改名“南洋海军学堂”。^[70]这一学校，在民国时更名为“海军军官学校”和“海军雷电学校”。

为了加强对北洋地区海军人才的培养，1902年在烟台东山设立海军练营，训练水兵，由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期毕业生谢葆璋任管带。谢葆璋，字镜如，福建长乐人，他的女儿谢冰心，后来成为著名的女作家。1903年，谢葆璋在练营内草创烟台海军学堂并兼任监

督,招收学生 20 名,次年春又招 20 名。这两班学生后来并作一届,于 1906 年毕业,不少人被派往日本。其中陈石英、叶芳哲还被送往美国学习造舰工程。由于学堂办有成效,1906 年经袁世凯批准,将嵩武军右营旧房拆除,改建新式校舍。1908 年新校舍落成,烟台海军学堂宣告正式成立。^[71]

此外,广东黄埔水师学堂还在继续招生。南洋在 1909 年又设立湖北海军学校。

官办的福州船政局,如同其他官办企业一样,一直受到人浮于事、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拨款不足、资金糜费、订单鲜微等弊端和困难的扰惑。有关方面曾打算变更所有制,招商承办,由于需费浩繁,华商无力承揽,洋商又未便招致,最后只得作罢。1896 年,闽浙总督兼船政大臣边宝泉另提改革计划,指出船政之设,经营 30 年,糜帑至千百万,纲举目张,规模毕具,只以财力短绌,因陋就简,积习日深,必须及时整顿,设法扩充。他建议重新聘请精于工作的洋员领导管理和指导技术,“督率在事员匠认真讲求,所造新式巨舰,务使坚固迅捷,成一船即得一船之用,庶不致有名无实”。原材料则宜内地采办。尤其炼钢熔铁设备,必须依法仿造,自成机杼,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要加强对学生的培养造就;请沿江沿海各省通筹合作,拨解经费;并提出简派廉干精核大员,担任船政大臣。^[72]这些建议本无新鲜内容,核心是船厂管理。同日本造船工业相比,中国人仍旧停留在建局初期所遇到的困难中,30 年光阴竟像白过了一般。但朝廷别无选择,惟有照例批准,并任命福州将军裕禄兼充船政大臣。^[73]

裕禄兼充船政大臣前后共 17 个月。他上任后,立即抓紧聘请外国管理人员。经与法国驻华公使的代表、海军军官卜玳的数次谈判,签订了《福州船政局订请法国造船监督合同简明约章》。1897 年 3 月下旬,由法国海军部选派的 5 个法国人——正监督杜业尔(原法国水师制造学堂帮办教习、二等监工)、监工达韦德(原勘矿炼钢监工)、毕尔第(原水师制造监工)、绘图官李嘉尔、书记

官伯乐抵达福州。^[74]裕禄和杜业尔商定,在三年内建造两艘鱼雷快舰(即驱逐舰)。这种军舰排水量 850 吨,功率 6500 匹马力,时速 23 节,船体为钢肋钢壳,配有 100 毫米口径快炮 1 门,65 毫米口径快炮 1 门,并装有鱼雷发射管。^[75]这两艘军舰,后来命名为“建威”、“建安”。

“建威”、“建安”的船体和蒸汽机系船政局自制,所需钢材从法国地中海钢铁厂进口,锅炉也是从法国定购的。就其船型设计和航速看,皆为船政局历史上最为先进的。而在此之前,4 月下旬,船政局还下水了一艘“福安”号运船,排水量 1700 吨,功率 750 匹马力,航速 12 节,属于中法战争前下水的“威远”、“超武”等舰的水平。这说明,引进西方技术专家,对于提高船政局产品的技术水平,有着十分明显的效果。

裕禄与卜弢签订的《简明约章》,同当年在左宗棠与日意格签订的合同的最大不同,在于由受聘外国人员个人与船政局直接签订变为由受聘人员所在国政府与船政局主持人签订,从而使得这种聘请具有官方性质。在日意格的合同里,监督只是船政大臣的属员,必须承诺“安分守法”、“不准私自擅揽工作”等等义务。法方当时还特别要求,船政局应用各国之人,以免别国借口有所不平。而到 1897 年,这些条文都没有了,只有“人员应用法员”的规定。这反映出 19 世纪末叶,列强对华掠夺、侵略和控制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76]

杜业尔在船政局担任正监督期间,依凭法国政府为后台,独断专行,并力图为法国谋取利益,终于导致了同清政府的直接冲突。

先是杜业尔擅自同法商订立制造“宝璧”号商船合同,订价 10 万元,制成后核计工料价达 16 万元。接着,1902 年 7 月,他未经与船政大臣商量,又与法国设在上海的立兴洋行签订了建造 3 艘长江货轮商轮的合同。杜业尔自称是船政局的代表,又规定制造责任由他独担,一切工料归他包办,成船后有无弊病短绌,均由他自理,与船政局无涉。军机处得悉后,致电船政局总办沈翊清,指出由我方耗费代人造船是失算的,况且船政局经费一直不敷,因此

要杜业尔中止合同,立即停工。然而杜业尔声称已与对方画押付款办料,万难作废,坚不允从。不久,立兴洋行擅自提出以其公司股票 23 万元抵作船款,面对这种严重侵权的作法,加上杜业尔其他擅自专权的行为,朝廷决定起用懂得世界情况,又精通造船工程的魏瀚为四品卿銜会办船政大臣,进行遣退杜业尔的交涉。几经周折后,杜业尔被召回国,立兴洋行的合同亦被废除。

魏瀚会办船政后,主张建造鱼雷艇加强海防,船政大臣崇善对此并无兴趣,他热衷于用鱼雷厂来铸造铜元。魏瀚向他指出,现在铸造铜元固有余利,但当铜价上涨,赢利就很困难了。两人意见相左,崇善就借端参魏。魏瀚离开船政局,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去,总办黄埔造船所并所属学校及石井兵工厂。^[77]

杜业尔离任后,崇善另聘法国人柏奥镗出任总监工。柏奥镗在职期间,主要完成前定为立兴洋行制造,已经开工的长江货轮“宁绍”号。“宁绍”号排水量 2160 吨,功率 5000 匹马力,时速 15 节,船体结构为肋骨钢壳,是清季船政局所制的最后一条轮船。^[78]

1907 年夏,陆军部奉旨筹议船政事宜,主张关闭船政局。其奏折称:

查船厂为海军根本,闽厂积弊既深,亟应整顿。前经南北洋大臣派员前往洋查,嗣据复称,该厂机器多系旧式,又无专门工师,加以基址不宜,款项支绌,似宜另图改建等情。是该厂窳败情形既经南北洋大臣查勘明确,自应暂行停办……现已电调海军提督萨镇冰来京面询一切机要,细酌妥善办法。该船厂既议停办,则所雇之洋员自应照该将军(崇善)所请,白外部查照合同办理,并由该将军遴选将该厂船坞机器等项妥为看守保存,以备应用。^[79]

这样,创办了 41 年的福州船政局就此关闭。

随着海军的重新振兴,对舰艇的维修和新舰的建造任务显得十分迫切,船政局又经营不善,于是人们想起了停止造船 20 年的

江南制造局。

1904年冬,两江总督周馥途经上海时,专程前往制造局察看,发现这里船坞也是管理混乱,工缓价昂,以致“商船裹足不前,兵轮反入洋坞修理”。回江宁后,他提出将船坞从制造局单独划出,交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水师叶祖珪督察,由前留美幼童、总兵衔副将吴应科总办船坞事宜,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妥筹改良。聘请原任北洋海军总管轮机的德国人巴斯任总稽查,其余委员、司事、机匠、工匠人等,概由总办自行遴选,予以充分的用人权。将来南北洋兵轮如需修理,只要船能入坞,皆可归该坞包修。按照实用工料收回工价,其他商轮亦许该坞承揽修造。开办伊始,由粮道库款中挪借20万两,随后以修船余利分年归还。此后常年经费即由船坞修船收入自行周转,不再另行拨款。若有盈利,除酌提花红以作奖励外,其余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80]这一主张得到朝廷的允准,从而开始了封建官办大型企业经营体制的重大改革。

1905年4月,局坞正式分立,船坞从制造总局划分出来,称作“江南船坞”。凡与船坞相应之轮船、机器、锅炉、熟铁、木工、铸铁等厂和江岸码头,均归船坞接收,总计分得地基60亩,泥船坞1座;轮机厂1所,连样板楼、锯木房、木工房、抽水房、物料房以及员司住房、大小厂屋共98间;岸坞(即修理小轮船舢板的船槽)2座;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锅炉厂1所,连办公房、木料栈、大小厂房共48间,内有60匹马力总汽炉2座,40匹马力、30匹马力蒸汽机各1台,剪、钻、冲、刨机床18台;炮弹厂1所,划分后改为机器厂,连同打铜厂、翻砂厂等新旧厂房、大小披屋共百余间,内有30匹马力、25匹马力汽机各1台,车床64台;水雷厂1所,连住房共90间,改作储料栈房;栈房5所,华洋式住房14所。^[81]

江南船坞的成立引起外资船厂的紧张,清政府只能妥协,增聘耶松船厂所属和丰船厂经理毛根为总工程师。后来巴斯被排挤,仍回北洋海军任职,毛根就升任总稽查。

江南船坞开办后,将泥船坞改为长375英尺、面宽75英尺、底

宽60英尺、深24英尺5英寸的木质干船坞,可容四五千吨舰船进出,还增添了不少新设备。船坞规定,将盈余分十二成,提六成还本,五成公积,留一成作为花红,分给华洋员司。由于采取了面向市场、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产值、利润不断增加。据统计,自局坞分开至1911年的6年中,江南船坞共造船136艘,排水总吨位21040吨,修船254艘。这同江南机器制造局在1865~1905年40年间,仅造船15艘,修船11艘相比差距十分悬殊。^[82]同福州船政局冷冷清清,打烊关厂状况相比,也成鲜明对照。曾几何时,人们批评说:“上海制造局之在今日已为大而无用之废物。以之糜费公帑则有余,欲其制造有用之枪炮则不足。”^[83]然而仅用6年时间,船坞便还清原定10年归还的20万两开办费,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说明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是扭转官办洋务企业连年亏损的惟一有效途径。

江南船坞这一时期所制船舶中,军舰不多,规模也不大,吨位最大的是海军大臣载洵的座船“联鲸”号,不过500吨,在性能上也落后于船政局的产品。但民用船的建造有了突破,1911年为招商局制造的钢质长江轮,排水量达4130吨,算是清末自制舰船中的老大了。

三、三个事件

在世纪交替时期中外关系的激烈动荡中,有三个事件与海军发生直接联系,即意大利索借三门湾、八国联军之役和日俄战争。

受到列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狂潮的鼓舞,1899年初,意大利驻北京公使、代理牧师马迪讷向总理衙门提出索借浙江三门湾的请求,使世人为之一惊。意大利自1861年完成统一后,资本主义工业有了相当发展,但在欧洲列强中,它的经济还较落后,国内市场狭小,资金和资源都很缺乏。它的海军,排在英、法、俄、德之后,大约比美西战争时期的美国海军略强些,算是个二等强国。清廷

觉得连意大利也欺侮到头上来，自恃还有些力量与之抗衡，决定采用强硬措施。而意大利，则拿出炮舰外交的腔势，派出3艘军舰到中国东南沿海游弋示威。于是，本来几乎洞开的海防线，忽然被动员起来了。

3月17日，朝廷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意国索租三门湾未允，诚恐向隙生衅，着密饬沿海防军侦探踪迹，妥为防范。^[84]接着便重新起用叶祖珪、萨镇冰等前海军将领。5月15日，朝廷又向江督电询意大利舰队的数量和停泊地点，并告诫浙江巡抚刘树棠，意船如系大队，未便以寻常兵轮尝试，只应设法试探，相机制敌，妥善调度。^[85]次日，刘坤一报告说，意舰现到3艘，2泊淞，1泊沪。据闻其海军提督即日内到，并另有3舰调遣东来。已饬陈旭调集兵轮数号，会同陆军相守御。以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所部驻扎镇江之江胜军3000人，为预备策应之师。^[86]

17日，朝廷谕刘坤一，水师固难争雄，陆防不可不筹先着。万一有事，一切相度策应之事，朝廷不为遥制。意大利无端索地，衅自彼开，与其动辄忍让，不如力与争持。而刘坤一有些胆怯，他报告说，南洋现有6艘军舰，皆系木壳旧式，钢板不过数分。而意大利军舰，钢板厚六寸者1艘，厚三寸者2艘，利钝悬殊。只能依附炮台，不敢轻于尝试。现令陈旭率2舰驻扎吴淞，默察动静，1舰赴镇江，余3舰并雷艇蚊船，驻扎江阴。^[87]

5月30日，朝廷训令北洋大臣裕禄，北洋所有兵轮应饬令出海，常川巡哨。次日，意大利宣布放弃对三门湾的要求，表示它“无意要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而只要推行一种扩展商业的政策”。朝廷仍不敢松懈。10月底，它得到消息，说风闻意大利暗调军舰，欲截三门湾，又说欲占登州、庙岛。于是立即饬令裕禄和山东巡抚毓贤等早为部勒，毋使意舰乘隙而来。

11月20日，朝廷还专门就海军训练和联络发布上谕，指出南洋各炮台对旗号灯号不甚谙晓，必致呼应不灵。又说，北洋所购新舰各炮台未经认识，辨别不真，为害匪细。至于炮台攻船之法，各炮台恐怕也未精此义，需要加强训练，还须谨防抄袭后路。命叶祖

珪率北洋诸舰南下,并着南洋闽浙督抚接见该统带,面商一切机宜,不得稍存畛域。^[88]接着,12月18日,刘坤一在江宁乘军舰出发,巡阅南洋诸炮台。抵沪后,与江苏巡抚鹿传霖及叶祖珪会面,商量防守和训练的有关计划。刘坤一后来在汇报中说,南洋各处炮台的防务都已抓紧,南洋兵轮、炮台所用的旗语、灯语,均按北洋所颁章程办理。叶祖珪此次率舰南下,各舰均已被辨认,不致有误。打靶放炮有准,成绩可观。^[89]

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事件,沸沸扬扬地折腾了一年,总算平安地过去了。这是中国人在近代对外交涉中,所取得的罕有胜利。究其原因,一是意大利本身毕竟较弱,它在中国的扩张要求,仅仅得到英、法、德的外交上的支持,且以避免使用武力为前提。俄国没有表态。日本则认为三门湾地区属于中日协定不得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的范围。中国利用这一形势,采用强硬态度,迫使意大利退让。二是中国在国外新购的“海容”、“海琛”、“海筹”、“海天”、“海圻”、“飞霆”、“飞鹰”诸舰及鱼雷艇已经先后到华,海军复兴初步有了点规模,并在实力上超过意大利在远东的舰队,这在战略态势和心理上都起了威慑作用。三是戊戌政变之后,朝廷中的满族亲贵保守势力占了上风,军机处由荣禄、刚毅等人控制,王文韶、钱应溥都是光磕头不說話的角色,原先对外交事务有很大发言权的李鸿章,此时已不得宠。保守势力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强硬政策,恰好碰上并不中用的意大利,歪打正着,意大利妥协了。朝野上下,不禁兴高采烈。

当甲午那年,日军越过鸭绿江,中国守军向凤凰城撤退的时候,赫德在北京的书房里给金登干写信说:“两千年的经验,虽把中国人磨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情绪以最激怒的方式爆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也许会通被杀光,每个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闹到今天这样,在我们自己被毁灭以前,且让他们先尝尝滋味!’”^[90]这番咒语般的预言,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旅

京的外国人头上。6年之后,宝剑真的落了下来,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其他劳动群众、无业游民参加的反帝运动。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社团,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白莲教的反清活动,最初流行在山东、直隶等地。它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北方四处勃起,同甲午战争后中国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开始修筑胶济铁路,开发沿线矿产,以及大批外国商品的涌入,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日益艰难;海运业发展后,运河中的船工搬运工大量失业;传教士在山东广为传教,庇护教民为非作歹,这都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相当多的人认为,外国人筑路、开矿、架设电报线,伤了“风水”,坏了“龙脉”,泄了“宝气”。这同他们生计迅速恶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不满情绪如同春天里的野草,到处蔓延。人们便利用义和拳的形式进行各种反洋教和排外活动。可以说,当地主阶级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住帝国主义扩张侵略,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新政也被顽固守旧势力扼杀之后,中国农民便重返历史前台,用愚昧落后的宗教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极端手段,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悲壮搏斗。60年来东西方文化的反复较量,天朝大国屡屡败绩,气息奄奄,到了1899年,更带有世纪末的凄凉。社会的躁动,便通过最底层的农民做载体,以义和团为形式,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

义和团的传播方式是设立拳厂坛场。他们用念咒、请神、画符等法术吸引群众,依着戏文和神话小说,搬请孙悟空、关云长、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等神仙传奇人物附体,声称法力无边。从1900年4月下旬北京出现义和团起,短短一个月,星星之火便在京师燃成燎原之焰。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街头巷尾,到处是舞拳弄棍的坛场。在朝中守旧大臣的策划和怂恿下,人们开始袭击教堂、教会学校、外商机构,乃至公使馆和一切与“洋”字沾边的东西了。

列强看到清政府难以控制京津形势,决定直接出兵,以“保卫使馆”的名义进行武装干预和镇压。各国还派出30余艘军舰云集大沽口外洋面。6月10日,驻扎天津的英德俄法美日意奥联军2000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率领,向北京进发。因为铁路被破坏,至杨村受阻。接着,联军不断受到义和团的袭击。5天以后,只得撤回天津。

13日,朝廷谕令裕禄迅速将聂士成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扼要驻扎,大沽口防务,着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91]大沽口是京津的海上门户,自1860年英法联军突破僧格林沁的防线,直薄北京、火烧圆明园后,40多年来,经过数次兴工修造和改建,共筑有四座炮台群,分扼白河口两岸,把守着150丈宽的海口通道。河南岸有南炮台和新炮台,前者安装火炮56门,后者安装火炮20门。河北岸有北炮台和西北炮台,分别装有大炮74门和20门,由罗荣光所部淮军六营和水雷营担任防御任务。^[92]根据形势,罗于16日下令在大沽口布设水雷。

6月15日,俄、英、法、德四国海军上将和意、奥匈、日本3国的高级舰长在俄国军舰上开会,决定占领塘沽火车站并保护天津外侨。18日,各国海军将领再次会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荣光在17日上午2时前,把大沽炮台移交给他们。当天下午,由6个国家935名士兵组成的陆战队在大沽登陆。原先已在白河之内的9艘外国军舰也分别调整位置,其中日舰“爱宕”号,驶靠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白河左岸;英国驱逐舰“惠钦古”、“弗爱摩”号,驶靠清军水雷营附近,监视北洋海军的4艘鱼雷艇;法国炮舰“利天”号、德国炮舰“伊利达斯”号驶靠位于塘沽和大沽之间的海关附近;俄国炮舰“基里亚克”、“朝鲜人”、“海狸”号驶靠白河右岸东沽附近;英国巡洋舰“阿尔舍林”号则停在俄舰稍后的于家堡对岸区域。^[93]当晚,俄国海军副提督海尔布德朗把通牒送交罗荣光,接着,各国侨民便纷纷登上泊在车站附近保持中立的美国军舰“莫诺开西”号。

深夜,炮台与外国军舰间的激烈炮战开始了。黑夜之中,难于

说清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首先开炮。^[94]在探照灯拉出的光柱中,只见炮弹如雨,爆炸轰鸣,波涛翻滚,水花四溅。罗荣光督率炮台弁勇发炮还击,双方鏖战6个多小时。至次日黎明,炮台的弹药库被击中,引起猛烈爆炸。接着,联军的陆战队分别占领了4个炮台,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撤退。

大沽口之战时,叶祖珪因乘“海容”去天津商量机要,将军舰停泊大沽口。“飞鹰”、“飞霆”两艘驱逐舰和“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鱼雷艇在大沽修配。海军舰艇均未参加对联军作战。有的史书说,这些舰艇“盖即未开战时停泊于口内者,以未知开战,故均未预备”。^[95]其实不然。裕禄事后向朝廷报告说,罗荣光“差人密约鱼雷艇开炮协击,诿该鱼雷船始终并不援应”。^[96]当时海军主力在山东登州、庙岛群岛一带操巡,这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军军官,显然对于义和团的排外行动不以为然。叶祖珪到沽后,称将有战争爆发,命“龙”、“犀”、“青”、“华”四雷艇去山东归队,就是想将海军置身事外,由于未及成行,战事已开,结果鱼雷艇均联军所夺,驱逐舰的机件被俄军拆卸运走。“海容”停泊在联军舰队处,叶祖珪同意与联军舰队一起熄火抛锚,放弃与联军作战。^[97]

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令对各国开战。山东巡抚袁世凯却劝海军各舰南下以避联军。海军主力旋由“海天”管带刘冠雄、队长林颖启率领,抵泊上海。接着,又参与了盛宣怀、余联沅和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发起的“东南互保”活动,宣称海军来,系奉命保护中外人士生命财产。惟由萨镇冰率“海圻”留守山东,将蓬莱一带教士侨民保护上舰。接着,美舰“俄勒冈”号在庙岛附近触礁,萨镇冰又驾“海圻”营救其出险,使得萨在美国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在“俄勒冈”舰长的劝说下,萨镇冰也率舰南下,开往江阴,加入东南互保行列。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互保”这种公然与北京分廷抗礼的做法能够出台,除了西方外交官的策动和南方督抚对于守旧派枢臣借用义和团进行盲目排外,以及慈禧太后想趁机废掉光绪皇帝的

做法不以为然外,也显示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大为下降。外重内轻局面已经形成。就海军而言,这是它第一次不执行朝廷命令,在某些实力人物支持下,擅自行动。到了后来,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它更日益受到各种力量的重视和争取。

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的义和团却久攻使馆不下。23日,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旋于29日在菜市口被杀头。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到处烧杀掠抢,慈禧太后挈光绪帝西逃,北京陷入一片混乱。接着,朝廷命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办理议和事项。77岁的李鸿章从广东启程北上,最后一次为大清王朝拯救危局。经过近一年的谈判,1901年9月7日,庆亲王、李鸿章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11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以空前屈辱的条件,换取同各国重新恢复和平状态。

李鸿章精疲力竭了。这个饱经半个世纪政坛风云沧桑,领导洋务运动并亲手创建中国近代海陆军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0月30日夜,李鸿章的胃部管破裂,咳血半盂。在静养的日子里,他很达观地给盛宣怀写了遗书,中有“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98]的句子。以后健康更趋恶化,11月6日,直隶布政司周馥赶至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寓所时,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在呼之犹应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延至7日中午,目犹瞪视不瞑。周馥哭喊着: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嘴唇喃喃颤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阖上,须臾气绝。^[99]

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眷念时局,老泪纵横,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100]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的老相识赫德，曾对李鸿章做过这样一段尖刻的评价：

他像我一样，年轻时交上好运，就此扶摇直上，位极人臣，其实我再说一遍，他像我一样，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因为身居高位使他声名显赫而已。当他接待外国人时仿佛应付裕如，但揭去他的这张皮，他还是中国佬，同其他官僚同样是无能之辈。^[101]

李鸿章，这位与中国近代海军有着最密切联系的老人终于撒手西去了。他的一生，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曲折坎坷之路。关于他身前的是是非非，从此留待后人评说。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以保护侨民和中东铁路为由，向中国东北派出 16 万大军。《辛亥条约》签订后，俄军仍盘踞东北，并力图胁迫清政府再次签订密约，以实现“黄色俄罗斯”的梦想。为了抗衡俄国在远东的扩张，1902 年 1 月 30 日，英国和日本订立同盟条约，声称英国利益主要在中国，日本利益除在中国外，还在朝鲜有政治、商务、经济上的利益。因此如果此等利益受到侵害时，两国将采取必要措置。在此背景下，4 月 8 日，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以半年为一期，在未来的一年半中，分 3 批全部撤出中国。

然而沙俄毫无履约的诚意，正如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日记中所说：“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102]到 1903 年 4 月第二次撤兵期限时，俄国向清政府提出新的条件，包括不得在满洲开辟通商口岸驻扎外国领事；在华北的公职中，除俄国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俄国保留旅顺口-营口-奉天电报线的管理权；满洲领土不得割让给其他国家等等，以作为撤军的前提。这些要求，显然把中国东北视为俄国的独占区域。

7 月，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全部建成。8 月，俄国在旅顺设立远东总督府，非法将旅大租借地和中东铁路沿线纳入俄国版图。至 10 月第三次撤兵期限时，沙俄军队非但不撤，而且又增兵重占奉

天。此外,俄国还想插足朝鲜。

英日条约签订后,日本同俄国展开外交谈判。他们都想把中国东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争执不下,双方便开始准备战争。

俄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陆军,在远东布置了两个军。至1903年底,它的兵力增至24万人。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口驻有7艘战列舰、1艘装甲巡洋舰和5艘防护巡洋舰,以及2艘装甲炮艇、4艘小型护航舰、25艘240~350吨位的驱逐舰和21艘鱼雷快艇。在海参崴,驻有四艘装甲巡洋舰和1艘防护巡洋舰,在朝鲜仁川也驻有2艘军舰,总计排水量约达19.1万吨。^[103]

在甲午战争之后10年中,日本军事力量也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巨大变化,在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大将的筹划下,魔术般地完成了“六六舰队”配置,即由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组成常备舰队。“朝日”号(15200吨)、“三笠”号(15200吨)、“初濑”号(15000吨)、“敷岛”号(14850吨)、“富士”号(12500吨)、“八岛”号(12500吨)等万吨级的战列舰,一下子把甲午战争中日军俘获的当时远东最大战舰“镇远”号(7335吨)撤入二线舰艇。甚至6艘装甲巡洋舰“浅间”号、“出云”号、“磐手”号、“常磐”号、“八云”号、“吾妻”号的排水量,也都在9000吨以上。1903年底,又从意大利买到2艘装甲舰,命为“日进”、“春日”号,在这10年中,日本还增加了8艘防护巡洋舰,海军舰艇总吨位达到20万吨。^[104]日本在海军上的巨大投入,显然同甲午战争后从中国获得巨额赔款有关。

1904年2月6日,日本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8日下午,日本海军击沉了停泊在仁川的俄舰“瓦兰人”号和“朝鲜人”号,次日凌晨,又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延续了一年多,其中包括旅顺口突围和对马海战等几场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海战。战争以日本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清政府企图用置身事外的方法,不卷入这场自己无力阻止的武力冲突。2月12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布中立。同日外务部通电声明,划出了两国在中国东北的作战范围。这种静待战争结束,

再来确定谁有力量获得支配中国东北控制权的做法,说明清政府的怯懦无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谓“中立”,是一个国际法概念。清政府在国内被列强强行打开之后,知道了欧洲国家在处理彼此关系时,有一个“万国公法”。可是,当它企图用“万国公法”来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却依然手足无措,受尽欺侮。1894年,清政府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甚至连日本领导人也感到将引起很大的国际交涉。可是最后居然被英国法学家解释说,日本的攻击是合法行为,弄得清政府莫名其妙。同年8月7日,荷兰公使费果荪告诉总理衙门,按“万国公法”,交战国对外国船只驶近时有盘查、辨别的权利。李鸿章立即把这一要求转告各国,并提出各国军舰到达设防口岸,也应停轮检查,方准进口。这些合法要求遭到英国公使欧格纳的拒绝,^[105]总理衙门也无可奈何。这次在日俄战争中,中国对自己的“中立国”地位,一开始就战战兢兢,毫无把握,后来则不断受到交战国双方的破坏。

1904年8月10日,俄国舰队从旅顺口突围,企图绕过朝鲜,驶往海参崴,在渤海湾口,与日本舰队相遇。午后1时,双方开始炮击,至傍晚6点半,俄军失利。俄国旗舰“策萨列维奇”号负伤,驶往胶州,被德国人扣留。俄国驱逐舰“刚毅”号驶入烟台,在这里,日本悍然破坏国际法,制造了“刚毅”号事件。

那天,萨镇冰率领3艘中国巡洋舰,正泊在烟台港中。当“刚毅”号来到时,中国海军便按照国际惯例,将其拘禁并解除了它的武装。俄国舰长和官兵宣誓不再作战,军舰由中国海军控制。傍晚前,2艘日本驱逐舰驶入港口,作了一番侦察后离去。晚间,这两舰又驶回来,在中国舰队和“刚毅”号附近抛锚。萨镇冰亲自前去拜访日本军官,宣布“刚毅”已向中国海军投降,现在在中国保护之下。日本人回答说,他们也许当晚就会离去。

次日凌晨3时,一位日本军官登上“刚毅”,要这艘军舰驶入外海作战,不然就向他投降。俄国舰长拒绝说,他已立誓不再参加战争,而且事实上他也被解除武装,不能作战。中国军官也向日本

人重申这点,并向“海容”舰报告。“海容”立即派一位高级军官乘汽艇赶来,但在他赶到前,日舰已经驶靠“刚毅”号,日俄双方展开射击和肉搏,而“刚毅”号则被日舰拖着向外驶。萨镇冰再次要求日本人不应在中国海面掳去一艘在他保护下的船,然而无效。^[106]

在此事件中,日本滥用了交战国进入中立国港口的权利,并在中立港口演出了一幕武装暴行,反过来,也显示出中国中立地位的虚弱。从中国海军方面而言,3艘巡洋舰居然没能阻止2艘日本驱逐舰在自己眼皮底下的海盗行为,实在也很无能。最后,清政府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了一项没有结果的控告。

8月10日海战后,还有2艘俄国军舰“阿斯柯尔德”号和“暴风雨”号逃到上海。这里的清朝官员更加无能,他们不去执行国际法规定的行政警察职能,却同日俄两国领事进行商谈,并在北京也同这两国公使进行冗长的外交谈判,然后才将这两艘军舰解除武装和拘禁。事后,清政府决定聘请从前曾在英国海军供职,此时在中国服务的巡工司戴乐尔作为海军统帅的中立事务顾问官。

11月16日早晨,俄国驱逐舰“特拉斯罗尼”号驶入烟台港。当天它通过俄国领事馆通知中国当局,愿意投降并接受拘留。可是在中国军官登舰接管前,俄国官兵已全副武装离舰登陆,不久,又将“特拉斯罗尼”炸沉在港中。这是俄国对中国中立国地位的挑衅,表示怀疑中国的保护能力,不愿重蹈“刚毅”号的覆辙。萨镇冰对这一事件依然无能为力,直到日本领事馆向俄国人传话说,他们必须被遣送到“海筹”号中,否则日军将登陆占领俄国领事馆,而中国人又对俄国官兵多次恳切劝说,他们才来到中国军舰接受拘留。

1905年1月2日,又有4艘俄国驱逐舰和1艘汽艇驶入烟台,向中国当局投降。当时港内没有中国军舰,当局就派英籍海关税务司监督解除武装的有关事宜。为了防止“刚毅”号事件重演,俄国官兵被迁到岸上居住,军舰由中国官员控制。

后来,中国海军对处理这类事较有经验了。1905年5月下旬,几艘为第二太平洋舰队执行补给的运输舰进入吴淞,叶祖珪立

即宣布它们是军舰,让他们在离境和接受拘禁两者间作出选择。叶祖珪拒绝和领事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让中国地方官介入。船只被拘后,拒绝宣誓的俄国人被禁锢起来。^[107]

中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还付出了其他代价。1904年4月26日,4300吨的“海天”舰奉命赴江阴领取军火,以济辽西“中立”之需。行至舟山调头,因大雾迷漫,舰速过快,撞上鼎星岛搁浅,舰首高高地架在礁石上。^[108]管带刘冠雄因袁世凯联合两广总督岑春煊奏保,仅被革职。“海天”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它的损失,对于海军复兴的影响是很大的。

1905年9月5日,日俄国双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朴茨茅斯会议前,清政府向日俄两国致送照会,指出“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但日俄两国对此毫不在意。和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水内的权利及租界内的一切公共营造物和财产,全部移让给日本。从此旅顺军港便沦入日本人的控制中了。

四、海军复兴

1905年中国政治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革命党人认为,清廷用假立宪欺骗人民。9月24日,27岁的安徽青年吴健身怀炸弹,潜入北京正阳门车站进行暗杀,轰动全国。12月,朝廷重组使团,由镇国公载泽领衔,成员包括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

次年7月,五大臣回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10个奏折。在“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他们提出设立军部,以兵部练兵处改并,管理全国海陆军事务,分设陆军、海军两局。在“军政重要请取法各国以图进步折”中,提出军事大权谨请皇上亲御戎服,以

振士气,皇帝实统海陆军权。海军制度宜次第筹划规复,宜指定一款为分年筹划之需,先以5年为期,造就军官若干人、兵舰若干只、军港若干处、工厂衙署若干所,逐款预计,决一定数,分年而筹。不准挪借,循序渐进。^[109]朝廷派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及北洋大臣会议。海军复兴问题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受到了重视。

11月6日,朝廷厘定官制,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之前,暂归陆军部办理。

1907年6月7日,陆军部奏定官制,建立海军处,设正使(相当于协都统,格同巡抚、布政使,从二品)、副使(相当于正参领,格同按察使、正三品)各1人,承发官2人,录事4人。设机要、船政、运筹三司,置司长、副官、录发官各1人。科长7人(机要司四科:制度、筹械、驾驶、轮机;运筹司三科:谋略、报务、测海;船政司不设科),一、二、三等科员18人,考工官5人,艺师3人,股长股员视事闲剧设置,录事18人。正使未任命,副使以谭学衡充任。郑汝成任机要司长,程璧光任船政司长,林葆纶任运筹司长。^[110]

海军发展战略主要在练兵处一批人马中筹划,由练兵处提调姚锡光主持,确定拿出急就、分年二套方案,形成了《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等几个文件。在第一个文件里,提出将现有舰艇“海圻”、“海筹”、“海琛”、“海容”、“镜清”、“南琛”、“保民”、“康济”、“琛航”、“伏波”,练习舰“通济”、“威远”,鱼雷艇“辰”、“宿”、“列”、“张”等堪用外海的16艘军舰,编成巡洋舰队。再将广东所有“广”字号军舰,福建所有“福”字号军舰一体并入。将来陆续添置一、二等装甲巡洋舰6艘,更换原有三等巡洋舰、巡洋炮舰、报知舰,增添鱼雷艇8艘,以形成一支完全巡洋舰队。将现有长江“楚”字号6舰,江南“江”字号3舰及驱逐舰“飞鹰”、“建威”、“建安”等12舰,编成巡江舰队。设立海军提督1员,统领巡洋、巡江两支舰队。设立

海军总兵1员,任巡洋舰队翼长;海军副将1员,为巡江舰队翼长。并根据各国海军舰长皆官至上校的惯例,建议以参将为管带的最高品秩。

在第二个说帖里,计划10年筹款5千万两,添置三等战列舰(7000吨上下)2艘,一等装甲巡洋舰(6000吨以上)2艘,二等装甲巡洋舰(4300吨,类似“海圻”)1艘,三等装甲巡洋舰(2950吨,类似“海筹”)1艘,一等鱼雷艇12艘。计增总吨位35000吨。并兴建海军基地厂坞,创办海军兵官学堂、海军机轮学堂、海军大学堂、海军研究所、海军工科学堂、海军学兵营、海军水雷学兵营,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在第三个说帖里,计划12年中筹款1.2亿两,添置一等战列舰(12000吨以上)2艘,二等战列舰(8000吨以上)2艘,三等战列舰2艘,一等装甲巡洋舰4艘,二等装甲巡洋舰3艘,三等装甲巡洋舰1艘。计增总吨位94000吨。并购鱼雷艇16艘。合之原有军舰,可望达到平时海军为两队,战时海军一大队的构想。

同年夏天,萨镇冰应召入京。姚锡光与他数次会晤,未得要领。有关方面要姚另拟前三年计划,于是又提出了《拟暂行海军章程》,主张在最近3年中,增置二等、三等巡洋舰3艘,与原有“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舰组成装甲巡洋舰分队。另制600吨以上800吨以下的浅水炮舰17艘,与原有“广玉”、“广金”、“安澜”、“镇涛”4舰,合成21艘,配作7个守口炮舰分队。以上各分队合编成海疆巡防舰队。在沿海七省分设巡防舰队和各海军军区。设立海军最高指挥机关海军总司令部。^[111]

姚锡光主持制定的海军发展战略中,组建集中统一的巡洋舰队思想很值得回味,不能简单看作是由于海军力量单薄,无力再按“三洋”构想组建区域舰队,而应该看到这是对分区域完成海军近代化思路的一种否定和超越。从历史教训来看,“三洋”舰队的构想容易在地方实力派系争夺的背景下造成有限实力的进一步分散和隔断,造成部分区域海军的片面发展和整个海军发展被忽视的局面。而按巡洋和巡江的使命编成舰队,就能使舰队的使命更加

明确,协同能力和适应不同海区作战的能力更为提高,真正使有限的力量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个海军战略中,制海权思想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述。姚锡光说:

方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然而远人之来抵掌而作说客者,恒劝我多购浅水兵舰,以图近海之治安;而我当道及海军诸将恒乐闻其说者何哉?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慕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遂乃巧为其辞,勸我购浅水兵船为海军根本,使我财力潜销于无用之地,而远洋可无中国只轮。^[112]

姚锡光还明确指出:“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守内者哉!”这是对从魏源开始,在中国海防理论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守外洋还是守海口问题所做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应当说,20世纪初年,马汉的海权论在中国海军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1900年3月,由日本乙未会主办,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连载了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第一章的有关内容。1909年,吴振南翻译出版了马汉的另一部著作《海军政艺通论》。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主办的《海军》杂志,刊载了许多论文,研究海权的内容、海权产生的历史条件、影响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因素、海权对国家盛衰的关系,指出“吾国民之不知有海上权力”,主张“当鼓我不拔不挠之精神,活跃海上,为不凡之民而后可”。并运用海权理论,研究中国海军建设问题,批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海军缺乏争夺制海权的意识,“数万吨之舰队,分布沿海诸岸,待敌之来,不得已而与之战”。^[113]这些研究表明,即便重建海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在海权理论上,中国人的观念已较前几十年,有了相对的进步。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驾崩。根据太后生前的安排,由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皇位,年

号宣统。嗣皇帝年方3岁,太后遗命醇亲王监国摄政。摄政王出生在中法战争前一年,是老醇亲王奕譞的第五个儿子,这年才25岁。1901年曾被派充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为其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死“谢罪”。这算是他最重要的政治经历了。摄政王处事优柔寡断,缺乏主见。在他身边,云集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经验的皇族贵胄,他们一心想把国家大权全部收归到自己手中。

次年2月19日,朝廷派肃亲王善耆、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海军提督萨镇冰妥慎筹划海军事宜,先立海军基础,并着庆亲王奕劻随时综核稽查。^[114]7月,肃亲王等依照姚锡光海军发展规划为蓝本,提出划一海军教育、统编舰艇、开办军港、整顿厂坞台垒的奏折。15日,摄政王以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载统率陆海军之权操之皇上等语,发布上谕,宣布皇帝为大清国陆海军大元帅。所有一切权任事宜,于未亲政前由监国摄政王代理。并命摄政王六弟,郡王衔贝勒载洵和提督萨镇冰担任筹划海军大臣。^[115]今年夏天,朝廷正式将南北洋舰队归为统一,再分巡洋、长江两舰队,由萨镇冰任海军提督,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沈寿堃统领长江舰队。

载洵这年才二十来岁。他因出继给瑞郡王奕志为嗣,袭了贝勒,从后海的醇王府搬出,住进西单甘石桥槐里胡同和背阴胡同间富丽堂皇的洵贝勒府,摆出一派王孙贵胄的派头。他哥哥做了摄政王后,给他和七弟载涛都加了郡王衔,于是益发不可一世。他吵吵嚷嚷要管海军,说是子承父志。摄政王明知他完全外行,但禁不住他声色俱厉的争闹,只能授他做了筹办海军大臣。^[116]

据说摄政王同意载洵当海军大臣时有一个条件,要他出国考察海军。旅行对于纨绔子弟来说,是件很有吸引力的事,但处理公务就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从8月下旬,先国内后国外,载洵和萨镇冰开始了一系列的巡视和考察。

8月25日,两人出京,南下巡阅海防。29日抵达上海。次日阅看江南制造局和江南船坞。9月2日,到达浙江象山。3日上

午,会同闽浙总督松寿、浙江巡抚增蕴举行象山军港的辟港典礼。象山属于宁波府治,在南田之北、镇海之南,面对舟山群岛,港湾深入县境66里,口宽12里,水深21尺至115尺。群山环绕,随处可以避风。港内另有一支港,叫西湖港,地势平缓,可做船坞。在20世纪初重辟海军基地的各种建议中,象山是最受重视之地。几经周折后,终于确定将这里作为未来的海军基地。

9月4日,载洵到达福州,视察船政局,接着又往香港、广州、厦门、上海、杭州、江阴、镇江、江宁、田家镇、汉阳,至24日返回北京。^[117]

清王室家法甚严,王室成员未经特许,不得轻易离京。反之,因公出巡,则所到之处,典礼隆重。清末老醇王和洵贝勒的出巡,都被海军界和当地督抚视为一大盛事。但同乃父相比,载洵个人的地位要低得多,海军的状况也差很多。因此,巡阅的场面就大为逊色。可是载洵又没有老醇王的那份谨慎,一路收受各地特产和高贵物品,于是名声坏得多了。

10月16日,载洵和萨镇冰出访欧洲。他们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在热那亚上岸,参观意大利各军港船厂,订制一艘400吨级的驱逐舰“鲸波”号。接着前往奥匈帝国,在的里雅斯特订造了400吨级驱逐舰“龙湍”号(这两舰在民国初年因船款纠葛,未交中国),尔后前往柏林。

近代中国和德国的交往尚属频繁,但高级官员出访却十分罕见。1887年,钦差大臣崇厚前往俄国交涉索还伊犁,途经柏林时,驻德公使李凤苞在旅馆大厅迎接,并跪请圣安之事,曾被当地报纸哗传一时。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也引起轰动,被称作“东方俾斯麦”。这次载洵等来访,再次引起德国人的兴趣。下榻的凯旋门前菩提树大街勃里斯特旅馆外围观者塞途。当载洵等身穿黄绫马褂,佩戴大绶勋章,拖着长长的辫子从马车上走下来进入旅馆时,引起一阵发笑。萨镇冰对前来迎接的留学生林献炘、常朝干说:“你们看看,这个时代我们还拖着根尾巴,可笑不可笑?”

在德国,载洵等照例参观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并向德国人订购

新式驱逐舰“同安”、“建康”、“豫章”(390吨级)和140吨级河用炮舰“江鲲”、“江犀”号。

载洵在德国大耍纨绔脾气。当德方皇叔出面,举行送别宴会时,载洵忽然以晚饭已经吃饱为由,拒绝前往,以致中国驻德公使荫昌只能以辞职相威胁,才将他硬拖着前往皇宫。在宫里,他看到红男绿女早已久候迎接,乐队高奏中德音乐,宴会后还举行了舞会,又不由欣喜若狂。

他接着前往英国,在阿姆斯特朗公司和威克斯船厂分别订购了2757吨级巡洋舰“肇和”和“应瑞”。^[118]旋于1910年初经德国、奥地利取道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国。

载洵在回国途经哈尔滨时,革命党人熊成基布置对他进行暗杀,事泄被捕。在受审时,熊成基历数清廷罪恶,第一条便是海陆军权不与汉人。他质问说:近年来创设海陆军,关系何等重要,清廷若真有改革军事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偏要选载洵、载涛、铁良之辈?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居心何在。^[119]

回到北京不久,载洵奏请开去海军要差,没有得到允许。8月下旬,载洵和萨镇冰再度出访美、日两国。在纽约,他们订购了2600吨级巡洋舰“飞鸿”号(后因民国初年船款纠葛,未交中国)。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认为载洵不仅腐化,而且易受欺骗,他说:“我们造船厂的工人也许能够向他展示令人一饱眼福的展品,并且用大量的烟火使之闪闪发光,这样就能使他对我们高超的造船技术留下深刻的印象。”嘉乐恒所说的深刻印象,是指维克尔和马西姆工厂在焰火中突然显示出载洵身着将军服的肖像。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把戏,我们今天搞不清楚。但公使先生认为诱使载洵耗尽他的国家拥有的很少一点钱,将使美国成为中国的罪人。^[120]途经日本回国时,载洵继续天女散花,订购了两艘780吨的炮舰“永丰”、“永翔”号。“永丰”号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山”舰。

从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共计16年半,这16年半中,清政府外购军舰39艘,排水量34728吨(均不含未能来华之军舰),平均每年增加2105吨。国产

军舰 24 艘,排水量 10564 吨,平均每年增加 640 吨。两项合计,平均每年增加 2745 吨,就晚清末年承担着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巨额财政负担的清政府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可说是勉为其难了。^[121]

朝廷宣布载洵、萨镇冰为筹备海军大臣后,旋将陆军部海军处的事务和档案文卷统统移交给新成立的“钦命筹办海军事务处”。陆军部并将长江水师、江南水师、广东水师、福建水师、浙江水师有关事宜及建造旧式师船的金陵船厂、湖口船厂、汉阳船厂均划交筹办海军处管理。^[122]

海军大臣根据 1905 年练兵处奏定的《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陆军人员补官体制摘要章程》所规定的三等九级军衔制,拟定海军人员军衔。在正都统、副都统、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前,皆冠以“海军”二字,以示区别,又据此拟定海军长官旗及各级军官章服标志。还同陆军部会商,正式提出了筹办海军的 7 年规划。与度支部商定,为海军筹集 1800 万两开办费和 200 万两常经费。其中开辟军港经费 150 万两,购舰经费 1650 万两。前者两年内拨出,后者分 4 年匀拨。至 1909 年 10 月,共从全国 18 省和度支部筹得开办费 1134 万两,常经费 168 万两。^[123]

1910 年 2 月 19 日,朝廷命海军元老,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严复、魏瀚、郑清廉和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伍光建为筹办海军事务处顾问。

4 月 8 日,载洵提出请拨地建造海军衙署。请仿英国海军警备队之制,在北京城外昌运宫旧址,设立海军警备队总营。^[124]又重新厘定海军处各司职掌:军制司掌海军规制、考绩、驾驶、器械、轮机等事宜;军政司掌修造战舰、建筑工程等项事宜;军学司掌海军教育、训练、谋略等项事宜,军防司掌铨衡各省水师将弁并侦测等项事宜;军医司掌海军卫生、疗伤、医药及军医教育等项事宜;军枢司掌全体人员升迁、调补、差缺、机密公牍、函电及承发文件等项事宜;军储司掌海军经费暨服装、军粮等项事宜;军法司掌海军事

事裁判、风纪、法律等事项。共计八司,此外还设有参赞厅,设参赞一员及一、二、三等参谋官,为海军大臣赞助佐理各种事务。^[125]

这年年底,筹办海军处制定《海军部暂行官制大纲》,又在原有八司基础上,增设主计处,并建议裁去原设筹各海军处大臣和参赞,另设海军部正副大臣各一员。12月4日,朝廷授载洵为海军大臣,原海军处参赞谭学衡为副大臣。海军大臣品秩视尚书,副大臣视侍郎。^[126]又于次日命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127]谭学衡是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在此之前,做过军学司司长。他在海军界本不出名,资历也不老,现在擢升得如此之快,是朝廷想借此平抑福建籍军官的势力。

1911年初,开始对海军军官授衔。海军大臣载洵,简授海军正都统,即海军上将,格同总督,正一品;副大臣谭学衡,简授海军副都统,即海军中将,格同巡抚,正二品;巡洋长江舰队统制萨镇冰,简授海军副都统加正都统衔;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简授海军协都统,即海军少将,格同布政使,从二品;署理巡洋舰队统领吴应科、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严复,驻沪一等参谋官徐振鹏、烟台海军学堂监督兼海军部一等参谋官郑汝成,赏海军协都统衔。

此外,军学司司长曹汝英、军枢司司长伍光建、署理军法司司长李鼎新、军制司司长蔡廷干、署理军政司司长郑清濂、驻英国威克斯船厂监造员李和、驻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监造员林葆懌、“海圻”管带汤廷光、巡洋舰队总管轮孙辉垣,皆授海军正参领,即海军上校,格同按察使,正三品。军储司司长林葆纶、舰队统制官一等参谋官郑祖彝、“海筹”管带黄钟瑛、“海琛”管带杨敬修、“海容”管带喜昌、“南琛”管带曾兆麟、“镜清”管带荣续、“通济”管带葛保炎、“保民”管带甘联璈、“江元”管带宋文翔、“江利”管带郑纶、“楚同”管带何广成、“楚泰”管带马炳钰、“楚有”管带朱声冈、“江贞”管带饶怀文皆授海军副参领,即海军中校,格同盐运使,从三品。“飞鹰”管带林颂庄、“建威”管带程耀垣、“江亨”管带沈继芳、“建安”管带沈樾、“楚谦”管带王光熊、“楚豫”管带方佑生、

“联鲸”管带许建廷、“楚观”管带吴振南、“舞凤”管带王传炯皆授海军协参领，即海军少校，格同道员，正四品。^[128]

从世纪初开始的重兴中国海军工作，至此达到了顶点。由于有了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的经验和近40年培养的海军人才的积累，这次从谷底走向重兴，仅用了十来年时间。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海军力量也在迅速发展。1906年，英国建造了“无畏”号战列舰，使得各国海军坚船利炮竞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是美国的莱特兄弟在1903年成功地制造了飞机。到了1910年11月14日，尤金·伊利驾机从停泊在切萨皮克湾的“伯明翰”号巡洋舰甲板上起飞成功，次年1月18日，他更驾机在“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安全降落，从此海军增添了一种强有力的兵器，使海战走向立体化，并最终注定战列舰这个舰种退出历史舞台。这都使得中国在发展海上力量时，必须不断地增加新的考虑因素。就中国国内范围而言，这次海军重兴，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统治力度，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进行的。朝廷通过建设海军来强化皇权，而其掌权者和军队的统帅，又远比上一代人更无能、更近视。结果就在1911年，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五、辛亥革命海军易帜

中国近代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海军官兵，受西方教育程度最高，绝大多数军官受到正规院校培养，相当一部分人留学欧美日本。然而海军中投身革命的人极少，仅程璧光之弟程奎光，原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为兴中会早期会员，因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被捕，瘐死狱中。究其原因，一则舰艇部门繁多，仅靠一二人振臂高呼，难以控制全舰。在未得确切把握前，只能债事。二则待遇优渥，大大高于陆军，也使海军军官政治上倾向保守持重；三则革命党人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新军和会党，没有着力在海军中开

拓。因此,在统治者看来,海军一直是他们依恃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工具。

广东是孙中山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方。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镇压起义,一直被革命党人视为头号暗杀对象。1907年,刘思复谋用炸弹刺李准未成。1911年8月,林冠慈、陈敬岳再次策划暗杀,终于将李准炸伤。

1911年的中国,危机四伏,已经成为巨大的火药库,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黄花岗起义、“皇族内阁”、保路风潮,都是通往火药库的导火索,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0月10日,驻守武汉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带领40多名士兵,打响了起义武昌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广总督瑞澂匆匆逃上停泊在武昌江面的“楚豫”号炮舰避难。12日,清廷发布上谕,命陆军大臣荫昌督率两镇陆军,前赴湖北镇压。着海军部加派兵轮,飭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飭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129]次日,萨镇冰从上海乘“楚有”号炮舰全速西驶武汉,并从各地调集军舰增援。15日,萨镇冰抵达汉口江面。^[130]他通告各国领事,待海军事军舰到齐,便开炮轰城。

至17日,集结在汉口江面的军舰,已有“楚豫”、“楚有”、“楚同”、“楚泰”、“建安”、“建威”,其他军舰也在调集之中。海军对武昌起义者构成严重威胁。被起义者簇拥为鄂军大都督的黎元洪,原是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管轮班毕业生,甲午战争时,担任“广甲”二管轮。战后改投张之洞门下,从两江到湖广,协助训练新军,官至第21协统领。他与曾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和“康济”练习舰管带的萨镇冰有弟子之谊,决定写信劝萨反正。他派已经投向革命军的原“建威”帮带朱孝先充信使。朱身着西装,以商会犒军的名义前往“楚有”,致送信函。信称: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都[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

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促出此。虽任事数日，未敢轻动，盖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今已视师八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而连日各省纷纷之士，大都留学东西各国各种专门学校及世代簪缨，学有专长，阅历极富；并本省官绅人等，故外交着手，各国已认为交战团体，确守中立。党军亦并无侵外人及一私人财产之事，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视为创见，即各国革命史，亦难有文明若此。可知清国气运既衰，不能任用贤俊，至使聪明才智之士，四方毕集，岂又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洪有鉴于此，识事机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土，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洪受业于师，学识浅陋，不能担负重任，已向同志宣告，将以党军之所要挟者，倩诸先生，登轮要求师宪。昔人谓谢安云：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同胞万声一气，谓吾师不出，如四万万同胞何？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色改观……洪非为私事干求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满汉存亡，系于师台一身。齐王反手，洪计之已熟。否则各同胞视为反对此志之人，即以满奴相待，虽洪亦不能禁止其不邀击也。^[131]

萨镇冰阅信后默无一言，没有回信。几天之后，一个名叫轲斯的瑞典人，乘坐悬有红十字旗的小火轮登“楚有”，鼓动萨镇冰反正，并送呈黎元洪的又一信，萨镇冰依然没有答复。

萨镇冰是个老成的人，遇事并不走极端。到汉以后，他没有积极布置进攻革命军。10月18日，海军在江岸停车场附近江面与相距3500米的革命军炮队对射。彼此炮弹都落在水面，没有造成损失。28日，汉口清军与革命军激战，海军前往助战。据目击者说，双方的命中率都很差劲。^[132]就革命军这边而言，显然在继续采取争取海军的战略。^[133]而海军官兵，则已萌发同情起义的思想。

革命形势风起云涌。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

动会党和新军起义,攻占长沙,宣告独立。西安新军张凤翔等也举行起义,宣布陕西独立。23日,革命党人蒋群、林森策动九江新军起义。24日,广东同盟会员策动化州新军起义,成立临时政府。25日,湖南岳州新军起义。29日,山西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30日,昆明和南昌新军分别起义,成立军政府。四处风声鹤唳,清廷命令海军部加紧布置,巡洋、长江舰队全部被调动起来。除“海圻”舰由程璧光率领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尔后开往美国、古巴慰问华侨,“江亨”舰拨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遣用外,“海琛”、“海容”、“海筹”、“江贞”、“楚同”、“楚泰”、“楚有”、“楚豫”、“辰”、“宿”、“湖隼”、“湖鹰”、“湖鹞”等13艘舰艇被派往武汉;“建安”、“江利”、“列”字3艘艇被派往江西;“飞鹰”、“建威”、“江元”被派往安徽;“镜清”、“南琛”、“楚谦”、“联鲸”、“登瀛洲”、“策电”、“楚观”、“张”、“湖鹏”9艘艇被派往江宁;“通济”练习舰向武汉海军运送油米,“保民”舰从烟台装运巡洋舰弹药接济安徽。以至后来谣传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制造军舰,并已驶至澳门,闽浙总督松寿电请海军分拨舰艇驻泊福州、厦门,裁洵和谭学衡答复完全无舰可派。^[134]

随着形势的发展,海军内部出现了分化。中下级青年军官开始活动,某些高级军官也逐渐转向革命。

11月2日,驻泊在吴淞的“策电”炮舰率先响应中部同盟会的号召,用桌布制成白旗,参加起义。接着,上海商团在李英石、李燮和等人领导下,进攻江南制造局。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在四面楚歌中,乘小轮船逃往法租界德商洋行,原先观望的“建安”等舰便相继反正。^[135]

停泊在南京的“镜清”、“楚观”、“楚谦”、“江元”、“联鲸”等十余舰,由“镜清”管带宋文翔担任队长。宋文翔是留美幼童出身,时年50余岁,虽然军衔才至副参领,但官场生涯使他十分谨慎,其他管带也莫不如此。“镜清”舰教练官,留日学生陈复和同盟会有联系,将苏州都督程德全的招纳文告面交宋文翔。宋接受了,翌日

又召集官兵,表示不能负义背清,当场撕毁文告,但他没有追究陈复。各舰新近从烟台、黄埔海校毕业的实习生,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决定采取行动。他们秘密将炸弹运上军舰,又与革命党人、镇江都督林述庆取得联系。11月10日,他们向各舰官兵宣布起义,并维持本军秩序,即保留军官地位。若有拒绝者,将施放炸弹,同归于尽。晚间,舰队下驶镇江,次日宣布易帜起义。^[136]

12日,山东烟台革命党人起义,攻占道署。次日成立军政府,推举停泊在港的“舞凤”舰管带王传炯为总司令。

在武汉的海军主力也开始分化。舰队停泊武昌期间,官兵亲眼目睹起义情景,又先后收到黎元洪和武汉军政府政事部长汤化龙给其弟弟、萨镇冰的参谋官汤芾铭的劝降密信,部分军官开始同情起义者。他们不愿与民军继续作战,但他们没能说服萨镇冰起义,亦没有立即反戈一击、向清朝陆军开火的思想准备,只能以深秋季节,长江进入枯水期,水位下降很快,大舰容易搁浅,军舰远离上海基地,煤弹日罄,无处修理军舰等理由,要求驶回上海。11月12日早晨,“海容”、“海筹”、“海琛”3舰从七里沟锚地起碇,向下游驶去,下午2时悬白旗通过大冶^[137]。他们的行动,估计是得萨镇冰默许的。“楚豫”、“江贞”、“江利”、“湖鹏”、“湖鹰”、“湖鹗”6舰艇则在阳逻一带悬着龙旗,继续观望。

13日中午,三“海”驶抵九江码头,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参谋龚少甫、九江要塞司令戈克安等人上舰与其交谈。当天马毓宝向武汉报告此事:

本日午刻,有“海琛”、“海筹”、“海容”三舰到浔。据各船主云,因水涸,奉萨统制谕,命驶东下。该船通竖白旗,并向浔军政分府请领国旗。惟窥其意,尚欲下驶。现在南京尚未克复,该舰仍想东下,不可不防。现已由浔将三舰扣留,暂时不准下驶。^[138]

武昌军政府接电也觉意外。他们以为萨镇冰在舰上,复电指示“优待萨镇冰,满籍人员,可遣送往沪。至军舰如何处置,即派员前来接洽”。^[139]两天后,武汉派徐明达、李作栋乘轮船到达九

江,同汤芑铭及各舰军官会商,并接济军饷煤粮,决定舰队回驶武汉,协助进攻清军。至此,这支分舰队正式跨入起义者的行列。

“海容”舰管带喜昌、帮带吉升,“海琛”舰管带荣续是昆明湖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因是满人而受青睐,擢升重任。当三“海”离汉东驶时,他们附和形势,表示同情民军。喜昌甚至对部下说:“我本来也是汉人,老姓姓何”。刚到九江时,马毓宝曾对喜昌说:“我们此次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你虽是满族,也希望你好好为革命服务。”舰上官兵对他们也很客气。14日上午,喜昌下令“海容”换锚位。军舰移动引起九江要塞注意,司令戈克安指称“海容”逃跑,下令开炮射击。戈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毕业生,曾任“海容”轮机员。因与喜昌发生冲突而离开军舰,跑到湖北,又将差船开得搁浅,当道将他下狱待审。等到武昌起义释放政治犯时,戈冒充是搞地下工作而被捕的,被释放后出任九江要塞司令。此次炮击,是“海容”真想逃跑,还是戈克安挟报私仇,很难说清。但九江方面就此对满族海军军官产生怀疑,决定将其遣散。喜昌拿到遣散费后,提出按薪俸多寡的比例来分配,使得帮带吉升所得无几。吉升在舰负债累累,债主大都是同舰军官,在其债务未清前不让他离舰。吉升计无所出,便在晚间从右舷梯盘投江自杀。^[140]

萨镇冰率“江贞”、“江利”、“楚豫”等舰在江浔间继续观望。他从当时的政治局势中看出人心的向背,对于黎元洪的劝降信也有感触。再加上各国领事因承认武汉军政府为交战团体,宣布局外中立,又要求海军炮击武昌时,不得波及租界,这都使萨镇冰进退维谷。现在三“海”离去,大局无可挽回,他又不愿参加起义的行列,便于11月12日,或以后的某一个夜晚,在武汉-九江之间换乘英国轮船,至九江英国领事馆过夜。再化装成商人,前往上海。^[141]

萨镇冰离舰后,武汉诸舰决定各自行动。“江贞”、“湖鹗”、“湖鹰”前往九江,加入三“海”队伍。“江利”、“楚豫”等舰则径驶上海,途经镇江时,经“楚观”管带吴振南挽留,参加镇江起义。

九江舰群公举“江贞”管带杜锡珪升为“海容”管带，“海琛”帮带林永漠升为管带，“海容”鱼雷大副饶涵昌升为帮带，“江贞”大副周兆瑞升任本舰管带。又举汤芑铭为临时海军司令。15日下午，九江军民向各舰分赠慰劳品。16日清晨，各舰挂满旗帜，欢庆起义。中午12时，下午4时，分别鸣放了礼炮。

18日，九江军政分府参谋长李烈钧率兵400名，分乘“海琛”、“江贞”两舰前往安庆。“海容”、“海筹”、“湖鹗”等舰则上溯武汉，协助民军攻击清军。至次日清晨，重返阳逻一带江面，并炮击江岸车站一带清军。

这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初冬的江风吹来，并不很冷。下午3点多钟，沿江的行人发现一艘悬挂革命军旗号的巡洋舰稳稳地驶过江岸车站前清军炮兵阵地，至武昌黄鹤楼畔停靠。原来清军不识此旗，以为是外国军舰。待到某外国人提醒，军舰已经驶出射程之外了。这是“海容”号。不久，“湖鹗”号鱼雷艇也溯江而上。清军炮兵便一齐猛射。“湖鹗”被击中，大量蒸汽迸出。武昌革命军的炮兵开炮援救，“海容”也重新启航，向清军阵地袭击。顿时火光闪烁、爆炸连绵，清军阵地不久便归于沉默，江岸车站后方燃起大火，“海容”胜利返航。^[142]

在后来几天里，“海容”、“海筹”等舰还配合革命军，炮击二道桥和三道桥，但效果似不很明显。进入12月后，长江水位进一步下降，“海”字巡洋舰活动受到搁浅的威胁，遂于7日以后，返航上海基地。

上海是海军的大本营。12月6日，上海都督陈其美电告武汉军政府：海军各处代表，公举“海圻”管带程璧光为总司令，“海筹”管带黄钟瑛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毛仲芳为参谋次长。总副司令未到之前，暂由参谋长代理一切。鄂方回电同意，又建议由汤芑铭担任巡洋舰队司令长。^[143]清政府重建的海军，在清廷尚未彻底垮台之前，已经全部起义，成为革命党人掌握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了。革命党人过去不曾重视在海军中展开活动，海军官兵也一向以保守持重著称，是清军中较为稳定的部分。但在波澜壮阔的

历史洪流面前,他们迅速转向,选择了民主共和,显示了时代的潮流和人心的向背。大清王朝确实走到了末日。

当武汉上空枪炮声轰鸣不息时,载洵在北京与美国贝里咸钢铁公司订立了借款造船合同,总额合银 2500 万两,期望由美国政府帮助中国发展海军。^[144]这是清廷发展海军的最后一个行动。合同由于革命未能实施,中国的舰队已经驶入 1912 年的新港湾了。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新政权是以北洋陆军为核心的军阀政府,他们对海军的重视甚至还不如清王朝。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中国海军与世界海军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个军种被长期冷落了。

注 释:

[1] 《清德宗实录》,卷三七二,页七~八,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丁未条。

[2] 《清史稿·李鸿章传》,第三十九册,第 12021 页。

[3] “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北洋海军阵亡员弁拟请照章发给赏恤养伤银两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三册,第 540~542 页。

[4] 刘坤一:“遵议廷臣会议时务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刘集》,第二册,第 895~896 页。

[5] “顾元勋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盛档之三》,下册,第 481 页;又据刘含芳电报称:“接收后,坞、局、厂、库各房屋毁损尚不甚多,惟各厂机器合计仅存十之二,非购配安设不能工作。”见《清末海军史料》,第 88 页。

[6] “御史王鹏运奏请严谕疆臣痛除因循旧习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三册,第 622~623 页。

[7] 文廷式:“请饬南北洋大臣认真整顿海军慎重用人片”(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廷式集》,上册,第 75 页。

[8] “北洋大臣王文韶奏为遵旨查复道员罗丰祿被参各款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三册,第 635~637 页。

[9] 王文韶:“统筹北洋海防冀渐扩充片”(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清末海军史料》,第 87~89 页。

[10] 池仲祐:《海军实纪·购舰篇》,《清末海军史料》,第 171 页。

[11] 刘坤一:“南洋兵轮酌减人数薪费片”(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刘集》，第三册，第987页。

[12] 《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1896年6月3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50~651页。

[13]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一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646页。

[14]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649页。按，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其回忆录中讽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不谙远东事务。他说密约中规定“如果中国领土或俄国远东滨海各省被日本进攻，两国有互相保卫的义务”一条，草约文本中遗漏了“被日本”三字，从而使这一防守同盟针对所有国家。经他向沙皇汇报后，沙皇亲自要求洛巴诺夫修改这一条款。到签约时，维特发现条约文本依然如旧。原来洛巴诺夫忘记把沙皇的意旨通知秘书了。洛巴诺夫便玩弄花招，把签字仪式改在午餐之后。而在午餐时，他让秘书重抄了条约的两份文本(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0~72页)。这一插曲似不可信。因为从李鸿章同国内往来电报中看出，洛巴诺夫在签字前半个月，已通知中方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字句。而总理衙门5月29日向李鸿章发出的上谕(李6月1日收到)，也已确认了改订的条约内容。此外，俄国外交部秘书在午餐时间居然能重抄条约中文本而不使中方觉察。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很难使人相信的。

[15] 蔡尔康、林乐知编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259~260页；《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3875~3876页。

[16]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6页。

[17] “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副提督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公文”(1895年4月14日)，《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92页。

[18]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杜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文”(1896年11月19日)，《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121页。

[19] “威廉二世在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奏威廉二世公文上的边注”(1897年2月19日)，《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131页。

[20] “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致圣彼得堡代办齐尔绪基电”，《德国外交史料》，第1卷，第149页。

[21] “登州镇总兵章高元致山东巡抚李秉衡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246页。

[22] 见“北洋大臣王文韶致总署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山东巡抚李秉衡致总署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247~248页。

[23] “德使馆参赞贝威士等至总署与李鸿章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130~131页。

[24] “总署致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248~249页。

[25][29]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058、3059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廿一、廿三日条。

[26] “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11月24日),《红档杂志有关中俄交涉史料选译》,第111~112页。又,高阳在《翁同龢传》中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和《翁同龢日记》非比,以为翁同龢在十月二十二日(11月16日)始知德舰进占胶州湾,而李鸿章早一日即先知情,并连夜拜访俄国使馆,是“私通外国”,“作了俄国的走狗”。他断言二十一日总署绝无一人知道胶州有警,“则李鸿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俄国公使馆”(见259~260页)。这些议论,皆系其未见到当时的档案材料而作出的猜测。

[27] “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250页。

[28] “北洋大臣王文韶致总署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252页。

[30][31] “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253、259页。按:后一条电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页二十二作十月二十四日。

[32] “威廉二世的宣言”(1897年11月20日),《红档杂志有关中俄交涉史料选译》,第106页。

[33] 田原天南:《胶州湾》,载《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一册,第397页。

[34] 《中德胶澳租借条约》(1898年3月6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8~740页。

[35] “使俄杨儒致总署俄外部云德事愿效力但俄貌示交好恐不足恃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页二十八。

[36] 俄舰进入旅顺口日期,据宋庆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李鸿章电报内容确定,见《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805页。

[37]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6~80页。关于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事,1898年3月21日俄国外交官璞科第致维特的密电中说:“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酌给他们银五十万两。”28日又称,“今

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两(按银行所用公砵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后来,在张荫桓流放途中,巴布罗福同意向他支付部分银两。《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7~212页。

[38]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3月27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1~742页。

[39] “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1898年3月28日),《“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16页。

[40] 《北华捷报》1897年12月24日,“胶州及其他”。

[41] “萨里贝利勋爵致欧格纳爵士函”(1898年1月23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24页。

[42][43] “萨里贝利勋爵致宴纳乐函”(1898年3月7日、25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26页。

[44] 《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1898年7月1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82~783页。

[45] “赫德致金登干”(1897年11月28日),《中国海关密档》,第六册,第770页。

[46] 《海军实纪·购舰篇》,《清末海军史料》,第172页。又,三舰航速,《购舰篇》称19.5节,而裕谦验船奏折称“海容”……试洋,每半时行二十海里零四分之一……现查“海筹”一船速率与原订合同尚符,“海琛”速率与原订合同加增;惟“海容”一船速率稍减。因船行四万里,苔锈所致”。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4260页。故推定三舰速率大于20节。

[47][49][50][51] 《海军实纪·购舰篇》,《清末海军史料》,第171~173页。

[48] 《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一,页四,光绪二十九年正月甲子条。

[52] 陈贞寿:“萨镇冰生平及其轶事”,《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第9页。

[53] 《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第184页。

[54] 《清德宗实录》,卷四四〇,页九~十,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乙卯条。

[55]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四,页七,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甲午条。

[56]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八,页五,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戊戌条。

[57] “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蓝建枢等开复原官片”,“袁世凯奏萨镇冰请破格擢用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末海军史料》,第585~586页。

[58] “袁世凯奏萨镇冰暂缓赴任片”(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奏叶祖珪请留直差遣片”(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十日),《清末海军史料》,第586~

587 页。

[59] 周馥：“南北洋海军联合派员统率折”（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恣慎公全集·奏稿》，卷三，页三。

[60]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 5342 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乙卯、丁巳条。

[61]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 3824 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壬午条。

[62] 裕禄：“选派第四届出洋肄业学生核估用款并派监督带往折”（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日），《船政奏议汇编》，卷四十九，页一一四。又据《海军大事记》称，卢学孟后调赴比利时，改派魏子京充任。

[63][6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 89~110 页。

[64][66] 鲁迅：《朝花夕拾》，第 56~57 页。

[67]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 5303~5304 页，光绪三十一年正月癸巳条。

[68] 《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 501 页。又据《清末海军史料》，第 446 页“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册”载，王孝慕作王孝藩。

[69] 《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 501~502 页。

[70]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册，第 8697 页。

[71] 许秉贤：“烟台海军学校始末”，《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 916~918 页。

[72][73]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 3823~3825 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壬午条。

[74] 裕禄：“船政延订法国洋员到闽日期折”（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船政奏议汇编》，卷四十八，页十一~十二。

[75] 裕禄：“筹造新式快舰现与洋员议定办理情形折”（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船政奏议汇编》，卷四十九，页二十一~二十四。又，两舰参数，没有采用本奏，而是参考南洋劝业会编：《福州船政成绩概略·船政厂建造鱼雷快舰木模说明书》，载《清末海军史料》，第 153~154 页。

[76] 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第 283~285 页。

[77] 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第 195~197 页。

[78] 韩玉衡：“福州船政始末记”，《福州马尾港图志》，附表二，第 70 页。

[79] “陆军部奏议停办船厂片”，《时报》1907 年 8 月 6 日，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170 页。

[80] 周馥：“上海官坞改照商务办理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周恣慎公全集·奏稿》，卷三，页十五~十六。

[81] 刘冠雄：“江南造船所纪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94页。

[82] 刘大钧：“江南制造总局从成立到‘局坞分立’的演变”，《船史研究》，第3期。

[83] “论制造局”，《中外日报》1904年5月30日~6月10日，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74页。

[84][85]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九，页六~七，卷四四二，页七~八，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甲辰、四月癸未条。

[86] 刘坤一：“复总署”（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七日），《刘集》，第三册，第1422页。

[87] 刘坤一：“寄总署”（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刘集》，第三册，第1424~1425页。

[88]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二，页三~四，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壬辰条。

[89] 刘坤一：“遵旨妥筹南洋防务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刘集》，第三册，第1194~1196页。

[90] “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10月28日北京去函Z字第637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71页。

[91] “直隶总督裕禄奏”（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2页。

[92][93] 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第245~246页。

[94] 关于大沽口保卫战的开始时间和谁首先开炮，各种说法记载不一。《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221页中说：“中国防军在上午零时四十五分钟——在最后通牒的限期前——一小时又一刻钟——开了防御性质的攻势炮火，他们受到还击。”《庚子中外战纪》说，攻势起于零时五十分。见《义和团》丛刊，第三册，第288页。裕禄则奏报说16日夜“十一时，各国停泊余家埠之兵船十余艘，一齐开炮。用电灯照定南北岸各台轰击”。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5页。

[95] “西巡回銮始末记”，《庚子国变记》，第139页。

[96] “直隶总督裕禄奏”（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5页。

[97] 佛甫爱加来等：《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丛刊，第三册，第290页。

[98] “李鸿章致盛宣怀遗书”（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下旬），《义和团运动·盛档之七》，第657页。

[99] 周馥：《周恣慎公全集·白订年谱》，下卷，页三。

[100] 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转引自雷祿庆：《李鸿章新传》。

第902~903页。

[101] “赫德致金登干”(1895年2月24日北京去函乙字第六五三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84页。

[102]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3月16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03页。

[103] [美] 唐纳德·W. 米切尔:《俄国与苏联海上力量史》,第232~234页。

[104] 《日本海军史》,第60页。

[105] “各外交照会文件”,《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六卷,第3419、3433、3441、3448、3466~3468页。

[106] “关于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中立问题的备忘录摘要”,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523~525页。

[10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456~457、525~552页。

[108] 林献忻:《1904年“海天”军舰触礁沉没记》(未刊稿)。

[109] 端方:“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军政重要请取法各国以图进步折”,《端忠愍公奏稿》,卷六,页四十八、八十八。

[110] 《清史稿》,第十二册,第3461页。

[111][112] 姚锡光:“筹海军刍议”,《清末海军史料》,第797~846页。

[113] 参见皮明勇《关注与超越》,第375~385页。

[114][115] 《清宣统政纪》,卷七,页三十四;卷十四,页二十一~二十二,宣统元年正月庚戌条、五月丙子条。

[116] 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5页。

[117] “筹办海军大臣南下日记”,《东方杂志》,第6年,第9、10期。

[118] 林献忻:“载洵萨镇冰出国考察海军”,《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87~191页。

[119]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册,第763页。

[120] 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第347页。

[121] 进口及国产军舰的吨位数,参见马幼垣:“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革新海军的尝试”,载《岭南学报》新第一期,第533页。按马幼垣此文对甲午战后清廷的购舰、造舰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惟使人不明白者,他将这十六年半算作十七年半,故各年平均数字均有出入。

[122]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卷,第9734页。

[123] “度支部奏拨海军开办及常年经费折”(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清末海军史料》，第 671 ~ 676 页。具体经费分派见下表：

各省及度支部	开办费 (万两)	常年经费 (万两)	各省及度支部	开办费 (万两)	常年经费 (万两)
直隶	120	20	四川	80	10
奉天		6	河南	64	8
吉林		3	山西	60	5
黑龙江		1	江西	56	10
江苏	120	20	广西	50	6
广东	120	20	安徽	48	8
湖北	80	10	陕西	40	2
浙江	100	15	湖南	36	4
山东	80	15	度支部	500	
福建	80	5	合计	1634	168

[124] 《清宣统政纪》，卷三十二，页三十五 ~ 三十六，宣统二年二月庚子条。

[125] “筹办海军大臣奏重订各司职掌折”（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清末海军史料》，第 518 ~ 519 页。

[126] “筹办海军处奏拟海军部暂行官制大纲”，《清末海军史料》第 520 ~ 522 页；《清宣统政纪》，卷四十四，页十，宣统二年十一月癸卯条；卷四十五，页四，宣统二年十一月戊午条。

[127] 《清宣统政纪》，卷四十四，页十，宣统二年十一月甲辰条。

[128] “载洵等奏请将现充海军要职各员分别除授折”，《清末海军史料》，第 590 ~ 592 页。

[129]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谕”，《辛亥革命》丛刊，第五册，第 291 页。

[130] 萨镇冰到汉时间，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第 997 页）、李春萱：“辛亥革命纪事本末”（《武昌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 216 页）、汤芑铭：“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 88 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均称为 17 日，不确。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朋 10 月 22 日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报中，转引驻汉总领事松村兼雄的报告，称“萨提督已本月十五日乘炮舰赶到”（载《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10 页）。1911 年 11 月 17 日《民立报》也报道萨镇冰 15 日到汉。当时的外交文件和报刊报道，当比事后的回忆更可靠。

[131] “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清末海军史料》，第 691 ~ 693 页。

[132] [日]内田顾一：“湖北革命战见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

[133] 黎元洪在致“楚同”、“楚有”、“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各船主书中说：“今日本军政府作战计划，意在扑灭满奴。故炮弹专注‘楚豫’，藉表本

军政府对诸船主之微忱。诸船主并未还击一弹，具见诸船主深明大义，共表同情。”载《民立报》，375号，1911年10月27日。

[134] “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海军大臣载洵等奏”，《辛亥革命》丛刊，第五册，第300页。

[135] 林舜藩：“回忆辛亥革命海军‘策电’炮舰起义”，王时洋：“驻沪海军反正和陆战队会攻南京经过”，《清末海军史料》，第712~715、717~719页。

[136] 杨廷纲：“驻宁海军各舰参加辛亥革命记”，陈弘毅：“北洋海军光复记”，《清末海军史料》，第715~717、734~736页。

[137] 一些军官在辛亥后若干年撰写回忆录，均称自己是起义的组织者。由于他们的回忆相互矛盾，又与许多史实出入甚大，故当慎重使用。如“海琛”舰中尉正电官张悻伯写的“辛亥海军起义记”和“海军辛亥革命纪实”，将自己说成是组织起义的核心人物，并把起义的各项细节写得栩栩如生，且“起义记”一文被收进《辛亥革命》丛刊，第七册，因此被广为引用。惟张文有许多基本事实错误。如说辛亥革命爆发，“海琛”从上海驶往武汉，“同行上驶者，有‘楚豫’、‘楚同’、‘江贞’三炮艇”。其实“楚豫”在起义前已泊武汉，瑞澂从武昌逃出即上该舰，而“楚同”则是从沙市下驶武昌的（见“日本驻沙市领事桥口贡1911年10月13日致外务大臣林董电”，《日本外交文书——关于辛亥革命》，第10页）。又如“起义记”和“纪实”记载同三“海”前往九江的军舰是互相矛盾的，与日本领事馆的目击报告也不一致。张悻伯回忆中提到“海琛”驾驶副杨庆贞曾在起义的圆形签名单上签字，则杨庆贞的回忆录“‘海容’、‘海筹’、‘海琛’三舰参与光复经过”（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99~103页）一文根本未提此事，也未提张悻伯其人。杨文称三“海”系萨镇冰离开舰队两天后驶武汉，显然也是错误的。“海容”煤饷副严寿华回忆说，他与“海容”大副饶涵昌、陈季良等军官发起，与“海筹”舰员联系，说服“容”、“琛”管带起义，又联络汤芑铭说服萨镇冰自动离舰（见《清末海军史料》，第705~711页）。汤芑铭的回忆录则说他是与“江贞”管带杜锡珪一起活动，发动“海容”、“海琛”官兵，并劝说萨起义。在他说服下，萨允许把全部舰队开往九江。事实上，萨镇冰并没有允许把舰队开往九江。如此等等。故研究这一时期海军动向，还应参证其他档案和目击者报告。

[138][139]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43页。

[140] 严寿华：“‘海容’等舰在辛亥革命中的经历”，《清末海军史料》，第704~711页。

[141] 关于萨镇冰离舰返沪，也有多种说法。1. 邹鲁说：“九月下旬，因秋深水涸，萨镇冰统率三舰及‘湖鹰’、‘湖鹗’等鱼雷艇离武汉下驶。原思驶往上海。嗣金鸡坡炮台有备，且马当三台，尤难飞越。乃萨镇冰匿于渔船，过得先道。”见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第998页。2.李春萱援引汤芑铭说，“萨乘江贞轮至黄石港，改搭渔船到九江英领事署借宿了一宵，第二天即装成商人模样，转赴上海。”见《武昌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218页。3.汤芑铭又说：“全部舰队开到九江以后……萨先生自以年老，不能担任非常举动，亦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赴沪。”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91页。4.“海琛”驾驶副杨庆贞说：“阴历九月下旬某日，萨镇冰邀各舰舰长至海容谈话。略谓：‘本人有病，必须赴沪就医，统领沈寿堃亦同去沪，此间各舰舰长以海筹舰长黄钟瑛资格最深，堪为队长。从明日起即将我之提督旗落下，由海筹升队长旗行之。’次日即由海筹升队长旗，并预备小火轮一艘恭送萨、沈离舰赴沪。”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101页。5.“江利”管带朱天森说：“海军兵兵……毅然有反正之心。萨统制在此情形下乃决然辞职，用灯语示知停泊在阳逻的江贞、楚豫、江利、湖鹏等各兵船及雷艇云：‘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好自为之’。江贞又用灯语告知正在航行的太古轮船，暂泊候令，即派该轮的舢板接萨统制上太古轮，萨即去上海。”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121页。6.英国驻华领事朱尔典向外交大臣格雷报告说：“萨镇冰提督率领的全部舰队现已明确地拥护革命事业。提督本人仍继续忠于清朝。因此他的地位颇有危险，他被允许在英王陛下的一艘军舰上避难，并在英王陛下驻九江领事馆过夜。他化装成商人离开九江，已平安抵达上海。”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74页。诸说之中，当以朱尔典的报告较为可信。又从汤芑铭的记述看，他也是知道萨的行踪安排的。

[142]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39报，11月19日下午10时，《近代史资料》，总25期，第575页。

[143] 陈春生：“辛亥革命海军反正纪实”，《清末海军史料》，第702页。

[144]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411页。

1987年1月—1988年初稿

1990年11月第一版定稿

2001年1月—2002年5月增订

主要参考书目

中文文献

(1) 史料及史料汇编

-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1977年中华书局
- 《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1987年中华书局
- 《清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编，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简称《筹办咸丰夷务》），1979年中华书局
-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简称《筹办同治夷务》），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
-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简称《清穆宗实录》），1970年台湾华文书局
- 《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简称《清德宗实录》），1970年台湾华文书局
- 《光绪朝硃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1995年中华书局
- 《光绪朝上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199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编，1958年中华书局
-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简称《中法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编，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简称《中日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编，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 《大清宣统政纪实录》（简称《清宣统政纪》），1968年台湾华文书局
-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影印
- 《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辑，1935年外交史料编撰处铅印本
-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乙、福建船厂；丙、机器局。195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影印本

《船政奏议汇编》，光绪戊子船政衙门版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简称《德国外交文件》），孙芹译，1960年商务印书馆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清代档案资料丛编》第一辑，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1978年中华书局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邵循正等编，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张振鐤主编，1995~1996年中华书局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1983年中华书局

《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中法战争镇海之役资料选辑编委会，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邵循正等编，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戚其章主编，1989~1996年中华书局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1983年中华书局

《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三）（简称《盛档之三》），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1980、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葛伯瓚等编，1951年神州国光社

《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七），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义和团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1979年中华书局

《庚子国变记》，1951年神州国光社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柴德赓等编，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末海军史料》，张侠等编，1982年海洋出版社

《北洋海军资料汇编》，谢忠岳编，1994年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北洋海军章程》(稿本、十四款本等)
-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卢毓英撰,(手稿影印件)
- 《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徐建寅撰,(手稿影印件)
- 《1904年“海天”军舰触礁沉没记》(未刊稿),林献忻撰
-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杨志本主编,1987年海洋出版社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编,1961年三联书店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简称《孙辑》),孙毓棠编,1957年科学出版社
-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聂宝璋编,18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宓汝成编,1963年中华书局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朱有献主编,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陈霞飞主编,1990~1996年

中华书局

-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汇编》,青岛市博物馆等编,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吕浦等编译,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湘军记》,王定龢著,1983年岳麓书社
- 《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撰、蔡尔康纂辑,光绪乙酉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 《普天忠愤集》,孔广德辑,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
- 《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编,光绪乙酉武昌刻本
- 《外国师船图表》,许景澄著,光绪十一年柏林石印本
- 《防海新论》,[普鲁士]希理哈著,同治十三年江南机器制造局刊
- 《海战新义》,[奥]阿达尔美阿著,光绪十一年天津机器局刊
- 《水师操练》,英国战船部著,同治十一年江南机器制造局译书馆刊

(2)文集、日记

- 《林则徐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1965年中华书局
- 《林则徐书简》,林则徐著,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 《曾文正公全集》(简称《曾集》),曾国藩著,光绪二年版
- 《曾国藩全集》,曾国藩著,1994年岳麓书社
- 《李文忠公全集》(简称《李集》),李鸿章著,吴汝伦编,光绪乙巳四月金

陵版

- 《李文忠公尺牍》,李鸿章著,1916年合肥李氏石印本
- 《李鸿章全集·电稿》,顾廷龙、叶亚廉主编,1985~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李鸿章著,载《丰润文史》第2辑,1989年丰润

县政协编印

- 《合肥李氏三氏遗集·李鸿章遗集》，李国杰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 《海军衙门函稿》（未刊稿影印件）
- 《北洋纪事》（未刊稿影印件）
- 《张佩纶与李鸿章往来信札》（未刊稿影印件）
- 《合肥李勤恪公政书》，李瀚章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 《左文襄公全集》（简称《左集》），左宗棠著，光绪庚辰仲冬排印本
- 《沈文肃公政书》，沈葆楨著，光绪辛卯排印本
- 《沈文肃公牍》，沈葆楨著，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 《清醇亲王信函选》，《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 《刘坤一全集》（简称《刘集》），刘坤一著，1959年中华书局
- 《曾忠襄公奏议》，曾国荃著，光绪二十九年仲春版
- 《抚吴公牍》，丁日昌著，宣统元年南洋书局
- 《马端敏公奏议》，马新贻著，王锡蕃校，光绪甲午闽浙总督署版
- 《刘铭传文集》，刘铭传撰，马育华、翁飞点校，1997年黄山书社
- 《彭刚直公奏稿》，彭玉麟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 《丁文诚公遗集》，丁宝楨著，光绪十九年京师版
- 《张靖达公奏议》，张树声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 《吴光禄奏稿》，吴赞诚著，光绪十二年版
- 《张文襄公全集》（简称《张集》），张之洞著，王树枏编，1990年中国书店

影印

- 《丁汝昌集》，戚俊杰、王记华编校，1997年山东大学出版社
- 《曾纪泽遗集》，喻岳衡点校，1983年岳麓书社
- 《闾学公集》，袁保龄著，宣统辛亥夏清风阁编刊
- 《吴汝纶尺牍》，徐寿凯、施培毅校点，1988年黄山书社
- 《润于集》，张佩伦著，1922~1928年丰润张氏润于草堂刻本
- 《佩弦斋文存》，朱一新著，光绪二十二年葆真堂版
- 《周恂愷公全集》，周馥著，民国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 《许文肃公遗稿》（简称《许稿》），许景澄著，1918年北京外交部铅印本
- 《许竹笈先生出使函稿》，许景澄著
- 《庸庵全集》，薛福成著，光绪辛丑上海书局石印本
- 《浙东筹防录》，薛福成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 《薛福成集》，丁凤麟、王欣之编，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适可斋纪言纪行》，马建忠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 《春在堂全书》，俞樾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 《李忠节公奏议》，李秉衡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 《李秉衡集》，戚其章辑校，1993年齐鲁书社
- 《端忠愍公奏稿》，端方著，1918年铅印本
- 《二二五五疏》，钱恂著，上海聚珍仿宋书局印本
- 《林文直公奏稿》，林绍年著，1927年印本
- 《郑观应集》，夏东元编，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謇全集》，张謇研究中心等编，199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
- 《于湖题襟录》，袁昶辑，1937年商务印书馆
-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高宗鲁编译，台北《传记文学》第36卷第6期
-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民国十五年中华书局
- 《翁同龢日记》，陈义杰点校，1989~1998年中华书局
- 《王文韶日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1989年中华书局
- 《洵于日记》，张佩伦著，民国年间丰润张氏洵于草堂石印本
- 《越縕堂国事日记》，吴语亭编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 《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著，1984年岳麓书社
- 《郭嵩焘日记》，郭嵩焘著，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 《英私杂纪》，刘锡鸿著；《随使英俄记》，张德彝著，1986年岳麓书社合刊本
-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曾纪泽著，1985年岳麓书社
- 《欧游杂录》，徐建寅著，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 《出使四国日记》，薛福成著，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罗森等著，1983年岳麓书社
- 《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罗大春著，1972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请纒日记》，唐景崧著，光绪癸巳台湾布政使署刊本
- 《楼船日记》，余思诒著，光绪丙午山东官印书局
- 《西行日记》，池仲祐著，光绪三十四年商务印书馆

(3) 笔记、回忆录、方志

- 《清朝野史大观》，1981年上海书店影印
- 《清宫史事》，王树卿、李鹏年著，1986年紫禁城出版社
-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2年文史资料出版社

《西学东渐记》，容闳著，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庸庵笔记》，薛福成著，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梵天庐丛录》，柴小梵著，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蔡尔康、林乐知编译，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客座偶谈》，何刚德著，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
《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澹著，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荃楚斋随笔 续笔 二笔 四笔 五笔》，刘声木著，1998年中华书局
《异辞录》，刘体智著，1988年中华书局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鄢琨标点，1985年岳麓书社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63年中华书局
《武昌首义回忆录》，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朝华夕拾》，鲁迅著，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知堂回想录》，周作人，1980年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
《对华回忆录》，[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1958年商务印书馆
《维特伯爵回忆录》，[俄]维特著，傅正译，1976年商务印书馆
《近代京华史迹》，林克光等主编，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张爵著；《京师坊巷志稿》，朱一新著，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合刊

《津门杂记》，张焘著，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咫偶闻》，震钧著，光绪乙未甘棠转舍刊
《福州马尾港图志》，林萱治主编，1984年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上海县竹枝词》，秦荣光著，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县志》，应宝时修，俞樾纂，同治十年刊
《崇明县志》，民国版
《琉球地理志略》，傅角今、郑励俭著，1948年商务印书馆

(4) 年谱、传记

《曾国藩年谱》，黎庶昌编，1986年岳麓书社
《李鸿章年(日)谱》，窦宪一编，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
《李鸿章年谱》，雷祿庆编，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左宗棠年谱》，罗正钧编，1982年岳麓书社
《李鸿藻先生年谱》，李宗桐、刘凤翰编，196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江村编，198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益堂年谱》，方伯谦撰，载《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1993年知识出版社

《近代名人小传》，费行简编，台湾明文书局

《近代中国科学家》，沈渭滨主编，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淮军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马昌华主编，1995年黄山书社

《淮军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马昌华主编，1995年黄山书社

《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稿》，孙克复、关捷主编，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李鸿章评传》，[美]刘广京、朱昌峻编，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沈葆楨评传》，[美]庞百腾撰，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丁日昌评传》，邓亦兵著，198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沈葆楨与福建船政》，林崇墉著，1987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翁同龢传》，谢俊美著，1994年中华书局

《翁同龢传》，高阳著，1995年华艺出版社

《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甲午海将方伯谦》，王宜林著，1997年海潮出版社

《张謇传记》，刘厚生编，1985年上海书店

《赫德与中国海关》，[美]魏尔特著，陈致才译，199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

《赫德传》，卢汉超著，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汪敬虞著，1987年人民出版社

《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土宏斌著，200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詹天佑生平志》，詹同济著，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铁路巨擘詹天佑》，经盛鸿著，2000年兰州大学出版社

《程璧光殉国记》，程慎修堂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威震东洋的西乡隆盛》，田野著，200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

(5) 研究著作

《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吕一燃主编，1995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被调整的目光》，姜鸣著，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沙俄侵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1年人民出版社
-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197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王如绘著，1999年人民出版社
- 《干戈春秋——中国古代兵器史话》，李少一、刘旭编，1985年中国展望出版社
- 《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院编，1985年军事科学出版社
- 《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改革论》，皮明勇著，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梁巨祥主编，1987年军事科学出版社
- 《中国海军史》，包遵朋编，1974年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 《中国古代航海史》，孙光圻著，1989年海洋出版社
- 《中国近代海军史》，吴杰章、苏小东、程志发主编，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
- 《中国近代海军史论文集》，王家俭著，1984年台湾文哲出版社
-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姜鸣著，199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近代中国海军》，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1994年海潮出版社
- 《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张炜编，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晚清海军兴衰史》，戚其章著，1998年人民出版社
-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中国近代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王家俭著，2000年台湾国立编译馆
- 《中国近代造船史》，王志毅著，1986年海洋出版社
- 《鸦片战争史论文集》，列岛编，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清季总理衙门研究》，吴福环，1995年天津出版社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张国辉，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幼童留学美国史——现代化的探索》，高宗鲁编译，1982年台湾华欣文化事业中心
- 《中法战争诸役考》，黄振南著，199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8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越南与中法战争》，龙章著，199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 《中法战争史》，廖宗麟著，200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 《中法战争镇海之役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镇海口海防历史遗迹领导小组编，1996年人民出版社

- 《大清福建海军的创建与覆灭》，杨东梁著，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福州船政局史稿》，林庆元编，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 《北洋海军研究》，戚俊杰、刘玉明主编，199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 《北洋舰队》，戚其章著，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 《朝鲜1884年的政变》，杨昭全，1986年商务印书馆
- 《甲午战争史》，戚其章著，1990年人民出版社
- 《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戚其章著，1994年人民出版社
-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戚其章、王如绘主编，1995年人民出版社
-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著，199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山东省历史学会编，1986年齐鲁书社
- 《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戚其章著，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 《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戚其章著，2001年人民出版社
- 《中日甲午战争与李鸿章》，郑天杰、赵梅卿著，1979年台湾华欣文化中心
- 《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杨念群，1995年知识出版社
- 《甲午中日陆战史》，孙克复、关捷，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甲午中日海战史》，孙克复、关捷著，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林濂藩编，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林伟功、黄国盛主编，1993年知识出版社
- 《台湾历史影像》，杨孟哲编著，1996年台湾艺术家出版社
- 《鄂州血史》，蔡寄鸥著，1959年龙门书局
- 《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著，1960年中华书局
-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美]马士著，张汇文译，1960年商务印书馆
- 《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英]季南著，许步曾译，1984年商务印书馆
-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德]施丢克尔著，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世界海军史》，丁一平等编著，2000年海潮出版社
- 《世界海战简史》，[德]H.帕姆塞尔著，屠苏译，1986年海洋出版社
-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美]马汉著，安常容译，1998年解放军出版社
- 《海权论》，[美]马汉著，萧伟中译，1997年中国言实出版社
-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美]杜普伊著，李志兴译，1985年军事科学出版社

《战争艺术》,[瑞士]安·亨·约米尼著,钮先钟译,1981年解放军出版社
《潜艇发展史》,[加]爱德华·霍顿著,粟俊译,1979年国防工业出版社
《俄国与苏联海上力量史》,[美]唐纳德·W·米切尔著,朱协译,1983年商务印书馆

《美国海军史》,[美]内森·米勒著,卢如春译,1985年海洋出版社
《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美]史蒂芬·豪沃斯著,王启明译,199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美国军事战略和政策史》,[美]韦格利著,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
《日本军国主义》,[日]井上清著,尚永清译,1985年商务印书馆
《日本海军史》,[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译,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
《甲午中日战争纪要》,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1935年印本
《日清战争》,[日]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清战史讲授录》,[日]誉田甚八著,1936年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译印

(6) 工具书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郭廷以主编,1987年中华书局
《中国军事史大事记》,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百科编审室编,1988年打印本

《近代上海大事记》,汤志钧主编,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近代教育史大事记》,陈学恂主编,198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1978年中华书局

《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1980年中华书局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等编,1985年中华书局

《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郑鹤声编,1980年中华书局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兵书总目》,刘申宁编,199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

(7) 论文

《黄鹄号,中国自造第一艘轮船》,李惠贤,《船史研究》第2期,1986年

《阿思本舰队与英国的侵华政策》,吴乾兑,《历史教学》1984年第8期

《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张利民,《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

- 《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考》，邹兆琦，《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
- 《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叶志如、唐益年，《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 《北洋海军经费初探》，姜鸣，《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
- 《北洋海军训练述论》，姜鸣，《东岳论丛》1986年第6期
- 《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姜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 《江南制造总局从成立到“局坞分立”的演变》，刘大钧，《船史研究》第3期，1987年
- 《北洋海军的教科书〈电气水雷问答〉》，杨根有，《文物天地》1990年第2期
- 《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杨志本、许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 《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述论》，杨志本、许华，《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
- 《关于黄海海战中国舰队接敌队形问题》，姜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 《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郭毅生、汤池安，《文史哲》1957年第6期
- 《黄海大战中北洋舰队的队形是否正确？》，郭济，《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 《谈谈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吴如嵩，《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
- 《丰岛海战》，季平子，《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 《略谈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议定队形》，吴如嵩，《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 《甲午黄海海战队形考》，戚其章，《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 《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阵形考》，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 《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沉没真相》，廖宗麟，《光明日报》1984年5月16日
-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孔祥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 《甲午英烈，家国情长——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及其甲午遗书所见》，王记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
- 《北洋海军覆灭原因再探讨》，杨志本、许华，《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吕实强，《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9

期,1995年

《方伯谦是民族英雄吗?》姜鸣、刘申宁,《文汇报读书周报》1997年11月22日

《冤乎?不冤乎?方伯谦研究又起波澜》,危兆盖,《中华读书报》1997年12月3日

《方伯谦是民族英雄?》翟明磊,《南方周末》1997年12月5日

《方伯谦如何成了民族英雄?》陈开仁,《新安晚报》1998年1月17日

《一篇书评引来的一场官司》,周伯军,《文汇报读书周报》1998年12月12日

《关于近年来方伯谦评价的一些情况》,姜鸣,《近代史学会通讯》第8期

《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革新海军的尝试》,马幼垣,《岭南学报》新第1期,1999年

外文文献

(1) 西文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Fiting Out, Dispatching to China, and Ultimate Withdrawal of the Anglo-Chinese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Sherard Osbor; and the Dismissal of Mr. Lay From the Chief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 27*. Irish University Press. Shannon Ireland. 1971.

China-Japan War. Vladimir, London, 1896

The Naval Annual, 1890. Edited by T. A. Brassey, London, 1890

The Naval Annual, 1895. Edited by T. A. Brassey, London, 1895

Pulling String In China. W. F. Tyler, London, 1929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 ~ 1895. John L. Rowli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 1967

Modern History of Warships. W. Hovgaard, E. & F. N. Spon, Ltd. London 1920

The Encyclopedia of Sea Warfare, From The Ironclads To The Present Day Spring Books, London. 1975

R. M. Anderson: The Rendel Gunboat, *Warship International*, No. 1, 1976

(2) (日文)

《日清戦争實記》,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日本博文館

《廿七八年海戰史》,日本海軍軍令部編纂,明治三十八年東京水交社

《廿七八年海戰史·黄海役》,日本海軍軍令部編纂,(秘本)

《近世帝國海軍史要》海軍有終社編,1970年東京原書房

- 《山本權兵衛と海軍》,日本海軍大臣官房編,1966年日本東京原書房
《威海衛戰紀》,平田勝馬編纂,明治三十年六月東京陽春堂
《山縣有朋意見書》,大山梓編,1973年東京原書房
《日清戰爭寫真帖・伯爵龜井茲明の日記》,1992年東京都柏書房
《あつ日本海軍》,寒松讓著,1977年光人社
《海軍》第二卷《帝國海軍と日清戰爭》,《海軍》編集委員會編纂,1981年
日本東京誠文圖書株式會社
《幕末明治の群像》第六卷,《帝國陸軍の誕生》,1977年東京世界文化社
《日本陸海軍八十年——維新の建軍より敗戦の壊滅まで》,圖書刊行會
編纂,1978年東京都圖書刊行會
《韓國の歴史》,南昌祐編,1999年ハソリム出版社

报刊杂志

- 《格致汇编》
《申报》
《益闻录》
《民立报》
《东方杂志》
《近代史资料》
《传记文学》
《辛亥革命史丛刊》
《海事》
WARSHIP INTERNATIONAL
SEA POWER
《世界の艦船》

人名索引

A

- 阿璧成(又译亚伯烈希脱 J. Albrecht) 299
阿达尔美阿 364, 432
阿古柏 75, 85, 87
阿简妥明 85
阿兰 59
阿麟 253
阿姆斯特朗(Sir W. Armstrong) 19
阿思本(S. Osborn) 23-28, 65, 66
阿务德 59, 138
爱德门 237
爱斯德 300
安德海 99, 222
安德森(R. M. Anderson) 156
安的森 283
安维峻 317, 361, 395, 396, 401, 442
埃尔莎 383
埃里克森 19
艾布艾拉 85
艾伦 432

B

- 巴德诺(J. Patenôtre) 174, 175, 191, 192, 208, 211
巴布罗福(A. I. Pavlov, 又译巴福祿) 345, 348, 458, 460
巴尔伯 298
巴麦尊(H. J. T. Palmerston) 15
巴健特(R. S. Paget) 344
巴兰德(M. A. S. von Brandt) 266, 267, 303
巴伦 460
巴纳贝(Barnaby) 128
巴斯 474
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 39
白劳易(L. Bertin) 328
白藻泰(G. G. S. de Bezaure) 181, 182
柏奥铿 473
拜列员 298
坂元八郎太 371
包义德(Boyd) 29
包遵彭 69, 161, 258, 259, 431
宝璽 29, 75, 80, 81, 103,

104,170
 宝森 104
 宝士德 430
 宝廷 104,116,172,218
 宝文 253
 葆亨 133
 鲍察 148,298
 鲍德 298
 贝克 425
 贝锦泉 42
 贝孙 (C. Beasant) 298
 贝威士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
 457,504
 俾斯麦 (O. von Bismarck) 199,
 204,267,491
 比德曼 117
 毕德格 (W. N. Pethick) 400
 毕尔第 471
 毕格里 298
 毕乐 (A. Billet) 200
 必第 298
 边宝泉 200,467,471
 边粹玉 200
 卞宝第 249,251,259,261
 卞长胜 145,146,161
 贝锦泉 42
 贝孙 298
 波波夫 (Admiral A. Popov) 265
 波福尔 (Pierre Poivre) 164
 波滑 (Bouet) 166
 波林奴 (Boulineau) 191,211
 波特 (D. D. Porter) 141
 伯恩 52

伯乐 472
 伯彦讷谟达 75
 博白傅 (S. I. Popoff) 205
 博赖 58
 博来 430
 布里奇福德 (M. Bridgeford) 125
 布什内尔 (D. Bushnell) 52
 卜耽 471,472
 卜力 (Sir. H. Black) 341
 卜里士刻 298
 卜鲁斯 (Sir. F. W. A. Bruce) 27

C

柴小梵 154
 柴卓群 63
 蔡尔康 321,323,445,446,503
 蔡根业 177
 蔡国喜 25
 蔡国祥 25,26,32,139
 蔡寄鸿 510
 蔡廷千 278,412,444,494
 蔡贤植 335
 常朝干 491
 常明 253
 常瑛 236
 长麟 395
 长叙 275
 曹嘉祥 436
 曹廉箴 242
 曹汝英 494
 曹志忠 189,190
 朝比奈 213
 岑春煊 473,486

- 岑毓英 165,207
- 陈宝琛 54,104,107,108,148,
162,168,169,172,175,179,216,
240,241
- 陈宝箴 154,442
- 陈伯函 242
- 陈伯璋 145
- 陈长龄 242
- 陈才瑞 145,249
- 陈策 277
- 陈春生 511
- 陈得胜 198
- 陈杜衡 242
- 陈恩焘 242,445,446
- 陈芳年 210
- 陈复 498,499
- 陈庚 242,259
- 陈公远 261
- 陈和庆 129,267
- 陈鹤潭 242
- 陈弘毅 510
- 陈季良 510
- 陈季同 129,142,143,145
- 陈金揆 277,380
- 陈锦荣 63,119
- 陈敬岳 496
- 陈京莹 346,373,426
- 陈开仁 439
- 陈可会 143
- 陈兰彬 100,189
- 陈林璋 143,144
- 陈麟清 129
- 陈楠 277
- 陈其美 501
- 陈其元 67
- 陈庆平 242
- 陈荣 373
- 陈澍 313,325
- 陈彤肖 259
- 陈石英 471
- 陈寿彭 242,259
- 陈万清 408
- 陈旭 466,476
- 陈学书 278
- 陈学海 321,436,444
- 陈永隆 190
- 陈毓淞 63
- 陈禹谟 210
- 陈英 138,183
- 陈在正 149
- 陈兆翱 129,142-144,245,247,
263
- 陈兆艺 145
- 陈贞寿 382
- 陈真 506,507
- 陈镇培 418,419
- 陈作新 497
- 程燮光 238,398,416-418,445,
446,466,487,490,494,495,
498,501
- 程奎光 495
- 程德全 498
- 程学启 100
- 程耀垣 494
- 程允和 389,440,441,496,498
- 成吉思汗 19

- 池贞铨 143, 144
池仲祐 66, 210, 256, 258, 303,
322, 326, 424, 429, 435, 446, 502
崇善 473
崇厚 42, 50, 103, 104, 109, 111,
117, 491
崇礼 457
崇纶 253
崇绮 219
慈安太后 22, 109, 170
慈禧太后, 西太后(叶赫那拉氏)
22, 52, 54, 75, 80, 99, 103, 104,
109, 116, 170-173, 189, 205, 206,
217, 219, 221, 222, 228-235, 237,
246, 258, 260, 266, 268, 275, 276,
287, 294, 307, 308, 332, 333, 341,
356, 387, 391, 394, 395, 401, 421,
422, 431, 441, 463, 464, 480,
481, 489
川上操六 336, 337
船越卫 72
崔济愚 337
崔时亨 337
春龄 253
村越千代吉 370
醇亲王奕譞 75, 83, 87, 151,
170, 171, 179, 206, 217-225, 229-
231, 233, 235, 252-256, 258, 261,
266-269, 281, 300, 315, 318, 334,
419, 424, 425, 490, 491
垂赛(Admiral Tracey) 384
- D**
- 达特兰(Evêque d'Adran) 164
达韦德 471
大久保利通 72, 75, 110
大鸟圭介 337, 338, 344, 347,
348
大山岩 388, 406, 412
大隈重信 73
大院君李显应 112-114, 201,
334, 342
道光帝旻宁 14, 16, 22, 221
戴伯康 138, 277
戴鸿慈 486
戴金镛 399, 403
戴宗骞 288, 289, 395-397, 399,
400, 403-409, 418, 442, 443
德布雷 52
德瑾琳(G. von Detring) 119,
168, 287, 352, 383, 432, 455
德尔庚 382
德峰 236
戴乐尔(F. E. Taylor) 485
德伦 298
德克碑(D'Aiguebelle) 38-40,
44, 67
德尚 139
德勒塞(Captain. R. N. Tracey) 59,
63, 138
德素 58
德威尼(M. Thevenet) 135, 287
德馨 233
邓安邦 315
邓承修 104, 105, 116, 205
邓汉仪 413
邓禄普(Captain Dunlop) 384

邓罗 (H. B. Taylor) 139, 140
 邓世昌 57, 63, 114, 122, 123,
 194, 267, 274, 276, 297, 307, 312,
 373, 378, 380, 436, 437
 邓士聪 140
 邓秀枝 25
 蒂埃里 19
 楛立斯 (Admiral von Diederichs)
 457
 丁宝楨 80, 99, 104, 150, 153,
 222, 281, 319
 丁格 298
 丁龄 298
 丁平澜 468
 丁日昌 30, 33, 46, 71, 77, 78, 80-
 84, 89-93, 96, 97, 118, 119, 125-
 127, 132, 133, 139, 142, 149-151,
 153, 156, 158, 251, 299
 丁汝昌 97, 100-102, 107, 112-115,
 122, 123, 153, 167, 193, 202, 205, 221,
 225, 240, 241, 247, 267, 268, 275, 276,
 281, 283, 287, 288, 294, 296, 297, 300-
 302, 304, 305, 307, 309, 310, 312, 322,
 323, 325, 330-333, 335, 344-348, 355-
 362, 366-369, 371, 374, 375, 377-380,
 384-386, 390-393, 395-398, 400-402,
 404, 405, 407-419, 425-427, 429, 431-
 435, 440-443, 445-447, 465
 丁幼章 241
 定安 220, 294, 332, 333
 东乡平八郎 353, 354, 429
 董恂 87, 103, 117
 董元度 148

塞纳乐 (Sir C. M. MacDonald)
 462, 505
 塞宪一 323, 517
 塞振彪 15
 都兴阿 77
 杜波克 196
 杜冠英 196
 杜拉普 (Dewsnap) 29
 杜普伊 (T. N. Tupuy) 432
 杜锡珪 501, 510
 杜业尔 (C. Doyere) 471-473
 端方 486, 508
 惇亲王奕谅 75, 111

E

额德茂 298
 额尔金 (J. B. Elgin) 23
 额勒和布 170, 361
 恩格斯 (F. Engels) 130, 151,
 158, 228, 255
 恩诺尔 265
 恩佑 222, 234, 235, 253

F

法乐 298
 樊增祥 470
 范惠意 191
 方伯谦 57, 62, 143, 144, 148,
 274, 277, 309, 325, 347, 349, 351,
 358-360, 373, 374, 378-380, 428,
 429, 435, 438, 439, 451
 方儒祥 438, 439
 方汝翼 255

- 方勋 177
 方耀 315
 方佑生 494
 方正祥 202
 斐士博(G. S. Fishbourne) 139,247
 斐利曼特尔(E. Freemantle) 403,410,432,434
 费果芬(J. H. Ferguson) 484
 费纳宁(T. Finenon) 298
 费行简 325
 冯焱光 34
 冯琦 241
 冯子材 198,200,314
 丰大业(M. H. V. Fontanier) 423
 丰培 253
 丰伸 253
 封燮臣 470
 佛甫爱加来 507
 富尔顿 18
 富思德 298
 伏拉底米尔(Vladimir) 433
 伏司 265
 福锷 257
 福兰西斯(Franzius) 456
 福来舍 298,382
 福祿诺(F. E. Fournier) 168, 172,174
 福泽谕吉 202
 傅角今 517
 傅兰雅(J. Fryer) 239,321,363
 傅云龙 220,253
 釜谷忠道 350
 副岛种臣 73,420,421
- G
- 甘联璈 494
 刚毅 458,477
 高拜石 507
 高炳康 210
 高承锡 321,433
 高而谦 242
 高岛万太郎 370
 高惠悌(Galsworthy) 353-355, 429
 高勉之 320
 高木英次郎 412,436
 高桥义笃 370
 高善继 353,354
 高衫晋作 328
 高腾云 184
 高万枝 395
 高文(Cowen) 210
 高燮曾 361
 高阳 103,108,171,207,215, 216,504
 高宜勇 14
 高宗鲁 162,444
 戈登(C. G. Gordon) 24,27,319
 戈尔敦 196,212
 戈克安 499,500
 戈威因(Gauvain) 303
 哥嘉(Cocker) 280,298,303
 葛保炎 494
 葛兰德 283
 葛雷德 298

葛雷森 (Clayson) 122, 128, 280,
297, 300, 303, 322
格兰特 (U. S. Grant) 110, 303
格兰威尔 (Granville) 166, 211
賡音泰 263
恭亲王奕訢 22, 24, 30, 45, 49,
50, 54, 66, 75, 76, 78-81, 87, 88,
103, 104, 110, 111, 126, 131, 132,
137, 150, 151, 156, 158, 159, 170,
171, 216, 220, 221, 229, 387, 394,
419, 458, 463
龚少甫 499
龚照珩 287-289, 374, 378,
379, 385, 393, 396, 440
龚照璠 348, 381, 382, 440, 441
孤拔 (A. A. P. Courbet) 166,
167, 174-187, 189-193, 195-198,
200, 208-211
占柏尔 (S. H. Cooper) 298
古德 (Admiral Coote) 299
谷玉霖 323, 436
顾元勋 450, 502
关捷 433, 435, 436, 440
关天培 16
关文炳 399
官文 25
光绪帝载湫 75, 81, 104, 227,
229, 276, 356, 358, 361, 362, 385,
387, 390, 391, 395, 397, 400, 401,
421, 431, 463, 465, 489
广重源植 370
归有光 363, 431
归与 431

贵宝 81
桂嵩庆 238, 239
桂祥 236
桂祥 (承恩公) 275
郭宝昌 313
郭得山 25
郭瑞珪 143
郭士立 (C. Gutzlaff) 14
郭嵩焘 29, 46, 118, 125, 142-145,
147, 161, 299
郭廷以 504, 509
郭毅生 433, 434
H
哈必登 298
哈卜们 (又译赫克曼, Heckman)
299
哈克斯他耳 265
哈孙 173
哈逊克 298
海尔布德朗 479
海靖 (Baron von Heyking)
456-459
海麦尔 (J. Hamer) 298
韩殿甲 33
韩国钧 155
韩理 (R. Henle) 456
韩玉衡 506
韩肇庆 16
汉密尔顿 (B. Hamilton) 118
汉密尔顿 (G. C. Hamilton) 302
汉纳根 (C. von Haneken) 280,
285, 290, 299, 321, 352-354, 361,

- 366, 367, 377, 380, 383, 392, 396,
429, 436, 451
- 豪沃思 (S. Howarth) 161, 508
- 浩威 (Howil, 又译好威) 400,
401, 446
- 何尔门 (Vize-Admiral Hollmann)
455, 503
- 何刚德 67, 517
- 何广成 494
- 何璟 29, 92, 96, 97, 110, 120,
133, 150, 153, 177-179, 181, 182,
185, 189, 200, 209
- 何伦洛熙 (Prince von Hohenhe)
455, 503
- 何品璋 277, 419, 466
- 何如璋 47, 68, 100, 110, 112,
177, 178, 182, 185, 189, 200, 209,
210, 214, 215, 252, 321
- 何天爵 (C. Holcombe) 175, 262,
296, 322, 325
- 何心川 47, 57, 62, 119, 143, 144
- 阖顺 138
- 赫德 (Sir P. Hart) 21, 22, 24,
25, 27, 28, 38, 65, 109, 117-128,
130, 155, 156, 264, 297, 300, 301,
303-306, 322-325, 339, 376, 380,
382-384, 420, 425, 432, 437, 440,
447, 449, 462, 477, 482, 505,
507, 508
- 赫胥黎 (T. H. Huxley) 463
- 贺寿慈 103
- 黑木为楨 406
- 亨利亲王 (Prince Henry) 459
- 洪良品 105
- 洪仁玕 41
- 洪天贵福 41
- 洪秀全 30
- 洪英植 202
- 洪钟宇 336
- 胡恩浩 470
- 胡兰德 (Sir E. Holland) 356
- 胡林翼 18
- 胡思敬 441
- 胡宗宪 363
- 花房义质 113
- 华蘅芳 31, 32, 34, 55, 127, 363
- 华尔身 (Sir J. Walsham) 302
- 桦山资纪 329, 332, 343, 344,
365, 366, 368, 371, 398
- 荒川己次 340, 348, 425
- 黄承勋 350, 428
- 黄戴 129, 267
- 黄德椿 468
- 黄季良 183
- 黄建勋 57, 63, 143, 277, 370,
380, 435
- 黄爵滋 64
- 黄鸣球 242, 247, 418, 419
- 黄潜 207
- 黄瑞兰 280, 285, 286, 309, 320
- 黄襄治 501
- 黄绍本 59
- 黄少春 476
- 黄仕林 389, 440, 441
- 黄体芳 104, 136, 218, 219, 253
- 黄庭 145

黄维焯 67,70
黄翼升 332
黄幼臣 212
黄振南 211,212
黄钟瑛 494,501,511
黄祖莲 418
黄遵宪 451
怀特黑德(R. Whitehead) 248
怀特(J. H. White) 266,328
惠二哑巴 457
惠年 235,236
惠斯沃思(Withworth) 19
霍顿 260
霍夫加德(W. Hovgaard) 156
霍金斯(E. Hawkins) 29
霍克尔(H. W. Walker) 148,298

J

吉必勋 298
吉岛德三 336
吉礼丰(Griffon) 287
吉升 500
吉田松阴 327
季南(E. V. G. Kiernan) 317,324
季平子 430
纪奢(C. Cheshire,又译余锡尔)
298
嘉格蒙 298
嘉乐尔(J. Carroll) 58-60,62,
139
嘉乐恒(W. J. Calhoun) 492
贾凝禧 242
迦莱特(G. Garrett) 52

剑华道人 420,447
江长贵 152
江村 151
江懋祉 138,143
江仁辉 277
江自康(寿庵) 347,356
姜桂题 389,440,441
姜鸣 65,255,321,322,432,
519,522,523
蒋超英 57,59,62,142,162,
194,200,211,212
蒋群 498
蒋益澧 96
焦达峰 497
杰达翁 58
金伯利(J. W. Kimberly) 338,
357,430
金登干(J. D. Campbell) 65,
109,117-119,121-123,125,126,
155,156,200,262,297,299-301,
303,304,306,322-324,339,380-
384,425,437,440,447,477,505,
507,508
金楷理(C. T. Kreyer) 317,455
金荣 194,196,200,211,212
金如铿 253
金玉均 202,336
金允植 113,114,202
瑾妃(嫔) 275,395
景廉 169,170
景寿 75
井上清 424,425
井上馨 202,203

敬信 457

K

卡诺 211
凯古柏(Sir Cooper Key) 303
康斯坦丁亲王(Konstantin) 111
康熙帝玄烨 15, 22, 228
康有为 275, 276, 463
柯鸿年 242
柯克(Captain Cocker) 280
柯建章 350, 428
柯斯 497
科士达(J. W. Foster) 423, 448
克尔克 414
克林德(Baron von K. A. Kettler)
490
克洛斯(W. L. Clowes) 432
克诺尔 455
克锡(W. Keswick) 381, 382
喀西尼(A. P. Cassini) 339,
345, 387
肯宁威(A. Conningham) 377,
413, 437, 444
孔祥吉 424, 444
库罗巴特金(A. N. Kuropatkin)
482, 508
邝咏钟 140, 183
奎斌 233
奎昌 235, 236
奎焕 253
昆冈 189
埜岫 253

L

拉杜林(Prince von Radolin)
455, 503
拉北列尔(de Lapeyrière) 183
来觉福(N. Laptew) 345
莱赛尔 18
莱特兄弟(Wright, Orville and Wil-
bour) 495
赖乏 298
赖格罗(Le Orge) 139
赖世(W. Rash) 298
濂之口觉四郎 370
蓝建枢 138, 278, 418, 419, 466,
505
琅威理(W. M. Lang) 118, 194,
247, 267, 281, 296-306, 309, 320,
322, 323, 325, 330, 357, 383, 384,
397, 432, 433, 450
劳崇光 22
劳伦斯·庆(Laurence Ching)
118
莱赛尔 18
乐平 58
勒方琦 97
勒皮斯 248
勒·普里曼达吉(Laprimandage)
118
勒威 298
雷登(T. Layton) 298
雷礼 298
雷禄庆 507
黎庶昌 98, 113

- 黎星桥 277
- 黎元洪 240, 496, 497, 499, 500, 509
- 黎兆棠 46, 47, 68, 144, 148, 162, 251, 280, 319, 432
- 礼亲王世铎 83, 151, 170, 458
- 李白 223
- 李秉衡 319, 396, 399, 402-404, 413, 414, 418, 442, 443, 445, 447, 457, 458, 503, 504
- 李长乐 283
- 李朝斌 92, 93, 96, 97, 152
- 李成谋 88, 92, 94, 96-98, 152, 153, 194, 312, 313
- 李承曾 470
- 李春萱 509, 511
- 李大受 242
- 李鼎新 145, 277, 321, 419, 466, 494
- 李定民 191
- 李芳荣 145
- 李福 298
- 李凤苞 55, 100, 125-130, 142-148, 158, 162, 189, 194, 245, 262-264, 280, 298, 314, 317, 318, 364, 491
- 李国杰 254
- 李国堂 470
- 李瀚章 55, 66, 69, 77, 79, 106, 149, 150, 244, 315, 316, 326
- 李鹤年 77, 79, 141, 150, 152
- 李和 278, 397, 398, 419, 466, 494
- 李鸿章 13, 26-30, 33, 36, 37, 41, 44, 46, 47, 50-53, 55, 65-70, 74, 76, 77, 79-127, 129-134, 136-138, 142, 144-162, 167-169, 171-174, 177-179, 189, 191-194, 200, 203-209, 211-213, 215-221, 223-225, 227, 230, 231, 233, 234, 236, 240, 243, 245, 247-249, 252-262, 264-268, 276, 278-289, 291, 293, 294, 296-305, 307-311, 313-327, 330-337, 339-342, 344-349, 351, 352, 355-364, 366, 374, 377-387, 389-397, 400-408, 413-415, 418-428, 430-432, 435-444, 446-453, 455-461, 463, 464, 466, 477, 480-482, 484, 491, 495, 502-505, 507
- 李鸿藻 75, 81, 83, 103, 105-108, 167-172, 207, 216, 219, 347, 357, 361, 387, 394, 430, 431, 449
- 李惠贤 66
- 李继刚 241, 418
- 李家孜(F. T. Richard) 139, 237
- 李嘉尔 471
- 李经方 336, 422, 423, 448
- 李经琦(鞠耦) 200, 423
- 李莲英 222, 254, 395, 401
- 李烈钧 501
- 李勋协 145
- 李鹏年 441
- 李荣光 399
- 李善兰 31
- 李少一 260
- 李盛铎 486
- 李时珍 200

- 李士彬 160
 李世甲 210
 李仕茂 352, 358, 428, 429
 李斯 403
 李寿田 47, 143, 144, 245, 247
 李泰国(H. N. Lay) 21-28, 65
 李彤恩 190
 李威利(又译李维业, H. L. Reviere)
 166
 李文安 28, 106
 李熙 112, 204, 335, 342, 349
 李希霍芬(F. P. W. Richthofen)
 454
 李燮臣 212
 李燮和 498
 李錫亭 323
 李英石 498
 李秀成 22
 李逸稷 336
 李逸植 336
 李扬才 166
 李楹 99
 李占椿 466
 李宗侗 207
 李宗羲 29, 66, 77, 80, 150
 李钟英 317
 李最应 113
 李作栋 499
 李准 467, 496
 理格 139
 利辉 315
 利士比(S. N. J. Lespes) 168,
 175, 176, 184, 186, 190, 192, 195
 里斯贝特勒 208
 立克路司 298
 联魁 253
 梁炳年 143, 144
 梁诚 162
 梁鼎芬 172
 梁同悻 69
 梁启超 101, 232, 256
 梁祖全 277
 廖宗麟 207
 列索夫斯基 111
 林葆纶 487, 494
 林葆悻 494
 林承谟 63, 246
 林椿(P. Ristelhuber) 191, 287
 林达 97
 林登亮 277
 林董 337, 510
 林福贞 468
 林藩 242
 林冠慈 496
 林国康 470
 林国祥 57, 63, 352, 380, 398,
 418, 419, 439, 465
 林贺崧 59
 林乐知 321, 323, 503
 林濂藩 428, 429
 林履中 138, 145, 277, 370,
 380, 435, 436
 林明德 207
 林鸣坝 267
 林普晴 41
 林庆升 143, 144

- 林庆元 67, 68, 210, 259, 261, 506
- 林日章 143
- 林赛(H. Lindsay) 14, 15
- 林绍年 234
- 林森 498
- 林森林 138, 184
- 林绳武 210
- 林颂庄 494
- 林寿阳 74, 149
- 林述庆 499
- 林舜藩 510
- 林泰曾 57, 62, 63, 114, 122, 123, 142-144, 162, 194, 268, 275, 302, 305, 323, 332, 344, 345, 356, 357, 360, 378, 380, 385, 393, 397, 418, 430
- 林文彬 277, 418, 419, 466
- 林宪曾 59
- 林献圻 324, 491, 508, 514
- 林怡游 143, 144
- 林颖启 138, 143, 277, 398, 411, 418, 419, 462, 466, 480
- 林永漠 501
- 林永升 57, 63, 143, 144, 267, 274, 277, 373, 380
- 林则徐 16, 18, 41, 56, 64, 74, 334, 335, 363
- 林振峰 242
- 林子候 424
- 林志荣 242
- 凌焕 79, 150
- 麟瑞 253
- 刘璇 175
- 刘秉璋 69, 113, 158, 196, 197, 233, 234, 257
- 刘步蟾 57, 60, 62, 119, 130, 142-144, 162, 263, 265, 268, 274, 275, 302, 305, 312, 332, 344, 356, 367, 378-380, 385, 386, 391, 397, 398, 402, 411, 413, 415, 418, 427, 440, 443, 444
- 刘长佑 98, 164
- 刘超佩 395, 397, 399, 400, 404, 407, 408, 442, 443
- 刘大钧 507
- 刘传授 240
- 刘达材 428
- 刘恩荣 238
- 刘芳圃 145
- 刘凤翰 207
- 刘冠雄 242, 277, 466, 480, 486, 507
- 刘含芳 106, 161, 223, 281, 287, 288, 320, 321, 397, 400, 403, 410, 414, 418, 444, 445, 447, 502
- 刘厚生 155
- 刘蒋华 99
- 刘坤一 53, 54, 69, 77, 79, 93, 95-98, 111, 120, 134, 137, 150, 152, 155, 159, 160, 220, 237, 294, 313, 314, 321, 326, 332, 401, 402, 405, 407, 443, 450, 452, 466, 476, 477, 480, 502, 507
- 刘鹏 351
- 刘懋勋 143

- 刘铭传 100,153,175,176,189-192,210,211,216,220,252,268,306,307,310,319
- 刘祺 283
- 刘汝翼 247,287
- 刘瑞芬 335
- 刘申宁 439
- 刘声木 150,447
- 刘盛休 280,366
- 刘思复 496
- 刘树德 406,408
- 刘树棠 476
- 刘体智 219,253
- 刘旭 260
- 刘学礼 278,418
- 刘学询 341
- 刘荫渠 160
- 刘应霖 277
- 刘永福 166,205,207
- 刘忠 436
- 柳原前光 73
- 穴户玘 111
- 龙殿扬 450
- 隆裕皇后 275,391,393,395
- 卢察审 298
- 卢坤 14,18,64
- 卢斯 141
- 卢守孟 242
- 卢维 58
- 卢学孟 468,506
- 卢毓英 324,325,359,386,413,415,430,434,441,444-447
- 录赛 58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64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64
- 陆奥宗光 336-338,340,355,425
- 陆尔发 280,285
- 陆麟清 277
- 陆汝成 249
- 鹿传麟 169,477
- 罗蚩 (Roche) 210
- 罗登汉 503
- 罗尔弼 256
- 罗大春 94,152
- 罗丰祿 57,142,143,149,152,162,247,268,283,334,335,340-342,348,408,415,424,444,445,450,451,468,502
- 罗斯伯里 (Lord Roseberg) 339
- 罗荣光 283,479,480
- 罗素 (J. Russell) 22,24
- 罗亚尔 (Loir) 208-211
- 罗臻祿 143
- 罗忠铭 242,259
- 罗觉斯 (W. S. Rogers) 298
- 罗哲士 (Rogers) 349
- 罗荣光 283,479,480
- 骆佩德 353,354
-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 (Prince Lobanov-Rostovski) 453,503
- 吕翰 57,63,184
- 吕实强 438,439
- 吕贤基 29
- 吕文经 418,419
- 吕一燃 149

- 吕耀斗 162, 259
 律劳卑(W. J. Napier) 14, 64
 伦察 298
 伦道尔(G. Rendel) 117, 120,
 121, 156
 伦道尔(S. Rendel) 117, 120,
 121, 156
- M**
- 马迪纳(R. de Martino) 475
 马丁(Martin) 190
 马复恒 402, 414, 418, 419,
 444, 445, 447
 马格斐 144
 马格禄(J. McLure) 384, 385,
 402, 404, 414, 440, 446
 马嘉理(A. R. Margary) 136, 142
 马汉(A. T. Mahan) 141, 163,
 365, 489
 马夏尔尼(G. M. McCartney) 13
 马吉芬(P. N. McGiffin, 又译马格奋)
 241, 298, 299, 377, 431-434, 436,
 437, 446
 马建忠 112-116, 142, 143, 155,
 215, 252, 280, 281, 291, 321
 马克思(K. Marx) 151, 158, 255
 马沙耳(Baron. von Marschall)
 455, 503
 马士(H. B. Morse) 187, 210,
 211, 505, 508
 马新貽 29, 35, 50, 66
 马益识 58
 马幼垣 508
- 马玉昆 347
 马毓宝 499, 500
 马煊钰 494
 麦乞伊 205
 迈达(Medard) 58, 139, 182
 满德 427
 满粟士 298
 毛昶熙 50, 73
 毛根(R. B. Mauchan) 474
 毛精长 110
 毛仲芳 470, 501
 梅辉立(W. F. Mayer) 117
 梅启照 37, 66, 67, 92, 93,
 150, 152, 159
 弥伦斯(H. L. M. Mclensteth)
 355, 430
 米勒(N. Miller) 161
 米切尔(D. W. Mithell) 508
 密拉 265, 298
 密勒克 298
 密妥士(J. A. T. Meadows) 50, 68
 苗沛霖 106
 苗秀山 444
 闵妃 112, 113, 204, 334
 闵谦镐 113
 闵台镐 102
 闵泳翊 202, 335
 明惠 253
 明治天皇 71
 摩尔根 68
 莫海德(D. Muirhead) 29
 墨贤理(H. F. Merrill) 325,
 425

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
204, 205
穆晋书 412
穆拉维约夫(N. N. Muravyev-Amur-
sky) 460, 461, 504
穆理登(A. G. Moreton) 139
穆图善 177, 206, 208, 216, 245
木户孝允 72, 328

N

纳尔逊(Nelson) 13, 20, 143, 397
纳希莫夫(Nakhimov) 19
南木 64
内田顾一 509
内田康哉 509
能方济(F. Nies) 456
倪耳森 148, 298
倪乐顺 298
倪文蔚 165, 207
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
452, 456, 461, 505
尼格路士(T. Nicholls) 299
聂士诚 337
午昶晒 410, 414, 417-419,
444-447
诺加(Rogers) 303
诺斯罗普(B. G. Norththrop)
412
努尔哈赤 270
努瓦康(Noiquand) 303

O

欧阳芳 25

欧阳利见 196
欧格纳(N. R. O'Conor) 339,
355, 357, 423, 430, 448, 484, 505

欧阳庚 140
欧披次 238
区世泰 298

P

帕克斯 19
帕姆塞尔(H. Pemsel) 208, 520
潘炳年 210
潘鼎新 168, 170
潘骏德 161, 235, 236
潘世恩 29
潘霁 74
潘兆培 418, 419
潘祖荫 29, 116
庞百腾 67
庞斯福德(J. Pauncefote) 303,
323
裴龙(Peyron) 174, 208
裴式楷(R. E. Bredon) 119
裴荫森 241, 243-247, 249-251,
259-261
佩里(M. C. Perry) 71
彭楚汉 92-94, 96, 97, 152, 396
彭玉麟 88, 92, 93, 96, 101, 152,
206
皮明勇 319, 508
朴泳孝 202, 336
坪井航三 344, 350, 351, 353,
437
平田胜马 436

溥心畲 207
普菲士 299
璞科第(D. D. Pokotilov) 504

Q

琦善 283
祁景颐 207
祁世长 207
耆龄 253
齐尔绪基 503
戚继光 294, 321
戚金藻 409
戚其章 153, 321, 323, 427, 428,
430, 433, 436, 438, 442, 444
前原一诚 72
乾隆帝弘历 13, 22, 98, 230, 231
钱宝兴 196
钱德 140, 145
钱德勒(W. E. Chandler) 140
钱实甫 152
钱应溥 231, 256, 264, 458, 477
浅尾重行 370
浅野正恭 433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3
乔治五世(George V) 498
峴粟 207
桥口贡 510
桥口广次郎 371
秦荣光 66
秦始皇 403
青木周藏 338, 339
庆宽 253
庆禧亲王永璘 233

庆亲王奕劻 71, 217-220, 230,
232, 233, 235, 252, 257, 266, 313,
332, 357, 361, 394, 481, 490
邱宝仁 57, 60, 63, 118, 145,
267, 274, 277, 398, 411, 418, 419,
444, 465

邱志范 242
裘国安 143, 267
全顺 253
全臻准 337
权东寿 336
权在寿 336
犬养毅 202

R

饶涵昌 501, 510
饶怀文 470, 494
饶鸣衢 436
日意格(P. M. Giquel) 38-40,
42, 44, 46, 47, 56-58, 62, 67, 74,
117, 126, 130, 138, 139, 142, 145,
162, 472
人见善五郎 353, 354
任照 143, 144
荣安 389
荣全 85
容闳 33, 66, 109, 139, 142, 350,
412, 444
容良 445
容尚谦 183
荣禄 464, 465, 477
荣续 236, 494, 500
茹费理(J. F. C. Ferry) 166, 174-

176,191,192,198,199,208,211

儒昂索 59

阮福时 166

瑞澈 496,510

瑞联 100

瑞麟 53,81,96

瑞乃尔 (T. H. Schnell) 414,
415,446

瑞沅 236

S

萨君谦 470

萨镇冰 138,143,144,148,277,
398,413,418,465-467,473,476,
480,484,485,488,490-494,496,
497,499,500,505,508-511

赛明顿 (W. Symington) 18

三浦虎次郎 374

三宅贞造 370

杉村潜 337

山本权兵卫 149,328,424,483

山具有朋 202,328,329,388,
398

善庆 217,218,222,224

善威 (Mr. Samwer) 287,298

善普 490

尚其亨 486

尚思懋 253

尚泰 73,110

尚贤 317

邵友濂 209,402

余锡尔 (C. Cheshire, 又译纪奢)
298,299

色克图 253

色楞额 253

僧格林沁 33,479

绅珂 (Schenk zu Schweinsberg)
455

沈保靖 34,50,162

沈葆楨 29,37,39,41-46,48,
57,61-63,66-70,74,77-79,81,
83,87-89,91-98,117-119,124-
126,132,133,140-142,144,149-
153,156,158,245,251,280,
334,335

沈秉成 313

沈桂芬 29,75,81,87,103,104,
137,154,160

沈继芳 494

沈樾 494

沈寿昌 277,350,351,418,428

沈寿堃 148,242,295,321,375,
413,415,433,437,490,494,511

沈舜泽 202

沈渭滨 506

沈翊清 472

沈有恒 46,63,119

沈瑜庆 59,156

盛宣怀 106,340,342,366,389,
425,426,437,451,480,481,
502,507

盛永清 25

盛昱 169-171,207

森有礼 110

司徒诺 (J. Stewart) 52

师丢瓦 139

- 斯恭塞格(E. D. de Segonzac) 61,
 74, 162, 242
 斯德浪 283
 斯托克顿 19
 施恩孚 468
 施辉藩 409
 施丢克尔 319
 施密士 298
 石塚铸太 370
 史澄 64
 史济源 283
 史建中 138
 什记 59
 式百龄(Sehelin) 194, 202, 298
 嵩日生 442
 松村兼雄 509
 松寿 491, 498
 宋晋 44
 宋庆 286, 393, 504
 宋文翔 140, 494, 498
 寿尔(H. N. Shore) 59, 70, 154,
 156, 160
 寿山 253
 苏萃 144
 苏廷玉 64
 舒赛 58
 舒尔次(Schalze) 298
 舒文 266
 寿尔 59, 70, 154, 156, 160
 肃顺 22
 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 又译沙
 里士伯、萨里贝利) 302,
 462, 505
 孙克复 433, 435, 436, 440
 孙辉垣 494
 孙姜 277
 孙金彪 399, 404
 孙锵鸣 29
 孙开华 190
 孙瑞芹 429
 孙万龄 406
 孙玉堂 34
 孙毓汶 170, 171, 362, 394, 395,
 421, 449
 孙中山 341, 496
 顺治帝 22
- T
- 泰莱(W. F. Tyler) 290, 299,
 321, 369, 414, 432-434, 440, 446
 谭碧理 332
 谭家复 241
 谭嗣同 463
 谭学衡 487, 494, 498
 谭钟麟 238
 汤池安 433
 汤化龙 499
 汤姆斯 183
 汤廷光 494
 汤芎铭 499-501, 510, 511
 唐定奎 74
 唐国华 33
 唐炯 168, 169
 唐景崧 166, 208, 516
 唐仁廉 281, 283
 唐顺之 248

唐益年 255,257
 陶威尔 (Admiral Sir H. Dowell)
 205
 陶模 447
 特洛特霍夫 (Commodore W. von Te-
 getthoff) 21,432
 田浚林 (Tamplin) 354,429
 田原大南 504
 铁毕子 (Tirpitz) 455
 铁良 253,470,490,492
 藤村道生 212,424,427,430,
 437
 同治帝载淳 22,73,75,80,
 81,229
 托克顿 19
 脱里西 266

W

瓦定敦 (W. H. Waddington) 211
 瓦连 427
 万青藜 103
 汪凤藻 336,338,359
 汪乔年 46
 汪守正 287
 王柏心 64
 王炳耀 434
 王传炯 495,499
 王道成 257
 王得胜 145,146
 王德榜 200
 王德均 55
 王福昌 145
 王福清 371

王福祥 235,236
 王光熊 494
 王国成 352,358,428,429,465
 王桂芳 143,144
 王记华 426
 王家璧 83,84,88,151
 王家俭 70,253,258,320,322,
 323,424
 王遽常 258,259
 王回澜 145
 王凯泰 44,46,68,77,79,97,
 141,150
 王涟 183
 王鹏运 450,502
 王平 412,414
 王齐辰 277
 王庆祺 81
 王庆瑞 145
 王庆云 169
 王仁东 169
 王仁堪 169
 王如绘 212
 王时泽 510
 王世稣 256
 王寿昌 242
 王苏波 210
 王铁崖 149
 王桐 242
 王文韶 77,80,87,103-105,115,
 150,154,159,255,307,324,419,
 445,447,449-452,457,458,462,
 477,502-504
 王五 401

- 王锡山 351
 王孝慕 470,506
 王学廉 241,242
 王宜林 439
 王咏霓 265-267,318
 王永发 355
 王永胜 286
 王毓礼 320
 王芸生 425
 王在晋 431
 王照 254
 外山三郎 424,433
 威理得(Wilde) 400,401
 威廉二世(William II) 456,
 459,461,503-505
 威妥玛(Sir T. F. Wade) 28,38,
 66,117,300,303,317
 危兆盖 439,523
 维松 253
 维特(S. Y. Witte) 2,453,454,
 461,503,504
 韦贝(C. Waeber) 335,348
 韦振声 138
 尾崎行雄 202
 魏尔特 65
 魏光燾 464
 魏瀚 59,129,139,142-144,
 182,245,246,473,493
 魏暹 145
 魏源 16,31,56,363,489
 魏子京 506
 卫汝成 389
 卫汝贵 347
 末松谦澄 355
 温瓦而脱 298
 温子绍 53-55
 文彬 77,79,150
 文格 99
 文清 22
 文锡 81
 文祥 21,30,75,78,79,81,87,
 89,103,104,150,151
 文煜 44,48,67,70
 文廷式 347,361,380,395,415,
 427,439,445,450,451,502
 翁同龢 29,54,83,104,116,
 151,154,169-171,208,230,231,
 256,294,307,347,356-358,361,
 362,383,387,394,395,401,421,
 423,430,431,441,443,447,449,
 453,458,459,462,463,504
 翁同书 29
 翁心存 29
 翁曾桂 104
 倭仁 43,67
 乌赫托姆斯基(Prince Ukhtomsky)
 460
 吴安康 193-197,313,325
 吴炳文 353,354
 吴长庆 113-116,356
 吴大澂 171-173,203,216,237,
 289,291,321,330,386,405
 吴大廷 42,95,96,152
 吴德章 46,47,143,144,245,
 250,468
 吴殿元 115

吴观礼 136
 吴嘉善 444
 吴乾兑 66
 吴杰 196
 吴敬荣 373, 378, 379
 吴静轩 336
 吴开泰 138
 吴全美 166
 吴纫礼 241, 259
 吴汝纶 104, 154, 393, 441
 吴棠 43, 69, 80
 吴廷芬 189
 吴学铿 143, 144
 吴研人 310
 吴毓麟 240
 吴元炳 77
 吴应科 140, 277, 474, 494
 吴永 447
 吴育仁 347
 吴樾 486
 吴赞诚 46, 47, 96, 97, 139, 142,
 143, 146, 158, 305
 吴兆有 116
 吴振南 489, 495, 500
 吴仲悻 320
 吴仲翔 59, 119, 146, 148, 161,
 162, 237, 240
 伍光建 148, 242, 493, 494
 伍廷芳 340, 425, 450
 伍廷山 277

X

西摩 (Admiral Sir E. H. Seymour)

479
 西乡从道 72-74, 202, 328, 343,
 344
 西园寺公望 412
 西乡隆盛 72, 73, 110
 喜昌 236, 494, 500
 希耳顺 (S. H. Hearson) 298
 希理哈 363, 431
 希罗多涅 (M. Hitrovo) 339
 希勤司 (C. Higgins) 298
 锡伦司 (B. Sillence) 298
 锡珍 209
 夏献纶 42, 60, 74, 97
 咸丰帝奕訢 21, 22, 221
 相浦纪道 411
 向荣 21, 404
 萧一山 256
 小山六之助 422
 小川又次 328
 谢冰心 470
 谢葆璋 148, 470
 谢满禄 (Semalle) 176, 177, 182
 谢天佑 240
 兴奎 80
 熊秉坤 496
 熊成基 492
 徐邦道 389, 393
 徐长顺 195
 徐承祖 424
 徐传隆 194, 333
 徐福 84, 403
 徐建寅 9, 100, 107, 125, 127-
 129, 157, 321, 393, 397, 398, 401,

402, 437, 438, 442
徐明达 499
徐寿 31, 32, 34, 55, 127
徐桐 219
徐雄飞 333
徐延旭 168, 169
徐用仪 394, 395, 421, 449
徐振鹏 140, 494
许秉贤 506
许庚身 221, 254
许济川 138
许建廷 470, 495
许景澄 101, 154, 157, 199, 212,
260, 262-267, 281, 314, 318, 382,
452, 455, 456, 458, 463, 481, 504
许乃济 64, 100
许乃普 100
许乃钊 100
许彭寿 100
许其光 146, 161
许铃身 100, 101
许寿山 63, 119, 184, 397
许寿仁 242
许应骥 457
许兆箕 148
宣统帝溥仪 489, 490
薛斐尔(R. W. Shufeldt) 303
薛福成 18, 64, 101, 102, 109,
114, 117, 124, 154, 156, 162, 196,
197, 212, 259, 264, 280, 296, 302,
318, 320, 322, 323, 424
薛焕 22
薛田资(G. M. Stenz) 456

薛有福 183
逊顺 60, 61

Y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52
延茂 264, 318
阎德胜 399, 406
阎敬铭 18, 170, 189, 216, 252,
307
严道洪 277, 419, 462
严复(原名严宗光) 57, 59, 62,
161, 162, 240, 241, 258, 259, 397,
415, 463, 493, 494
严厚甫 57
严世永 205
严寿华 510
严文炳 240
严中平 64
岩仓具视 72
彦忠 253
杨昌潜 77, 79, 150, 189, 206,
245
杨德明 145
杨发 409
杨福同 449
杨济成 242
杨根有 321
杨敬修 494
杨廉臣 47, 143, 144, 245, 247
杨溥 363
杨岐珍 196
杨庆贞 510, 511

- 杨儒 444,460,504
 杨廷纲 510
 杨廷辉 177
 杨仰曾 249
 杨岳斌 88,101,193
 杨永泰 247
 杨用霖 277,397,398,
 416,418
 杨昭全 212
 杨兆璠 263,265
 杨兆楠 183
 杨志本 210
 杨作宾 418
 姚椿 64
 姚锡光 324,432,436,441,444,
 446,487-490,508
 耀来斯 37
 耀豫 253
 叶伯璠 63
 叶琛 138,184
 叶殿铄 143
 叶芳哲 471
 叶富 57,63
 叶志超 337,344-347,352,358,
 366,385,426,427
 叶志如 255,257
 叶祖珪 57,62,143,144,267,
 274,277,374,397,398,413,418,
 419,465-467,470,474,476,477,
 480,485,486,505
 伊东祐亨 343,344,353,361,
 368,372,387,388,389,398,399,
 403-405,410,411,416,417,432,
 433,436
 伊利(E. Ely) 495
 伊藤博文 203,204,213,328,
 338,340,348,398,402,422
 -户兵卫 338
 怡良 64
 易俊 361
 宜霖 236
 义律(C. Elliot) 283
 奕誌 490
 尹泰骏 202
 荫斌 253
 荫昌 492,496
 英格斯(Captain J. Ingles) 306,
 384
 英翰 77,80,98
 英俊 98
 英文 253
 应宝时 34,66,517
 有吉朋 509
 于凌辰 83,84,88,151
 俞樾 66,318,319
 俞大猷 363,431
 俞箕煥 336
 俞政 209
 余飞雄 316
 余璜 107,214
 余联沅 480
 余思诒 321-323
 余守顺 277
 余芝春 241
 毓贤 457,476
 裕宽 165,207,395

裕禄 77, 80, 233, 467, 471, 472,
476, 479, 480, 506, 507
庾裕良 212
袁保恒 106
袁保龄 106-108, 114, 116, 154,
167, 173, 207, 215, 216, 231, 252,
256, 285-288, 296, 309-311, 320,
321, 325, 334, 515
袁昶 208, 264, 481
袁甲三 106, 114
袁九皋 195, 313, 333
袁俊 25
袁世凯 114-116, 155, 202, 321,
330, 334-338, 344, 383, 425, 466,
471, 480, 486, 505
袁雨春 145
恽宝惠 508
永田廉平 370
游学楷 242

Z

查连标 145
载沣(第二代醇亲王,摄政王)
221, 487, 489, 490
载林 236, 253
载涛 490, 492
载洵 221, 475, 490-494, 498,
502, 508-510
载泽 486, 490
翟明磊 439
詹天佑 140, 209, 238
张爱玲 200
张百熙 361

张秉圭 242
张伯初 66
张成 57, 63, 118, 139, 147, 177,
178, 183, 200
张德彝 145, 161
张得胜 177
张尔梅 418, 447
张凤翔 498
张光前 389, 440, 441
张华奎 105-108, 116, 154, 168,
169, 207
张家骥 80
张睿 113, 114, 116, 155, 356,
358, 430, 516, 518
张金生 143, 144
张凯嵩 168, 170
张李成 191
张利民 255, 256
张梦元 46, 47, 139, 251
张佩纶 46, 101, 104-109, 114,
139, 140, 153, 154, 161, 162, 167-
173, 176-179, 182, 185, 188, 189,
200, 207-210, 215, 216, 218, 243,
249, 252, 259, 309, 317, 325, 423,
426, 448
张启正 143, 267
张人骏 179
张汝梅 458
张士珩 289, 321, 377, 378, 498
张树声 54, 69, 105-108, 113-
116, 120, 155, 165, 167-169, 207,
237, 285, 320, 515
张焘 69, 161, 517

- 张文祥 50
 张文宣 288, 289, 321, 395, 397,
 399, 405, 407, 410, 414, 416, 418,
 442, 443, 445, 446
 张筱石 320
 张曜 86, 220, 293, 307, 313
 张翼 415
 张恽伯 510
 张荫桓 99, 189, 208, 281, 394,
 402, 453, 457, 461, 504, 505
 张印塘 105
 张玉田 434
 张兆栋 77, 149, 177, 185, 200,
 209, 245
 张哲深 295, 321, 325
 张之洞 54, 55, 69, 104, 105,
 139, 169, 171, 173, 178, 179, 181,
 200, 206, 208, 209, 212, 216, 218,
 233-235, 237, 244, 257, 314-316,
 326, 464, 465, 480, 496
 张之万 29, 170
 张志沂 200
 张宗禹 106
 张仲忻 395
 章高元 190, 191, 282, 392, 457,
 458, 503
 章洪钧 109, 280, 309
 章士敦(Johnstone) 298
 章斯敦(Johnstone) 122
 赵怀业 389, 441
 赵梅卿 256
 赵宁夏 202
 赵元益 55
 赵幼雄 157
 珍妃(嬪) 275, 276, 395
 曾国藩 17, 18, 21, 22, 25-35,
 41, 44, 50, 55, 64-67, 77, 93-95,
 98, 100, 101, 106, 111, 124, 127,
 140, 152, 219, 269, 311, 423, 514
 曾国荃 26, 97, 98, 116, 134,
 159, 167, 172, 175, 178, 193, 194,
 196, 206, 211, 216, 217, 233, 238,
 252, 312, 313, 315, 318, 325
 曾恒忠 59
 曾纪泽 31, 111, 112, 121, 127,
 139, 144, 148, 161, 162, 199, 204,
 212, 217-219, 253, 265, 266, 299,
 300, 314, 318
 曾锦文 59
 曾朴 427
 曾望颜 21
 曾兆麟 240, 494
 曾宗珣 240
 曾宗瀛 267
 增菴 491
 震钧 253, 517
 郑成功 15
 郑复光 31
 郑观应 281, 282, 295, 296, 319-
 321, 325, 447
 郑勋俭 149, 517
 郑纶 494
 郑溥泉 63
 郑清濂 129, 143, 144, 245, 250,
 494
 郑汝成 241, 242, 487, 494

- 郑绍忠 332
 郑守钦 468
 郑守箴 242
 郑天杰 256,520
 郑永邦 337
 郑文超 435
 郑文成 148
 郑文英 242
 郑孝胥 465
 郑永邦 337
 郑祖彝 494
 志摩清宜 372
 志锐 238,361,395
 宗方小太郎 365,432
 宗源瀚 196
 中牟田仓之助 343
 钟德祥 361
 钟俊 253
 邹鲁 508-510
 邹兆琦 256,257
 周宝 183
 周德润 165,179,189,207
 周馥 106,116,167,221,247,
 252-254,256,268,269,280,284,
 286,287,296,308-310,319-321,
 323,325,366,466,474,481,
 506,507
 周恒祺 120,133
 周家恩 408
 周家楣 189
 周开锡 41,42
 周懋琦 242,259
 周善初 198
 周盛传 280
 周寿昌 80
 周树人(鲁迅) 468,469
 周文祥 25
 周献琛 242
 周兆瑞 501
 周作人 238,468,469,506
 朱尔典(Sir. J. N. Jordan) 511
 朱亮生 154,318
 朱声冈 494
 朱天奎 470
 朱天森 511
 朱孝先 496
 朱学勤 200
 朱耀彩 145,146
 朱一新 220,222,253,254,281,
 282,320
 朱芷芬 200
 朱宗祥 263,267
 壮强 207
 左宝贵 347
 左宗棠 33,37-40,43,44,48,
 56,58,62,67-70,80,82,85-87,
 89,93,94,97,98,109,123,141,
 150,151,189,193,205,206,209-
 211,213,216,243,245,251,273,
 314,472
 佐久间左马太 406
 佐藤利八 73,75
 佐藤铁太郎 371
 佐佐木广胜 371
 竹添进一郎 202

舰 船 索 引

A

阿尔舍林 *Algerine* 479
 阿高那 *Arcona* 457
 阿米林 *Hamelin* 174
 阿其力 *Achilles* 144
 阿荣·曼比 *Aaron Manby* 18
 阿斯柯尔德 *Askold* 485
 阿塔朗特 *Atalante* 166
 爱宕 343, 365, 403, 412, 479
 爱勤考特 *Agincourt* 143
 爱仁 347, 349
 爱斯米拉达 *Esmeralda* (后为日本购去, 改名为泉) 266, 382
 安东罗灭古 *Andromache* (又译安德罗马齐) 14
 安澜 42-45, 49, 63, 74, 488
 安澜 (广东巡船) 96
 安澜舰 237
 安南人 *l'Annamite* 198
 奥利恩 *Orion* 126, 137

B

巴雅 *Bayard* 166, 175, 189, 190, 195-198

八岛 352, 483
 八云 483
 八重山 (琉球贡船) 37
 八重山 329, 337, 342, 343, 350, 365, 388, 403
 百粤 (后改名广东) 26
 保大 107, 222
 保民 37, 75, 76, 149, 243, 312, 313, 333, 452, 464, 487, 494, 498
 宝璧 472
 宝筏 411
 暴风雨 *Grozovoi* 485
 北京 *Beijing* (后改名金台) 23, 25, 26, 28
 比睿 76, 343, 365, 368, 370-372, 387, 411, 435
 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495
 播布斯 354
 字来克柏林 *Blackprince* 142, 144
 伯利洛芬 *Bellerophon* 143
 柏尔来 *Belleisle* 122, 137
 伯明翰 *Birmingham* 495
 布兰可 *Blanco* 381, 382

C

长胜 63
 常磐 483
 操江 35, 51, 95, 98, 102, 282,
 297, 344, 345, 351, 353, 355, 358,
 359, 402, 429, 430
 超武 37, 47, 49, 196, 243, 472
 超勇 47, 101, 102, 113, 114, 121-
 123, 125, 126, 134, 135, 137, 167,
 173, 194, 202, 205, 218, 222, 224,
 267, 277, 278, 280, 297, 298, 302,
 330, 333, 344, 345, 348, 366, 367,
 369, 370, 372, 379, 433-435, 437
 朝鲜人 *Koreets* 112, 203, 336,
 479, 483
 策电 98, 118, 120, 452, 464,
 498, 510
 策萨列维奇 *Tsesarevitch* 484
 漕海 35, 74, 95, 98, 313, 314,
 487
 琛航 44, 49, 63, 74, 181, 267,
 487
 澄波 96
 澄清 96
 澄庆 47, 49, 98, 194-196, 211,
 212, 243
 辰 314, 452, 487, 498
 初濑 483
 出云 483
 春日 28, 72
 春日(日本铁甲舰) 483
 赤城 342, 343, 368, 370-372,

387, 412

楚观 465, 495, 498, 500
 楚谦 465, 494, 498
 楚泰 465, 494, 496, 498, 509
 楚同 465, 494, 496, 498, 509,
 510
 楚有 465, 494, 496-498, 509
 楚豫 465, 494, 496, 498-500,
 509-511

D

大岛 343, 365, 388, 412
 大和 164, 342, 343, 365, 411,
 469
 大雅 44, 49, 56, 74
 胆 *Tarn* 189, 190
 德皇 *Kaiser* 166, 457, 461, 505
 德拉克 *Drac* 189, 197
 德胜(穆克德恩改名) 26
 德斯丹 *d'Estaing* 174, 175, 180,
 181, 184, 186, 189, 191, 198
 德意志 *Deutschland* 459
 登瀛洲 45, 49, 98, 114, 313,
 452, 498
 狄芬士 *Defence* 142
 定二 412
 定一 412
 定远 127, 129, 130, 135, 137,
 157, 222-224, 226, 232, 245, 247,
 248, 250, 255, 263-265, 267, 277,
 278, 295, 298, 299, 302, 305, 316-
 318, 328, 330, 331, 333, 366-372,
 374-377, 379, 380, 386, 390, 392,

393, 398, 405, 411, 413, 415, 432-
437, 445, 464, 466

东 72

杜居士路因 *Duguay-Trouin*
180, 181, 186, 189, 190, 195

杜沙佛 *Duchaffaut* 198

E

俄勒冈 *Oregon* 480

恩卡拉达 *Encalada* 381

恩廷甫 *Emryafus* 144

F

飞鸿 492

飞鲸 347-349, 354

飞龙 96

飞霆(炮艇) 98, 118, 120, 313,
314, 412, 452, 464

飞霆(驱逐舰) 452, 477, 480

飞鹰 452, 477, 480, 487,
494, 498

飞云 44, 45, 74, 99, 139, 178,
181, 184

费勒斯 *Villars* 175, 176, 180,
181, 186

敷岛 483

伏波 44, 45, 49, 70, 74, 178,
181, 183, 185, 487

扶桑 76, 343, 365, 368, 374,
388, 403, 411, 413

福安 314, 326

福安(运船) 472

福星 42, 44, 49, 62, 70, 74, 177,

181, 183

福靖(广丁改名) 244, 249, 251,
316, 450

福龙 249, 278, 366, 371, 377, 412

福胜 119, 177, 181, 184, 245

蝮蛇 *la Vipère* 166, 180, 186, 190

富士 483

弗爱摩 *Fame* 479

弗吉尼亚 *Virginia* 20

凤翔 343

G

盖尔人 442

甘米力治 *Combridge*(又译剑桥)
16

刚毅 *Ryeshitelni* 484, 485

高千穗 328, 331, 342, 343, 365,
368, 370, 388, 399, 403, 411, 412

高砂丸 344

高升 347-349, 351-356, 358,
359, 429, 430, 484

高雄 342, 343, 365, 388, 411

葛城 343, 365, 388, 410, 411

格希翁 *Gefion* 459

拱北 114

馆山 343

广丙 244, 245, 249, 315, 316,
333, 344, 345, 366, 367, 371-374,
376, 398, 413, 416-418, 445, 446

广丁(福靖改名) 244, 251

广东 *Kuantong*(后改名百粤) 23,
26, 28, 276, 316

广庚 245, 315

广亨 315,316
 广己 315
 广甲 55, 238, 244, 315, 316,
 333,348,359,366,367,369,373,
 374,376,378,379,384,386,433,
 434,437,445,496
 广金 315,488
 广利 315,316
 广戊 315
 广万(厦门改名) 26
 广乙 244, 249, 315, 316, 333,
 347,349-353,358,380
 广玉 315,488
 广元 315,316
 广贞 315,316
 公义 422

H

海琛(招商局轮船) 123
 海琛(巡洋舰) 463, 465, 477,
 487,488,494,498-501,505,510,
 511
 海筹 464, 465, 477, 485, 487,
 488,494,498,499,501,505,510
 海东雄 54
 海东云 63
 海镜 44,49,278,402
 海镜清 54
 海定 366
 海军上将 *General Admiral* 265
 海华 464,480
 海狸 479
 海龙 464,480

海门 343
 海圻 464-466, 477, 480, 487,
 488,494,498,501
 海青 464,480
 海容 464, 465, 477, 480, 485,
 487,488,494,498-501,505,510,
 511
 海天 464-466, 477, 480, 486,
 508,514
 海犀 464,480
 海晏(后改名镇安) 35,36,95,
 222,223
 罕佩尔斯 65
 赫士本 263
 和泉 383
 横海 47,49,243,244,312
 横海(广州机器局制) 56
 亨利 *H. L. Henry* 52
 胡萨托尼克 *Housatonic* 52
 湖鹗 465,498-501,510
 湖鹏 465,498,499
 湖隼 465,498
 湖鹰 465,198-500,510
 虎威 98,118,120,452,464
 淮特 *White* 183
 寰泰 47,244,259,312,313,
 333,450,452
 黄鹄 31,32,35,66
 皇家至尊 *Royal Sovereign* 65
 惠吉(恬吉改名) 34,195
 惠钦古 *Whiting* 479
 毁灭 *Devastation* 383

J

- 基里亚克 *Guliak* 479
- 吉野 329, 342, 343, 349-353, 358, 359, 365, 368-370, 373, 376, 378, 381, 388, 403, 411, 412, 428, 464
- 济安 44, 49, 74, 139, 142, 181
- 济远 130, 135, 138, 222-224, 226, 245, 246, 248, 263-267, 277, 278, 298, 302, 317, 318, 330, 333, 337, 344, 345, 347, 349-353, 358, 359, 366, 367, 369, 373, 374, 376-380, 398, 412, 417, 418, 427-429, 433-437, 446, 465
- 坚定 *Staunch* 117, 119
- 建安 472, 487, 494, 496, 498, 509
- 建康 492
- 建胜 119, 177, 181, 184, 245
- 建威(马得罗改名) 62, 63, 70, 138
- 建威(鱼雷快船) 472, 487, 494, 496, 498, 509
- 江苏 *Kiangsoo*(后改名镇吴) 23, 26, 28
- 江亨 465, 470, 494, 498
- 江户丸 403
- 江鲲 492
- 江利 465, 470, 494, 498-500, 509, 511
- 江犀 492
- 江元 464, 465, 494, 498
- 江贞 465, 470, 494, 498-501, 510
- 金刚 76, 114, 343, 365, 388, 411
- 金龙 378, 384
- 金甌 35, 98, 121, 314
- 金台(北京) 26
- 近江丸 365
- 经远 9, 135, 136, 138, 224, 226, 247, 267, 268, 274, 277, 278, 302, 307, 331, 333, 337, 346, 348, 366, 367, 369, 373, 376, 379, 426, 433-435, 437, 522
- 靖安 56
- 靖远(福州船政局制,后更名通济) 44, 63, 74, 98, 242, 246, 452
- 靖远(德国制巡洋舰) 135, 136, 138, 224, 247, 267, 268, 277, 278, 300, 307, 328, 331, 333, 337, 366, 367, 369, 373, 374, 376, 377, 379, 382, 397, 398, 413, 418, 433-435, 437
- 鲸波 491
- 镜清 47, 49, 244, 312, 313, 333, 450, 452, 487, 494, 498
- 君主 *Royal Sovereign* 13, 14

K

- 开济 47, 49, 98, 193-196, 222, 224, 243, 244, 312, 313, 333, 450, 452
- 开泽林·奥古斯塔 *Kaiserin Augusta* 459
- 凯旋 *Triumphant* 175, 184,

186,189-191,195,197
康德尔 *Condell* 382
康济 47,49,135,173,194,240,
243,267,277,278,333,345,398,
402,417-419,446,452,487,496
柯裘德士迪克 245
克莱蒙特城 *City of Clermont* 18
狂暴 23

L

拉裕兑 410
拉加利桑尼亚 *la Galissonnière*
175,186,189,190
拉里 *Raligh* 144
来远 135,136,138,224,226,
247,267,268,274,277,278,295,
302,321,325,331,333,337,348,
366,367,369,371-374,377,379,
391,392,398,408,411,414,418,
433-437,444
浪速 328,343,349-356,365,
368,370,385,387,388,403,
411,412
雷兑 249
雷良 249
雷虎 249
雷坎 249
雷坤 249
雷离 249
雷龙 249
雷鸣 *Tonnante* 20
雷诺堡 *Château Renaud* 166,
177,180,186,189-191

雷乾 249
雷巽 249
雷震 249
雷中 249
林则 *Lynch* 382
里苏甘 *Resurgam* 52
礼裕 422
利安门 354
利顺 412
利天 *Lion* 479
利运 366
联鲸 475,495,498
列 314,452,487,498
龙湍 491
龙威(改名平远) 246,247
龙骧 98,101,118-121,134,298,
313,314,452,464
龙骧(日舰) 72
鸬鹚 *Cormoran* 457
鲁汀 *Lutin* 175,189
罗尔·阿美士德 *Lord Amherst* 14

M

马得罗(后改名建威) 62
马那杜 *Minotour* 142,144
满珠 343
麦里马克 *Merrimack*(后改名弗吉尼
亚 *Virginia*) 20
湄云 42,44,49,100,102,452
美那(后改名平远,练习舰) 241
孟长 73
门司丸 344
们那次 *Monarch* 144

敏捷 277, 278, 333
莫尼特 *Monitor* 20
摩耶 343, 365, 403, 412
穆克德恩(后改名德胜) 23, 26

N

拿破仑 *Napoleon* 19
南琛 47, 123, 193-196, 222,
224, 245, 312-314, 333, 452, 464,
487, 494, 498
南瑞 47, 123, 193-196, 222, 224,
245, 312-314, 333, 450, 452, 464
南图 56
尼埃利 *Nielly* 195, 197
尼夫 *Nive* 189, 190
鸟海 343, 365, 388, 412
纽喀什尔 *New Castle* 143
宁绍 473
诺登费尔特-I *Nordenfelt I* 52
诺尔参木顿 *Northampton*
145

O

奥利恩 *Orion* 126, 137

P

潘尼洛布 *Penelope* 144
磐城 76, 343, 365, 388
磐手 483
捧日 53, 237
平远(龙威改名) 135, 226, 241,
242, 247, 248, 260, 278, 307, 337,
344, 345, 366, 367, 371-374, 376,

397, 398, 413, 417, 437, 446, 466
普拉脱 *Pratt* 381
普林斯顿 *Princeton* 19
菩提西阿 *Bouducea* 144

Q

企业 *Enterprise* 183
千代田 329, 342, 343, 365, 368,
369, 374, 388, 411
千珠 343
浅间 483
桥立 328, 343, 365, 368-370,
372, 374, 376, 378, 388, 411, 412
秋津洲 329, 343, 349-351, 353,
355, 365, 368, 370, 385, 387, 388,
403, 411, 412

R

日进 72, 73
日进(日本铁甲舰) 483
日新 114
熔岩 *Lave* 20

S

萨克森 *Sachsen* 128, 129, 157
三邦 73
三笠 483
三卫(天津) 26
山城丸 365
扫荡 *Devastation* 20
司门丸 344
十飞礼 245
士班登 *Spartan* 144

斯卫福舒尔 *Swiftsure* 145
绥靖 96
梭尼 *la Saône* 180, 186, 189, 195
松岛 328, 342-344, 365, 368,
369, 372, 374, 376, 380, 387, 411,
412, 416-418, 436
宿 314, 452, 487, 498
顺明 338

T

泰安 45, 49, 102, 114
泰米雷勒 *Temeraire* 157
太平山 73
特拉斯罗尼 485
天城 76, 343, 365
天津 *Tientsin* (后改名三卫) 23,
26, 28
天龙 343, 365, 411
恬吉 (后改名惠吉) 34, 35, 95
田凫 *Lapwing* 59, 70, 154, 160
通济 (靖远改名) 236, 251, 452,
465, 487, 494, 498
同安 492
图南 361, 366

W

瓦兰人 *Variag* 483
万年清 42, 44, 48, 49, 74
威靖 35, 95, 98, 194, 313, 336,
452
威廉亲王 *Princess Whithelm* 457
威灵顿 *Wellington* 144
威远 47, 49, 92, 113, 114, 135,

145, 148, 167, 173, 194, 202, 240,
242, 243, 267, 277, 278, 330, 333,
347, 349, 351, 359, 398, 411, 418,
433, 462, 466, 472, 487
窝尔达 *le Voka* 168, 180, 181,
183, 184

乌龟 *Turtle* 52
舞凤 499
无畏 *Dreadnought* 121, 495
武藏 342, 350, 365, 411

X

西德尼 442
西京丸 336, 366, 368, 371, 372,
377, 387, 403
遐荒 23, 28
仙航 69
相模丸 403
翔云 (广州机器局制) 56
翔云 (天津机器局制) 237
厦门 *Amoy* (后改名广万) 23,
25, 26, 28
夏洛特·邓达斯 *Charlotte Dundas*
18
小鹰 388
新裕 366

Y

亚细亚 *Asia* 352
严岛 328, 343, 365, 368, 369,
374, 376, 388, 411
扬武 37, 42-44, 49, 63, 74, 89,
92, 138-140, 173, 177, 178, 181,

183,184,209,241,248
 扬武(广州机器局制) 56
 扬威 47,101,102,113,114,121-
 123,125,126,134,135,167,173,
 194,202,205,218,222,224,267,
 277,278,280,297,298,302,330,
 333,337,344,345,347,349,366,
 367,369,370,372,379,433-437
 野猫 *Lynx* 166,180,182,186
 依莫禁 *Imogene* 14
 一统(中国改名) 26
 伊力达斯 *Ilitis*(又译伊尔契斯)
 354,479
 艺新 46,49,181,183,185,397
 益士弼 *l'Aspic* 166,177,178,
 180,186,195
 英蒂巴 *Intibah* 248
 英弗来息白 *Inflexible* 128,129,
 144,157
 应瑞 492
 永保 44,49,74,181
 永丰(后改名中山) 492
 永翔 492
 有功 73
 右队二 366,412
 右队三 366,412
 右队一 412
 鱼雷艇9号 411
 鱼雷艇14号 410
 鱼雷艇18号 410
 鱼雷艇19号 411
 鱼雷艇22号 411
 鱼雷艇23号 388

鱼雷艇45号 166,180,183
 鱼雷艇46号 166,180,183
 驭远 35,36,98,194-196,200,
 211,212
 豫章 492
 元凯 45,49,196
 云扬 110
 Z
 张 314,452,487,498
 朝日 483
 肇安 56
 肇和 492
 则唐 *Zieten* 245
 侦察 *l'Eclaireur* 195
 镇安(后改名海晏) 35
 镇北 101,119,120,148,155,
 222,278,283,298,410,416,
 418,445
 镇边 120,222,278,283,417,
 418,446
 镇东(北洋海军炮舰) 101,119,
 155,222,223,278,283,417
 镇东(招商局轮船) 114,366
 镇二 412
 镇海(广东巡船) 96
 镇海(船政局制兵船) 43,44,
 49,51,89,98,102,282
 镇南 119,155,222,278,283,
 297,366,367,397,417
 镇涛 96,488,495
 镇吴(江苏改名) 26
 镇西 119,155,222,278,283,

370,417
 镇一 412
 镇远 127-129, 135, 137, 157,
 222-226, 247, 248, 250, 263-265,
 267, 274, 277, 278, 299, 302, 318,
 328, 330, 331, 333, 344, 345, 348,
 357, 360, 366-369, 371, 372, 374,
 376, 377, 379, 380, 385, 390, 392,
 393, 396-398, 405, 408, 411, 414-
 418, 432-434, 436, 437, 446, 464,
 483
 镇中 120, 222, 278, 283, 298,
 366, 367, 418
 振威 44, 49, 74, 181, 184
 征服者 *Congueror* 157
 直隶挖河船 52
 致远 135, 136, 138, 224, 226,
 247, 256, 267, 268, 274, 276-278,
 292, 293, 298-300, 302, 307, 312,
 314, 328, 331, 333, 348, 366, 367,
 369, 372, 373, 376, 378, 379, 382,
 433-437
 中队甲 412
 中队乙 412
 中国 *China* (后改名一统) 23,
 25, 26, 28, 168, 187
 筑波 343
 筑紫 342, 343, 365, 388, 410,
 412, 413
 左队二 249, 278, 412
 左队三 249, 278, 412
 左队一 138, 249, 267, 278, 366,
 400, 412